

目 录

序	张学海(1)
---------	--------

鲁西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对几个古史

问题的思考	张学海(1)
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	张学海(23)
东土古国探索	张学海(48)
景阳冈城址刻文陶片发现的意义	王守功(72)
阳谷龙山文化城猜想	张从军(77)
聊城茌平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 陈昆麟 孙淮生 吴明新 孙恒生(86)	
山东阳谷、东阿县古文化遗址调查	孙淮生 吴明新(117)
山东茌平县李孝堂遗址的调查 ... 陈昆麟 马允华 孙淮生(132)	
山东省阳谷县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 李繁玲 孙淮生 吴明新(144)	
鲁西发现两组八座龙山文化城址 省考古所 聊城市文管会(170)	
景阳冈龙山城址考古有重要发现	王守功(174)
东阿前赵龙山文化遗址	孙淮生(178)

鲁西两座龙山文化城内大小夯土台址的功能初探	孙淮生 王庆友(182)
东阿县出土一批战国陶器.....	刘玉新(187)
山东省阳谷县吴楼汉墓发掘简报	陈昆麟 孙淮生 吴明新 杨 燕(189)
聊城地区汉画像石墓调查.....	陈昆麟(213)
东阿发现汉代画像石墓.....	陈昆麟 玉 新 淮 生(218)
堽垸冢之谜新解.....	殷黎明(220)
山东省东阿县曹植墓的发掘.....	刘玉新(222)
高唐郭五里汉墓.....	曲建江(242)
山东临清瓷窑址调查.....	陈昆麟(244)
高唐县国棉厂宋墓清理简报.....	陈昆麟 孙淮生 吴明新(251)
山东临清出土明代墓志.....	殷黎明(259)
山东聊城北宋铁塔保护修复技术.....	周建国 魏 聊(260)
光岳楼墩台修复工程技术.....	魏 聊(268)
光岳楼修复工程技术得失谈.....	魏 聊(275)
今非昔比子建墓.....	默 涛 徐燕萍(286)
千年铁塔重现异彩.....	陈昆麟 徐燕萍(291)
独具特色的古城格局.....	魏 聊(298)
光岳春秋.....	陈昆麟 徐燕萍(303)
谈谈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利用与建设的关系.....	魏 聊(311)
名塔巍然立 又闻风铃声.....	陈昆麟 徐燕萍(317)
山陕会馆维修记.....	徐燕萍(322)
希望集团慷慨解囊 武训祠堂恢复原貌.....	
.....	陈昆麟 徐燕萍(331)

坚持依法办事,四千年前古城得以保护 …	陈昆麟	徐燕萍(335)
临清砖与紫禁城	殷黎明	陶 光(344)
高唐建置考	陈昆麟	(347)
略论《老子》的政治思想	李付兴	(368)
马陵古战场考	陈昆麟	(377)
从孙臆论将看工厂企业厂长、经理的选任	陈昆麟	(384)
“桂陵”擒与“马陵”自刭考	魏 聊	(394)
曹植出生在莘县朝城考	刘玉新	(398)
也谈曹植出生地	孙淮生	陈清义(400)
曹植在东阿事迹考索	刘玉新	(401)
曹植死因勾沉	刘玉新	(406)
鱼山“渔姑庙”溯源	刘玉新	(410)
汉代的“闹洞房”图	刘玉新	(414)
古诗与汉画三题	刘玉新	(417)
汉画撷英拾趣	刘玉新	(423)
汉画中的汉代社会风情略述	刘玉新	李清洪(433)
运河发展简史	陈昆麟	(439)
运河与聊城地区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陈昆麟	(453)
运河与临清城的变迁	殷黎明	(482)
傅斯年与考古学	陈昆麟	徐燕萍(488)
称谓习俗与远古的婚姻形态	魏 聊	(497)
中国古代钱币之最	陈昆麟	(501)
论賸化圆钱产生的划时代的意义	陈昆麟	(515)
阳谷景阳冈出土骨贝币管见	孙淮生	(525)
浅谈几种唐代货币及其相关问题	吴明新	(530)
论聊城地区发展文物旅游业之优势	陈昆麟	(534)

临清市征集瓷器选介·····	殷黎明(548)
《乾隆英使觐见记》与马戛尔尼·····	殷黎明(550)
临清穆斯林·····	黎明 建文 陶光(553)
浅谈《戒赌碑》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	刘玉新(556)
依法强化管理 确保文物安全·····	陈昆麟(559)
后 记·····	(5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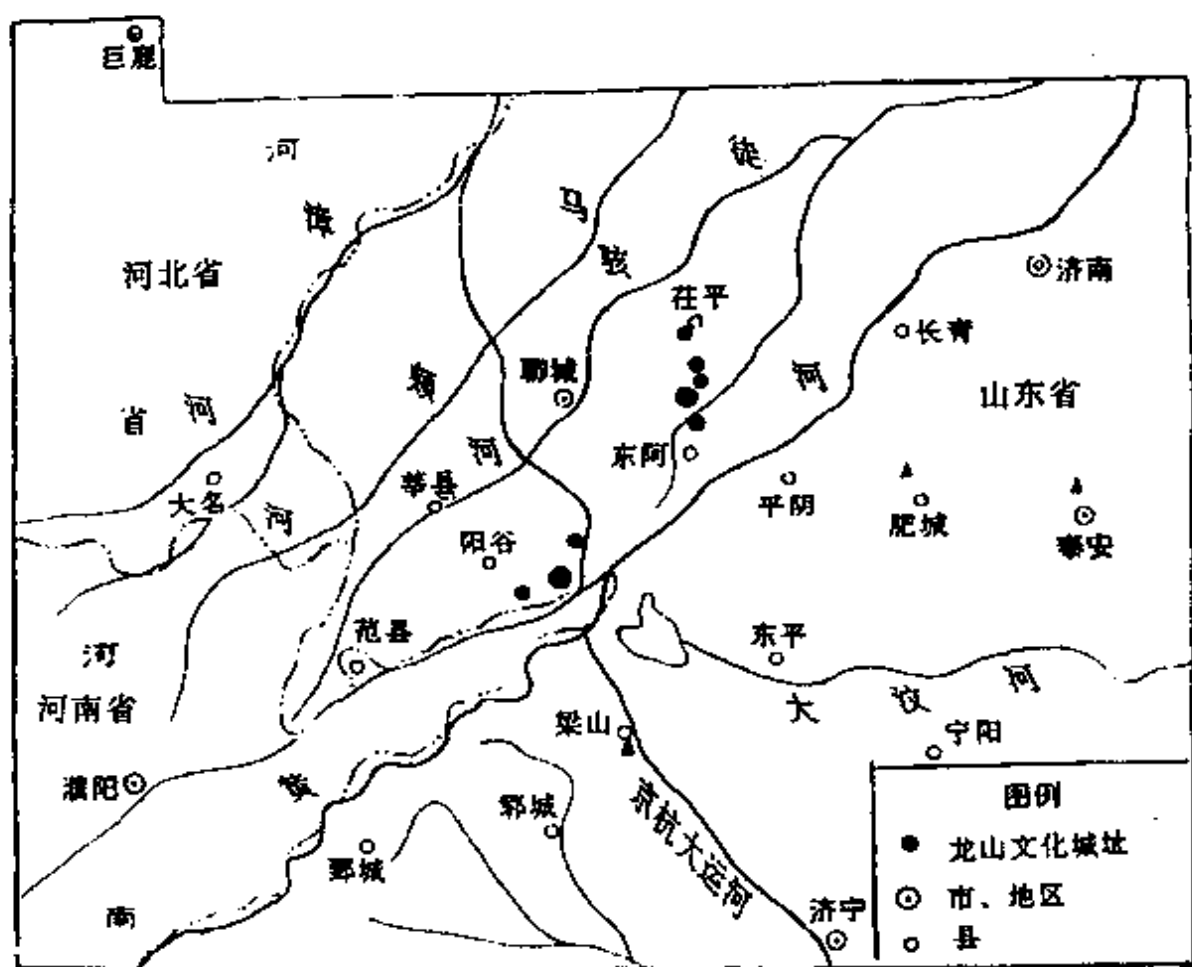
鲁西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 及对几个古史问题的思考

张学海

七八十年代山东的文物普查,在鲁西聊城地区的徒骇河上游,先后发现了以茌平县和阳谷县为中心的两个古遗址群,其中都包含着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商周时期的遗存。1994年11月,聊城地区文化局文物研究室在配合阳谷县景阳冈公园工程的钻探中,发现景阳冈龙山文化遗址有夯筑城垣,接着在城内又发现有大型夯筑台址。12月下旬,又对景阳冈龙山城、阳谷县的王家庄、皇姑冢,东阿县的王集,茌平县的教场铺、大尉、三十里铺(乐平铺)、尚庄等龙山文化遗址作了勘查。这些遗址都有挖沙坑、取土坑或有水渠通过,大部分坑壁、渠壁上暴露着龙山文化城垣遗迹,略作钻探,多能得知大体范围,包括景阳冈遗址在内,共发现了8座龙山文化城址,可分南北两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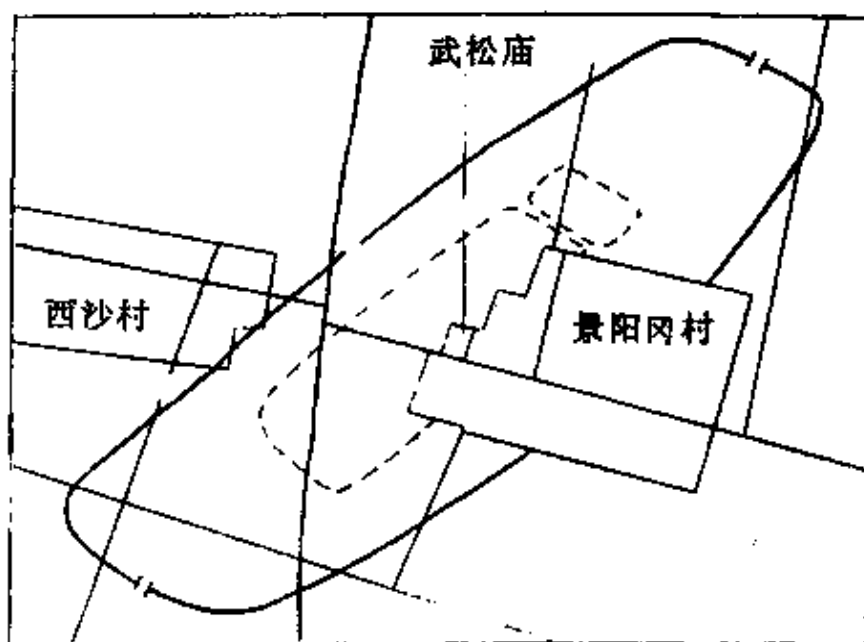
南组3城,即阳谷县景阳冈、皇姑冢和王家庄龙山城,以景阳冈龙山城为中心(图一)。

景阳冈龙山城,位于阳谷县东南18公里张秋镇景阳冈村周围。城平面近横长方形,两端较窄,中部弧形凸出,西南东北长约1150米,北端宽约230米,南端宽约330米,中部最宽处约400米,面积约39万平方米。地面已无城垣遗迹,地下城垣保存完整。城址东北角现有南北向水渠穿过,从水渠西壁可见耕土下即有岳石文化城垣残基,其外侧被东周城垣残基打破。岳石文化残垣下压龙山文化城垣,其顶部到水渠底高1米余,渠底已见水,无法钻探,



图一 鲁西龙山文化城址分布图(1:2000000)

估计渠底以下还应有四五米以上的城垣。水渠壁上暴露的龙山城垣内侧夯层向里倾斜,夯层较厚,不规整,城垣外壁陡直。打破内侧城垣的灰坑,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在南、西、北三面城垣的中部,均有一缺口,未知是否是城门(图二)。城内中部有大小两个夯筑台址。



图二 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平面示意图

大台呈圆角扁长方形,方向与城平行,南北长约 520 米,两端宽 175 米左右,台址面积约 9 万余平方米,原由西南向东北倾斜,西南部最高处高出地面约 3 米,即俗传武松打虎的景阳冈。1969 年至 1975 年,逐渐由东向西取土,村子随着向西推进。1976 年,大规模挖土填沟,台址地表以上部分基本上被削平,今仍保留着原高度的残台址,只有中部武松庙基处和村西南一小部分。台址原高约 5~6 米,但有多层台面,估计台址是逐步加高的。此台址基本上用生黄面沙土筑成,但在台址西南部的前沿夯土中,可见龙山文化遗物,知台址经过扩建。小台在大台东北 15 米处,呈东西向的圆角长方形,东西长约 130 米,南北宽约 60 米,面积约 8000 平方米,原来和大台一样高出地表,1976 年与大台同时削平。在台址与城垣之间,有丰富的文化堆积,基本上都在地表下 2 米余。

皇姑冢龙山城,在景阳冈龙山城西南 8 公里处,位于阳谷县南

7.5 公里皇姑冢叶街村东,平面也呈东北、西南向的扁长方形,南北长约 400 余米,东西宽 150 米,面积约 6 万平方米。1973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曾在城内堙堆处作过试掘,发现有后岗一期遗物。目前暴露的堆积,主要属龙山文化时期。

王家庄龙山城,在景阳冈龙山城东北 10 公里,位于阳谷县阿城镇王家庄西北,已被阿故城(汉东阿县城)东南角所压,阿故城城垣东南角即筑于龙山城东城垣之上。在其北的东西向水渠北壁与阿故城东垣相对的部位,可见用生黄面沙土筑成的城垣,并有上下层之分。上层夯层较规整,层厚约 8 厘米,下层难辨夯层。下层城垣被一小灰坑打破,坑仅残存坑底,深不到 20 厘米,所出 16 片陶片,只有两片似为龙山文化陶片,其余全是大汶口文化陶片,城的始建年代当不晚于龙山文化早期。因城内黄河淤积深达 2.3 米以上,且不到 2 米即见地下水,钻探困难,龙山城的范围未详,估计面积在 3~4 万平方米之间。

北组 5 城,即在平县的教场铺、大尉、乐平铺(三十里铺)、尚庄和东阿县的王集龙山城,以教场铺龙山城为中心(图一)。

教场铺龙山城,位于在平县南乐平铺镇教场铺村的西北,北距在平县城 20 公里,西南距汉在平故县所在地高垣墙约 6 公里。城平面呈横长方形,钻探得知龙山文化堆积的范围东西约 1100 米(西面到仇陶村中部),南北 300 余米,面积约 33 万平方米,如加上城垣宽度,估计城的面积达 40 万平方米左右。地面已无城垣遗迹,探知地下东垣宽 30 米,夯土特征有二:西半部 10 余米用生黄面沙土筑成,土质纯净,较松软,当为龙山城垣;东半部城垣属黑黄色细花夯土,质坚硬,应晚于龙山文化时期。其它三面城垣湮埋较深,未细探。城内有两个东西并立的夯筑台址,东台东西约 100 米,南北约 160 米,面积约 1.6 万平方米;西台东西长约 800 余米,南北宽约 160 米,面积约 14 万平方米。两台间隔约 70 米。东台

东部因挖沙受到破坏,据断面和在坑底的钻探,知台高 6 米,台址高出地表 1 米余,其上还有 1 米左右的晚期堆积,形成一个大堦堆,由东向西呈漫坡状。城内中部地面有丰富的商代后期陶片,周、汉陶片随处可见,堦堆断面有汉石匣墓,挖沙坑偶见大汶口文化陶片,并有特大型的龙山鸟首形鼎足。

王集龙山城,在教场铺龙山城东南约 3 公里处,位于东阿县城以北、王集村西到村南一带。平面呈圆角长方形,东北—西南向,南北长 320 米,东西宽 120 米,面积约 3.8 万平方米。地面不见城垣遗迹,地下城垣范围清楚,用生黄面沙土筑成,难辨夯层。城址地面隆起,龙山文化堆积原高于现地面,已受到破坏。地面见有商周陶片,断崖有汉墓暴露。

大尉龙山城,在教场铺龙山城东北 3 公里处,位于茌平县乐平铺镇东南。地面原有较大堦堆,现其北部大半因挖沙而破坏殆尽,东北部已成鱼池。堦堆南部残存的面积已不到 1000 平方米,高约 3 米,上部属商周时期和汉代堆积,可见商周陶片和汉墓,底部为龙山堆积。城址东北角、西北断崖上均暴露有城垣遗迹,龙山城垣用生黄面沙土筑成,土质纯净;西北角见有黑黄色细花夯土城垣,土质坚硬,当晚于龙山文化时期。龙山城垣范围未作钻探,据龙山堆积分布范围,东西约 150 米,南北约 200 米,面积约 3 万平方米。

乐平铺(三十里铺)龙山城,在教场铺龙山城东北 6 公里处,位于乐平铺北街东南,平面近似圆角方形,东西约 200 米,南北约 170 米,面积 3 万余平方米。地下城垣范围清楚,城垣西南角仍如坟丘般高出地面,其它部分地面均已不见。在城址东部取土坑的断面上和穿过城址中南部的东西向水渠的北壁,均暴露有东城垣,系用生黄面沙土筑成,夯土纯净,不辨夯层。南垣中部探出一缺口,似为城门。因挖土和平整土地,城址上部堆积已被挖掉。因地下水位高,无法深探,现存堆积厚度不详。

尚庄龙山城,在教场铺龙山城以北 19 公里处,位于茌平县城西南、尚庄村东。北垣呈直线,西垣中部外凸,南垣呈弧形,东垣未探出,但位置大体可定。现城址的西南角、东北角各有挖土坑,断面均暴露有城垣。龙山城垣用生黄面沙土筑成,夯土纯净,可见夯土层。东北角还见晚期城垣,时代未详。龙山城址面积约 3 万余平方米,地面显著隆起,1975 年、1976 年在西南部两次试掘,发现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文化三期堆积。

此外,在教场铺龙山城东北 21 公里,有台子高龙山文化遗址,地面有高大城墙,可能是座龙山城。教场铺西南 3 公里,有迟桥龙山文化遗址,俗称孟尝君遗址。传孟尝君屯兵于此,而在教场铺练兵,故名教场铺。迟桥遗址地面也有城墙,可能也是座龙山城。

综观这两组龙山城和这两个古文化中心的龙山文化遗址,具有如下特征。首先,每组龙山城都有一座约 40 万平方米的中心城,中心城内都有一小一大的大型夯筑台址。小台都居东,大台都在西,虽然目前还不了解台址的功能,但这种一致性已令人深思。其次,中心城周围有若干小城,已知阳谷组有 2 座,茌平组有 4 座,实际上都可能超过此数。它们的面积大都在 3~4 万平方米,其中阳谷组的皇姑冢较大,约 6 万平方米。这些是城组中的二级城。第三,这两个古文化中心,一般的龙山文化聚落数量较少,茌平古文化中心约 30 余处,阳谷古文化中心更少,这比黄河以东地区的许多古文化中心的龙山遗址少得多,大概有不少龙山遗址被黄河淤积湮埋而未露。一般聚落较少,也可能反映了人口向城邑集中。频繁战争和水患,可能是促使人口集中的重要因素。第四,这两个古文化中心的范围都相当大。据龙山遗址的分布范围,茌平古文化中心东北到西南约 40 公里,阳谷古文化中心东北到西南约 80 公里。综上可知,茌平、阳谷这两个古文化中心,在龙山时代已形成“都、邑、聚”的金字塔形三级社会结构。中心城是“都”,二级城

是“邑”，还有一批一般的聚落，如能证实中心城的大小台址是宫殿和宗庙基址，就能肯定是两个古国。这可能是一种脱胎于部落的古国。这对研究黄河文明、中华文明的形成，中国国家的产生，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态和国家发展的进程等重大史学与理论课题，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茌平、阳谷所在的聊城地区，属《禹贡》兖州之域，汉为东郡地，处于冀、鲁、豫三省交汇地带的东部。冀鲁豫交汇地带是黄河中、下游和华北东北三方文化最先接触、交融的中心区，是中国古史演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舞台，五帝时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该地区曾是蚩尤、少昊族的活动范围，有学者认为涿鹿之战可能发生在该地区北部的巨鹿县一带。区内的古濮阳县是古史传论的帝丘，顓頊之墟。文献记载，陶唐氏的火正阼伯、夏王相、夏伯昆吾、商先公相土、卫成公等都曾居于此。五十年代以来，在这一地区已有磁山文化、后岗一期文化、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大汶口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后岗类型、山东龙山文化、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等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如今又发现了成组的龙山城址，不仅显示出古济水西岸的茌平、阳谷一带，曾是古史上一个极重要的政治中心，而且为冀鲁豫交汇地区在上古史上的特殊地位，增添了一项十分宝贵的新物证，自然也引起我们对一些古史传说的新思考。现把对蚩尤、涿鹿之战、穷桑、虞舜的地望以及五帝封泰山等问题的思考写出来，以就正于学术界。

一、关于蚩尤的地望和涿鹿之战的发生地

蚩尤，高诱注《战国策·秦策》、马融《经典释文·吕刑下》都说他是九黎君长，自清末以来，学者几乎都以蚩尤属于苗蛮集团。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根据文献对蚩尤的族属和地望作了详细考证，认定蚩尤九黎族属于东夷集团，活动于冀鲁豫三

省交汇地带,证据充足,令人信服。徐氏虽未明确指出蚩尤居于何地,但注意到了汉代人 对蚩尤的传说和秦祀兵主蚩尤,都在山东西部的东平一带、在太昊后人的封国范围内。按《史记·封禅书》记秦祀东方八神将说:“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①又《汉书·地理志》^②东郡寿良县自注:“蚩尤祠在西北涑上”。涑应是洸,涑为济古文,洸上即济水滨。此祠应当就是秦祭蚩尤的地点,地当在今梁山县北境。《封禅书》又说:“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可见东方八神之祀,由来久远,或许起自史前的东夷集团,也未可知。蚩尤虽战败被杀,但无疑是东夷集团的英雄,战死而受到本族的祭祀,是情理中事。而同族祭祀蚩尤的地方,最有可能是在他原来的居地附近。开始只是祭祀有业绩的祖先,后来才演化成战神之祀。寿良,西汉属东郡,东汉光武帝避叔父赵王良讳改寿张,属东平。据《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六·鄆州》寿张县条和《大清一统志·山东兖州府》古迹条,汉寿良故城在梁山县梁山以北约 18 公里的寿张集,本是春秋良邑,应是卜辞的良地。县境主要在今黄河南岸,后来因黄河泛滥冲毁县城,县治北移至阳谷寿张镇,1964 年县撤销,地分归阳谷、东阿和台前县。阳谷县,乃隋析东阿县阳谷亭所置。阳谷古文化中心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集中于县东北到县南一带,属汉东阿县境,南与汉寿张县邻接。寿张县还有蚩尤墓的传说。《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说:“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阡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③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相互参证,推测古济水两侧,今东平、东阿、阳谷、台前、梁山等县一带,曾是蚩尤族的中心地区。

蚩尤和炎帝、黄帝同时。据徐旭生考证,炎黄是华夏集团的两个分支,起自陕西西部黄土高原,不知什么时候向外迁徙。炎帝一支沿黄河南岸向东发展,到达豫北、豫东北一带;黄帝一支自黄河北岸沿中条山、太行山到达北京一带,乃至远到燕山以北。先是到

达豫东北一带的炎帝族和东夷集团的蚩尤族发生冲突、争斗,炎帝族战败,求救于黄帝,黄帝与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杀了蚩尤。这一事件,最早见于《逸周书·尝麦解》。^④但说战于涿鹿的是蚩尤与赤帝(即炎帝)。《史记·五帝本纪》、《盐铁论·结和》和先秦有关记载,都说涿鹿之战的双方是黄帝与蚩尤。而涿鹿之战的发生地,一直聚讼未决。

涿鹿之战的地望,史学界大体有北、中、南三说。北说在涿县或涿鹿县,前者在北京市西南,今河北涿州市;后者在北京市以西桑干河北岸。南说在彭城。《太平御览·州郡部一》引《帝王世纪》说:“黄帝都涿鹿,于《周官》幽州之域,在汉为上谷。而《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南’,然则上谷本名彭城。”《路史》、《续汉书·郡国志》上谷郡涿鹿注、王应麟《地理通释》都引《世本》,主涿鹿在彭城(《郡国志》、《地理通释》引《世本》彭误作鼓)。此彭城实为宋之彭城,即今徐州市,并非汉代“上谷本名彭城”。中说在今河北南部的巨鹿县一带。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95页)说:“如果从九黎的地望猜测,或在河北南境今巨鹿县一带,也很难说。巨、涿古音虽不同部,但音近,可互转。”徐氏说这仅是一个推测,以备今后工作的参考。但这一猜测很有道理,涿鹿之战是华夏和东夷部族集团的战争,主战场应在冀鲁豫交汇地区,参加战争的华夏集团有黄帝和炎帝两支,东夷集团有蚩尤、太昊、少昊各支。先是蚩尤大败炎帝,炎帝“九隅无遗”,地盘尽失,东夷集团大概控制了冀鲁豫交汇地带。此时的黄帝可能活动于燕山南北一带,势力强盛,在同族系的炎帝遭受惨败以后,就南下讨伐蚩尤。战争可能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终于在涿鹿之野杀了蚩尤。当时黄帝未必能深入蚩尤控制范围以内很远,所以涿鹿之战发生在蚩尤控制范围的北境附近、河北南部巨鹿县一带的可能性最大。

二、关于穷桑的地望

穷桑也称空桑，在古史传说时代是个很重要的地方，古文献不乏穷桑或空桑的记载。例如：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实不失职，遂济穷桑。”杜预注：“地在鲁北。”

《山海经·北山经·北次三经》空桑之山郝疏引《启筮》：“蚩尤出自羊水，以伐空桑。”^⑤

《吕氏春秋·古乐》：“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

《淮南子·本经》：“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高诱注：“空桑在鲁地。”

《史记·周本纪》正义：“《帝王世纪》云：‘炎帝自陈营都于曲阜。黄帝由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太平御览·皇王部》引，下多‘故或谓之穷桑帝’七字）。颛顼始都穷桑，徙商丘’。^⑥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

这穷桑或空桑，和黄帝、蚩尤、少昊、颛顼、共工、舜等著名人物密切相关，至今不明何处。郝懿行据《山海经》说空桑有三地，一在青、兖间，一在赵、代间，一在莘、魏间。实际上，《山海经》有明确记载的空桑之山只有两处，一见于《东山经·东次二经》，一见于《北山经·北次三经》。我们要找的空桑，似应在《东山经》空桑之山附近。

首先，《山海经·东山经》说：“《东次二经》之首，曰空桑之山，北临食水。”食水者，“《东山经》之首曰榑兹之山，北临乾昧。食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海。”此食水应在青、兖之地。空桑之山在食水南，是知作为居地的空桑，不在西部青州，就在中部兖州之域。又《山海经·海内经》：“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郭璞注引《世本》说：“颛顼

母，涪山氏之女，名昌璞。”郝懿行疏：“《大戴礼·帝系篇》云：‘昌意取于蜀山氏之子，谓之昌仆氏，产颡顼。’郭引《世本》作涪山氏，涪、蜀古字通，涪又通淖，是淖子即蜀山氏也。”吕思勉《读史札记》说：“然则蜀山氏之蜀，乃涿鹿、独鹿之单呼，其字可作涪，亦可作淖；乃望文生义，附会后世之蜀地，岂不谬哉？”吕说可信。但证之考古资料，涿鹿、涿县所在的北京市以西到西南一带，古文化遗存不多，而河北西南部则有丰富的古文化。其中分布着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是重要的古文化分布区。这里的巨鹿县与涿鹿音近，可互转，涿鹿之战很可能发生在这里。古蜀山氏或许在巨鹿县一带，也难说。而颡顼“实处空桑”，那么空桑应离巨鹿不远。

其次，《海内经》说“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王蒙友《说文释例》说若即桑字，那么若水也就是桑水。此桑水应在兖州之域。兖州古代盛产蚕桑，桑林很多。《禹贡》“桑土即蚕”，《礼记·乐记》“桑间濮上之音”，都可证明，因而有“兖州桑土之野”之称。桑水可能是流经“兖州桑土之野”的一条河流。汉东郡辖境一带，可能是“兖州桑土之野”主要的蚕桑产区，说不定桑水就流经该地区。桑水和蚕桑产地有关系的另一证据，是嫫祖发明养蚕的传说。《路史·后纪五》：“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嫫祖，以其始蚕，故又礼先蚕。”嫫祖之子“昌意降处若水”，若水即桑水，那么嫫祖，实际上是黄帝族，也应当居于桑水或附近。所居属于蚕桑产区，所以就有了嫫祖发明养蚕的传说。此传说可以说明黄帝、嫫祖的居地是蚕桑产区。他们的孙子“帝颡顼”生于若（桑）水，实处空桑。空桑与桑水或有关系。颡顼由空桑徙商丘，即帝丘濮阳，是知空桑应离濮阳不远。

第三，穷桑与少昊关系密切，少昊有穷桑帝的别号。《帝王世纪》：“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曲阜是少昊之墟，是知穷桑离曲阜也不能太远。

第四,《淮南子·本经》:“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知空桑是个地势低下,易遭水患的地方。

那么,和巨鹿、濮阳、曲阜都不很远,地势低下而有水患之虞,而且和古兖州的蚕桑产区有密切联系的穷桑会在哪里呢?和这些条件相符合的,唯有山东西部的聊城地区和河南的台前、范县,山东的鄄城、鄆城县一带。今在该地区的茌平、阳谷发现了两组重要的龙山文化城,尤其是在茌平县龙山城,城址更多,中心城的规格似更高,1975年、1976年对其中的二级城尚庄龙山城进行了试掘,出土了一些颇有气魄的龙山文化陶器,说明茌平一带在当时是个极为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推测茌平可能就是古穷桑所在(笔者现认为穷桑应在今阳谷县一带,参见本集《东土古国探索》)。

聊城地区当汉东郡的东北境,古兖州的中部地段,地势低洼,是著名的黄河冲积区。茌平县位于聊城地区的东部,古遗址集中分布于县境的东北到西南部,向南延伸到东阿的北部和南部。教场铺龙山文化中心城在县南20公里,西北距河北巨鹿县、西南距河南濮阳县、东南距山东曲阜市各约130公里左右,都不太远。少昊氏可能先居于此地,所以少昊氏有“穷桑帝”之称,后来迁到了曲阜。迁曲阜之前,和居于今阳谷一带的蚩尤,实南北毗邻,所以蚩尤有“伐空桑”的举动。蚩尤伐空桑,实际上是伐少昊。此时的蚩尤可能已是东夷集团的大首领,也可能在伐少昊之后成为东夷的大首领,而统率东夷集团与炎、黄进行了斗争。《逸周书·尝麦解》记载:“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赤帝”就是炎帝。蚩尤是九黎之长,“命蚩尤宇于少昊”,是说天帝命蚩尤居住在少昊氏的居地,

也就是少昊族迁曲阜前的穷桑,反映出蚩尤已成为东夷集团的大首领。接着就是蚩尤赶走炎帝族,黄帝杀蚩尤。当时的太昊族,可能活动于泰山、黄河间。黄河东岸的东平县,有太昊后人的封国宿和须句,而泰山以南 30 余公里的大汶口遗址,是大汶口文化时期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其规模之大,文化内涵之丰富和发展水平之高,早为考古界所瞩目,也许就是太昊氏的居地。蚩尤、太昊、少昊可能是活动于山东西部、今黄河两岸的三个强盛的东夷部落,处于东西北三方斗争的战略要冲地区,所以他们都参加了涿鹿之战,结果都战败被杀。《盐铁论·结和》:“轩辕战涿鹿,杀两焯、蚩尤而为帝。”两焯即两昊,即太昊、少昊,指两族的首领。黄帝杀了蚩尤和两昊的首领,制服了东夷集团,占领了穷桑,成为黄河中下游集团公认的首领,而成为“帝”。其后,一方面扶持了一位叫清的人为少昊族的新首领,统率少昊、蚩尤旧部,少昊族大概就在此时迁到了曲阜。估计太昊族也可能在此时南迁的。另一方面,黄帝又合嵬泰山(《韩非子·十过篇》)。泰山本是东夷集团的神山,黄帝此举虽不无耀武东夷之意,但也是盟主的职责。涿鹿之战后,黄帝族可能就在冀鲁豫交汇地区定居下来,而以穷桑为大本营,该地区进入一个文化融合和族群重组迅猛发展的时期。黄帝后裔颛顼高阳氏是该地区后来出现的一个重要古国。颛顼“后徙商丘”,此商丘即帝丘濮阳,在穷桑即在今教场铺龙山城西南 130 公里左右。五帝时代的冀鲁豫交汇地区,是东西北三方文化激流汇集的漩涡,高阳氏处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文化和社会都会得到较快的发展,而处于领先地位。颛顼在宗教上采取了“绝地天通”的措施,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不仅黄帝、蚩尤、少昊、颛顼都曾居于穷桑,而且虞舜也可能建都于此(详后)。此外,还有伊尹生于空桑的传说,推测也是此地。

考穷桑或空桑,在古济水西岸、徒骇河上游的茌平县一带,有

关古史传说似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

三、关于虞舜的地望

舜的传说流传极广,遍及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湖南、浙江等广大地区。古书关于舜的出生地、都邑和葬地的记载,紊如乱丝,说的比较系统似可信据的是孟子和司马迁。《孟子·离娄》下篇:“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公孙丑》下篇又说:舜“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冀州人也。舜耕于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⑧《史记》的“耕于历山”,就是《孟子》的“耕稼”;“渔雷泽,陶河滨”,就是《孟子》的“陶渔”;“就时于负夏”,就是《孟子》的“迁于负夏”。《管子·版法解》、《墨子·尚贤》、《尸子》、《吕氏春秋·慎人》、《书传》、《淮南子·原道训》等,都有相关内容的记载,必有根据。但是,孟子说舜是东夷人,司马迁则说是冀州人,说法不同。按孟子说舜生于诸冯、是东夷人时,是和说文王生于岐周、是西夷人对举的,应比较可信。东夷之人,也就是东土之人。但舜出生的诸冯在东土什么地方,并不清楚,还有一个寻找舜都的问题。探寻舜的出生地和都邑,后者更重要。两者可能是一地,也可能是两地,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便是两地也不会相距太远。由于古代同名异地、同地异名的现象很普遍,因此,在缺乏确凿文献记载的情况下,只有依据考古资料,对有关文献记载进行梳理,才有可能得出正确或近似的结论。在平、阳谷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重要发现,说明这里存在着两个重要的古国,会是什么古国呢?参证有关虞舜的文献记载,以及在平组龙山城的规模、气势,推测在平古国应是虞国,教场铺龙山城可能是虞舜之都。根据如下:

1. 据初步勘查,两组龙山城的中心城教场铺和景阳冈龙山城,地下水位以上的城垣属于龙山中期到夏初(水位以下还有更早的

城垣),虞舜所处的时代约当龙山文化后期,两者的年代一致。

2.教场铺和景阳冈龙山城面积大,城内都有两个大型夯筑台址,气势宏伟,而且周围各有若干小城。尤其是教场铺龙山城,面积近40万平方米,城内大台址近14万平方米,周围的二级城多达4座以上,这与虞舜的显赫地位相适应。诚然,山东东部五莲县的丹土遗址,也是一处大规模的、极其重要的龙山文化遗址,可能是座龙山城,而且北临传为舜出生地诸冯所在的诸城县,为什么不说舜居丹土呢?这是因为教场铺位于冀鲁豫交汇地带,处于东方集团西进的前沿,五帝不过是黄河流域一些强盛古国的首领,并非以后的帝王天子,他们的威名之所以流传后世,和他们处于两大集团斗争的前沿地区有关。当然,还有下列文献作依据。丹土遗址偏居鲁东南沿海,不是舜的都邑是无须多讨论的。

3.《史记·五帝本纪》所说的“舜耕于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勾勒了有虞氏的活动范围。只要确定历山、雷泽、河滨、寿丘和负夏的大致地望,也就知道有虞氏的大体活动范围。

历山,各地叫历山的地方不少,当以唐濮州雷泽县的历山为是。《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濮州雷泽县有历山、舜井,又有姚墟,云舜生处也。”^①《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七·濮州》雷泽县:“历山,在县北十六里。《史记》曰:‘舜耕于历山。’”^②又说:“姚墟在县东十三里,舜生于姚墟。”按隋开皇六年置雷泽县,本为汉成阳县,因县北雷夏泽而得名,治所在鄄城东南境,金贞元二年废入鄄城县,历山、姚墟应在今鄄城东南境一带。

雷泽,即《禹贡》雷夏泽。《史记·夏本纪》集解说:“郑玄曰:‘雍水、沮水相触而合入此泽中。’《地理志》曰:‘雷泽在济阴城阳县西北。’《正义》说:‘《括地志》云:‘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雍、沮二水在雷泽西北平地也。’”^③知雷夏泽约在今鄄城东南境。

河滨,河即黄河。黄河之名似起自东汉,西汉以前河为黄河专称。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据卜辞地名,考定商代后期黄河下游的部分河道,大致由今河南省郑州市以北向北流经淇县东南,又东经浚县南,至濮阳县西南故县村西,北折经今濮阳市北,东北流至大名市东南,经鲁西北、河北,流入渤海。据《史记·河渠书》,黄河河道自夏至西汉初,并无大变化,估计唐虞时代的黄河,基本上也是这个走向,在荏平、阳谷以西不很远。沿河滨随处可以烧制陶器,不必固定在某一地。

寿丘,皇甫谧说在鲁城东门以北,似无异说。鲁城在今曲阜市,西距鄆城约 130 公里。

负夏,《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郑玄说:“负夏,卫地。”^④推测负夏因雷夏而得名,负夏义如负海。果真为此,负夏就应在雷夏泽附近。

值得注意的是,在鄆城、睢城一带,有更多的舜的传说。这一带正与阳谷古文化中心接壤,北距教场铺龙山城不到 100 公里,本属蚩尤、少昊和颛顼的活动范围,在考古文化上属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分布区,与孟子说舜是东夷人相吻合。

4.《国语·鲁语》上说:“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商人禘舜而祖契。”说明他们曾先后处于同一地域,所以在族源上有渊源关系。前已说过,黄帝族南下打败东夷集团后,就定居于冀鲁豫交汇地区,与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族群共处,而以穷桑为大本营,冀鲁豫交汇地区揭开了文化融合和古族重组的新篇章。颛顼高阳氏是黄帝族的分支,也可能是以黄帝族为核心而在该地区形成的新族。颛顼“始都穷桑,徙商丘”。穷桑在荏平,商丘就是帝丘濮阳,是颛顼之墟,知颛顼高阳氏是以冀鲁豫交汇地带的汉东郡辖境为中心的古族,与东夷集团的少昊族东西相邻,关系密切。少昊、颛顼族不仅都曾居于穷桑,而且《山海经·大荒东经》还有“少昊孺帝颛顼”

的记载。孺,郝解为“孺养”,就是说少昊氏曾养育过颛顼。《尚书·吕刑》还记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史记·历书》:“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⑨重是少昊氏的四叔之一。以上足见颛顼、少昊族关系的密切。至于商族,当起源于太行山东麓,河北西南部到豫北一带,这一地域有着丰富的先商文化,商先公先王的活动大都在这一地域。商人始祖契,《尚书·汤誓伪传》、《史记·殷本纪》、《诗·商颂谱》都说契封于商。王国维、吕思勉认为即今商丘县,^⑩但此商丘是周封微子于宋以后才有的名,本是卜辞的宋地,这一带属于岳石文化的分布区,契未必活动在这里。古帝丘又称商丘,即颛顼之墟濮阳,也许就是契居的商,所以又有商丘之称。濮阳在漳河南,漳河流域是先商文化漳河型的中心。契迁蕃。近人丁山说:“汉常山郡薄吾县,战国时谓之番吾,亦作蒲吾,在今平山县境,即蕃。”^⑪有认为蕃在山西永济县。^⑫据河北南部有丰富的先商文化的事实,蕃似应在河北境内。契子昭明居砥石,丁山认为在今河北隆尧、柏乡、宁晋诸县间。^⑬昭明子相土居商丘,即帝丘濮阳。《左传·僖公三十一年》:“卫迁于帝丘。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杞曾何事?’”《御览·皇王部》引《世本》说:“相徙商丘,本颛顼之墟”。《史记·郑世家》:“迁闾伯于商丘。”^⑭《集解》引贾逵云:“商丘在漳南。”《汉书·地理志》:“东郡治濮阳县,卫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颛顼墟”^⑮古以商丘、帝丘为一地,在汉濮阳县,治所在今县西南的故县村。商族六世祖冥,《国语·鲁语》上说“冥勤其官而水死”。商人祖契而郊冥。知冥所居必不出水患严重的兖州之域。冥子王亥,《山海经·大荒东经》曰:“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楚辞·天问》也记有此事。王国维指出,三书所记实为王

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王氏以为有易当在河北易水一带。邹衡先生指出,古易水有南北之分,今河北滹沱河当是古北易水,漳河为古南易水,并根据河北南部和漳河流域大量存在的先商文化和文献关于漳河一带广泛流传河伯娶妇的传说,得出结论说:“南易无论是指滹沱,还是指漳河,都是先商文化漳河型的中心分布地区,因此我们认为先商时代有易的地望,应在滹沱河与漳河之间。”^④又《路史·国名记》说:“邶,上甲微居。”知王亥、上甲微时期,商族以漳水流域为活动中心。汤始居亳,亳地当以郑州商城说为是。综上,知商人祖先主要活动于河北南部、河南东北的太行山东麓、黄河沿岸,其活动范围基本上覆盖了颛顼高阳氏的中心活动区。那么时代界于颛顼和商人之间,有着渊源关系的虞舜的地望与颛顼、商人先祖的活动范围,必定有密切联系。在平、阳谷两组龙山城,以及集中了更多虞舜传说的雷夏泽周围,属于汉东郡与济阴郡辖境的一部分,在颛顼中心活动区的范围内。《左传·昭公八年》说:“陈,颛顼之族也。”陈为舜后,是知有虞出自颛顼高阳氏,两者有着共同的活动范围,证明有虞与颛顼确有渊源关系。目前我们还不清楚聊城地区是否属于先商文化的分布范围,但至少可以说是先商文化的紧邻或交错地带吧,因此,就有充分理由推测有虞不出该地区。

5.《淮南子·本经》说:“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高诱注:“共工,水官名也,柏有之后,振,动也。滔,荡也。欲雍防百川,滔高堙库,以害天下者。薄,迫也。空桑,地名,在鲁地。”从这条文献和高诱的注中,知空桑是个易遭水患,地势低下的地方。共工氏是个古老的氏族,徐旭生考共工氏在汉共县即今河南辉县一带。该地正处于黄河进入下游河段的西岸,是开始产生水患的地段。黄河自青海高原奔腾而下,到达豫北平原,在郑州市西北北拐,进入下游,水势变缓,从黄土高原冲刷下来的大量泥沙,迅速沉

淀淤积,又承源自太行山东流的河水,水量大增,汛期极易泛滥成灾,首当其冲的就是兖州之域。共工、鯀、禹治水的传说,主要在兖州。共工处于黄河流经兖州的上游河段,在平龙山城所在的聊城地区,当中部兖州之域,处于下游,所以共工氏能利用洪水来危害穷桑。据《淮南子》等书记载,共工氏和颛顼、帝喾都有斗争。此条文献则说“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似乎既反映出此时的共工和虞舜是相邻而敌对的族,同时又隐含舜居空桑之意。

综上五点,说在平古文化中心曾为虞舜所居,教场铺龙山城曾是虞舜之都,应可说得通。在古雷夏舜周围,即约当今鄄城一带;集中了较多的舜的传说;又河南东部的虞城县,旧有舜子商均居地之说(徐旭生以为即舜所都);虞城西南方的淮阳,是太昊之墟,陈建都于此,陈为舜后,这些踪迹似乎反映出舜的后人,曾逐步南迁。

四、关于五帝封泰山

《史记·封禅书》说:“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虑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皆受命然后得封禅。”^②《正义》释封禅说:“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五经通义》说:“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封禅应由原始社会祭祀天地山川的活动发展而来,《五经通义》说的封禅,已是文明社会的事。王者通过封禅,表明自己的王权授于天,借天神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是封禅的目的。因此,这种封禅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原始社会祭祀天地山川,所祀的是自己氏族、部落境内的灵山大川。五帝时代,

古国、部落林立,互不隶属,更无受命,五帝并非后来的帝王。而过去占优势的说法是,黄帝都涿鹿,颛顼居濮阳,帝喾都亳,尧都平阳,舜都蒲坂,都远离泰山。那么五帝的封泰山是事实吗?现在看来,至少黄帝、颛顼、帝舜很可能在泰山进行过祭祀活动。他们都曾居过的穷桑,应在茌平县。这里位于华北平原的中部东沿,南、西、北三面全是一望无垠的平原,只有相距 70 公里的泰山雄峙东面,大概早就是东夷集团崇拜的神山。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②的古代社会,黄帝、颛顼、舜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祭祀泰山,是理所当然的事,《韩非子·十过篇》记黄帝东嵬泰山,《史记·封禅书》记舜祭泰山,应该都是事实。《史记·封禅书》说:“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观东后。东后者,诸侯也。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赞。”《史记·封禅书》所记,本于《尚书·舜典》。舜是东夷人,可能是东夷集团的首领,都于茌平,东临泰山,所以舜柴祭泰山,望祭东方山川,完全可以理解。至于《史记·封禅书》说舜祭泰山以后,接着南巡狩、西巡狩、北巡狩,祭祀了衡山、华山、恒山和嵩山,就未必全是事实。连秦始皇都未能做到一下子巡狩四方,祭祀五岳,虞舜是无法做到的。不过,五帝类似春秋五霸,五霸是春秋时期的五位诸侯盟主,五帝可能是古国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五位古国、部落联盟的盟主,所不同的只是上面没有一个象征性的周天子。因此,黄帝、颛顼、帝舜不仅可以就近祭泰山,他们也可以祭祀境外的名山。同样,帝尧也可以在东方祭祀泰山,这从尧“合和万国”,^③“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④的记载中,也能想象得出。

在结束本文之前,再就两组龙山城是两个古国遗存的推测,作点补充说明。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产生,又是管理日益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的需要,同时也是抵御入侵,保障社会生产正常运行,捍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要求。冀鲁豫交汇地带,具有国

家产生的充分条件。首先,该地区是黄河中下游和北方三势力集团最先接触与争夺的焦点,部族战争频繁,传说蚩尤与炎帝的斗争,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都发生在这一地带。这些战争是不同族团的战争,延续时间长,战争规模大而激烈,而且还有水患因素在起作用。“滔高堙庠”,以邻为壑,随时都能触发部族战争。频繁、激烈的战争,特别是不同族团的战争,给予了原始氏族制度以巨大的冲击,成为国家产生的催化剂。其次,该地区自古就是水患最严重的地区,尤其是河济之间的兖州之域,共工以水行霸,洪水的传说和鲧、禹、四岳治水的故事,主要在古兖州地域。水患是该地区比战争更具威胁的、经常存在的严重问题。要想解决洪水泛滥和大范围的水患,就需要疏通河道,修筑堤防,进行统一规划,上下游的部族共同实施,并需要组织大量的劳动力,统一指挥,所有这一切,氏族社会的原则是根本无法解决的。治理水患的需要,是促使该地区由原始向文明过渡的基本因素之一。正因为要应付频繁的战争和消除经常存在的洪水威胁,促使该地区的氏族社会迅速瓦解,有可能较早地出现职业军队,出现城,较早地诞生了国家。基于上述分析,即便现在还不知道教场铺和景阳冈龙山城中大小夯筑台址的功能,也不妨大胆说它是两个古国之“都”。假如教场铺龙山城果真是虞舜之都,那么有虞确是个东夷古国,虞舜已处于文明时代了。

注 释

①《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版第四册,第1367页

②《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版第六册第1557页。

③《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版第1册第5页。

④《逸周书·尝麦解》。

⑤《山海经·北山径·北次三经》。

- ⑥《史记·周本记》中华书局版第1册第128页。
- ⑦《尚书·吕刑下》。
- ⑧同③第32页。
- ⑨同③第33页。
- ⑩《元和郡县志·河南道七·淮州》。
- ⑪《史记·夏本记》中华书局版第1册第55页。
- ⑫同③第33页。
- ⑬《史记·历书》中华书局版第四册第1257页。
- ⑭王国维：《观堂集林·说商》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 ⑮⑰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5年第五本第一分册。
- ⑯郑杰祥：《夏史初探》第9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 ⑰《史记·郑世家》中华书局版第五册第1712页。
- ⑱《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第六册第1557页。
- ⑳邹衡：《夏商周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 ㉑同①第1361页。
- ㉒《左传·成公十三年》。
- ㉓同①第1355页。
- ㉔《史记·五帝本记》中华书局版。
- ㉕《左传·哀公七年》。

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

张学海

城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重要的里程碑。目前我国最早阶段的城,是4座第六千年期的城,即湘北澧县城头山大溪、屈家岭文化城,^①郑州市北郊西山仰韶文化城^②,鲁中南滕州市西康留大汶口文化城,^③鲁西阳谷县王家庄大汶口文化城。其中西山城与王家庄城的城垣建筑技术表明,中国城的产生当在距今第七千年期。^④进到第五千年期,我国城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龙山时代城,数量剧增,规模扩大,出现了数十万平方米的大城,乃至成百万平方米的超级大城,形成了不同等级,产生了原始城市。目前在山东、河南、四川、内蒙、湖北、湖南等地,已发现数十座龙山时代城,其中黄河中下游地区共发现18座,而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占14座。山东地区的龙山城,不仅发现数量较多,半数的规模也较大,而且有龙山城组,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它对龙山城的建筑技术、类型、性质与功能以及中国文明的形成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态等重大史学与理论课题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现就山东地区龙山城的发现作概括介绍,对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往笔者介绍过的有关资料,以及对有关问题的观点与提法,凡与本文不符者,均以本文为准。

一、山东地区龙山城的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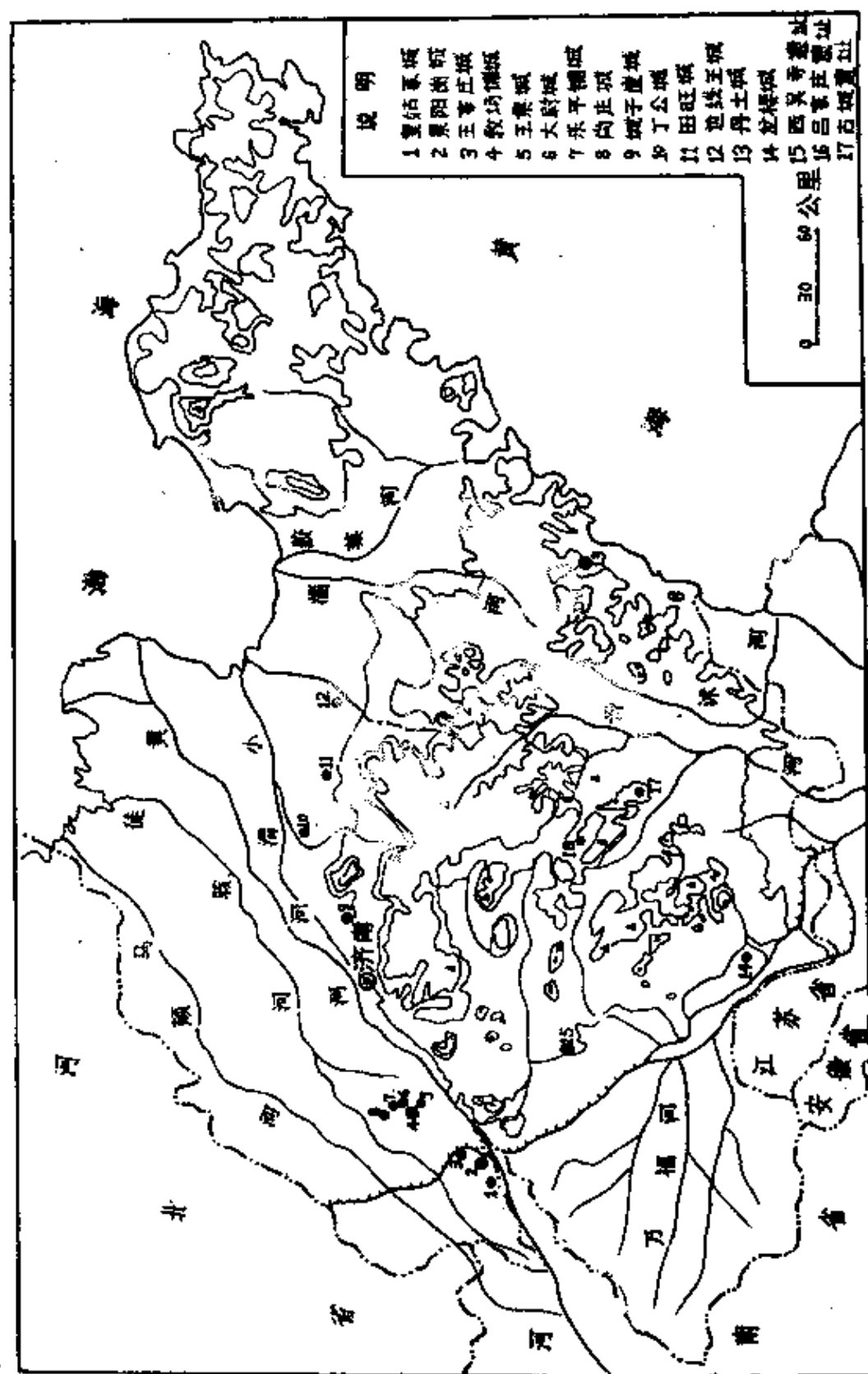
1985年,在配合益(都)羊(口)铁路工程中,在寿光县孙家集

镇边线王村北,首先发现了龙山城。因挖土破坏,仅残存两个城圈的基槽,地面城垣和筑城时的地面都已不存,城内堆积也只在东北、东南部有少许残存。内圈平面近圆角方形,东西、南北各约100米,面积约一万平方米,东北两面正中有门,宽约10米,西、南面本来也应有门,已被挖土破坏。外圈平面近不规则方形,面积约57000余平方米,东、西、北三面有门,东、北门与内圈东北门对应,南面被村子所压,应有门。所有门都作城垣缺口式,门道下为原生土,隔断城垣基槽,门道和门外路土都已无存,未见特殊结构。基槽草率,口大底小,口宽4~6米,局部宽达8米,深2米余至3米左右。基槽壁上有不规则的狭窄台阶,或平或倾斜,可能挖基槽时用于倒土和上下。槽内夯土用龙山堆积夯筑,夯层厚5~15厘米不等,夯痕不清。在外圈基槽夯土中发现人、猪、狗等骨架,是否属奠基,不能肯定。基槽夯土中夹杂大量龙山陶片,内圈陶片的年代属海岱龙山文化中期,外圈陶片略晚,知先有内城,后来城作了扩建。因城内东南部有外城时期的灰坑压着内城东基槽的层位关系,知外城建成后,内城城垣已被夷平(图一,12)。据《泗水尹家城》龙山文化的分期,估计小城的建造年代在距今4300年前。^⑤

1990年上半年,在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复探、试掘中,发现城子崖遗址下层是座龙山文化城(图一,9);中层为岳石文化城,即《城子崖》报告所谓“黑陶文化期城”;上层是春秋城,即前书所称“灰陶文化期城”。城子崖龙山城,北垣弯曲,中部呈弧形显著外突,其余三面城垣平直,城东西455米,南北最大距离540米,面积20万平方米(图五)。城垣由堆筑、版筑结合筑成,拐角呈弧形。解剖北垣东段的探沟显示,此处始建城垣的外壁近直壁,高约7米;内壁呈小斜坡形,水平长4、高2.5米;墙基宽约14、城顶宽7米。城垣似沿河崖上筑,方法是将河崖挖成数米深的半斜壁沟形基槽,并将基槽以里的10余米地面挖成向外倾斜的缓坡,然后在基槽底开始夯

筑。达到槽口时,夯筑范围扩展到缓坡面上,继续堆筑成两面坡形的墙身。夯土层外陡内缓,内部夯土层很不规整。然后再贴外坡自下而上版筑出厚1米至2米余的外部城垣,夯层较规整。夯层厚2~3厘米,夯痕呈浅弧底形,直径2~3厘米。土湿时在平、剖面上都极难分辨夯层与夯窝,土干后上下夯土层之间往往出现裂缝,可见弧底夯窝。堆筑城垣一般筑到10余厘米至20~30余厘米厚时,经较多夯筑,因而夯层面坚硬,上下层的土色又往往有差异,故易判别。乍看夯层很厚,实则其中包含着许多不规整的小夯层。东垣南端探沟显示的城垣结构大致相同,外侧残高约3米,外壁近陡直。南垣西段和北垣中段的探沟表明,筑城时这两处似为漫坡,都是先挖沟,从沟底内侧上筑,从外侧取土,至沟口夯筑范围向沟里地面扩展。地面未作特别处理,其上的夯层由内向外下斜,城垣外部已无存。估计当如北垣东段探沟所示,用版筑筑成陡直的外壁。取土沟深3米左右,它起到了降低城外地面、增高外侧城垣的作用。西垣北端探沟显示,此处城垣亦依河崖修筑,上部毁坏严重,已失原貌,结构当和北垣东段同。城筑成后,不断沿城垣两侧进行修筑,有时是局部修葺,有时是大规模修筑。后者都只将城根堆积略作清理或挖个不大的弧底基槽,然后依墙壁上筑,所以城垣不断加厚增高,晚筑城垣的墙基,一般都高于早筑的墙基,城内地平面也逐渐增高。

城子崖龙山城已发现南北门,两门之间有道路连接。南门已被山城村小学教室所压,从教室后面的断崖上可见门里的道路是一般土路,上下有数层,包括岳石文化期路土在内,东西摆动宽近30米。城垣缺口外有夯筑斜坡,长约12米,在小学西墙外的坡西沿作了清理,沿上有南北向墙基,墙东有房子遗迹,当为门卫之类建筑遗迹。斜坡中间即为门道,已在小学院内,未能清理,详情不知。东西两面未见城门,城东西临河,估计没有东西门。



图一 山东地区龙山城址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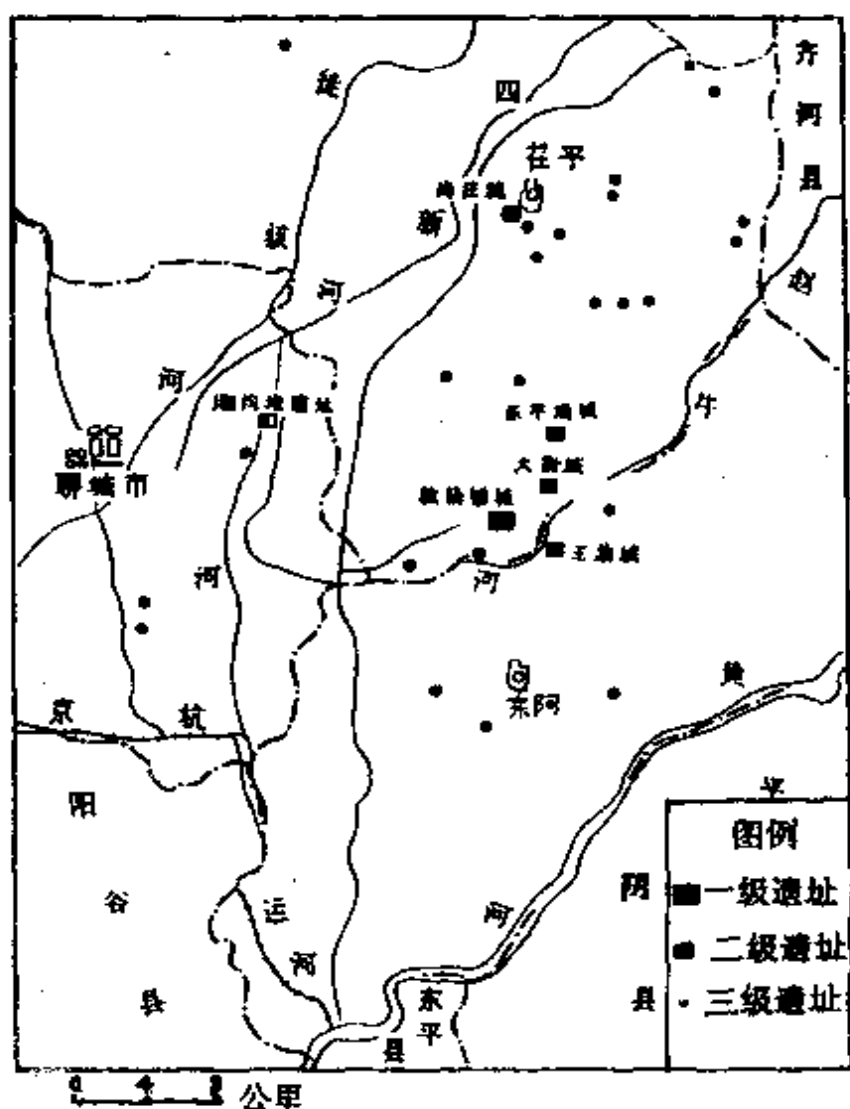
城内未作试掘,探知中部有约一万平方米的淤土,当属水池或经常积水所致。连接南北门的道路,经水池东沿、东南角折向南沿东部,南通南门。估计城内有环城路,北部外凸部分地下似有大型建筑基址。城内龙山遗存覆盖了全城,厚者达3米多,薄者1米左右,一般沿城垣内侧保存了较厚的龙山文化堆积,城顶亦常见房址和灰坑。^⑥

1991年秋,在山东大学实习基地丁公遗址,发现了山东地区第三座龙山城。城位于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东,孝妇河上游地区。(图一,10)平面呈圆角方形,面积约11万平方米,城垣堆筑而成,东垣以里20余米处发现一段与现东垣平行的龙山早期城垣,知城始建于龙山早期,至少在东面有过拓宽。目前尚未发现城门,因亦属台城,城门形制、结构应和城子崖城相似。^⑦

1992年3月,在复查临淄田旺遗址(原称桐林遗址)中,又发现了龙山城(图一,11)。城位于临淄区路山乡田旺村东北,平面呈圆角竖长方形,面积约15万平方米,现遗址上的十字路沟打断城的东、北垣,路沟断面上可见倾斜的城垣夯土层。城属台城,现遗址高出周围地面1~3米,未作系统的钻探、试掘。1981年在相当于北垣内侧中部的试掘中,在一直径3米的圆坑内出土以7鼎、3甗、4鬲、3平底盆四类器为主的一组龙山中期后段的陶器。鼎、鬲的形态、大小基本一致;甗、盆形制基本一致,大小相次。其中的大甗高116厘米,为迄今最大的龙山文化陶甗。应是一组陶礼器,圆坑为祭坑。目前所知城的年代属海岱龙山文化中晚期,下层有晚期大汶口文化。^⑧

1994年上半年,在薛国故城勘探试掘中,在郭城东南部的西周春秋城中,发现了龙山城。城位于滕州市官桥镇尤楼村东南,薛河故道以西(图一,14),平面呈方形,东西、南北各约100米,面积10000平方米,周围有壕沟围绕。^⑨但此城未发现明显的城垣,据景

阳冈龙山城大台址的结构,似属龙山城中的夯筑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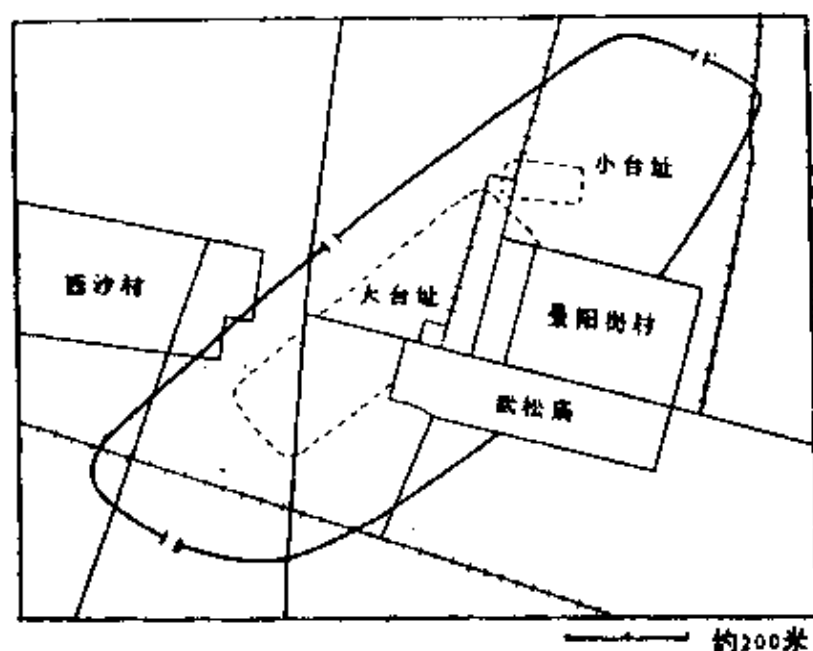


图二 教场铺龙山古国“都、邑、聚”图

1994年11月,在配合阳谷县景阳冈开发工程的钻探中,发现大规模的景阳冈龙山城。同年12月下旬,在对阳谷与茌平、东阿两个聚落群中包括景阳冈龙山城在内的部分龙山遗址,进行了勘查,发现了两个龙山城组共8座城。南组阳谷组3城,北组茌平、东阿组5城,两组中各有一座大型的中心城,其余除一座达6万平方米以外,均属3~4万平方米的小城。^⑩

北组中心城教场铺龙山城,位于茌平县南20公里乐平铺镇教场铺村西北(图一,4),平面呈圆角横长方形,龙山遗存范围东西约

1100米,南北约360米,城面积约40万平方米。城内有大小两座大型夯筑台址,小台临近东垣,面积约16000平方米,东面呈陡坡状与台东的地面成弧形连接,估计西北两面也当如此。台东地面平整,经加工,已见两层地面。大台址在小台以西约70米,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地面城垣已不存,探知地下东垣基宽约15米。在教场铺中心城以北19公里有尚庄龙山城(图一,8),平面呈圆角方形,面积3万余平方米;东北6公里有乐平铺龙山城(图一,7),平面略作横长形,面积3500平方米左右,南部中部发现一门;东北3公里余有大尉龙山城(图一,6),平面约呈竖长方形,面积3万平方米左右;东南3公里余有东阿县王集龙山城(图一,5),平面呈圆角长方形,方向东北到西南,面积约37000平方米。



图三 景阳冈龙山城平面示意图

南组中心城景阳冈龙山城,位于阳谷县东南张秋镇景阳冈村周围,黄河北岸(图一,2)。平面呈扁椭圆形,方向东北到西南,中部外鼓,南北长1150米,北端宽约230米,南端宽约330米,中部最

宽处约 400 米,面积约 39 万平方米,城垣南西北三面中部有缺口,当为门;东面因村子所压,不详(图三)。龙山晚期城垣外壁平直,因发现和外壁平行与垂直的夯土块交接痕,知外侧 1 米余的城垣系版筑。其内是夯土层向城内倾斜的堆筑城垣。西垣缺口北侧城垣的夯土,同样有与城垣平行的版痕,知城垣宽非一版筑成,城垣缺口两侧的墙应是直壁或斜壁。龙山中期以前的城垣已在水位以下,建筑方法不详。城内中部偏北也有大小两座大型夯筑台址。大台址面积约 9 万平方米,已知西北面呈大漫坡形,台址中心部位的武松庙下,仍保存了台址原高,从东断面可见 4 层互相叠压的台面。此处台面至台基底高 5 米余。在西南部残台断面则见 6 层以上的活动面。除上部的两层以外,均属龙山文化。下属活动面下有深厚的龙山文化堆积,知台经多次扩建。始建台址用生黄面沙土筑成,活动面下的龙山堆积,即是早期台址西南坡前的堆积。因知大台址应是大型宫室基址。小台址紧临大台东北面,新近的试掘证明面积已超过 10000 平方米。在西北面地表下 3 米以上已暴露 3 级台阶,上层台阶的台面及其东的中心台址都已削平,小台形制当为阶梯形,同样经过多次扩建。始建的台址用生黄面沙土筑成,应和大台同时建造,一直并存。在西面已揭露的三级台阶上,均挖有不少坑。而当小台中心部位的台基,不见有灰坑打破,估计中心台面上可能有大型建筑。西面第二级台阶上有的灰坑坑底有完整的羊骨架,台址西南角第一次扩建的夯土下出有人头骨。^①1979 年,聊城地区博物馆曾在台址东北面约当二级台阶上,清理了一个直径 3 米的规整圆坑,坑底有一具完整的牛骨架,出土了 20 余件龙山陶器,其中 3 件陶甗形态基本一致,大小相次,坑当为祭坑。因知小台应是座祭祀遗迹。

景阳冈龙山城东北 10 公里,有王家庄龙山城(图一,3)。城垣东北角至西南角部分已查明,被战国阿城东南角两侧的东、南垣所

压;西北角和西垣因修筑阿城时在城内挖土,已遭严重破坏,尚未找到,但大致位置可以确定。城平面呈东北到西南的圆角扁长方形,南北约 360 米,东西约 120 米以上,面积约 4 万平方米,始建于大汶口文化时期,延续到龙山时期。龙山城垣堆筑而成。^⑫

景阳冈龙山城西南 8 公里,有皇姑冢龙山城(图一,1)。平面呈东北到西南的圆角扁长方形,南垣与东垣呈弧形连接,拐角极不明显,城西南部如弹头形,西南端甚窄。南北长约 495 米,东西宽约 150 米,面积约 6 万平方米,中部地面上有隋唐堽堆,其下为龙山夯筑台址,台址有上下层。^⑬

1995 年上半年,在鲁东五莲县丹土遗址探出了龙山城。城位于朝河镇丹土村周围,平面呈不规则的圆角方形,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⑭(图一,13)。

此外,兖州西吴寺、蒙阴吕家庄、费县古城等遗址,也已发现龙山城的线索(图一,15-17)。

山东地区自 1985 年发现首座龙山城后,至 1994 年底鲁西龙山城组的发现,先后整 10 年。当发现城子崖、丁公龙山城后,笔者推测山东地区数十个史前文化中心龙山时期的中心居址,大都会是龙山城。田旺、教场铺、景阳冈、丹土这些中心居址龙山城的发现,证明这一推测大致不误。当 1994 年上半年发现了面积仅 1 万平方米的尤楼龙山城后,联系首次发现的边线王龙山城也未超过 6 万平方米,而章丘古文化中心龙山聚落群中的六七处二级遗址,面积在 3~6 万余平方米之间,其中大的约与边线王城相当,比尤楼城则大得多,因而推测龙山聚落群中的二级遗址可能也有城址,即一些龙山聚落群可能存在龙山城组。结果果然在茌平、阳谷两个龙山聚落群发现成组的龙山城。因此,现在似可以预言:山东地区龙山聚落群中的重要者,如泰山北麓山前平原、淄河中游、沂河中游、泗河上游、薛河下游、沂河中游、沭河上游、鲁东南沿海等聚

落群,都可能存在龙山城组。如果运用大遗址勘探试掘方法进行系统探查,证实这一点将不会很困难。

二、山东龙山城的类型与城垣建筑技术

上述 14 座龙山城,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常的城,另一种是台城,以后者占多数。

通常的城是指有直立城垣、城垣内外地平基本一致、以城垣缺口为城门门道的城。目前能确认的只有一座边线王城。其城垣挖有斜壁沟形基槽,两侧地平一致,外侧未见沟壕。城门位置预先规划,门道下为原生土,隔断基槽,门道内外未见特别设施。因基槽口宽仅 4~6 米,城垣自不能过宽。上述现象说明城垣应是直立的墙,这种直立的城墙只能用版筑。地面以上城垣已不存,版筑方法不详。据景阳冈、城子崖城垣的建筑技术,估计基本上承袭西山仰韶城的版筑技术。西山城城垣用方块版筑,在基槽内逐层、逐段夯筑,墙身两侧基槽留有一定空间,两壁逐板内收成上台阶形,尚未出现枋,稳固夹板采用斜支撑,用作支撑的棍棒下端即支在基槽的内外壁上。夯土版块一般长 1.5~2 米,目前所见最大的版块不过长 3.5 米、宽 1.5 米。墙宽由三版筑成,拐角加宽至五版。版筑技术仍比较原始。^⑩城子崖岳石文化期的城垣内侧,仍用槽内逐板内收的方法版筑,墙壁成小台阶形,知仍未用枋固板。^⑪边线王城间于西山仰韶城与城子崖岳石城之间,城垣版筑技术应不会更进步。

台城、顾名思义是台形的城。外观高墙耸立,内看如土岭围绕城周围,城垣内侧成缓坡,或只有矮墙。墙基不在同一地平上,内高外低,高差悬殊。一般仅在城垣外侧挖斜壁沟或半斜壁沟形基槽或不挖基槽。由于城内高外低,决定了城门门道必须是斜坡形。城子崖始建的龙山城,内外地平高差可达 5 米以上,在城垣缺口外

修筑了斜坡形的门道,是比较典型的台城。除城子崖城以外,已知丁公、田旺、景阳冈、教场铺龙山城,都是台城。

这些台城的城垣,原以为全由堆筑而成。堆筑城垣很难形成陡直的墙壁,推测要对外壁作再处理,削成平直。现知城子崖、景阳冈城的城垣,均由堆筑、版筑相结合筑成。城垣外侧一小部分用版筑,外壁近陡直;其内的城垣用堆筑,内侧成小缓坡。景阳冈的城垣是先在外侧版筑,后在其内堆筑;城子崖城则是先筑成外陡内缓的两面坡形墙身,然后再贴外坡版筑了自下而上宽1~2米余的城垣。景阳冈城西门城垣缺口两侧的墙身全用版筑,由两版以上筑成,应是为了缺口两壁的规整和耐久。版筑技术显然承袭了西山城垣的版筑技术。但陡直的墙壁和较大的夯土版块,说明龙山城垣版筑技术已有重要改进。这种版筑、堆筑相结合的城垣建筑技术,提高了筑城的效率和城垣质量,在同样宽度的墙基上可以筑成更高大的城垣,而外壁保持平直而耐久,是城垣建筑技术的一大进步,满足了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普遍筑城和修筑大规模城的需要,可能代表了龙山城垣的主要建筑技术。同时,用单一的版筑和堆筑法来筑城,也在使用,但可能不占主导地位。

龙山台城一般都有环城沟壕,主要由取土筑城而形成,实质上是取土沟。积水时也就成了濠沟。但这种濠沟内侧以城垣外壁为濠壁,墙基易受侵蚀,且易淤积。北方地区也不常年积水,淤积后还常常在其上对城垣进行修葺,因此很不稳定。和晚期的比较稳定的护城河不同,还不是后来的城垣、城河结合,共同构成防御体系的那种城濠,只是城濠的滥觞。

龙山台城在当时来说,有着明显的优点。首先,能适应不同地形,因地制宜,依托河崖、沟崖和利用取土沟,加高城垣外壁的高度,而保持平直的外壁,使难于攀登;而成小斜坡形的内壁,把城顶与城内地面连成一体,任何部位都可上下城顶,而且城顶也可居

住,便于了望、防御。这种类似后来坞壁的台城,显然具有较强的防御能力;其次,台城因能更好地适应和利用不同的地形,营筑起来比较省力、省时,因此既能大批地筑城,又能营筑大规模的城。它是龙山时代正在普遍筑城和要求营筑更大规模城的时代的产物,是史前城的一个发展阶段,而不是城的产生阶段。当然,台城毕竟还不是完全成熟的城,它的一个明显缺陷是城内地面不平,周围隆起,中部相对低洼,容易积水,而且不易排泄。城子崖城中部有池塘或经常积水,就是显例。

山东龙山台城和版筑、堆筑相结合的城垣夯筑技术,可能代表了黄河、长江流域同期城的主要类型与主要的城垣建筑技术,处于承前启后的阶段,在我国城与筑城技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三、山东龙山城的不同等级

在鲁西两个龙山城组发现之前,已看出山东龙山城中有不同的等级,其中城子崖、丁公、田旺龙山城,具有较大的面积,处于所在聚落群的中心地位,是一级龙山城。边线王龙山城早期阶段的面积只有1万平方米,扩建以后不到6万平方米,不是所在潞河中游龙山文化聚落群的中心聚落,同前三城显然不是一个等级,似可称为二级龙山城。龙山城存在不同等级,从全国范围看更为清楚,但这些龙山城都分散在各地,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同一聚落群中似未发现两座以上的城,因此互相关系并不清楚,所反映的龙山城的等级关系还不够典型。当1994年12月在阳谷、茌平两个古文化中心各发现了龙山城组之后,山东地区龙山城的两个等级已毋庸置疑。阳谷组的景阳冈和茌平、东阿组的教场铺城,不只规模较大,而且城内都有两座宏伟的夯筑台址。它们在各自城组和聚落群的中心地位,清楚不误,显然是两座一级龙山城。阳谷组的王家庄、皇姑冢龙山城,面积只有景阳冈中心城的十分之一与六分之

一。茌平、东阿组的王集、大尉、乐平铺、尚庄城,面积在三四万平方米之间,不到教场铺中心城面积的十分之一。它们在城组和聚落群中都不占中心地位,显然是另一个等级城,即二级的城。此外丹土龙山城因有 25 万平方米的面积,又处于鲁东沿海龙山聚落群的中心地位,无疑是一级城。尤楼城的情况还不明朗,等级未明。如此,已知山东的 14 座龙山城,除尤楼城情况不明以外,城子崖、丁公、田旺、丹土、教场铺、景阳冈等 6 座龙山城属于一级龙山城;边线王、尚庄、乐平铺、大尉、王集、王家庄、皇姑冢等 7 座龙山城,是二级龙山城。

一级龙山城不仅具有较大的规模,更重要的它是一个龙山聚落群的中心。这种龙山聚落群应是一个龙山古国,有的或是个部落。因而一级龙山城是古国的政治中心,具有“都城”的性质,或是部落和部落联盟的中心。由于古国和部落的实力不同,决定了一级龙山城的规模、内涵也很不一样。在上述 6 座一级龙山城中,教场铺、景阳冈城规模宏大,气势宏伟,反映了它们是两个强盛龙山古国的统治中心。相比之下,城子崖、丹土城无论是规模还是内涵,都略逊一筹,而田旺、丁公城的规模则更小。当时,古国和部落都不是长期稳定不变的,当一个古国和部落被兼并以后,原来的一级城就会失去一级城的地位,降为二级城。这种变化很复杂,从考古上不易弄清楚这种变化。但依据是否是聚落群的中心及城的规模来区分龙山城的等级,将有助于对龙山城的性质、功能、地位和龙山时代社会性质的认识。

龙山二级城,一般说来规模要比一级城小得多,尤其它不是古国主要的政治中心,但又明显高于村落,因而具有“邑城”的性质,应是古国二级行政权力所在。由于山东地区龙山城已形成不同等级,联系龙山聚落群中大批一般聚落的存在,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已形成“都、邑、聚”的等级结构。这一点下文还要继续论述(笔者按:

本文所说一二级城是就聚落群而言,就全区的龙山城而论,目前可分为四个等级)。

四、有的龙山城是原始城市

八十年代中,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著名观点,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⑭原始文化发展到最后阶段,出现了城。城的发展,为原始城市与国家的诞生准备了重要的条件。由于创造和推动原始文化发展的氏族与部落,有着牢固的血缘纽带的维系;以及在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下,人们的生存与繁衍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有利的自然生态环境,因而氏族与部落(这里主要指农业部落)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长期发展,而形成许多原始文化地区中心,在考古遗迹上表现为许多遗址集中区,或称之为聚落群。这些史前文化地区中心或聚落群中的重要者,大概都经历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逻辑发展过程。据文物普查资料,知山东地区最晚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已形成数十个聚落群,其中大部分都是地区古文化中心,它们的文化持续不断地发展,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从理论上说,这些古文化中心都应有一部古文化古城古国史。事实上山东已知的 14 座龙山城以及 3 座已有龙山城线索的遗址,分属 11 个地区古文化中心,证明山东的史前文化地区中心,在龙山时期已普遍存在城。

城和城市不同。城是泛称,包括城市,但城市不能概括全部城。城市是晚于城出现的,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了城市。这里的城市是指原始城市或者说早期城市,区别于一般的城,而不指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特定含义的城市。原始城市不是简单的城与市的结合,它的基本特征可以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概括:“城市本身表明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⑮“这些城市中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体现为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

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这种资本和现代资本不同,它不是以货币来计算的,而是与所有者的完全固定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完全不可分割的,因此它是一种等级的资本”。^⑨ 马、恩对城市特征的上述概括,应可适用于我们所探讨的原始城市。上述资本的集中,意味着手工业生产者的集中,手工业者阶层的存在。享乐和需求的集中,反映出社会财富的积聚,贫富分化、社会分化的深刻化,以及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剥削阶级和权力统治的存在。因此,原始城市的出现必须具备必要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这就是原始农业和手工业已有较大的发展,社会财富日益丰富和积聚,交换有了初步发展;贫富分化、社会分化已相当深刻,出现了富有阶层和贫困阶层,形成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人口迅速增长,聚落增多,规模扩大;城已比较普遍,而且形成了不同等级。只有在这种经济、社会条件下才能产生原始城市。而作为原始城市必须具备下列要素,即:一、是个政治权力和行政管理中心;二、存在着手工业者阶层,是手工艺技术中心;三、人口相对集中,居民数量可观,比如达到 3000 人左右,居民具有多种社会身份。这些要素,可从城或聚落的规模,它在古文化地区中心的地位(等级)、文化内涵、遗物所反映的综合工艺技术水平、有无宫室建筑与礼仪性建筑以及墓葬资料等的分析中得知。一般来说,只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才能同时具备这些要素。所以,最早的城市应该是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我们探讨原始城市的时候,应当着重对那些重要史前聚落群的中心城或中心聚落进行考察。

如所周知,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在第七千年纪前期,已形成以晚期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为特征的海岱文化区。至第六千年纪中期,这里的许多大汶口文化聚落群,已出现如泰安大汶口、邹县野店、滕州西康留、广饶付家、章丘焦家等大型中心聚落,反映了人口的增长和逐渐集中。这时农业、手工业已经分

离,并得到迅猛发展。在农业上值得指出的是,大汶口文化末期龙山文化早期阶段玉牙璋的发现。这种主要用于祭天、拜日、祈年的玉礼器,由耒耜演化而成。耒耜成为祈年的礼器,表明它早已在大汶口文化的农业生产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似可说明大汶口文化已是耒耜农业。在手工业方面,大汶口遗址大汶口文化早期后段精美的陶、石器,就已是当时全国同类器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此后手工制作技术水平不断进步,直到龙山晚期,手工艺技术综合水平一直名列前茅。当时贫富分化正在急剧发展,大汶口遗址大汶口文化早中期之交、距今约 5700 年的 M2005 已有葬具,随葬了包括 58 件精美陶器在内的 100 余件随葬品;^①而付家遗址所清理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偏后的 200 座墓,绝大部分墓穴仅能容身,除了骨架,别无它物,其中约三分之一有器物的墓不过 1~3 件陶器,个别器物最多的也不过 5~6 件陶器;^②和付家墓葬大体同时的江苏新沂花厅大汶口文化中期墓,则反映出当时社会上层已流行人殉。^③由此可见大汶口文化中期以来,贫富文化、社会分化急剧发展之一斑。基于大汶口文化早中期的总体发展水平和王家庄、西康留大汶口文化早期、中期城的发现,估计当时城已不是个别现象。综上所述,可知早中期的大汶口文化,已为城市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大汶口文化晚期应已出现原始城市。

一个比较显明的例子是大汶口遗址,其晚期阶段已是座原始城市。首先,晚期大汶口遗址具有数十万平方米的规模,自北辛文化晚期以来,已经历了一千余年持续不断的发展,人口必已相当可观,居民的成分已远非单一的农业人口;其次,大汶口墓地已见一部分手工业者或手工业家庭家长之墓,墓地随葬的陶、石、玉、骨、牙器制作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证明大汶口有一个技术精湛的手工业者阶层,手工业中的陶器、玉石器、骨牙器的制作已实现了专业化,是大汶口文化独占鳌头的手工业技术中心;再次,墓地随葬

品总量丰富多彩,出现了白陶、骨牙雕嵌等新工艺,反映了手工业生产的惊人发展,折射出农业的快速增长和交换的发展,也表明社会财富空前丰富;又次,极少数墓十分富有,拥有了大部分陶器(包括几乎是全部的白陶),全部的骨牙雕嵌等最珍贵的手工艺品,有的还有玉铲等礼器,说明晚期的大汶口遗址、有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富有的权贵集团。以上说明晚期大汶口遗址已具备了原始城市的基本要素,已是座原始城市。^③虽然尚未发现城垣,但这可能是以往还没有找城的意识和缺乏这方面的田野考古知识之故。即便没有城垣,也是座城市。城垣只是外壳,关键在于是否是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晚期的大汶口遗址是整个大汶口文化最突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早就是考古界的共识。它为龙山时期城市的存在,提供了确凿的实证。

承袭大汶口文化的海岱龙山文化,无论是社会经济、社会分工和社会关系分化,都比大汶口文化有了更显著的发展。仅就大汶口文化中期后段开始到龙山时期,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空前繁荣这一点来看,就足以说明海岱龙山文化时期经济与社会的巨大变化。这时聚落激增,规模扩大,内涵极为丰富,城已普遍存在,形成了等级等现象所反映的人口急剧增长,经济飞速发展和社会的深刻变化,远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可以比拟,说明龙山时期已具有城市生生、发展的更充足的条件,估计一些重要的龙山中心城,都已发展成原始城市。^④

例如,城子崖龙山城。我曾在拙文《城子崖与中国文明》中,论证了城子崖龙山城是座原始城市。一方面它具备原始城市的基本要素(人口、手工业队伍、技术水平等),是泰沂山北侧西段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另一方面,它和本区数十处龙山村落之间所反映的城乡分离、城乡差别的格局,已十分清晰,因而已是座原始城市。

同样的情形在鲁西茌平古文化中心,有更加明显的反映。这里的中心城教场铺龙山城,面积达40万平方米,是城子崖龙山城的两倍,人口也应超过城子崖城。城内存在宏伟的宫室基址和礼仪性建筑基址,证明是个重要的政治中心。其下的二级城尚庄龙山城,出有上乘的陶器,如红褐色双釜类器,制作精美,器形雄伟,堪称古陶珍品,说明尚庄城具有高超的制陶水平。尚庄城面积只有教场铺中心城的十分之一,由此可以推知教场铺城会有更高的手工艺技术水平。在教场铺城所在的茌平史前文化中心以北的大片鲁西北地区,不见大规模的龙山遗址,所以教场铺龙山城应是鲁西北地区一个突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和茌平龙山聚落群中已知20余个村聚之间,存在清楚的城乡分离的格局,所以教场铺龙山城也是座原始城市。

城乡分离的格局在阳谷古文化地区中心也很清楚。这里的中心城景阳冈,是泰山西南麓汶河流域和鲁西地区主要的政治中心,今后的发掘将会证明它可能是该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因此也应是座原始城市。类似的情况,在鲁中南的薛河流域,鲁西南的万福河流域,鲁东南的沂、沭河流域,鲁东南沿海,鲁中北潍、淄河流域等地区都存在,龙山时期这些地区都应有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就是原始城市。

五、山东龙山城是古国实证

古国是“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是原始文化发展的逻辑结果。原始文化在氏族、部落的载体内长期发展,当达到了氏族社会不能承受时,国家脱胎而出。苏秉琦先生用“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对原始文化与古城、古国之间的逻辑关系,给予了精确的表叙,为古国问题的研究,指明了科学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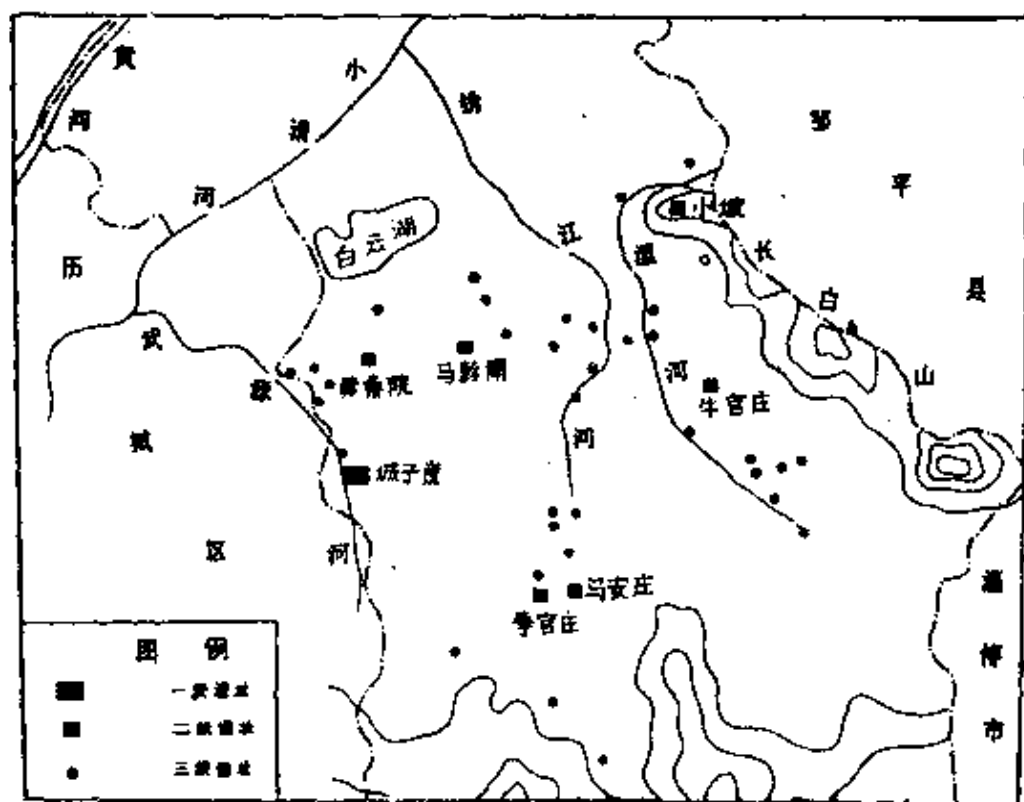
古国首先在那些先进的原始农业部落诞生,因此我们应当从

这些部落入手,对其文化发展进程进行系统考察,探索古国的诞生。山东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存在的数十个原始文化中心或聚落群,大致反映了当时部落的分布状况。每一原始文化中心或聚落群,大体上就是一个或几个部落,或是部落联盟。其中社会进程发展较快的,如泰安大汶口、章丘焦家、广饶付家、莒县陵阳河等部落,在距今五千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交或稍早,可能已向国家过渡。到龙山时代,许多原先的大汶口部落已转变为古国。

这种脱胎于农业部落又高于部落的古国,有着金字塔形的等级社会结构。处于塔尖位置的是作为古国统治中心的城或原始城市,即古国之“都”,居住着古国的统治集团。因此应有宫室基址和礼仪性建筑基址,城内或城外应有他们的墓葬,还会有首先是满足他们需求的手工业者阶层。处于塔基地位的是一批村落,主要是从事农业,是古国的社会与经济基础。由于脱胎于部落,血缘纽带关系在社会生活中仍起着重要作用,这些村落很可能是族居的,实行着族葬。这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其塔尖上的城或城市、塔基部分的村落,反映了城乡分离的形成。城一出现,就开始了城乡分化的进程,但初期阶段的城乡分化并不是明显的。只有形成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产生了原始城市,社会形成了等级结构,城乡分离才能最终完成,而成为国家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⑧因此,城市的出现,城乡的分离,是国家诞生的标志。古国社会的这种等级结构和城乡分离,是社会经济、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的发展,已超越氏族社会阶段的重要尺度。因此,我认为只需要从是否已形成等级社会结构,是否产生了城市和形成了城乡分离这两方面进行考察,就可以确定是否已进入了国家社会。这

两方面的情况是大都可以从考古上找到证据的。基于这种认识,我曾认定城子崖龙山城所在的章丘地区,是一个龙山古国,而且可能已发展成方国,以其都城城子崖城为代表,称为城子崖龙山古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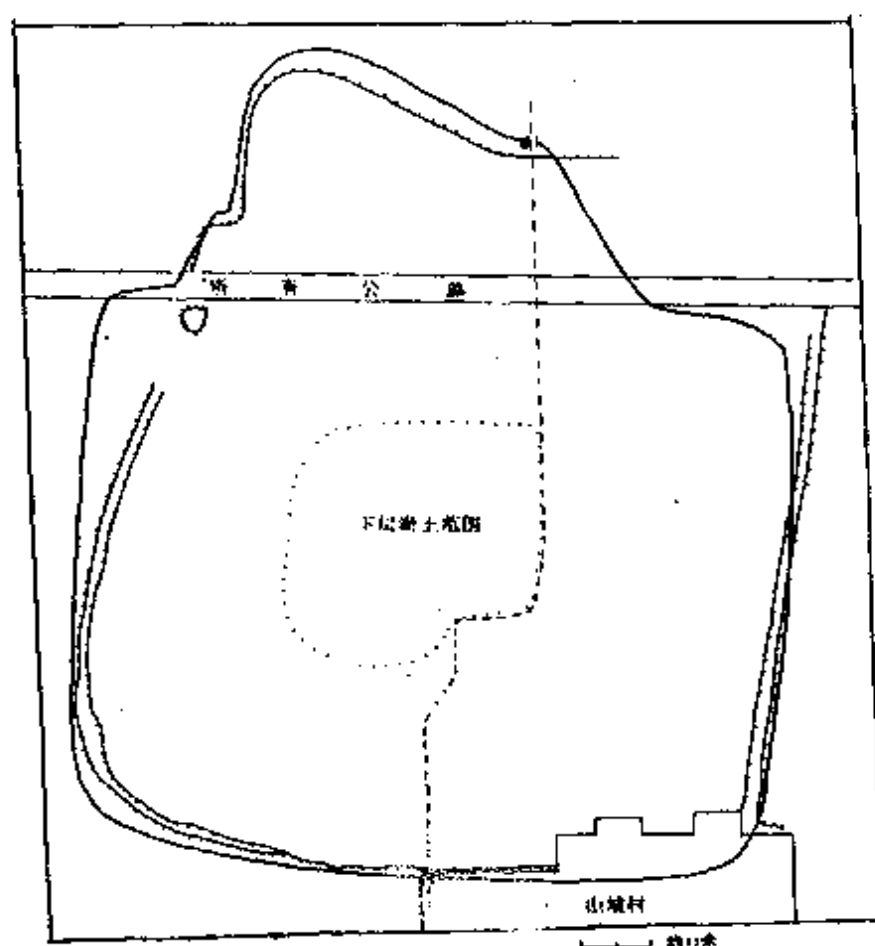
该古国所在的泰山北麓地区古文化地区中心,有陶新石器文化的出现可早到距今 8500 年的西河文化,是目前山东地区最早的史前文化中心。区内古文化自西河文化开始,经中晚期北辛文化、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直到商周汉代。这里已知有 5 处西河类型遗址,11 处大汶口文化遗址。至大汶口文化中期,出现了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焦家遗址,可能已是城。1994 年元月,遗址中部一批墓葬遭盗掘,追回的部分玉器有数件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玉钺与玉铲,应是玉礼器。至龙山文化时期,聚落已激增至 40 余处,分布范围扩展,东抵长白山西南麓,东北至长白山西北麓,南达泰山北麓谷地,北临白云湖南,西面范围不明,可能已到济南历城区东境一带,南北约 32 公里,东西约 30 公里。这些聚落已有三个等级。一级即城子崖龙山城,面积 20 万平方米,碳十四测年的最早数据为 4565 ± 130 年(树轮校正值),是座原始城市。二级聚落有黄桑院、马彭、马安庄、季官庄、牛官庄、小坡遗址等六七处,面积 3~6 万平方米,其中可能有城址。其余 30 余处都是三级遗址,面积数千至二万余平方米。显然,龙山文化时期这里已形成类似“都、邑、聚”的金字塔形等级社会结构。城子崖龙山城相当于“都”,二级聚落相当于“邑”,三级聚落是村聚。同时城子崖龙山城和大批村落,也把城乡分离的状况清晰地展示于世。证明龙山时期,这里已是个古国^⑧。(图四)



图四 城子崖龙山古国“都、邑、聚”图(历城部分缺)

在平、阳谷两个史前文化地区中心龙山城组的发现,为龙山古国的存在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新佐证。在平龙山文化地区中心的范围,包括在平县东北到西南部,聊城市东部,东阿县北、中部,处于徒骇河上游地区。已知这里的原始文化始于大汶口文化,已发现大汶口文化遗址6处,其中心聚落可能是教场铺或尚庄遗址。到龙山时期,聚落已达30余处,分布范围东西约25公里,东北到西南约45公里,“都、邑、聚”的等级社会结构,比城子崖古国更加典型。其中心城教场铺龙山城,规模宏大,城内宏伟的大小台址,应是宫室和礼仪性建筑基址,而小台很有可能是宗庙遗迹。《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所以教场铺龙山城应是座都城。已知的4座二级城,虽然都是小城,但据尚庄城具有非同一般的文化内涵和高超的制陶水平,可知它们都是“邑城”。

其余的聚落基本上都是数千平方米至一万多平方米的村落。“都、邑、聚”的等级社会结构和城乡分离的格局,已很清楚(图五)。所以这里也是个龙山古国,可称为教场铺龙山古国。



图五 城子崖龙山城平面示意图

阳谷史前文化中心的范围,包括阳谷东南部,南跨金堤河与黄河领有河南台前县全境和范县东境,以及山东梁山、郓城县的北部,鄄城县东北部和东平县西南部地区,位处泰山西支山前平原、古济水西侧,东西穿越该地区的黄河河道是清咸丰五年以后才形成的。原始文化始于大汶口文化早期,已知大汶口文化遗址4处,龙山聚落也只有19处,这是因为许多遗址已被黄河淤积湮埋和毁坏之故,实际上龙山聚落比这要多得多。已知聚落虽不多,分布范

围却很大,东北到西南约 80 公里,东西宽 35 公里。中心城景阳冈也有宏大的规模,城内有宏伟的宫殿基址和宗庙遗迹,知是座都城。这里也已发现两座“邑城”,同样存在一批村落。群内“都、邑、聚”的等级社会结构也很清楚。而且从景阳冈中心城的规模、气势来看,它很可能是大汶河流域和鲁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座原始城市。所以阳谷古文化中心龙山时期也是个古国,不妨称为景阳冈龙山古国。

以上列举了以城子崖、教场铺、景阳冈龙山城为代表的三个龙山古国。由于海岱龙山文化的发展水平大体一致,透过这三个古国,可知许多龙山文化地区中心可能都已进入国家社会,海岱龙山时代已是古国时代。

注 释

①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文物管理所:《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文物》1993 年第 12 期。简报定此城为屈家岭文化城,距今 4800 年,新的地层资料证明是大溪、屈家岭文化城,始建年代距今 6000 年。

②⑬张玉诗、杨肇清:《新石器时代考古获重大发现》,《中国文物》1995 年第 36 期 1 版,报道据当时的层位关系,定城建于秦王寨文化时期,距今 4800 ~ 5300 年。《中国文物报》1996 年第 7 期公布 1995 年十大考古发现时,似据新地层资料改作“城兴建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废弃于秦王寨类型时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或庙底沟期约距今 5500 年前。据笔者考察此城版筑城垣以前有堆筑城垣,城兴建的年代可能相当早。

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薛故城勘探队、滕州市博物馆探查。

④1994 年 12 月考查王家庄遗址时,发现该遗址是座龙山城。1995 年 12 月再次探查,发现城始建于大汶口文化早期。其东北角到西南角城垣的位置已找到,基本上在战国阿城城垣东南角两侧的东垣与南垣之下。西北角与西垣因修筑汉东阿县城,可能已被破坏,或已在水位之下,未探到。城平面呈东

北到西南向的圆角扁长方形,南北约 360 米,东西约 120 米以上,面积约 4 万平方米,大汶口文化城垣夯土层规整匀称,层厚 6~8 厘米,用束棍夯筑成。

⑤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89—1992 年城子崖遗址钻探、试掘资料。资料未发表。

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进中的十年——1978—1988 年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概述》,《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 年,发掘资料未正式发表。

⑦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邹平丁公遗址发现龙山文化城》,《中国文物报》1992 年第 2 期 1 版。

⑧1992 年 3 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工作站探查;1981 年该站在该遗址的试掘。资料均未发表。

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薛故城勘探、试掘资料。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薛故城勘探队:《薛国故城考古又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4 年第 25 期 1 版。

⑩张学海《鲁西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对几个古史问题的思考》。

⑪参见注⑩;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阳谷县景阳冈龙山文化城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97 年 5 期。1995 年 12 月、1996 年 5 月,笔者现场考察。

⑫参见注④。

⑬1994 年 12 月考勘,发现皇姑冢遗址是座龙山城,1995 年 12 月再次探查,基本上查明了城的大体范围。

⑭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5 年上半年丹土遗址钻探资料。

⑮⑯张学海主编《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扉页图版,齐鲁书社,1983 年。

⑰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第 76—79 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年。

⑱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57 页,人民出版社,1960 年。

⑬同⑩,第59页。

⑭参见张学海《牙璋杂谈》,《南中国及相邻地区古文化讨论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与艺术研究所编,1994年。

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78年大汶口遗址发掘资料。此墓年代依据郑笑梅先生意见。

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6年清理,见注⑥。

⑰南京博物馆花厅考古队:《江苏新沂花厅遗址1987年发掘记要》,《东南文化》1988年第2期;考古编辑部:《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记要》,《考古》1992年第6期。

⑱⑲⑳参见张学海《城子崖与中国文明》,《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㉑同⑩第56页。

㉒资料现藏章丘市博物馆。

原载《文物》1996年第12期,1997年5月修改

东土古国探索

张学海

古文献每称黄帝尧舜时有万国,五帝时代是个古国时代,这是我国历史的拂晓期。“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①国家的诞生标志文明史的开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实质上是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还是宏观的分析讨论,为了阐明中国文明的形成,必须探索具体的古国。海岱地区是东夷部族的活动中心,商人称此为人方,周人则叫东土,在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上占有重要地位,探索该地区国家的诞生,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曾在一些文章中对东土古国作过探讨,但有关见解分散于各文,有的见解已有所更新,而且又发现了重要的新资料,故就东土古国的几个问题再作探讨。

一、东土国家的出现

国家社会的本质特征,是私有制、阶级、等级结构 and 公共权力。国家的基本职能是实施政治统治,对复杂化的社会实行有效的管理,以及组织对外战争,防御外敌入侵,保障社会安宁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政治统治一般是结合行政管理的实施而实现的。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进程,具有各自的特点。笔者曾提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协调内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集团之间利益的冲突,组织指挥外部战争的需要,是中国国家产生的主导原因。”^②原始社会晚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

经济迅速发展,导致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私有制产生,手工业、农业走向分离,劳动产品日益丰富,社会财富不断积聚,并向少数家庭集中,促使私有制迅速巩固和发展;私有制的迅速发展,导致贫富分化、社会分化日趋严重,氏族内部出现了富有的和贫穷的家族与家庭,逐渐形成了不同利益集团,进而产生了阶级;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氏族、部落内部贫富之间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对立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不断扩大与激化,其中许多矛盾随着阶级的产生而演化成阶级矛盾与阶级对抗。

这一社会变化是和人口的迅速增长相联系的。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口迅速增长,聚落增多,规模扩大,氏族、部落及其规模也相应增加与扩大,从而在更大范围引发更多的矛盾、冲突和社会问题。例如需要在更大范围更频繁地划分耕地,而氏族部落增多,意味着有利的可耕地渐渐缩小,使本来不是问题的分配耕地成了问题,有些氏族占有优良的耕地,另一些氏族只能分到贫瘠的土地,从而造成氏族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诱发部落内部的不满,导致冲突增多。同时氏族部落数量与规模的发展,也使社会防治水患、兴修水利的总频率大增,增加了引起冲突的机会。为获得有利的生存空间,氏族部落常要迁徙,这常常会引起冲突。占有和保卫有利生存空间,也就成了氏族冲突和部落战争的重要原因。所以人口增长,氏族部落增多及其规模的扩大,加速了氏族社会的分化瓦解。因此,一定数量的人口,是原始社会向国家社会过渡的必要条件。在人口很稀少,部落规模不大,周围有着广阔的回旋空间,与外界相对隔离的情况下,国家是不可能产生的。

上述社会变化,加上大范围的兴修水利、治理水患和应付频繁的部落、部族战争,使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日趋复杂化。面对复杂化了社会状况,氏族社会的法则已不能适应,需要采取新的管理机制对社会实行有效的管理,国家应运而生。这一发展变化,在大汶

口文化有着清楚的反映。

大约距今 6500 ~ 6200 年阶段,海岱地区初步形成了以晚期北辛文化为特征的文化共同体,至大汶口文化中期(约距今 5700 ~ 5000 年),某些先进的大汶口文化部落贫富分化、社会分化已十分明显。一个突出的实例是大汶口遗址以 M2005 为中心的一组墓。M2005 约距今 5700 年,墓穴长 3.6、宽 2.45 米,有葬具,随葬了陶器、石镞、石斧和其它骨、角、牙器共 104 件。其中陶器 58 件,器形有细柄觚形杯、高柄杯、红陶三足盆、三足钵、钵形豆、鼎等,制作极其精美。三足盆、三足钵、钵形豆、鼎、壶等,分别盛有牛头、猪头、猪下颚和肢、蹄,置于四周熟土二层台上;一组骨器整齐地放在死者身旁。这是已知全国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大墓。在该墓东北 10 厘米,有一无头男性墓,仅有墓穴容身,别无它物。该大墓东南侧有一墓,内埋 5 颗人头与一男性骨骼,系二次葬,也无随葬品。该大墓东近 3 米是座 6 岁儿童单人葬,随葬了三足觚形杯、鼎、豆、彩陶釜、彩陶器座等 38 件陶器及松绿石等饰件。^③当时的一个儿童竟有如此之多的随葬品,这是前所未见的。这儿童显然是大墓墓主的子女,大墓两侧的男性成人墓可能是他的仆从,而 5 颗人头应是他生前猎首或参战的成果。这组墓明显地反映出如下的事实:首先,贫富分化已很明显,有的家庭已很富有,不只家长、就连夭折的儿童也享有丰富的随葬品,说明私有制已经巩固;其次人与人的关系已发生本质变化,产生了依附关系。如果大墓两侧的成年男性原是战俘,那么已把战俘作为家内奴隶,家长奴隶制已在运行;第三,随葬陶器已不仅仅是带往阴间的生活用品,而具有礼器的涵义;第四,综上所述可知氏族内部已存在与氏族对抗的“特殊显贵家庭”(恩格斯语)。因墓葬反映社会现象具有滞后性,这组墓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也不可能突然产生,所以大汶口部落的这种社会变化可能早已出现。此后贫富分化、社会分化的势头急剧发展,一发

而不可收。在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的墓地,如《大汶口》早中期墓、《邹县野店》第四期墓所反映的,富有家族与贫穷家族的分野明显可见,两者分别埋葬,互不相混。而属于中期后段鲁中北地区付家遗址的 201 座墓,仅处于遗址南部 100 平方米的范围内。墓成三层叠压,墓穴浅小仅能容身,约四分之三的墓只有墓主,别无它物;约四分之一有器物的墓,绝大部分只有 1~3 件陶器,最多的不过 5~7 件,也仅有数墓,^④可能是处贫民与奴隶墓地,由此可知当时贫富分化、社会分化已极其深刻。稍后的一个重要信息出自与山东接境的江苏新沂花厅遗址。1987、1989 年在这里发掘的 62 座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中,有 8 墓共殉 18 人,各墓殉 1~5 人不等,殉人中有小孩和青壮年男女,^⑤证明当时社会上层已流行殉葬。此时应已存在阶级,东土的氏族社会已向阶级社会过渡。

上述社会变化发生在距今 6000~5000 年的大汶口文化早中期阶段,这阶段的聚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巨大变化。距今 6000 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早期,聚落还很少,大概还只有雏形聚落群,未见大型中心聚落。到了中期,已知有数百处聚落址,形成了数十个聚落群,出现了许多大规模的中心聚落。例如泰山以南大汶河中游宁阳县东北聚落群,已知 9 处聚落遗址,内有数十万平方米的大汶口中心聚落;连同宁阳县西南、兖州区北部聚落群,共有聚落址 26 处。鲁中南泗河中游滕州市东南部聚落群,有 36 处遗址,内有 20 万平方米的西康留聚落址,中期后段已是座城;连同滕州市中部东北部聚落群,共有 60 余处聚落址。泰山北麓山前平原章丘市北部聚落群,已知 12 处聚落址,内有 40 万平方米的焦家聚落址。这说明大汶口文化中期,因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已急剧增长,一方面聚落、氏族、部落不断产生;另一方面,人口正向一些聚落集中,出现了大规模的中心聚落。群内聚落已出现等级,中心聚落与一般聚落可能已有从属关系。而人口向中

心聚落集中,特别是中心聚落已是城时,将意味着各氏族、胞族成员出现杂居,使原有的氏族法则难以适应,为公共权力的产生作着准备。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已有城。目前已在山东西部阳谷县发现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王家庄城,^⑤在鲁中南滕州市发现中期的西康留城。^⑦而郑州西山仰韶城和湘北城头山大溪文化城的年代,分别距今 5500 年前和 6000 年。^⑧这 4 座城显示出 5000 年前的大汶口、仰韶、大溪文化城已不是个别现象。城是原始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标志,它的出现与发展,表明部落战争日趋频繁,城乡分离的进程正在进行,已在呼唤着国家的诞生。这些原始城还不是城市,一般也不是国(城的出现并不标示国家的诞生,原始城市的产生才是国家诞生的标志),但它们是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中心,其中许多将发展成古国都城。就是说,城在国家出现以前已经比较普遍。通常我们把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时期,称为军事民主时期。这时期的一个突出社会现象,就是频繁的部落、部族战争,应该存在许多城。所以虽然不能把城与国不加分析地简单相联系,但是把城已较多地存在作为军事民主时期的重要标志,将可以成立。不仅是这 4 座早期城,而且山东地区龙山城的普遍发现和龙山城组的存在,都说明大汶口文化中期的许多中心居址可能都是城,证明当时已处于军事民主时期。这一点还可以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得到证明: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黑貔貅貔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

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④

古史传说,多以神农氏、轩辕氏先后相承,神农在三皇之末,黄帝居五帝之首。虽说三皇“若明若暗”,五帝“若有若无”,但史前考古的成就使我们相信五帝确有其人其族,不妨把神农与黄帝看作两个时代的代表。《庄子·盗跖篇》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又《商君书·画策》曰:“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由此可知神农代表着母权制时代,而黄帝则代表了父权制时代。根据现今的研究成果,黄河流域母权父权时代的交替大约在距今 6200 年前,此后进入父权时代。黄帝时代,“诸侯相侵伐”,“以强胜弱,以众暴寡”,部落、部族战争频仍激烈。《逸周书·尝麦解》所记蚩尤与赤帝(即炎帝)的战争,上引《五帝本纪》说的黄帝、炎帝阪泉之战,黄帝、蚩尤涿鹿之战,都是激烈的部族大战,蚩尤、黄帝、炎帝都是各自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和军事首长,说明当时正处在军事民主时期。而黄帝是在涿鹿之战杀了东方集团的领袖蚩尤以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始称黄帝的。皇甫谧说黄帝由穷桑“登帝位”,实际上就是黄帝在穷桑被推为盟主,于是出现了黄河流域、北方地区大半个中国的联盟。这是划时代的大事,标志着“诸侯相侵伐”的军事民主时期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涿鹿之战大约发生在 5000 余年前大汶口文化中期晚段,结合前文对大汶口文化早中期社会发展变化的分析,证明大汶口文化中期已处

在军事民主时期。由上所叙,可知东土自私有制出现到国家的诞生,大约走过了近千年的历程,约在距今 5000 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中期之末,进入古国时代,即文明时代。涿鹿之战和黄帝在穷桑“登帝位”,是东土实际上也是中国文明史开端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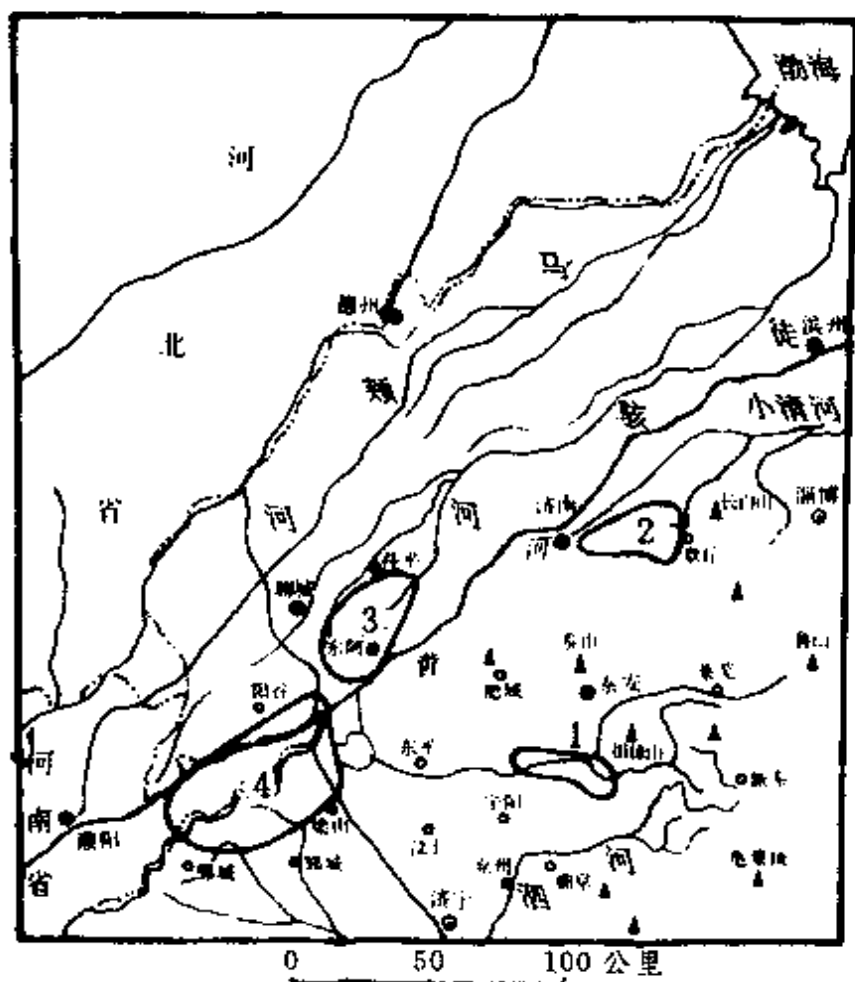
二、东土古国举例

在介绍这些古国之前,先就笔者确认这些古国的依据,也即从考古遗存判断古国的基本条件作出说明。这些基本条件是:(1)具有范围明确的一定规模的聚落群。古国须有地盘和一定数量的人口;(2)聚落群内具有“都、邑、聚”的金字塔形等级结构。古国必须有统治中心,即国都,一般都是城。判别都城主要看该城规模大小,是否处于群内的中心地位,有无殿堂与礼仪性建筑和大贵族墓,以及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邑相当于群内的二级聚落址,其中也有城,是古国二级行政管理机构所在。聚是村落,是群内三级以下的聚落址,大都应有古国的基层社会组织;(3)原始城市的存在,聚落群内具有比较明显的城乡分离格局。原始城市是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必然是个古国都城,古国都城并非都是原始城市。这三条关键是后两条,因为等级社会结构和城乡分离,是国家社会的基本特征,原始社会并不具备这些特征。符合后两条之一的考古遗存,就是古国。在不很明显的考古遗存中,虽然可能是古国,但从考古上是不容易被确认的。

用上述标准考察大汶口、龙山文化聚落群,现在可以指出大汶口、城子崖、教场铺、景阳冈等古国。笔者在《城子崖与中国文明》、^⑨《试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⑩等文中,对这 4 个古国已有所论,这里仅作概括介绍和某些补充。

大汶口古国 属大汶口文化晚期,位于泰山以南徂徕山西南的大汶河中上游地区,以宁阳县北东部到东南部为中心,聚落群已

知有 9 处遗址,集中在大汶河南岸的宁阳县,大汶河北岸的泰安市郊区和肥城县南部各只有一处,似因调查工作尚未深入之故。聚落群范围东西长约 40 公里,南北宽约 8 公里,其肥城南部地区就是著名的春秋鲁国汶阳田所在。群内遗址有三个等级。一级遗址即国都大汶口遗址,总面积达 82 万平方米。二级遗址有张家围子、邰邑遗址两处,面积分别为 5 万与 12 万平方米之间。其余是三级遗址,面积在 2000 ~ 6000 平方米之间^⑩。(图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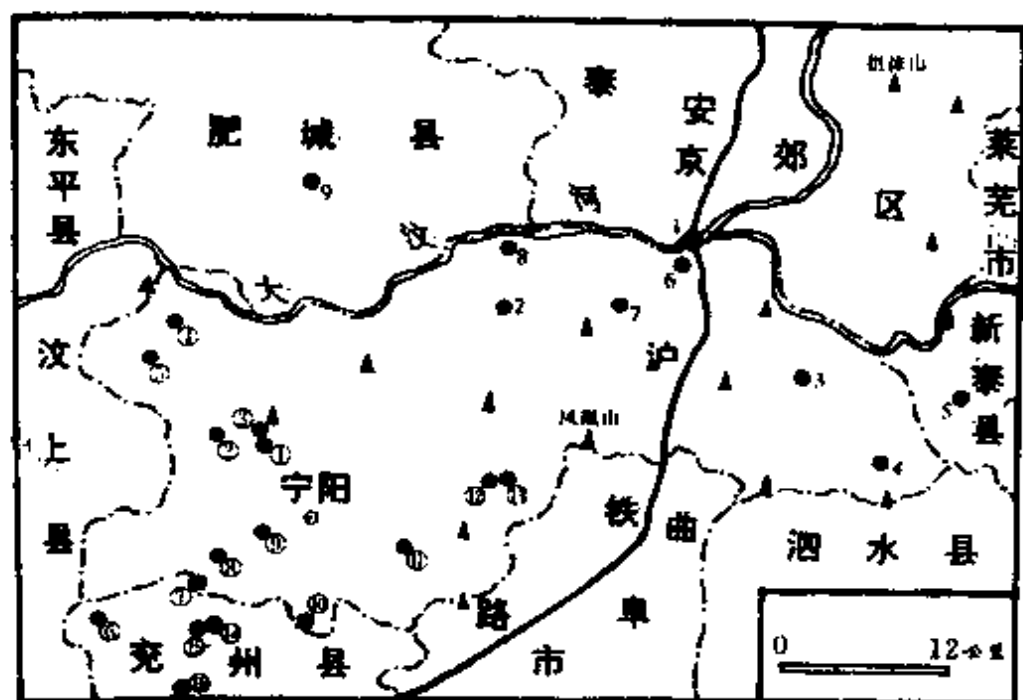


图一 大汶口、城子崖、教场铺、景阳冈古国位置图
国都大汶口遗址,位于泰安市郊区大汶口镇西南和宁阳县磁

窑镇堡头村西北,北距泰山主峰玉皇顶 35 公里。本来在汶河北岸,今被汶河割为两部。估计作为国都阶段的面积达 50 万平方米左右,是大汶口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大汶口》发掘报告表明,其中期阶段手工业与农业已经分离,存在手工业者阶层,产品丰富多彩,各种质地的稀世手工艺珍品众多,雄辩地说明它是整个大汶口文化乃至全国同期文化独占鳌头的手工艺技术中心。手工业生产的空前发展,折射出农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为商品交换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总体来看,这里经济繁荣,社会相当富有,财富迅速积聚;同时贫富也急剧分化,少数人占有了大部分社会财富。《大汶口》报告这阶段有 5 座大墓,仅占这阶段墓的 20%,但占有 61% 的随葬陶器,包括全部的白陶,以及所有的玉骨牙质手工艺瑰宝。其中 10 号女性成人墓、126 号少年墓随葬品尤其丰富,而且全墓地仅有的两件精美玉礼器—玉铲,也为这两墓分享,墓主应是王族成员。上述情况说明,晚期大汶口遗址已是大汶口文化首屈一指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座原始城市,是个古国都城。它位处大汶口文化重要分布区的大汶河中游,北对东方神山泰山的地理位置,表明它是大汶口文化的一个重要古国。^③

城子崖龙山文化古国 位于泰山北支山前平原,以章丘市北半部为中心,包括济南市历城区东部一带(图一)。中心区是目前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一个地区中心,有陶新石器文化的出现可早到 8500 年前。这里已发现西河文化遗址 5 处,北辛文化晚期遗址 3 处,大汶口文化遗址 12 处,龙山文化遗址 43 处。后者几乎全在章丘市境内,西部的历城区仅有两处,应有一些遗址尚未发现。龙山遗址的分布范围,东抵长白山西麓,南达泰山北麓谷地,西到济南市历城区东境,北面在白云湖、小清河以南。因古济水济南以下水道与原小清河流向大体一致,故遗址群原本北临或北近济水,是济水下游的一个龙山古国。其范围东西约 30 公里,南北约 32

公里,面积约 1000 平方公里,周围有宽广的空白区与山地。群内龙山遗址有三个等级。一级遗址即国都城子崖城,面积 20 万平方米。二级遗址有黄桑院、马彭、马鞍庄、季官庄、牛官庄、小坡等六、七处,面积约 3~6 万余平方米。其余的是三级遗址,面积各数千至两万余平方米。



图二 大汶口古国“都、邑、聚”居址分布图(1-9)

国都城子崖城,位于章丘市西部龙山镇龙山村东北、巨野河东岸。1930 年、1931 年首次发掘,1989 - 1993 年进行了系统钻探与试掘。笔者曾从城的规模、城内人口的数量与成份,手工业技术的高超水平,井的普遍使用和区内城乡分离的格局等方面作了分析,证明它是泰沂山脉北侧西段乃至更大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座原始城市,因而是座都城。二级遗址具有邑的地位,大者

面积达6万余平方米,可能也是城。大批三级居址则是村落。因而已形成“都、邑、聚”的金字塔形等级社会结构,而且区内存在清晰的城乡分离格局,群体范围明确,是龙山古国无疑。就其范围而论可能已是个方国。^⑭

教场铺龙山文化古国位于山东西部黄河西侧、徒骇河上游地区。此段黄河原是济水古道,所以是济水下游西侧的龙山古国(图一)。境内已知大汶口文化聚落6处,龙山文化居址31处。龙山居址大多数在茌平县西南部、东阿县北、中部和聊城市东部,少数在茌平东北部。分布范围东北至西南约45公里,东西约25公里,面积约1100平方公里,除西南境和景阳冈古国的界限不很明确以外,其余各面都有宽阔空地。1994年12月在这里发现了包括1座中心城和4座二级城的龙山文化城组,清晰地反映出“都、邑、聚”的金字塔形等级社会结构。处于塔尖位置的教场铺中心城,位于茌平县南境乐平铺镇教场铺村西北,面积约40万平方米,城内中部偏东有大小两座宏伟的夯筑台址。小台居东,面积约16000平方米,大台在西,面积10余万平方米,两者间隔约70米。中心城内的这种大型夯筑台址,通常都会是宫殿建筑群与礼仪性建筑基址。《考工记·匠人》记载:“匠人营国,面朝背市,左祖右社。”据此,推测大台址应是宫殿建筑群基址,小台址则是祖,即宗庙基址。《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者曰邑。”可知教场铺城是座都城。其余四城是王集、乐平铺、大尉、尚庄城,其中只有尚庄城与教场铺城的距离达20公里,其余都在6公里以内。这4城面积都只有三、四万平方米,城内也未发现大型建筑基址,与中心城不能同日而语。但又明显高于一般居址,其中经过试掘的尚庄城的陶器气势雄浑,证明这4座城属于邑城,为古国二级管理机构之所在。其余的龙山居址,踏查面积只有一千到一万多平方米,除个别可能是城以外,都是村落。群内“都、邑、聚”

金字塔形等级社会结构已十分典型,显然是又一个龙山古国。^⑮

景阳冈龙山文化 古国位于山东西部徒骇河上游,与教场铺古国南北相邻。境内已知大汶口文化遗址 4 处,龙山文化遗址 19 处。龙山遗址分布在阳谷县东北到西南部,梁山、郓城、鄄城三县北半部,内含河南台前县全境及范县东部,分布范围东北到西南约 80 公里,东西约 35 公里,面积约 2800 平方公里,是泰山西支山前地带、济水西侧的龙山古国。今境内被黄河分为南北两部,此段黄河是清咸丰五年(公元 1855 年)河决河南铜瓦厢后形成的新河道。自汉武帝时河决瓠子以来,黄河泛滥决口,经常淹没这一带。估计已有许多史前遗址被淹没和冲毁,加上挖土破坏、村庄占压等原因,故现见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不多。据万历于慎行《兖州府志》、康熙《重修张秋镇志》、光绪《重修寿张县志》等书记载,在本区明代东阿县西北半平原上,“平地小山,三五错峙,状如布棋”;寿张县有“九岭十八堎”;张秋镇有许多以山为名的地点。清末以前,这一带众多称某某山、堎、堎堆、岗、岭的地点,除少数确是自然山岗和古墓以外,大都是史前遗址,鲁西南黄泛区的情形便是为此。今除景阳冈(沙堎堆)、红堎堆(红沙堎堆)等遗址以外,均已不存和不明所在,知境内龙山遗址原本比现知 19 处多得多。郡内也已发现了包括一座中心城和两座二级城的龙山城组,典型地反映出“都、邑、聚”的等级社会结构(图三)。

中心城景阳冈,位于阳谷县东南张秋镇景阳冈村周围,面积达 39 万平方米,城内中部偏北有大小两座宏伟的夯筑台址,同样是小台居东,大台在西。小台面积一万多平方米,原高出地面约 3 米,1976 年削平。新近在小台西沿试掘,得知西沿呈阶梯形,台阶上灰坑众多,有的坑出羊骨架;1979 年在小台东北沿曾清理过一个祭坑,内有一具完整的牛骨架,出土 20 余件龙山陶器,其中有 3 件甗,形制一致,大小相次。^⑯小台中部偏西有村民取土形成的约

50 米长的断面,全是纯净的黄土夯土,不见灰坑打破,与西沿台阶上密布灰坑的现象迥然有别,知小台中部台面上原有大型建筑。大台面积约 9 万平方米,东北紧临小台,现地面台址仅在中南部有少许残存,其余部分均已夷平。台址上有一个近 200 米长的南北断面,笔者观察到残存的地面台址仍保存着原来的 4 层台面,每层厚 20 厘米左右,有的台面有火烤痕迹。其北不远的断面,夯土呈中部高起向两面倾斜状,地面台址虽已削去,但仍可以看出其上原有建筑。可知大台是大型建筑群基址,各单体建筑在大台上各有高起的基础,并不建在一个大平面上,说明大台址是宫殿建筑群基址。新近的发掘证明,大小台址同时存在,都曾多次扩建。^⑩中心城内大小台址并存,本身就说明大台址最可能是宫殿建筑群基址,而小台址是宗庙基址,祭坑的存在也为小台址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因此景阳冈龙山城是座都城,这也为教场铺中心城是都城提供了佐证。

两座二级城是王家庄与皇姑冢城。前者在景阳冈中心城东北 10 公里,是座大汶口、龙山文化城,面积约 37000 平方米;后者在景阳冈西南 8 公里,面积约 6 万平方米;这是两座邑城。其它遗址都未探查,而且有大量遗址已被湮埋与毁坏,但现有龙山遗址分布范围比教场铺古国大得多,所以邑城、村落都不会比后者少,群内都、邑聚的等级社会结构同样已很明显。

东土的龙山古国可能已很普遍,已知山东地区的龙山遗址约有一千数百处,绝大部分分属 30 余个大小遗址群。举一反三,估计那些大中型龙山遗址群,都将和城子崖、教场铺、景阳冈古国一样,具有都、邑、聚的金字塔形等级社会结构,因而都是龙山古国,其中一部分可能已发展为方国。

三、古国的疆域

古代的国家没有固定的疆域,古国更是如此,但都会有个比较稳定的中心区。根据古籍记载和史前遗址的分布状况综合考察,可知古国时代古国的范围是很小的。

古文献每称五帝时代有万国。《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⑩帝尧时“百姓昭明,合和万国。”^⑪《史记·夏本纪》说:帝舜时,“众民乃定,万国为治”。《左传·哀公七年》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离俗览》:“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商周时期国仍很多,如《尚书大传·汤誓》记载:“汤放桀而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洛诰》记:“天下诸侯之悉来,进受命于周,而退见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诸侯。”是知商初会于亳的就有 3000 国,周初受命于周的仍有 1700 余国。这些数目特别是万,并非确指,但可知五帝时代邦国之多,不知其数。即使去掉一半也是个惊人之数。邦国如此之多,其地盘之小可想而知。古者有所谓“百里之国”、“七十里之国”、“五十里之国”,还有不足五十里的附庸国,分封诸侯就是这四等。古文献一致记载灭夏前的汤,仅有地方七十里或方百里。这可能大致反映了古国时代的情形。周里约当今四分之三里,那么大国的面积约为 1400 平方公里左右,其次约 700 平方公里左右,小国约 350 平方公里上下,分别相当于今山东省的中等县、小县和半个小县的面积,而附庸国也就一两个到数个乡镇那么大。如此看来,上举城子岸、教场铺、景阳冈古国都是很大的古国,也许是些方国了。

古国的疆域,还可从它的母体部落的范围来考察。古国是脱胎于农业部落的政治实体,当一个部落向国家转化时,主要是社会形态的转变,即由原始氏族社会转变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地盘的扩展,也不说明其军事力量一定

强于部落。尽管战争对国家的诞生起着催化作用,军事力量强的部落可能先建立国家,具有军事优势的古国其疆域可能大些,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很大。古国疆域的大小不仅受军事力量的制约,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多寡、历史环境和整个国家机器强弱等诸多因素。我们之所以把五帝时代称为古国时代,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国家还是比较原始的国家,国家机器处于发展、完善之中,一个国家还不能管理辽阔的地域,国家只能是小范围的;另一方面,大量的原始小国和众多的部落氏族相混杂(两者即所谓“万国”),血缘纽带关系和氏族社会的旧观念仍在强烈地起着作用,这些古国与部落的根本差别在于有无公共权力,而不是疆域大小。国家诞生之初,一个国家的疆域和一个部落的范围,将不会有多大差别。因此我们可以从 5000 年前后的部落来了解古国的大致范围。

众所周知,氏族社会末期的农业部落,都有相对稳定的范围,部落周围一般都有隔离地带,部落成员不会很多。恩格斯概括了易洛魁人的状况说:“绝大多数的美洲印地安人,都没有超过联合为部落的阶段,他们的人数不多的部落,彼此由广大的边境地带隔离开来。”^⑨这应当也是古代世界氏族社会的一般状况。由于氏族社会依靠血缘纽带来维系和人们对有利地理环境的依赖,人口又不很多,所以一个农业部落都会在一个有利的生存空间稳定居住,在考古遗存上表现为遗址群。因此那些范围明确的遗址群,一般就是一个部落的遗存,遗址群的范围大致就是一个部落的范围。因此,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分布在环泰沂山脉与胶东山地的山前平地、山间盆地、河谷平地和沿海河口地带的三四十个遗址群,大体上反映了大汶口文化大部分部落、氏族的分布状况。其中大中等遗址群的范围都在 200~700 平方公里,小群范围不超过一二百平方公里。少数地区大汶口文化遗址很多,分布范围较广,可能存在

大部落、亲缘部落或部落联盟。这些大部落或部落联盟,可能是首先向国家过渡的。当他们向国家转化时,疆域未必就跟着拓展,而疆域的扩展,一般也是在原部落占地的基础上扩展的。大汶口文化遗址群发展到龙山文化时,群内遗址剧增、范围明显扩大的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起初因人口增长而使古国疆域扩大,可能是主要形式;通过兼并略地而扩大地盘,大概是次要的。从黄帝到大禹都说有万国,即可说明。通过以上分析,知古国的疆域并不大。这也是我之所以把具有一定规模的聚落群作为探寻古国的一个基本条件的理由。

四、五帝是黄河流域古国联盟的盟主， 帝舜出自东方集团

既然五帝时代是个古国时代,五帝自然是古国联盟的盟主,而不是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尽管这个联盟也包括许多部落在内。据文献记载,黄帝族起源于陕西北部黄土高原,史称黄帝都涿鹿,《舆地志》说后迁有熊,譙周说黄帝是有熊国君,皇甫谧认为有熊在新郑。一种意见以为黄帝族由陕西西北部沿渭河、黄河北岸、太行山麓,迁到了北京乃至燕山以北地区,后又南下。^④事实已难确考,但黄帝族总不出黄河中游、华北北部地区。帝颛顼都帝丘,即今河南濮阳县,在古黄河的东、南岸。皇甫谧说帝喾都亳,在今河南偃师县。帝尧都平阳,或说都唐。前者在山西临汾,后者多认为在河北唐县、望都一带。帝舜,皇甫谧说“舜所都,或言蒲坂,或言平阳,或言潘”。前两地分别在山西永济与临汾,潘在河北涿鹿一带。古史所传五帝居地都不离黄河中下游和华北北部地区,而且治理洪水和征伐三苗是尧舜禹时期的两大业绩。洪水主要发生在古兖州之域,可能还有淮河流域;三苗居于两湖地区。那么五帝是黄河流

域、北方地区古国、部落联盟的盟主,是很清楚的。

据文献记载,五帝除帝喾以外,都和东土势力有密切关系。黄帝自不必说,涿鹿之战就是他代表的炎黄部族和蚩尤代表的东夷部族的大战。不仅战争可能发生在离东夷势力范围不远的巨鹿县一带,^②黄帝战胜后取得盟主地位(“登帝位”)的穷桑,也在山东西部的某地。徐旭生先生关于蚩尤为东夷部族的大首领,蚩尤族活动于冀鲁豫三省交汇地区的考证,为我们提供了打开那段古史迷宫的一把钥匙。^③当然,冀鲁豫交汇地区是个大范围,蚩尤应有自己的中心居地。我曾依据考古资料与古史传说,考蚩尤族的活动中心应在冀鲁豫交汇地区东南部的山东一方,即后来的景阳冈龙山古国境内,很可能就在阳谷县一带。我原先以为穷桑可能在茌平、阳谷一带,现在看来穷桑更可能在阳谷县境。杜预、张守节都说穷桑在鲁国北部,后者还记录了穷桑即曲阜的异说。《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曰:“黄帝由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按《太平御览·皇王部》引此,下有‘故或谓之穷桑帝’之文)颛顼始都穷桑,徙商丘。”^④接着张守节就说:“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总之,穷桑在鲁国境内可信,而在鲁国北境更近事实。穷桑是东方集团前沿地带一个极重要的据点,和少昊、颛顼后来的居地,以及涿鹿之战的发生地都不应该很远。又《淮南子·本经》说:“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空桑即穷桑,知穷桑还是个低洼易受水患之地。今景阳冈龙山古国的都城景阳冈城,东偏北距泰山主峰玉皇顶约 100 公里,东偏南距大汶口古国的中心大汶口遗址约 95 公里,东南距少昊之墟曲阜市区约 105 公里,西南越大野泽、雷泽距定陶县(古陶地)约 120 公里,西偏南距颛顼之墟濮阳县约 100 公里,西北距可能是涿鹿之战的发生地巨鹿县约 150 公里,这一带地处泰山西麓与鲁西平原的结合部,古济水西侧,冀鲁豫交汇区山东一方,属于大汶口

文化的重要分布区一大汶河分布区的前沿地带,与仰韶文化东西为邻。又是黄泛区,自汉武帝时河决瓠子以来,黄河泛滥决口经常湮没这地区,且有济水为患,自古就是水患重灾区。这些都与穷桑的地理条件很吻合,穷桑应在这一带。当时的情形可能是,黄帝取得涿鹿之战的胜利,杀了蚩尤和太昊、少昊族的首领(据《盐铁论·结和篇》记载),接着来到这个东方集团的前沿据点,被拥戴为盟主,出现了黄河流域、北方地区的联盟,后来黄帝族或其一支可能南迁。而出自黄帝族的颛顼,《吕氏春秋·古乐》说他“生自若水,实处空桑”。《帝王世纪》则说他“始都穷桑,徙商丘”。商丘即帝丘濮阳。而颛顼和少昊关系密切。《山海经·大荒东经》说:“少昊孺颛顼。”郝懿行解孺为乳养之乳,即少昊氏养育过颛顼。颛顼又以少昊氏的四叔之一重为南正,“司天以属神”,为颛顼掌管宗教大权。这些记载说明颛顼与少昊都曾居于穷桑的传说未必是子虚乌有,至少表明他们曾是近邻。这不仅为穷桑在景阳冈龙山古国境内的阳谷县一带提供了佐证,也说明黄帝、颛顼和东方势力的密切联系。

至于帝尧,不仅尧有居陶(鲁西南定陶县城周围一带)的传说,《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都有尧游于成阳的记载。汉成阳县治在鲁西鄆城县东南与菏泽市接境地带。成阳、鄆城还有尧陵、尧城的传说。西汉魏晋时尧陵盛极一时,汉祭尧陵十分隆重,士大夫拜谒、立碑,络绎不绝,至赵宋还置守陵户守护。又《系本》、《大戴礼》、《史记》等书均记尧以二女娥皇、女英为舜妻,知尧舜互通婚姻(下面就要说明舜属东夷集团),可见尧和东土势力同样有着密切关系。

虞舜的地望,自古说法纷纭。按舜都蒲坂,或都平阳、都潘的传说,有虞应是冀州地区的古国,属炎黄集团,所以司马迁说舜是冀州人。徐旭生先生认为有虞属东夷集团。他在《中国古史的传

说时代》中,把我国史前部族划分为华夏(炎黄)、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同时指出还可细分出三个亚集团。他的古代部族分野说,和考古学文化区系框架基本相符,虽然后者表明中国古代部族集团不止是三或六个,但这三大部族集团是最重要的集团。他认为三个亚集团之一,是介于华夏与东夷集团之间的颛顼高阳氏、有虞氏、商人的宗教集团。这是否是宗教集团,还可以商榷。但他据《国语·鲁语》有虞氏祖颛顼,而商人禘舜的记载,指出三者有渊源关系,说他们居于炎黄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他们的文化全是一种混合而较高的文化,却是很有见地的看法。只是当时考古学文化区系框架远未形成,并受王国维契居商丘,汤都亳在汉薄县(今山东曹县南境)说的影响,所以他认为商丘以东的虞城县,是自虞幕到舜的居地,并非舜子商均所居;商均居于商丘,商均的商即因于商丘之商,后来的夏王相、商祖契全都居此地。并认为两地离颛顼所居濮阳都不远,足以证明舜居虞城。徐先生指出虞舜不在山西、河北很对,但说有虞在豫东虞城仅据虞城之名和商均居虞城的传说推测,说商均之商因于商丘,同样是揣测。况且商丘也不是现在的商丘县,先秦古籍中的商丘、帝丘是一地,即汉东郡濮阳县,今仍为县,现商丘是周封宋以后才有的名称。虞城为舜子商均所居,今天虽不能肯定,但也不能否定,况且商人并不起源于鲁西南、豫东地区。虽然如此,徐先生关于颛顼、有虞、商人三者有渊源关系,介于炎黄、东夷集团之间,居地应相近的思考,确实可以作为我们探寻有虞地望的一条途径。

颛顼居濮阳,并无疑义。这从颛顼和少昊氏的密切关系也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商族起源于河北西南部的太行山东麓,商族先祖以漳河地区为活动中心,约处于冀鲁豫交汇地区的西部地带,基本上也已成定论。而濮阳在漳河以南很近,处于冀鲁豫交汇地区的南部,商族先祖和颛顼高阳氏的活动范围实际上互有重叠。那

么介于两者之间、有着渊源关系的有虞氏居地,自然应与他们的居地邻近,不应远离他们的活动区。

梳理虞舜居地杂乱的文献记载,孟子和司马迁的说法不仅比较充实,而且他们所勾勒的虞舜早期的活动范围,恰好也和冀鲁豫交汇地区部分重叠和紧邻,应非偶然巧合。《孟子·离娄下》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五帝本纪》曰:“舜,冀州人也。舜耕于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两人除对舜是何地人的看法相左以外,其余各项可以互补。舜的耕渔陶就时之地,《管子·版法解》、《墨子·尚贤》中、下篇、《吕氏春秋·慎人》、《淮南子·原道训》等书都有记载。《尚书大传》还有舜“贩于顿丘,就时负夏”的说法。这些较早的记载都未说舜都蒲坂、平阳或潘。上述地点的出生地诸冯,卒地鸣条不能确知。知雷泽即《禹贡》雷夏泽,在汉成阳县郭外西北,当今山东鄄城县东南境。成阳有历山,即今鄄城县东南部的历山庙,是处龙山文化遗址,舜不必专耕于历山,况且今称历山的地点有许多,大都是后人附会,历山对确认舜的地望并不重要。河滨即黄河滨,当时的黄河大概经濮阳西、北折向东北,由鲁西北进河北,在天津南入海,就近沿河到处可烧制陶器。寿丘,皇甫谧说在曲阜鲁城东门以北。顿丘,作为春秋卫邑,在河南浚县西;作为西汉县,县治在河南清丰县西南,西晋、北朝为顿丘郡治,就在雷夏泽西北不远。而《尚书大传》系西汉伏生弟子编撰,所指顿丘更可能是当时的县,不会指春秋卫邑。负夏,又见于《国语·齐语》。书中记录了齐桓公“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以御戎狄之地”的霸业,只是以往均把四城标点成“筑葵兹、晏负、夏领、釜丘”的双音地名,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国语》作了更正。此负夏和舜所迁或就时的负夏应是一地。参证春秋前期狄人长期活动于齐、鲁、卫、晋之间,狄人侵邢、灭卫,齐桓公迁邢存卫的史实,负夏应是华夏与戎狄交接地带的一个冲要之

地,应在卫国东北境到北境的某地,离顿丘不远。负夏也许因雷夏泽得名,义同负海,果其如此,就应靠近雷夏泽。至于《淮南子·本经》所说“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把舜与空桑联称,含有舜居空桑之意。这和《吕氏春秋·古乐》所说“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信息相通。空桑即穷桑,应在景阳冈古国的阳谷一带。如此就勾勒出东南到曲阜,南到鄄城东南境,西北到古黄河边,东北大体至济水西岸的一个地理区间。景阳冈龙山古国恰好占据此区间的东北和中部,在大野泽、雷夏泽以北地区,处于冀鲁豫交汇地区东南部的山东一方,和南邻河南一方以濮阳为中心的颛顼高阳氏东西为邻,也靠近商人先祖的活动中心漳河地区。即便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肯定景阳冈龙山古国就是虞国,但说虞国地望不出上面勾勒的地理范围,是综合分析西汉以前比较可信的文献记载得出的结论,并有重要考古发现的支持,理由更为充分。这地区属东西北三方文化的交融地带。早先梁山青堌堆^⑤和新近景阳冈遗址^⑥的发掘表明,这里受河南龙山文化的浓厚影响,但仍属海岱龙山文化体系,证明有虞是东夷古国,孟子说舜为东夷人是正确的。当然这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说的。我原先以为教场铺古国可能是虞国的思考,^⑦并不正确。

五帝不同源,黄帝、颛顼、帝喾、帝尧也不先后相承。他们的身份类似春秋五霸,是古国时代古国、部落联盟的盟主。只因他们所处的时代刚从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不久,身上还保留着浓厚的部落酋长、部落联盟大首领那种半人半神身份,所以被称为帝。当时的帝就是神,不光《五帝本纪》的五帝是帝,少昊、丹朱、羿、夏王等也都可以称帝。而且存在不同的五帝说,孔安国、宋衷就是把少昊列为五帝之首的,所以不能把五帝和后来的帝王天子相混同。五帝首先是各自国家的贤能君主,然后才成为黄河流域、北方地区古国、部落联盟的大首领的。作为盟主,他们对中华古文明的推

进,对后来中华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正是五帝和这个联盟,为夏商周文明的形成,创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是中华民族列宗列祖最早的祖先。

注 释

①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

②⑪⑬⑭ 张学海:《城子崖与中国文明》,《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出版。

③大汶口遗址1978年发掘资料,存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参见郑笑梅:《东方文明的曙光》,《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出版。

④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86年配合博(兴)潍(坊)公路拓宽工程,对付家遗址的清理,资料存本所临淄工作站。

⑤南京博物院花厅考古队:《江苏新沂花厅遗址1987年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88年第2期;《考古》编辑部:《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1992年第6期。

⑥1994年12月,笔者和聊城地区文研室同志一起勘察,发现王家庄史前遗址是座龙山城,1995年12月又进行了钻探与试掘,得知该城是大汶口、龙山文化城,龙山城城垣东北角到西南角部分已基本查明,西垣与西北角可能因修战国阿城与汉东阿县城时挖掉或残垣在水位下较深,未探到,但方位大致可以确定,东北到西南约360米,中部东西宽约120米,面积约4万平方米。详情见《张学海考古论集·中国城的起源与原始城的发现》。

⑦1992年配合水渠工程,在西康留遗址北沿的清理中,发现一小段大汶口文化夯土(见《考古》1995年第3期)。1994年夏探出了大汶口文化城垣,上述夯土属城垣东北角内侧,城平面近圆角方形,南北最长处约195米,东北最宽处约180米,面积约37000平方米。详情见注⑥后文。

⑧西山仰韶文化城,据《中国文物报》1996年第7期发布的“1995年十大考古发现”报道,兴建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时期。城垣有多个层位,版筑城

垣之前似有堆筑城垣,始建年代应早于距今 5300 年。城头山城,参见注⑥后文。

⑨《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第 1 册第 3 页。

⑩《张学海考古论文集》,学苑出版社,1999 年第一版。

⑪见本集。

⑫八十年代山东文物普查资料。

⑬⑭参见本集:《鲁西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对若干古史问题的思考》。

⑮1979 年山东省聊城地区博物馆清理,资料存聊城地区文研所。

⑯笔者现场考察和山东省考古所 1995 年冬、1996 年春发掘资料。参见注⑭;景阳冈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7 年第 5 期。

⑰《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第 1 册第 6 页。

⑱《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第 1 册第 15 页。

⑲⑳㉑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二章,科学出版社,1960 年版。

㉒《史记·五帝本纪》中华书局第 1 册第 128 页。

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山东梁山青堌堆发掘简报》,《考古》1962 年第 1 期;吴秉楠、高平:《对姚官庄与青堌堆两类遗存的》,《考古》1978 年第 6 期。

㉔1995 年冬、1996 年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景阳冈遗址进行了发掘,旨在了解大小台址形制、层位和性质,以确定该城的性质。主要在小台西南沿与大台东北沿之间进行了发掘,出土了丰富的龙山陶片,与南面不远的梁山青堌堆的遗存很接近,与西面的后岗类型关系密切,但主流仍属海岱龙山文化体系。见《考古》1997 年第 5 期,景阳冈遗址发掘简报。

㉕见本书《鲁西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对几个古史问题的思考》。

原载《华夏考古》1997 年第 1 期,1998 年 4 月修改

景阳冈城址刻文陶片发现的意义

王守功

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位于山东省阳谷县张秋镇景阳冈村周围。1994年冬至1996年冬,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聊城市文化局文物研究室对该城址进行了钻探、试掘工作。经钻探,城址呈东北—西南向,长1200米,宽300~500米,总面积约40万平方米。发现有城墙、城门、台地、夯土台基等。试掘工作于1995年冬—1996年春进行,发掘面积约1200平方米。发现大量龙山文化时期的遗迹、遗物,并出土一片带文字(或符号,下同)的陶片。现将这片陶片的发现及研讨情况报道如下:

一、陶片发现情况

带刻字的陶片出土于G54。G54位于T6350、T6351内,是1996年春季发掘时发现的一条灰沟,位于城址4、5号台地之间,呈东西向。1996年9月2日,在对G54内出土遗物整理时,发现了该陶片。

从层位关系看,G54开口①B层下,在T6350、F6351内,没有晚于龙山文化的遗存,耕土层(即①A、①B层)下即为龙山文化的堆积。打破G54的遗迹有两个,即G52、H114。

G52及H114均为龙山时期遗存,G52东西向打破G54南部,H114打破G54北部。

G54内堆积分①、②层,出土遗物丰富,主要器类有罐、瓮、鼎、

盆、器盖等,刻文陶片出土于①层,其时代与泗水尹家城三、四段相当,即属龙山文化中期晚段或晚期早段。

带刻文陶片属一小型泥质磨光黑陶罐的肩部,残存部分大致呈三角形,从刻划形式看,是在陶器成型之后,烧制之前刻上的,因此该陶片的文字系龙山时代人们所为。

通过对陶片上刻划文字的观察可以发现,陶片上残存的文字大致属于三个个体,每个个体以点或折线组成,刻法古拙,点线刻划深浅不一,直线及折线的刻划也较生硬、呆板,说明刻划技法并不熟练。此外,在三个刻文下端(即陶片下部)尚有一刻划的点,当属另一文字,由于陶片残破,这一文字的另一部分已经残缺。

二、陶片所刻文字(或符号)的研讨

为进一步了解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出土的带文字陶片的性质和意义,山东省文物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召集山东省考古界专家就景阳冈(及滕州庄里西)出土的刻划文陶片进行了专家论证。

大多数专家认为,G54应属龙山文化中期晚段或晚期早段,陶片上的刻文为烧前刻,可分为两组或三组,不是纹饰,应是文字。至于是什么字,是两组还是三组,尚可探讨。从字的形体看,与甲骨文似有渊源关系。

有的先生还从龙山文化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认为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山东已出现刻划文字,龙山时期应该产生文字,景阳冈龙山城址这么大,出现文字完全是可能的,我们过去对古代人的社会文明估计过低。

当然,也有一部分专家认为,中国古代书画同源,与现代文字不能等同,景阳冈出土陶片上的刻文象图画而不具备文字的意义。

作为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的发掘领队,笔者曾对陶片上的刻

文进行反复观察和思考。首先,陶片虽然是在整理时发现的,但T6350、T6351内耕土层下没有晚于龙山文化的遗存,刻文又是烧成前所为,因而其时代是明确的。从陶片残存情况看,应为泥质黑陶罐的肩部,三组刻文下还多出一个点划,应为另一文字的残存部分,因此,当时人们是在陶罐肩部刻了三个以上的刻文,由于陶器残破,刻陶片上仅保存三组刻文。其次,刻文均以点、直线、折线组成,不象是装饰,也不是图画,因为在泥质黑陶罐上刻上此类纹饰既不美观,也不典雅,到目前为止,在同期遗物中也未发现类似的纹饰。刻文之间有一定距离,从而看出其主体应为三组,从形体看,与甲骨文也较接近,因而其为传播某种信息的文字的成份可能性要多些。再次,就文字发展阶段看,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山东莒县陵阳河就出现图象文字,龙山文化时期出现文字也是完全可能的。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是目前已经发掘的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在其城内出现文字也在情理之中。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景阳冈龙山城址出土的陶片上的三组刻划符号应为文字。至于它们到底是什么字、代表了什么意义,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陶片文字发现的意义

文字是人类文明开始的标志,因此,关于文字起源的问题,历来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学的深入开展,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及岳石文化中都发现了文字,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近四十年来,在山东诸城前寨、莒县陵阳河、大朱村、杭头等地,先后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刻在陶尊上的图象文字。许多专家都对其进行了探讨。有的专家经过考证,认为其中七个字可以辨析,进而认为“诸城、莒县一带发现陶尊文字,是现行汉字的祖型或远祖;从文字学的科学概念出发,诸城、莒县一带发现陶尊文字,

也是我国最早的文字”(王树明:《苍颉作书与大汶口文化发现陶尊的文字》,《中国文物世界》103期)

1991年秋至1992年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队在邹平丁公发掘时,有两个重要的收获,一是确认丁公为一处龙山文化城址,此项发现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另一个是在H1235内发现一片带多个陶文的陶片,有关专家对该陶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考古》1993年4期),还对其中文字进行了释读。

从邹平丁公陶文的结构与笔法看,大都是由曲线组成。王恩田先生将之与二十年代在章丘城子崖周代地层中发现的陶文及莱阳前河遗址出土的西周时期陶器上的文字加以对比,认为“丁公陶文使用连笔,字的写法、结构与甲骨文、金文有很大的差距,似应属东夷文化系统的文字”(见《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

1996年,淄博市博物馆在桓台史村遗址进行抢救性试掘时,发现一祭祀坑,内出岳石文化陶器300余件,除陶器外,还出土刻有“字符”的甲骨。史家遗址出土的这种带字符的甲骨,有的刻六个字,有的刻一个字。有的学者认为,卜骨上的“字符”肯定就是人为刻写的文字。

从这几处遗址出土的刻文看,大汶口陶尊上的文字尚以象形为其主要构图方式,所以有人称它为图象文字,应是文字发展的初级阶段。桓台出土的岳石文化的甲骨刻文从形体上看,与甲骨文极一致,应与甲骨文为同一系统的文字。发掘者认为,史家遗址出土的甲骨上的文字,说明这一地区岳石文化时期的人们与商王朝有密切的关系。

景阳冈与丁公出土的陶文基本属同一时期,丁公H1235属龙山晚期偏早阶段,距今4100~4200之间。景阳冈G54属龙山文化中期晚段或晚期早段,距今约4100~4300年。从陶文风格看,二

者差异甚大,属两个文字系统,因此,笔者认为王恩田先生关于“丁公陶文……似应为东夷文化系统的文字”的论点甚确,而景阳冈出土的陶文,似应与甲骨文有渊源关系。

文字的出现有一个产生、发展阶段。如果说大汶口文化的图象文字为孕育阶段,那么龙山文化的陶文,就应处于产生乃至发展阶段,否则在商代就不会出现成熟的甲骨文。文明的产生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文字及城市的出现,是其中两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目前,全国各地龙山文化城址不断被发现,出现文字的资料也时常见诸于报道,这都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由此可见,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及陶文的发现同其它龙山文化城址或文字发现一样,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阳谷龙山文化城猜想

张从军

1994年11月,考古工作者在山东阳谷县景阳冈发现了一座距今四、五千年的古城址。经初步探测,城址平面呈现圆角扁舟形,东北西南向,东西两条城墙较长,城中部有大小两座台基,台基高近6米,大台面积约9万平方米,小台面积约1万平方米,全城方圆35万平方米。

这一发现非同小可。它是中国目前发现的龙山文化时代最大的一座城址,城内两座台基面积之大,堆筑之高,也为国内所罕见。

无独有偶。当这座沉寂地下数千年之久的古城初露端倪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又惊喜地在景阳冈周围发现了7座龙山文化时代的城址!

如此成群成片地发现,使人们在惊诧之余,不免生发出遐思和猜想:

鲁西北为何有这么多城

龙山文化是山东的“专利”,它是因为在山东章丘龙山镇的首次发现而命名的,这是一个辉煌的历史时代。

生产的进步,生活的稳定,使龙山文化时代的人口逐渐增多,地方居民点鳞次栉比。人口的增加使得原有的活动范围相对狭小,加上自然灾害或人口迁徙等外部因素,原始村落、部落之间的联系和斗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为了保护自己而筑造的防御设施

应运而生。挖掘的村濠在不断加宽加深的同时，濠沟里翻起的积土也在不断加高加厚，“墙”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为了生存的需要，人们以血缘为纽带，聚居到一起，并逐渐扩展至一个较大的群体，最终将这一群体聚集成一个又一个方国，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方国阶段。

“城邦”虽然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名词，但不唯西方独有，中国实际上也曾经有过一个城邦的时代，这就是龙山文化时代。著名学者田昌五先生在所著《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中指出：在中国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有一个部落方国时代，这个时代在 4500 年前后。按考古学的年代划分，这时正是龙山文化时代。

但是，一座又一座城邦麇集在鲁西北平原之上，且城邦之中均有高台基，则不免使龙山文化的历史面貌扑朔迷离起来。

因为，按人类生存环境选择的一般规律分析，原始社会的人们往往把自己的居址安排在山前冲积地带接近水源的高坡区域。高坡既防水又便于排水，而平原地带则无论是防水还是排水都比较困难。然而，鲁西北的龙山文化先民们何以弃高坡而就平原？恐怕事出有因：一是这个时代，人口增长较快，导致了生活环境不得不向平原地带转移扩张。另外一点是否与其部落种属不同有关？原发地或土著居民们不容许新来的部族在高坡地带插足。这就带来了新的问题：

谁是城群的主人

传说的中国历史上有个三皇五帝的时代，孔子所编纂的历史始自于尧舜禹，而除去禹以外，尧舜则为后人所杜撰。舜是夏朝的创始人，据说从禹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

然而，夏朝是什么样子？夏朝的国都在哪里？夏文化的特征是什么？至今人们仍不得而知。

大禹既然是传说中最早的一个男性英雄，自然是父系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其生活的时代自然与父系制度确立的龙山文化时代关系密切。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来自于民间歌谣，其中对于禹的赞美集中在他对周围环境的改造上。他不但是位治水的英雄，能敷土、甸（布置陈放）山，而且也是一位耕稼的专家。不管是甸山、填土还是治水、耕稼，都与农业生产有关，毫无疑问，禹是一位农业英雄。

根据古地质学研究成果，12000年前左右，地球气温回升，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了100多米，原来曾经是山川原野的地方被海水相继吞没，原始人们曾经安居乐业的处所顿时变成了一片汪洋，人们不得不在海水面前退避揖让，于是便流传下了关于洪水泛滥的传说，于是也就有了禹的父亲鲧奉上天之命取来“息壤”下界堵截洪水的传说，虽然因为鲧治水未成而被处死，但当禹继承了父业之后依然奉行了乃父的衣钵，不过他在堵的同时还发明了填、垫和疏导的治水方法。这里的填、垫和堵正是借助于先民们环村落构筑濠墙的经验。由此可知，村濠、土围子也兼有防洪的作用，在平原水多地带，这种作用恐怕还超过了防范人为和野兽侵袭的作用。

禹何以会采用疏导、敷土的方法呢？

古代地理学证实，大约在七、八千年以前，黄河下游湖泊相连，水草丰美，气候潮湿。为了扩大耕种面积，清除了一批积水潭，填平了一些自然沟壑。同时，一些河流因山洪暴发而泛滥成灾，也有必要加以治理。舜因此而率众治水。

但是禹到底住在哪里，史书和神话却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

有的专家认为禹是南方人，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人物；《史记·夏本纪》认为“禹行自冀州始”。冀州在华北平原，阳谷龙山文化城也在华北平原，华北平原是禹从事治水事业的起点，禹的故乡应在北方。

忽然有一天,海水侵袭,先民们分头撤退,退到南岸建立了山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退到北岸的建立了辽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但辽东与山东的新石器文化有着许多的共性和联系。不了解地理变化的人们总以为这种联系是两岸航海的结果,殊不知其联系有着更为久远的渊源,这就是三大猿人后裔的交汇和融合。

一个毋庸置疑的考古现象支持着渤海地区是远古先民故乡的观点。

北辛文化曾经被认为是黄河下游时代最早的一种古文化,而早于北辛文化的遗址不在北辛文化的发现地洙泗之滨,而是在泰沂山北部的淄滩平原。这个时期的陶器制作已比较成熟,其风格特征与鲁南地区的大不相同。如果以磨制石器和发明制陶技术为新石器时代开端标志的话,那么在泰沂山北部还应有时代更早一些的文化面貌。而且,从猿人发展而来的旧石器文化过渡到新石器文化,曾经有一个“中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正好处于冰后期气候转暖的时代。然而这个时代的遗物在泰沂山北部一直寻觅不到。

历史不会缺环,尤其是人类的发展史。唯一的解释便是被淹没在无法探测的地方,符合这一条件的只有大海。大海把三大猿人后裔创造的中石器时代吞食进渤海之中。

山东地区自七十年代以来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大都集中在渤海南岸、泰沂山北部的冲积平原或丘陵地带。从寿光边线王城堡向西,临淄田旺、邹平丁公、章丘城子崖、西河,再向西至鲁西北以阳谷、茌平为中心的城址群,无不面向渤海。而五十年代以来的考古调查与发现,龙山文化遗址也以这一区域为最多。

这里不仅有着密集的村落、聚落和城池,而且也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丁公龙山城址出土的原始陶文,茌平尚庄出土的卜骨,以

及令今天的陶塑大师们百思不得其解的蛋壳黑陶制作工艺,都集中于龙山文化时代,集中于环渤海地带,这决非偶然。因为这里是人类最早开垦的土地,是人类文化积淀最丰富的地带。

禹的故乡在渤海这一猜想,从传说也可找到论据。

《说文》中说禹的父亲鲧死后化为黄熊(即三足鳖),“以入羽渊”,沉埋藏身于深水之中。大禹治水时,他所驱使的不仅有其豢养的应龙,而且还有水神共工氏的子孙们。水神共工不但帮助过禹,而且还帮助过禹的父亲鲧。此可见,禹与共工同样善于治水,自然与水的关系不会太浅。所以,当北方由于气候的关系水灾已不十分突出,南方水患连年不断的时候,禹便自然而然地被调到南方,在浙江的会稽山下辛苦终老。禹的南下很可能是北方龙山文化居民南迁的反映,浙江良渚文化中出现的山东龙山文化器物则给予这一推断以实物的佐证。

禹既南去,禹所居住过的城址却又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问号。阳谷龙山城为何不是正南正北向的方形而是扁椭圆形?城内的庞大台基又是作何用途的?

台基之谜

三十年代初,中国第一代考古工作者在城子崖发现了龙山文化时代的城墙之后,七十年代又在河南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发现了两座龙山文化时代的小城,然后在山东环渤海地带十几座龙山文化时代城址的披露。然而在阳谷龙山文化城被发现之前,所有已揭露的城址内均不见有台基的痕迹。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一座宫殿台基,不过这里却没有城的发现。

阳谷龙山文化城址内有两个基址,基址位于城中部,大的面积有9万平方米,小的也有1万平方米。在平教场铺龙山文化城总面积35万平方米,比阳谷的略小一些。城内有两个台址。其面积

是10万平方米。阳谷城中的台基南北排列,大台址在南,小的在北。茌平的则东西排列,因为在平的城址是东西方向的,两城台基的特点都是前后排列,有大有小。

如同城邦是村落的扩展一样,台基应是台地的延伸。在鲁西北龙山文化城中连续发现两处台基,而在城子崖、丁公等地均不见台址的迹象,这是什么原因呢?

鲁西平原上的堽堆文化为解开这一谜底提供了佐证。

传说黄帝时代的万恶之凶蚩尤被黄帝打败杀死之后,身首埋葬在山东的寿张县(今阳谷、东阿一带)和巨野县,其坟墓高七、八丈,这巨大的坟墓其实是古文化遗址的堆积,即使是传说武松打虎的景阳冈,也是一座龙山遗址,这就是阳谷龙山文化城址中的大台址,至于菏泽地区的数处堽堆,无一不是龙山文化以后的堆积。

这些遗址为什么以堽堆、高台地的形式出现,不言而喻与水有关。

《山海经·大荒北经》载:“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歃所屠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这记载清楚地表明禹所生活的区域是洪水泛滥过后的一片沼泽,因沼泽死水,腥臭无比,连野兽都不愿居住在那里,而多水的环境无法使当时居住在半地穴式房屋的先民们生存,于是抬高所居地面势在必行,这也正是《诗经》对禹所赞颂的功绩:甸山,敷土。正是因为人们在抬高的地面上聚族而居,才有可能使我们在今天的堽堆和台址层里探寻到当时的文化遗存。

由此可见,阳谷城内的台址最早是人们避水的产物,这一创造在经历了五、六千年之后,至今仍在沿黄一带村落中流行,由于连年的垫筑,许多村落甚至高出地面二三米之多。人们在不断加高、扩展其台址面积之余,顺水推舟,村落的围墙也因此而增高加长,

这也就是为什么阳谷城台基南北排列而城池呈偏南北向，在平城内的大小台基东西排列时，其城址也就呈东西向的缘故。

人们聚台而居，城池因台而建，以台址为中心。这一建筑形制一直延续到魏晋甚至更晚的朝代。战国时的大小城，曹魏时期邺城的铜雀台等等，都是龙山文化台址的遗存。

先有台而后有城，是鲁西平原潮湿多水地带的特色，是当时人们顺应自然环境的创造发明。

孔子在带着十分敬佩的口吻述说禹的功绩时写道：“对于禹，我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他的饮食很简单却尽力敬鬼神；他平时穿戴很破旧，祭祀时却穿戴得极华美；他居住的宫室很低矮，对农田水利却很尽力。对于禹，我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

从孔子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禹时的人们有着敬鬼神的宗教活动，这一活动的仪式也相当隆重。人们平时可以节衣缩食，但在祭祀时却马虎不得，甚至作为人主的首领，房屋可以很低矮简陋，但对于鬼神的居所却不敢有些许的怠慢。而祭祀须有一个场所，这场所如果是在城里的话，则非高台莫属。登坛祭祀形制历时数千年，直至明清时代仍要筑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这种现象历代沿袭不变决非偶然。综观世界文明区域，与龙山文化相当或早于龙山文化时代的城邦之中，高高筑起的台基大多非祭祀所用即宫室所居，原始先民们的居所随着历史的演化不得不拱手揖让给无所不能的神祇们，恭让给主宰自己命运的人主们。

如果禹时代的首领果如孔子所描述的那样，身居低矮的房屋，那么龙山文化城中的居民们将全部撤离高台而分散居住在其周围。根据城内除高台以外的面积计算，这时的城内可安排三、四百座房屋，每个房屋住五、六人的话，城内居民可达 2000 人左右，城内居民除继续从事农业、畜牧业外，恐怕更多的要从事专门化的手工业，如制陶、磨骨、琢石雕玉等等，社会大分工因此逐步扩大，一

个全方位的城市文明终于到来了,方国林立的历史从此在中国的东部诞生,山东的史前文化终于拉开了中华文明的帷幕,把一缕曙光洒向四方。

聊城茌平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

陈昆麟 孙淮生 吴明新 孙恒生

聊城、茌平二县市位于山东省西北部黄河冲积平原。北与高唐、临清接壤，西与莘县、冠县相连，南与阳谷、东阿搭界，东与齐河为邻。徒骇河流经两县市。这里地势平坦，气候温暖，水流充足，植被繁茂，为人类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近年来，我区文物普查小队与各县市文物干部共同进行了多次文物普查。特别是 1988 年至 1990 年的文物补查，在这一古文化小区内发现秦以前的古文化遗址 35 处。有的遗址，包含五、六个时代的文化遗存。遗址多发现在已干涸的古河道两侧。两县相较，茌平县境内的古遗址分布比较密集。以县城为中点，在一条西南—东北方向的故河道两侧，每隔三、五公里就有一处古遗址，而徒骇河以西的古遗址却很少（图一）。这里似乎有一条规律可寻，那就是这一文化小区的古文化遗址大部分布在这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古河道两侧的高台地上。向东北一直延伸到德州地区的禹城县境内。现将调查情况简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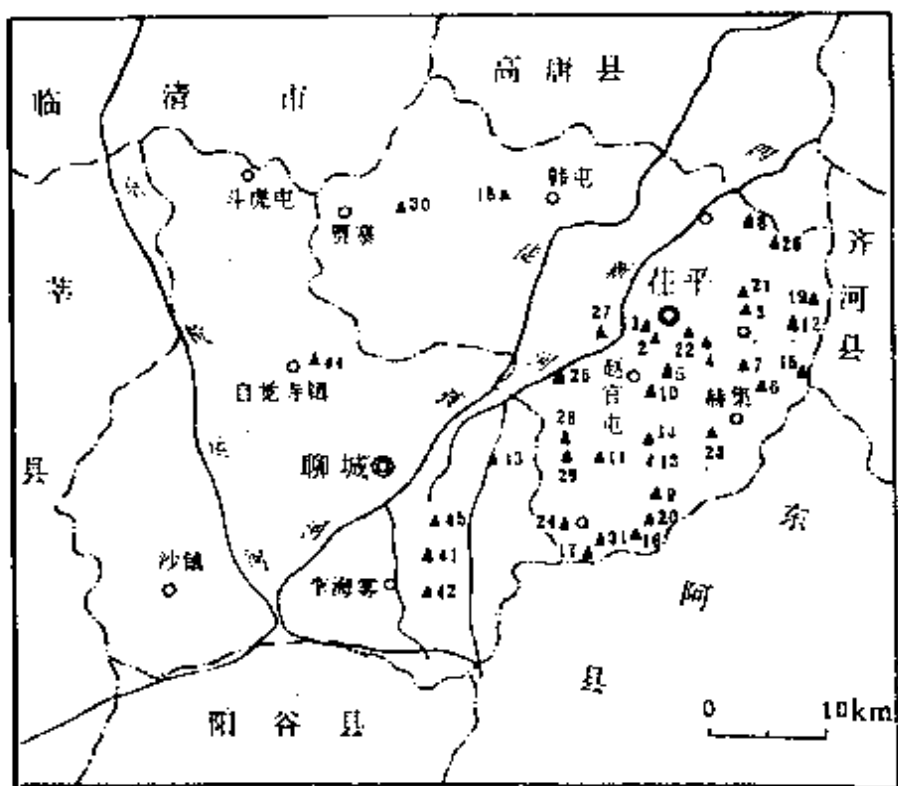
一、大汶口文化遗存

这次调查，共发现大汶口文化遗址 13 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现以尚庄、十里铺为例加以介绍。

尚庄遗址（编号 LC1）

遗址位于茌平县城西 2 公里处尚庄村东一块隆起的高地上，

遗址中心高出周围地面约 3 米,当地俗称为岗子。其南距韩王遗址 0.5 公里。清康熙年间重修《茌平县志》“尖塔岗在城西二里”,所指即是这块高地。遗址东西长约 300、南北宽约 250 米,面积 75000 平方米许。经探查和发掘得知,遗址中心部位文化层堆积达 5 米以上,可分为六层。包含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及汉代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有陶器、石器、蚌器、玉器、骨器等遗物。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存较好。



图一 聊城、茌平古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

十里铺遗址(编号 LC10)

遗址位于在平县城南约 2.5 公里的十里铺村北 10 米处。中心部位高出周围地面 2 米许。遗址东西长约 200、南北宽约 1500 米,面积达 30000 平方米。根据探查和断崖得知,遗址中心部位文化层堆积较厚,包含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商周及汉代各时期的文化遗存,而以大汶口文化遗存较为丰富。采集遗物有陶器、石

器、骨器、蚌器等。是研究这一地区大汶口文化的重要遗址之一。现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存情况一般。

现将在这两处遗址及其它遗址采集的大汶口文化遗物介绍如下。

这次调查采集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遗物较为丰富,可辨器形有鼎、鬲、盂、壶、豆、单耳杯、高柄杯、器盖等陶器,另外还有斧、钺等石器。

1. 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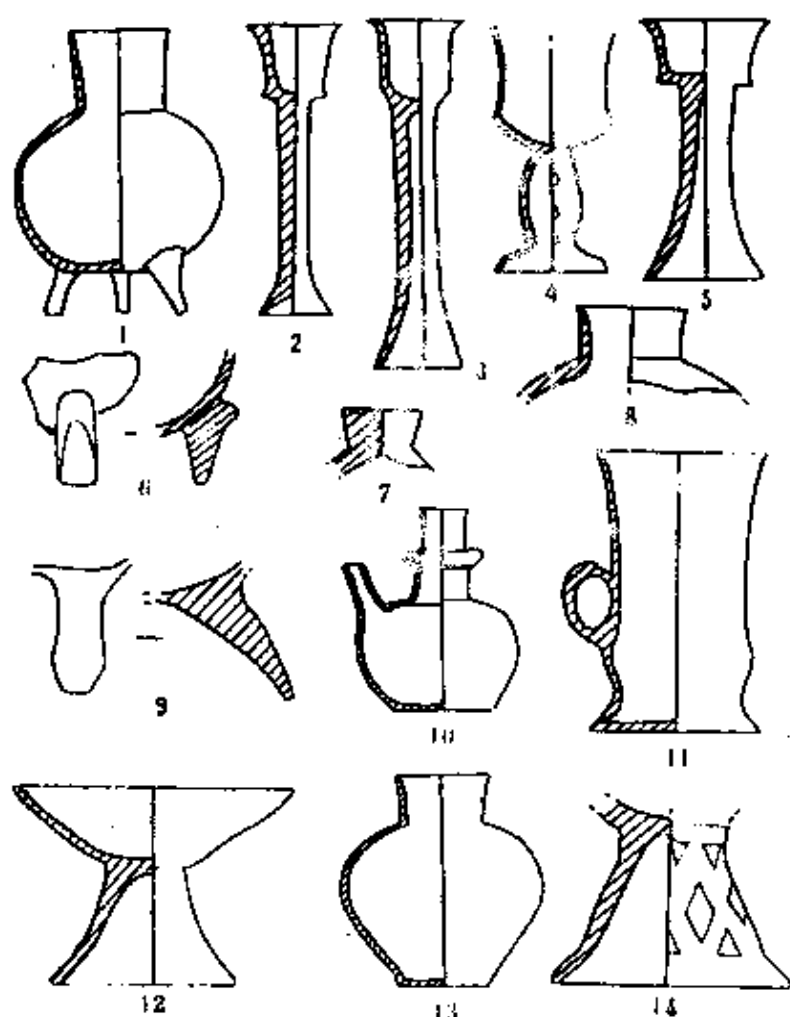
鼎足 2件。均夹砂褐陶。标本 LC1:2,矮凿形足,与腹部相接处有一鹅头状凸起,腹饰一周戳印纹(图二,6)。标本 LC3:65,扁凿形足较高(图二,9)。

鼎 1件。标本 LC1:5,泥质褐陶。直口微侈,尖唇,圆腹,小平底,下附凿形足。素面。口径 5.4,腹 11、通高 15 厘米(图二,1;图三,4)。

盂 1件。标本 LC1:1,泥质灰陶。直口,折沿,长颈,颈中部外凸成箍。鼓腹,平底,肩部有一管状流。素面。口径 5.7、腹径 17.4、底径 10、高 21.3 厘米(图二,10;图四)。

壶 3件。标本 LC3:22,泥质灰陶。侈口,卷沿,圆唇,高领,圆腹,小平底。口径 11、底径 8.4、高 22.5 厘米(图二,13)。标本 LC10:1,泥质黄褐陶。直口微侈,尖唇,广肩。口径 6 厘米(图二,8)。

豆 2件。标本 LC1:4,泥质红陶。钵形,敞口,浅盘,喇叭形圈足。素面。口径 15、足径 10.2、高 10.5 厘米(图二,12)。标本 LC1:3,残。泥质褐陶。镂孔圈足。圈足径 13.2 厘米,残高 9.6 厘米(图二,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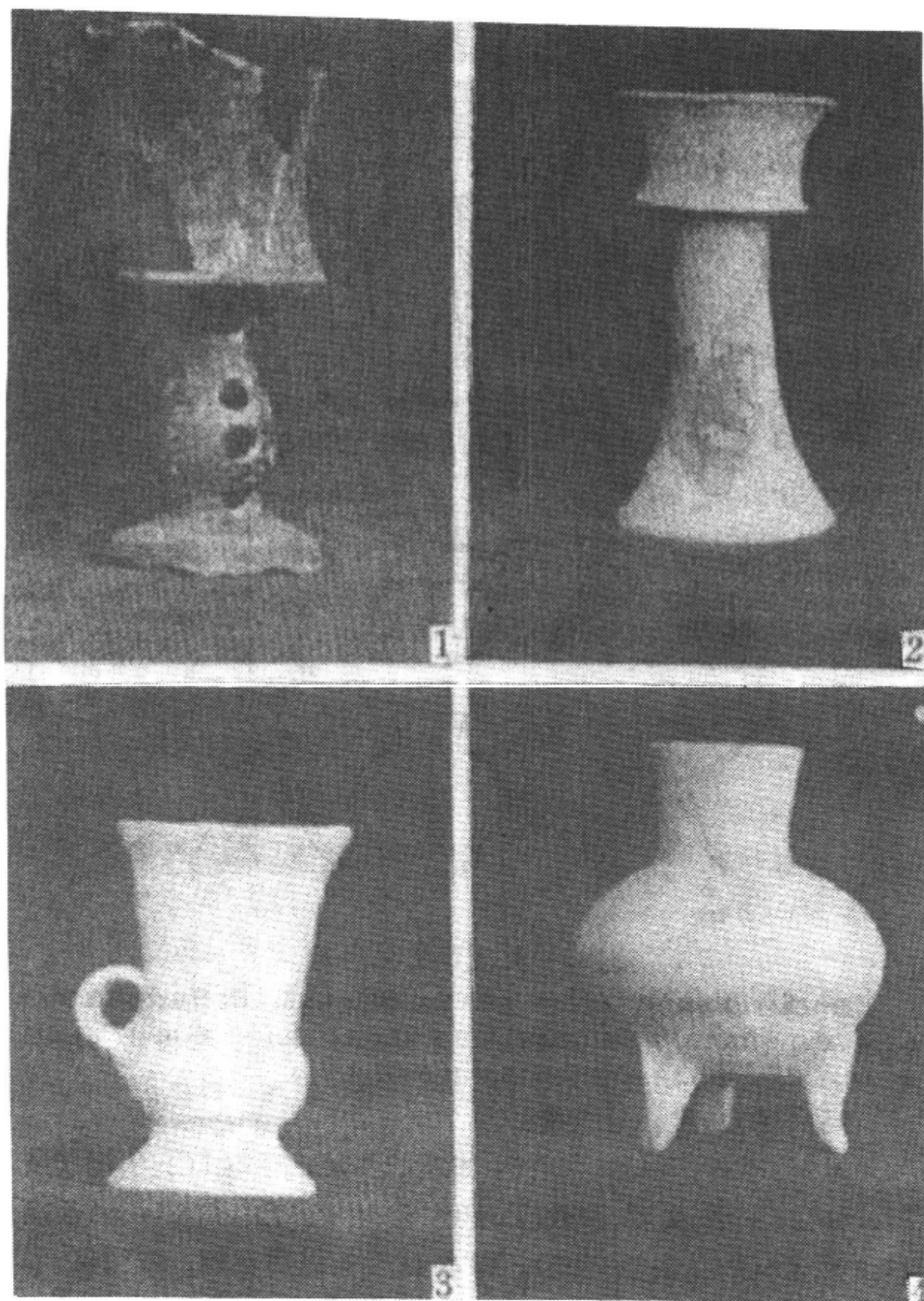


图二 大汶口文化陶器

1. 鼎(LC1:5) 2. B型高柄杯(LC1:9) 3、5. A型高柄杯(LC1:8、6) 4. C型高柄杯(LC1:10)
6、9. 鼎足(LC1:2, LC3:65) 7. 盖钮(LC1:37) 8、13. 壶(LC10:1, LC3:22) 10. 盂(LC1:1) 11. 单耳
杯(LC1:7) 12、14. 豆(LC1:4, LC1:3)(6为1/8, 10、13为1/12, 余均1/6)

高柄杯 4件。分三型：

A型 2件。厚胎，空心柄，喇叭状圈足。标本 LC1:6，泥质灰陶。侈口，平沿，尖唇，腹较浅，平底，底外缘外凸。口径6.9、通高13.8厘米(图二,5;图三,2)。标本 LC1:8，泥质褐陶。口微侈，卷沿，尖唇，深腹圜底，柄细高。口径5.1、通高18.6厘米(图二,3)。



图三 大汶口文化陶器

1. C 型高柄杯(LC1:10) 2. A 型高柄杯(LC1:6) 3. 单耳杯(LC1:7) 4. 鼎(LC1:5)

B型 1件。标本:LC1:9,泥质红褐陶。侈口,斜折沿,圆唇,深腹,平底,底外缘出凸棱,实心柄,喇叭状圈足。陶胎较厚。口径5.1、通高15.6厘米(图二,2)。

C型 1件。薄胎,台式圈足。标本 LC1:10,泥质黑陶。敞口,圆唇,腹内束,圜底,柄中间粗,较矮,饰圆形镂孔。口径9、通高15.3厘米(图二,4;图三,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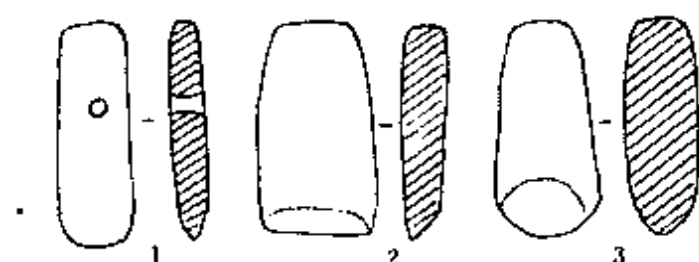
单耳杯 1件。标本 LC1:7,泥质褐陶。敞口,圆唇,上腹斜直,下腹圆鼓,近底内收,平底,腹中部有一单耳。素面。口径6.2、底径8.1、高10厘米(图二,11;图三3)。

盖钮 1件。标本 LC1:37,残。泥质褐陶。钮顶面有刻划纹(图二,7)。

彩陶片 8片。均为钵的腹片,饰三角纹、条带纹等。



图四 大汶口文化陶盂(LC1:1)



图五 大汶口文化石器

1、3.斧(LC1:35,LC1:33) 2.斨(LC1:34)(1、3为1/8,2为1/4)

2.石器 4件。

斧 3件。平面均呈梯形。标本 LC1:35,青石质。磨制。弧刃,正锋,中部偏上有穿孔。长 15.4、宽 4.8、厚 2.6 厘米(图五,1)。标本 LC1:33,青石质。琢制,弧刃。长 10.6、宽 5 厘米(图五,3)。

斨 1件。标本 LC1:34,褐色。平面呈梯形。单面刃,刃部存实用痕迹。磨制较精。长 7.4、宽 3.9、厚 1.6 厘米。(图五,2)

二、龙山文化遗存

这次调查共发现龙山文化遗址 25 处。文化内涵都十分丰富。如茌平县的台子高、腰庄、乐平铺、西路庄,聊城市的堽均店等遗址。现分别予以介绍。

台子高遗址(LC3)

遗址位于茌平县杜郎口乡台子高村西南 200 米处的高台地上。遗址面积约 34000 平方米许。中心部位高出周围地面约 2 米。遗址文化内涵比较丰富。断崖上暴露有灰坑等遗迹。1976 年经局部探掘,文化堆积厚达 7 米左右。地表暴露遗物也十分丰富。采集标本陶器有鼎、鬲、鬯、盆、豆、圈足盆、器盖、陶祖等;石器有斧、斨、矛,另外还有骨器、蚌器,主要为龙山文化遗存。遗址保

存较好,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腰庄遗址(编号 LC6)

遗址位于茌平县孙桥乡腰庄村东 150 米。为一垆堆式遗址。中心部位高出周围 1.6 米,面积 8800 平方米许。文化堆积情况不详。采集陶器有罐、鼎、鬲、簋等,多属龙山文化遗物。遗址破坏较为严重,现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乐平铺遗址(编号 LC13)

遗址位于茌平县乐平铺镇乐平铺北街南 50 米处。为一垆堆遗址。中心部位高出四周 0.7 米,面积 4.5 万平方米许。从遗址南部排水沟断崖上观察,文化层厚达 2.5 米,遗址文化内涵丰富。采集标本以陶器为主,可辨器形有鼎、鬲、罍、豆、盆、罐、盂、器盖、甗足诸类。另有部分石器和骨器。为一单纯的龙山文化遗址,保存较好。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西路庄遗址(编号 LC14)

遗址位于茌平县乐平铺镇西路庄村西南 450 米处。南临管化河,为一高出周围 0.7 米的隆起高地。东西长 800、南北宽 600 米,面积约 48 万平方米。遗址中部因平整土地,已将上部土层去掉,暴露出文化层。文化堆积情况不详。采集的标本以陶器为主,可辨器形有罍、盆、鬲、罐等。为一龙山文化遗址。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保存较好。

垆均店遗址(编号 LL43)

遗址位于聊城市蒋官屯乡垆均店村西 20 米处。遗址地势平坦,四新河从遗址中南北穿过。从河岸断崖观察,遗址南北长 220、东西宽约 150 米,总面积 3.37 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 2 米左右,土质浅灰,内含大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鼎、尊、罐、碗、甗、瓮、豆等。为一龙山文化至战国时期的遗址,保存较好。

这次调查采集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十分丰富,有陶器、石器、

蚌器、骨器诸类,现分类予以介绍。

1. 陶器

龙山文化陶器,陶系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次之;陶色以灰陶居多,其次为黑陶、黑皮陶,也存少量的红陶和白陶。陶器多为轮制,器形规整。常见纹饰有篮纹、绳纹、方格纹、弦纹及附加堆纹等。可辨器形有鼎、甗、鬲、瓮、罐、碗、盆、盒、壶、盘、簋子、网坠诸类。

鼎 3件。均夹砂灰陶。标本 LC3:56,侈口,卷沿,方唇,沿面凹,矮领,鼓腹,圜底下附三角形足。口径 10.5、高 8.7 厘米(图六,11)。标本:LC1:18,侈口,折沿,方唇,肩部饰盲鼻。口径 13 厘米(图六,10)。

鼎足 7件。分三型:

A型 1件。凿状足。标本 LC5:6,夹砂灰陶。

B型 3件。鸟首形足。标本 LC1:3,夹砂褐陶(图六,14)。

C型 3件。侧三角形,一侧压印成齿状纹。标本 LC13:3, LC13:5 均为夹细砂灰陶(图六,5、6)。

甗足 1件。标本 LL41:1,夹细砂灰陶。高实足尖(图六,16)。

鬲足 2件。标本 LL41:2,泥质褐陶,高实足(图六,15)。标本 LC14:14,细砂白陶(图六,17)。

瓮口 8件。分四型:

A型 1件。标本 LC1:14,泥质灰陶。侈口,圆唇。颈部有数道凸棱,肩以下饰篮纹。口径 40 厘米(图六,19)。

B型 2件。标本 LC8:2,泥质灰陶。侈口,卷沿,沿面有凹槽。方唇,矮领,广肩。腹部饰篮纹。口径 23.8 厘米(图六,20)。

C型 3件。标本 LC3:55,夹砂灰陶。侈口,折沿,方唇。斜肩,鼓腹。肩以下饰篮纹。口径 20.4 厘米(图六,21)。标本 LC8:

1,夹细砂灰陶。侈口,折沿,方唇,鼓腹。腰部饰拍印方格纹。口径22厘米(图六,12)。

D型 2件。标本LL41:9,泥质灰陶。直口,圆唇,方肩,肩部一周凹弦纹。口径18.6厘米(图六,22)。标本LL42:4,夹细砂灰陶。直口,卷沿,方唇,唇面有二周凹槽。沿面微凹,矮领。口径30厘米(图六,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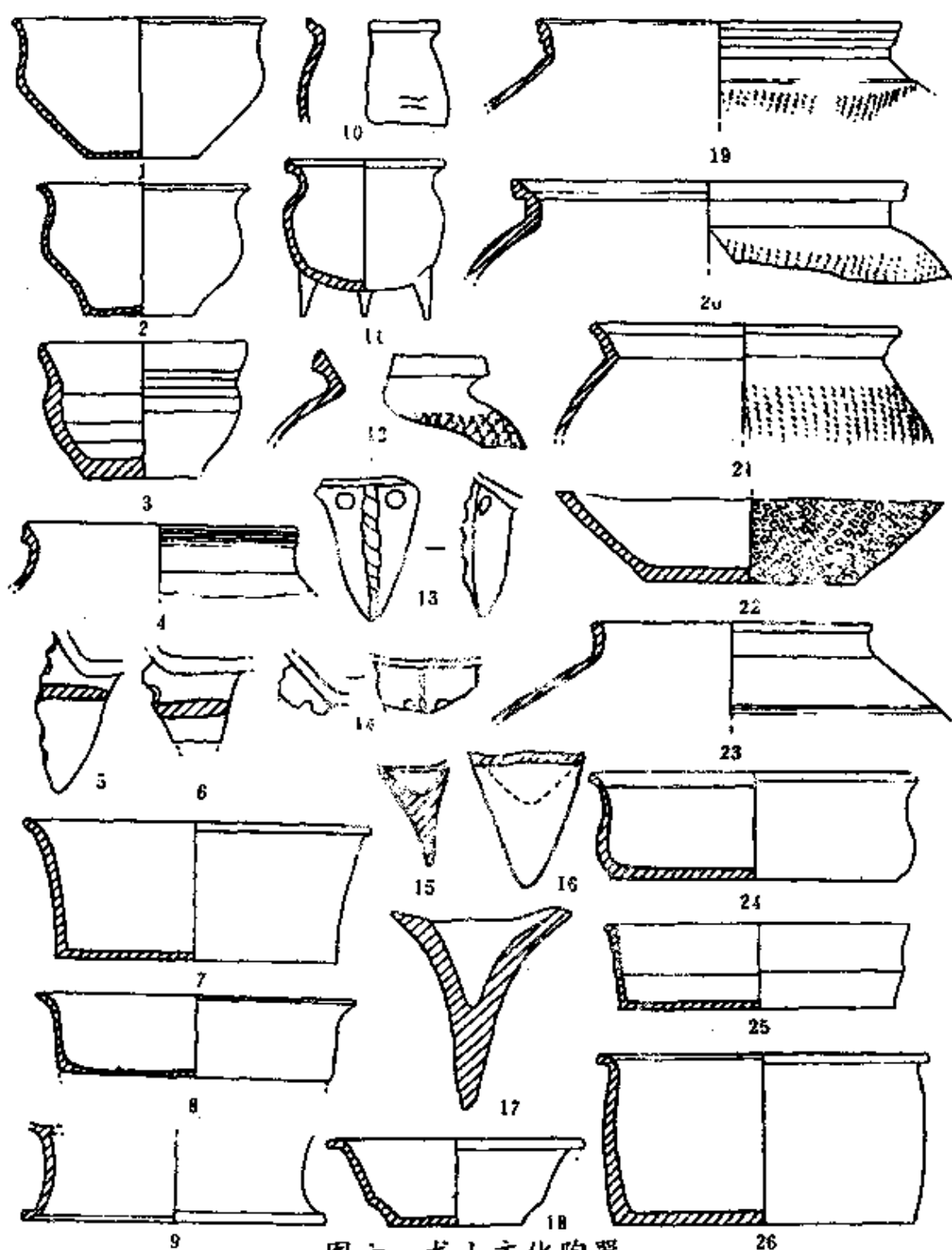
瓮底 1件。标本LC3:57,泥质灰陶。平底,饰方格纹。底径15厘米(图六,22)。

碗 1件。标本LC1:19,泥质灰陶。敞口,卷沿,圆唇,腹壁斜直,下腹折收成小平底。口径16.5、底径9、高5.7厘米(图六,18)。

圈足盆 2件。标本LC1:16,夹砂褐陶。残存圈足。足高6厘米(图六,9)。标本LC3:71,泥质灰陶。敞口,卷沿,方唇,直腹,下附圈足已残。素面。口径21厘米(图六,8)。

平底盆 4件。各不相同。标本LC3:59,泥质灰陶。敞口,圆唇,直腹,底部外缘外凸,腹中部饰一周凸棱,平底。口径21.6、底径14.8、高11.4厘米(图六,24)。标本LC3:62,夹砂灰陶。敞口,方唇,上腹内束,下腹外鼓,器壁较厚,平底。素面。口径42、底径37.2、高14.4厘米(图六,24)。

鼓腹盆 5件。标本LC3:70,泥质灰陶。敞口,圆唇,鼓腹,小平底。素面。口径16.8、底径7.4、高9.3厘米(图六,1)。标本LC3:68,泥质黑陶。敞口,方唇,小平底,鼓腹。素面。口径13.5、底径7.5、高8.7厘米(图六,2)。标本LC3:67,磨光黑陶。敞口,圆唇,鼓腹,小平底,器壁较厚。口径9.2、底径4.8、高6厘米(图六,3)。



图六 龙山文化陶器

1-3. 鼓腹盆(LC3:70, LC3:68, LC3:67) 4, 22. D型瓮(LI42:4, LI41:9) 5, 6. C型鼎足(LC13:3, LC13:5) 7, 24-26. 平底盆(LC3:63, LC3:62, LC3:59, LC3:61) 8, 9. 圈足盆(LC3:71, LC3:16) 10, 11. 鼎(LC1:18, LC3:56) 12, 21. C型瓮(LC8:1, LC3:55) 13, 14. B型鼎足(LC1:30, LI41:3) 15, 17. 鬲足(LI41:2, LC14:14) 17. A型鼎足(LC5:6) 18. 碗(LC1:19) 19. A型瓮(LC1:14) 20. B型瓮(LC8:2) 22. 瓮底(LC3:57)(17为1/2, 4, 9, 19为1/10, 24为1/12, 余为1/6)

罐 15 件。分三型：

A 型 侈口罐,5 件。标本 LC3:50,夹砂灰陶。侈口,卷沿,沿面微凹,方唇,鼓腹。腹部饰方格纹。口径 20.8 厘米(图七,19)。标本 LC9:1,夹砂黑陶。侈口,卷沿,方唇,鼓腹。腹部饰拍印篮纹。口径 18 厘米(图七,6)。标本 LI43:1,夹砂灰陶。侈口,卷沿,方唇,束颈,沿面一周凹槽,溜肩。腹部拍印方格纹。口径 18 厘米(图七,21)。标本 LI42:3,夹砂灰陶。侈口,斜沿,方唇,沿面一周凹槽,斜肩。腹饰细绳纹。口径 21 厘米(图七,20)。

B 型 直口罐,2 件。标本 LC8:4,泥质灰陶。直口,方唇,唇面有凹槽,领较高,鼓腹。口径 21.9 厘米(图七,12)。标本 LI42:5,夹砂灰褐陶。直口,折沿,方唇,矮领,广肩。口径 15.6 厘米(图七,22)。

C 型 子母口罐,2 件。标本 LC12:3,夹砂灰陶。尖唇。口部三道凹弦纹。腹饰篮纹。口径 21.9 厘米(图七,11)。

罐耳 1 件。标本 LC8:5,为一竖桥形耳(图七,15)。

器盖 12 件。分三型：

A 型 覆碗式,9 件。又可分为三个亚型。

Aa 型 4 件。平顶,盖顶隆起。标本 LC1:13,夹砂灰陶。盖面微隆,平沿,圆唇。口径 16.2、高 3.9 厘米(图七,3)。标本 LC3:39,夹砂灰陶。盖面隆起较甚,圆唇。捉手较高,器壁较厚。口径 11.8、高 5.1 厘米(图七,4)。

Ab 型 4 件。平顶,盖面斜直或内曲。标本 LC3:33,夹砂黑陶。盖面斜直,圆唇,沿内面有凹槽。口径 16.2、高 6.6 厘米(图七,2)。标本 LC3:40,夹砂灰陶。盖面内曲较甚,顶部外缘外凸,圆唇。口径 12.8、高 4.6 厘米(图七,1)。

Ac 型 1 件。标本 LC3:41,夹砂灰陶。盖面微隆,圆唇,盖钮较高。其边缘刻划有锯齿纹。口径 8.4、高 3.4 厘米(图七,5)。

B型 筒形,2件。标本 LC3:38,泥质黑陶。素面磨光。沿面有一道细凹槽,盖顶微凹,其外缘一道深凹槽。口径 13、高 5.4 厘米(图七,10)。标本 LC13:7,泥质磨光灰陶。直口微敛,平顶。口径 12、高 6 厘米(图七,13)。

C型 1件。覆盘形。标本 LC3:31,细泥质褐陶。表面磨光,子母口,盖面饰盲鼻。口径 27、残高 2.5 厘米(图七,7)。

盘 2件。标本 LC3:29,残,泥质磨光褐陶。敞口,圆唇,浅盘,平底,高圈足。口径 32、圈足径 16.4、残高 8 厘米(图七,18)。标本 LC12:1,泥质灰陶。敞口,圆唇,浅盘,平底。口径 17.7、高 2.1 厘米(图七,23)。

盒 5件。分三型:

A型 2件。直口,沿面存一道细凹槽,平底,底外缘外凸。标本 LC3:47,泥质黑陶。口径 16.8、底径 15.6、高 5.7 厘米(图七,9)。

B型 2件。圈足盒。标本 LC3:44,残,泥质黑皮陶。子母口内敛,平底,下附圈足残缺。口径 13.5、残高 5.1 厘米(图七,8)。

C型 1件。标本 LL42:8,残,泥质灰陶。子母口,平底。底径 21、残高 3.6 厘米(图七,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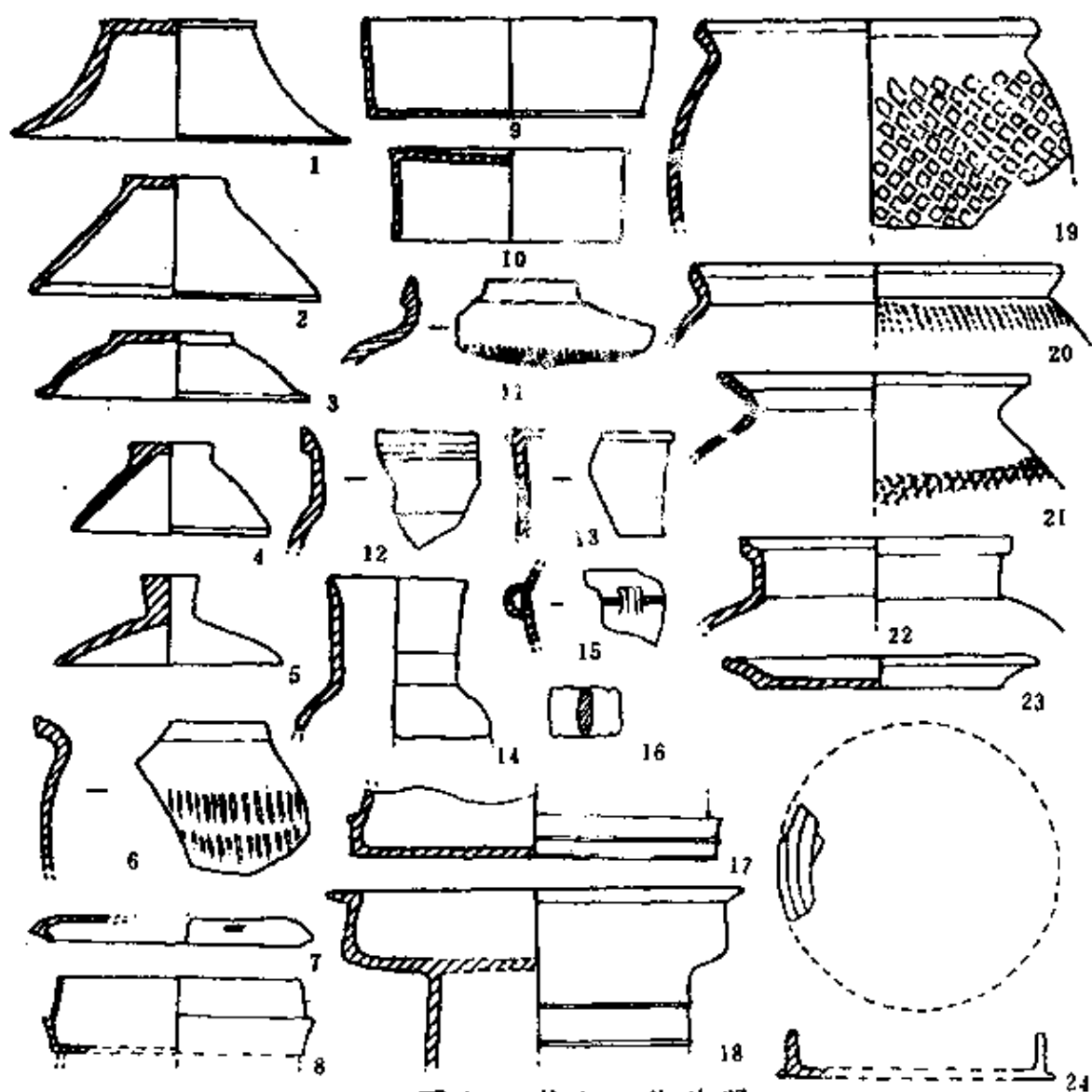
壶口沿 1件。标本 LC7:4,泥质灰陶。器表施黑陶衣。直口,尖唇,长颈,鼓腹。口径 7.8 厘米(图七,14)。

算子 1件。标本 LC13:2,泥质灰陶。直壁浅盘,底沿有凹弦纹,算孔呈三角形。直径 32.4 厘米(图七,24)。

纺轮 3件。标本 LC3:42,泥质褐陶。圆形,中间厚,边缘稍薄,无孔。直径 8,厚 1.4 厘米(图八,3)。

网坠 2件。标本 LC13:8,泥质灰陶。长方形,长边两端各划两个三角形缺口。素面。长 4.2、径 2.7 厘米(图七,16)。标本 LC3:76,泥质褐陶。圆柱体形,其上有一系绳圆孔。长 7.4、径 2

厘米(图八,1)。



图七 龙山文化陶器

1, 2. Ab型器盖(LC3:40, LC3:33) 3, 4. Aa型器盖(LC1:13, LC3:39) 5. Ac型器盖(LC3:11)
6, 19-21. A型罐(LC9:1, LC3:50, LL42:3, LL43:1) 7. C型器盖(LC3:31) 8. B型盒(LC3:A4) 9.
A型盒(LC3:47) 10, 13. B型器盖(LC3:38, LC13:7) 11. C型罐(LC12:6) 12, 22. B型罐(LC8:4,
LL42:5) 14. 壶(LC7:4) 15. 罐耳(LC8:5) 16. 网坠(LC13:8) 17. C型盆(LL42:8) 18, 23. 盘
(LC3:29, LC12:1) 24. 算子(LC13:2) (5为1/4, 7为1/10, 16, 24为1/12, 18为1/8, 余为1/6)

环 1件。标本 LC3:77, 残, 泥质灰陶。直径约7厘米(图八, 7)。

祖 1件。标本 LC3:86, 泥质灰陶(图八,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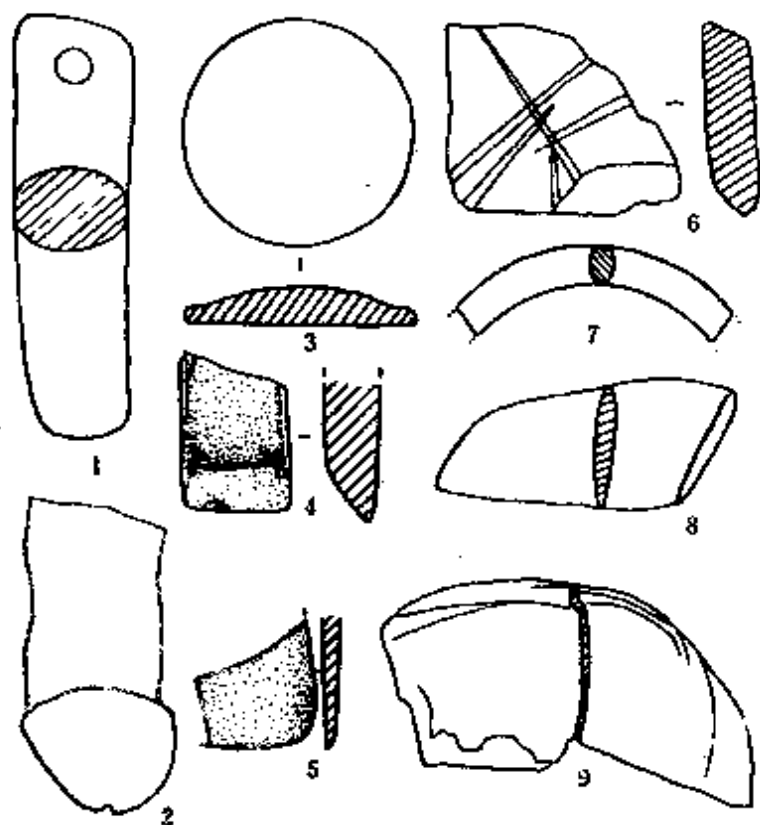
2. 石器

铲 2件。均磨制。标本 LC7:2, 平刃, 偏锋。残长 6.9、残宽 6.3、厚 1.2 厘米(图八, 5)。

镰 3件。均磨制。标本 LC5:11, 残, 刃部有崩损痕。残长 10.1、宽 5.6 厘米(图八, 8)。

铤 1件。标本 LC13:9, 残。正面梯形, 平刃。长 8.1、宽 5.7、厚 2.4 厘米(图八, 4)。

砺石 1件。标本 LC3:12, 表面有磨损深沟数条。长 8、宽 6.7、厚 1.9 厘米(图八, 6)。



图八 龙山文化遗物

1. 陶网坠(LC3:76) 2. 陶祖(LC3:86) 3. 陶纺轮(LC3:42) 4. 石铤(LC13:9) 5. 石铲(LC7:2)
6. 砾石(LC3:12) 7. 陶环(LC3:77) 8. 石镰(LC5:11) 9. 蚌镰(LC5:1) (1、2、7 为 1/2, 4、5 为 1/6, 余为 1/4)

3. 蚌器

镰 3 件。均有穿孔,残。标本 LC5:1,长 13.4、宽 6.5 厘米(图八,9)。标本 LC5:2,长 11.2、宽 5.3 厘米。标本 LC13:10,穿双孔。长 8.1、宽 5.4 厘米。

4. 骨、角器

30 件。器形有锥、凿、镞、矛、筭等。

骨锥 8 件。分二型:

A 型 5 件。用劈裂的动物长骨骨片制成,仅在一端削刻,磨制尖刃。标本 LC3:73,长 10.7、宽 2.3 厘米(图九,6)。标本 LC3:74,长 6.7、宽 1.5 厘米(图九,11)。

B 型 3 件。横断面呈圆形,通体磨制精细光洁。标本 LC3:79,中部有一小穿孔,长 7.7、径 0.9 厘米(图九,8)。标本 LC3:75,顶部平,锥体较粗短。长 7.7、径 0.7 厘米(图九,7)。

角锥 2 件。用鹿角稍加磨制而成。标本 LC3:78,长 9.8 厘米(图九,5)。

骨筭 9 件。通体磨制光滑。分二型:

A 型 5 件。断面为圆形和扁圆形,钝尖。标本 LC3:82,平顶。长 13.9 厘米(图九,3)。

B 型 4 件。用窄骨片磨制而成,体扁薄。标本 LC3:83,近顶部刻口,尖残,残长 7.5 厘米(图九,10)。

骨凿 5 件。断面呈长方形。磨制精细,双面刃。标本 LC3:80,长 8.4 厘米(图九,2)。标本 LC3:81,顶部残,刃有崩痕。残长 7.6 厘米(图九,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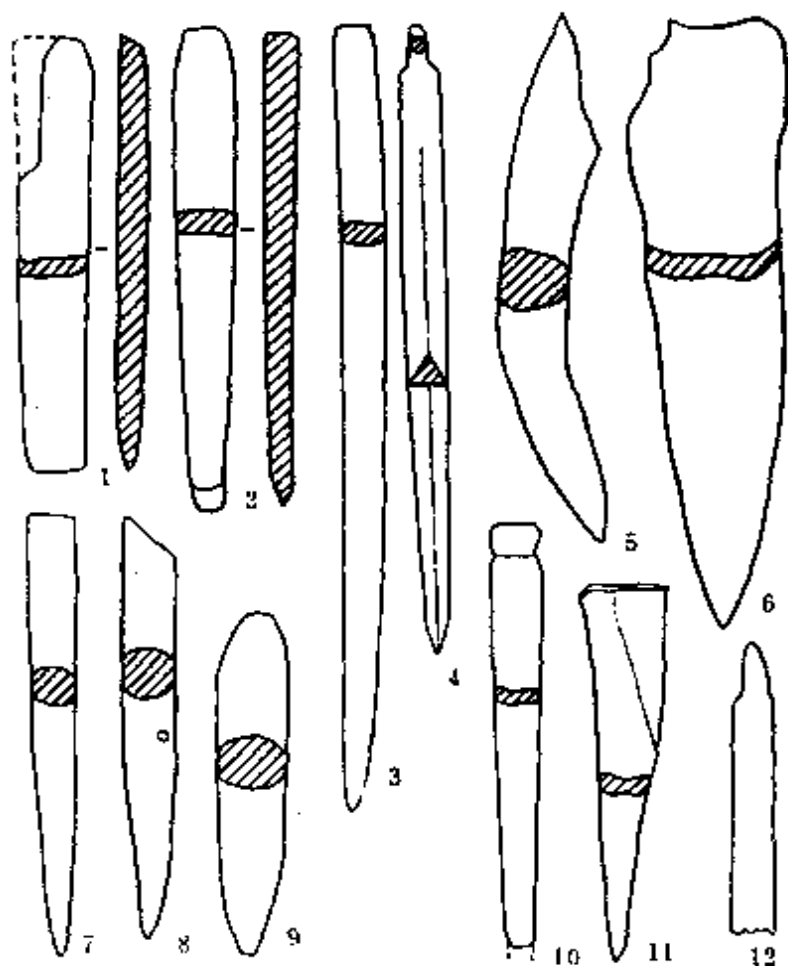
骨镞 5 件。分三型:

A 型 2 件。磨制精细。标本 LC3:84,锋残。圆体有铤。残长 5.1 厘米(图九,12)。

B 型 1 件。标本 LC3:85,圆柱体,锋钝铤不明显。黑色。长

6 厘米(图九,9)。

C 型 2 件。通体磨光。长身,短铤,断面呈三角形。标本 LC3:86,长 11 厘米(图九,4)。



图九 龙山文化骨、角器

1、2. 凿(LC3:81, LC3:80) 3. A 型笄(LC3:82) 4. C 型镞(LC3:86) 5. 角锥(LC3:78) 6、11. A 型锥(LC3:73, LC3:74) 7、8. B 型锥(LC3:75, LC3:79) 9. B 型镞(LC3:85) 10. B 型笄(LC3:83) 12. A 型镞(LC3:84)(均为 1/2, 未注明质料者为骨器)

三、岳石文化遗存

这一地区含岳石文化遗存的遗址有 9 处,都与龙山文化遗存共存。现择其主要者予以介绍。

权寺遗址(编号 LI41)

遗址位于聊城市李海务乡权寺村西 80 米处。东西长约 170、南北宽约 110 米,总面积约 1.87 万平方米。遗址地势平坦,地表遗物较少。其北部因挖沙形成一东西长 80 余米、南北宽 30 多米的土坑,西部为小学占据。从断崖观察,文化层距离地表在 1 米以下,文化堆积厚 1 至 2 米不等。土质灰黑松散,内涵丰富,包含有大量陶片。采集标本可辨器形者有鼎、瓮、尊、碗、罐、器盖等陶器。破坏较严重。

梁庄遗址(编号 LC11)

遗址位于茌平县广平乡梁村东北 500 米处,一水渠从遗址中部穿过。从水渠断崖上观察,文化堆积厚 1.5 米许,均深埋在 3 米厚的黄土之下,地表很少见到遗物。面积约 3000 多平方米。采集标本主要为陶器,可辨器形有鬲、盆、罐、瓮、壶诸类,分属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

现将采集岳石文化遗物简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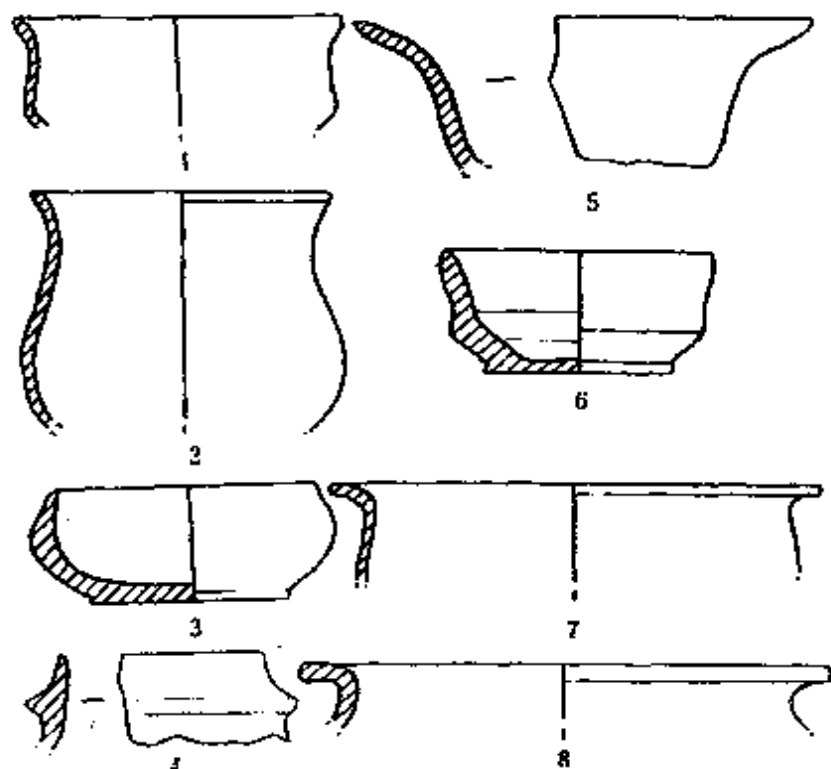
采集岳石文化遗物较少,仅有陶器一种。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次之。陶色多为灰、褐陶,不见黑陶。均为素面。制作粗糙,器壁厚重。器形有罐、盆、碗、钵等。

罐口沿 3 件。标本 LC3:27,夹砂灰褐陶。侈口,圆唇,鼓腹。口径 10 厘米(图一〇,2)标本 LC3:24,泥质褐陶。宽卷沿,圆唇,鼓腹。口径 33.6 厘米(图一〇,7)。标本 LC11:1,泥质灰陶。子口微敛,短颈,颈部有一周凸棱(图一〇,4)。

盆 3 件。标本 LC3:26,泥质灰陶。敛口,宽卷沿,方唇,口径 27 厘米(图一〇,8)。标本 LC7:1,泥质黑灰陶。敞口,卷沿,尖唇,腹壁斜直(图一〇,5)。标本 LL41:6,泥质磨光褐陶。侈口,圆唇,直腹。口径 16.8 厘米(图一〇,1)。

碗 2 件。标本 LC3:28,夹砂灰陶。敞口,圆唇,折腹,假圈足,壁较厚。素面。口径 9.4、底径 6.6、高 4.4 厘米(图一〇,6)。

钵 1 件。标本 LC3:25, 泥质灰陶。素面磨光。敛口, 尖唇, 鼓腹, 平底, 器壁较厚。口径 9、底径 6.8、高 4.2 厘米(图一〇, 3)



图一〇 岳石文化陶器

1、5、8 盆(UJ41:6, LC7:1, LC3:26) 2、4、7 罐(LC3:27, LC11:1, LC3:24) 3. 钵(LC3:25) 6. 碗(LC3:28)(7 为 1/8, 余为 1/6)

四、商代文化遗存

这两个县市, 共有含商代文化的遗存和遗址 26 处。大都与龙山文化遗存并存, 文化内涵都很丰富。如在平县的东一甲遗址、南陈遗址、大尉遗址、大碾李遗址等。现分别介绍如下:

东一甲遗址(编号 LC5)

遗址位于在平县赵官屯乡东一甲村东南约 0.5 公里处。中心部位高出周围约 0.5 米, 向四周成缓坡状逐渐变低, 面积约 2 万平方米, 文化堆积 1-3 米不等。采集标本主要为陶器, 有鼎、鬲、盆、罐、豆、瓮、甗等, 多属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位,保存比较完好。

南陈遗址(编号 LC7)

遗址位于茌平县郝集乡南陈庄西 30 米处。原为两个南北相连的土丘,因农民常年取土,平整土地,现已成为平地,面积 8 万余平方米。1980 年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配合教学任务,曾在此进行发掘。文化堆积约 2.5~3.2 米。可分五层。第三层、第四层为商周文化层,第五层为龙山文化层。出土器物有盆、鬲、簋、瓮、碗等。另外有石斧、骨镞等。出土遗物分属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战国及汉代各时期。

大尉遗址(编号 LC9)

遗址位于茌平县乐平铺镇大尉东南 1 公里处。总面积达 6 万多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度 1~5 米不等。原为一面积较大的高台地,后因群众挖沙,遗址遭到大面积破坏,仅遗址中心部位得以保存下来。采集遗物主要有鼎、鬲、罍、豆、杯、罐等陶器及铜剑等物,分属大汶口、龙山、商周及汉代各时期。现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碾李遗址(编号 LC18)

遗址位于茌平县韩屯乡大碾李村北 100 米处,地势平坦,总面积约 2 万平方米。文化层厚度 1~3 米不等。采集遗物主要为陶器,有鬲、罍、豆、盘、杯、纺轮等。分属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及汉代各时期。

这次调查采集商代文化遗物十分丰富,有陶器、骨器、蚌器等。现分类予以介绍。

1. 陶器 器形有鬲、盆、豆、罐、瓮、簋、甗等。

鬲 20 件。可粗略分为五型:

A 型 16 件。依其细部的差别分为三个亚型:

Aa 型 7 件。侈口,卷沿,方唇或圆唇,鼓腹。标本 LC5:38,

夹砂褐陶。沿面外缘一周凹槽,圆唇。腹部饰粗绳纹。口径 18 厘米(图一一,5)。标本 LC5:40,夹砂灰陶。沿面微凹,方唇。腹部饰绳纹。口径 18 厘米(图一一,13)。标本 LC6:2,夹砂红褐陶。方唇。沿下绳纹抹去,腹部饰粗绳纹。口径 24.9 厘米(图一一,17)。

Ab 型 5 件。侈口,折沿,沿面凹,方唇或圆唇,鼓腹。标本 LC5:36,夹砂褐陶。宽折沿,圆唇。腹部饰绳纹。口径 16.2 厘米(图一一,6)。标本 LC5:42,夹砂灰陶。圆唇。颈下一周附加堆纹,腹部饰绳纹。口径 18 厘米(图一一,12)。标本 LC14:10,夹砂灰褐陶。沿较窄,方唇。腹部饰绳纹。口径 14.4 厘米(图一一,1)。

Ac 型 4 件。侈口,卷沿,沿面凹,方唇或圆唇,腹壁较直。标本 LC5:49,夹砂灰褐陶。方唇。腹部饰绳纹,口径 16.8 厘米(图一一,11)。标本 LC5:35,夹砂褐陶。圆唇。腹部饰绳纹(图一一,3)。

B 型 6 件。侈口,卷沿,方唇,沿面外缘及唇面各有一深凹槽,鼓腹。标本 LC5:48,夹砂灰陶。腹部饰粗绳纹。口径 24 厘米(图一一,14)。标本 LC3:20,夹砂灰陶。颈部一周凹弦纹,腹部饰绳纹。口径 15.9 厘米(图一一,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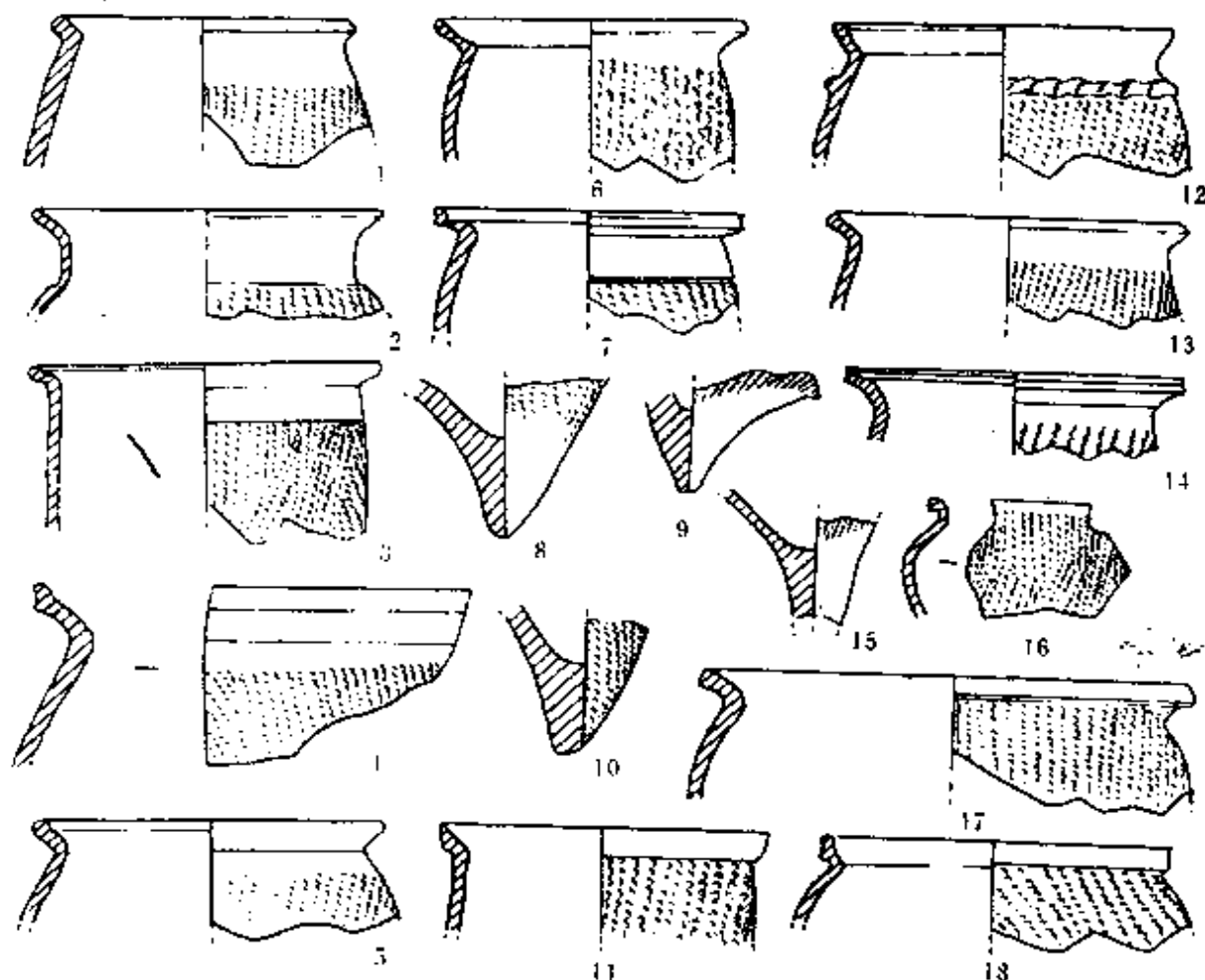
C 型 6 件。侈口,折沿,沿面凹,方唇,唇面较宽,唇上缘翘起,束颈,鼓腹。标本 LC6:9,夹砂红陶。腹饰绳纹。口径 27.9 厘米(图一一,4)。标本 LC5:47,夹砂灰陶。腹部饰粗绳纹。口径 18 厘米(图一一,18)。

D 型 1 件。标本 LC41:10,夹砂灰褐陶。侈口,卷沿,沿面鼓甚,圆唇,束颈,鼓腹。沿下绳纹抹去,腹部饰绳纹。口径 16 厘米(图一一,16)。

E 型 1 件。标本 LC5:8,夹砂灰陶。侈口,卷沿,圆唇,高领,

鼓腹。腹部饰粗绳纹。口径 18 厘米(图一一,2)。

另外,还采集到一批鬲足。标本 LC5:27,夹砂灰陶。高实足尖(图一一,15)。标本 LC5:22,夹砂灰陶。实足尖较高(图一一,8)。标本 LC6:13,夹砂红陶。实足尖较矮内收(图一一,9)。标本 LC5:21,夹砂褐陶。通体饰绳纹(图一一,10)。



图一一 商代陶鬲

12. Ab 型(LC14:10, LC5:36, LC5:42) 2. E 型(LC5:8) 3、11. Ac 型(LC5:35, LC5:49) 4、18. C 型(LC6:9, LC5:47) 5、13、17. Aa 型(LC5:38, LC5:40, LC6:2) 7、14. B 型(LC3:20, LC5:48) 8、9、10、15. 鬲足(LC5:22, LC6:13, LC5:21, LC5:27) 16. D 型(LC41:10) (14 为 1/8, 余为 1/6)

盆 5 件。分三型:

A 型 2 件。侈口,折沿,方唇,鼓腹。标本 LC5:16,夹砂褐陶。沿下绳纹经抹,腹饰交错绳纹。口径 22 厘米(图一二,2)。标

本 LC5:15,夹砂灰陶。腹部饰绳纹(图一二,16)。

B型 2件。标本 LC5:17,夹砂褐陶。敞口,卷沿,圆唇,直腹。腹部饰绳纹。口径 24 厘米(图一二,1)。标本 LC5:19,夹砂灰陶。侈口,卷沿,方唇,腹微鼓。腹部饰绳纹(图一二,23)。

C型 1件。标本 LC3:64,夹砂灰陶。大敞口,平折沿,方唇,腹壁斜直,平底。口径 16.2、底径 12、高 9 厘米(图一二,22)。

尊口沿 2件。均为泥质黑陶。标本 LC14:2,敞口,卷沿,方唇,腹壁斜直。腹部饰绳纹。口径 33 厘米(图一二,6)。

豆盘 5件。均泥质灰陶。素面。分二型:

A型 3件。标本 LC5:53,敞口,沿面外斜,浅盘。盘内壁有二周凹弦纹。口径 17.1 厘米(图一二,14)。标本 LC14:4,敞口,平沿,圈底。口径 12 厘米(图一二,24)。

B型 1件。标本 LC5:32,口微敛,平沿,深盘。沿下饰四道凹弦纹。口径 14.7 厘米(图一二,13)。

C型 标本 LC3:21,口微敛,平沿,盘较深,圈底,圈足。器壁较厚。口径 13 厘米(图一二,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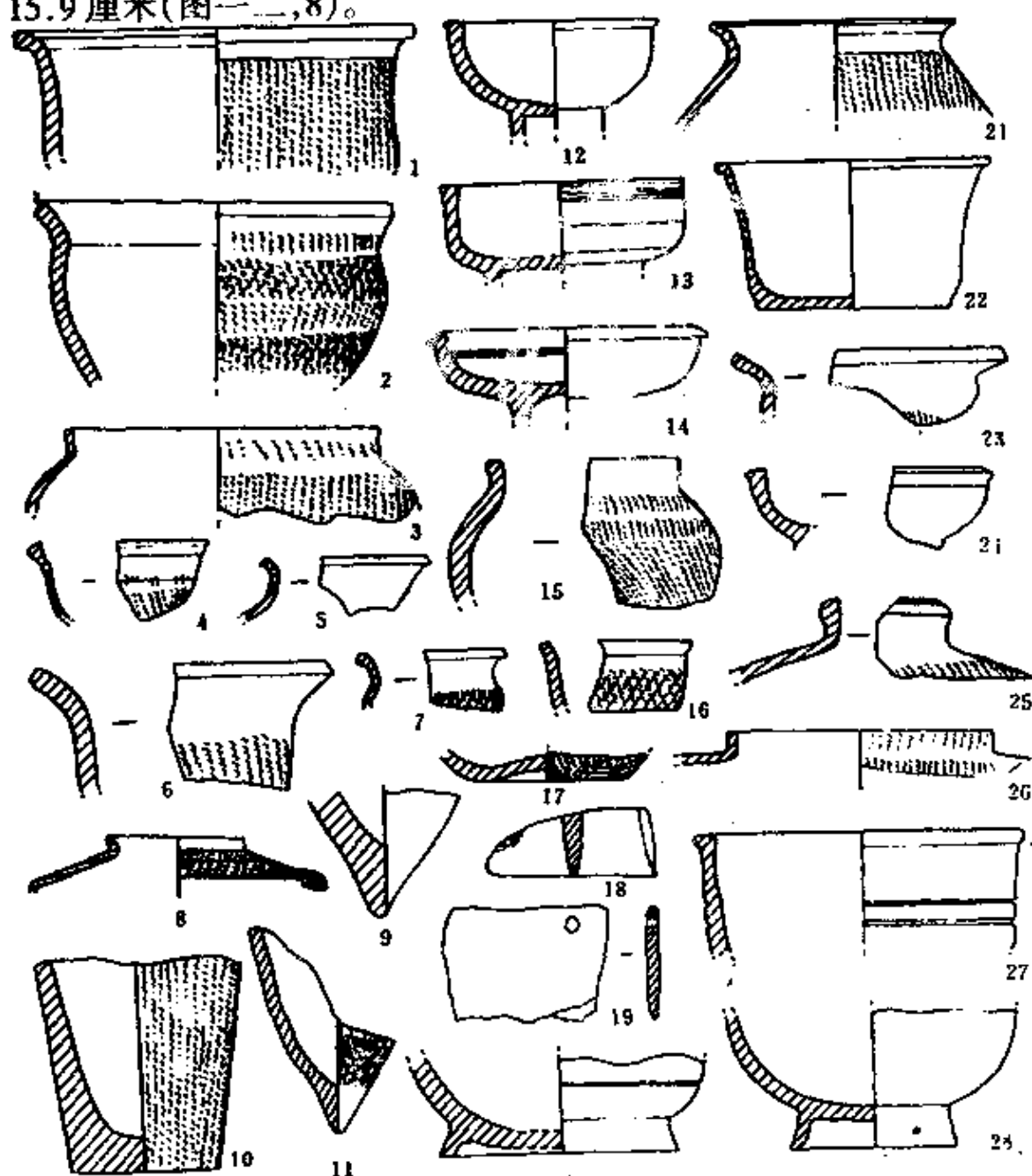
簋口沿 2件。均泥质灰陶。标本 LC5:34,直口,圆唇,深腹,腹饰二道凹弦纹。口径 26.8 厘米(图一二,27)。标本 LC6:19,敞口,方唇,弧腹。饰三角划纹。口径 26.8 厘米(图一二,4)。

另外,还采集部分簋下部残片。标本 LC5:33,泥质灰陶。下腹内收,圈足外侈,圈足上有镂孔一个。底径 9.6 厘米(图一二,28)。标本 LC5:30,泥质灰陶。下腹内收,饰一周凹弦纹,圈足外侈,较矮。圆足径 14.7 厘米(图一二,20)。

瓮口沿 3件。均泥质灰陶。分二型:

A型 2件。标本 LC5:7,直口微侈,方唇,广肩。口部绳纹抹去,腹部饰绳纹。口径 21.6 厘米(图一二,26)。标本 LC14:3,直口,方唇,广肩。饰绳纹。口径 12 厘米(图一二,25)。

B型 1件。标本 LC5:18,侈口,圆唇。肩饰交错绳纹。口径15.9厘米(图一二,8)。



图一二 商代文化遗物(未注明质料者为陶器)

1,23.B型盆(LC5:17,LC5:19) 2,16.A型盆(LC5:16,LC5:15) 3,15.A型罐(LC5:4,LC14:1)
4,27.簋口沿(LC6:19,LC5:34) 5,21.B型罐(LC5:5,LC3:17) 6.尊口沿(LC14:2) 7.C型罐(LC6:
21) 8.B型瓮(LC5:18) 9,11.甗足(LC5:50,LC5:51) 10,17.罐底(LC5:3,LC6:23) 12.C型豆
(LC3:21) 13.B型豆(LC5:32) 14,24.A型豆(LC5:53,LC14:4) 18.石镰(LC14:13) 19.蚌镰
(LC3:99) 20,28.簋足(LC5:30,LC5:33) 22.C型盆(LC3:64) 25,26.A型瓮(LC14:3,LC5:7)
(18,19为1/4,3,26,27为1/8,4,8,11为1/12,余为1/6)

足 2 件。均夹粗砂,器壁较厚。标本 LC5:50,褐陶。袋足尖内收。素面(图一二,9)。标本 LC5:51,灰陶。袋足。饰绳纹(图一二,11)。

罐 8 件。均口部残片。分三型:

A 型 2 件。直口微侈,方唇,圆肩圆腹。饰绳纹。标本 LC5:4,夹砂灰陶。颈部绳纹抹去。口径 25.6 厘米(图一二,3)。标本 LC14:1,泥质灰陶。肩部一道弦纹。口径 11.7 厘米(图一二,15)。

B 型 5 件。直口,折沿,方唇,短颈,斜肩。标本 LC3:17,夹砂灰陶。沿面一周凹槽,腹饰绳纹。口径 16 厘米(图一二,21)。标本 LC5:5,泥质灰陶。素面。口径 13.2 厘米(图一二,5)。

C 型 1 件。标本 LC6:21,侈口,卷沿,圆唇,折肩。泥质灰陶。肩以下饰交错绳纹。口径 24 厘米(图一二,7)。

另外还采集罐底 2 件。标本 LC5:3,夹砂褐陶。腹壁斜直,平底,厚胎,饰绳纹。底径 9 厘米(图一二,10)。标本 LC6:23,泥质灰陶。凹圜底。饰交错绳纹。底径 9 厘米(图一二,17)。

2. 石器

镰 1 件。残。标本 LC14:13,尖头,弧背,直刃,磨制精细。残长 6.5、宽 2.7、厚 0.7 厘米(图一二,18)。

3. 蚌器

镰 1 件。标本 LC3:99,刃部残,尾部残缺。残长 60 厘米(图一二,19)

五、周代文化遗存

这次调查发现含有周代文化遗存的遗址 30 余处。采集遗物较丰富的有茌平县的蝉周寺遗址、张李遗址、教场铺遗址等。

蝉周寺遗址(编号 LC26)

遗址位于茌平县王老乡杨官屯村西北 0.5 公里处,地势平坦。

面积约 5000 平方米,文化层厚 1—3 米。地表散布着大量陶片,采集标本主要有鬲、罐、盆、瓮、豆等陶器。为一典型的商周遗址,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教场铺遗址(编号 LC16)

遗址位于茌平县乐平铺教场铺村西北约 100 米处。遗址东西长约 270、南北宽约 240 米,面积 6.5 万平方米。遗址中部偏东有一缓起的高台地,最高处高出地表 5 米。当地俗称为“金牛山”。高台东侧断崖上暴露有许多石棺单人葬汉墓。从断崖上观察,文化堆积厚 2—6 米。采集标本陶器有鬲、罍、鼎、杯、豆、罐、盘等,石器有石斧、石镞等。这处遗址含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周等不同时期的遗存,而以周代文化遗存较为丰富。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次采集周代文化遗物十分丰富,主要为陶器。可辨器形有盆、钵、鬲、罐、瓮、豆、盘、拍子、纺轮等。

鬲 1 件。标本 LC1:12,夹砂灰陶。直口微敛,宽折沿,圆唇,鼓腹。颈以下饰绳纹。口径约 22.5 厘米(图一三,7)。

盆 3 件。分二型:

A 型 2 件。敛口,折沿,方唇。腹部饰绳纹。标本 LC11:3,泥质灰陶。沿面微鼓(图一三,20)。标本 LC1:15,夹砂灰陶。沿面有两周凹槽。(图一三,19)。

B 型 1 件。标本 LC6:26,夹砂褐陶。敛口,卷沿,方唇,腹微鼓(图一三,10)。

钵 2 件。均夹砂灰陶。分二型:

A 型 1 件。标本 LC3:15,直口,圆唇,折腹,矮假圈足。腹饰暗弦纹。口径 19.8、底径 8.4、高 9 厘米(图一三,22)。

B 型 1 件。标本 LC6:29,敞口,圆唇,腹壁斜直,小平底。有彩绘痕迹。口径 6.8、底径 5、高 6.3 厘米(图一三,6)。

罐 3件。分二型：

A型 2件。标本 LC1:21,夹砂灰陶。侈口,卷沿,方唇,唇面微凹,高领,鼓腹。腹部饰绳纹。口径 15.4 厘米(图一三,18)。标本 LC11:2,泥质灰陶。侈口,卷沿,方唇,领微高,鼓腹。腹部饰抹断的绳纹(图一三,17)。

B型 1件。标本 LC1:26,夹砂灰陶。侈口,卷沿,方唇,鼓腹。肩部附对称的两个环耳。器表饰绳纹(图一三,16)。

瓮 2件。标本 LC6:27,夹细砂灰陶。直口,圆唇,广肩(图一三,9)。标本 LC9:3,泥质灰陶。直口,圆唇(图一三,8)。

豆 5件。皆泥质灰陶,分三型：

A型 2件。标本 LC9:5,直口微敛,方唇深盘,圜底。口径 15.4 厘米(图一三,2)。标本 LC9:6,敞口,圆唇,深盘,圜底,喇叭状圈足。口径 15、圈足径 9、高 1 厘米(图一三,1)。

B型 1件。标本 LC5:10,盘形,敞口,方唇,圆底,盘外壁与底转折明显。口径 15 厘米(图一三,3)。

C型 2件。标本 LC9:7,敞口,折沿,方唇,平底。口径 12.9 厘米(图一三,5)。标本 LC43:5,敞口,圆唇,盘外壁内束。口径 15.6 厘米(图一三,4)。

另外,还采集部分豆柄。标本 LC1:29,泥质灰陶。柄较细。喇叭状圈足。残高 10.8 厘米(图一三,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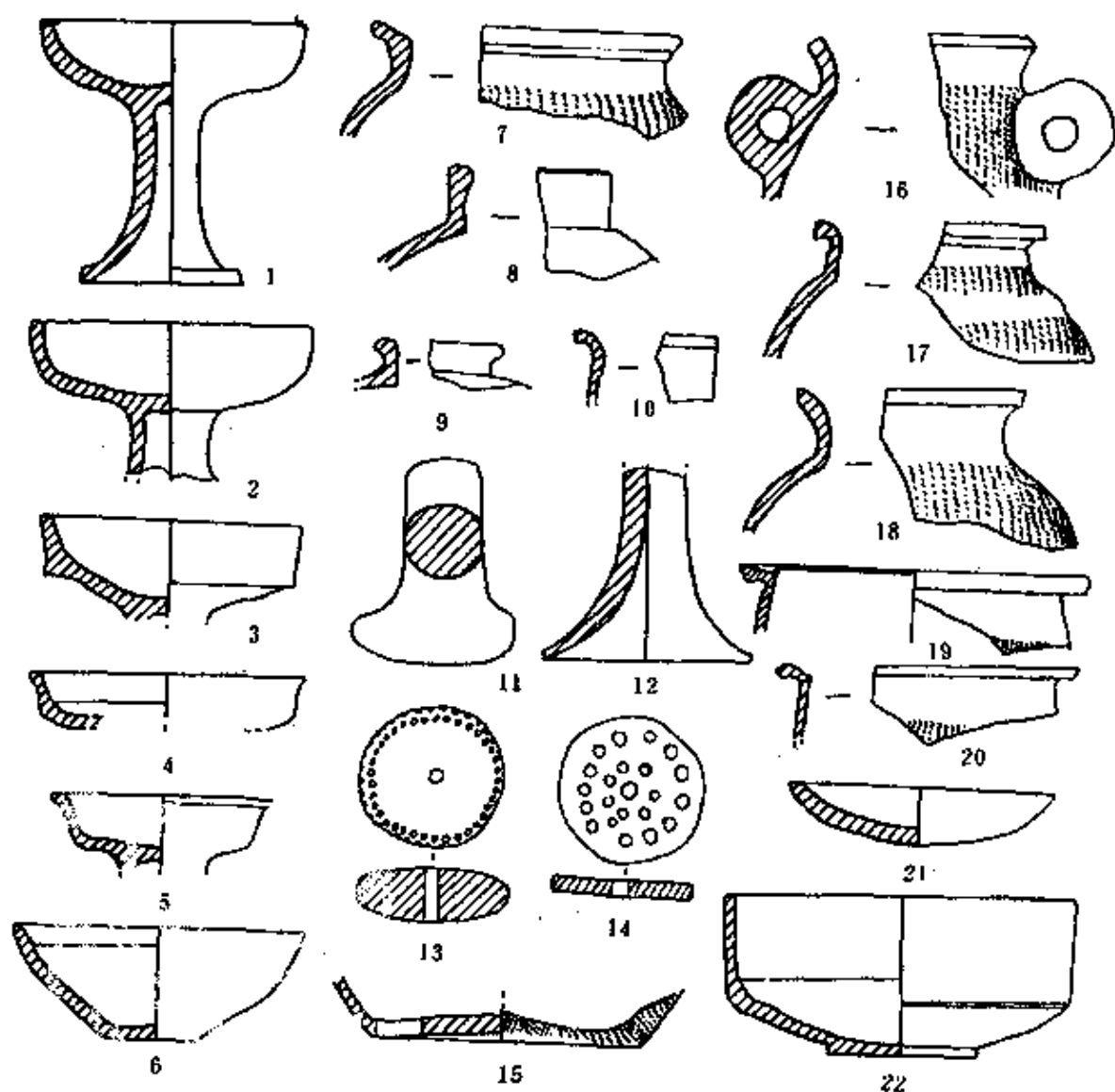
盘 1件。标本 LC9:4,泥质灰陶。敞口,圆唇,浅盘,圜底。口径 15,高 3.3 厘米(图一三,21)。

甑底 1件。标本 LC1:25,夹砂灰陶。底有五个漏孔。腹及底饰细绳纹。底径 15.6 厘米(图一三,15)。

拍子 1件。标本 LC1:23,夹砂灰陶。拍面圆形,鼓甚,圆柱状柄。拍面径 4.5、通高 8.7 厘米(图一三,9)。

纺轮 2件。均泥质黑陶。标本 LC9:8,中间厚,边沿薄。表

面有压印圆圈纹。径5.4、厚2厘米(图一三,13)。标本LC9:9,一面压印有圆圈纹。径5.5、厚0.7厘米(图一三,14)。



图一三 周代文化陶器

1, 2. A型豆(LC9:6, LC9:5) 3. B型豆(LC5:10) 4, 5. C型豆(LC43:5, LC9:7) 6. B型钵(LC6:29) 7. 鬲(LC1:12) 8, 9. 瓮(LC9:8, LC6:27) 10. B型盆(LC6:26) 11. 拍子(LC1:23) 12. 豆柄(LC1:29) 13, 14. 纺轮(LC9:8, LC9:9) 15. 甑底(LC1:25) 16. B型罐(LC1:26) 17, 18. A型罐(LC11:2, LC1:21) 19, 20. A型盆(LC1:15, LC11:3) 21. 盘(LC9:4) 22. A型钵(LC3:15) (9, 10, 19, 20为1/12, 11, 13, 14为1/4, 余为1/6)

结 语

通过对这一文化小区古文化遗址的调查整理,使我们对这一地区古文化遗址的分布、文化类型及文化面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从遗址分布来看,以茌平县的南部、东南部最为密集,徒骇河以西仅见大碾李(编号 LC18,大汶口、龙山等)、五菜瓜(编号 LC30,春秋)两处。聊城市除在距县城 10 公里的西北方向发现一处聊古庙遗址(编号 LL44)外,其它遗址都在县城的东南部和东部。这些遗址大都分布在古济水流域的高坡地带,呈东北、西南条带状分布,有一定规律可寻。这次调查发现龙山文化及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较为丰富,而介于其间的岳石文化遗存发现较少。各遗址延续时间一般较长,大都包含有二至三个以上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分析各不同时期的文化内涵,这次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物都与尚庄遗址的发掘资料一致。龙山文化遗存则明显不同于鲁东及沿海地区的两城类型,而与鲁中地区的城子崖类型较为近似,同时,又与河南地区的龙山文化有着共同的文化因素,这为进一步探讨本地区龙山文化与周边地区同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一批实物资料。岳石文化遗址发现数量较少,则可能说明,岳石文化由东向西扩展,到达本地区已经是边缘地带了。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除与中原地区的同期文化具有一致性外也有着明显的地方特点,这对研究商文化对本地区的影响和在本地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与这一地区土著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通过这次文物普查,使我们对这一地区的古文化面貌有了一个概括的了解。我们相信,随着今后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这一地区各时期的文化面貌会更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聊城、茌平古文化遗址登记表

编号	名称	位 置	面积 (平方米)	文 化 遗 物	文化性质与时代	保存现状
LL41	权 寺	聊城市李海雾乡权寺村西	18700	鼎、盆、罐、尊、瓮、器、盖	龙山、岳石	破坏严重
LL42	白 庄	聊城市李海雾乡白庄村北	不详	鼎、罐、盆、瓮、豆	龙山	破坏严重
LL43	垌均店	聊城市蒋官屯乡垌均店西	44000	鼎、罐、尊、瓮、盆、甗、豆	龙山、战国	保存一般
LL44	聊古庙	聊城市闫寺乡东	4500	鼎、鬲、罐、瓮、器盖	龙山、春秋、战国	
LL45	五 台	聊城市许营乡许田庄	2880	罐、盆	龙山——唐	破坏严重
LC1	韩 王	茌平县茌平镇尚庄村东	75000	鼎、鬲、甗、鬲、罐、盆、杯、豆、刀、石斧、釜	大汶口、龙山、商周、汉	保存一般
LC2	尚 庄	茌平县茌平镇韩王村西 200 米	60000	鬲、罐、背壶、鬲、釜、釜、釜、釜、釜、釜	大汶口、龙山、商周、汉	保存较好
LC3	台子高	茌平县孙桥乡台子高村东南 50 米	50000	鼎、鬲、鬲、罐、盆、杯、釜、陶祖、石斧、釜	大汶口、龙山、岳石、商周、汉	保存较好
LC4	李孝堂	茌平县茌平镇李孝堂村东南 100 米	8000	石斧、铸、陶、鼎、盆、罐、鬲、甗、器盖	龙山、商周、汉、唐宋	保存一般
LC5	东一甲	茌平县赵屯乡东一甲村东南 500 米	20000	鬲、鬲、鬲、鼎、盆、豆、蚌铲、刀、石斧	龙山、岳石、商周、汉	保存较好
LC6	腰 庄	茌平县郝集乡腰庄村东 500 米	20000	鬲、鬲、盆、罐、豆	龙山、商周、汉	保存一般
LC7	南陈庄	茌平县孙桥乡陈庄村西 20 米	80000	鬲、鼎、盆、鬲、剑、豆、杯、罐	大汶口、龙山、岳石、商周、汉	保存较好
LC8	望鲁店	茌平县王老乡望鲁店村北 200 米	3500	背壶、鬲、鬲、甗、鼎、豆、蚌刀	大汶口、龙山	保存完好
LC9	大 尉	茌平县乐平镇大尉东南 1000 米	60000	鼎、鬲、罐、鬲、铜剑、豆、杯	大汶口、龙山、商周、汉	破坏严重

编号	名称	位 置	面积 (平方米)	文 化 遗 物	文化性质与时代	保存现状
LC10	十里铺	在平县赵屯乡 十里铺村北 10 米	30000	鬲、甗、鼎、盘、 杯、石斧、刀、镰、 剑	大汶口、龙山、商 周、汉	破坏严重
LC11	梁 庄	在平县广平乡 梁庄村北 500 米	3000	鬲、甗、甗、鼎、豆、 盘、盆、石斧、纺轮	大汶口、龙山、岳 石、商周、汉	保存完好
LC12	玉皇甫	在平县北郎口 乡大刘村西 500 米	4200	尊、缸、盆、鬲	龙山、商周、汉	
LC13	乐平铺	在平县乐平铺 镇东街外南 50 米	25000	甗、甗、罐、鼎、鬲、 豆、盆、盘	大汶口、龙山、岳 石、商周	保存较好
LC14	西路庄	在平县乐平镇 西路庄西南 500 米	10000	鬲、盘、豆、甗、石 斧、镰、纺轮	龙山、商周、汉	保存完好
LC15	大刘庄	在平县杜郎口 乡大刘庄村西 北 1000 米	20000	鬲、盆、甗、盘、杯、 甗、豆	大汶口、龙山、岳 石、商周、汉	保存较好
LC16	教场铺	在平县乐平铺 教场铺村北 100 米	30000	鬲、甗、鼎、罐、杯、 豆、盆、石斧	大汶口、龙山、岳 石、商周、汉	保存较好
LC17	高垣墙	在平县韩集乡 高垣墙东南 1000 米	20000	鬲、罐、瓷、杯	大汶口、龙山、商 周	保存完好
LC18	大碾李	在平县韩屯乡 大碾李村北 100 米	20000	鬲、甗、豆、盘、杯、 纺轮	大汶口、龙山、岳 石、商周、汉	保存较好
LC19	辛戴张	在平县杜郎口 乡辛戴张村西 500 米	5000	鬲、罐、豆、瓦	龙山、商周、汉	
LC20	孟尝君	在平县韩集乡 迟桥村西 500 米	20000	鬲、罐、豆、盆	龙山、商周	破坏严重
LC21	崔 庄	在平镇崔庄村 西南 10 米	不详	鬲、罐、瓮、石刀、 豆	龙山、商周、汉	保存较好
LC22	马家坊	在平镇马家坊 村南 500 米	不详	骨簪、鬲、盆、罐、 豆、商周、汉	保存较好	
LC23	前王屯	在平县郝集乡 前王屯村北 400 米	15000	罐、盆、砖、盘	商、春秋、战国、 汉	保存较好

原载《考古与文物》1998 年第 1 期

山东阳谷、东阿县古文化遗址调查

孙淮生 吴明新

阳谷、东阿两县地处山东省西部黄河冲积平原的黄河北岸,北与聊城、茌平接壤,东北部与齐河毗连,西部与莘县搭界,南部的西段与河南省为邻,东段隔黄河与长清、平阴、东平诸县相望。两县面积合计 1835 平方公里,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境内河流有新金线河、羊角河、赵王河、小运河、徒骇河、金堤河等。两县下辖 35 个乡镇。1988 年,在全省的文物普查中于两县范围内发现了汉代以前的古文化遗址计 16 处(图一,附表),采集到一批遗物标本。现将这次调查情况简报如下。

壹 大汶口文化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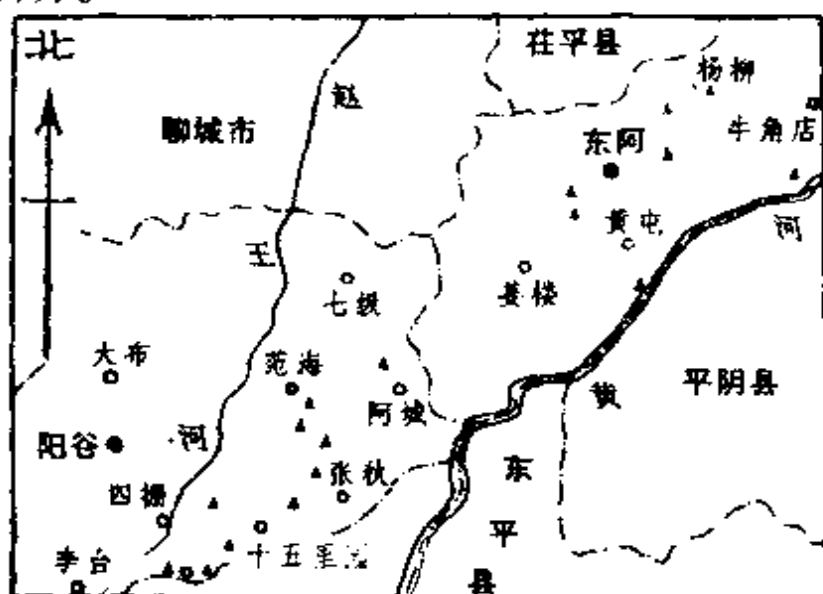
这次调查共发现含有大汶口文化遗存的遗址 5 处,其中较典型的有红堎堆、皇姑冢、香山遗址。

一、概况

(一)红堎堆遗址

位于阳谷县张秋镇许楼村西 1 公里处,为一隆起的高地,面积约 5 万平方米,一条小河从遗址中间南北向穿过。从断崖观察,文化层厚 1.50~2.30 米,河床和地面上暴露有许多鼎、罐、钵、鬲、器盖等器物残片。采集标本分属于大汶口、龙山、岳石、商周几个不同时期。其中大汶口文化遗物有鼎、钵、尊、纺轮等陶器,另外还采

集到 1 件石斧。



图一 阳谷、东阿古文化遗址分布图(1:360000)

(二) 皇姑冢遗址

位于阳谷县十五里园乡皇姑冢村东 150 米,为一圆台形高地,遗址高出周围地面约 6.5 米,面积 1120 平方米,文化层厚约 1.50~7 米。保存完好,遗址表面散见鼎、盆、鬲、钵、豆、瓶等陶器残片。采集标本有大汶口、商、周时期的遗物,其中以大汶口文化遗物较为丰富。

(三) 香山遗址

位于东阿县黄屯乡香山村南 300 米,遗址的南部被黄河大堤所压,为一高出周围 1~1.50 米的台地,面积 8800 平方米。从断崖看,文化层厚约 1.40~2.30 米。遗址南部在修黄河大堤时被破坏。遗址表面散见钵、鼎、罐、盆等器形残片。采集标本分属于大汶口、龙山、商周不同时期,其中以大汶口文化遗物较为丰富。

二、遗物

(一) 陶器

这些大汶口文化陶器,主要采自上述遗址。陶系以夹砂者居

多,泥质陶次之,部分陶器中还夹有云母碎片,陶色以红陶为主,次为褐陶和灰褐陶;常见纹饰有褐色带状纹、竖凹槽和捺窝等;陶器多为轮制,手制少见,可辨器形有鼎、钵、尊、环、纺轮诸类。

鼎 1件(LY61:5)。泥质红褐陶,钵形,敛口,圆唇,浅腹,圜底,口沿外侧饰一周褐色带状纹(图二,1)。

另外,还采集到鼎足 9 件。标本 LY61:13,夹云母片红褐陶,正面略呈长方形,上部有一竖向凹槽,足尖残(图二,7)。标本 LY61:17,夹砂红褐陶,铲状足。足高 4.2 厘米。标本 LD54:1,夹砂红褐陶,锥状足截面呈圆形。残高 6.7 厘米(图二,10)。

钵 5 件。均泥质陶。分二型:

A 型:2 件。红陶,标本 LY61:1,直口,圆唇,口沿外侧饰一周褐色带状纹。口径 14.4 厘米(图二,2)。标本 LD52:2,直口,圆唇,腹较深。口径 21.2 厘米(图二,6)。

B 型:3 件。标本 LY61:2,红褐陶,敛口,圆唇,腹较浅,内外器壁均施红陶衣。口径 29.1 厘米(图二,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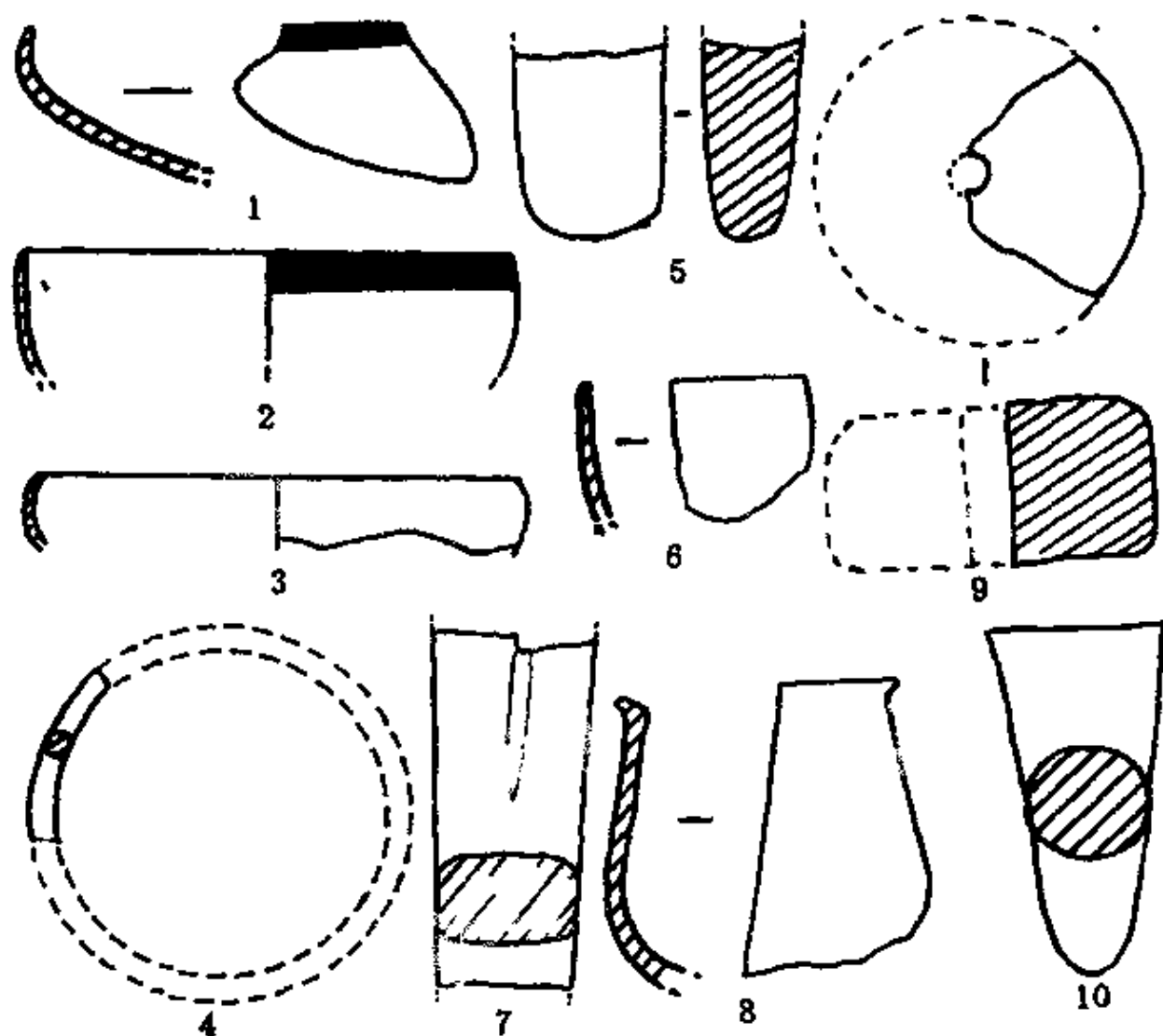
尊 1 件(LY61:6)。泥质灰褐陶,敛口,斜折沿,方唇,深腹,腹壁斜直。口径 9.6 厘米(图二,8)。

环 1 件(LY61:9)。残,泥质褐陶,断面为圆形。内径 9.6、外径 11.1 厘米(图二,4)。

纺轮 1 件(LY61:11)。夹砂红褐陶,制作粗糙,圆形,较厚。直径 6.5 厘米(图二,9)。

(二)石器

石斧 1 件(LY61:20)。青灰岩质,顶残,琢制,斧体较厚,弧刃。残长 7.4、刃部宽 5、厚 3.8 厘米(图二,5)。



图二 大汶口文化遗物

1. 陶鼎(LY61:5) 2、6. A型陶钵(LY61:1、LD52:2) 3. B型陶钵(LY61:2) 4. 陶环(LY61:9)
5. 石斧(LY61:20) 7、10. 陶鼎足(LY61:13、LD54:1) 8. 陶尊(LY61:6) 9. 陶纺轮(LY61:11)(1、2、8
为1/3, 36为1/4, 余为1/2)

貳 龙山文化遗存

一、概况

这次调查发现含有龙山文化遗存的遗址计 15 处,现择其重要者予以介绍。

(一)黑塌堆遗址

位于阳谷县张秋镇刘楼村东 120 米,呈塌堆状,由于遗址堆积为黑灰土,当地人俗称之为黑塌堆。遗址面积约 3 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 1.70~2.60 米,其中心部分在平整土地过程中曾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该遗址包含有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及商、周时期的遗存。采集的龙山文化遗物有罐、盆、鼎足、纺轮诸类。

(二)黑土坑遗址

位于阳谷县范海乡常楼村南 200 米,遗址原为隆起高地,为黑灰土堆积,因常年取土,遗址的东部形成 43×37 米大坑,故称为黑土坑。遗址面积约 5000 平方米。断崖暴露古代文化层厚 1.50~2.60 米,可分三层,自上而下分属商周文化层、岳石文化层和龙山文化层。采集的龙山文化遗物有罐、盆等陶器残片。

(三)王集遗址

位于东阿县陈集乡王集村南 300 米处,为一隆起的高地,遗址高出周围地面 0.50~1.80 米。面积约 7.5 万平方米。遗址东部由于挖沙形成一 38×52 米的大坑,从断崖观察,遗址堆积可分三层:上层为灰褐土,厚 0.35~1 米,出土商周时期的鬲、罐、豆等陶器片;中层为浅灰色土,厚 0.1~0.3 米,为岳石文化层,出土有豆、罐等陶器残片;下层为黑灰色土,厚 1~2 米,出土有龙山文化的罐、鼎、盆等陶器残片。

(四)青冢子遗址

位于东阿县杨柳乡杨柳村西约 600 米,为一高出周围 1.20~6 米的垆堆状遗址,面积约 3000 平方米,文化层厚约 2~7 米。遗址保护较好。地表散见许多罐、鼎、盆、豆、簋、鬲等陶片,分属于龙山文化和商、周不同时期,其中以龙山文化遗存最为丰富。

二、遗物

现将在上述遗址采集的龙山文化遗物介绍如下:

(一)陶器

龙山文化陶系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其中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陶色以灰陶居多,磨光黑陶次之,有少量的红褐陶;常见纹饰主要有篮纹、方格纹,间或有刻划纹;可辨器形有鼎、罐、盆、瓮、钵诸类。

鼎足 6 件。标本 LY62:32,夹砂褐陶,鸟喙形(图三,4)。标本 LD51:5,夹砂褐陶,鸟首形(图三,7)。标本 LD52:4,夹砂灰褐陶,“V”字形(图三,8)。标本 LD51:7,夹砂褐陶,侧三角形(图三,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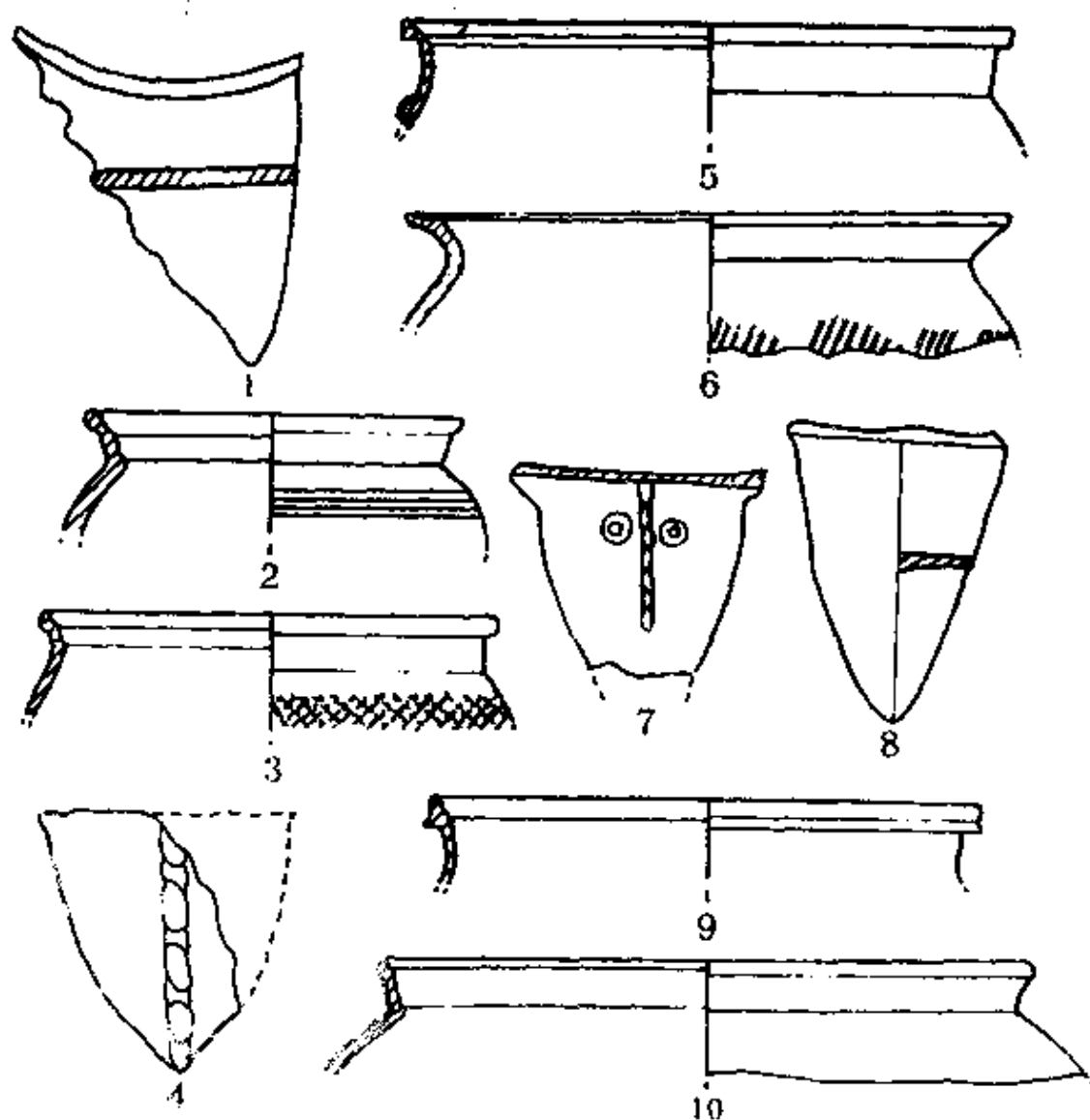
罐 8 件。均为口沿残片。分三型:

A 型:5 件。皆夹砂灰褐陶。标本 LY63:25,侈口,折沿,方唇,沿面外缘有一周凹槽,溜肩。口径 25.2 厘米(图三,10)。标本 LY64:26,侈口,卷沿,方唇,沿面外缘微凹,腹部饰篮纹。口径 24 厘米(图三,6)。标本 LD51:11,侈口,卷沿,方唇,沿面有凹槽,腹部饰方格纹。口径 18 厘米(图三,3)。标本 LD52:5,侈口,折沿,圆唇,沿面两周凹槽,圆肩,肩饰三周凹弦纹。口径 28 厘米(图三,2)。

B 型:1 件(LD51:12)。泥质磨光灰陶,侈口,卷沿,沿面微凹,方唇,唇面凹,高领,肩部饰盲鼻。口径 40 厘米(图三,5)。

C 型:2 件。标本 LD51:13,夹细砂灰陶,侈口,卷沿,方唇,沿

面有凹槽,领较高。口径 36 厘米(图三,9)。



图三 龙山文化遗物

1、4、7、8. 陶器底(LD51:7、LY62:32、LD51:5、LD52:4) 2、3、6、10. A 型陶罐(LD52:5、LD51:11、LD64:26、LY63:25) 3. B 型陶罐(LD51:12) 9. C 型陶罐(LD51:13)(1、8 为 1/8, 2 为 1/16, 5、9 为 1/20, 余为 1/2)

罐 1 件(LY63:27)。仅余器底,为夹砂灰陶,下腹内收,小平底。底径 6.9 厘米(图四,6)。

盆口沿 1 件(LD51:3)。残,泥质磨光黑陶,直口微侈,方唇。口径约 35 厘米(图四,4)。

盆底 1件(LD51:2)。夹细砂红褐陶,圈足较高,下部外撇,其上有三周凸棱。圈足径 27 厘米(图四,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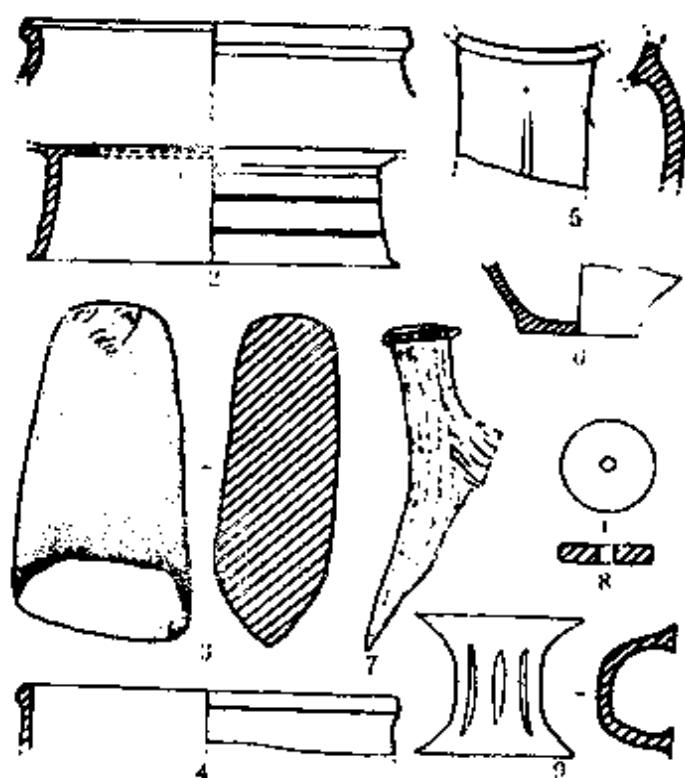
瓮 1件(LY64:28)。残,仅余口沿,夹砂灰陶,侈口,卷沿,方唇,沿面有一周凹槽,束颈。口径 21 厘米(图四,1)。

纺轮 1件(LY63:33)。泥质褐陶,圆形,侧面有指甲印纹。直径 5.4、厚 1 厘米(图四,8)。

器耳 1件(LD51:9)。泥质磨光灰陶,桥形,表面有三道凹槽(图四,9)。

鬲 1件(LD51:1)。夹细砂红陶,宽带状,表面有一竖凹槽(图四,5)。

(二)石器



图四 龙山文化遗物

1.陶瓮(LY64:28) 2.陶盆底(LD51:2) 3.石斧(LD51:34) 4.陶盆口沿(LD51:3) 5.鬲
釜(LD51:1) 6.陶罐(LY63:27) 7.鹿角锄(LY64:34) 8.陶纺轮(LY63:33) 9.陶器耳(LD51:9)
(1、4、6、8为1/6,余为1/4)

石斧 1件(LD51:34)。青石质,磨制,正面呈倒置梯形,弧顶,平刃,正锋。长12.3、顶宽7.5、刃宽3、厚4.2厘米(图四,3)。

(三)角器

鹿角锄 1件(LY64:34)。斜面刃,刃锋利,锄把残。长24厘米(图四,7)。

三、岳石文化遗存

这次调查发现含岳石文化遗存的遗址5处,现将采集的岳石文化遗物介绍如下:

采集标本均为陶器残片,全部为泥质陶,可辨器形有罐、豆、盆、孟等。

罐 1件(LD53:1)。泥质灰陶,侈口,圆唇。口径约24厘米(图五,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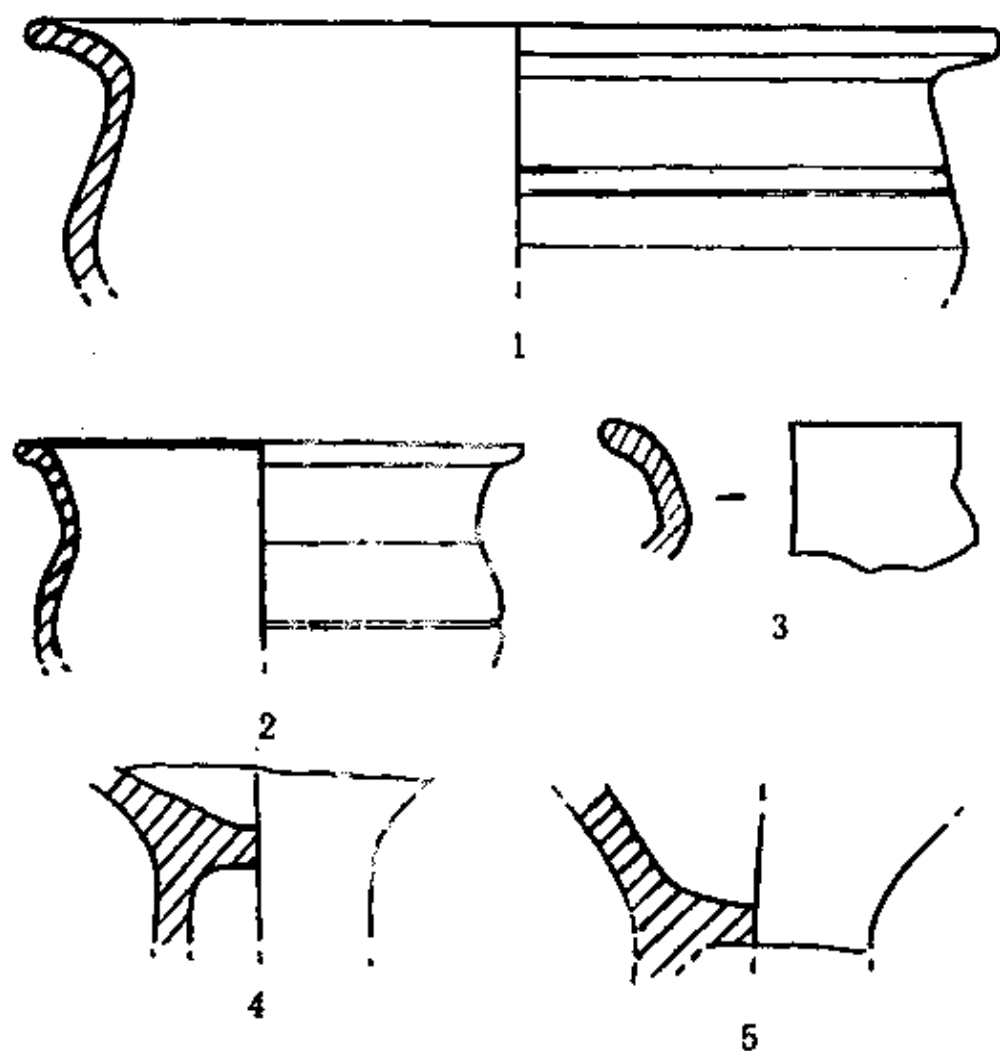
盆 1件(LY64:39)。泥质黑皮陶,为口沿残片,宽折沿,圆唇,沿面有一周凹弦纹,折腹,上腹饰二周凹弦纹。口径25.8厘米(图五,1)。

豆盘 2件。泥质磨光浅灰陶,盘底有一周凸棱。标本LY63:35,盘较浅,盘内壁有一周凸棱(图五,4)。标本LY61:36,盘较深(图五,5)。

孟 1件(LY63:58)。残,泥质磨光灰陶,侈口,圆唇,鼓腹,腹部有一周凹槽。口径13.5厘米(图五,2)。

四、商周时期文化遗存

商周遗址发现较多,计12处,其中以青冢子、王集、黑垆堆较为典型。采集到的商周时期文化遗物只有陶器,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夹砂褐陶、泥质灰陶次之,所见纹饰以绳纹为大宗,也有少量附加堆纹、划纹,可辨器形有鬲、簋、大口尊、瓮、罐、盆、豆诸类。



图五 岳石文化遗物

1.陶盆(LY64:39) 2.陶盂(LY63:58) 3.陶罐(LD53:1) 4、5 陶豆盘(LY63:35、LY61:36)(3为1/4,余为1/3)

鬲口沿 8件。分三型:

A型:1件(LY63:41)。侈口,折沿,方唇,唇下缘下垂,腹微鼓,器表饰细绳纹,颈部抹光(图六,2)。

B型:3件。皆夹砂灰陶,侈口,卷沿,方唇,腹微鼓。标本LY61:43,沿面有一周凹槽,器表饰粗绳纹。口径18厘米(图六,

6)。标本 LD51:27,沿面有一周凹槽,束颈,器表饰绳纹。口径 18.6 厘米(图六,4)。标本 LY63:46,沿面微凹,颈下饰一周附加堆纹,腹部饰绳纹。口径 15 厘米(图六,19)。

C 型:3 件。皆夹砂灰陶,侈口,折沿,方唇,鼓腹。标本 LY64:45,颈部抹光,腹饰细绳纹。口径 11.7 厘米(图六,16)。标本 LY61:44,束颈,腹饰粗绳纹。口径 21.6 厘米(图六,3)。

D 型:1 件(LD51:28)。夹砂红褐陶,侈口,斜折沿,方唇,沿面微凹,鼓腹,颈以下饰粗绳纹。口径 18.6 厘米(图六,5)。

另外,还采集一批鬲足。标本 LD51:21,袋状足,实足尖较高且内收(图六,20)。标本 LD51:26,袋状足,有小实足根,通体饰绳纹(图六,24)。标本 LY64:52,柱状足,截面呈圆形(图六,13)。

簋口沿 1 件(LD51:32)。夹细砂灰陶,直口,平沿,圆唇,腹部饰凹弦纹及三角划纹。口径 22.8 厘米(图六,11)。

簋圈足 3 件。均泥质灰陶,喇叭形圈足。标本 LD51:33,圈足上有两周凸棱。圈足径 14.8 厘米(图六,25)。

大口尊口沿 1 件(LY63:40)。泥质磨光灰陶,侈口,腹内收,器表饰绳纹。口径 30 厘米(图六,23)。

瓮口沿 2 件。皆泥质灰陶,侈口,卷沿,方唇。标本 LD53:3,沿以下饰绳纹。口径 18 厘米(图六,7)。标本 LD51:29,束颈广肩,颈部手抹,以下饰交叉绳纹。口径 16.8 厘米(图六,12)。

罐口沿 1 件(LD53:5)。泥质灰褐陶,卷沿,圆唇,束颈,斜肩,颈部绳纹抹去,腹部饰绳纹(图六,15)。

盆口沿 7 件。分三型:

A 型:2 件。泥质灰陶。标本 LD51:17,敞口,卷沿,圆唇,沿面有一周凹弦纹,腹部饰绳纹。口径 22.8 厘米(图六,18)。标本 LD53:2,敞口,卷沿,方唇(图六,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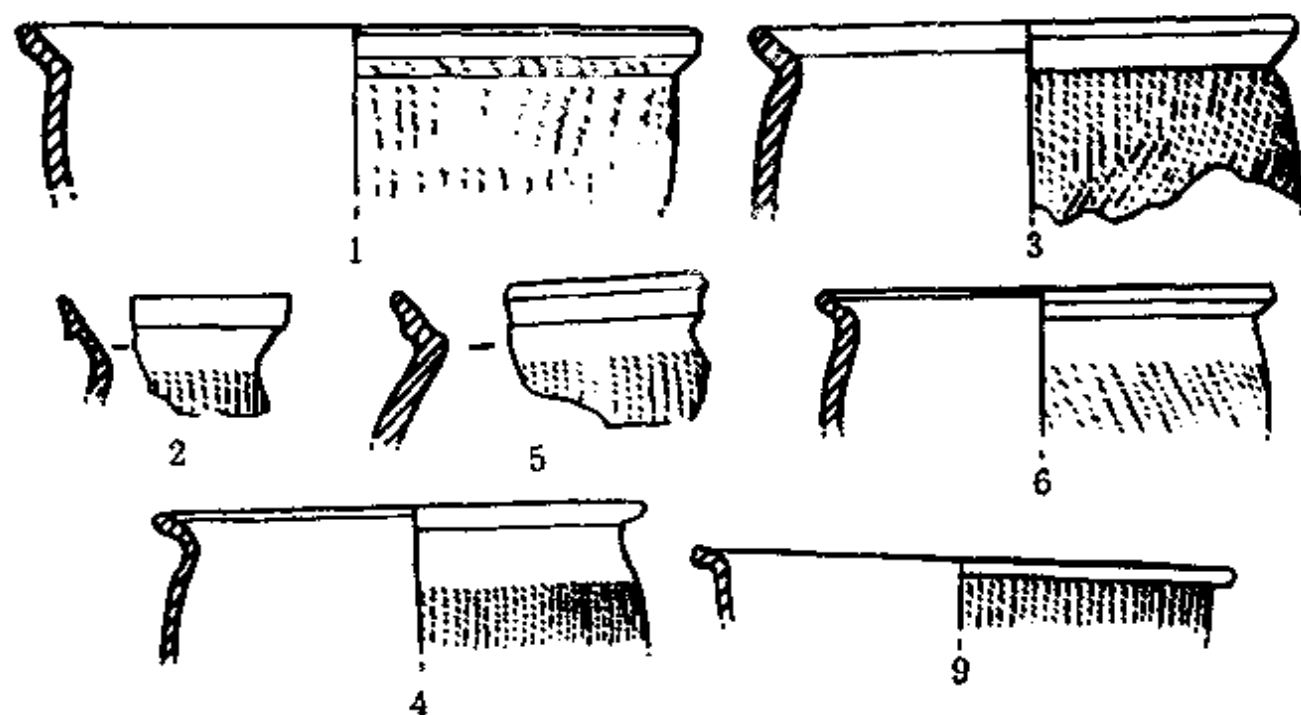
B 型:2 件。夹砂褐陶,标本 LD53:2,敞口,卷沿,方唇(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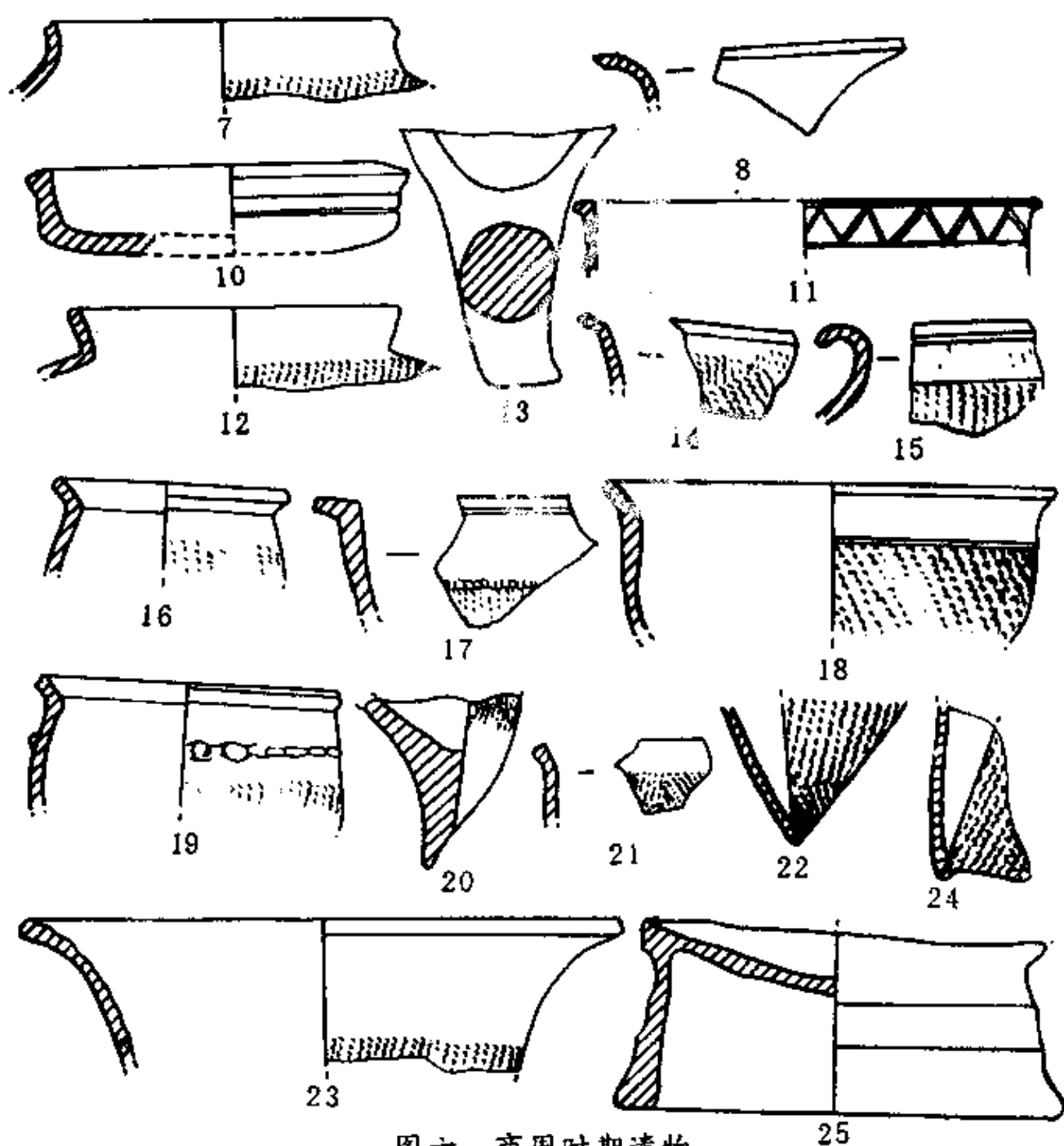
8)。

B型:2件。夹砂褐陶,标本 LD53:4,敞口,卷沿,圆唇,沿面有一周凹弦纹,腹部饰绳纹。口径 22.8 厘米(图六,18)。标本 LD53:4,敞口,折沿,方唇,沿面凹,腹饰粗绳纹(图六,14)。标本 L63:56,口微敛,折沿,方唇,腹微鼓,沿下饰细绳纹,经手抹。口径 26.4 厘米(图六,1)。

C型:3件。标本 LY63:54,夹砂灰陶,敞口,平沿,颈部内收,腹部饰绳纹(图六,21)。标本 LY64:55,泥质灰陶,敞口,折沿,方唇,上腹饰附加堆纹一周,以下饰细绳纹(图六,17)。标本 LD54:6,泥质褐陶,敞口,折沿,方唇,沿以下饰绳纹。口径 36 厘米(图六,9)。

豆盘 1件(LD54:2)。残,泥质褐陶,敞口,平沿,圆唇,盘较浅,假腹,腹饰一周凹弦纹。口径 14 厘米(图六,10)。





图六 商周时期遗物

1、14. B型陶盆(LY63:56、LD53:4) 2. A型陶盆(LY63:41) 3、16. C型陶盆(LY61:44、LY64:45)
4、6、19. B型陶盆(LD51:27、LY61:43、LY63:46) 5. D型陶盆(LD51:28) 7、12. 陶盆(LD53:3、
LD51:29) 8、18. A型陶盆(LD53:2、LD51:17) 9、17、21. C型陶盆(LD54:6、LY64:55、LY63:54) 10.
陶豆(LD54:2) 11. 陶盆(LD51:32) 13、20、22、24. 陶盆足(LY64:52、LD51:21、LY64:47、LD51:26)
15. 陶罐(LD53:5) 23. 陶大口尊(LY63:40) 25. 陶盆圈足(LD51:33)(8为1/12, 9为1/15, 14、21为1/
18, 10、13、25为1/6, 余为1/9)

五、结束语

阳谷、东阿两县是山东聊城地区古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区之一，这次调查发现的先秦时期的古文化遗址 16 处，包含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及周朝不同时期的遗存。从这次调查情况来看，这一地区古文化遗址的类型多属堆式遗址，一般高出周围地面 1.5~5 米，保护较好，多数遗址含有两个以上时期的文化堆积。遗址的分布也有一定的规律，由西南向东北呈条带状分布，这一分布规律可能与古济水有关。

这次调查发现了较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其中红陶堆、香山、皇姑冢等 5 处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现为这次调查的重要收获之一，采集的鼎、钵等陶器标本，其形态具有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特征。这次调查也发现了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存，从其文化内涵看，这一地区的龙山文化与典型龙山文化的城子崖类型较为接近，同时，遗物中的方格纹等，应是受到河南龙山文化影响的结果。另外，从多处岳石文化遗址中采集到的豆盘的形态，与泗水尹家城、章丘城子崖等地点发现的同类器基本一致。多处岳石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也为我们探讨这一时期本地区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提供了实物资料。商周时期的遗存也较为丰富，综观这一时期的陶器特征，如鬲、盆、簋、豆等都与中原地区发现的同类器较为接近，就其时代而言，周代遗物较少，大部分为商代晚期的遗物，个别的如 A 型鬲，有可能早到商代早期。

附表 山东阳谷、东阿县古文化遗址登记表

编号	名称	位 置	面积 (平方米)	文 化 遗 物	文化性质与时代	保存现状
LY 61	红窑堆	阳谷张秋镇许楼	50000	鼎、罐、钵、鬲、器盖、纺轮	大汶口、龙山、岳石、商周	较好
62	阿城	阳谷阿城镇王庄	37500	罐、钵、豆、盆、石斧	大汶口、龙山、商周	较好
63	黑窑堆	阳谷张秋镇刘楼	30000	鼎、罐、鬲、孟、盆、簋、豆	龙山、岳石、商周	遭破坏
64	黑土坑	阳谷范海乡常楼村	5000	罐、盆、豆、鬲、瓮	龙山、岳石、商周	一般
65	景阳冈	阳谷张秋镇景阳冈村西 50 米	380000	罐、瓮、鬲、钵、鼎	龙山、春秋	较好
66	皇姑冢	阳谷十五里园乡皇姑冢	120	鼎、盆、鬲、钵、豆、陶环	大汶口、商周	较好
67	寿张	阳谷寿张乡寿张村东南 500 米	10800	鼎、瓮、罐、鬲	龙山、商周	一般
68	八里庙	阳谷寿张八里庙村东 300 米	4500	鼎、盆、罐、钵、簋	龙山	一般
69	陈冯	阳谷寿张陈冯村	2000	罐、盆、豆	龙山	一般
70	常楼	阳谷范海乡常楼村	4000	鼎、罐、豆、瓮	龙山	一般
LD 51	王集	东阿陈集乡王集村南 300 米	35000	鼎、鬲、盆、簋、豆、罐、瓮、舟型器	龙山、岳石、商周	破坏较轻
52	香山	东阿黄屯乡香山村	8800	钵、鼎、罐、盆、陶环	大汶口、龙山、商周	较好
53	冢子	东阿县大桥镇韩庄村	1500	豆、簋、罐、盆、瓮	龙山、岳石、商周	一般
54	杨柳青冢子	东阿县杨柳乡杨柳街西北 600 米	3000	罐、钵、豆、鼎	龙山、商周	较好
55	魏庄	东阿姜楼乡魏庄东北 300 米	15000	钵、罐、豆、鬲	龙山、商周	较好
56	王宗汤	东阿铜城镇王宗汤村	2500	鼎、罐、瓮、盆	龙山	较差

原载《华夏考古》1996 年第 4 期

山东茌平县李孝堂遗址的调查

陈昆麟 马允华 孙淮生

李孝堂遗址位于山东省茌平县茌平镇李孝堂村东南约 50 米，西北距县城 2 公里，往北 1.5 公里为冯氏河。遗址原为一高台地，俗称东庵。现高出周围地面 0.5 米，总面积约 12000 平方米。遗址保存基本完好。

1974 年首次发现此遗址，后经多次调查，1978 年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从断面观察，文化层堆积厚约 4 米，并可看见灰坑等遗迹和各种遗物。采集的标本有石、骨、蚌、陶器数量较多，年代从龙山文化到汉代各个时期的都有。下面以时代先后为序，对遗物作以简介。

一、龙山文化遗物

龙山文化遗物十分丰富，包括石、骨、蚌、陶器。

1. 石器 数量较少，且多残损，均经磨制。

凿 1 件(标本采:222)，正面呈长条形，横断面近长方形，单面刃，长 7.5 厘米，宽 3.5 厘米。(图一,6)

铲 2 件。均残。器体扁薄，近顶部穿一孔。标本采:223，残长 4.7 厘米，宽 6 厘米，厚 1.5 厘米。(图一,7)

镰 1 件(标本采:225)，残，长条形，平弧背，尾端较宽，单面刃，刃部内凹，残长 4.9 厘米。(图一,8)

2. 骨器 数量较多，但多残，主要器形有凿、簪、镞、锥等。多

数骨器磨制较精,可看出切割痕迹,也有一部分骨器是利用动物骨骼的原形磨制而成的。

镞 2件。标本采:237,残,平面近梯形,横断面近长方形,单面刃微弧,残长5.4厘米。(图一,9)标本采:239,镞身与铤分界明显,镞身横断面略呈菱形,柱状铤,长7.7厘米。(图一,10)

锥 7件。标本采:234,圆锥体,磨制光滑,长20.3厘米。(图一,1)标本采:236,锥体呈扁平状,横截面近似椭圆形,尾端残,残长9.5厘米。(图一,12)标本采:235,系用动物骨骼直接磨制而成,长14厘米。(图一,2)

簪 2件。标本采:233,系用骨片磨制而成,体呈扁平长条形,前端锐利,长14.5厘米。(图一,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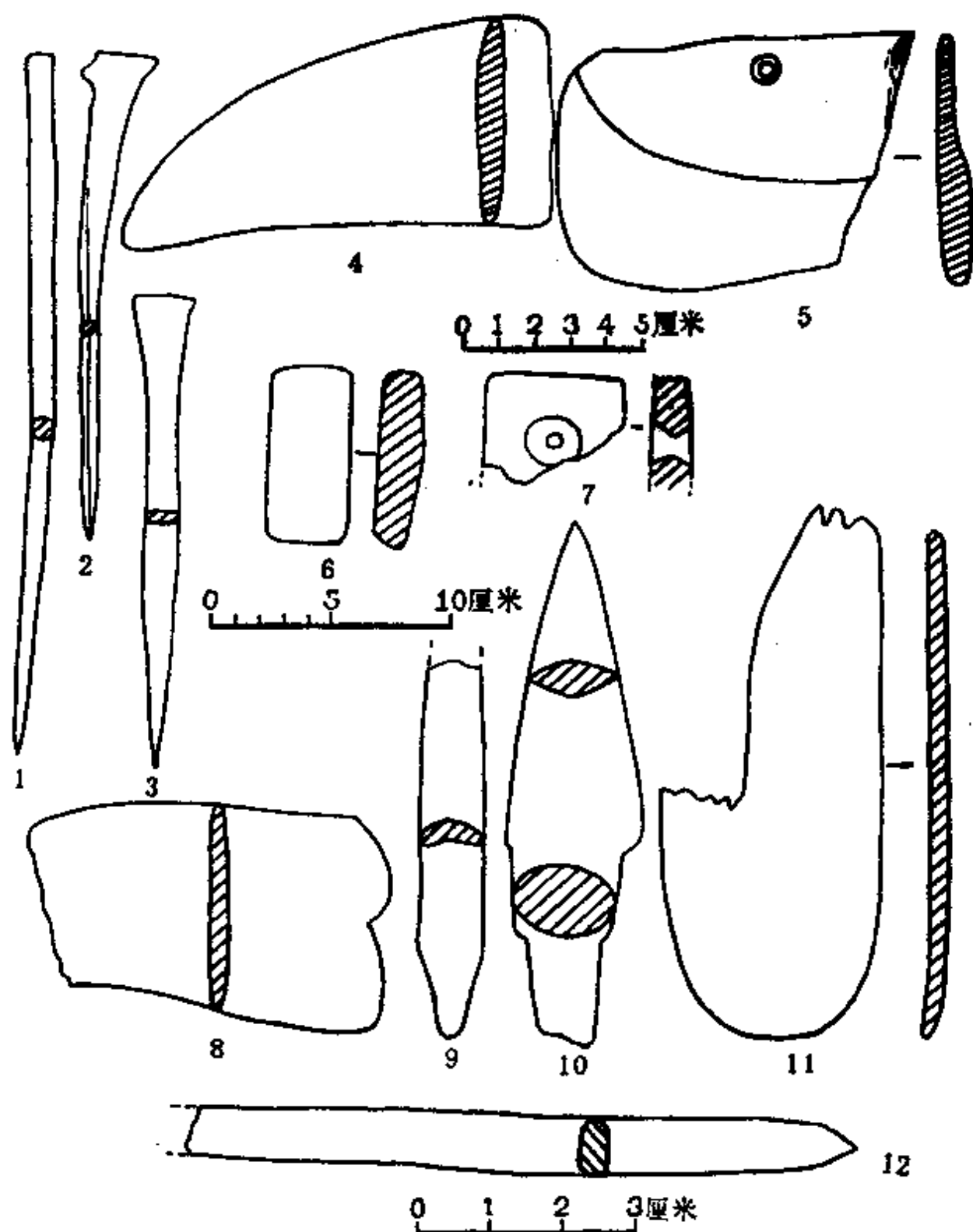
匕 2件。标本采:230,残,磨制而成,平面近条形,弧刃,残长8厘米,宽3.1厘米。(图一,11)

3.蚌器 蚌器数量很多,但大部分残破。以刀为主,也有镰和其它器形。

刀 3件。标本采:227,残,弧背,平刃,一孔残,残长10厘米,宽7厘米。(图一,5)

镰 1件(标本采:229),残,平面呈三角形,尾端较宽,弧背,平刃内凹,长12厘米,宽6厘米。(图一,4)

4.陶器 数量很多,但完整器很少,多为残片。陶器的质料可分为泥质和夹砂两大类,多数泥质陶质地细腻、纯净。灰陶占绝大多数,有少量黑陶和褐陶。陶色比较纯正,色泽均匀,有一部分黑皮陶。陶器的制法以轮制为主,多数器表或内壁可以看见轮旋的痕迹。器物造型规整,个别小器物是手制而成。器表以素面为主,少部分陶器表面磨光,所见花纹有方格纹、篮纹、绳纹、弦纹、凸棱、镂孔、刻划纹等几种。器形很多,主要有鼎、罐、盆、钵、甗、鬲、瓮、杯、盒、盘、器盖、纺轮等。



图一 龙山文化石、骨、蚌器

1、2、12. 骨锥(采:234、235、236) 3. 骨管(采:233) 4. 蚌镰(采:229) 5. 蚌刀(采:227) 石凿(采:222) 7. 石铲(采:223) 8. 石镰(采:225) 9、10. 骨镰(采:237、239) 11. 骨匕(采:230)

鼎 数量不多,采集的标本多为鼎足,均为夹砂陶。扁凿形足 2 件,灰陶,标本采:82。(图二,7)侧三角形足 2 件,灰陶,标本采:83。(图二,8)

鬲 1 件(标本采:1),夹细砂灰陶,方唇,折沿,口沿上有一周凹槽,颈腹相联,腹下部残,颈下饰一周凸棱和一对盲鼻,口径 24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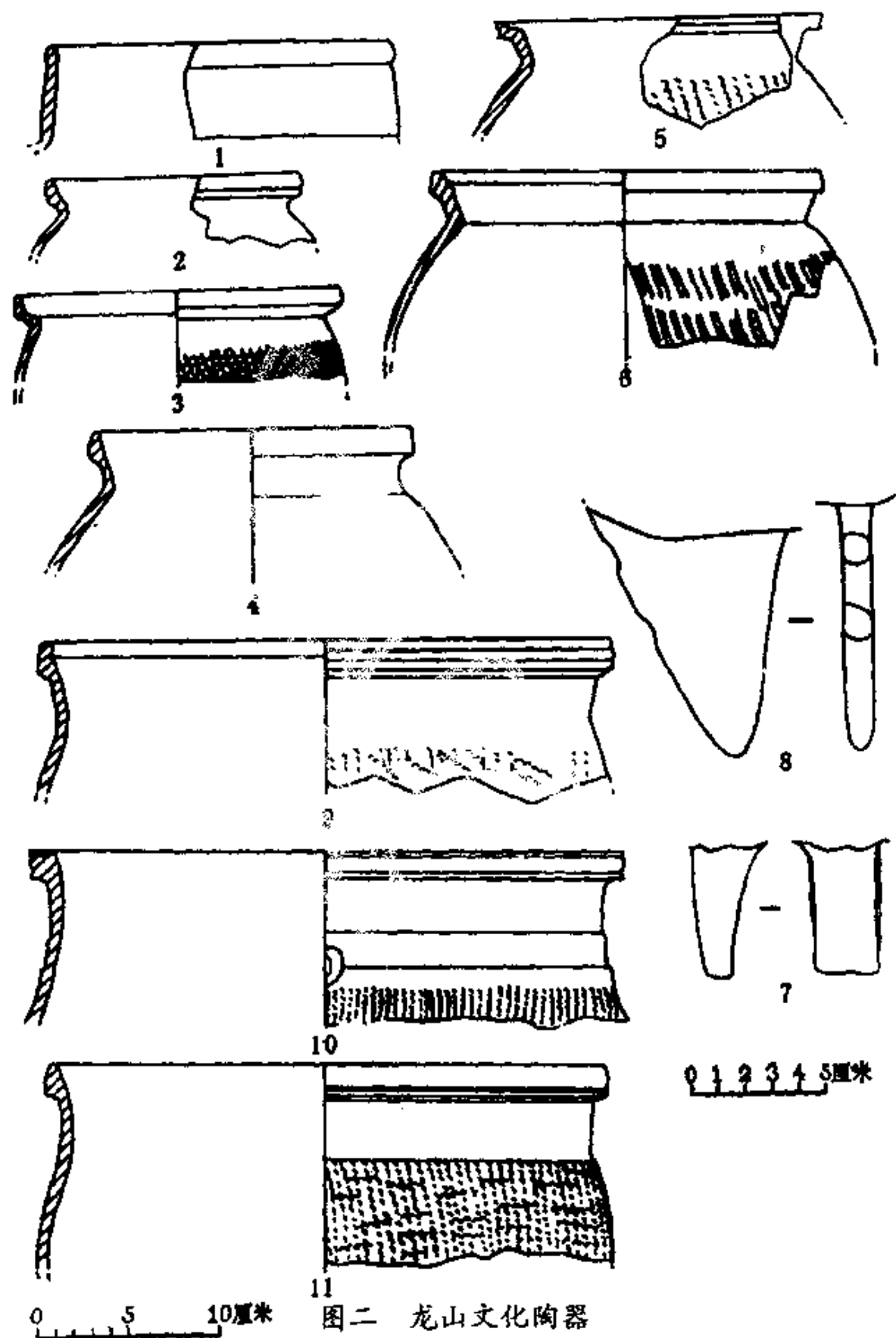
罍 数量极少,均为夹细砂褐陶,有的表面施一层白色陶衣。标本采:94,残口,方唇,折沿,沿面上有一道凹槽,粗颈,颈部饰二周凸弦纹,其下有乳钉。(图三,12)标本采:22,残器底,平底;近底部有二周凹弦纹。

盆 9 件。均残,泥质磨光黑陶。标本采:8,斜直腹,平底下附圈足,底径 26 厘米。(图三,6)标本采:26,方唇,折沿鼓腹较深,口径 22.2 厘米。(图三,3)标本采:9,圆唇,卷沿,直腹,口径 21.3 厘米。(图三,4)标本采:14,圆唇,直口,折沿,短颈,鼓腹,口径 12 厘米。(图三,5)

罐 均残。数量多,形制复杂。可分为中口罐、直口罐。其中以中口罐最多。

中口罐 夹砂陶占多数,有少量泥质陶。均为轮制。标本采:54,方唇,折沿微卷,短颈,鼓腹,口径 17.4 厘米。(图二,4)标本采:57,方唇,折沿,鼓腹,腹部饰横断篮纹,口径 21.3 厘米。(图二,6)标本采:31,方唇,唇外侧有一道细凹槽,折沿,沿面微凹,短颈,鼓腹,腹部饰戳印纹,口径 18 厘米。(图二,5)标本采:2,方唇,唇外侧有一道细凹槽,卷沿,鼓腹,素面,口径 13.8 厘米。(图二,2)标本采:18,尖圆唇,折沿,沿面内凹,鼓腹,腹部饰斜方格纹,口径 18 厘米。(图二,3)

直口罐 多为夹砂陶,泥质陶较少,均为轮制。标本采:39,泥质灰陶,方圆唇,直口,广肩,口径 18.9 厘米。(图二,1)



图二 龙山文化陶器

1. 直口罐(采:39) 2,3,4,5,6, 中口罐(采:2,18,54,31,57) 7,8 甗足(采-82,83) 9,10,11 瓮
(采:53,63,52)

另外还有子母口罐、高颈罐等。

瓮 均残。数量较多,以夹砂陶为主,多在腹部饰方格纹或横断篮纹,均为轮制。标本采:52,夹砂灰陶,方唇,唇外侧有一周凹槽,折沿,粗短颈,鼓腹,肩以下饰横断篮纹,口径 30.9 厘米。(图二,11)标本采:53,夹砂灰陶,方唇,唇外侧有一道凸棱,折沿,沿面有二道凹槽,粗短颈,鼓腹,肩以下饰横断篮纹,口径 31.8 厘米。(图二,9)标本采:63,夹砂灰陶,方唇,折沿,唇外侧有一道凹槽,沿面有一道宽凹槽,直口,粗颈,鼓腹,颈部饰二道弦纹和一对泥饼,腹部饰绳纹,口径 31 厘米。(图二,10)此外,还有子母口瓮残片,为泥质灰陶,素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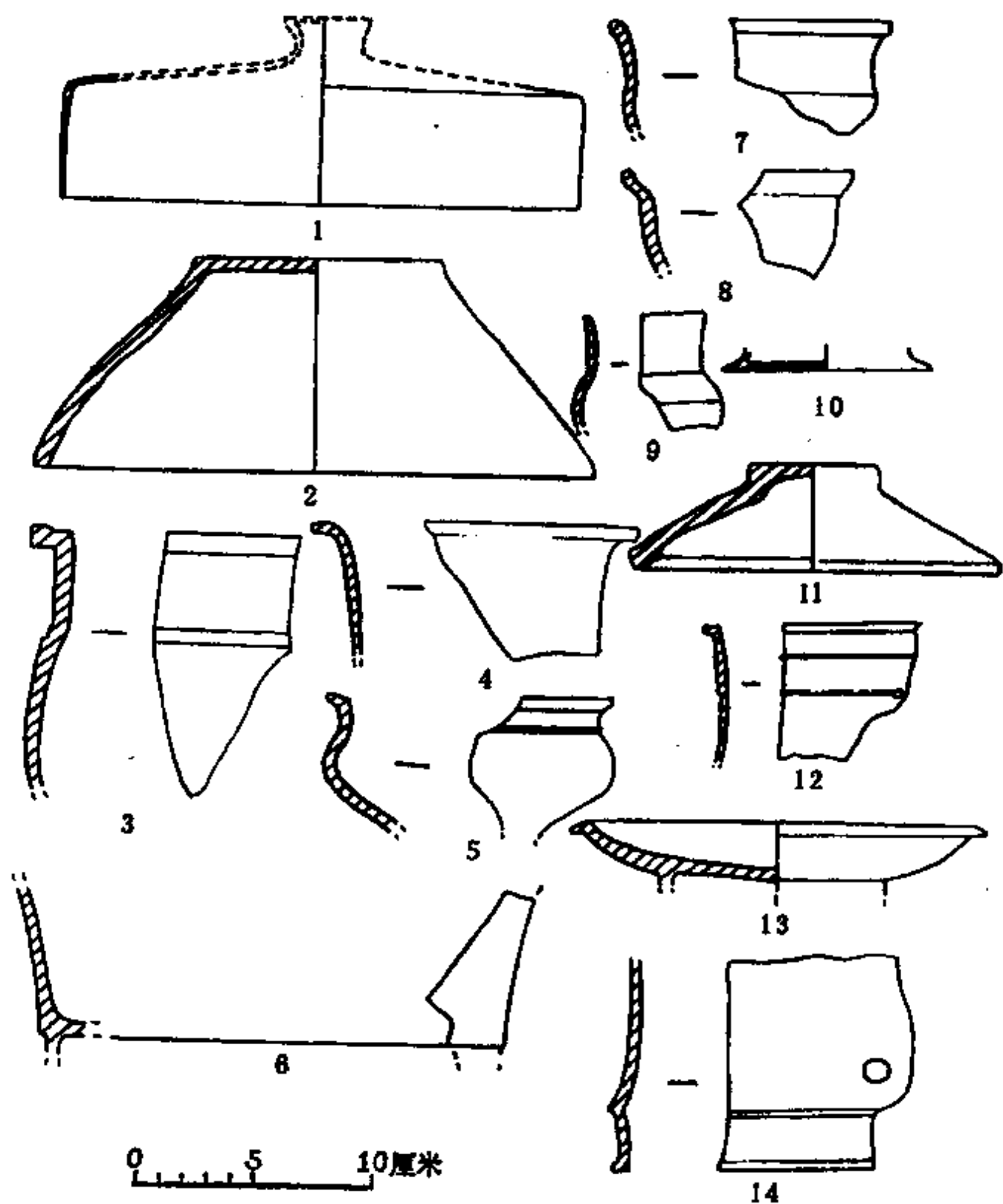
碗 2 件。泥质灰陶,敞口,折腹。标本采:5,口径 9.9 厘米。(图三,8)标本采:7,口径 15 厘米。(图三,7)

杯 3 件。皆残。泥质陶。标本采:12,为杯口,黑褐陶,口微侈,腹部外鼓,有二周弦纹,口径 7.8 厘米。(图三,9)标本采:96,为杯底,器壁薄,平底内凹,底径 9 厘米。(图三,10)

盘 标本采:99,为残口,夹砂黄褐陶,尖唇,平沿,腹壁斜收,口径 16.5 厘米。(图三,13)标本采:88,为残圈足,夹砂黄褐陶,圈足近底处外折,圈足有镂孔,足径约 11 厘米。(图三,14)

算子 标本采:85,夹砂灰陶,轮制,圆形,窄沿,矮直壁,平底,底部为长条形孔。

器盖 8 件。多为夹砂陶,泥质陶较少。均为轮制。标本采:87,夹砂灰陶,平顶较大,斜壁,似覆碗形盖面稍隆起,器体较高,圆唇,口径 24 厘米。(图三,2)标本采:93,夹砂灰陶,平顶斜壁,似覆碗形,方唇,沿内面有一道凹槽,口径 15.8 厘米。(图三,11)标本采:101,泥质黑灰陶,轮制,喇叭形握手,盖面较平,折肩,直壁,口径 21.9 厘米,残高 5.4 厘米。(图三,1)



图三 龙山文化陶器

1, 2, 11 器盖(采:101、87、93) 3, 4, 5, 6 盆(采:26、9、14、8) 7, 8 碗(采:7、5) 9, 10 杯(采:12、96) 12, 簋(采:94) 13, 14 盘(采:99、88)

二、岳石文化遗物

岳石文化的遗物较少,全是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陶数量较少,绝大多数是灰陶,少量褐陶,器表多为素面,有少量的绳纹和戳印纹,可识别的器形有盆、罐、豆等。

三、商代文化遗物

商代的遗物均为陶器,绝大多数是夹砂陶,少数泥质陶,以灰陶为主,有一定数量的褐陶和红褐陶,纹饰以绳纹为主,有少量的凹弦纹、圆圈纹、附加堆纹等。可辨器形有鬲、盆、簋、罐、豆。

鬲 皆残。主要为灰陶,有少量的褐陶和红褐陶,均夹砂陶,腹饰绳纹。据口沿的不同,可分三型。

A型 15件。窄折沿,分6式:

I式 2件。灰陶,厚方唇,鼓腹。标本采:127,沿内面有一道宽凹槽,颈饰重圈纹,下饰二周凹弦纹,腹饰中绳纹,口径15厘米。(图四,1)标本采:142,沿内面一道宽凹槽较浅,腹饰中绳纹,口径16.5厘米。(图四,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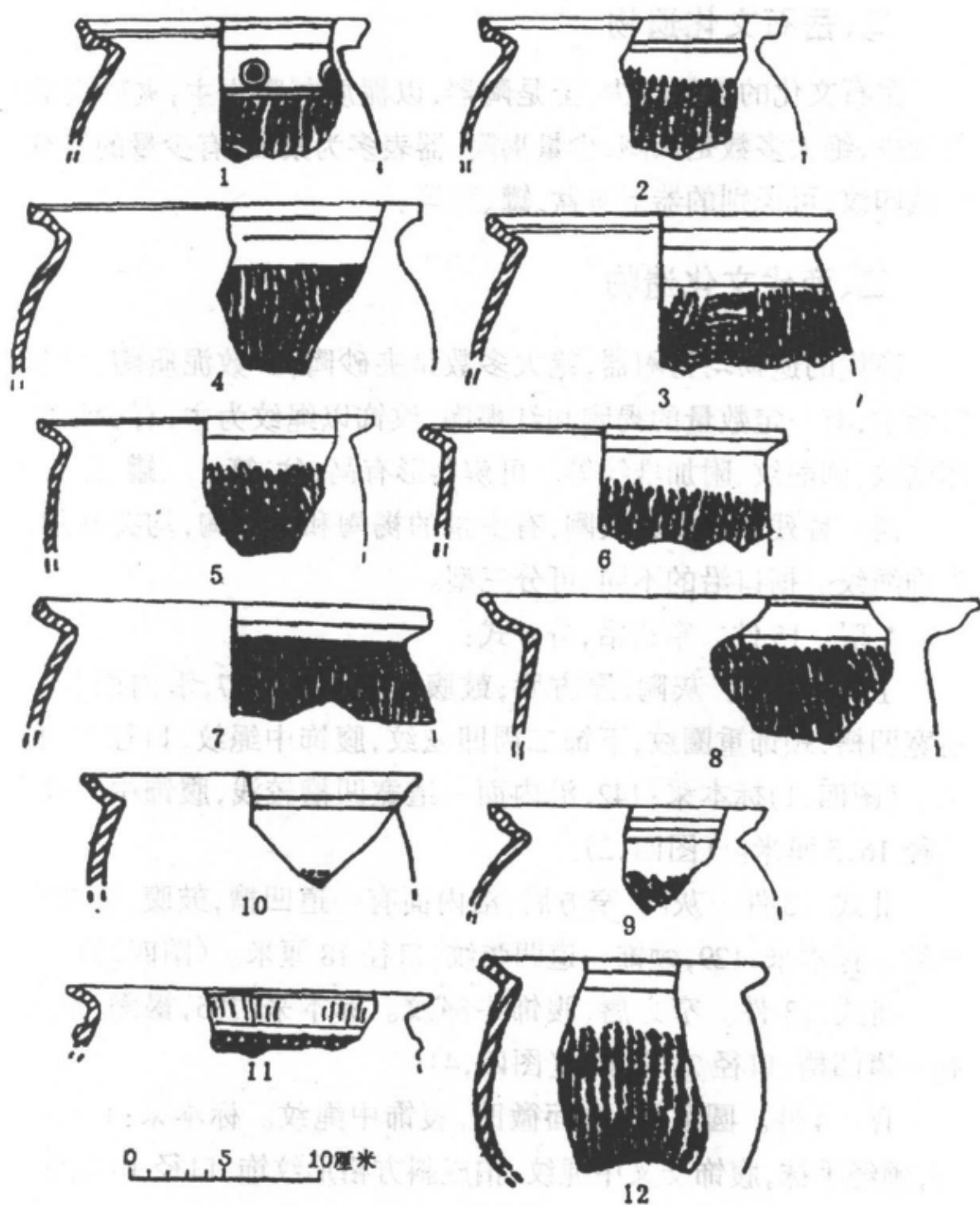
II式 3件。灰陶,窄方唇,沿内面有一道凹槽,鼓腹,腹饰中绳纹。标本采:129,颈饰一道凹弦纹,口径18厘米。(图四,3)

III式 3件。窄方唇,腹饰中绳纹。标本采:185,褐陶,沿面有一道凹槽,口径21厘米。(图四,4)

IV 4件。圆方唇,沿面微凹,腹饰中绳纹。标本采:128,灰陶,颈经手抹,腹饰交叉中绳纹,拍成斜方格形纹饰,口径18厘米。(图四,5)

V式 2件。褐陶,小方唇。标本采:135,斜折沿,沿面有一道浅凹槽,直腹饰中绳纹,口径18.9厘米。(图四,6)

VI式 1件(标本采:136),夹砂灰陶,圆唇,沿面有一周手抹



图四 商代文化陶器

1、2. A型Ⅰ式鬲(采:127、142) 3. A型Ⅱ式鬲(采:129) 4. A型Ⅲ式鬲(采:185) 5. A型Ⅳ式鬲(采:128) 6. A型Ⅴ式鬲(采:135) 7. A型Ⅵ式鬲(采:136) 8、9. B型鬲(采:154、161) 10、11、12. C型鬲(采:181、175、170)

凹槽,鼓腹,颈以下饰中绳纹,口径 21 厘米。(图四,7)

B 型 4 件。宽折沿。标本采:154,灰陶,圆唇,斜折沿,腹微鼓,颈以下饰中绳纹,口径 27 厘米。(图四,8)标本采:161,灰陶,尖唇,唇下有凹槽,沿面有一周凸棱,口径 20 厘米。(图四,9)

C 型 3 件。圆方唇,斜折沿,标本采:175,褐陶,肩饰附加堆纹,腹饰细绳纹,颈部用手抹光,口径 38.4 厘米。(图四,11)标本采:170,灰陶,沿面微凹,腹饰绳纹,口径 15 厘米。(图四,12)标本采:181,沿面微凹,鼓腹,素面,口径 18 厘米。(图四,10)

另有鬲足 14 件。素面或饰绳纹。

盆 2 件。标本采:119,泥质灰陶,方圆唇下垂,斜折沿,沿面微凹,深直腹,腹下部内收,上腹有两周凹弦纹,腹以下饰绳纹,口径 27.6 厘米。(图五,1)标本采:172,泥质灰陶,尖唇,宽折沿,直腹,腹部饰弦断绳纹,口径 28.8 厘米。(图五,2)

簋 2 件。皆残。泥质灰陶。标本采:192,圆唇,侈口,斜折沿,腹壁略鼓,下腹急内收,腹饰两周凹弦纹,近底饰横绳纹,口径 21 厘米。(图五,6)标本采:114,尖唇,敞口,斜直腹,上腹部饰凹弦纹二周,腹饰细绳纹,口径 27 厘米。(图五,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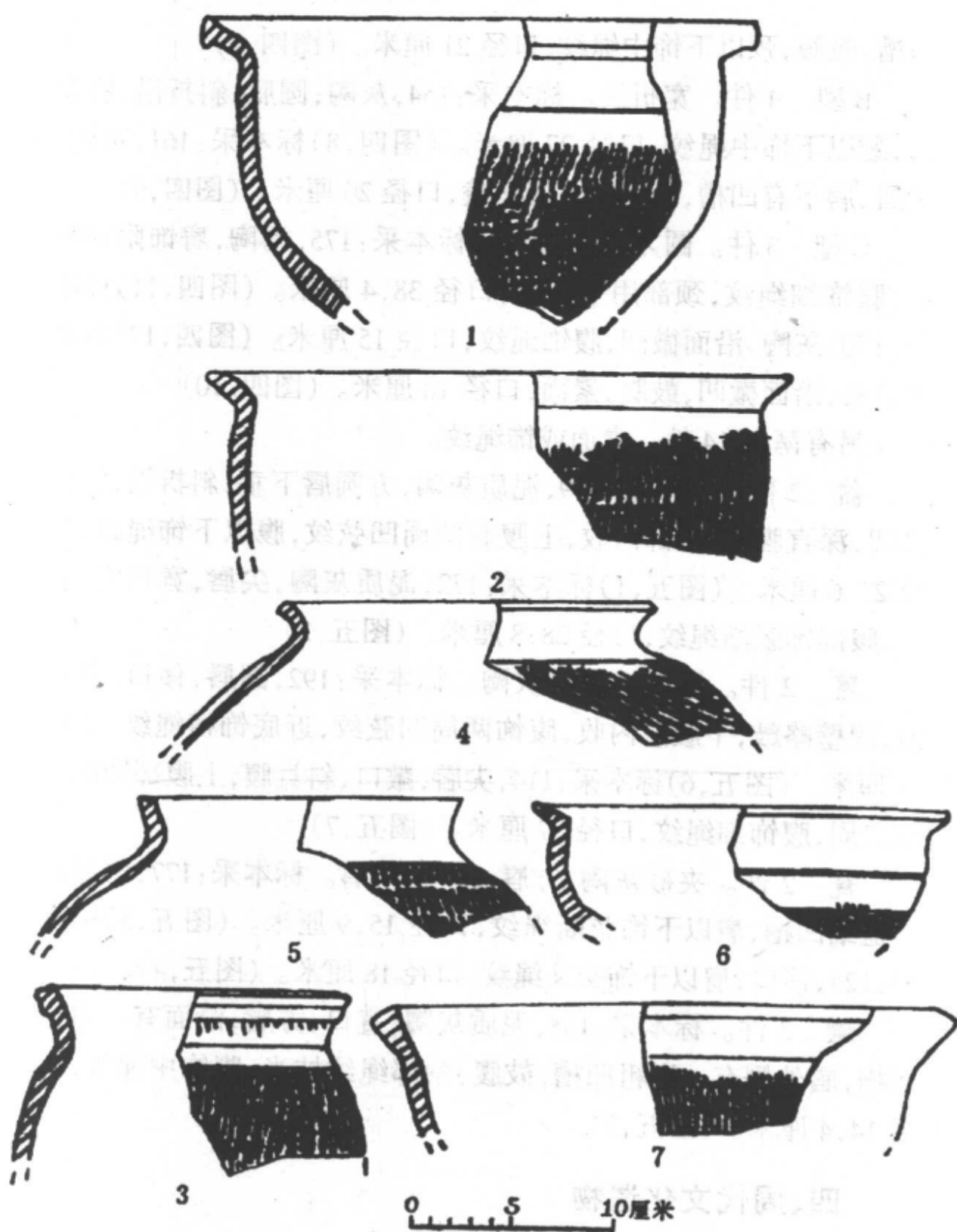
瓮 2 件。夹砂灰陶,方唇,侈口,广肩。标本采:177,唇面有一道细凹槽,肩以下饰弦断绳纹,口径 15.9 厘米。(图五,5)标本采:124,侈口,肩以下饰交叉绳纹,口径 18 厘米。(图五,4)

罐 3 件。标本采:138,泥质灰陶,直口,方唇,沿面有一道细凹槽,唇外侧有一道粗凹槽,鼓腹,颈部绳纹抹光,腹饰中绳纹,口径 14.4 厘米。(图五,3)

四、周代文化遗物

陶器较少,仅有鬲、盆和豆。

鬲 1 件(标本采:109),夹粗砂褐陶,卷沿方唇,沿面微内凹,



图五 商代文化陶器

1、2.盆(采:119、172) 3.罐(采:138) 4、5.瓮(采:124、177) 6、7.簠(采:192、114)

鼓腹,颈以下饰中绳纹。

盆 1件(标本采:145)。夹砂灰陶,直口,方唇,卷沿,沿面有一道凹槽,腹壁微鼓,腹饰数道横绳纹。

豆 2件。泥质灰陶。标本采:128,方唇浅盘,喇叭形,细高柄,口径14.5厘米,高25厘米。(图六)



图六 周代文化陶豆(采:128,1/3)

五、小结

李孝堂是在平县的一处重要的古文化遗址。其龙山文化遗物十分丰富,这主要反映在陶器上,陶器制作规整,烧制火候高,而且器形种类多,其中不乏细泥磨光薄壁的黑陶杯、盆等陶器,说明这里的制陶技术有较高的水平,罐、鼎、瓮等陶器腹部常饰方格纹、篮纹、绳纹,这是鲁西北区龙山文化晚期陶器装饰的一个特点。根据器物形制和装饰风格分析,李孝堂遗址的龙山文化遗存属于龙山文化晚期。在该遗址发现的岳石文化遗存较少,常见的陶器有罐和盆,这两种器物的腹部多饰横绳纹,这一点与丁公、城子崖、王推官庄等遗址发现的岳石文化遗存有相同之处。遗址中的商代文化遗存相当丰富,时间上可以从二里岗上层延续到殷墟晚期,说明从二里岗上层时开始,商王朝的势力已达在平一带。周代文化遗存较少,反映的文化特征也不明显。

整理:陈昆麟 吴明新 孙恒生 李 涛

孙建波 马允华 孙淮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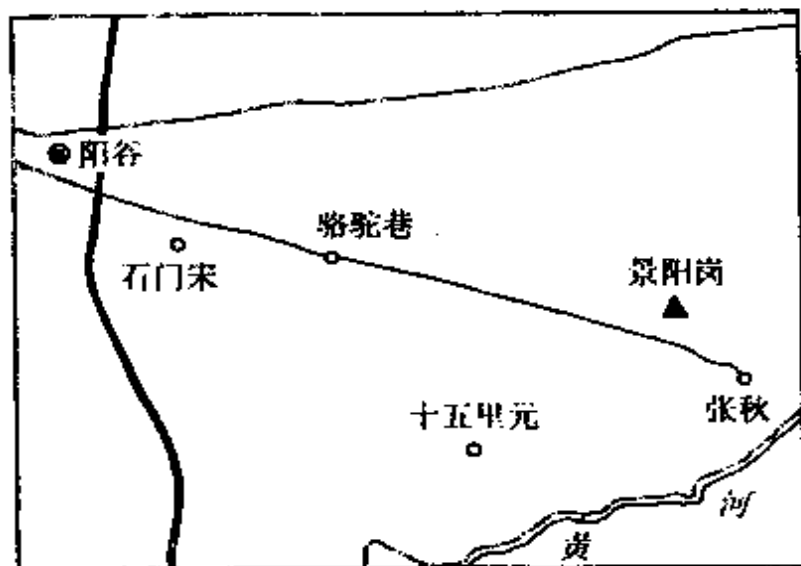
绘图:孙淮生 李 涛

墨描:王占芹

山东阳谷县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 调查与试掘

李繁玲 孙淮生 吴明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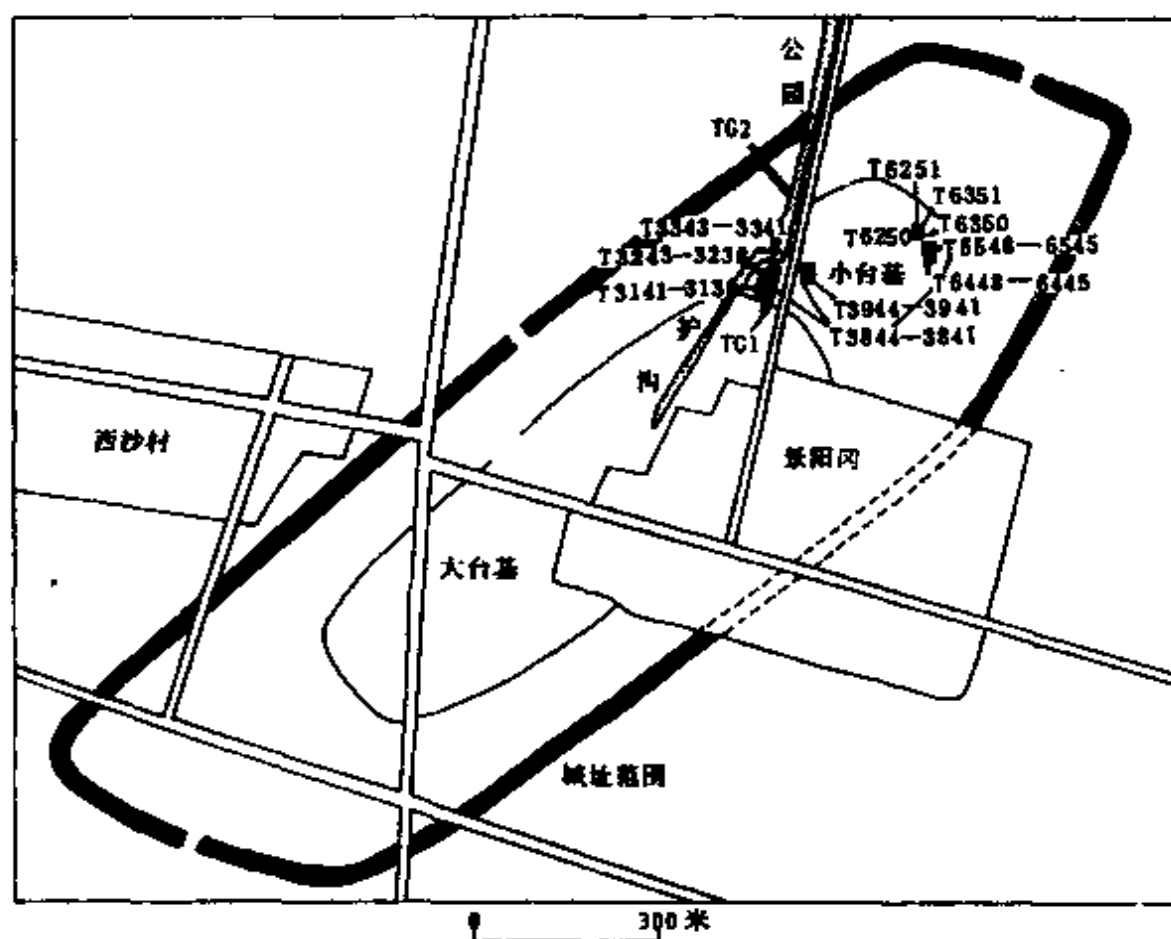
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位于鲁西北黄河冲积平原阳谷县张秋镇景阳冈村,西北距阳谷县城 17 公里,南距黄河约 4 公里(图一)。



图一 景阳冈遗址位置示意图

景阳冈遗址发现于 1973 年,1978 年被定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所在地原为一较高沙岗,沙岗中部高出周围地面约 10 余米。60 年代以来由于挖沙,整个沙岗基本夷为平地,遗址遭到严重破坏。1979 年,聊城地区博物馆在遗址中部清理灰坑 1 座,出土陶器 30 余件和牛骨架 1 具。1994 年,阳谷县在景阳冈村西北建开发区,挖护沟时发现一些夯筑遗迹。聊城地区文化局文物研究室随即对遗址进行调查、钻探。钻探结果表明,遗址为一龙

山文化城址,开发区护沟挖到的夯筑遗迹为龙山城西墙北段,并基本搞清了城址的范围。1994年底,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城址再次进行钻探,并对遗址进行试掘,于城内发现大小台基2座。为进一步了解城址性质及文化内涵,1995年秋及1996年春季,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聊城地区文物研究室先后两次对该遗址进行试掘,共开探沟2条,5米×5米探方34个,揭露面积约1200平方米(图二)。



图二 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范围及探方分布平面图

通过调查与试掘,发现城墙、大小台基、灰沟等一批重要遗迹和遗物。兹将该城址调查、钻探及试掘的主要收获简报如下。

一、地层堆积

钻探资料表明,城内地层堆积比较复杂。从现有剖面及此次试掘情况来看,大小台基边缘及其周围低洼地带,大多为唐宋以后的文化堆积层及黄河淤积层。大台基与小台基中部,由于上部堆积遭到破坏,耕土层以下即为龙山文化遗存,大小台基之间文化堆积较厚,最深处达4米以上。根据土质、土色及出土遗物的不同,地层堆积分为14层。现以TG1(方向19°)东壁中部长24米的一段剖面为例说明(图三)。

第1层:又分为两小层。1A层,耕土,厚20厘米,此层下发现几座清代墓葬。1B层,灰褐土,含细沙,质地细密,厚10~20厘米。主要分布于探沟的北部,H5、C15等开口于此层下。

第2层:黄褐细沙土,质地细密、松软,夹有草木灰,厚5~25厘米。分布于探沟北部,出土遗物有少量瓷片、陶片等。

第3层:棕褐色粘土,质地较硬、板结,厚5~40厘米。分布于探沟北部,出土少量瓷片、瓦片和陶片等。发现有灰沟(G2)。

第4层:含沙量大,质地细密、较纯,根据土色不同又分两小层。4A层,灰褐色细沙土,质地较松软,厚0~40厘米,分布于探沟南部,出土少量陶片、瓷片等。4B层,浅灰褐沙土,质地松软,厚5~50厘米,分布于探沟北部,发现有灰坑(H8-10、13、14、16、56),探沟北部4B层下即为小台基址。

第5层:仅分布于探沟南部,又分两小层。5A层,灰黑土,夹黑土块,质地较疏松,含细沙,厚0~35厘米,出土大量陶片,器形有瓮、罐,还有瓦片,H6开口于此层下。5B层,浅灰黑土,质地松软,含细沙较多,厚0~40厘米,出土遗物主要是陶片,器形有瓮、罐、盆,以及瓦片等,此层下发现有灰沟(G4、G9、G17)和灰坑(H17)。

第6层:浅黄褐土,质地细密,含沙少,厚5~25厘米。分布于探沟中部,出土少量龙山及汉代陶片、瓦片,器形有罐、杯、盒、盆等。此层下发现有灰沟(G5、G7、G11)。

第7层:黑褐土,夹有红烧土块,质地细密、较硬,厚5~40厘米。仅分布于探沟的中南部,出土遗物主要有罐、盆、盒、杯、鼎、器、盖等陶器。

第8层:分布于探沟中南部,又分两小层。8A层:黄褐土,含沙量大,质地较软,夹有红烧土和夯土块,厚5~50厘米,出土大量陶片,器形有罐、瓮、盆、杯、器盖等,此层下发现灰沟(G12)。8B层,浅灰褐土,含沙较多,质地松软,厚25~50厘米,出土物与8A层相同,此层下发现灰沟(G16),并叠压两组夯土(夯Ⅰ2、夯Ⅱ)。

第9层:黄褐土,质地紧密,夹杂大量灰黑土块,厚5~40厘米。分布于探沟中南部,出土少量陶片,器形有罐、盒、鼎、圈足盘、器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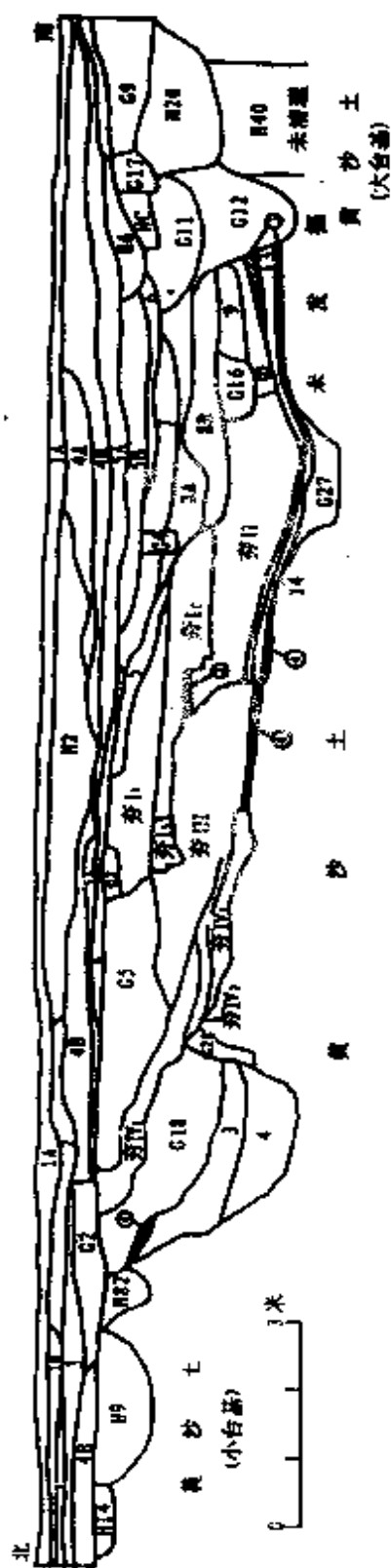
第10层:灰黑土,质地疏松,含有草木灰,厚3~22厘米。出土少量陶片,器形有罐、器盖等。

第11层:灰褐土,质地松软,含大量草木灰,厚5~30厘米。此层由北向西向南分布,出土大量陶片,器形有罐、盒、器盖、鼎、杯、盆等。

第12层:灰黑土,质地疏松,含草木屑,厚3~20厘米。出土陶器有罐、盒、器等。此层叠压在由南向北倾斜的黄土硬面上,此硬面仅在TG1内有一小片,土色暗黄,质地坚实,似为人们长期在此活动而形成的。

以上第10至12层,仅分布于TG1中南部的西壁。

第13层:灰黑土,质地松软,含有硬土颗粒,厚5~10厘米。



图三 TCI 东壁地层剖面图

- 1A. 耕土 1B. 灰褐土 2. 黄褐细沙土 3. 棕褐粘土 4A. 灰褐细沙土 4B. 浅灰褐沙土
5A. 灰黑土 5B. 浅灰黑土 6. 浅黄褐土 7. 黑褐土 8A. 黄褐土 8B. 浅灰褐土 9. 黄褐土
13. 灰黑土 14. 黄砂土 ①台阶 I ②台阶 II ③活动面 ④斜礫石面 ⑤弃 I 护坡

分布于探沟中南部,出土陶器有罐、盆、盒、鼎等,以及骨锥、骨凿和少量兽骨、蚌壳等。

第14层:黄沙土,颗粒较小,质地细密,厚3~15厘米。分布于探沟中南部,出土有罐、盆、簋等陶器。此层下有灰沟(G27),并叠压一料礅石面。

第14层以下为黄沙生土。

根据探沟地层及出土遗物分析,大小台基之间的地层堆积可分为三个大时期:第2至4层,为唐宋至明清时期;第5、6层,为汉魏时期;第7至第14层,属龙山文化时期。

二、遗迹

经过初步勘查与试掘,对龙山文化城墙的位置与结构有了初步了解,另外还发现有台基、台阶、灰沟、灰坑等遗迹。

(一)城墙

1994年普探资料表明,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为东北—西南向,方向为43°,城墙宽20~25米,东墙中段因村庄所压,无法详探。城址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长约1150、宽300~400米,包括城墙在内,总面积约38万平方米(图二)。由于地下水位较高,是否有城壕尚不清楚。

1996年春在西城墙北段开2米×56米探沟一条(编号TG2),方向为315°。由于景阳冈公园建设取土,TG2上部与TG1相对应的第1、2层及第3层上部均遭破坏,城墙顶部被铲掉厚1米左右,因此TG2内叠压城墙的地层编号从第3层开始,分为3、4、5三层。第4、5层内出土少量瓦片及陶盆等口沿残片,属汉魏时期遗物。由于地下水位较高,TG2未挖掘到底。

从已发掘部分得知,城墙顶部宽10.5~12.5、下部宽19~20.5、残高2~3米。依据夯土的土色、夯筑技术的不同及叠压关

系,由上(晚)至下(早)分为十组,现以 TG2 南壁城墙剖面为例说明(图四)。

I 组:位于城墙里侧最东端,剖面暴露厚 220 厘米。夯土为黄褐色,呈颗粒状,质地较硬,夯层厚 10~50 厘米。夯土上部被汉代灰坑(H84)打破,下部叠压 V 组夯土。出土少量龙山文化陶片。

II 组:位于城墙外侧最西端,倾斜叠压在 III、IV 组夯土之上,剖面暴露厚约 220 厘米。依土质、土色及夯筑质量的差异分上下两部分。上层(II 1)为红褐色夯土,夯层清晰、平整,厚 5~20 厘米,夯窝直径 2~7 厘米,为单棍夯筑。下层(II 2)呈灰褐色及乳黄色,质地相对较疏松,没有明显的夯层及夯打迹象。

III 组:位于外侧城墙西部,剖面暴露厚 3~70 厘米。红褐色粘土,质地紧密、较硬。夯层清晰可辨,厚薄不一,夯层由东向西倾斜,厚 10~25 厘米。

IV 组:分布于墙体中西部,被 II 2、III 组夯土叠压,此组又叠压 V4、VI1、VII3、VII4、IX 组夯土,剖面暴露厚 200~270 厘米。黑褐色五花夯土,结构紧密,硬度高。夯面平整,厚约 10 厘米,夯窝直径 5~8 厘米,为单棍夯筑。

V 组:位于城墙里侧东部,叠压 VI、VII、VIII 组夯土,剖面暴露厚约 220 厘米。根据土质、土色不同可分四部分。前三部分,即 V1、V2、V3,夯土为深浅不一的褐色,结构紧密,夯窝清晰,夯层厚 5~15、夯窝直径 5~8 厘米,为单棍夯筑。V4 较纯的黄土,含少量料礓石和红褐土块,土质较疏松。出土少量龙山文化陶片。

VI 组:位于城墙中部,剖面暴露厚 30~100 厘米,黑褐色夯土。夯筑质量好,层次分明,夯面平整,夯层之间夹有少量细沙。夯层厚 7~15 厘米,夯窝为圆形圈底,直径 5~7 厘米。VI 组下叠压 VII 组夯土和淤土层。

VII 组:位于城墙中央下部,其下叠压 VIII、IX 两组夯土,剖面暴露

厚约 15 ~ 100 厘米。根据土质、土色不同,可分四部分(Ⅶ1 - Ⅶ4),土色分别呈黄、红、灰、黑褐色,其顶部及底部两部分土质松软,中间两部分土质较硬。没有明显夯层、夯窝。

Ⅷ组:为红褐、灰褐、黄褐土相杂的夯层,根据土质土色的变化分三部分。Ⅷ1 分布于 TG2 南部,Ⅷ2、Ⅷ3 见于探沟北部。夯筑质量好,土质坚实,夯层明显,厚 10 ~ 20 厘米;夯窝圆形圜底,直径 3 ~ 8 厘米。Ⅷ组叠压Ⅸ、Ⅹ两组夯土,剖面暴露厚 10 ~ 100 厘米。

Ⅶ、Ⅷ组夯土之间夹有黑土、黄沙土各一层。

在Ⅷ组夯土的北部内侧,发现有板筑痕迹,板筑夯土由下至上呈阶梯状内收。板宽 9 厘米。残长 100 ~ 150 厘米,板面光滑平整。局部尚存板灰痕迹。

Ⅸ组:位于城墙中央下部,剖面暴露厚约 150 厘米。黄花夯土,质地较硬,夯层均匀,厚 5 ~ 8 厘米,没有明显夯窝。有少量龙山文化陶片出土。

Ⅹ组:在已发掘城墙的最下部,厚 10 ~ 60 厘米。夯土中间高,逐渐向两边倾斜。依土质、土色的不同可分上、下两部分。上层(Ⅴ1)黑褐夯土,夯层清晰。下层(Ⅴ2)为灰褐色与红褐色相夹杂的夯土,土质较硬,夯层不明显,仅分布于探沟内北部。

Ⅹ组夯土下为乳黄色土层,因地下水位较高,未向下发掘。

上述十组夯土,除Ⅰ、Ⅱ组之外,其它各组夯土均相互叠压,互有联系。里侧和外侧夯土向城墙中部夯土倾斜叠压。

Ⅰ组夯土的土质,土色及夯层构筑方式与Ⅱ、Ⅲ组有较大差别,Ⅱ、Ⅲ两组则较为接近,前者应为对城墙内侧的加宽,后者可能为加宽外侧城墙而形成。Ⅱ、Ⅲ组夯土倾斜叠压Ⅳ组,二者构筑方式较为一致。Ⅳ、Ⅴ组夯土在上部有叠压关系(TG2 北壁剖面明显),Ⅳ、Ⅴ1、Ⅴ2、Ⅴ3 均压在松软的Ⅴ4 之上,前者可能为Ⅴ4 之外皮。从剖面观察,Ⅵ组系先在城墙顶部向下清理,然后再向上修

筑,是为了加高城墙。Ⅶ、Ⅷ两组夯土之间有淤土层,两者的修筑时间应有一定的间隔。Ⅷ、Ⅸ、Ⅹ三组夯土为较早时期的城墙,Ⅷ组夯土打破Ⅸ组夯土,两者均叠压在Ⅹ组夯土之上,表明这三组夯土也可能不是一次修筑的。

综上所述,目前发掘有十组夯土叠压,说明城墙系多次修筑而成。但由于城墙出土遗物及资料正在整理之中,目前对各组夯土的关系和构筑时间等问题,尚难作进一步的阐述。

(二)台基

在城内发现大、小台基2座。

大台基位于城址南部,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方向与城墙一致。南北长约520、两端宽175米,面积9万余平方米。因村民挖沙,大台基仅在今武松庙周围及村西南部保存较好,其余部分上部破坏较甚,现存部分高出周围地面约2~2.5米。1995年冬,在武松庙东和村西南部,利用断崖清理了两个剖面。从剖面观察,层次分明,大台基南部(即村西南部分)系分层夯筑,其中南部(武松庙周围残存部分)的上部也可见加工痕迹。而在TG1南部的大台基北端,即台基的下部,无明显加工迹象。据此推测,大台基系利用原自然沙丘,在其上部经加工而成。

小台基位于大台基北面,平面略呈方形。根据钻探及试掘情况推测,面积约在1万平方米以上。依地层堆积判断,小台基中部原来可能较高,但已遭破坏,在其上发掘的8个探方,耕土层下即发现龙山文化遗迹(如H33等)。小台基西南部台面相对较低些, TG1北部的小台基面距现地表深约0.7米。TG1西部的T3141、T3241的小台基面上,有人工堆筑迹象。

在小台基的南部、大小台基之间发现大片夯土,依其叠压关系,由晚至早分为四组(夯Ⅰ-夯Ⅳ)。

夯Ⅰ 位于四组夯土的南部,在TG1中部可见夯土为8层叠

压。夯土坚实,结构紧密。上部宽 120~160、下部宽 500~550、厚 100 厘米。系分块夯筑,分三大块(夯 I 1、I 2、I 3),各块夯土夯层分明,厚 5~10 厘米。夯窝为圆形圪底,直径 3~7 厘米,深 1 厘米以上,以单棍夯为主,有的地方可见似用鹅卵石夯筑的痕迹,夯窝直径约 10 厘米。在夯 I 2 北端与夯 I 3 交接处,有一漆黑光亮的斜面,局部存有板灰。夯 I 叠压台阶 II(发现有路土,似为当时人们长期踩踏而成,台阶 II 亦同)和 G5、夯 II、夯 III。出土大量龙山文化陶片及石斧、石镞、陶器盖等遗物。

夯 II 被夯 I 叠压,又斜压夯 III。为黄灰和暗黄色夯土相夹杂的夯层,夯土坚实,夯窝清晰。上部宽 70、下部宽 450、厚 60~80 厘米,夯层厚 3~5 厘米。夯筑方式与夯 I 相似,夯窝直径 5~8 厘米。出土有石镞及大量龙山文化陶片。

夯 III 被 G5、夯 II 叠压,其下又叠压夯 IV。夯土为灰褐色,杂质较多,含大量大颗粒黄土块和灰渣。上部宽 160~200、下部宽 150~180 厘米,夯筑质量较差,无明显夯层。夯土中央有两层较薄的料礓石面。在其底部也叠压一层厚 5~12 厘米的料礓石面,该料礓石面与其南部 14 层叠压的料礓石面(厚 3~5 厘米)相连,北高南低,呈台阶状。夯 III 出土有骨锥、骨镞及大量龙山文化陶片。

夯 IV 被夯 III 叠压,其下开口的 G18 以北即为小台基。IV 组夯土南北长约 600、厚 20~40 厘米。以土色不同及夯筑质量的差异,分上下三块。夯 IV 1 表面局部铺有料礓石,下部为沙土,结构紧密,夯窝不明显。夯 IV 2、IV 3 均呈黄褐色,土色深浅略有不同,质地纯正,夯层明显,厚 8~10 厘米,夯窝直径 3~4 厘米,为圆棍夯筑,夯 IV 3 下为黄沙生土。夯 IV 中含少量龙山文化陶片及蚌刀、骨针、骨笄等遗物。

这四组夯筑遗迹位于 TG1 中部,大小台基之间,由于目前揭露面积较小,上述四组夯土的性质尚难判定。

(三)灰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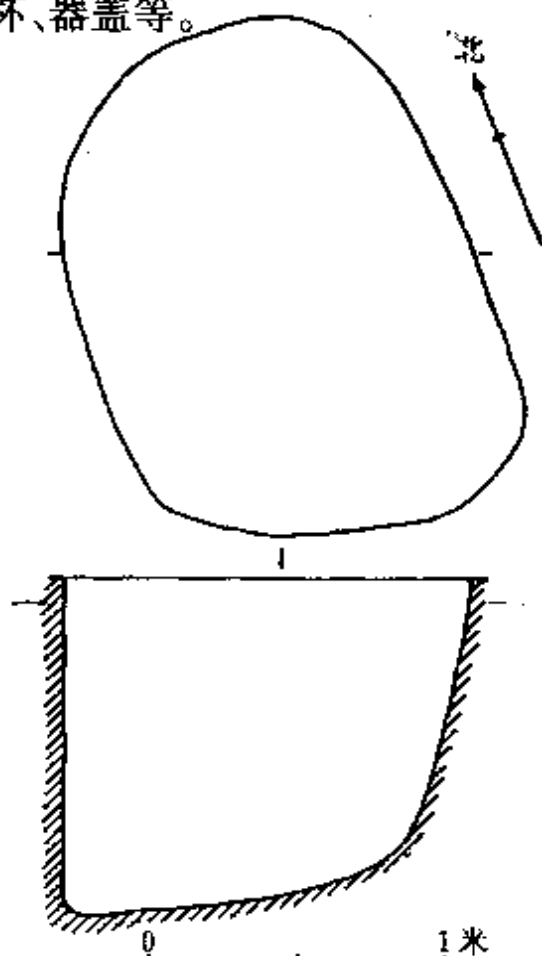
发现灰沟 18 条,方向较一致,大多呈东西向,或西北—东南向。因发掘面积有限,灰沟两端均未挖完。已清理部分东西长 21~82、南北宽 0.8~4.1 米,灰沟均无明显加工痕迹。

G12 位于大台基北坡下部,东西向,沟为斜壁,底部不平。发掘部分长 4、口宽 1.95、深约 1.8 米。沟内堆积黑灰土与灰淤土。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有罐、鼎、盆、杯、器盖等。

(四)灰坑

发现灰坑 100 多座,大小不一。形状有圆桶形、圆锅底形、椭圆形、椭圆锅底形和不规则锅底形五类。坑壁及坑底均未发现明显加工痕迹。

H16 位于 TG1 北部,开口于 4B 层下,打破小台基。平面略呈椭圆形,长轴 1.85、短轴约 1.4、坑深 1.2 米。坑壁较直,底部不甚平整。坑内填土为深灰褐色,含草木灰、烧土块、草拌泥、白石灰皮等,土质疏松。填土内出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陶器以罐、盆、鼎、甗、豆、杯、器盖等为主(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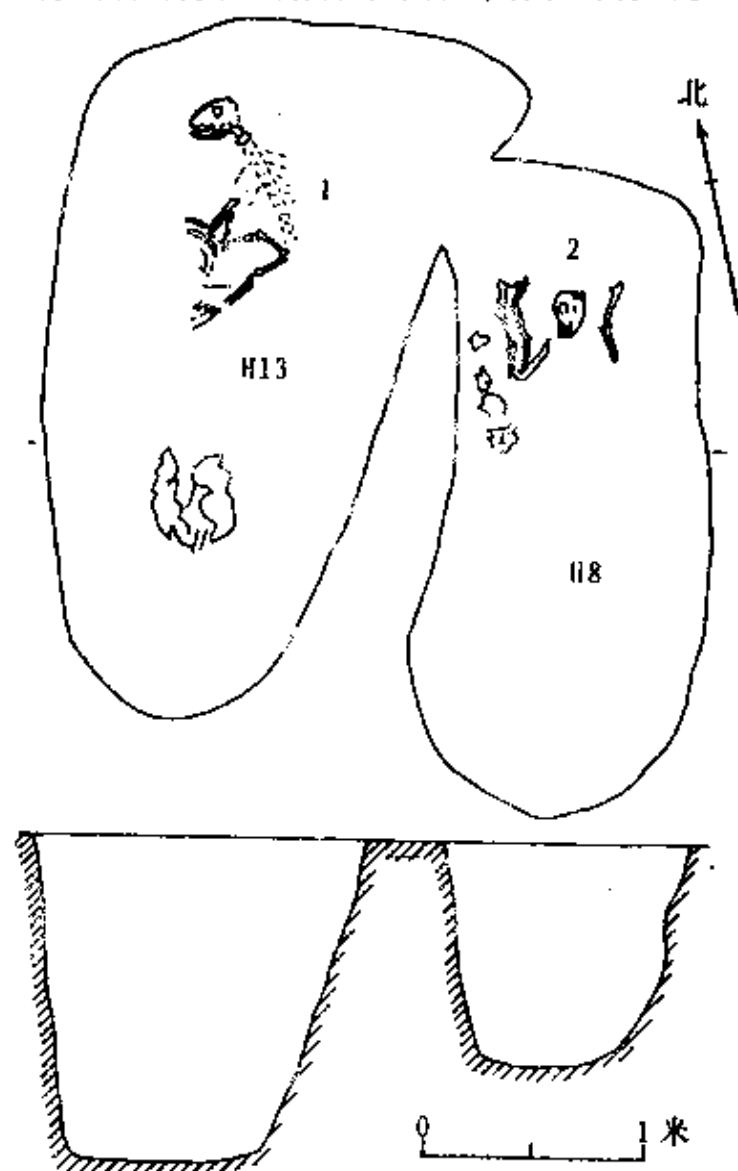
图五 H16 平、剖面图

H8、H13 两坑北部相连,位于 TG1 北部,开口于 4B 层下,打破小台基。两坑内填土均为灰黑土,含草木灰、烧土块及黄夯土块,土质疏松。同一陶器的碎片往往在两个坑中发现,因此,两个坑可能同时建成(图六)。

H8 位于 H13 东部,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斜壁,底不平整。南

北长 2.9、东西宽 1.2 米、坑深 1.15 米。在坑北部下面发现完整狗头骨及后肢骨。H13 呈不规则形，一端宽、一端窄的长条形，斜壁，底不平整，长 3.6、宽 0.8~1.8、坑深 1.5 米。在坑底北侧有一完整狗骨架。

两个灰坑均出土大量龙山文化陶器，器形有罐、盆、鼎、杯、甗、器盖等。还有石器、骨器、角器、蚌器等，并出有许多狗、羊骨骸。



图六 H8、H13 平、剖面图

1、2 狗骨架

三、遗物

景阳冈龙山城址的文化堆积较厚,出土遗物丰富,有陶器、骨器、蚌器、角器、石器等。

(一)陶器

数量最多,陶质分为泥质陶和夹砂陶两大类。泥质陶质地细腻,陶胎一般较薄;夹砂陶又可分为细砂陶和粗砂陶,少部分陶器加麝和细云母。陶色有灰、黑、褐、红、白等五种,其中以灰陶数量最多,黑陶次之,红陶、褐陶较少,白陶仅见个别陶器。部分器物的烧制火候不均匀,陶色不一致。

陶器绝大部分为轮制,有的器物(如豆)足和腹部分别制成后,粘接而成,再将接缝处抹平。陶器以素面为主,多经磨光。常见纹饰有篮纹、绳纹、方格纹、附加堆纹、凹凸弦纹、瓦棱纹、篦纹、指甲纹等等。篮纹、绳纹多饰于罐的腹部和 的上部,凹凸弦纹相间饰于盆、罐等器物颈部,附加堆纹见于罐、瓮等器物的上腹部。主要器类有罐、鼎、杯、盆、盒、器盖、甗、碗、瓮、壶、圈足盘、支脚、纺轮等。

罐 多数为泥质陶,夹砂陶数量少。可分为五型:

A型:侈口,束颈,鼓腹,平底或凹底,内壁转折处转角突出。H13:21,泥质灰陶,方唇,折沿,微凹底,腹上部饰两周弦纹,口径15.5、底径9.6、高20.5厘米(图七,1)。H16:30,夹砂红褐陶,方唇,折沿,唇面有凹槽,腹最大径偏上,微凹底,素面,口径15.3、底径7.4、高19厘米(图七,2)。H13:22,泥质灰褐陶,圆唇,折沿,沿面有凹槽,平底,口径12、底径8、高14.8厘米(图七,3)。H13:23,泥质灰陶,圆唇,盘口,口沿外侧有一周凹槽,腹饰竖篮纹,底部残,口径14、残高16.5厘米(图七,4)。

B型:直口,鼓腹,平底。H13:20,泥质灰陶,圆唇,腹最大径居

中。口径 10、底径 10.4、高 11.3 厘米(图七,5)。

C 型:子母口,素面。H8:6,泥质黑陶,已残。子母口较长,颈较矮,窄肩,腹上部施鸡冠耳。口径 17.5、残高 12.5 厘米(图七,6)。

D 型:卷沿,束颈,深腹,平底。G18:16,泥质灰陶,尖圆唇,侈口,深鼓腹,腹上部有对称的横耳,耳残。腹上部饰八周凹弦纹,下部饰篮纹。口径 30、底径 17、高 49.5 厘米(图七,7)。

E 型:单耳罐。H13:1,泥质磨光黑陶,方唇,长颈较直,折腹,微凹底,腹侧饰一横带状耳。口径 11.5、底径 7.2、高 12.5 厘米(图七,8)。

盆形鼎 折沿,多为鸟首形足。H14:1,夹细砂黑褐陶,方唇,侈口,束颈,浅腹,圜底近平,足残。腹侧有盲鼻,饰瓦棱纹。口径 28.8、残高 13.2 厘米(图七,20)。

罐形鼎 数量少,均为残片,罐形腹,多为侧三角形足。

杯 均为细泥陶,轮制,多通体磨光,制作精细。分二型:

A 型:圈足杯。H13:2,泥质磨光黑陶,圆唇,口微敛,弧腹,喇叭形圈足。口径 10、足径 7.8、高 9.5 厘米(图七,9)。

B 型:单耳杯。H13:4,泥质磨光黑陶,圆唇,敞口,筒形腹,凹底,腹下部有一宽带环耳,耳宽 3.6 厘米,与耳相对一侧有盲鼻,腹饰两周凸棱纹,口径 10.4、底径 8.8、高 8.9 厘米(图七,10)。G18:13,泥质灰褐陶,口残,束腰,扁宽耳,与其相对一侧盲鼻,凹底,饰六周凹弦纹(图七,11)。H16:1,泥质红褐陶,圆唇,侈口,束腰,下部为扁鼓腹,平底,一侧有环状耳,口径 4.1、底径 3.2、高 6.8 厘米(图七,16)。H16:24,泥质黑陶,筒形腹,口径大于底径,一侧有环形耳,平底残。口径 11.2、底径 10.2 厘米(图七,21)。

盆 大部分为泥质陶,轮制。分三型:

A 型:敞口,卷沿,浅直腹。H8:5,泥质磨光黑陶,圆唇,凹底,口径 25、底径 20.5、高 10.5 厘米(图七,17)。H16:11,泥质红褐陶,

圆唇,折腹,平底,口径 20.4、底径 14.5、高 10.5 厘米(图七,12)。
采:005,泥质灰陶,方唇,腹部有横鋸耳一对,耳上饰两道凹弦纹,底残,口径 34.5、底径 28、高 14.1 厘米(图七,22)。

B 型:侈口,圆唇,微束颈,扁鼓腹,平底或凹底。H13:19,泥质灰陶,器表磨光,沿外折,颈部三周凹弦纹。口径 12.5、底径 6、高 8.8 厘米(图七,19)。H13:18,泥质灰褐陶,沿面有一周凹槽,口径 13.5、底径 7.5、高 7 厘米(图七,18)。H13:3,夹砂黑褐陶,胎较厚,器体较小,器形不规整,侈口,微束颈,平底,口径 9、高 5 厘米(图七,13)。

C 型:方唇,折沿,微束颈,弧腹,小凹底。G18:12,夹砂灰陶,沿面有凹槽,口径略大于腹径。颈部饰凹弦纹一周,腹饰方格纹。口径 27.4、底径 9、高 21.6 厘米(图七,14)。

豆 多数为泥质红褐陶,筒形粗柄。分二型:

A 型:折沿豆。H16:8,泥质红褐陶,方唇,浅盘,柄较直。口径 11、底径 6、高 6.2 厘米(图八,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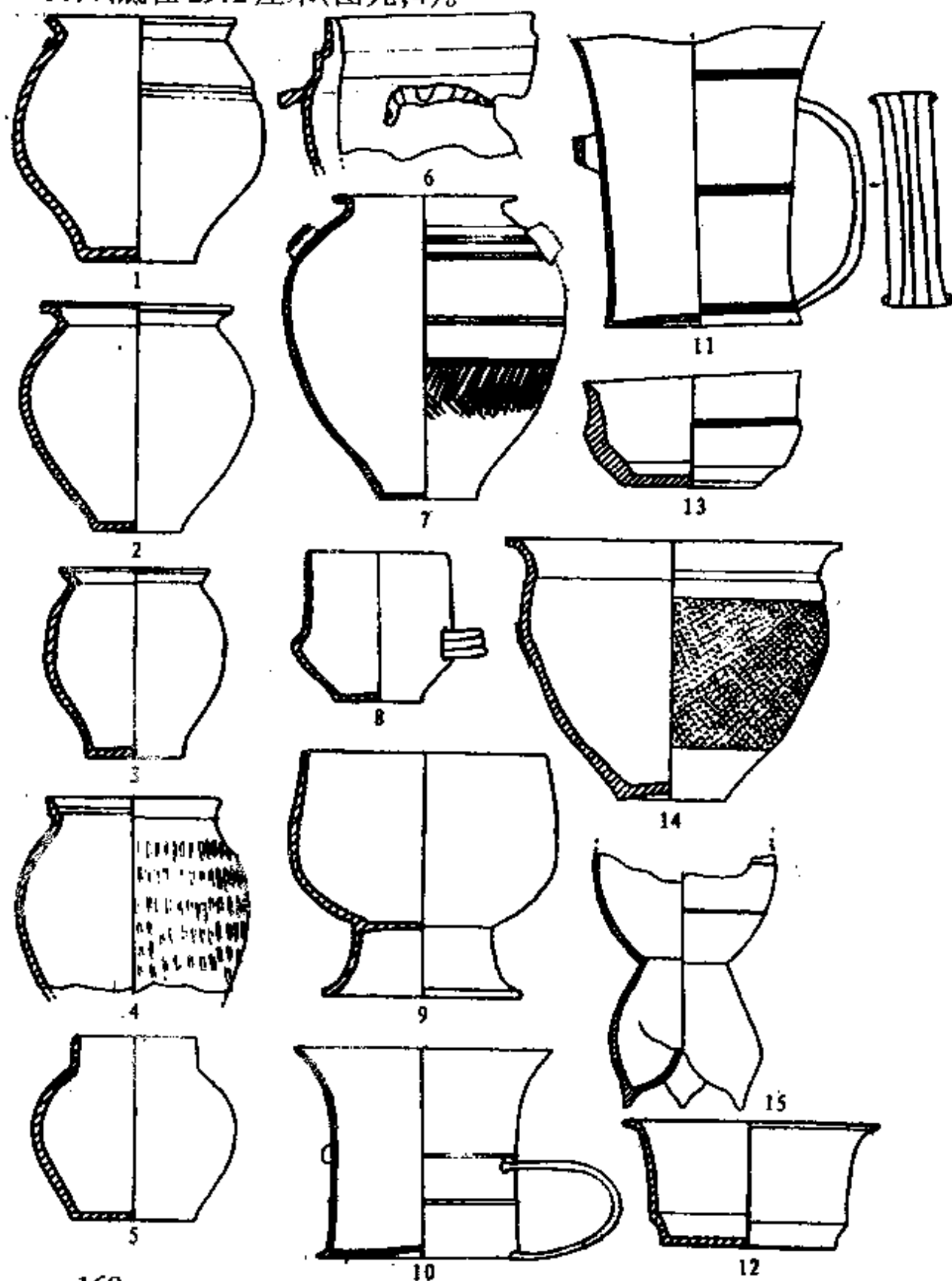
B 型:卷沿豆。H16:3,泥质红褐陶,圆唇,浅盘,内壁呈黑褐色,柄中部较细,略呈喇叭形,口径 10.8、底径 6.8、高 5.8 厘米(图八,2)。H16:4,泥质红褐陶,圆唇,折腹,腹较深,口径 11、底径 6.1、高 7.2 厘米(图八,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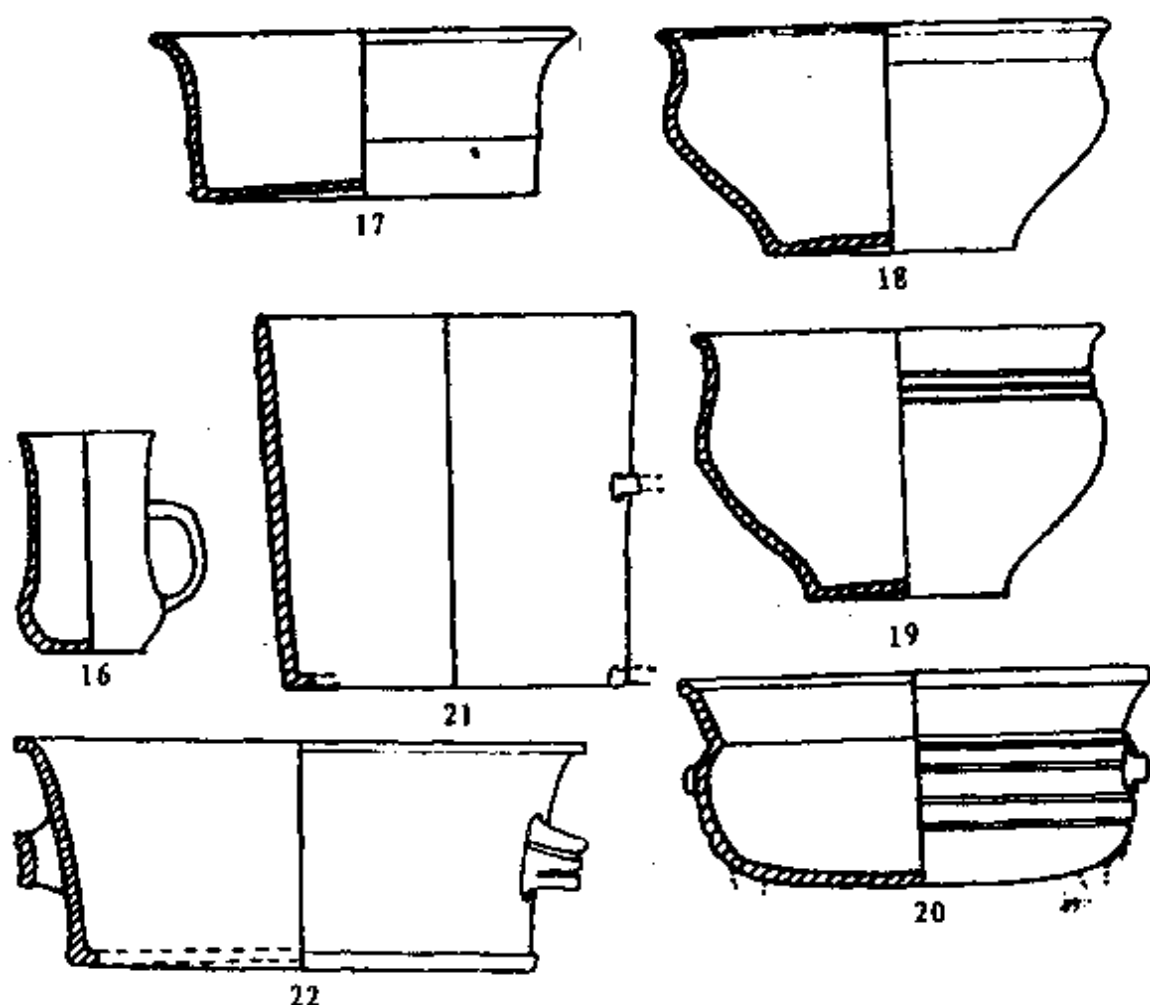
盒 均泥质陶,轮制,通体磨光。分二型:

A 型:平底盒,胎较薄。H33:15,泥质磨光黑陶,圆唇,子母口,筒状腹,腹下饰两周凹弦纹,凹底。口径 11.9、底径 11.9、高 4.4 厘米(图八,8)。

B 型:圈足盒。采:007,泥质磨光黑陶,子母口,浅腹,凹底,圈足残。卷足上部有一周凸棱,下部有打击痕,口径 15.2、底径 15.6、残高 5 厘米(图八,9)。H16:27,泥质磨光黑陶,子母口近直,浅斜腹,凹底,圈足较高,圈足上部有三个椭圆形镂孔,口径 28.4、高

14.4、底径 29.2 厘米(图九,4)。





图七 龙山文化陶器(160-161)

1、4. A型罐(H13:21、H16:30、H13:22、23) 5、6. B、C型罐(H13:20、H8:6) 7、8. D、E型罐(G18:9、H13:1) 9. A型杯(H13:2) 10、11、16、21. B型杯(H13:4、G18:13、H16:1、24) 12、17、22. A型盆(H16:11、H8:5、采:005) 13、18、19. B型盆(H13:3、18、19) 14. C型盆(G18:12) 15. 甗(H56:1) 20. 盆形鼎(H14:1) (7、15. 约 1/13, 9-11、13、16、18、21. 3/10, 余 3/20)

器盖 多数为泥质陶,分三型:

A型:覆盘形。H10:4,泥质红褐陶,局部呈黑褐色,盘形钮,钮较高,盖面微鼓,腹部饰一周附加堆纹,两侧各有一带状横耳,口径14.8、高11.4厘米(图九,5)。采:008,泥质陶,凹顶,钮已残,近直壁,底径16、残高5.2厘米(图八,4)。

B型:平顶直筒形。H13:24,泥质磨光黑陶,器体较高,口略外侈,顶微内凹。顶径11.5、底径12、高10.4厘米(图九,1)。

C型:覆碗形。H8:4,泥质灰陶,矮,顶微内凹,斜壁,唇面有凹槽,顶部残,底径15.2、高4.7厘米(图八,7)。H13:25,泥质灰褐陶,平顶残,曲腹,圆唇,顶径5、口径13、高4.9厘米(图八,6)。采:004,泥质黑褐陶,微凹顶,上有桥形钮,已残,斜壁,子母口,顶径4.2、底径7.2、残高4厘米(图八,5)。

甗均为残片,除素面外,有的饰绳纹、篮纹和方格纹等。H56:1,夹砂灰褐陶,素面,甗和鬲分别制作后粘接。甗口残,腹饰两周凸棱纹。鬲分裆,肥袋足,锥状足尖。残高43.5厘米(图七,15)。绳纹甗足尖多呈圆锥状,饰麦粒状绳纹至足尖。

碗 G18:18,泥质黑陶。侈口,圆唇,折腹,矮圈足。腹饰凸棱纹和小泥钉。口径20,底径11.8、高5.8厘米(图八,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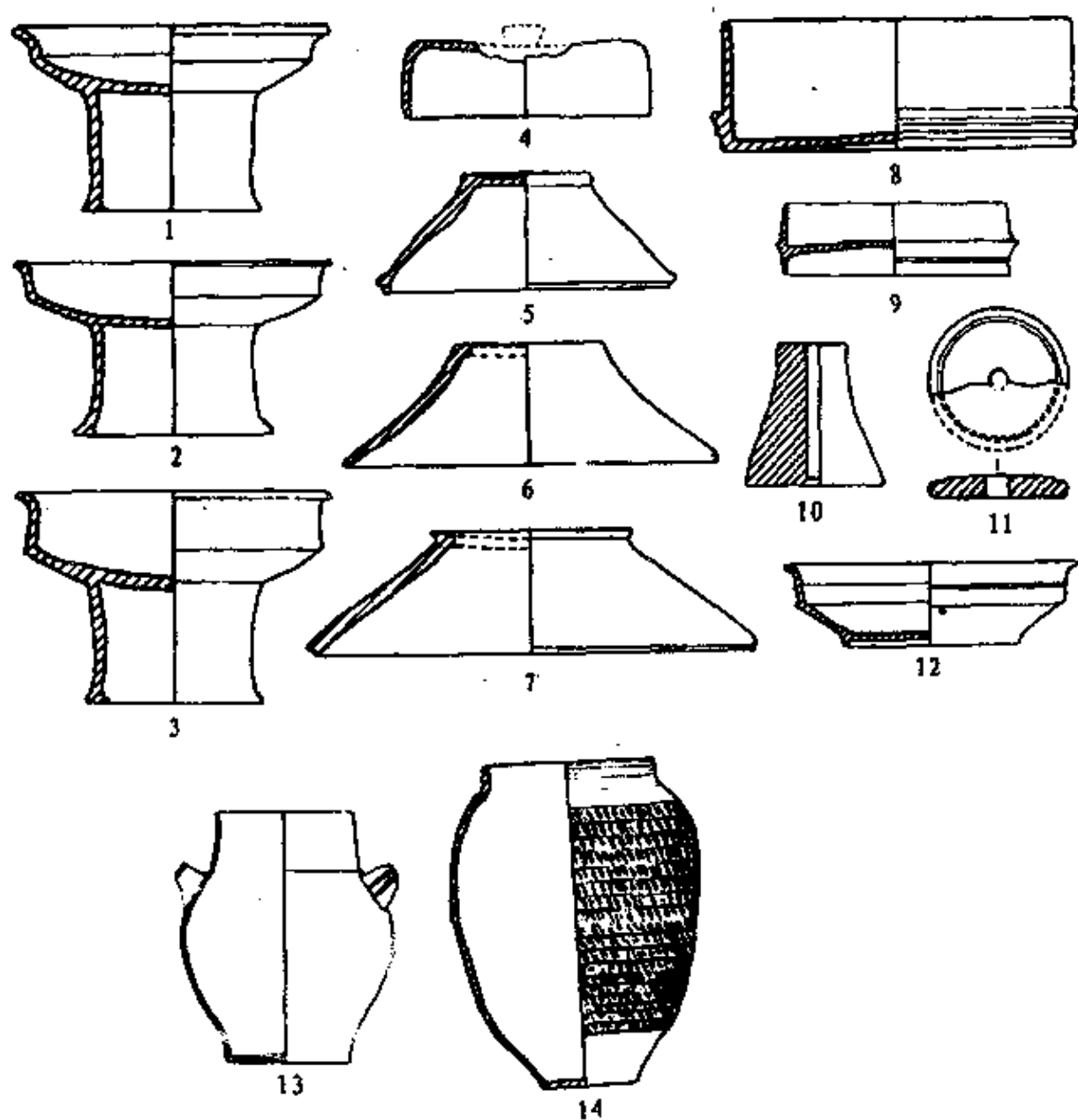
瓮 泥质陶较多,夹砂陶多夹细砂。分二型:

A型:子母口。窄肩,鼓腹,小平底。H16:26,泥质黑褐陶,局部呈红褐色。方唇,直颈,斜肩,肩腹之间有一对小横耳,肩下有一对大横耳,腹部饰四周凸棱纹。口径42、底径19、高63厘米(图九,2)。

B型:方唇,短颈,窄肩,深腹,小平底。H16:25,夹细砂红褐陶。微侈口,束颈,深弧腹。唇面和沿面均有凹槽,腹饰凹弦纹及竖篮纹,器形不规整。口径23.5、底径12.8、高44.5厘米(图八,14)。

壶 H16:29,泥质红褐陶。直口,溜肩,深鼓腹,凹底,肩部有一对小横耳。口径9.2、底径8.2、高17厘米(图八,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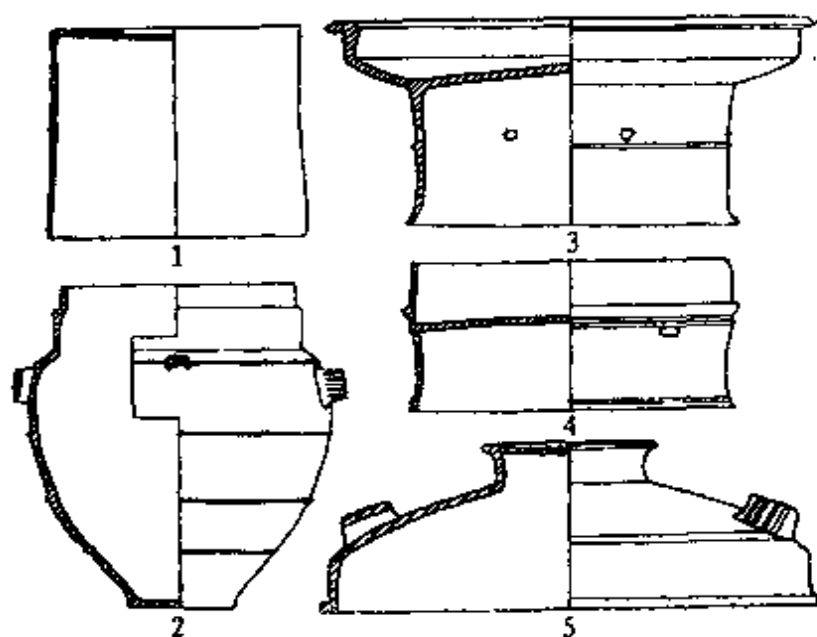
圈足盘 采:006,泥质灰陶,局部呈灰褐色。尖圆唇,卷沿,浅折腹,粗高圈足。沿面有凹槽,盘底内凹,圈足饰凸棱一周和圆镂孔两对。口径44.5、底径29.6、高19.8厘米(图九,3)。



图八 龙山文化陶器

1. A型豆(H16:8) 2,3. B型豆(H16:3,4) 4. A型器盖(采:008) 5-7. C型器盖(采:004、H13:5、H8:4) 8,9. A、B型盒(H33:15、采:007) 10. 支脚(H16:10) 11. 纺轮(H8:1) 12. 碗(G18:18) 13. 釜(H16:29) 14. B型碗(H16:25) (9,10,12,13、3/20,14. 约 1/13, 余 3/10)

陶支脚 H16:10, 泥质灰褐陶。上小下大呈圆台状, 中部有一圆孔。顶径4.8、底径9.5、高9.5厘米(图八,10)。



图九 龙山文化陶器

1. B型器盖(H13:24) 2. A型瓮(H16:26) 3. 圈足盘(采:006) 4. B型盒(H16:27) 5. A型器盖(H10:4)(1.1/5, 1.1/20, 余 1/10)

纺轮 制作精致,正面中部鼓起,边缘有凸棱或凹槽,背面较平。H8:1,泥质黑陶,施红色陶衣。直径4.8厘米(图八,11)。

(二)骨、蚌、角、石器

共70余件。大部分器物表面光滑,器形以镞、锥为最多,还有凿、刀、戈形器、骨针、骨笄等。

骨镞 分三型:

A型:三棱形,通体磨光。H13:9,短镞,锋残。残长4.4厘米(图一〇,2)。

B型:横断面呈椭圆形,短镞,通体磨光。H16:16,器身细长,锋锐利。长7.8厘米(图一〇,3)。

C型:体短小,平面近菱形。TG1⑧:3,锋残,镞身断面呈圆角长方形,圆锥镞。长4.7厘米(图一〇,4)。

骨锥 分四型:

A型:扁平体,通体磨制光滑。

H16:10,尖锋锐利。长4.9厘米(图一〇,5)。

B型:利用骨管一端磨出斜刃。G18:9,断面三棱形,体长略弯曲,顶残。残长7.75厘米(图一〇,6)。

C型:动物肢骨切割后,稍加刮磨整形,精磨刃部,锋细长而锐利。G18:10,中部骨髓腔较深,下部剖面呈半圆形。长11.3厘米(图一〇,7)。

D型:锥体近三棱形,器形较大。TG13:2用动物肢骨磨制,锥身两面磨制较好,一面保留有髓腔,锋部圆钝,顶残。残长18.2厘米(图一〇,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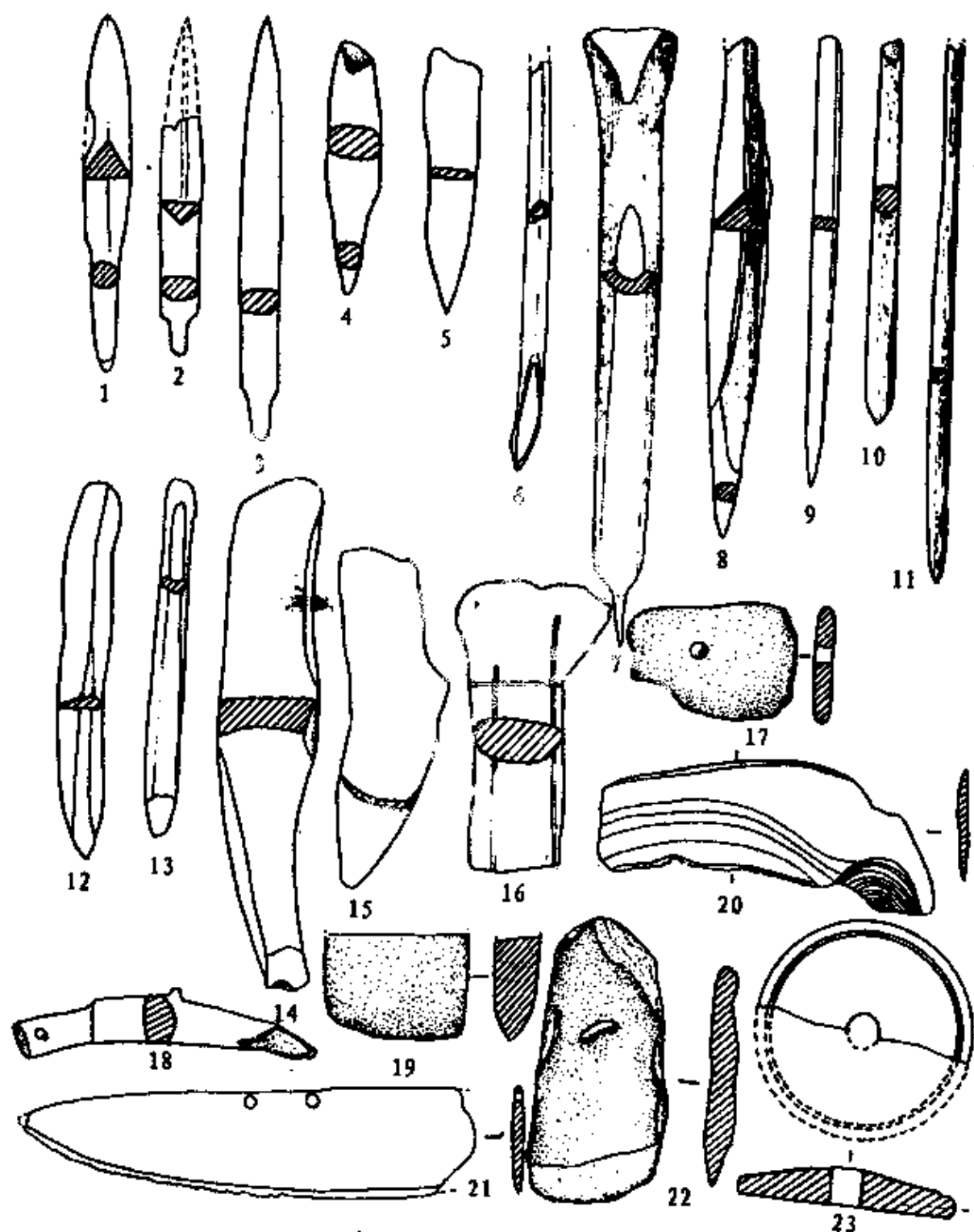
骨凿 将动物的长骨劈开磨制而成,长条形,单面刃。H47:2,一面有凹槽,通体磨光,长13.2厘米(图一〇,13)。TG(13):1,顶端较宽,刃端较窄,平刃,刃部有崩痕。长9.4、宽0.7~1.8厘米(图一〇,14)。

骨针 G28:1,扁圆体,器身较长、较粗,扁平顶,穿孔已残。长10厘米(图一〇,11)。

骨笄 TG1⑨:2,用扁条形骨片磨制,横断面近长方形,平顶,锐尖,长8.2厘米(图一〇,9)。H82:1,圆柱体,呈米黄色,通体磨制精细,一端较粗,一端残,残长7.1厘米(图一〇,10)。

蚌刀(镰) G18:1,蚌刀,器身较长,一端较宽,另一端较窄,弧刃,长12.4、宽3.8厘米(图一〇,15)。TG1小台基:1,蚌刀、镰两用器,以大蚌壳磨制,平面近新月形,两面刃,一面弧刃,锐利,一面刃近直,有锯齿,上有半圆残孔,长12.5、宽4.4、厚0.4厘米(图一〇,20)。TG1小台基:2,蚌镰,器形似剑形,一端残,直背,弧刃,刃部锯齿密集,锐利,近背部有二个圆孔,残长16.7厘米(图一〇,21)。

蚌锥 H13:7,近三棱形,尖锋锐利,背部有凹槽。长7厘米(图一〇,12)。



图一〇 龙山文化器物

1. 石镞(旁 I : 6) 2-4. A-C 型骨镞(H13: 9, H16: 16, TG1⑧: 3) 5-8. A-D 型骨镞(H16: 10, G18: 9, 10, TG⑨: 1) 9、10. 骨笄(TG1⑨: 2, H82: 1) 11. 骨针(G28: 1) 12. 蚌锥(H13: 7) 13、14. 骨凿(H47: 2, TG⑬: 1) 15. 蚌刀镞(G18: 1) 16. 鹿角器(G18: 2) 17. 石刀(采: 003) 18. 角戈形器(H8: 3) 19、22. 石斧(采: 010、002) 20、21. 蚌刀(TG1 小台基: 1, 2) 23. 石纺轮(采: 001)(8、13、15-17、9-23. 3/10, 余 3/5)

角戈形器 H8:3,系鹿角磨制而成。戈形,无栏,内部有叠,援狭长,前部有刃,刃残后又经磨制。长22.6、宽4厘米(图一〇,18)。

鹿角器 G18:2,呈长条形,上端经削磨,顶端较宽,偏上有一周凹槽,沿器身有两道磨蚀槽。长10.3、宽3.5~5.2厘米(图一〇,16)。

石纺轮 1件(采001)。花岗岩质,一面鼓起,另一面较平,缘边有一周凹弦纹。直径8厘米(图一〇,23)。

石镞 夯I:6,三棱锥形,圆锥铤。长6.4厘米(图一〇,1)。

双孔石刀 采:003,已残,为蚀变页岩磨制,扁平近圆角长方形,有两圆孔。因蚀变较甚,磨制痕迹不清。残长6.4、宽4.2厘米(图一〇,17)。

石斧 采:002,青褐色,平面近梯形,窄顶,斜弧刃,两面磨制,较钝,上有崩疤,长10.2、宽4厘米(图一〇,22)。采:010,顶残,玉白色,横断面呈椭圆形,弧刃,磨制精细、光滑,残长3.75、宽5.4厘米(图一〇,19)。

四、结语

通过对景阳冈遗址的钻探、试掘,主要有以下收获。

(一)城址

钻探、试掘结果证明,景阳冈遗址为龙山文化时代的一座城址。通过发掘,基本搞清了城址的范围、面积、城墙的宽度及结构。这是黄河流域目前已发现的龙山城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也是鲁西北地区科学发掘的第一座龙山文化城址。

(二)台基

经过钻探、试掘,证实该城圈内有大小两座台基遗址。大台基面积9万多平方米,小台基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两座台基分界明

显。由钻探、试掘情况可知,这两座台基系利用原自然沙丘在其上部及周围加工而成。这种布局在已发掘的龙山文化城址中尚属首例,为我们进一步了解龙山文化时代城内的布局提供了新资料。因试掘揭露面积较小,资料尚未系统整理,关于这两座台基的性质,目前尚难作出推断。

(三)文化性质

试掘资料表明,这一城址所包含的物质文化内涵相对较为单纯,除在表层发现一些魏晋以来的文化堆积、1979年于景阳冈村西南发掘1座属春秋墓外,^①主要属龙山文化时代的物质文化遗存,试掘所得实物资料大多是龙山文化的陶器及少量石、骨、蚌、器。陶器的基本组合及器物形制,与在平尚庄遗址^②出土的龙山文化同类器物较为接近,总体上属山东龙山文化范畴。但是,这里炊器以罐为主,鼎较少见,实足尖陶甗大量存在,并饰以麦粒状绳纹至足尖,以及陶器中方格纹占一定比例,这些特点与以往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子崖类型、尹家城类型存在着差异,与河南龙山文化后岗类型也有明显的不同。^③这里的龙山文化遗存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可能代表龙山文化一个新的地方类型,而时代上约相当于尹家城Ⅳ—Ⅵ段。^④

景阳冈龙山城址所处的鲁西北地区,正是中国古代东西文化交汇地带,它的发现为研究这一地区龙山文化的面貌,与中原龙山文化的关系乃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等问题,提供了新线索。

附记:先后参加发掘工作的有王守功、孙波、孙淮生、李曰训、靳桂云、李繁玲等,摄影王守功,插图由王占琴绘制。聊城地区文化局、阳谷县委、县政府对发掘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忱。

执笔者 李繁玲 孙淮生 吴明新

注 释

①刘善沂、孙淮生：《山东阳谷县景阳冈春秋墓》，《文博论集》，山东省出版总社聊城分社，1990年。

②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茌平尚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④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

原载《考古》1997年第5期

鲁西发现两组八座龙山文化城址

省考古所 聊城市文管会

去年 11 月,山东聊城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文物勘探队在配合阳谷县景阳冈公园工程的钻探中,探出一座大型龙山文化城址的城垣。12 月下旬,省、地、县文物考古人员对景阳冈龙山文化城的大型台址和阳谷、东阿、茌平 3 县的 7 处龙山文化遗址进行勘查,初步查明景阳冈龙山城大型台址的范围等情况,确认另外 7 处遗址全属龙山文化城址,加上景阳冈,共发现了 8 座龙山文化城址。它们成组分布,排列密集,在全国尚属首次发现。

这 8 座龙山城址可分南北两组。南组 3 城以景阳冈龙山城为中心。此城平面作扁椭圆形,东北至西南向,中部弧形凸出,两端较窄,城南北约 1150 米,北端约 230 米,南端约 330 米,城中部最宽处约 400 米,全城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在东北角和东墙南端,依水渠壁刮出的断面上,均显示出夏代城垣、龙山文化晚期和早期城垣互相叠压的层位,因地下水位高,探不到底,城垣高度不详。城内中部有大、小两座台址,大台址也作扁椭圆形,方向与城一致,南北长约 520 米,北、南两端宽约 175 米,中部因景阳冈村所压,宽度不详,估计宽 200 余米,台址范围近 10 万平方米。从一些断面考察,此台址非一次形成,开始时台址范围稍小,逐步扩大,至夏代规模最大。台址主要用纯净黄褐面沙土筑成,也有用龙山时期堆积堆筑现象,后者时代当主要属于夏代。据当地老者称,1964 年以前,此台仍高耸于地面,由西南向东北倾斜。1969 - 1974 年,由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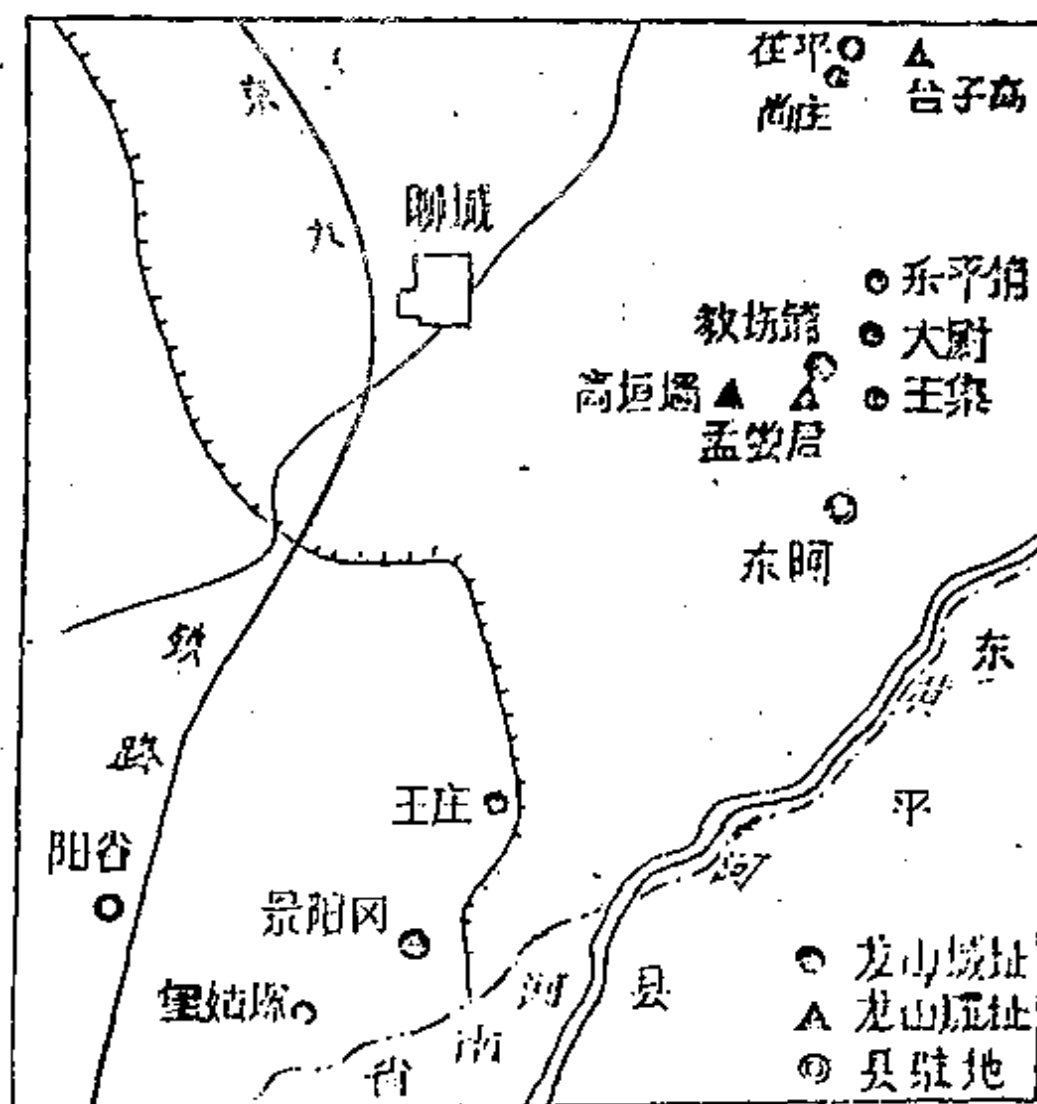
向西不断挖土,景阳冈村也随地面土台的缩小而向西扩展,1976年在台西部大规模挖土填沟凹,削平西部台址。80年代又在西南部大量挖沙,致使台址的地面部分几乎全部消失,目前尚残留着台面的仅有西南部和中部作为武松庙台基部分,约数百平方米。从武松庙台基东崖可见上部有四层活动面,此处所显露的台址,加上地面部分的台址共高4.5米,尚不到台底,估计此处台高约6米。武松庙后有大型台基,全用纯净黄沙土筑成。最近因建景阳冈公园在台址上挖南北向的大沟,在沟的断面上可见此台基早期的台面仍在现地表下,估计台基下层的台面仍基本保存,被挖掉的只是上部的活动面。从村西南残存的台基断面上,可见六七层以上的活动面,下层活动面属龙山文化时期,中层属于夏代,上层约属东周。小台在大台北端,东西向,东西约130米,南北约60米,大、小台之间相距15米。台址以外到城垣有丰富的文化堆积,大都深埋于地表2米以下。

景阳冈龙山城东北10公里有王庄龙山城。此城城垣东南角被东周阿城东南角所压,早期城垣用纯净黄褐面沙土筑成,被龙山文化初期的灰坑打破。由于黄河淤积厚达2.3米以上,地下水位离地表仅1.8米,无法深探,城的范围不详,估计是座小城。景阳冈西南8公里有皇姑冢龙山城,此城作东北至西南向,南北约400余米,东西约150米,面积约6万平方米,城内有夯筑台址。

北组5城,即在平教场铺、大尉、乐平铺、尚庄和东阿王集龙山城。以茌平县南20公里的教场铺龙山城为中心,此城东西向,东西长约1100米,南北宽约300米,面积达33万平方米,实际面积可能更大些。城内有东、西两台址。东台东西约100米,南北约160米,面积约1.6万平方米。西台东西约880米,面积达14万余平方米,东、西台相隔70米。探测城东垣宽约30米,西部10余米由纯净黄面沙土筑成,属龙山时期,东部由文化土筑成,夯土坚实,当

属夏商时期。城内还发现大量商文化陶片及大汶口文化陶片。

教场铺龙山城东北3公里,有大尉龙山城。此城因挖沙已遭严重破坏,城内台址三分之二已被挖掉,仅残存南部的一小部分。在台的东北方和北偏西因挖沙形成的断崖上,可见龙山城垣。城面积约3万平方米。教场铺龙城北偏东6公里,是乐平铺(卅里铺)龙山城,城垣范围清楚,平面近方形,东西约200米,南北约170米,面积3万余平方米。教场铺龙山城以北19公里余为尚庄龙山城,城北垣较直,西、南垣不规则,面积近4万平方米。70年代曾2次试掘,下层有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教场铺东北21公里处有台



子高龙山文化遗址。地面有高大堞堆,这次虽未勘查证实,肯定也是座龙山城。教场铺龙山城东南约 4 公里,为东阿王集龙山城。城作东北至西南向。南北 320 米,东西 120 米,面积约 38000 平方米。西南 2.5 公里处有孟尝君龙山文化遗址,地面仍有堞堆,也可肯定是座龙山城。

这 8 座龙山城,除阳谷王庄和东阿王集龙山城以外,原来都是作为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龙山文化遗址,目前除对景阳冈龙山城的城垣和台址有一定的了解外,其余均仅作确认及了解大体范围,个别的甚至连范围也未弄清楚。尽管如此,龙山城成组地出现,组群中有一座大型的中心城址,中心城址内有大型的台址,这在全国属首次发现,而且地处冀鲁豫交汇地区这一古史发展极为重要的舞台,对探讨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冀鲁豫地区的文化区系和古文化、古城、古国等课题,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景阳冈龙山城址考古有重要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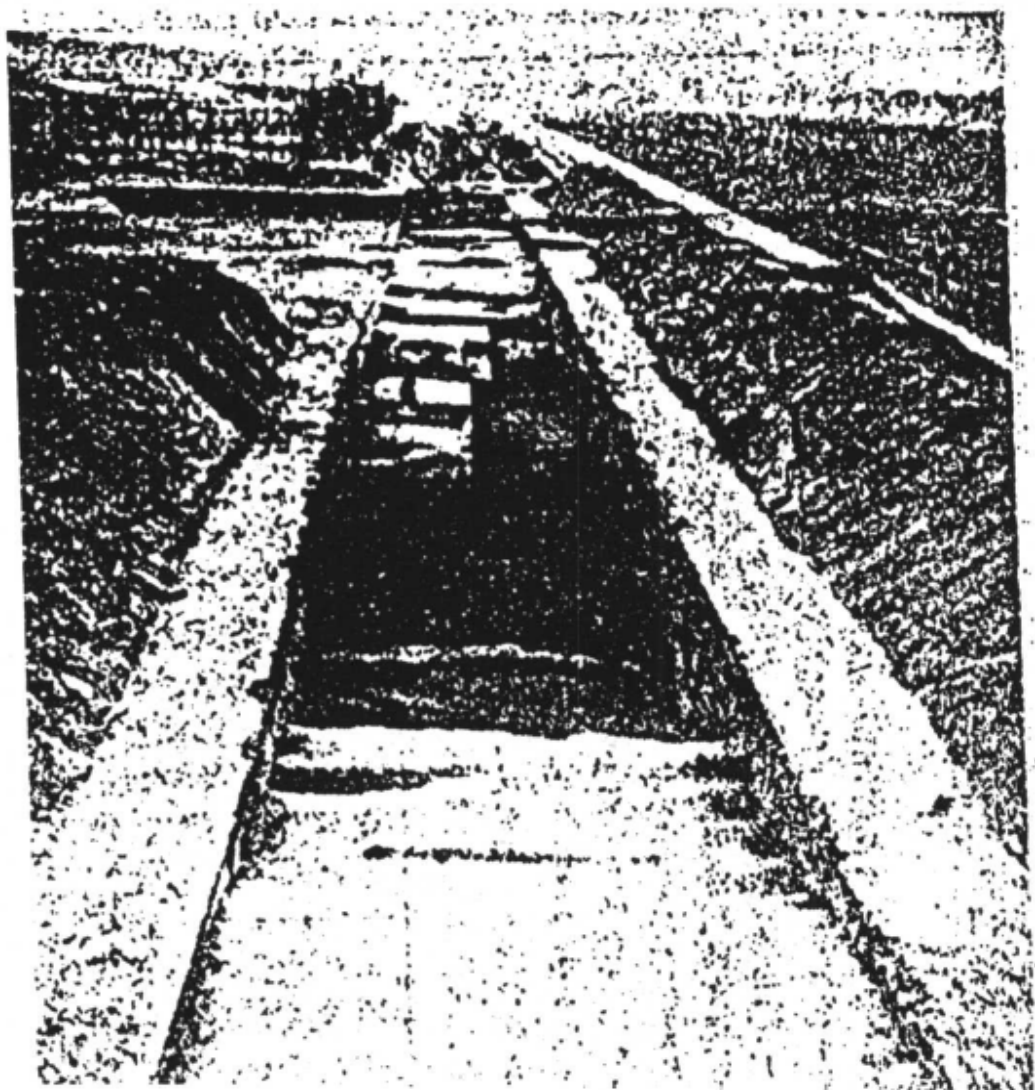
王守功

自 1994 年秋季以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聊城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阳谷县景阳冈龙山文化古城址进行了调查、钻探、试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

景阳冈遗址发现于 1973 年,1978 年被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 年,阳谷县在遗址西部修建公园,破坏了西北部城墙。聊城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得知情况后,对遗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钻探,发现这是一处龙山时代城址。城址平面作弧边长方形,东北西南向,长 1200、宽 300~400 米,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同年冬,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聊城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再次对其进行钻探、试掘,进一步了解了城址的性质,并在城内发现大、小两个台基。大台基位于南部,面积约 9 万平方米,小台基在北面,面积约 1 万平方米。两个台基的形状、方向均与城址一致。

1995 年秋,为解决大、小台基的关系及其修筑方式,考古工作者在它们之间开长 55、宽 4 米探沟一条。探沟南部去掉耕土层即为大台基边沿;小台基埋藏较深,在探沟北侧,表面距地表 1 米左右。两台基相距约 15 米。在小台基南部发现三次增修的夯土,第一次修筑紧贴小台基南坡,与其下小台基南坡之间夹杂一层黑灰土。第二次修筑位于第一次修筑的南部,它们之间也夹杂一层黑灰土和淤沙,夯土厚约 1 米,夯层约 0.1 米,层面清晰,圆棍夯,夯窝直径 3~5 厘米。第三次修筑位于第二次修筑的南侧,现暴露部

分厚约2、宽8米,为板筑分块夯成,夯面清楚,夯窝明显,直径3~7厘米。在第二次修筑夯土下面发现一人头骨,顶部被打破,保留一个大洞,或为奠基遗存。小台基南侧的三次修筑,显然是加固扩大小台基而形成的。在小台基上清理的一批龙山文化灰坑中,8号与13号灰坑东西相连,在8号坑底部发现一堆羊、狗头骨及狗的前、后肢骨,13号坑内有一具比较完整的狗骨架,它们的北部有一长方形活动面,表明古人或许在此进行过祭祀活动。另外,还有16号坑内发现6个泥质红褐陶豆,无使用痕迹,似为明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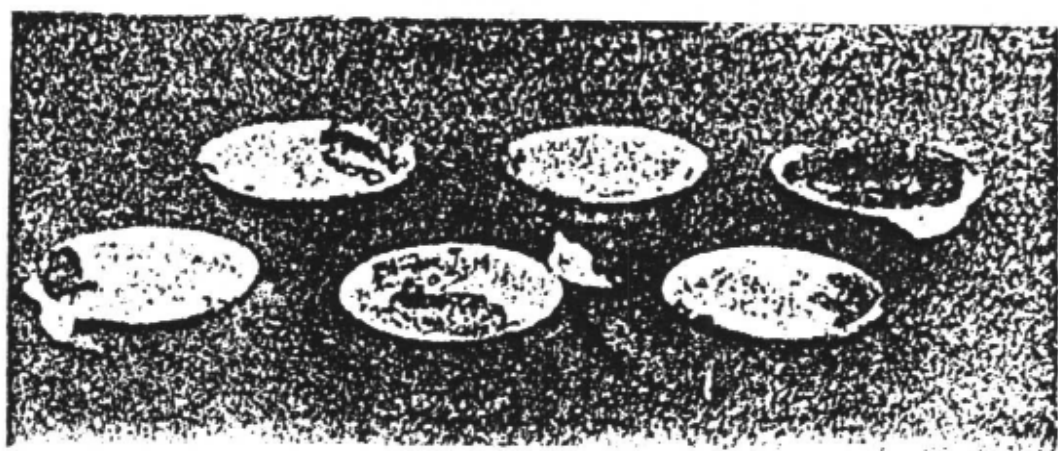


大小台基结合部位照片

为进一步了解大、小台基与城墙的关系及小台基的结构,考古工作者清理了景阳冈公园护沟剖面 350 米(护沟深 3 米以下出水,未到底),又在小台基中部揭露面积 200 平方米。通过剖面及发掘,可以观察到大、小台基与城墙是同时的,并且小台基在当时并非一个平面。护沟内的剖面显示,小台基的表面要比探沟内的小台基面低 1 米多,而探沟内的小台基面比小台基中部表面低 0.8~1 米左右。至于小台基是斜坡状还是台阶状,尚需进一步工作。

此次发掘主要是围绕解决小台基性质而进行的。早在 1979 年,聊城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小台基中部龙山文化灰坑中清理出一具完整的牛骨架和 30 余件陶器。与这次发掘的材料相印证,说明祭祀活动可能是小台基的一个重要功能。

阳谷县地处鲁西北平原,是中国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区。这次发掘出土的龙山文化遗物具有明显的地方特征。在陶器中,以灰陶为主,黑陶较少,红褐陶占有一定比例;纹饰以素面为主,有较多的篮纹、绳纹、方格纹;器类以盆、罐、豆、盒、甗、瓮为常见,鼎、鬲较少,以罐作为主要炊器之一,陶甗甗部饰篮纹,鬲部饰绳纹,具有许多异于典型龙山文化的特点。上述特征显示这个地区的文化



出土器物照片

面貌既与鲁北地区龙山文化城子崖类型有一定差异,更与中原龙山文化不同,但与它们存在密切的联系,似乎代表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

景阳冈龙山文化城址是鲁西北地区发现最早的古城址,其规模大,规格高,在全国亦属罕见。城内大、小台基布局清楚,又在小台基上发现了祭祀遗存,这些都为研究龙山时代城市结构、功能及社会形态提出了课题和线索。一部分龙山文化遗迹、遗物的发现为该地区文化区系的研究提供了依据,进而为中原与海岱文化区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东阿前赵龙山文化遗址

孙淮生

1996年12月10日,聊城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东阿化工厂新征地进行文物勘探时,发现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迹。为了解遗迹情况,我们对该遗址进行了勘探。经三天时间,便找出了遗迹的大体范围(因大部分属征地范围之外,未做深入的勘探工作),由此对遗址有了大体了解。简叙如下:

一、遗址位置、形状、文化堆积

前赵龙山文化遗址位于东阿(城关镇)化工厂的东北角至前赵村西头的土地上。遗址中间微微隆起,其东南面有一条东北西南凹状带,应是近遗址的古河道。

前赵龙山文化遗址平面呈舟形,中间宽两端窄。已知长约119米(化工厂占压的不包括在内,下同)。中间宽140米,西南端宽约90米,东北端宽约80。总面积约在5.3万余平方米。遗址的西南端由于被化工厂所占压,其折角和边的形状尚不清楚。初步勘探发现遗址中部边缘部位,均有30米左右的断口,两边断口比较对称,可能是出入的道路口。遗址的东北角为弧角(或称圆角)。有围墙、墙外有濠沟,宽度均8米左右,墙土坚硬,上层用灰褐色遗址土夯筑而成,下层黄褐色,夹杂大灰土块。墙已探知高4.2米,估计实际高度远超过4.2米,在遗址的西南部边墙2.7米下,发现一块春秋时期的陶片、陶片下即是用小棍夯的坚硬墙土。夯窝清

晰,径在0.35厘米。说明前赵遗址从龙山文化时期建的围墙一直沿续到春秋时期仍在使用。

遗址中间文化堆积距地表较浅,0.5米下就见灰褐色土,并夹有草木灰和商周、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片。0.9米下见深灰色土。草木灰量大,质地松软,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片较多,至2.2米见纯净的黄沙。遗址的四周文化层较深,距地表2.3~3.7米。上部被黄河淤积叠压,文化层厚2~3.3米,可分两大层,上层为商周层,文化堆积薄,包含物较下层少,并有极少量的岳石文化陶盆片。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堆积较厚,包含物丰富,采集标本有罐、盆、瓮等陶片。

八十年代中期,当地群众曾从遗址中间挖坑取沙。发现许多叠压的墓葬,多数是石砌和砖砌汉墓。其中一个墓出土了铜镜、釉陶罐、陶灶、甑、灰陶罐等几十件器物。铜镜流失,釉陶罐已损,其余的仍在群众家中收藏。

二、遗址特点

经过对前赵庄龙山文化遗址的初步勘探。我们大体了解了遗址的形状、面积和文化堆积情况。通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我们认为该遗址有以下几个特点:

1、居住特点

该遗址呈东北、西南方向较长的长方形。它应与西南至东北流向的河流有关。中国史前人居住地,一般是选择向阳、高坡、近水的地方。向阳为了取暖;住在高地,这对洪荒时代的人们是十分必要的。洪水的凶猛,时刻威胁着居住在平原上的人们,他们不得不奔至高地,以避洪水的侵害。《史记·五帝本纪》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大禹治水的故事更生动具体地说明了当时情况。人们虽然怕洪水,但生活中是离不开水的。前赵庄龙山文化时期的人类就

是沿河而居的。这条古河道很可能就是古济水。济水起源于河南王屋山,流经菏泽、甄城、阳谷、东阿、济阳北上注入渤海。这条古河道积满了砂。沿这条古河道,我市发现了几十处史前遗址,每处遗址的下面均为黄沙。黄沙上面长期居住形成了“居丘”。

2、路口特点

赵庄遗址中间部位的两个边缘,有 30 米左右宽的缺口南北相对应,很象是一个出入口,并有濠沟和围墙,这就为我们研究一般遗址是否有围墙提供了新线索。其它遗址(不包括城址)还没有发现围墙和门。围墙的结构情况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但该遗址出现的濠沟与路口是不能忽视的。

3、文化堆积特点

前赵庄龙山文化遗址的堆积呈斜坡状,中间高四周低。四周文化层比中间要厚得多。尤其南半部,房址分布比较密集。文化层中的包含物多为龙山文化中晚期遗物,罐的数量较大,陶片多灰陶,磨光黑陶少见,夹皮陶占一定比例。纹饰以绳纹为主,堆积可分为两个地层。商周阶段浅灰土,出土绳纹罐片等。文化层厚约 0.35 米,堆积比较薄,包含物不太丰富。龙山文化时期深灰色土。出土灰陶盆、罐、瓮等陶片。堆积厚达 1.2~2.3 米,包含物比较丰富,还探出房址。说明龙山文化阶段居住时间比较长,而且人们生活也较为富裕。遗址中出现的汉墓,证明该遗址远在汉以前就荒废,无人居住了。所以两汉时期成为墓地。

三、与周围同时期遗址的关系

1995 年元月,在我区茌平、阳谷、东阿发现的八座龙山文化城址分为南北两组,南组以景阳冈龙山文化城为中心,北组以茌平教场铺龙山文化古城为中心。东阿的王集龙山文化城址从属于教场铺而位于它的南端。材料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纷纷撰

文探讨。有的学者认为是“文明社会的标志,‘都’、‘邑’、‘居’社会制度的体现”。前赵庄龙山文化遗址南距景阳冈甚远,不会属于景阳冈龙山文化城的“居”,但北距王集龙山文化城仅3.5公里,当属于北组教场铺“都”城的“居”或“邑”,也更应属于王集“邑”下的“居”无疑。这样就为当时发现两组八座龙山文化城有“都”、“邑”而无“居”的社会结构形式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赵庄龙山文化遗址是我区近年发现的史前遗址中较为重要的一处,它是东阿县发现的第九处史前遗址,也是东阿县发现的最大一处龙山文化遗址。因为这座遗址从属关系明确,文化堆积较厚,内涵丰富,形状与结构极具特征,是探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社会产生、发展“都”、“邑”、“居”社会形态的珍贵史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

鲁西两座龙山文化城内 大小夯土台址的功能初探

孙淮生 王庆友

鲁西聊城地区发现的两组龙山文化城址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两组龙山文化城分别是：以阳谷景阳冈龙山城为中心，包括皇姑冢和王家庄龙山城的南组 3 城；以茌平教场铺为中心，包括茌平县的大尉，乐平铺、尚庄和东阿县王集龙山城的北组 5 城。这两组龙山文化城的中心城面积达 30~40 万平方米，周围小城的面积多数在 3~4 万平方米，稍大些的可达 6 万平方米。由于这两组龙山文化城各自分布范围都不太大，相对集中，因此很多学者认为阳谷、茌平这两个古文化中心，在龙山时代已形成“都、邑、聚”的金字塔形三级社会结构。张学海先生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主要观点体现在《鲁西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对几个古史问题的思考》（《华夏考古》1995 年第 4 期）和《试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文物》1996 年 12 期）等文章中。文中对这两组龙山文化城的特征做了概述。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景阳冈和教场铺这两个“中心城内都有一小一大的大型建筑台址，小台都居东，大台都在西”。关于这两个夯土台的功能，文中依据景阳冈的试掘情况推断“大台址应是大型宫室基址”，“小台应是座祭祀遗迹”。给了我们启迪，为推动对龙山城的研究，对鲁西龙山城大、小台址的功能做如下初探。

一、两座龙山城內大小夯土台址的概况

景阳冈龙山城內中部有大小两个夯土台址。大台是圆角扁长方形,方向与城平行,面积约9万平方米,从现有的西北面看,呈大漫坡形。从今仍保留着原高度的残台址地方,可看出台址的高度约5~6米,有多层台面,经过了多次的扩建、增高。小台在大台东北,两者相距15米,面积约1万平方米,呈东西向的圆角长方形,从试掘情况看,应与大台同时建成,同样经过多次扩建,形制为阶梯形,在台地和城垣之间,有文化堆积,但一般都在地表下2米多,多属早期遗存。

教场铺龙山城的面积约33万平方米,平面呈圆角横长方形。城內有大小两座大型夯筑台址,东西并立。小台临近东垣,面积约16000平方米,东部呈陡坡状与台东地面呈弧形连接。大台址在小台以西约70米,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由于挖沙取土等原因,目前两座龙山文化城的大小夯土台都遭到很大损坏,台面部分大多无存,故未能在台面上发现建筑遗迹。

二、大小夯土台功能的探讨

层位学的原理告诉我们,遗址的形成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我们考察事物的性质要用动态、全面、发展的观点进行研究,要与当时的社会性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地理环境等因素有机结合起来。

探讨大小夯土台的功能,一是要探讨这两个台址的最初功能,最初功能一般也是基本功能,第一需要。这就需要研究夯土台址与城垣早晚的关系。目前,由于工作有限,在这两城尚未发现明确的台址与城垣的打破、叠压关系。但在王家庄城址中,有清楚层位表明城址打破夯土,这为我们确定大小夯土台的始建时代早于城

垣提供了间接依据。鲁西地区地处黄河淤积平原,属低洼地带,从尚庄等遗址发现大量蚌器、贝壳等淡水动物,可以看出这一带在龙山时代气候比较温热,河湖较多,水患的威胁应比较严重。因此,为了生存的需要,人们选择居地肯定要选在地势较高,防潮的高岗上,正如《墨子·辞过》中言:“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室高,足以辟润湿。”从试掘看这些台址所处位置原为比较大的沙丘,相对较高,比较适宜人们居住。当人口相对比较集中时,为了团结起来,共同防御频繁战争和水患,人们便在夯土台的周围筑起了城墙,形成城垣。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多,人们只能不断扩建、垫高夯土台址。由此,我们推断夯土台的基本功能便是居住,其本身并不是生来就带有阶级色彩。

二是要探讨大夯土台和小夯土台址之间的关系。从勘探试掘的资料来看,之所以分成大小夯土台,一是夯土台的初始状态就是两个比较大的沙丘,自然分成两部分,为了防水和便于居住人们对其进行了加固平整;二是应与当时社会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发现的实物来看,这两处城址发现的最早陶片是大汶口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的晚期,社会生产关系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贫富分化已比较明显,大小夯土台的分立应是贫富分化的见证,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因此,笔者推断大夯土台应是占多数的一般平民的居住地,而小夯土台应是少数上层人士居住的“宫殿”和“官署”。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如果大夯土台是宫殿建筑,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是不适应的,大夯土台的面积达9~10万平方米,在当时人力、物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建筑如此大规模的宫殿很不现实,如与之相对照,战国时期的赵国邯郸宫城面积还不到2万平方米;其次如果大夯土台是宫殿建筑,那么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只有两个居住场所可供选择,一是居住到城外,二是城垣与夯土台之间的低洼地带。而当时修筑城垣的目的是为使人口相对集

中,共同对付频繁战争和水患的威胁,形成利益共同体,在普查钻探时城外也未发现有明显的同时代遗存,故多数平民居住在城外的可能性很小;如居住城垣与夯土台之间,由于地势低洼,经常积水,势必会受到水患和潮湿的威胁。因此,随着夯土台的不断扩大,其居住功能逐渐减弱、消失,故遗迹中中晚期遗存较少。因此,大夯土台应是广大平民的居住生活区。依前边推断,既然大夯土台为平民居住生活区,那么小夯土台应是上层的居住生活区,而并非单纯的祭祀遗迹。而推断小夯土台为祭祀遗迹的依据是在小夯土台的台阶上发现了不少祭祀用的羊、牛骨架、人头骨及规整的灰坑和大型的陶器,从而认为小台面上部应有大型的祭祀用的宗庙建筑。实际上,发现祭祀的遗物并不能说等于发现了祭祀遗迹。祭祀是宗教信仰的一种表现,按祭祀的对象大致分成祭天、祭地、祭祖等,这在古时是一种极其普通的社会现象。龙山时期发现的祭祀现象很多,如卜骨、祭牲等,因为祭祀是当时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寿光边线王龙山城墙的基槽内便发现有奠基祭祀用的猪、狗和人骨架,但我们决不能说城墙便是祭祀遗迹。因此,我们对发现的祭祀现象要客观分析,决不能人为夸大其作用,把一种日常的社会现象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综上分析,笔者认为小夯土台应是上层人士的居住生活区和官署区,是当时的政治中心。

三、夯土台址建筑发现的意义

鲁西这两座龙山文化城址的大小夯土台是人们“就陵阜而居”,并随着需要经过长期多次的垫土夯筑扩建而形成的建筑基址。虽然这两座城夯土台台面已被损坏掉,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他龙山城址的发现中看到这种高台建筑的影子。如在日照东海峪就发现了9座房基均为长方形的土台式建筑。这种房屋建筑的程

序是先分层筑起高于地面的台基座,并与四周修城漫坡状以利散水,然后在台基座上直接或挖槽起墙建房。这种采用了夯筑技术,由台基护坡、土墙和室内地基构成的房屋,在技术上已开后来中国台基式建筑的先河。鲁西这两座龙山夯土台址的施工技术与日照东海峪基本一致,只是使用得更广泛、更普遍。尤值得一提的是大小夯土台址的分立,不仅说明了当时社会的分化,也说明了人们已经重视讲究城址建设的规划和布局,如在景阳冈遗址试掘中台址上面发现了大批的方向比较一致的灰沟,可能是当时为排水而修的水沟。这说明鲁西龙山文化城房址的建筑技术已比较成熟,特别是这种台基式的建筑可以说成为后来高台建筑发展的雏形。从目前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河南二里头、湖北黄陂盘龙城及安阳小屯殷墟的大面积夯土建筑大致也是这种做法,因此,研究鲁西这两座龙山城大小台址的功能对于研究龙山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鲁西这两座龙山城内的夯土台的发现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建筑发展史,而且让我们看到了高台建筑形成和发展的一个轮廓。这种台基式建筑,在商、西周时期已比较普遍存在,在东周至秦汉时期经历了一个大发展时期,由于当时的木构技术水平低,为显示地位,多靠高台取得层叠巍峨的壮观效果。此外,还充分体现了它的防御性功能一居高临下,既便于了望,又利于防守,从而使高台建筑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具备了鲜明的阶级色彩。

东阿县出土一批战国陶器

刘玉新

1989年9月27日,东阿县图书馆在关山乡前关山村发现一批战国陶器,随即征集入馆。该批文物是村民在开山时破坏的一墓葬中出土的。由于墓葬破坏殆尽,无从考察。现仅将出土器物报道如下:

陶鼎:1件。釜形,有盖,子母口,附方形双耳,深腹,圜底,鼓腹,三兽蹄足,盖有等距三环形钮,腹有两道凸棱。口径20.5、腹径25.6、耳高8、足高16.5、通高26厘米。灰陶。

陶高柄盖豆:2件。形制一致。子母口,深腹圜底,高柄,上端略粗,喇叭形圈足。柄上中下有等距三组弦纹。盖为覆碗式,顶有圆提手。盘径15、足径15.2、圆提手口径9、通高39.5厘米。

陶高柄豆:3件。形制一致。其中一件残,无盘;一件盘与柄断接;一件完整。均为浅盘平底,柄细高,上端略粗,喇叭形圈足,柄上中下有等距三组弦纹。通高31、盘径18、足径14.1厘米。

陶匚:1件。瓢形,有流,小平底,无足,顶部口沿突起成尖状。高7、流长5、最大口径21.5厘米。

陶盘:1件。敞口、宽沿、方唇、浅盘,腹内收,平底稍凸,素面灰陶。高9.5、口径36.5、底径15.2厘米。

陶盖壶:2件。形制基本一致。口微侈,高领,圆肩鼓腹,贯底圈足,腹最大径略偏下,盖微隆,上有三个等距阶形方钮。领、肩、腹部有四组不相连的弦纹。通高28、口径14、最大腹径22.1厘米。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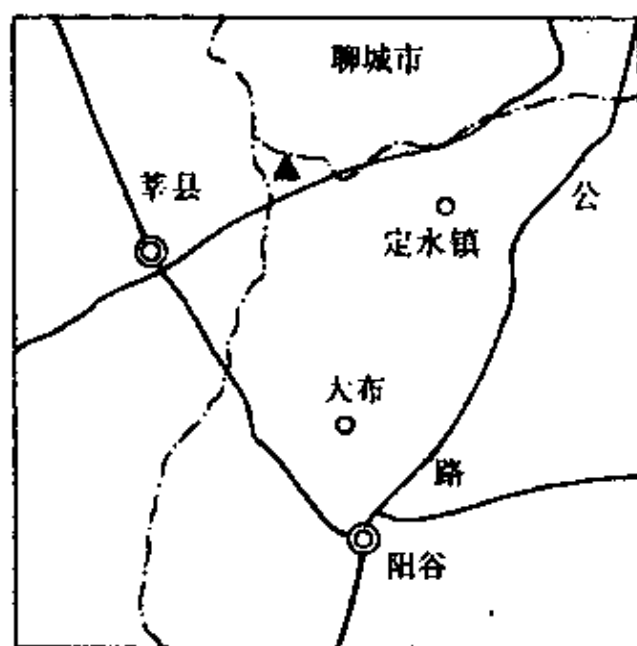
彩绘陶壶：2件，分二式。①：高领、侈口、方唇，圆肩鼓腹，贯底圈足，无盖，通身红色矿物质颜料彩绘云纹、弦纹、几何纹图案。高23.5、口径11.4、最大腹径18厘米。②侈口，短领，斜肩鼓腹，平底。器身饰墨色简易鸟形图案。领部及下腹部饰两道墨色弦纹。口残。高17.5、口径9.8、最大腹径12.2厘米。

以上器物，基本上以鼎、豆、盘、等组合，从器物形制及与已见报道的同类器物对照，鼎为深腹，壶的最大腹径偏下，似为战国早期，高柄豆、盖豆、盘、匜亦于山东阳信城关镇西北村战国墓出土器物基本相同，唯陶盖豆无彩绘之别。由此，初步分析认为该组器物的年代应为战国早期。

山东省阳谷县吴楼汉墓发掘简报

陈昆麟 孙淮生 吴明新 杨燕

墓葬位于山东省阳谷县定水镇吴楼村西北 0.5 公里,西距聊(城)莘(县)公路 1.5 公里(图一)。1997 年 8 月,吴楼砖窑厂取出时发现汉墓一座。聊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勘探,又发现砖窑墓葬 4 座,并对其中较大的 1 座(M1)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获得陶器、铜器、铁器及石、铅质器等文物。应该说明的是,该墓曾经被盗,扰乱严重,器物多残损,且在扰土中。有的器物陶片散落在甬道、前后回廊及西回廊。有的器物残片放在了甬道口券顶上,这给器物的复原组合、分析研究带来了诸多困难。



图一 吴楼汉墓位置示意图

一、墓葬结构

墓葬发现时,已遭部分破坏,地面以上尚存高 0.9 米的封土,封土略经夯打,夯层厚度不一,厚 0.12~0.2 米,但未见明显的夯窝。

该墓系一砖筑大型墓葬,平面布局呈“凸”字形,系在先挖好的土坑内以砖砌筑墓室。墓葬发掘时,砖室外土圻已大部分破坏,尺寸不详。砖筑墓室由甬道,两个墓室及回廊三部分构成,墓室南北全长 12.06 米,东西最宽处 9.56 米,方向 185 度(图二)。发掘时,墓室内均积满淤土。



图二 “长乐未央”瓦当拓本

甬道

位于墓葬南部偏东,与东墓室相对应。甬道平面呈长方形,分前后两部分。其前部分(外侧)南北长 4.2 米,连同墙体在内宽 2.24 米,墙体系用双砖错缝平砌,厚 0.34 米,墙体高 1.3 米。券顶,顶采用双层砖起券,甬道口处券砖为三层,其内顶高 2.02 米。底部一层铺地砖,铺地砖为错缝平铺形式。甬道口外原有墓道,已

遭破坏,近甬道口宽度同甬道宽,底呈斜坡状。甬道口以砖砌墙封堵,封门墙厚 0.32 米,残高 1.04 米。此外,甬道外口券砖之上还有单砖垒砌的砖墙,仅残存很少的部分(图四)。甬道后部亦为长方形,南北长 1.08 米,外观宽度与甬道前半部相等,但这一部分墙体加厚,使得室内空间变小。其顶部亦为券顶,高出前部券顶,用三层砖起券,室内高 2.07 米。底部一层铺地砖,铺地砖呈“人”字形。甬道前、后两部分相接处有一道砖墙封堵,墙厚 0.16 米,残高 0.77 米。甬道内出土鸡、狗等动物骨骼及陶壶,陶灶残片诸类遗物。甬道后端与前回廊相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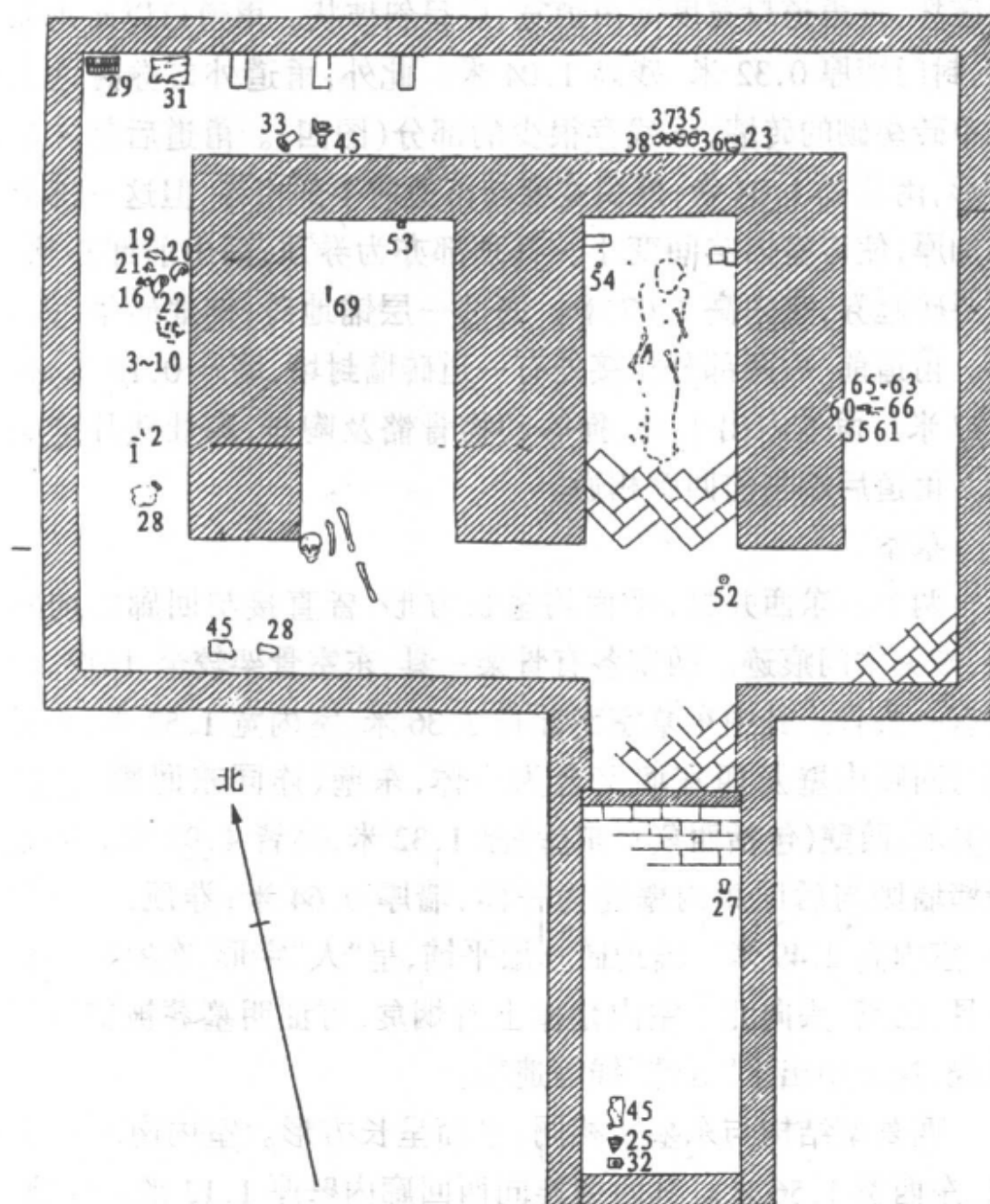
墓室

两个。东西并排,平面均呈长方形,皆直接与回廊的前廊连通,未见木门痕迹。两室各有骨架一具,东室骨架较全,已腐,西室仅有一头骨。其中东墓室南北长 3.36 米,室内宽 1.52 米,墓壁分别与回廊内壁及西室墙壁合为一体,东壁(连同东回廊内壁)厚 1.06 米;西壁(包括西墓室东壁)厚 1.32 米,高皆 1.92 米。墓室后壁堵墙则与后回廊内壁连为一体,墙厚 0.64 米;券顶,三层砖起券,室内高 2.49 米。铺地砖一层平铺,呈“人”字形,东室墓底骨架一具,已腐,头向北。室内墓壁上有烟炱,可证明墓葬被盗后又经焚烧,扰土中出土“五铢”钱等遗物。

西墓室结构与东墓室相同,平面呈长方形。室内南北长 3.34 米,东西宽 1.56 米。其西壁连同西回廊内壁厚 1.12 米。券顶,券砖三层。室内顶高 2.5 米。铺地砖一层平铺,呈“人”字形,于西墓室前端发现头骨一个及零散肢骨。室内发现铜铃等遗物(图三①)。

回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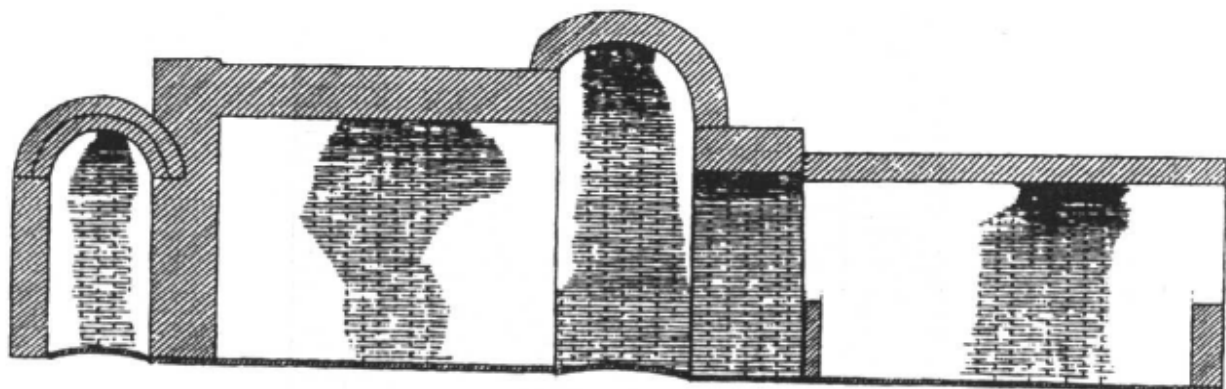
围绕墓室四周为回廊。四面回廊连通,其前廊分别与甬道及两个墓室相通,以回廊外墙壁内侧计算,四面回廊全长 31.12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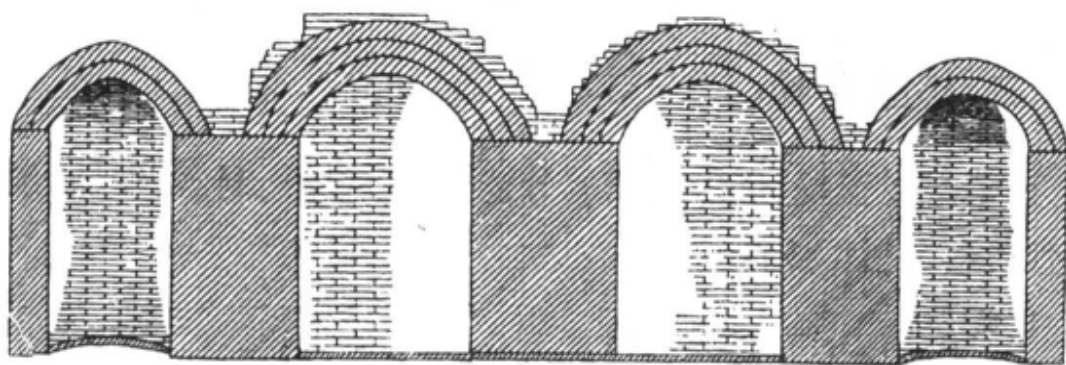
图三① 吴楼汉墓平面图

其中前、后回廊长度相等,分别为 8.84 米,左、右两侧回廊长度分别为 6.72 米。回廊外墙各面厚度相同,皆为 0.36 米;内侧墙壁则分别与墓室墙壁联为一体,已如前述。四面回廊室内宽度不一,以前廊最宽,室内宽 1.34 米;东西回廊室内宽度分别为 1.15、1.1 米;北回廊最窄,室内宽 1 米。回廊底部有一层铺地砖,铺地砖平

铺呈“人”字形,其前廊铺地砖之上还有一薄层石灰。各面回廊皆为券顶,都是两层砖起券,但高度不同,前廊室内高 3.6 米,其余三面回廊室内高度 2.12 米。另外,在前廊南壁上与西墓室宽度相同,高度则与甬道券顶高度相同,下部以砖封堵,成为墓壁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应是象征与西墓室对应的甬道。各面回廊清理前皆积满淤泥,清理中,前廊出土了铜镜及陶器碎片;后回廊发现有鼎、井、器盖等陶器;东回廊出土有铁剑及铜车马构件;西回廊则发现了人物俑及狗、鹅、猪、羊等动物陶俑。由于该墓早年被破坏、器物的具体出土位置已失去了原貌(图三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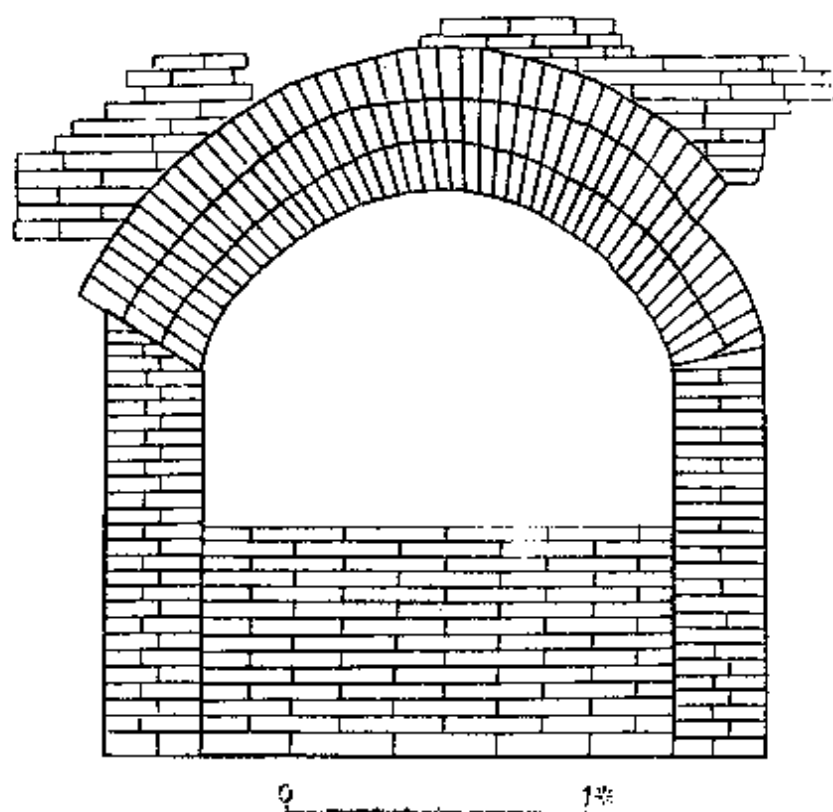
图三② 吴楼汉墓剖面图



图三③ MIB-B'剖面图

该墓葬虽经盗掘,墓葬结构保存仍然较好。墓葬各部分皆用

砖砌筑,且用砖一致,皆长方形青砖、长、宽、厚分别为 32、15、5 厘米左右,烧制火候较高。墓室各墙壁砌筑方法简单一致,都是错缝平砌,并以石灰粘合。墓葬各部分铺地砖高度略有不同,其甬道部分低于其余部分 5 厘米左右。



图四 甬道门正视

二、出土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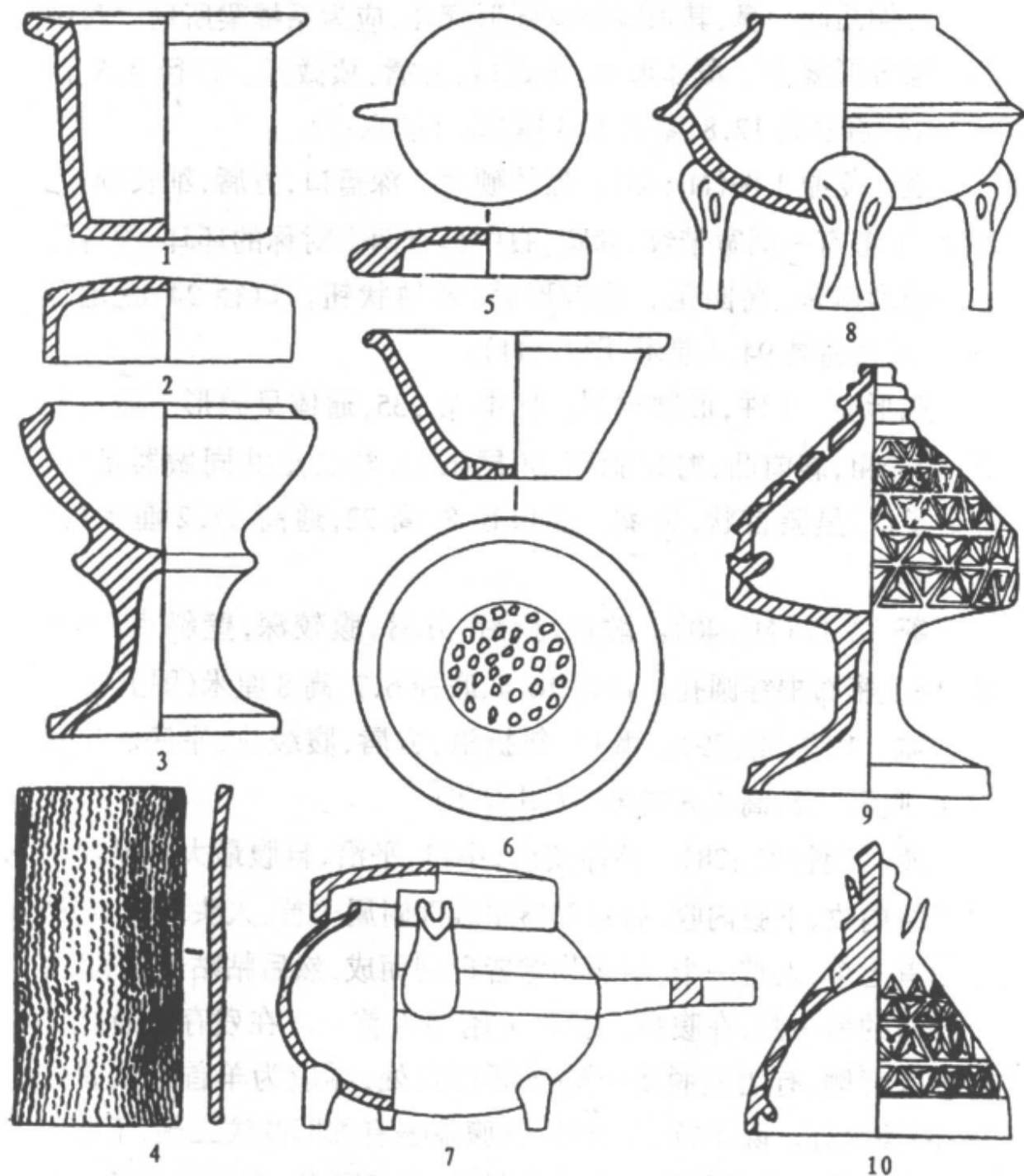
该墓虽经盗掘,仍出土了部分遗物,有陶器、铜器、铁器及铅、石、骨质器皿,计 85 件。

1、陶器

58 件。皆泥质灰陶,烧制火候高,器形有鼎、壶、盆、甑、薰炉、仓、灶、井、鸮形壶及器盖、俑等等。

鼎 1 件(M₁:23)。直口,圆唇,扁腹,腹中部外凸一扉棱,圆

底近平,三蹄状足,无耳。口径 10、通高 15.6 厘米(图六:1)。



图五 陶器

1. 井(M1:33) 2、5. 器盖(M1:49、48) 3、9. 薰炉(M1:24、25) 4. 板瓦(M1:51) 6. 甗(M1:40)
7. 蚕(M1:27) 8. 鼎(M1:23) 10. 薰炉盖(M1:26) (6为1/8,余为1/4)

盃 1件(M₁:27)。斂口、圓唇,扁圓腹,腹中部凸起寬帶一周,三矮柱狀足。實心雞首狀流,其頂部有小圓形穿孔;與流對應的另一側凸起一鼻,其頂端亦有圓形穿孔,應為系提梁所用。腹中部一扁方形鑿手。覆鉢形蓋,蓋直口,方唇,頂微弧。口徑 9.5、器高 12、帶蓋通高 12.8、鑿長 8.4 厘米。(圖六:7)

壺 復原 1 件(M₁:45)。器體碩大。深盤口,方唇,細長頸,頸部上、下各有一周寬帶紋;扁腹,腹中部有兩個對稱的環耳,並各銜一橢圓形陶環,高圈足。覆碗形蓋,禾穗狀鈕。口徑 24,圈足徑 23.2、帶蓋通高 94.4 厘米(圖六:11)。

鴛形壺 4 件,形制相同。標本 M₁:35,通體呈鴛形。壺口較直,頸較粗,腹前凸,略顯肥碩,鴛尾抵地,與二足共同微翹足用。壺蓋子口,呈鴛首狀,尖嘴。壺口徑 8、高 22,通高 27.2 厘米(圖六:10)。

甑 1 件(M₁:40)。敞口,折沿,方唇,腹較深,壁斜直,小平底,底上密布棍穿圓孔。口徑 16.4、底徑 6.7、高 8 厘米(圖五:6)

盆 1 件(M₁:39)。敞口,斜折沿,方唇,腹緩收,平底。口徑 14.6、底徑 7.6、高 5.6 厘米。(圖六:6)

瓶 1 件(M₁:23)。整體變形,小口,平沿,自腹最大徑至肩部呈三級內收,下腹內收,肩腹部器壁表面附屬羊首,人頭塑像,現殘存羊首七個,人首一個,附屬物像皆捏制而成,然後粘貼于器表,與其相對的另一側,在腹最大徑之上附屬人首一。在殘存羊首之間空隙及背側,有明显脫落痕迹或斷口六處,亦應為羊首或人首脫落、斷掉之處。除羊首、人首外,上腹器表有細凹弦紋二周,下腹有繩勒痕一周。器整體表面施以白粉地,多已脫落;下腹有朱色彩繪痕迹,依稀可辨紋樣為連弧及三角紋。口徑 9、底徑 28、高 34 厘米(圖七:10)。此外,出土器蓋中,有一件陶質,陶色皆與此瓶同,其

大小扣于瓶口亦正合适,或即为该瓶之盖。(图六:7)

薰炉 4件。各不相同。标本 $M_1:24$,炉身似豆,子口,圆唇、深腹;柄较粗,上部有一周凸棱、喇叭状圈足。口径 12.8、足径 12.4、高 18 厘米。(图五:3)标本 $M_1:25$,炉身似浅盘形,盖面呈折腹状,子母口,圆唇,浅腹,圈底近平;细短柄,喇叭状圈足。盖上分刻四层三角形,刻痕较深且规整,其上部三层每一三角形中心皆用棍穿一圆孔,最下一层及炉身表面仅刻出三角形,中心无穿孔。口径 15、圈足径 13,通高 24 厘米。(图五:9)标本 $M_1:34$,残存上部,略呈桃形,尖顶,壁斜直,其上镂刻三角形镂孔,下部残存空心柄。残高 25 厘米。(图六:9)标本 $M_1:6$,仅存盖,盖较高,禾穗状钮,母口。其上镂刻四层三角形,每一三角形中心各有棍穿小圆孔一个。口径 14.2、高 15.6 厘米。(图五: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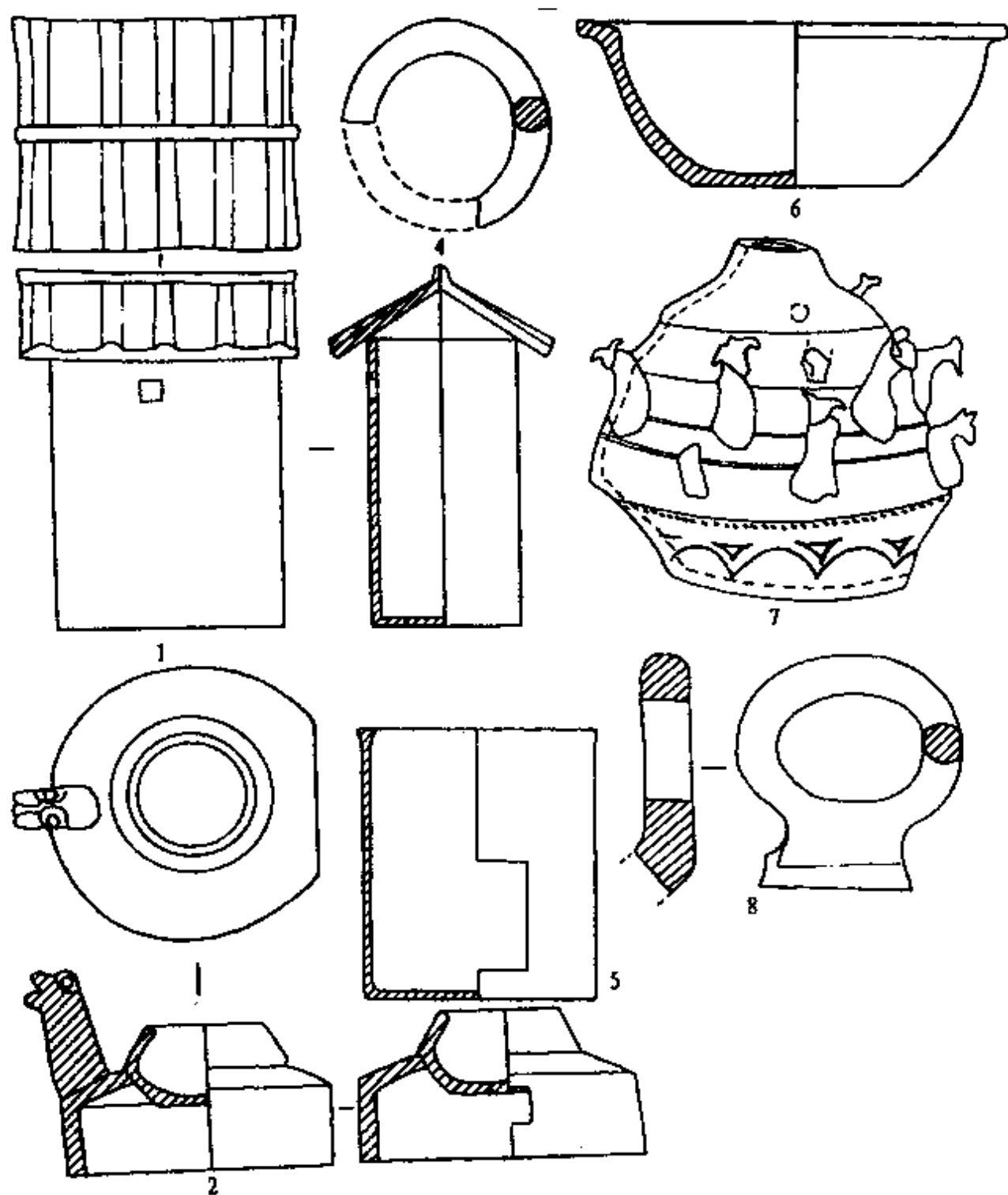
仓 3件,其中两件形制基本相同。标本 $M_1:29$,长方体,正面上部一小方形仓窗;两面坡式顶,顶中部起脊,有稀疏的瓦垅。仓体长 32、宽 21、高 39 厘米,通高 51 厘米。(图七:1)标本 $M_1:31$,长方形,正面下部一长方形孔,缺顶。长 31.2、宽 24.5、高 37.2 厘米。(图六: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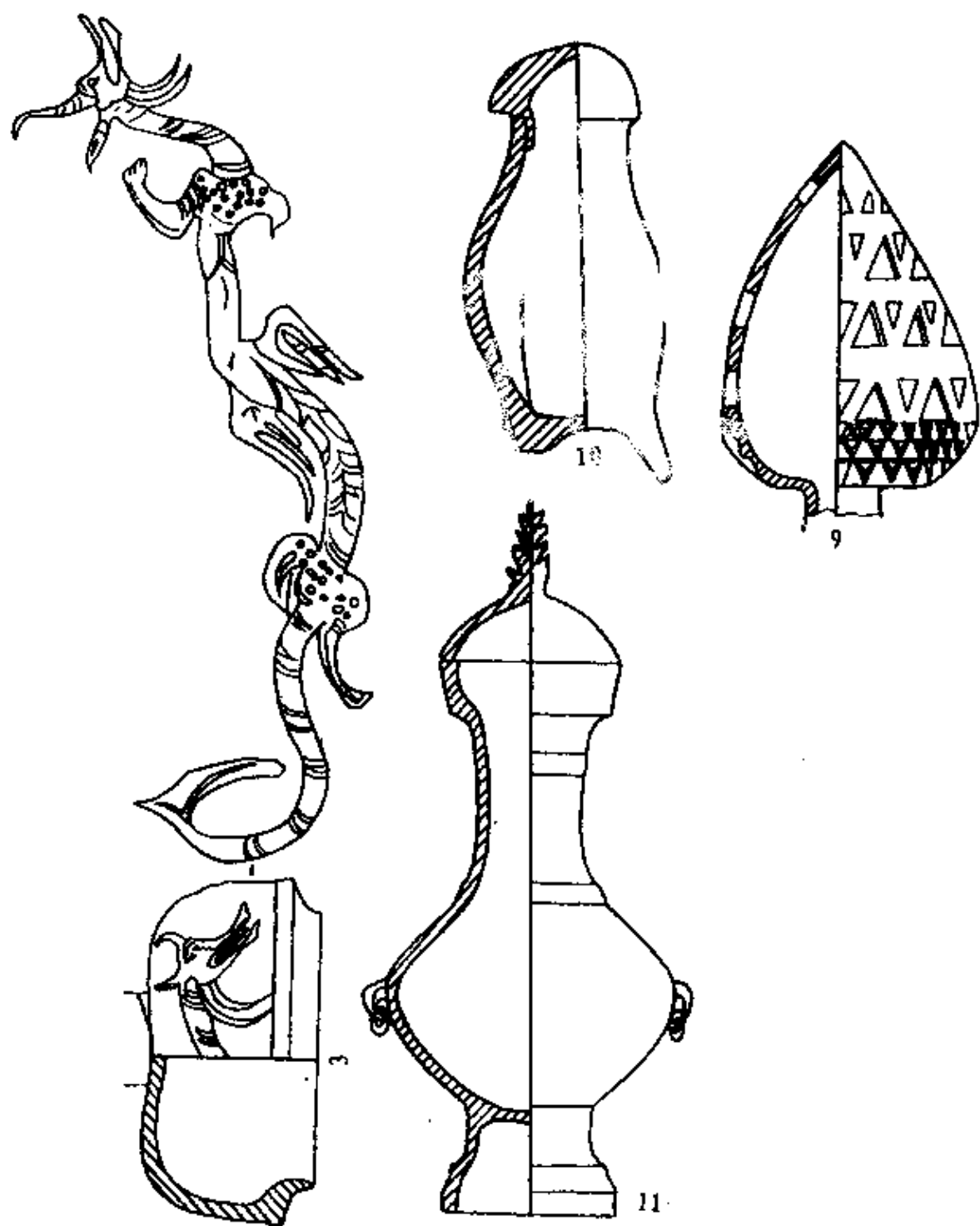
灶 1件($M_1:32$),灶平面圆形,中部略高,一圆形火眼,其上置折腹罐一个,火门方形,魁首柱状烟筒,实心无烟道。灶直径 19.2、高 7.2、烟筒高 7.5 厘米;罐、敛口,圆唇,折腹,平底。口径 8、底径 6.5、高 5.2 厘米。(图六:2)

井 1件。($M_1:33$)圆桶状,直口,宽折沿,方唇,桶状腹,平底。口径 15、底径 10、高 12 厘米。(图五:1)

器盖 7件。其中 3件,禾穗状钮,形同 $M_1:45$ 壶盖;1件呈鸛首形,同鸛形壶盖。标本 $M_1:44$,子口,圆唇,口部凸起一宽带,顶面内凹,捉手脱落,有明显痕迹,盖带刻划一带翼龙纹。口径 9、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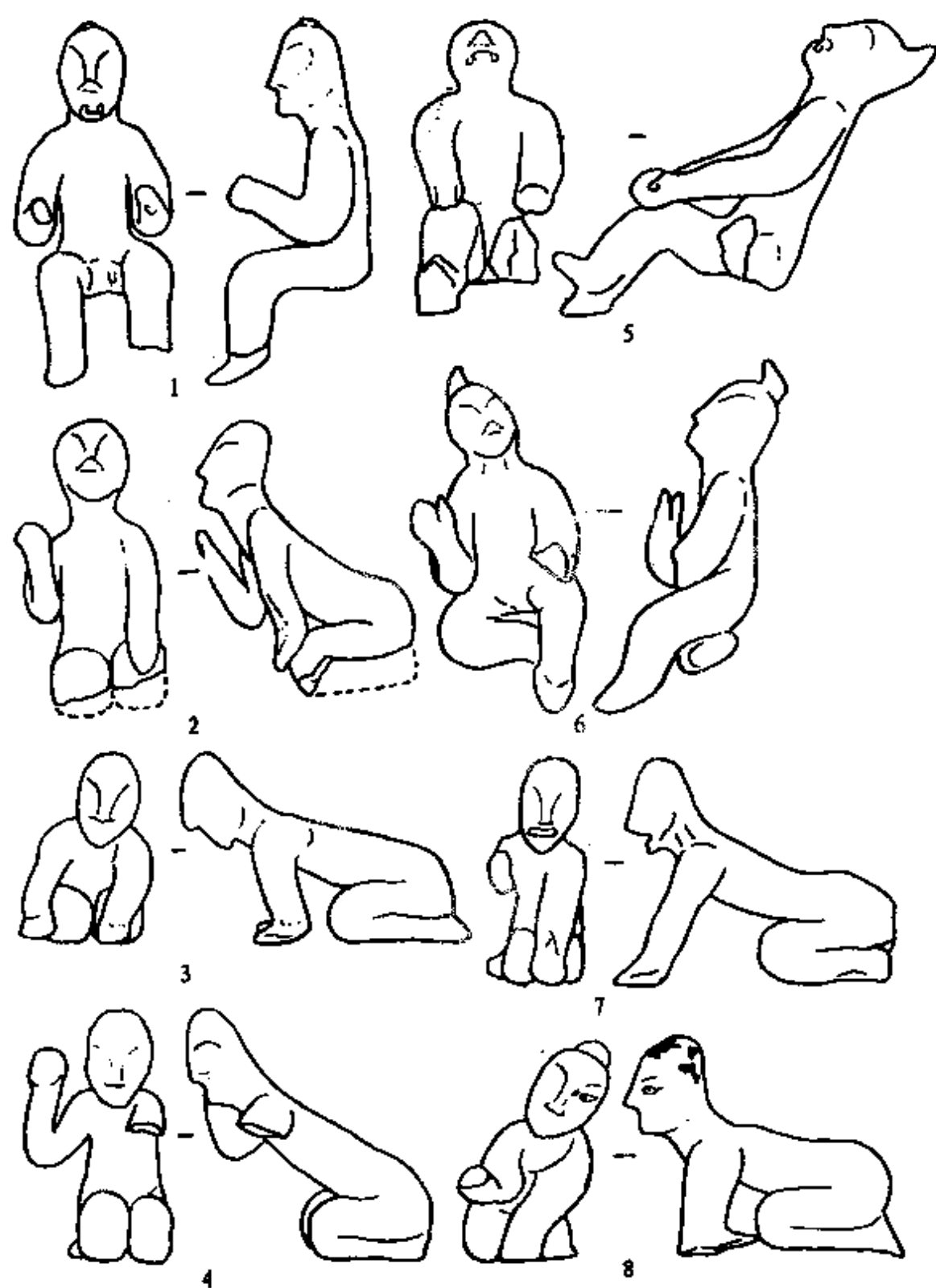
高 5.9 厘米。(图六:3)标本 M₁:49,直口,平沿,弧顶。口径 13.2,高 4.6 厘米。(图五:2)标本 M₁:48,盖较矮,直口,平沿,弧顶,一侧凸出一端柄。口径 10.8、高 2.2 厘米。(图五: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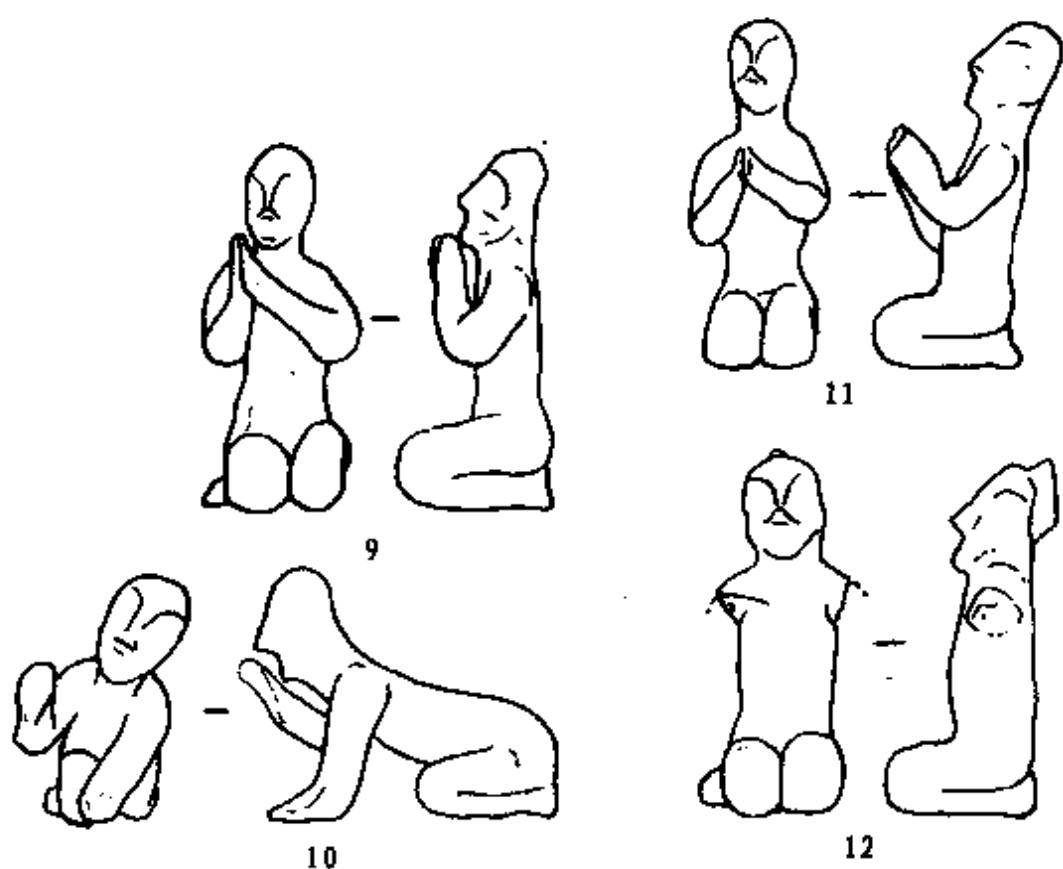




图六 陶器(198-199)

1. 瓮(M1:29) 2. 灶(M1:32) 3. 器盖(M1:44) 4. 陶环(M1:55) 5. 厕所(M1:31) 6. 盆(M1:39) 7. 瓶(M1:28) 8. 鼎耳(M1:50) 9. 薰炉(M1:34) 10. 鸭形壶(M1:35) 11. 壶(M1:45)(1、5、11为1/8, 2、4、6、8为1/2, 3、7为1/4, 9为1/3, 10为1/5)





图七 陶人物俑(200-201)

1、5、6 坐姿俑(M₁:11、10、9) 2、3、4、7、8、10 跪俯俑(M₁:4、1、3、2、5) 6、10、11、12 跏趺坐俑(M₁:6、8、9、7)

鼎耳 1件(M₁:50),环形,高8厘米。(图七:6)

环 5件,形制相同,皆残。标本 M₁:55,椭圆形,断面圆形。长径7.3、短径6.8厘米,应属陶壶之环。(图六:8)

器盖、环均不见与之相关的器物,应已被盗。

板 4件,形制相同,形如板瓦,长方形,四周切割整齐,一面饰绳纹。标本 M₁:51,长36、宽18、厚1.2厘米。(图五:4)

人物俑 12件。皆捏制而成,指纹痕迹犹存。俑体表面皆施白粉地,多已脱落,个别的残存墨线勾勒的眉眼等。

标本 M₁:1,双膝跪地,身前倾,头上仰,面部较瘦削,口大张。左手抚地,右手残缺;下肢并拢,双足均向右勾,俑长10,高8厘米

米。(图七:3)

M₁:2,形态与 M₁:1 略同,双膝跪地,身前倾,头上仰,面稍丰润;左手抚地,似在拍地痛哭。右手上举、下肢并拢,双足右勾。保存完整。跪俯体长 8.3、高 7 厘米。(图七:7)

M₁:3,整体形态同上,头微上仰,左上肢残缺,右上肢举起,似在拍地痛哭;下肢并拢足向右勾。跪俯体长 9、高 6.9 厘米。(图七:4)

M₁:4,身前倾,头微上仰,双手抚地,下肢并拢,脚向右勾。身長 9.1、高 6.5 厘米。(图七:2)

M₁:5,双膝跪地,身前倾,头上仰,面部丰润,以细墨线勾画出眉眼,顶束发高髻;左手抚地,右手残缺,由残存部分观察,应同属举手作拍地状;下肢并拢,足向右勾,跪俯体长 8.8,高 8.3 厘米。(图七:8)

M₁:6,身前倾,头向后仰,面部略瘦削。左手抚于左膝之上,右手上举。双脚并拢,小腿部分残缺。残高 9.3 厘米。(图七:6)

M₁:7、8、9,形态基本相似,上身直立,面部略丰,M₁:7.9 双手合十于胸前,下肢并拢跪地,足向右勾。M₁:8 顶部曲尖高起,如带巾状。高分别是 9.6、9.8、9.9 厘米。(图七:9、11、12)

M₁:10,上身直立,头向后仰,头顶如戴巾,口部横穿小孔;右上肢前伸,手握如拳,抚于右膝上;左上肢前伸,手上握如拳。右下肢呈悬腿坐姿,足下有踏物;左下肢残缺。高 12.6 厘米。(图七:5)

M₁:11,上身直立,稍前倾,头顶如戴巾残缺,下巴上有二穿孔。上肢屈曲前伸;下肢呈悬腿坐姿,左足残缺。高 11.9 厘米。(图七:1)

M₁:12,上身后仰,目视左上方,头顶戴巾。右手上举,左手残

缺。下肢呈盘腿坐姿。高 8 厘米。(图七:6)

猪俑 1 件($M_1:16$)。身呈半侧卧状,长嘴,耳尖下垂,高髻,尾长卷,双排乳硕大下垂,四肢较粗,属正在哺乳期的母猪形象。身長 11.2、高 4.8 厘米。(图八:10)

犬俑 3 件,形态各异。标本 $M_1:13$ 。体略显瘦小,站姿,尾上翘,耳尖下垂,口大张,侧首向天作长吠状。左下肢残缺。体长 6.7、高 4.5 厘米。(图八:3)

标本 $M_1:14$,蜷卧姿,体肥硕,无四肢,头较大,耳竖起似正警惕地守卫。高 6.5 厘米。(图八:8)

标本 $M_1:15$,站姿,体肥硕,尾上翘,四肢粗短,耳残。身長 10.4、高 5.6 厘米。(图八:6)

羊俑 1 件($M_1:18$),后肢立,前肢屈曲,尾上翘,作正跳起格斗状,左耳及角残缺,右下肢亦残缺。高 9.3 厘米。(图八:2)

猴俑 1 件($M_1:17$),身略肥,仰首,面部五官轮廓清晰,长臂,左前肢似正向口内送食,右前肢,左后肢及尾残。身長 10、高 6.3 厘米。(图八:5)

鵝俑 2 件,形态各异。标本 $M_1:19$,形态较大,昂首扁嘴,长颈前伸,短尾,无足。双翅仅捏制出轮廓。通体施白粉地,其上以墨线勾画双翅及羽毛形纹,多已脱落。体长 20.1、高 14.1 厘米。(图八: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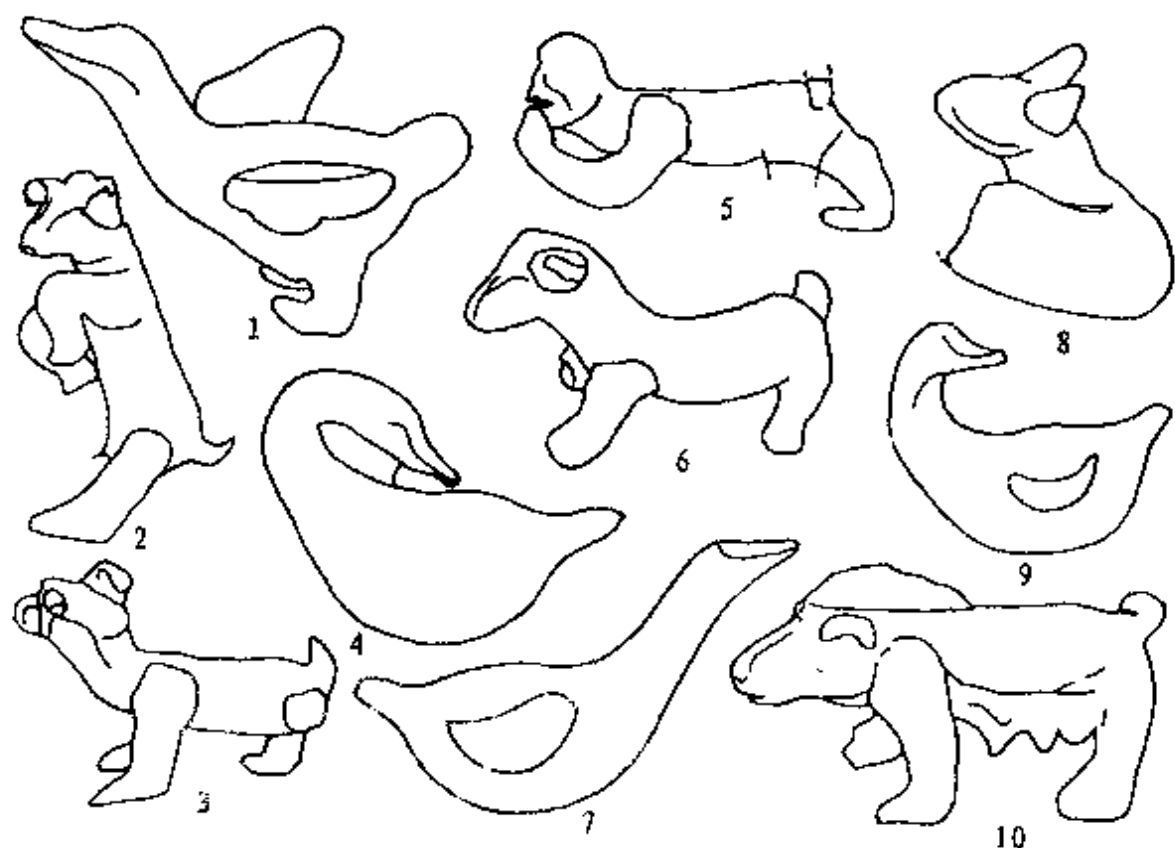
标本 $M_1:20$,形体较小,长颈向后扭曲,扁嘴抚于脊背之上,短尾无足,似正处休眠状态,身長 10、高 7.9 厘米。(图八:4)

鴨俑 2 件,各不相同。体态与鵝俑近似,惟颈较短。标本 $M_1:21$,昂首前伸,扁嘴,扁尾较短,双足短小,体肥硕,双翅展开似正欲飞状。体长 11.8、双翅展开宽 10.8、高 9 厘米。(图八:1)

标本 $M_1:22$,形体如鵝俑,颈较短,扭向后如观望状,扁嘴、短

尾、无足双翅仅捏塑出轮廓。通体施白粉地,其上以墨线勾画双翅及羽毛纹样,多脱落。体长 13.2、高 11.7 厘米。(图八:9)

上述动物俑,体表亦皆施以白粉地,仅鸭鹅之上尚残存墨线勾画的羽毛形纹,其余皆已脱落不存。



图八 陶俑

1、9.鸭俑(MI:22、21) 2.羊俑(MI:18) 3、6、8.狗俑(MI:14、15、13) 4、7.鹅俑(MI:19、20)
5.猴俑(MI:17) 10.猪俑(MI:16) (图1、5约1/4,其余约1/2)

2、铜器

16件,器形有镜、铃、戟、盖弓帽、带钩、铺首、衔、镞等。

镜 1件(M₁:52)四乳四螭镜,圆钮圆座,座外以四乳钉分列成四区,各区内一简化螭纹,素宽缘。直径 8.9、边厚 0.5 厘米。(图九)

铃 2件。标本 M₁:53,顶上一环钮,下缘两角下垂,器表饰以弦纹框及乳钉纹。下缘宽约 6.2 厘米,通高 6.8 厘米。(图十:14)

标本 M:54, 正面呈长方形, 平顶, 顶上一桥形钮。宽 2.1、通高 1.9 厘米(图十:18)。



图九 铜镜拓本(M1:52)

带钩 2 件。标本 M₁:57, 兽首。腰较宽, 背部一圆钮, 腹宽 1.8、长 8.2 厘米。(图十:2) 标本 M₁:58, 腰较瘦, 背部一圆钮, 腹宽 1.2、长 8.9 厘米。(图十:3)

戟 1 件(M₁:63)。“卜”字形, 器形狭小, 扁平而薄, 胡上三穿。刺胡通长 8.4、援长 5.1 厘米。(图十:10)

铺首 3 件, 形制相同。标本 M₁:56, 残, 兽面突起, 额作山花状, 鼻下垂向后弯曲成钩, 衔一圆环。背后一扁方形插钉, 鎏金。环径 2.5、通长 4.8 厘米。(图十: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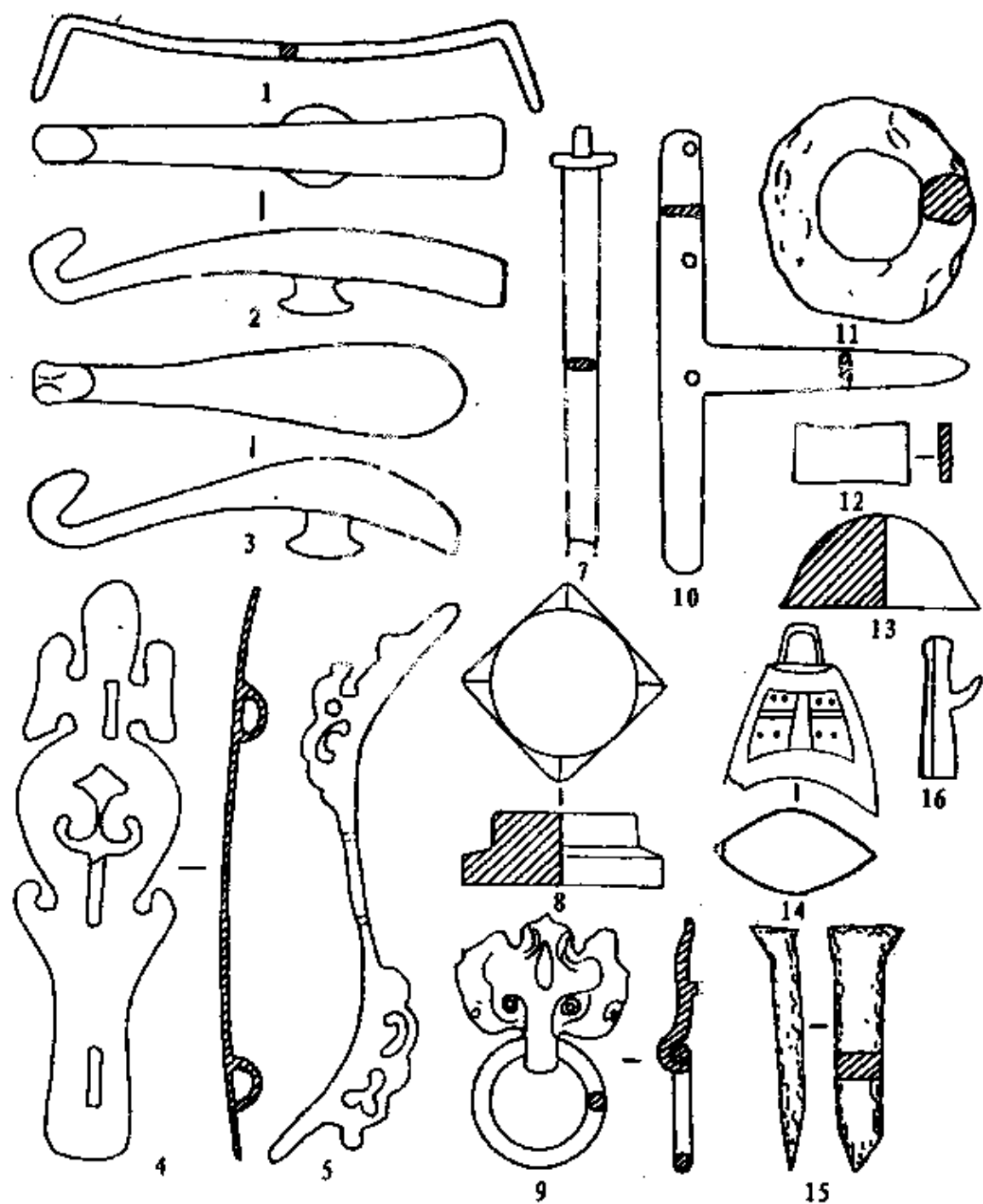
盖弓帽 1 件(M₁:59)。球形顶, 中空成釜, 中部向上挑起一钩。长 2.7 厘米。(图十:16)

当卢 2 件, 形制相同。标本 M₁:60, 薄片状, 上下各有一桥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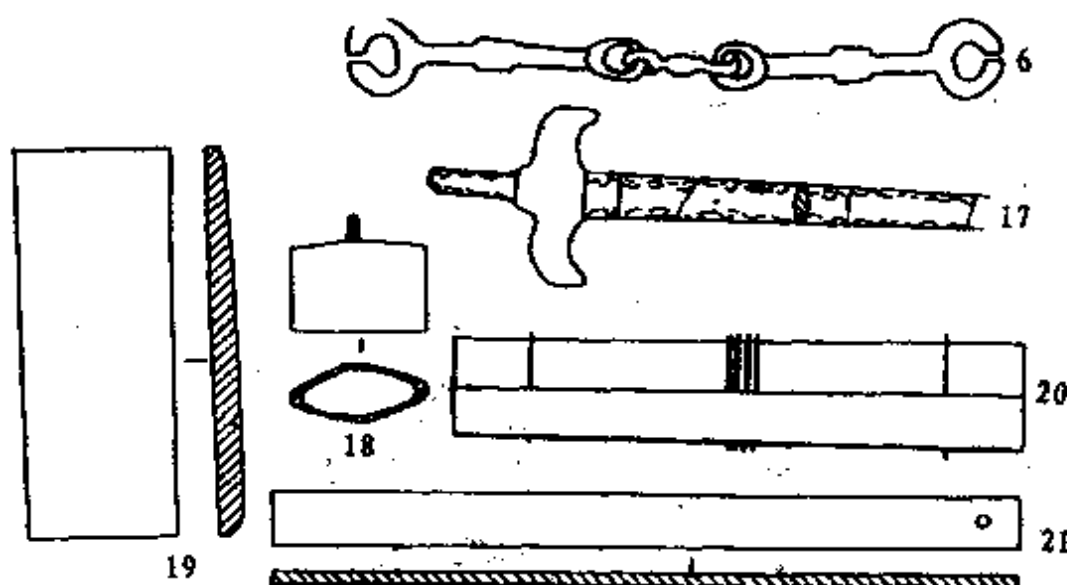
鼻。长10.8、厚0.15厘米。(图十:4)

衔 1件(M₁:62)。三节连环,长10.3厘米。(图十:6)

镮 1件(M₁:61)。叶部作花边状,中间二圆形小孔。长10.8厘米。(图十:5)



图十 铜、铁、石、铅器(206-207)



1.凹形器(M1:64) 2,3.带钩(M1:58,57) 4.当卢(M1:60) 5.镜(M1:61) 6.衔(M1:62)
7,17.铁剑(M1:65,66) 8.石研磨器(M1:73) 19.铺首(M1:56) 10.戟(M1:63) 11.铁环(M1:68)
12.石片(M1:75-1) 13.铅钉帽(M1:70) 14,18.铃(M1:53,54) 15.铁齿(M1:69) 16.盖弓
帽(M1:59) 19.石熏板(M1:74) 20.筒形器(M1:55) 21.骨尺(M1:72) (7,17,19,21.约 1/4,余约
1/2,未注明者为铜器)

筒形器 1件(M₁:55)。器表有凸棱。上端直径1.6,下端直径1.8,长8.8厘米。(图十:20)

“一”形器 1件(M₁:64),长9.8厘米。(图十二:7)

3、铁器

4件。有剑、铍、环及镡齿诸类。

剑 2件(M₁:65),已残断,锈蚀严重。器形小,当属冥器。柱状茎、铜质剑格,残存木鞘痕迹。通残长15.5厘米。(图十:7)

铍 M₁:66,残,锈蚀严重,铜质剑格,通残长16.5厘米。(图十:17)

环 1件(M₁:68),锈蚀严重,圆环,环外径4.1厘米。(图十:11)

镡齿 1件(M₁:69),长9厘米。(图十:15)

4、石、骨、铅器

石黛板 1件(M₁:74),长方形薄片状,一面磨制光滑。长12.4、宽4.8、厚0.5-0.8厘米(图十:19)石研磨器1件(M₁:73),下部为方形,上部为圆形,捉钮。边长2.9、高1.4厘米。(图十:8)

石片 2件。M₁:75-①,长方形,长2.2、宽1.1、厚0.2厘米。M₁:75-②呈平行四边形状,长2.2、宽1、厚0.5厘米。(图十:12)

骨尺 1件(M:72),长条状,顶端一圆形穿孔。长22.9、宽1.8、厚0.39厘米。(图十:21)

铅钉帽 1件(M₁:70),帽呈半球体,钉残缺。帽直径3.9、高1.9厘米。(图十:13)

5、钱币

13枚,皆为“五铢”钱,“五”字中间相交两笔略曲或弯曲,“铢”字的金字头呈簇形,“朱”字头方折。个别周廓经磨去,钱径2.4-2.5厘米。(图十一)



图十一 钱币拓本(1:1)

三、结语

吴楼一号汉墓建筑结构,在山东以往发现的汉墓中尚属罕见。其平面布局与河南唐河清理的一座新莽始建国天凤五年(公元18年)的石椁墓^①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②相类似。其共同之处都是墓室中部有两个棺室,墓室前回廊较宽且高,东、北、西三面回廊较窄、矮。据唐河汉墓刻石文字,知此回廊应名为“藏阁”。吴楼一号

汉墓与甘泉二号墓一样有甬道而无前室，而棺室前无门。不同于甘泉二号墓的是两棺室后有隔墙。

关于墓葬主人，身份及其时代

1、墓葬结构与出土文物引起的思考

吴楼一号汉墓结构形制在我省尚属首例。墓室起券三层，特别是前回廊更为高大宽阔，这一结构首先引起了省内部分专家的关注。他们提出该墓主人身份非同一般的说法，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查找有关资料，该墓与刘荆（甘泉二号墓）墓相似。刘荆墓是按王一级形制修建的。他的前回廊券顶是四层，后回廊券顶为三层，其他结构与该墓基本相同，只是墓室没有后墙封堵，这说明该墓墓主人的身份略低于刘荆。

从出土器物看，虽遭严重被盗，但遗留器物仍然可以反映墓主人身份非同一般。不仅数量多，而且个体大，气势恢宏。如高达94.4厘米的双耳壶。造形别致，做工精细，从残存陶片分析，如此大的器物应有4个。另如羊首瓶，造型奇特，个体较大，上腹现存7个羊首，姿态各异，这种器物，到目前为止，所发表的汉墓资料尚未见报道。从墓葬结构和出土物分析墓主身份应低于王一级，而高于地方官吏郡守一级。

2、文献资料记载

基于上述两种原因，我们查阅了有关文献资料。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西距吴楼1号墓5公里的莘县，西汉末为阳平侯国，据《汉书》、《后汉书》记载，两汉期间，封阳平侯的前后有蔡、王、桓三姓。《汉书·蔡义传》载：“蔡义，河内温人也。^⑦以明经给事大将军莫府……（昭帝）数岁拜为少府，迁御史大夫，代杨敞为丞相，封阳平侯。又以定策安宗庙益封，加黄金二百斤。义为丞相时年八十余……义为相四岁薨，谥曰节侯，无子，国除。”^⑧这段记载告诉我们，蔡义无子嗣，且死后国除。而我们在吴楼汉墓群经实地勘

探,发现这一时期的墓葬有五座,且范围大小相近,这与蔡义的家世不符,因此,这一墓群显然不是宣、昭之朝曾封过阳平侯的蔡义的家族墓地。《后汉书·》关于恒焉记载:“焉字叔元……顺帝即位,拜太傅……封阳平侯,固让不受。”^④这说明恒焉并没有实际接受阳平侯的封号。另外,恒焉所处的时代已是东汉中期,而吴楼1号墓的结构,应属西汉晚期或东汉早期。而恒焉生活的时代晚于1号汉墓的时代,因此,该墓不可能是恒焉的家族墓。而另一曾封过阳平侯的王禁,正是生活在西汉晚期,《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载:“阳平顷侯王禁,以皇后父侯二千六百户,子凤以大将军益封五千四百户,凡八千户。”(王禁)“初元元年三月癸卯封,六年薨。阳朔三年,侯薨嗣,十九年薨。建国三年,侯莫嗣,十二年,更始元年为兵所杀。”^⑤这段文字,明确记载了王禁子孙五人先后承袭阳平侯的史实。我们经实地勘探,也正好又发现四座墓葬,其规模与该墓相近。因此,我们认为吴楼一号汉墓应属阳平侯王禁家族成员之一。关于墓葬的年代,文献资料明确告诉我们,最后一个阳平侯死于更始元年。因此,结合出土器物的组合,造型,陶质、陶色,以及所用青砖尺寸分析,吴楼一号墓应属西汉晚期墓葬,即公元前48年至公元23年之间。

3、汉代阳平侯国的地理坐标和当代莘县地理位置坐标比较

西汉和东汉时期的阳平侯,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兖州刺史部》所处位置的坐标是在北纬 $115^{\circ}44'$,东经 $36^{\circ}20'$ 的交点上,现在莘县所处的地理位置,在1994年出版的《山东省地图》(鲁新登字第11号,1994年第3版)测得。坐标是北纬 $115^{\circ}40'$,东经 $36^{\circ}18'$ 。汉时的阳平侯国的治所,和当代莘县的县治所在地基本重合。因此,吴楼汉墓的所处位置,与汉代阳平侯国和现代的莘县距离相等。这进一步说明,吴楼汉墓群应属西汉晚期阳平侯国的范围之内。

关于几件器物

1、骨尺

骨尺虽没有刻度,但制作十分精细,磨制光滑,一端有穿孔,便于系绳携带,长度 22.9 厘米,相当现代市尺的七寸长,为研究汉代度量衡提供了实物资料。

2、十二件人俑

吴楼一号墓出土器物中,尤以十二件人物俑的造型极为罕见。但十二件人俑的排列组合,已被盗墓者扰乱,已无法恢复原排列顺序,现只能就其个体姿态做如下分析。由人物的造型、动作观察,应是“哭丧俑”和“导引俑”两种。

哭丧俑,我们认为 M₁:2、3、5 号俑是送葬的哭丧俑。他们均双膝跪地,一手抚地,一手上举,面呈悲哀之状,似在拍地恸哭。至于这几件俑与墓主的关系,从他们悲哀恸哭的形象分析,应与墓主有直接血缘关系,很可能是象征墓主的儿孙形象。至今当地仍有父母去世,儿孙俯地恸哭的丧葬习俗。

导引俑 M₁:4、6、7、8、9、10、11、12,有的曲腿坐姿,双手合十,有的握拳蹲坐,姿式各不相同,我们认为可能是一种“导引图”式,即现在的气功。如 M₁:12 右腿蜷起,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导引图》的一种运动姿式相似,^⑥这种屈膝的动作与《养生方导引法》中所记的医疗膝痛的术式也有相似之处。这种姿式主要是:舒两足坐,散气向涌泉,可三通。始收右足屈卷。将两手急捉脚涌泉,挽足踏手,挽一时取势,手足用力,逆气向下三七,不失气数行,去贤冷气,膝冷脚痛也。^⑦我们认为 M₁:12 正是收足屈蜷的姿势,治疗脚痛病的。再如 M₁:10,左上肢前伸,手上握如拳,右下肢呈悬腿坐姿,足下有踏物,与《导引图》图八相似。图八题记“堂狼(螳螂)”式。“作侧身起舞状,双臂向左上方舒展,双目注视足下一盘状物”,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 M₁:10

口部横穿小孔, M_1 ; 11 下巴上有二穿孔, 不知何意, 有待今后研究。

另外, 在墓葬上面, 发现许多瓦当, 圆形, 径 16 厘米, 中有半圆凸, 有十字凸棱分成四区, 篆书“长乐未央”四字。众多“长乐未央”瓦当的出现, 说明当时地上有陵园建筑。《汉书·王莽传》记载: “莽乃博征天下工匠……建……九庙: 一曰黄帝太初祖庙……八曰阳平顷王威祚昭庙……殿皆重层。太初祖庙东西南北各四十丈, 高十七丈, 余庙半之。”^⑧ 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相印证, 进一步证明应是阳平侯的墓。

注 释

①南阳地区文物队等:《唐河汉郁平大尹冯君孺人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80 年第 2 期。

②南京博物院《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文物》1981 年第 11 期。

③《二十五史·前汉书》第一册第 268 页。

④《二十五史·后汉书》第二册第 194 页。

⑤《二十五史·汉书》第一册第 435 页。

⑥⑦湖南省博物馆、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导引图的初步研究》,《马王堆汉墓研究》,1979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的。

⑧《二十五史·汉书》第一册第 749 页。

原载《考古》1999 年第 11 期

聊城地区汉画像石墓调查

陈昆麟

聊城地区,位于山东西部黄河淤积的大平原上。辖聊城、临清、高唐、茌平、冠县、莘县、东阿、阳谷八个县市。东南部以黄河为界与泰岱余脉隔河相望。到目前为止,在这一地区的高唐、茌平、东阿、阳谷、莘县、聊城六个县发现了大批汉代墓葬,其中高唐、东阿、阳谷、莘县部分汉墓中有丰富的汉画像石。

高唐县,西汉设县,属平原郡,东汉属平原国。原县治在今高唐县治东约三十里的洧河乡。后魏末期,由禹城县伦镇迁至今址,以今日之高唐城为中心,在城的西部、东部和中部都曾发现过汉代墓葬。1987年,在城西三十里铺乡孙庄村,曾发现并清理过一座汉墓,该墓为砖室墓,虽无壁画,但却出土了不少的汉代的文字,用红色写在砖上。因该墓破坏严重,文字也多残缺不全,但自残存笔划来看,字写得相当有功力。该墓所用砖,大部分为特制,许多砖上带有浮雕图案,如菱形纹、乳钉纹、米字纹等,这些纹饰,与汉画像石上有些装饰十分相近。

1990年,在高唐县城东南2公里处,又清理一座汉代墓葬,也是砖室墓,砖的形制与孙庄汉墓相近。

高唐境内的大汉墓群,位于洧河乡所在地的村西,这里也是汉代高唐县治的所在地。建国初期,这里地面以上有大封土的汉墓就有七八个。村西北有双冢,村西南有王子坟,盼子墓等,村南部也有较大的汉墓。1958年,群众在村西北双冢中间挖水库时,发

现了一座汉代大型画像石墓,出土带虎头铺首的石门,制作相当精致,出土部分带水波纹、垂幔纹、菱形纹及花卉的石块,耳室中出土了部分至今仍为全国最大的釉陶楼,还有陶厨俑、陶鸡、陶鸳鸯等。可惜这座汉墓不是科学发掘的,带有车马出行,人物聚会等图案的画像石,至今仍埋在地下,没有挖掘出来。

在平县境内的汉墓群不下几十个,但大都为单体石室或砖室墓,至今没有发现大型画像石墓,但孙桥乡腰庄东南方向的大封土堆,可能是一汉代大型墓葬,墓内可能有画像石。

东阿县内汉墓也较多,已明确知道的汉画像石墓有两座。一处在杨柳乡杨南村,该墓于解放前遭破坏,大部分画像已流失外地,下落不明,另有部分画像石块被当地群众或用于砌墙,或用于修桥,散落于民间,难以集中,所见图案有鱼、羊等动物,亦有装饰性的连弧纹、菱形纹等,石门上还有高浮雕虎头铺首,雕刻手法为浮雕、减地平面雕等。另一处汉画像石墓在姜楼乡邓庙村,该墓发现于三十年代末。为弄清该墓的情况,1995年4月,聊城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地区文物研究室、东阿县图书馆于1995年4月15日进行了实地调查。墓室形制为盩顶式多室石室墓,上口1.20米见方,下口东西2.60米,南北2.35米,斜高1.20米。经墓室内观察,四壁均有石门通向石室。北边石门宽1.77米,中有一八棱石柱,斗形柱顶,石室进深约3米;东门宽1.10米,石室进深1.5米,南门宽1.20米,石室进深2.00米;西门宽1.36米,有一石柱,因泥沙淤积,石室进深无法测出。由此可见,盩顶之下,可能为一中室,因中室淤泥较深,各门的高度均无法测量,地面钻探,自中室往西约8米为墓室西部边沿。整座墓东西长约12米,南北宽约8米,占地面积约96平方米。从中室内可以看到四壁门楣石宽0.40米,均有以减地平面雕手法刻成的图案,内容有“车马出行”、“祥瑞图”、“比翼鸟”以及“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等,保存都比较完好。

阳谷县境内,汉墓和汉画像石墓分布甚丰,较大的汉墓群就有阿城镇马湾汉墓群、七级乡汉墓群。所发现的有画像石的单体汉墓有三处。一处是在四棚乡闫兴鲁村内。1993年,该村村民在院内打压水井时,打到4.5米时遇到石头,打不下去,接连换了几个地方,都是如此。为了解开这个谜,他便找人挖了一个竖坑,一直挖到石头。经我们前去察看,院内五米以下,原是一座汉代石室墓,经现场探查,墓室一直延伸到其北房室内,占地面积也在60~70多平方米之间。估计是一座汉画像石墓,因没有挖掘,也无法进入墓室内调查,情况不详。第二座汉画像石墓位于张秋镇西沙村东南角的水渠内。墓分甬道,前后两室三部分。两个墓室通长约5.3米,宽约2.65米,内径约2.2米。墓室基本成正方形,甬道因石桥占压,长度不详。两室上部均有盝顶,盝顶顶部和四面各用两块石板组成。后室顶部石板上刻有团式赤龙图案。墓室四壁均用两块立式石板砌成。石板上用减底平面雕技法刻有各种人物活动图案、后室门楣石上用浮雕技法刻有弯角大羊头,造型生动逼真。

第三座汉墓位于寿张镇八里庙村东200米处。1983年10月对该墓进行了清理,该墓为砖石墓结构,墓室由前、后室组成,总长7.6米。该墓共出土14幅石刻画像,分别刻在墓门和前、后室过门的9块石料上。该资料已在《文物》上发表,现将其主要部分摘要于下:

画像一、六、七内容均为车马出行图。一画像面已磨损,细部漫漶,车马行列自右向左。左方一人躬身向迎,右方一人拱手相送,行列最前为二导骑,后跟二车,车后二骑相随,最后又为一车。画像六上部为五铢钱纹、菱形连线纹,下部车马自左向右,左右二人相迎送,行列前二导骑肩扛戟,二人随后步行吹奏,再后有一车,车后二人持鞭相随,最后又随一车。画面上有未题字的榜额。画像七磨损,内容格式与画像六相似。

画像十为五层重台楼阁。第一层屋内二人相对坐,左边一人举右手。屋外两旁各立一人,手持笏,似来禀事。第二层二人扶持栏杆对话,屋外两旁各一人手持彗侍,房顶二人戏耍。第三层右下角一人持弓射箭,左下角卧一虎。此层有重檐阙形立柱,右柱上侏儒双手承托屋顶,左柱上一兽举前肢承托屋顶,中间立一羽人,左、右上角各立一持彗侍。第四层中间有墙,两旁有柱,柱上斗拱承托房檐,右侧两人向左行进,左侧两人面左立于一旁,对面一人一手持笔,一手持筒。第五层右角有一卧虎,左角蹲一人,房脊上二人相对戏耍。左上角伏一人,右上角不知为何物。

画像十一分上下两层。上层上部饰云气,云气中露出九个鸟头和两只熊形神兽。下部刻二虎,一虎肩生双翼,昂首下扑,另一虎昂首行走。下层刻人形铺首衔环,环内线刻牙齿和水波纹,口内并立双鱼。两旁云气纹中出鸟头,左右下角各刻一人,半跪以手扶环。

画像十二分四层,自上而下第一为孔子见老子,有未题字的榜额。老子在左,手拄杖,身后一随从。其前为一儿童,一手推小车轮,应是项鬻。对面孔子手提两禽,躬身向老子问礼,身后随一弟子,应是颜回。第二层刻荆轲刺秦王故事。荆轲在右,举剑刺向秦王,被身后卫士抱住,秦王转身逃避,后面是两个持盾和兵器的卫士。第三层是角抵百戏。主体为三匹马拉车,车上有五人,立两竿,前面竿上倒悬一鸟,上有一人手持鞀鼓,后面两人扶一竿,竿上有三人献技。马前蹲一狗。左边一人骑马远去,手提一鸟,马后一熊奔扑。此层有题榜二字,不识。第四层刻一连理树,上有五只鸟,树上停一车,马已卸下,马下蹲一狗,马前蹲一人,在为马洗刷。

画像十三分四层,每层立三人,第三、四层有未刻字的题榜。

画像二至五、八、九、十四,均刻几何图案。图案二、三刻连弧、水波、双菱纹。画像四、五以连弧、菱形纹为主体,上部加刻一鱼

纹。画像八、九为连弧、双菱纹。画像十四刻连弧纹。

莘县境内已知的单体汉墓有四座。在莘县县城长途汽车站的西北约 300 米处,有石室汉墓一座,现地表已经盖上民房。妹冢乡有汉墓两座。地上封土已荡然无存,据群众反映有一个是太子冢,地下有石室。88 年进行文物普查时,虽找到了位置,但未能进行实地钻探,因此,没有见到石室。在朝城镇孟洼一带还有高大封土的墓葬。因风吹雨淋,砖砌墓道已经暴露,估计也可能是一座汉画像石墓。聊城市内有杨庄汉墓群,但多为单体砖室墓。唯堍堍乡的堍堍堆,至今仍有占地面积 5000 多平方米的封土堆。根据文献记载和地理位置考证,这很可能是东汉清河王刘庆之墓,也很可能是一座大型汉画像石墓,有待进一步证明。

总之,通过调查,聊城地区的汉画像墓十分丰富,随着经济的腾飞,这些深埋地下的宝贵的教科书,有一天会向人们证明,汉代的聊城地区,也曾经是人烟稠密、经济发达的繁华而富饶的地方。

东阿发现汉代画像石墓

陈昆麟 玉新 淮生

不久前,山东东阿县姜楼乡邓庙村群众挖鱼塘,地表下4米深发现石室墓的盨顶石。聊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东阿县文体委认为已无法保存,随进行了抢救性清理。

墓座北朝南,方向南偏西 11° 。双寐室东西并排,间距3.8米。两寐室前各有一近方形的“前堂”。两“前堂”左右各有耳室,两堂由耳室相通。“前堂”前为甬道,两甬道各有南向门双扇门组成,东甬道东门开启,两甬道门前均有封门石堵门。形成了以“前堂”为中心,前有甬道,后有寐室、左右为耳室的“中”字形,而两“前堂”又由耳室相通,成了两个“中中”并排的结构形式,甬道、耳室、前堂、寐室均为盨顶,墓的前堂四面有过梁,承托盨顶,其余为石壁承托盨顶。墓全部为石砌,铺底石不计算在内,共用石178块。墓东西长11.85、南北宽7.85米,寐室南北长3.12、东西宽1.81、高2.54米,前堂东西长2.67、南北宽2.52、高3.04米,左耳室南北长1.49、东西宽1.35、高2.36米。右耳室南北长1.47、东西宽1.3、高2.36米,甬道南北长1.57、东西宽1.78、高2.44米。

墓中清理出250余枚五铢,减轮五铢,1件残石豆,1件象征厕所的石板,从西寐室盨顶残损口分析,该墓早年被盗,墓壁石上有灰痕,应是火烧痕迹。墓主尸骨甚少,仅在室内泥土中发现数块。但是,墓壁上37块有故事内容的画像石尤为珍贵。这些画像内容分别雕刻在两甬道门扇、顶盖石、额石,两前堂顶盖石、四面过梁

石、角壁石、立柱石,东前堂右耳室顶盖石、东壁石,西前堂左耳室顶盖石、西壁石,两后寐室顶盖石、北壁石上。并在不同位置的石面上,雕刻了与之相关的内容。墓基础石上刻有菱形纹、连弧纹。

画像内容丰富。有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现实生活、飞鸟异兽、花木鱼龙等。历史故事有孔子见老子,七十二贤等。神话传说题材广泛,主要有伏羲、女娲,象征月亮的九尾狐,象征太阳的三足鸟,仙人、升仙图等,现实生活是画像的主要内容。如反映墓主人食、住、行、娱乐的庖厨图、亭台楼阁、车马出行、杂技等,庖厨图展现了一幅杀猪、剥狗、生火置灶的场景。居住图是双重楼阁和台榭,楼台亭榭上飞鸟云集,凤凰欲落,展示了一幅汉代地主庄园的生活画卷,车马出行场景更为壮观,迎面有躬身施礼的迎接者,车马出行队伍前有导骑吏,开道的“伍伯”车,主人的四维辎车、妇人座的辎车位于队伍的中间,后跟随着拉衣服的辎车、接物质的棚车。再后有骑吏随从,并有躬身送行者。在画像石上有姿式各异大小不一的鱼、龙、马、羊、狐、兔、鼠、鸟、凤凰,长翅的人马、羊等。

东阿邓庙画像石墓,是鲁西北地区首次清理的一座大型石砌墓,其画像内容丰富,雕刻精美,反映了东汉时期社会的现实生活与思想意识。丰富了山东汉画像内容,填补了鲁西北没有大型画像石墓的空白。



堠堠冢之谜新解

殷黎明

坐落在聊城地区西部今聊城市堠固乡的堠固冢子,是远近闻名的历史遗迹。它那高大的黄土堆积巍巍矗立在大平原上,远远望去俨然一座小山包。多少年来,人们对它有种种传说和猜想,就是一些地方志书也没能说清楚,一些专家、学者多次进行考查,在它上面发现有唐、宋、元、明等时代的建筑构件及器物残片,这就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是古代烽燧?是类似鲁西南一带的固堆遗址?均感证据不足,于是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未见有权威性的定论。

近日,有机会读到台湾出版的学术性刊物《大陆杂志》1981年6月15日第62卷第6期,载有张篷洲先生(临清籍,现任台北大学副教授)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清河识地”,论证堠固冢乃是后汉清河王刘庆之墓。文中写到:“庆贬为清河王至是凡二十五载,得年二十九岁,自延平元年三月出京就国,同年十二月薨,计到国不足九阅月。疑其未达王都清阳,抵贝丘即发病薨,(贝丘时为清河国都尉治)薨即葬于广丘,大河故渚北岸,贝丘地也,(南去贝丘15里),地今堂邑县堠固冢也。”

清河郡国都治在清阳,清阳故址今在何处,史载不一;顾祖禹曰:“清河县东。”《括地志》言:“清河县东北八里。”总之,清阳在今河北省清河县一带无疑,距今堠固冢100华里。时刘庆自洛阳赴清阳途径贝丘应是合理的,因当时贝丘是有规模的城池。贝丘在

今临清城南近古村,至今有故城遗址,地面遗存的汉代瓦片随处可见,此遗址距堽固冢仅 15 华里。东汉建初五年(80 年)章帝刘炟立其子庆为太子,准备继承皇位,后因窦皇后弄权,于建禄八年把皇太子刘庆废为清河王,随即出京,从洛阳出发去清阳—清河国都治所就任,在行至贝丘附近便染疾死了,葬在现在的堽固,汉崇厚葬,遂形成高大冢坟,至今巍巍壮观。

若张蓬洲先生观点成立,堽固冢子当是汉清河王刘庆墓。

原载《中国文物报》1992 年 5 月 3 日

山东省东阿县曹植墓的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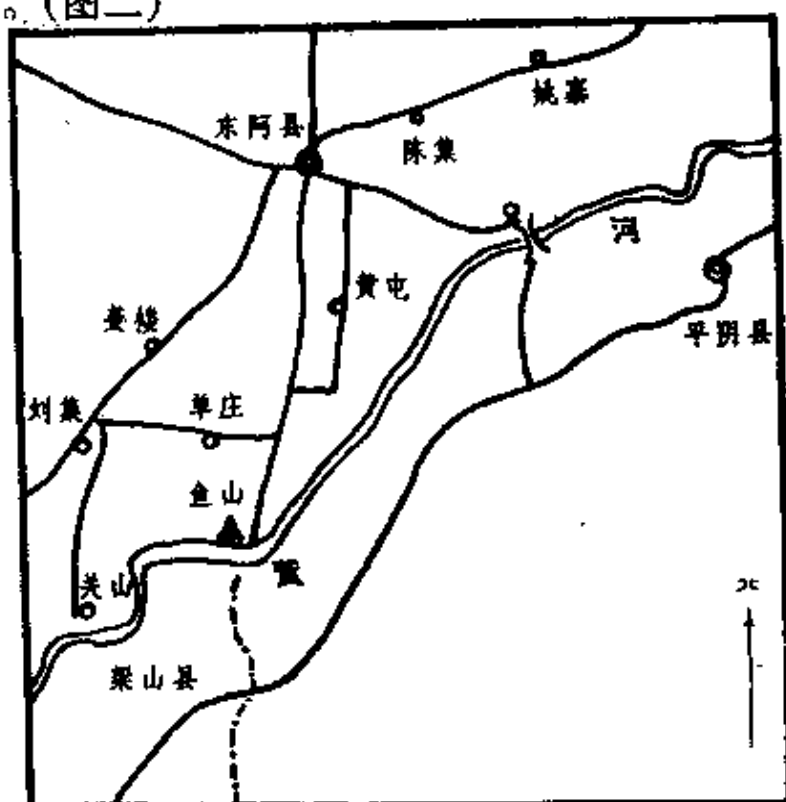
刘玉新

1951年6月,原平原省(1952年12月撤销区划)文物管理委员会会同东阿县文化部门,对安葬在鱼山西麓的三国魏东阿王曹植的陵墓,进行了清理发掘,出土文物132件。由于是建国伊始,发掘水平受到时代的局限。又由于区划的变更,没留下原始的发掘记录,很难了解当时的清理状况。今就现存的发掘资料和收集到的部分档案,对曹植墓的概况、形制和随葬器物做一概述,以填补曹植墓在清理方面的空白。

一、墓葬概况

曹植墓位于东阿县城南17公里处的鱼山西麓,(图一)依山营穴,封土为冢,始建于魏青龙元年(233年)三月。^①墓葬平面呈“中”字形,由甬道、前室、后室三部分组成,墓葬朝向为坐东面西^②,墓葬全长11.40米,宽4.35米。甬道长2.20米,宽1.47米,高2.24米,券顶,甬道口用砖平砌封堵。前门道深1.45米,宽1.32米,高2.06米,券顶。两壁中部砌有凹槽。槽宽0.20米,深0.12米,高1.41米,作为顺砖错缝横砌封门墙之用。墓室为砖结构,墓壁采用三横一竖砌法。墓壁及顶部均抹一层厚约0.5厘米的石灰。前室呈方形,大跨度横券顶。边长4.35米,高4.80米。后门道深1.20米,宽1.65米,高1.96米。位于前室后壁偏北部,券顶,两壁中部偏西处砌有宽0.20米,深0.09米,高1.67米的凹槽,作用同

前门道之凹槽。后室长 2.20 米,宽 1.78 米,高 3.31 米。券顶坍塌,无后壁。(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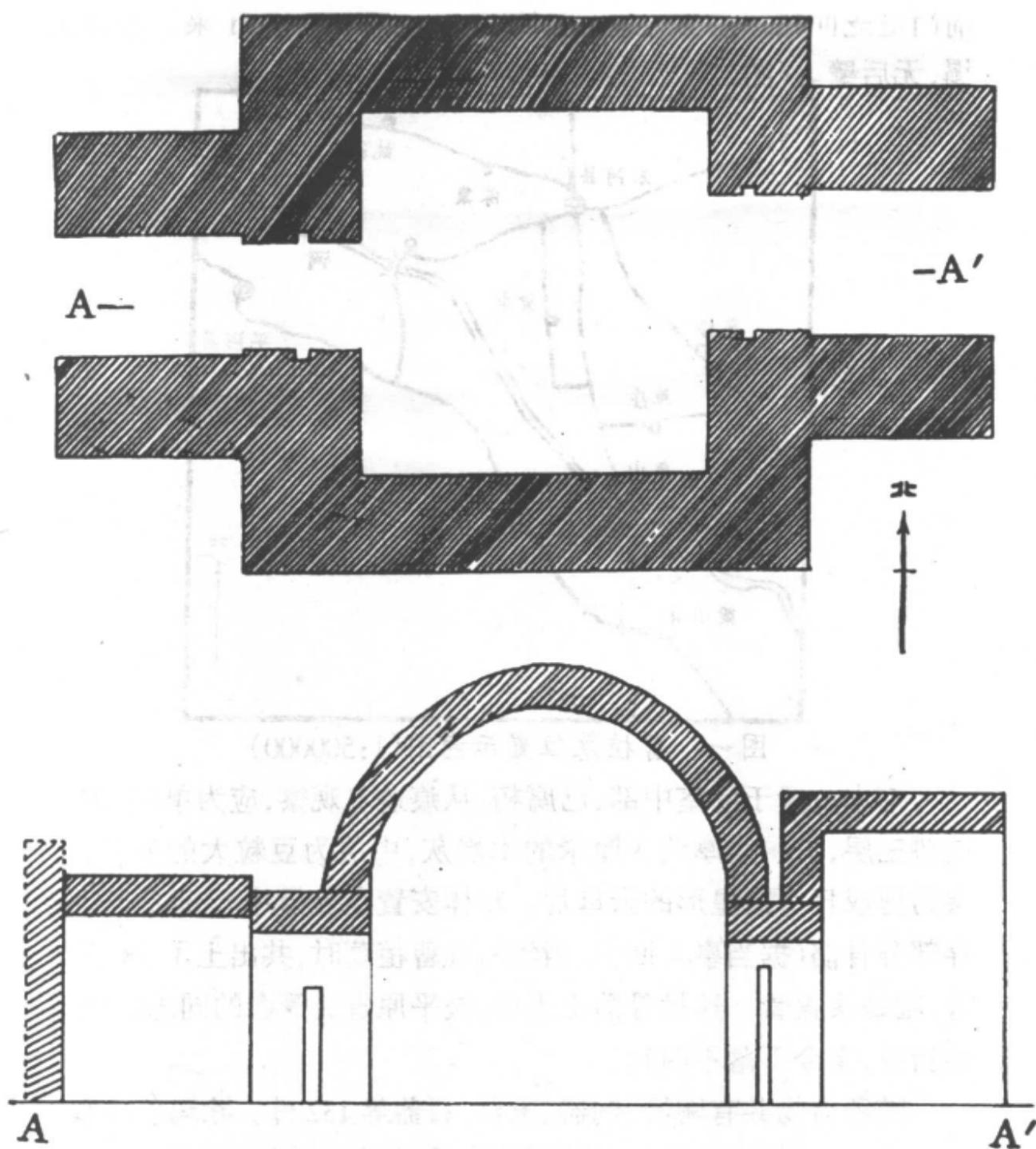


图一 曹植墓位置示意图(1:500000)

棺木放置于前室中部,已腐朽,从痕迹上观察,应为单棺,棺内铺垫三层,下层为厚约 3 厘米的木炭灰,中层为豆粒大的朱砂,上层为剪成日、月、星形的云母片。尸体安置在云母片上,已腐朽,仅存部分骨骼(据当事人回忆,当年清理曹植墓时,共出土了 28 节尸骨,唯缺头盖骨。这批骨骼出土后,被平原省文管会的同志取回省会新乡,至今下落不明)。

随葬器物共有陶器、铜器、玉器、石器 132 件。除玛瑙珠和 3 件玉璜放置于前过道封门墙内侧外,余均放置于棺木两侧。按当时墓室中器物零乱状推测,该墓早年曾被盗。

墓葬清理后,甬道、前门道和主墓室由于长期暴露,上部于 1978 年 9 月 18 日坍塌。1986 年山东省文物局拨专款对坍塌的墓室各部进行了修复。



图二 曹植墓平、剖面图(1:100)

曹植墓出土文物,曾于1952年在北京故宫午门展出,后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移交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1984年12月又移交给东阿县图书馆收藏,并举办了《曹子建墓出土文物展览》,在聊城地区博物馆、东阿县图书馆进行展出。

二、出土器物

1、玉器 4件。

青玉璜 4件,均为青白色玉质,分三式:

I式:2件(K:37),为两个半环形合在一起的环形,两端边缘处均有三个穿孔,玉璜内径3.4厘米,外径8.4厘米,厚0.5厘米,宽2.5厘米。(图三,1)

II式:1件(K:38),为一弯梳形,脊沿饰有圆齿,中间有一小穿孔,通长11.8厘米,宽5.56厘米,厚0.5厘米。(图三,5)

III式:1件(K:39)为一椭圆形,两边沿饰有圆齿,有三个小穿孔,通长8.6厘米,宽3.3厘米,厚0.5厘米。(图三,2)

2、料器 7件。

白料泡 1件(K:40),口杯盖形,玛瑙质,磨光精细,径4厘米。

绿料泡 1件(K:41),口杯盖形,绿松石质,径3.7厘米。

青玉珠 1件(K:43),圆球形,通体磨光,一端浅表面对钻两个小穿孔,径1.75厘米。(图三,4)

红玛瑙球 1件(K:44),圆球形,红玛瑙质,中有对钻小穿孔,径1.35厘米。(图三,3)

青玉球 1件(K:134),圆球形,通体磨光,径3厘米。

白料球 2件。其中标本K:129,为圆球形,磨光,中有对钻小穿孔,径1厘米。标本K:133,系磨光的不规则球形,白玉石质,径3.5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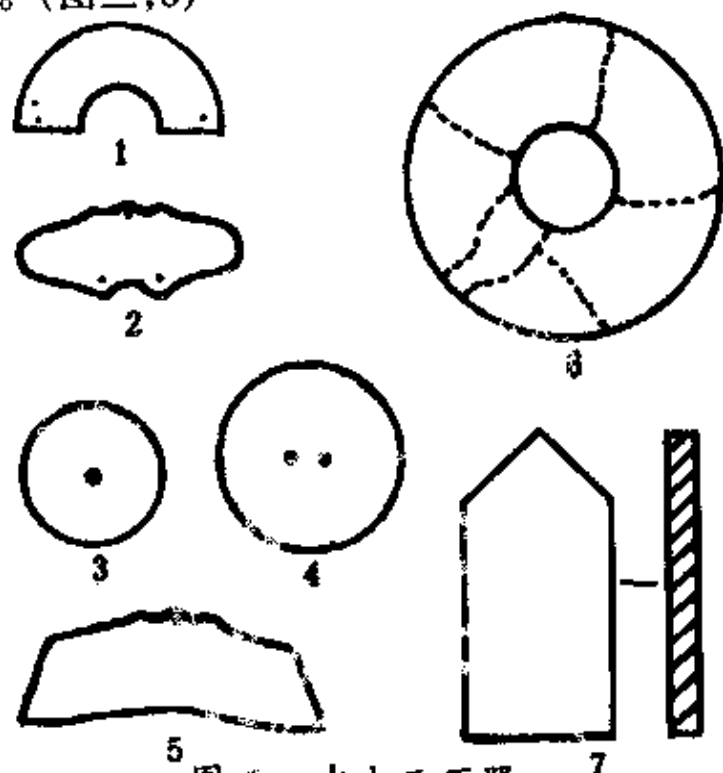
3、石器 3件。

花石球 1件(K:42),蒜头形,顶残,石质较粗,高3.3厘米,腹径3.5厘米。

石圭 1件(K:45),灰色岩石质,高22.7厘米,宽11厘米,厚

2.7 厘米。(图三,7)

石璧 1 件(K:46),断裂为六块,粘合成形,内径 7.9 厘米,外径 25.2 厘米。(图三,6)



图三 出土玉石器

1. I 式青玉璜(K:37) 2. II 式青玉璜(K:39) 3. 红玛瑙球(K:44) 4. 青玉珠 K:43) 5. II 式青玉璜(K:38) 6. 石璧(K:46) 7. 石圭(K: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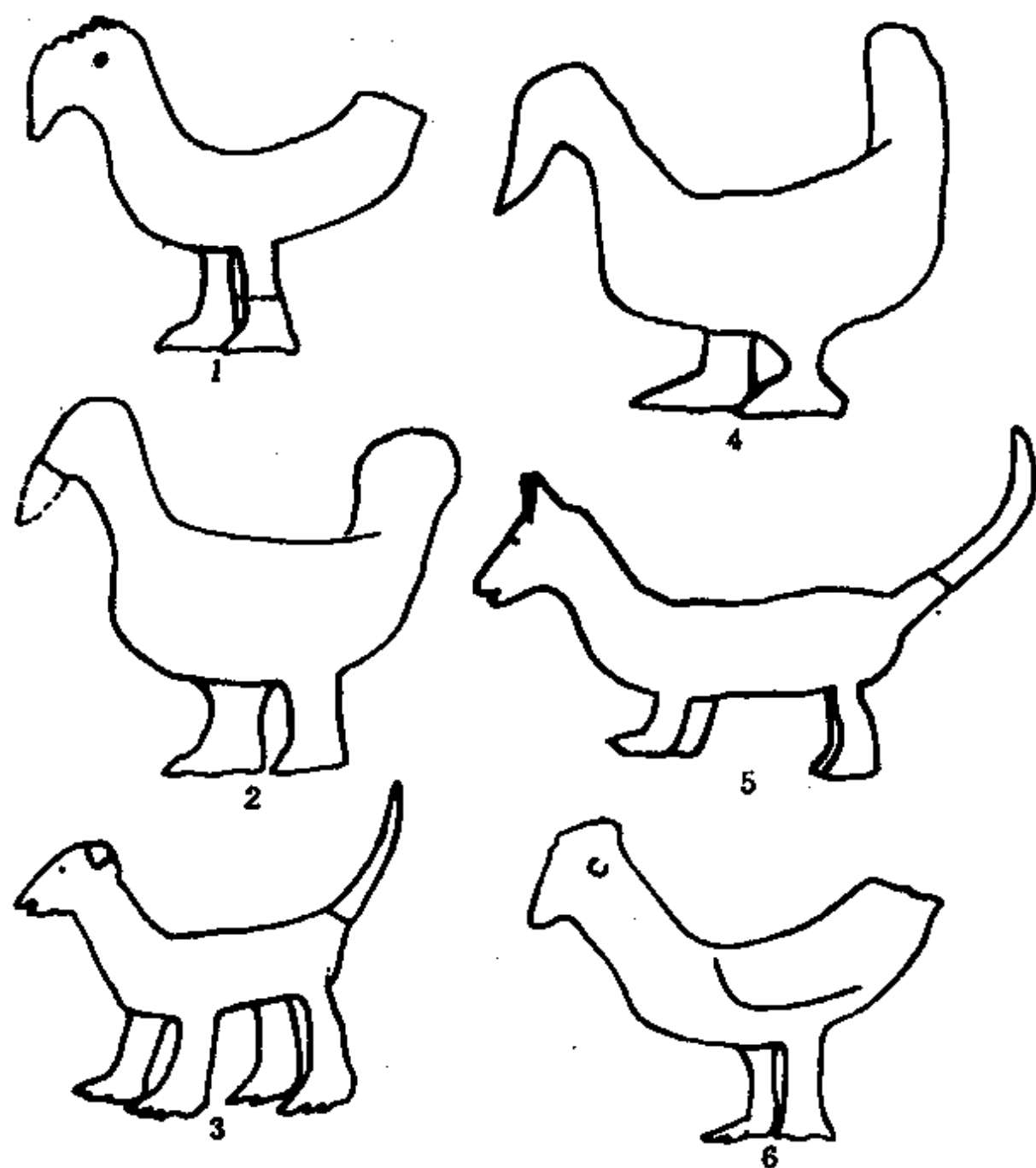
4、陶器 89 件。

陶鸡 2 件(K:48、K:49)。灰色陶质,形制基本一致。似为一雌一雄,尾残,鸡冠、鸡翅清晰,双腿直立,长 24 厘米,高 18.7 厘米。(图四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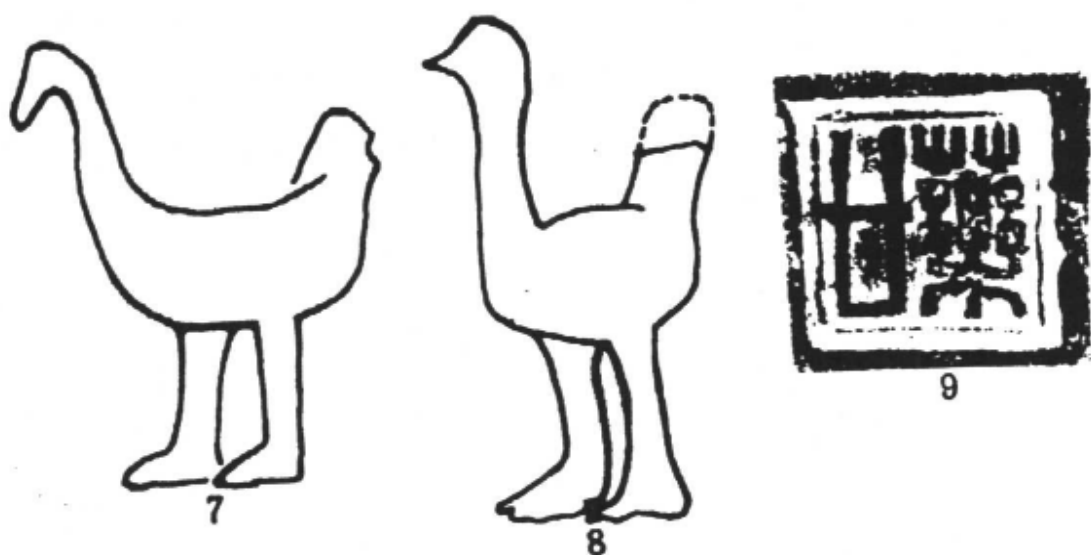
陶鸭 2 件。灰色陶质。标本 K:50,为雌性,嘴扁长,尾扁圆,体浑圆肥大,短足,直立,长 33 厘米。(图四,4)标本 K:51,雄性,嘴断残,尾呈扁圆形,腹浑圆,双足直立,长 32.5 厘米(图四,2)

陶鹅 2 件。灰色陶质。标本 K:52,雌性,长脖,扁嘴,长腿,尾呈扁圆形,高 36.5 厘米。(图四,8)标本 K:53 为雄性,长脖高昂,尾残,长腿,足趾清晰,高 32 厘米。(图四,7)

陶狗 2件。灰色陶质。标本 K:54, 双耳下垂, 尾尖高翘, 足趾、嘴、眼清晰, 高 30.3 厘米, 长 39.2 厘米。(图四, 3) 标本 K:55, 耳前竖, 尾细尖高翘, 短腿, 体长, 呈行走状, 嘴、眼清晰, 高 31 厘米, 长 42 厘米。(图四, 5)



图四 出土器物(227-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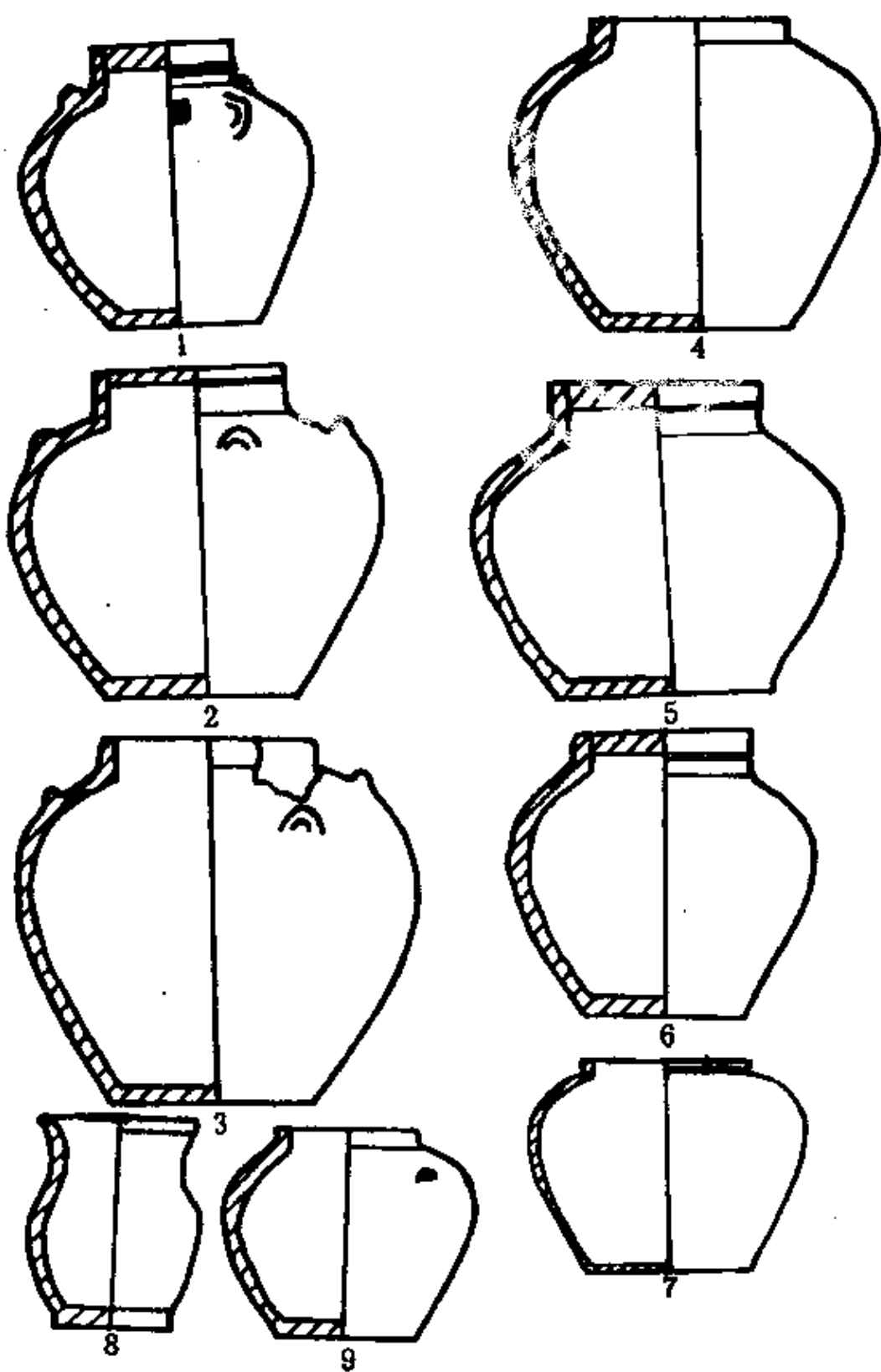
1.陶鸡(K:48) 2.陶鸭(K:51) 3.陶狗(K:54) 4.陶鸭(K:50) 5.陶狗(K:55) 6.陶鸡(K:49) 7.陶鹅(K:53) 8.陶鹅(K:52) 9.“丹药”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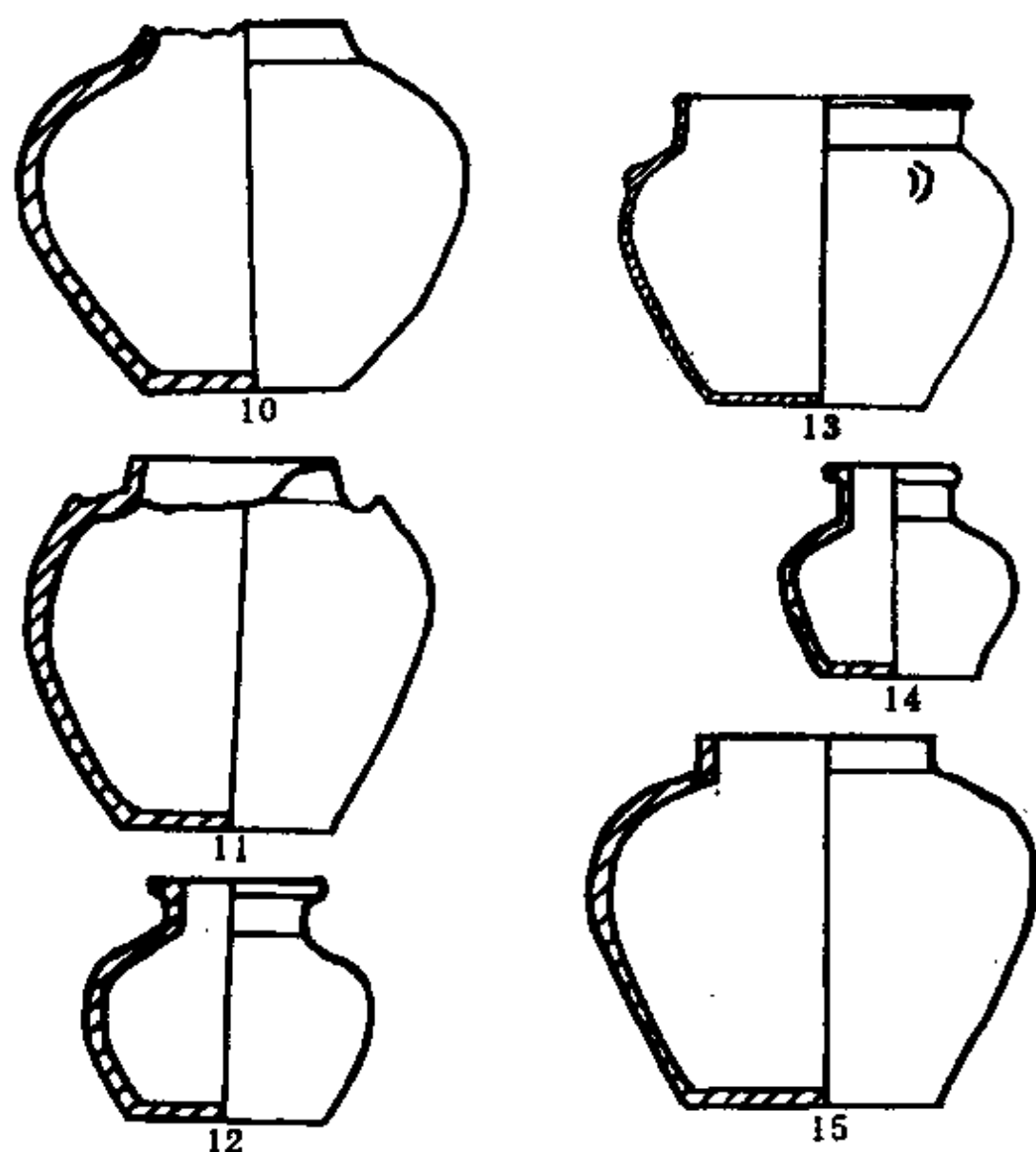
陶罐 15件。分6种。

“丹药”罐 5件。灰色陶质。标本 K:56,直口,方唇,斜肩,鼓腹,平底,肩有等距四系,并对称印有篆体阳文“丹药”戳记两个,有平顶圆盖,通高 19.8 厘米,口径 4.5 厘米。(图四,9;图五,1)标本 K:61,直口,圆唇,斜肩,鼓腹,平底,肩有等距四系,并对称印有篆体阳文“丹药”戳记两个,有平顶圆盖,口残,通高 20.7 厘米,口径 12.2 厘米。(图五,2)标本 K:90,形制同标本 K:61,独无盖。(图五,3)

陶盖罐 2件。灰色陶质。标本 K:57,直口稍侈,圆唇,斜肩,鼓腹,平底,有平顶圆盖,无系,通高 16.3 厘米,口径 10.11 厘米。(图五,6)标本 K:95,口稍侈,圆唇,斜肩,鼓腹,腹部有模糊弦纹,平底,有平顶圆盖,通高 16.8 厘米,口径 10.8 厘米。(图五,5)

陶双系罐 2件。灰色陶质。标本 K:58,口稍侈,圆唇,圆肩,鼓腹,平底,肩有对称两系,均残缺,高 14.8 厘米,口径 10.7 厘米。(图五,9)标本 K:91,直口,圆肩,斜腹,平底,肩有对称两系,高 21.5厘米,口径 11.3 厘米。(图五,11)





图五 出土陶器(229-230)

1.“丹药”罐(K:56) 2.“丹药”罐(K:61) 3.“丹药”罐(K:90) 4.陶罐(K:96) 5.陶盖罐(K:95) 6.陶盖罐(K:57) 7.陶罐(K:66) 8.陶瓶(K:60) 9.陶双系罐(K:58) 10.陶罐(K:94) 11.陶双系罐(K:91) 12.陶小罐(K:59) 13.陶四系罐(K:65) 14.陶壶(K:106) 15.陶罐(K:93)

陶小罐 1件(K:59),灰色陶质,侈口,卷唇,短颈,鼓腹,平底,高11.6厘米,口径7.5厘米。(图五,12)

陶四系罐 1件(K:65),灰色陶质,直口,鼓腹,平底,腹部有模糊弦纹,肩有等距四系,高30.5厘米,口径27.8厘米。(图五,13)

另有4件陶罐,灰色陶质。标本K:66,口稍侈,卷唇,圆肩,斜腹,短颈,平底,高22.8厘米,口径19厘米。(图五,7)标本K:93,直口,圆唇,短颈,圆肩,鼓腹,平底,无盖,高16.4厘米,口径9.7厘米。(图五,15)标本K:96与K:93相同,高15.2厘米,口径10厘米。(图五,4)标本K:94,敛口,短颈,斜肩,鼓腹,下腹部饰有模糊弦纹,平底,高16.2厘米,口径10厘米。(图五,10)

陶盆 4件。灰色陶质。标本K:62,敛口,宽沿,鼓腹,压痕纹,小平底,口沿残,高10.3厘米,口径19.6厘米。标本K:63,为敞口,宽沿,斜腹,腹饰弦纹,平底,高19厘米,口径50.2厘米。

陶灯台 3件(K:47、K:97、K:107)。灰色陶质,形制基本一致。高柄,上粗下细,顶均残,喇叭形足,高分别为16.9厘米,17.8厘米和17厘米。

陶盘 7件。灰色陶质。其中陶三足盘2件,形制基本一致。均为侈口沿,平底,底有等距三足,其中标本K:71,高8.7厘米,口径34.5厘米。(图六,4)另5件陶盘,形制基本一致,均为侈口,斜宽沿,浅腹,平底。

陶双耳环 17件。形制基本一致,标本K:73,灰色陶质。侈口,浅腹,双耳,平底,高4厘米,宽10.9厘米,长13.6厘米。(图六,1)

陶碗 10件。灰色陶质。其中8件形制基本一致,均为侈口,浅腹,小平底。其中标本K:76,高6厘米,口径17.5厘米。(图六,5)另两件尺寸分别为标本K:74,高4.7厘米,口径16.3厘米;标本K:75,高6.4厘米,口径16.3厘米。

陶瓶 1件(K:60),灰色陶质,侈口,圆唇,短颈,斜腹,平底,高11.7厘米,口径8.7厘米。(图五,8)

陶磨盘 1件(K:64),灰色陶质,槽形磨盘,中有两孔,盘径31.2厘米。

陶钟 1件(K:67),灰色陶质,钮为柄状,中有对钻穿孔,高19厘米,口径21.5厘米。(图六,6)

陶盞托 2件(K:68、K:69)。灰色陶质,形制基本一致。盞托一体,盞为釜形,有三足,托为侈口,浅腹,平底,通高5.7厘米,径21厘米,盞口径8.3厘米。(图六,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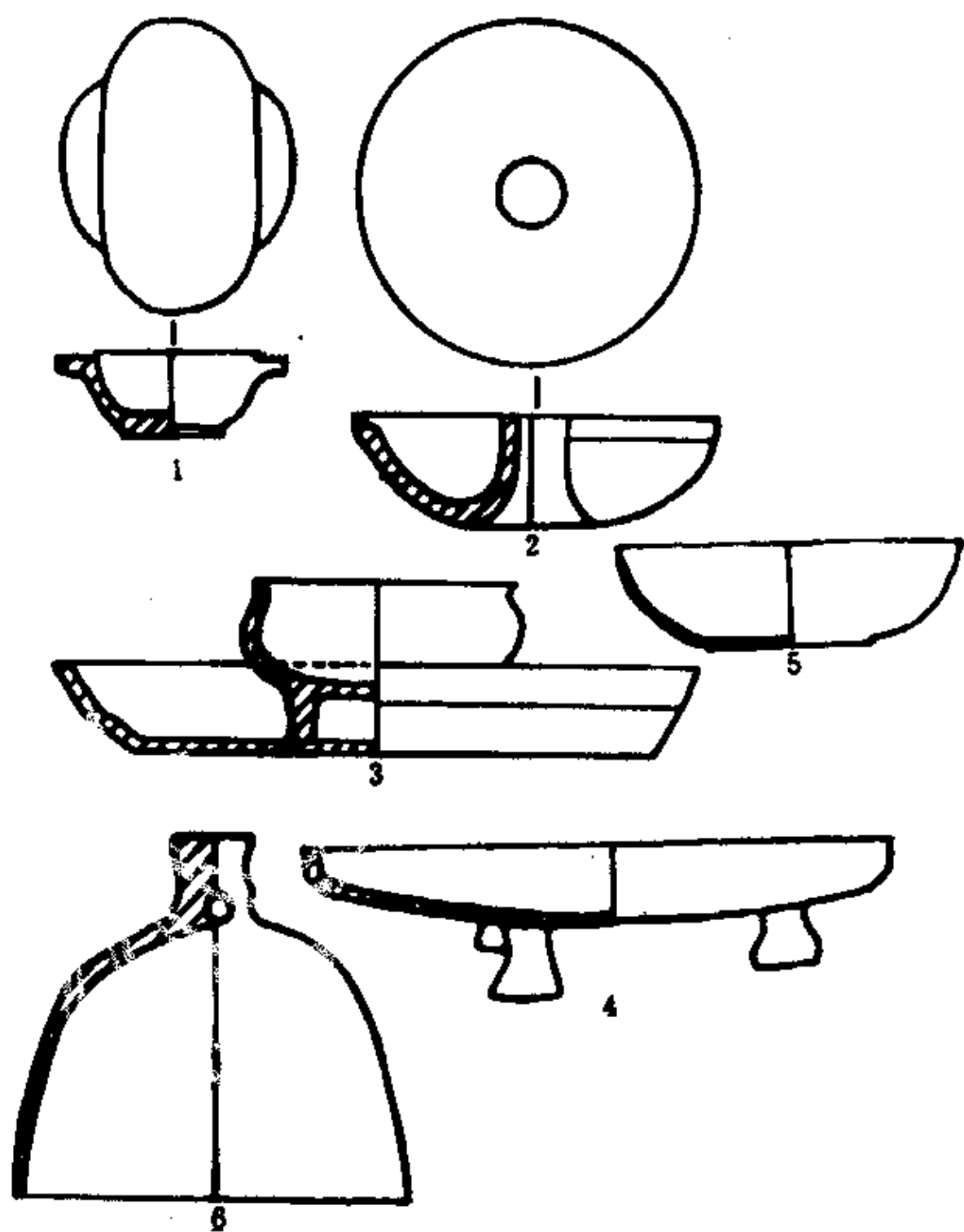
陶熏 2件。灰色陶质,大小各一。大者(K:70),侈口尖唇,浅腹,平底,中间有一柱形孔,高4.9厘米,口径16.6厘米。(图六,2)小者(K:101),侈口,深腹,平底,中间有一柱形孔,口沿残,高2.1厘米,口径8.7厘米。

陶灶 3件。灰色陶质。标本K:78,灶体平面呈长方形,前面有长方形灶门和较高的挡火墙,后有圆形烟孔,灶面有两个圆形火眼,上置一釜一甑,甑底有一小孔,灶体总长42.65厘米,宽23.8厘米,高18.3厘米,釜高4.8厘米,甑高5.6厘米。标本K:79,灶体平面呈圭形,上置一甑,甑底有六个小孔,灶门旁及灶面饰菱形纹,灶体长20厘米,宽14.8厘米,高9.9厘米,甑高5厘米,口径11.5厘米。标本K:80,灶体平面呈椭圆形,前面有方形灶门,后有柱状圆形烟孔,灶台上有一个圆形火眼,高8.7厘米,宽13厘米,长17.8厘米。

陶案 2件。灰色陶质。其中标本K:81,案面呈长方形,有四条弯腿及两根横底座,案面长42.3厘米,宽22厘米。标本K:82,案面呈长方形,面有八个方形卯孔,缺腿,长50厘米,宽22.6厘米。

陶瓢 1件(K:83),灰色陶质,口稍侈,浅盘式,有柄,口径27.2厘米。

陶勺 2件。灰色陶质。标本K:84,深勺斗,底部较尖,有柄,柄弯曲细长,长20.6厘米,高3.8厘米。标本K:102,勺斗为圆形,深腹,平底,宽沿,柄残缺,口径10.6厘米。



图六 出土陶器

1. 陶双耳杯(K:73) 2. 陶盘(K:70) 3. 陶盘托(K:68) 4. 陶盘(K:71) 5. 陶碗(K:76) 6. 陶钟(K: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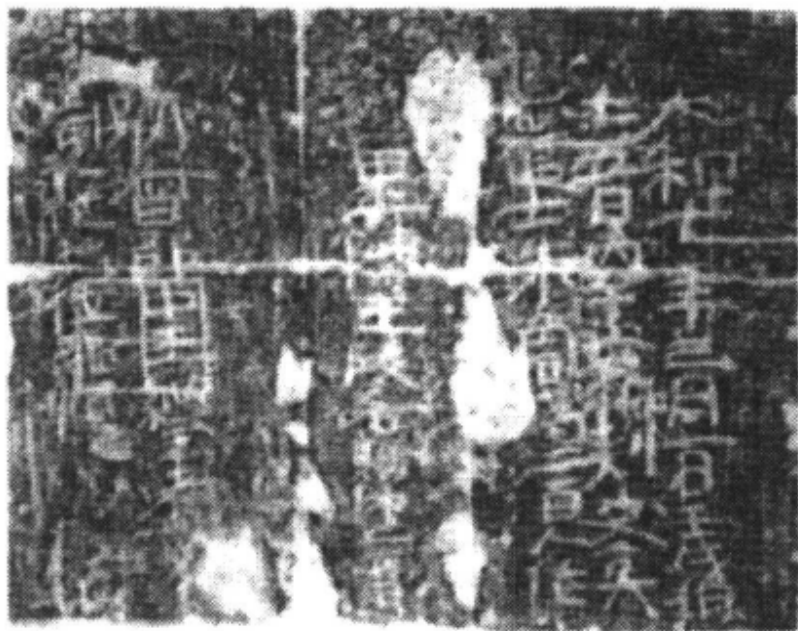
陶壶 1件(K:106),灰色陶质,口稍侈,卷唇,直颈,鼓腹,平底,高10.3厘米,口径7.5厘米。(图五,14)

陶井 2件。灰色陶质。标本 K:86,筒形,口有两斜直支架,高13厘米,口径9.5厘米。

另外还有陶车1件(K:108),灰色陶质,已残为21块,难以拼接;陶器盖3件,灰色陶质,其径分别为15.7厘米、15.7厘米和14.7厘米。

铭文砖 1块(K:77),青灰色,砖质较硬,长43厘米,宽20厘米,厚11厘米,重14.2公斤,中间断裂,三面有阴刻铭文6行,计字56个。其铭文曰:

太和七年三月一日壬戌朔十五日丙午兖州刺史候昶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毕陈王陵各赐休二百日别督郎中王纳主者司徒从掾位张顺(图七)



图七 曹植墓出土的铭文砖拓片

云母片 2包,其中一包剪成日月星辰等几何图形状,重 41.5 克;另一包碎为残片,重 6.5 克。

另外还有碎铜片 2 包,计 5 块;鍍金残铜扣 3 件;残铜扣 4 件;小铜铺首 5 件;小铜泡 3 件;小铜环 3 件;小铜钮 1 件;鍍金环状饰件 1 件;残铁器 1 件;残棺钉 1 件;料器残块 1 件等。

三、结语

通过对曹植墓资料的整理和各方面考察,使我们得以明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该墓为一迁葬墓,是由河南省淮阳县(古陈地)迁来的(至今淮阳县城南仍存有曹植的衣冠冢—思陵冢)。据文献记载,曹植于魏太和三年(229 年)由雍丘(今河南省杞县)迁徙来到东阿(今山东阳谷县阿城镇)为王,食户三千,尔后又于太和六年(232 年)二月改徙陈王(治所在今河南淮阳)。陈寿在《三国志·陈思王植传》中有一段详细记载:“(太和六年)其二月,以陈四县封植为陈王,邑三千五百户。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僚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三国志·明帝纪》载,太和六年十一月“庚寅,陈思王植薨”。由此可见,曹植在封陈王的当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就去世了,并且病死在陈。然而曹植在做东阿王期间,“每登鱼山,有终焉之志。后徙王陈,薨。其子志,遵治命,返葬于阿,即山为坟”。^③这还有 1977 年 3 月在曹植墓壁中发现的一阴刻铭文砖为证。该砖铭详细记载了曹植遗骸的迁葬时间及修建陵墓的具体过程。^④二是曹植墓实行的是薄葬。当时当地群众曾谣传“破开曹子建(墓),富了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其实不然。《三国志·陈思王植传》就曾记载“遗令薄葬”。从考古发掘中发现,所出土的 132 件文物,大都为比较

粗糙的陶器,还有几件石器和料器,没有发现什么贵重物品,符合曹丕在遗令中规定的那样,“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⑤亦符合其父曹操一贯倡导的“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⑥当然,曹植生前的生活是比较困苦、潦倒的,“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⑦死后亦难以厚葬,那种“富了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最后,关于曹植墓的墓葬形制,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徐苹芳、黄景略、俞伟超等先生于1993年1月26日考察了曹植墓后,认为曹植墓从形制到葬品,都堪称曹魏时期的标型,对于研究曹魏时期的丧葬制度、社会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⑧该墓于1996年11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四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文在编写过程中曾得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文祺先生、聊城市文管会陈昆麟、孙永生等先生的指教,同时还得到东阿县图书馆李清洪、张昭刚二同志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注 释

①1977年3月在曹植墓墓壁中发现的阴刻铭文砖记载,曹植墓的始建时间为太和七年三月。据《资治通鉴》卷七十二载:“春正月,甲申,青龙见摩陂井中,二月,帝如摩陂观龙,改元。”因此说,太和七年三月应为青龙元年三月为是。

②关于曹植墓的形制结构,我们曾于1995年4月遵国家文物局二处领导的意见,对曹植墓进行了勘探调查,发现该墓打破了一汉墓墓道和一龙山文化夯筑台址,并在墓后室发现了0.55米厚的残存封门砖石。有的专家认为该墓的墓门应在东面,西边还应有后墓室(似为早年坍塌殆尽),否定了以往坐东面西之说。但由于目前尚未对曹植墓进行全面的勘探发掘,很难做出肯定的结论。因此笔者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沿袭档案资料一说。待新的发掘资料证实后,再予以甄别。录此备参,特作说明。

③《东阿县志·古迹志》,清道光九年。

④东阿县文化馆:《曹植墓出土铭文砖释》,《文物》1979年5期;卢善焕:《曹植墓砖铭释读浅议》,《文物》1996年10期;赵乃光:《曹植墓砖铭补释》,《文献》1989年3期。

⑤《三国志·文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81页。

⑥《三国志·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27页。

⑦《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中华书局,1959年,591页。

⑧郡萍:《曹植墓》,《中国文物报》1992年12月19日。

曹植墓出土器物表

单位:厘米、件

总号	分类号	名 称	数量	尺 寸	备 注
37	K:37	青玉璜	1	外径8.1,内径3.4	为两个半环形
38	K:38	青玉璜	1	长11.8,宽5.65	
39	K:39	青玉璜	1	长8.6,宽3.3	
40	K:40	白料泡	1	径4	玛瑙
41	K:41	绿料泡	1	径3.7	绿松石
42	K:42	花石球	1	高3.3,腰径3.5	顶残
43	K:43	青玉珠	1	径1.75	青玉质
44	K:44	玛瑙球	1	径1.35	红玛瑙质
45	K:45	石圭	1	高22.7,宽11,厚2.7	
46	K:46	石壁	1	外径25.2,内径7.9	断裂
47	K:47	陶灯台	1	高16.9	顶残
48	K:48	陶鸡	1	长24.7	尾残
49	K:49	陶鸡	1	长24,高18.7	残
50	K:50	陶鸭	1	长33	足脱落
51	K:51	陶鸭	1	长32.5	足脱落、嘴残
52	K:52	陶鹅	1	长43,高36.5	残
53	K:53	陶鹅	1	长40.2	残
54	K:54	陶狗	1	高30.3,长39.2	尾脱落、腰断枯
55	K:55	陶狗	1	高31,长42	尾脱落
56	K:56	陶四系“丹药”盖罐	1	高19.8,口径4.5	肩有“丹药”戳记二个
57	K:57	陶盖罐	1	高16.3,口径10.11	
58	K:58	陶双系罐	1	高14.8,口径10.7	
59	K:59	小陶罐	1	高11.6,口径7.5	口残
60	K:60	陶瓶	1	高11.7,口径8.7	
61	K:61	陶四系“丹药”罐	1	高20.7,口径12.2	有盖,口残

总号	分类号	名 称	数量	尺 寸	备 注
62	K:62	陶 盆	1	高 10.3, 口径 19.6	口残
63	K:63	陶 盆	1	高 19, 口径 50.2	
64	K:64	陶磨盘	1	径 31.2	残
65	K:65	陶四系罐	1	高 30.5, 口径 27.8	
66	K:66	陶 罐	1	高 22.8, 口径 19	
67	K:67	陶 钟	1	高 19, 口径 21.5	
68	K:68	陶盘托	1	高 5.7, 口径 21, 小口径 8.3	口残
69	K:69	陶盘托	1	高 5.7, 口径 21, 小口径 8.3	
70	K:70	陶 熏	1	高 4.9, 口径 16.6	
71	K:71	陶三足盘	1	高 8.7, 口径 34.5	
72	K:72	陶 盘	1	高 5, 口径 28.2	
73	K:73 (1-17)	陶双耳杯	17	高 4, 长 13.2, 宽 10.9	
74	K:74	陶 碗	1	高 4.7, 口径 16.3	口残
75	K:75	陶 碗	1	高 6.4, 口径 16.3	
76	K:76	陶 碗	8	高 6, 口径 17.5	
77	K:77	铭文砖	1	长 43, 宽 20, 厚 11	三面有铭文
78	K:78	陶灶(附釜、甑)	3	长 42.6, 宽 23.8, 高 18.3	
79	K:79	陶灶(附甑)	2	长 20, 宽 14.8, 高 9.9	底残, 甑残破
80	K:80	陶 灶	1	长 17.8, 宽 13, 高 8.7	
81	K:31	陶 案	1	长 42.3, 宽 22	残
82	K:82	陶 案	1	长 50, 宽 22.6	腿残
83	K:83	陶 瓢	1	口径 27.2	
84	K:84	陶 勺	1	长 20.6, 高 3.8	
85	K:85	陶 井	1	高 15.7, 口径 14	
86	K:86	陶 井	1	高 13, 口径 9.5	
87	K:87	陶 盆	1	高 18.3, 口径 48.3	口沿残

总号	分类号	名 称	数量	尺 寸	备 注
88	K:88	三足陶盘	1	高 5.7, 口径 32.6	残
89	K:89	陶四系“丹药”罐	1	通高 20.5, 口径 11.1	肩有“丹药”戳记, 带盖
90	K:90	陶四系“丹药”罐	1	高 20, 口径 12.7	带盖, 口残
91	K:91	双系陶罐	1	通高 21.5, 口径 11.3	残
92	K:92	陶四系“丹药”罐	1	通高 20.5, 口径 11.3	
93	K:93	陶 罐	1	高 16.4, 口径 9.7	
94	K:94	陶 罐	1	高 16.2, 口径 10	口沿残
95	K:95	陶盖罐	1	高 16.8, 口径 10.8	
96	K:96	陶 罐	1	高 15.2, 口径 10	口沿残
97	K:97	陶 灯	1	高 17.8	顶残
98	K:98	陶 盖	2	径 15.7	
99	K:99	陶 盖	1	径 14.7	
100	K:100	陶 盘	1		碎为数块
101	K:101	小陶熏	1	高 2.1, 口径 8.7	残
102	K:102	小陶勺	1	径 10.6	柄残缺
103	K:103	陶 盘	1	口径 31	口沿残
104	K:104	陶 盘	1	口径 28.5	
105	K:105	陶 盘	1	口径 27.6	残破
106	K:106	陶 壶	1	高 10.3, 口径 7.5	口残
107	K:107	陶 灯	1	高 17	顶残
108	K:108	陶 车	1		残为 21 块
109	K:109	陶 盆	1		残为 6 块
110	K:110	碎铜片	4		残
111	K:111	鍍金残铜扣	1		
112	K:112	残铜扣	3		1 包
113	K:113	鍍金残铜扣	1		玉质
114	K:114	料器残块	1		

总号	分类号	名 称	数量	尺 寸	备 注
115	K:115	小铜铺首	3		1 包
116	K:116	小铜铺首	2		2 包
117	K:117	小铜泡	1		残
118	K:118	小铜泡	1		残
119	K:119	小铜环	1		
120	K120	小铜环	1		
121	K121	小铜钮	1		
122	K122	残铜扣	1		
123	K123	残铜片	1		
124	K124	鍍金铜扣	1		
125	K125	鍍金环状饰件	1		1 包
126	K126	小铜环			
127	K:127	残铁器	1		
128	K:128	棺 钉	1		残
129	K:129	白料球	1	径 0.75	
130	K:130	小铜泡	1		
131	K:131	云母片	1 包	重 41.5 克	剪成日、月、星辰诸形
132	K:132	云母片	1 包	重 6.5 克	
133	K:133	白料球	1		
134	K:134	青玉球	1		
总计			133		

注:以上为东阿县图书馆 1991 年 6 月馆藏器物登记目录。其中除铭文砖(K:77)为 1977 年 3 月新发现出土外,其余 132 件均为 1951 年 6 月由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清理出土的。

高唐郭五里汉墓

曲建江

高唐农民郭秀水在郭五里村北 500 米处开挖个人承包的鱼塘时,发现砖室古墓一座,他立即停止了鱼塘工程,向文化部门报告。文化部门对此十分重视,及时抽调了考古工作者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此墓座北朝南,长约 12 米,布局较为复杂,有墓道,耳室两间,并有前后甬道和前后墓室。早年曾多次被盗,但墓之结构仍保持完整,建筑风格浑厚、古朴,墓之发券技术已十分成熟。考古工作者根据墓之形式、墓砖及出土的陶器残片,初步断定墓的年代为东汉。

此墓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随葬品集中在前墓室,共清理出了可复原的陶楼、陶仓、陶灶、陶灯、陶盆等器物的碎片三百余块,完整的人物俑、鸡俑、狗俑等数件。这些随葬品表面均涂有彩釉,包彩绚丽,质感华美,其中主要有蓝釉、绿釉、粉红釉。随葬品中的陶楼、陶仓、陶灶全是仿照东汉时期的实物制作,造型优美,个体庞大,装饰复杂,在省内尚属罕见;随葬品中的人物俑、动物俑神态逼真,栩栩如生,是难得的古代艺术珍品,其中有猪俑、狗俑各一件,其形象与现代猪狗大不相同,还带有十分明显的野生动物的形象特征。

墓主人的头骨在前室和后甬道交口处发现,这个头骨在地下近两千年的时间里由于吸收了土壤中的矿物质而石化,变的十分坚硬,表面呈绿色和黑色,这种情况在中原地区也是较为罕见的。

高唐郭五里东汉砖室墓的发现,远远超出了对高唐这一局部地区历史研究的范畴。它的发现对于了解和研究东汉晚期的墓葬形式、建筑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状况都有重要价值;而且这对于深入地研究当时的风俗习惯,审美观点,意识形态都有一定的价值。

山东临清瓷窑址调查

陈昆麟

一、地理位置

新发现的这处未见记载的瓷窑址,位于临清市城南约五公里的胡家湾附近,分布在原卫河一拐弯处的两岸。据文献记载,北宋晚期至金朝,这里曾有一大镇,名曰曹仁镇。这时期的临清县治就设在这里。后来,临清县城迁址,这里一直被称为旧县。可能在这一阶段,临清的瓷窑址开始出现。当时的卫河流到这一地带时,曾有一向东凸出的弓形大弯,六十年代整修卫运河时,为了将卫河的弯道调直,将河床西移,在开挖新的河床时,将原来埋于地下的瓷窑址挖出,出土了大量瓷片。但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处重要的瓷窑址。据群众回忆,当时将地下挖出的瓷片,有的填入原来的河床,有的堆为堤防,给原来的部分窑址造成极大的破坏。

宋金时期这里为什么会有瓷窑址,估计与当时便利的交通有关。首先这里紧邻当时的临清县城——曹仁镇,其次,卫河便于水运。瓷窑的建立地点,不仅要便于原料的运进,还要便于产品的运出,没有这一便利条件,瓷窑的再生产便十分困难。从其他地方来看,也是如此,如磁州窑址就是以观台镇为中心,分布在镇西两公里漳河的两岸;登封曲河窑则位于颍河的北岸,交通方便。有碑文记载,“窑场环设,商贾云集”。这两处窑址所处的地理位置,与临清新发现的窑址的地理位置极为相似。可能因水患而将此窑址埋

于地下。

二、拣选标本描述

1991年春,卫运河的水几近干涸。有的群众在河床中拣到宋代铜钱,又见有许多瓷片,以为是沉船上的瓷器。于是,开始在这里挖土取宝,有时竟达数百人。我们听到消息后,立即赶赴现场,在公安人员的配合下,很快制止了破坏瓷窑遗址的行为。经过我们和临清市博物馆同志们的联合调查,发现这处瓷窑址面积相当大。在东北、西南走向长近两公里、东西宽约八十多米的范围内,满河床都是各类瓷片。我们不仅捡到许多瓷片标本,还捡到许多烧制瓷器的窑具以及窑内烧结块。拣选的标本多为白釉黑花、白釉酱花、黑釉瓷片,间有青釉、月白釉瓷片。器形有碗、盘、罐、盆等。特别是窑具和窑渣的出现,证明这些瓷片绝非沉船中遗留,我们认为这应是一处一直未被今人发现的瓷窑址。该窑址就是在这种偶然机会中发现的,现将捡拾的部分有代表性的标本描述如下:

“王”字白釉酱花碗:口径20.5、高8、底径6.5厘米,这件瓷碗残片,从造形、纹饰来看,都有明显的窑系特点和时代特征。《中国陶瓷史》第241页有这样一段描述:“……探方共分七层,第一、二层出土瓷器具典型的元代作风,其中碗里书写“王”字铭文的与各地元墓出土者相同。”而这一残片的底部恰好也有一“王”字,其时代当为元代无疑。而从其胎质釉色来看,当属磁州窑系。

“风”字款白釉黑花碗残部:这件瓷碗虽残破严重,但保留有整个圈足和约两厘米的口沿部位。基本能看出整个碗的原貌。口径17.5、高8、圈足外径7.1厘米。圈足宽而矮平,内径5.5厘米。碗内施全白釉,外部白釉仅施至口沿下2.2厘米处,其余部分直到圈足,均无釉,外部釉层较厚,有泪痕状积釉。釉色乳白,有冰裂纹,胎质灰白密实。字的结构舒适,行笔流畅飘逸,就书法艺术而论,

也可列为上乘。

“渔村落照”款瓷碗残部：仅剩圈足大部，圈足周围仅剩2~5厘米碗身。圈足外径7.5、内径5.5、高0.5厘米。碗内施白釉，有细冰裂纹，碗的底部用黑色釉画有两道不太规整的弦纹。内圆径11.5厘米，两圆间距0.4厘米。内圆中较合理的用墨釉书写了“渔村落照”四个字。字径3~4厘米。四字书写流畅舒展，遒劲浑厚。虽为民间艺人所写，但颇具大家之气。碗外施黑釉，一直施到圈足，且圈足的内侧也施有部分黑釉。釉面较粗。此碗和“风”字碗的施釉方法有很大差别。

鹧鸪斑釉黑碗：口径13.2、高5.4、底外径4.6厘米，敛口，腹深而微鼓。外部施半釉，釉面平整均匀。釉色乌黑光亮。碗内施金釉。在乌黑光亮的黑釉面上，有许多如鹧鸪羽毛状的银灰色斑点，在阳光下尤为明显。鹧鸪斑釉是油滴釉中的一种。据史书记载，鹧鸪斑釉是宋代黑釉的又一种装饰。就传世品看，福建地区、北方地区瓷窑中发现不少宋代油滴釉碗。其造形、胎土、施釉等特征，带有典型的建窑特色。北方地区瓷窑中也有这种油滴结晶标本，如河北定窑、河南鹤壁窑和山西临汾窑，以临汾窑稍多，定窑、鹤壁窑的油滴结晶斑点很小，但银光色泽很强。从这件标本来，油滴大而不太明显，很可能是临清窑自身的特点。

宋金时间，黑釉的产生与当时的斗茶风气有关。史书记载，宋代的茶叶是制成半发酵的膏饼。饮用前先把膏饼碾成细末放在茶碗内，再用滚开的水冲沏。水面立即沸起一层白色的沫。而黑色茶盏便于衬托白色茶沫观察茶色、因此，斗茶者特喜爱黑色茶盏。宋徽宗赵佶也很爱此道，常与臣属斗茶，上行下效，影响很大。徽宗在他写的《大观茶论》中说：“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篚之精，争鉴裁之别。”宋人唐庚《斗茶记》也说“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

之而第其品”。蔡襄《茶录》里谈到,宋代斗茶者茶色以白为贵。因此,黑盏最为适宜观色。正因为有这种特殊需要,黑釉盏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宋代关于记载黑茶盏的文字不少。陶毅《清异录》载:“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僧洪在诗中写道:“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斑中吸春露。”“鹧鸪碗面云茱字,兔毫瓯心雪作泓”,则是诗人陈蹇叔对黑釉盏的写照。可见黑釉碗在斗茶者心目中的地位。社会上层和众多文人墨客对黑釉的青睐,必然影响到社会各阶层,也会很快由南方传到北方。

宋金时期,临清的县治就在瓷窑东侧约三公里的曹仁镇。紧临卫河,宋代的运河也恰好与卫河合流,在那仅靠舟车为主要运载工具,以运河为主要运输要道的时代,当时的临清县的交通应当说十分便利了。烧制黑瓷的技术,乃至斗茶之习会很快传到临清,这也是该窑址为什么会生产油滴釉黑色瓷器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从这只碗的造形来看,敛口、深腹,小圈足。元代虽然也有类似的碗,但仅见于青花,而宋金时期的这种黑釉倍受喜爱;这件鹧鸪斑釉黑碗,极可能是宋金时期的产品。

黑釉金线罐残片:这里散布着许多类似的残片。釉色乌黑光亮,罐体布满一条条突起的竖线,大部分呈淡黄色,亦有白色者,人们通称金线罐。现在我区有两件完整器物,都是传世品,一件是在平县文物部门从乡间征集的,品象特好,釉面光洁明亮如初,是一件罕见的精品,被定为一级文物。另一件从品象上看,略逊于前件,但造形、纹饰、釉色都与前件相似,只是罐体上有一不明显的裂痕,被定为三级文物。这两件器物在省文物鉴定小组进行文物鉴定时,定为金代产品。

青花瓷盘:在制止乱挖遗址时,从一群众手里见到的。盘子已断为三半,但残而不缺。盘口径约 15 厘米,盘内底部有“秋城馆”三字。盘的边沿和中部有不规则的青色釉块,且器物表面有冰裂

纹。“秋城馆”三字为酱釉(当时,我千方百计做工作,想把这件器物收过来,没有做通,最后总算让拍了一张照片)。器物虽然不大,做工也不太精细,但“秋城馆”三字却大大提高了该器物的价值。元代曾有“秋成殿”款识,见于磁州窑白釉四系壶,书于器肩腹部。“秋成殿”是否与“秋城馆”是一个意思。有待进一步考证。

青花瓷盘:径约 15 厘米左右。盘内施淡蓝色釉,围绕底部有一弦纹。弦纹内有山水画,为深蓝色釉画成。画面画有远山近树和房屋,山树之间为水。笔法流畅自如,概括力强,是一幅非常完整的写意画。釉面也有冰裂纹。

钧窑瓷碗(残部):月白釉、侈口、平折沿。口径 12.4、底径 5.8、高 3.4 厘米。胎质青灰粗松,釉面不匀,光泽度较差。内施全釉。外部施釉不到底,圈足内外无釉,从这些特点看,当为元代产品。

白釉釉下黑彩大盆残部:此类器物残片也很多。但因残破严重,无法辨认全器。从残部看,口径不少于四十厘米,纹饰为水草。这类器物,磁州窑系诸窑,宋元都产,何时代产品,现难以定论。

捡拾的窑具有:匣钵、碗印花内模、支垫等。匣钵、支垫多为耐火土烧制,碗内模为陶制。现描述如下:

碗内印花模:径 19.2、高 6.9 厘米。是在碗内印花的模具。从残存图案看,似乎是花卉。

匣钵残部:装烧瓷坯的用具,外径 32、内径 22.7 厘米,高度不详。耐火土制成,从其大小看,应是装烧碗、盘之类器物的。

支垫:均是放于两件待烧瓷器之间支撑作用的,这里捡到的有圆锥形、圆球形、圆饼形三种。

(1)圆锥形支垫:高 3.5、底径 3.2 厘米,耐火土制成。

(2)圆球形支垫:径 4.4 厘米,耐火土制成。

(3)圆饼形支垫:有黑、白两种,直径都在 1.8 厘米,厚 0.3 厘

米之间。磁土制成。

窑渣：在这里发现大量瓷片和灰渣烧结在一起的烧结块。黑瓷、白瓷、青瓷的烧结块都有，这绝不会是沉船中的遗物。

房基遗址：发现了好几处砖砌房基，从砖的形状看，亦为宋元遗物，很可能是窑工们住的房子。

三、结论

人们在这里初期挖泥取宝时，都认为瓷片和铜钱来自河中的沉船。我们综合拣选的标本进行分析，认为这是一处遗物极为丰富的瓷窑址。如果是沉船，出土大量的各种类型、各种釉色的瓷片是可以理解的，但不会出土诸多的窑具。如匣钵、印模、支垫等，更不会出土窑渣。这些遗物的出土，充分说明这里是一处不见记载的瓷窑址。

这一窑址的烧瓷时代，延续得也相当长。有宋金时期的产品，如油滴釉碗，也有元代的标本，如“王”字碗，钧窑碗等。特别是“秋城馆”青花盘的出土，更说明这一窑址在元代还是相当发达的。是因为战争，还是因为水患，自明代以降，这里成为临清砖的著名产地，而烧造瓷器的历史，却如沉船一般埋入地下无人知晓了。

这一窑址，至今还没有见到有关的文献记载。不管是山东方志还是国家的文献资料，乃至笔记、碑刻、墓志等，都不曾有只字的记载。我认为这一窑址的发现，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一，临清瓷窑址不见史志记载，这一窑址的发现，将填补中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页空白；第二，该窑基本属磁州窑系。为磁州窑系增添了一处新的产地；第三，该窑生产瓷器品种繁多，白釉、黑釉、青釉瓷器都有，对研究磁州窑系的烧瓷历史，研究南北瓷窑间的互相渗透、互相交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根据捡拾的极少数标本，谈了上述看法，不一定正确。正

确的结论应当来自对该址的正式清理发掘之后。本文如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诸位瓷器研究专家、学者对这一窑址的重视，也就心满意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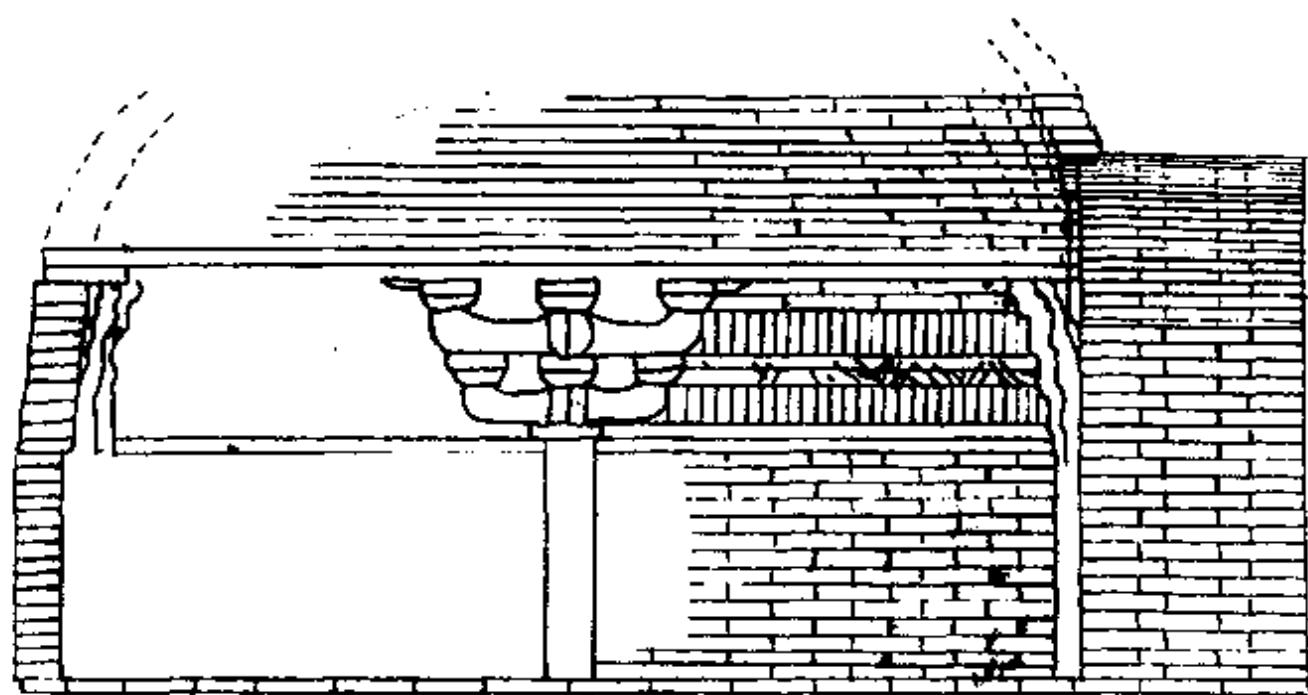
高唐县国棉厂宋墓清理简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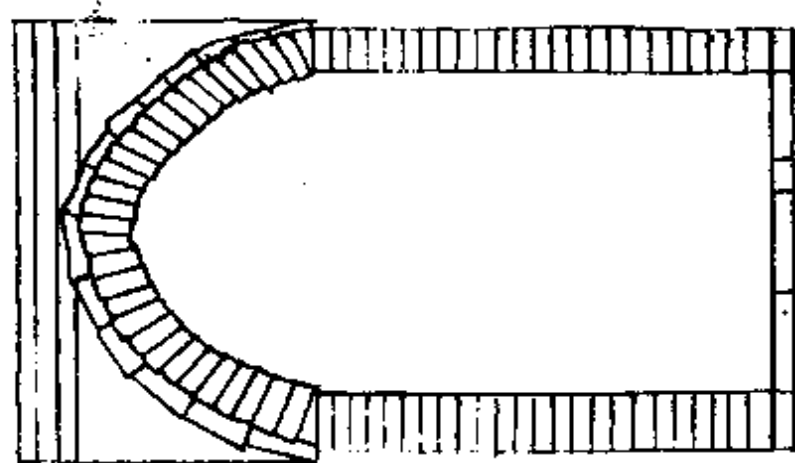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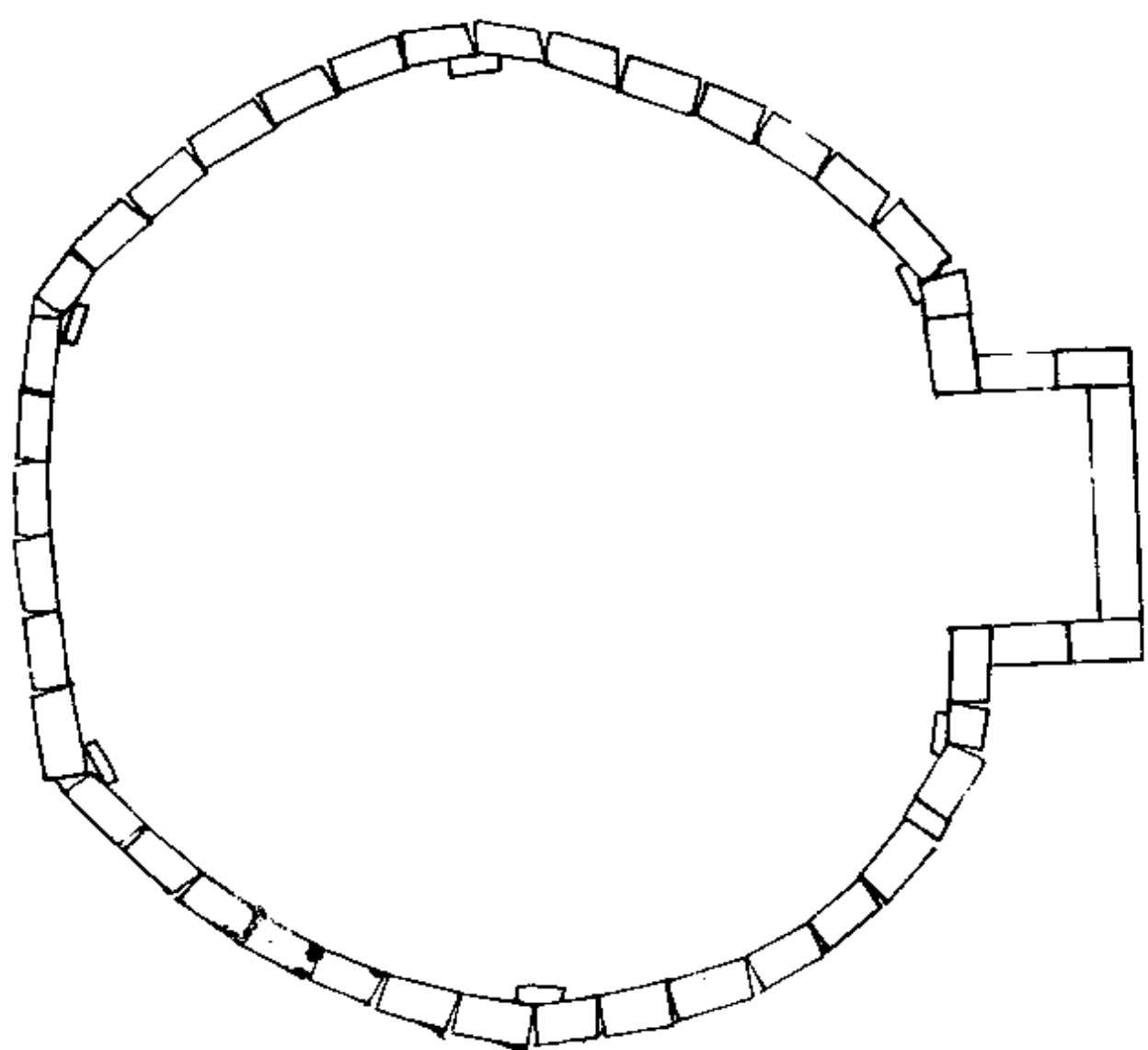
陈昆麟 孙淮生 吴明新

1996年5月7号,高唐县国棉厂挖宿舍楼基槽发现一圆形墓室,随上报文化部门,聊城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派员进行了抢救性清理,简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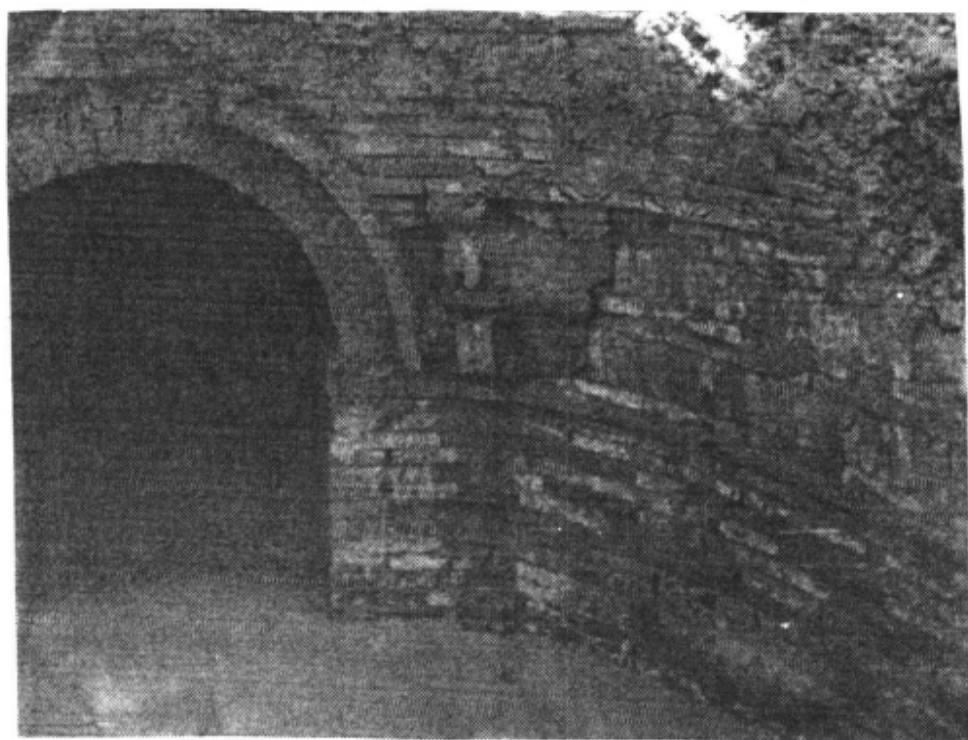
一、墓室结构

墓室底为砖砌正六角形,每边长1.6米。向南有砖砌券拱形甬道。由于水位较高,墓道未做清理。





图一 平、剖图



墓室对角直径 3.58 米。单砖错缝平砌 15 层后,向室内收出凸棱,棱为两层平砌。凸面施以红彩。其上用二层平砌一层竖砌的方法,将墓室由六角形逐渐砌成近圆形。砌至距墓底 1.02 米,又向室内出二层平砌砖的凸棱,其上施以白灰底,白底上用墨线绘连角花。白底,彩绘多脱落不清。以上起券,由起券方式观察,该墓为穹窿顶。墓室六角,均立有半圆面的砖象征为斗拱柱。斗拱为一斗三升式。双层斗拱。斗宽 0.90 米、高 0.54 米。(图一)

二、出土器物

该墓于 70 年代建房时受到破坏,又因地下水位较高、室内情况已不明确。器物位置也不准确。出土器物计瓷器 8 件。(可辨识者)铜币 10 枚。

瓷器有碗、盘两种。

碗 4 件,分二式,均为六曲葵花形。

盘 4 件,分二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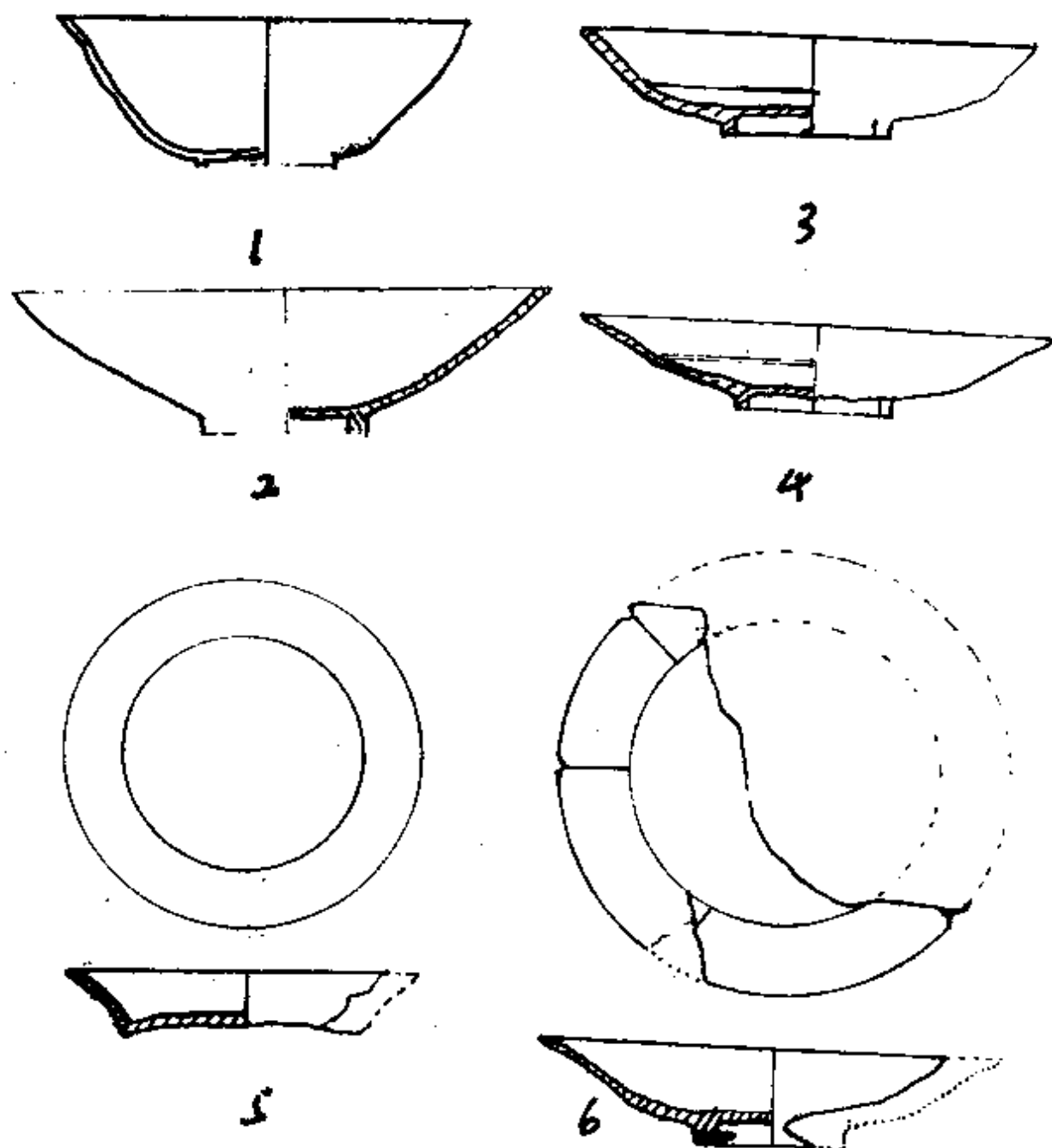
I 式 3 件,96M₁①侈口,斜直壁,矮圈足,白瓷胎,施白釉至底部,内底有 5 个条状支丁,口径 16.7、圈足径 5.7、高 6.1 厘米(图二,1)。96M₁②,白胎、白釉、釉施至圈足,施釉厚薄不均,内底 5 个条状支丁。96M₁③存底青灰胎,圈足内敛,内釉呈豆绿色,外施白釉,圈足露胎,有弦纹。

II 式 1 件,96M₁④敞口,大斜壁,壁外均分 6 条凹槽,以示葵花瓣径。圈足,内外施白釉。底露白瓷胎。内底条状支丁不明显,口径 21.6,圈足径 6.7、高 6.1 厘米(图二,2)

I 式 3 件,均为六曲葵花形,敞口,折壁,白釉施至近圈足,白瓷胎,内底有 5 个小支丁,96M₁⑤壁略弧,平底,圈足,口径 18.6、圈足径 6.8、高 4.1 厘米,96M₁⑥斜壁,外有凸棱,平底口径 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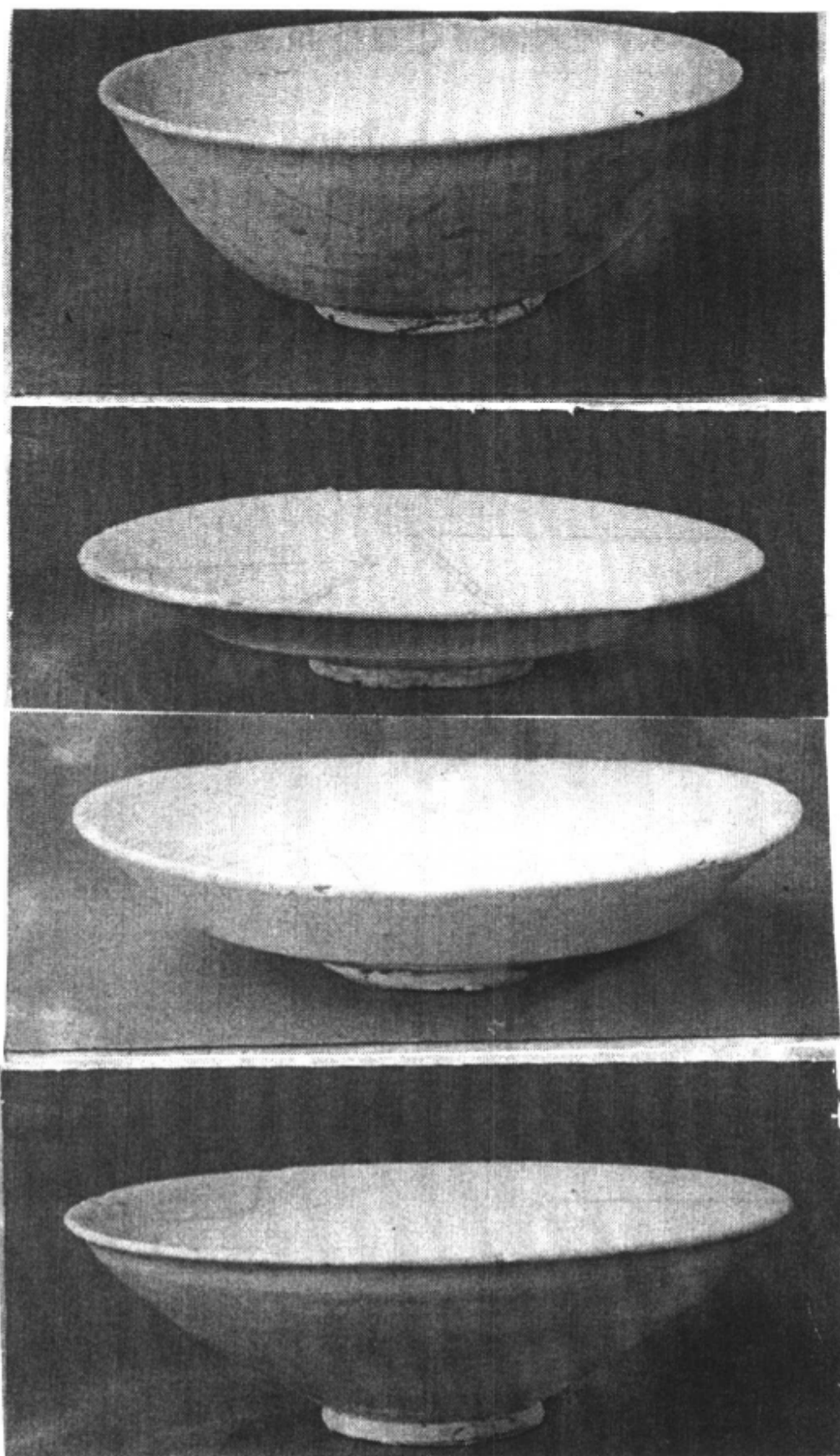
圈足径 6.3、高 3.7 厘米, 96M₁ ①口径 19、圈足径 6.1、高 4 厘米。
(图二, 3、4、6)

Ⅱ式 1件,残,侈口壁略直,大平底,施白釉,内底支丁不明显,口径14.4、底径10、高2.7厘米(图二,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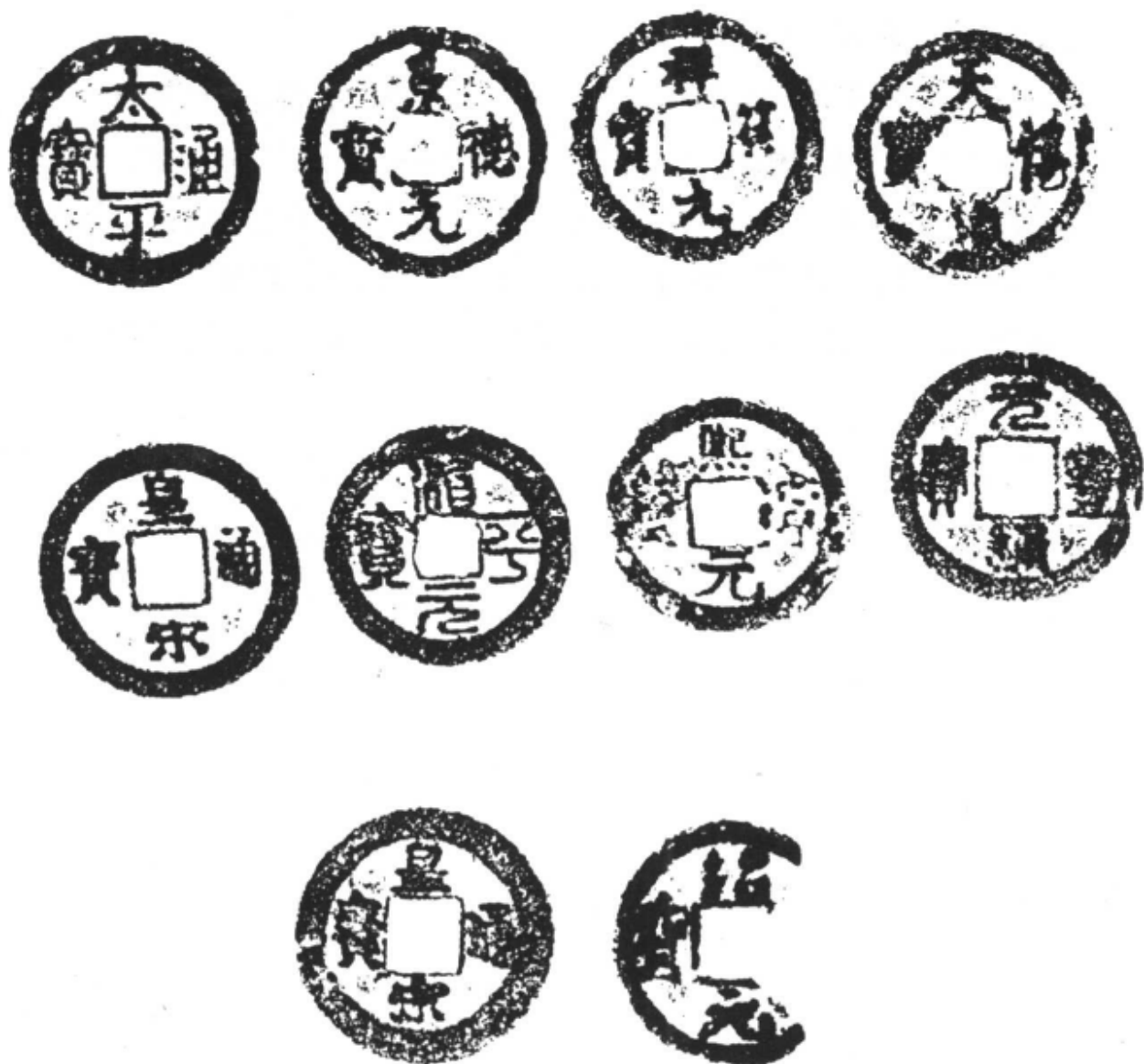


图二 1、2 碗, 3、4、5、6 盘(1/4)

174



铜币,10多枚,有10枚可识年号,即:太平通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天禧通宝,皇宋通宝(2枚),治平元宝,熙宁元宝,元丰通宝,绍(圣)元宝。(图三,1-10)



图三 铜币

该墓的清理,我们有以下认识:

1、宋墓在鲁西发现较多,清理发掘的较少,通过以往发现和对这座墓观察,底呈六角形,中砌斗拱,穹窿顶是这一地区这一阶段比较流行的墓葬形式。

2、六曲葵花形的瓷碗、盘、出现于唐代中期,流行于唐末和宋初。墓中出土的碗和盘,均为葵花形,施白釉至足部,圈足均较矮,属定窑系。从出土的货币看,最早是宋太宗太平通宝(976 - 983 年),最晚是宋哲宗绍圣元宝(1094 - 1097 年)。该墓的年代最早不会超过 1097 年,最晚也不会晚到宋晚期,应是宋哲宗之后而不久。

山东临清出土明代墓志

殷黎明

1993 年春,山东省临清市古楼村农民王长春在农田取土时,挖出一合墓志,随即报告有关部门,市博物馆闻讯派员调查,发现这是一块明代墓志。

该墓志用青石制成,正方形,边长 85 厘米。志盖阴刻“怀远将军柏公二代合葬墓志铭”,篆书。墓志文为楷书,36 行,满行 36 字。

志文记述了柏公祖孙三代明初南北征战事迹,内容涉及籍卫所、世袭制度等。二代合葬的墓葬实例不多见,这块墓志的发现对研究明史及墓葬制度增添了一段较为特殊的实物材料。

原载《文物》1995 年第 2 期

山东聊城北宋铁塔保护修复技术

周建国 魏 聊

聊城铁塔修复前的状况

聊城铁塔始建于北宋晚期,是国内为数极少的金属古建筑。明成化年间曾做过维修,后又遭雷击地震破坏,只残存三米高石质须弥座和五层塔身。1973年5月聊城县文化馆曾对此塔进行清理,从四周地下寻找到七层塔身和一块塔刹残片,在塔基中发现十块浮雕石刻,在塔基底部发现一地宫,清出石函、银函、铜佛、铜器和瘞钱等一批佛教器物,并出土“辟支佛”舍利。随后又进行了整修,将塔基从洼地向西北高地迁移六米,塔基每边增设7.37米宽共四层的水泥基台,新铸塔刹并进行安装。重立后的铁塔为八角十二级,总高15.5米。1977年,聊城铁塔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1973年的维修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一)新铸塔刹与原塔风格不一致。(二)原塔十三层,维修后为十二层。(三)安装不严格,第十一层向东错位5公分。(四)原塔身中空,为分层多次铸造,七三年维修时从塔刹到地基全部浇铸钢筋混凝土,致使整个塔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五)未对残损的塔体做修补,严重地影响着铁塔的寿命和风貌。实测报告表明:有八层腰檐有不同程度的缺损,第九层腰檐全部残失;第十二层也只残存两面。原残塔十二层,除第一层不设平座外,其余十

一层均设平座及平座回廊,但其中第三、四、五、十一层的平座不完整,有些部位塔栏全部残失。塔身和腰脊也有不同程度的缺损。整座铁塔残坏严重,裂缝和缺损加速了铁塔深处的锈蚀。鉴于这种状况,1988年,山东省文化厅文物局拨专款对此塔进行修缮,这次修缮的重点是残缺不全的塔身修补。1989年5月4日,修复工程正式开工。金属古建筑在国内各处都是十分罕见的,所以修复的经验及工艺方法也无处参考,根据此项工程的特殊性,工程设计者反复研究和试验,采用了一系列新工艺。

铁塔整修施工技术及工艺

(一)在铁塔缺损处用石膏铸塑雕刻取型

对铁塔缺损型部分进行修补,首先需要做出缺损部分的模型,然后才能依此进行修补复原。聊城铁塔的缺损包括平座、斗拱、平座栏杆、塔身、塔檐和群腰脊;这些缺损部位极不规则,缺损处凸凹不平,深浅不一。要恢复铁塔的时代特征,艺术风格,做到修旧如旧。新铸的部分必须与缺损部分风格一致,缺口衔接吻合严密。这是一项繁重复杂且要求精度很高的工作。在当代铸造业里,木模工艺占统治地位,但木模不可能准确地反映铁塔缺损口的形状。而干燥硫酸钙煅石膏具有纯净、粒度细、凝固度高的特点,石膏可以按需加水调成糊状,凝固后强度较高,造型性和可塑性都比较强,易于加工雕刻,而且价格便宜。把糊状石膏敷在缺损口上,可以准确的拓印出铁塔缺损暴露面任何不规则的形状,所以,石膏制作铁塔缺损型模型的方案被采用了。具体做法是:将适量石膏与水按1:1至1:3的比例搅拌均匀,浇在塔体缺损型上(缺损部位下面用木板或木型盒托住并支撑好)石膏固化后,撤下木板和木型盒,按照塔体的原造型风格进行雕刻,雕刻成形后,震动石膏型取

下,做出石膏雕刻型与铁塔缺损部位的形状一致,衔接十分吻合。

(二)拓制阴模浇铸石膏型工艺

铁塔檐底面和平座斗拱构造复杂,缺损严重,这些部位难于用上述方法准确塑出缺损部位模型,于是,我们采用了胶泥、油灰取型,拓制阴模浇铸石膏型工艺。

1、胶泥取檐型浇铸石膏型

选用可塑性好的聊城运河胶泥,在檐子保存完好部位的底面,用胶泥按压取型,即得到拓印的塔檐底面的胶泥阴模型。然后将这个阴模型用木板托住,抬至塔檐缺损处。按塔檐残存结构痕迹接好口,从上面浇入石膏浆,为了增加石膏型的强度,中间埋了钢筋,将石膏塔檐缺损型的大样稍加修整,即可交厂方铸造。此种方法比用石膏雕刻方法提高工效十倍以上,还可大量节约材料。

2、油灰取平座斗拱中完好的部位,得到拓制的油质平座斗拱型浇铸石膏型

胶泥有比较粘、软的特点,做平托式阳模型取塔檐底面较为合适,但取平座斗拱这类横方向的阴模型就困难了。油灰是一种用桐油和滑石粉搅拌成的材料,带有较强的油性,不会固化成块,也不会粘连塔体,比胶泥的强度和造型更强一些,我们用油灰拓取平座斗拱模型。具体做法是:将油灰按印在平座斗拱上作阴模型,然后用木板将阴模托住,抬至平座斗拱缺损处,按塔体残存结构痕迹接好口,从上面浇入石膏浆。待石膏凝固后,撤下木板,扒下油灰,对平座斗拱石膏型的毛坯大样稍加修整,即可交厂方铸造。此种方法也比人工石膏雕刻方法提高工效十倍以上,还可大量节约材料。用这种方法复制的缺损型与原造型风格完全一致。

(三)宣纸隔离工艺

由于铁塔缺损处暴露面极不规则,有的地方犬牙交错,石膏很容易与塔体发生粘连或卡在一起而取不下来。传统的机油和牛皮

纸隔离都不理想,机油隔离太轻,不起作用,牛皮纸太厚。经试验,选中了宣纸做隔离材料,将湿润的宣纸拓在残损口上,倒上石膏浆,(下面有木板或木型盒托住并支撑)待石膏固化后,雕刻成形,轻轻晃动石膏型即可取下。

(四)石膏雕刻型沙造型浇铸衍生工艺

在铁塔所有缺损型中,塔体平座栏杆是复杂的部分,平座栏杆是立式的,无有依托,石膏难以直接塑造。平座栏杆的复原工作量又最大。原塔体每层的平座栏杆的八个面是一体的,现为铸造和按装,必须分成八块制作。二层至十二层共需要原七十二面平座栏杆和四十块分件,每块残损情况都是一种形式,只有规格的不同,第十二层稍有特殊,少一层横栏。针对这种情况,设计者利用石膏的特性,采用了石膏雕刻型形沙造型浇铸衍生工艺。首先,依据各层残存栏杆的尺度,分别雕刻一个石膏塔栏,并依此为模进行形沙的造型,分别做出各层所需数量的沙型,然后用较稀的石膏浆浇铸在形沙阴型腔内,并把钢筋预浇在石膏型内。等石膏固化后从沙型内取出,这样就得到了各层各面的石膏栏。与其它不同的第十二层栏杆也按同样办法浇铸。然后修整新浇铸的石膏塔栏,分别在各层平座上试装入位,多去少补,到合上为止,最后取下石膏栏杆进行铸造。这项工艺比人工雕刻提高工效二十倍。

(五)石膏分模型多规格衍生工艺

在用预制的石膏塔栏对接各层平座栏杆时,发现每层平座的八面尺寸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这样在对接时就需要补一点或者去一点,这表明工艺上存在着不完善之处,为了提高复原塔栏尺寸的精确度。下面六层平座石膏栏杆的制作又采取了新的方法,先测量这六层平座八面的所有尺寸。从正西始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测量(见表一),然后按尺寸列表进行综合统计(见表二)。

(表一)塔体平座八面栏杆尺寸

单位:cm

项目 \ 位置	正西	西北	正北	东北	正南	西南	正东	东南
二 层	66	63	65	63	64	68	64	64
三 层	63	60	64	62	62	62	62	62
四 层	58	63	58	62	58	61	55	65
五 层	57	60	63	63	59	62	60	59
六 层	55	52	58	65	60	59	56	58
七 层	56	59	61	59	60	58	56	57

(表二)塔体平座八面尺寸综合统计表

单位:cm

层数 \ 尺寸	52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8	合计
二 层										3	2	1	1	1	8
三 层							1			5	1	1			8
四 层		1			3			1	1	1		1			8
五 层				1		2	2								8
六 层	1	1	2		2	1	1								8
七 层			2	1	1	2	1	1							8
合 计	1	2	4	2	6	5	5	2	7	7	3	2	1	1	48
合 计	1		8			16			16			6		1	48

统计结果表明,这六层平座栏杆的长度共有十四个尺寸,除52cm 特小和 68cm 特大专门雕刻石膏栏杆以外,中间的十二个尺寸分四组,每组三个尺寸都取中间值做为标准尺寸,也就是要做八个 56cm 的,十六个 59cm 的,十六个 62cm 的,六个 65cm 的石膏型。

为了方便制作,我们根据平座栏杆的结构特征把塔栏分解为八个部分,这八个部分分别用石膏雕刻成形。组成一个可拆装的平座栏杆石膏型。它组合的最大长度是 65cm,依据这个石膏型为模具形沙造型,分别浇铸出 65cm、62cm、59cm、56cm 的石膏型,每个模型内部预埋钢筋。待新浇铸的四个平座栏杆石膏型完全干燥

后加以修整,再依此四个石膏栏杆为模型制作沙型,浇铸出各规格所需数量的石膏栏杆。根据表(一)所记录的各层平座栏杆尺寸,上塔将石膏栏杆对接试装,然后取下铸铁。这种方法比人工雕刻方法提高工效二十倍。

(六)石膏雕刻型直接形沙造型铸造工艺

传统铸造业中,木型工艺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石膏型直接形沙造型用在铸造业中未有所闻。铸造厂家认为,用石膏制作缺损型是正确的,但石膏型强度小、脆弱、不能直接进入沙箱进行形沙铸造,还需依石膏型翻制一套石膏阴模,然后向阴模内充玻璃钢,要用得到的玻璃钢模型形沙造型才能铸造。但是,工程设计人员的反复试验证明,石膏雕刻型的强度可以抵御沙箱内的创击,而且依石膏为模所做的沙型的强度也完全可以抵御铁水的冲击,这样就减少了中间环节,彻底代替了木型工艺,也防止了模型转换的中间环节可能出现的走样和误差。具体做法是:将从塔上取下来的石膏雕刻型涂上石膜做防水隔离层。使用山东广平镇生产的水冲面沙(即红沙,这种沙的特点是成本低,铸造效果好)形沙造型,然后浇铸铁水(使用的是聊城锻压机床厂铸造车间国产三吨级冲天炉,铁水温度 1380℃,含有碳、硅、磷、锰、硫五种元素),最后清理铸铁型即可上塔安装复原。石膏型直接铸造工艺比传统的木型铸造工艺节约费用一万元。

(七)粘合加固复原工艺

这项工程共铸造了 151 块灰铁缺损型,其中包括 18 块平座斗拱,112 块平座栏杆,5 块塔身,31 块檐子,4 块群腰脊。

要把这些形状千姿百态,受力情况各不相同的铸铁与原塔体十分吻合又牢固的结合在一起,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焊接,但这种方法很快被否定了,它的缺点是生铁焊条价格昂贵、工作场地不易操作,塔身加温、焊接会发生爆裂,更重要的是,焊接需要打焊口,对

原塔体破坏太大。

另一种方法是卯接,但试验的结果又失败了,聊城宋代铁塔是白口铁铸造的,硬度大的惊人,钻头钻断也只能打一个小白点。

最后,选用金属填补胶粘接法,铁条加固和环氧树脂胶掺铁粉封闭法。

山东省五三研究所生产的 J-611 金属填补胶是一种理想的金属粘合材料。这种胶的特点十分适用于铁塔缺损型的粘接,因缺损型在铸造过程中存在着百分之一的收缩系数,铸件必然小于石膏雕刻型,这就使铸铁缺损型与原塔之间存有缝隙,金属填补胶正好进入填补并粘合,具体操作方法是:将新铸灰铁缺损型与原塔体缺损处接合部都用手砂轮清锈磨出亮口来,然后将二者对接好,用木板支撑或用扁型钢条牵拉固定,然后将金属填补胶 A 筒搅拌均匀,以 A:B=11:1 的比例将 A:B 两筒的胶料混合,然后再搅拌均匀。将胶涂在缺损型的缝隙里,室温 15℃ 以上四十八小时固化。室外温度高,温度小时固化快,反之则慢些。J-611 金属填补胶还有与铁塔白口铁相似的膨胀系数。为了避免不牢固,新安装的铸铁型大多采取了钢条牵拉加固措施。所用钢扁条的规格是 25mm×25mm 的 B5 号钢材。把每个相临的平座栏杆都用 B5 号钢条连接,钢条两端都打孔套丝,栏杆尽头也都打孔套丝,然后用 6mm 的平头螺丝上紧加固,使八面栏杆形成一体,塔檐和平座也巧妙地运用各种形状裂纹与新铸件进行钢条牵拉加固,原塔体的加固钢条做的十分隐蔽。再一项加固措施是用环氧树脂胶掺铁粉加固封闭。

配方的重量之比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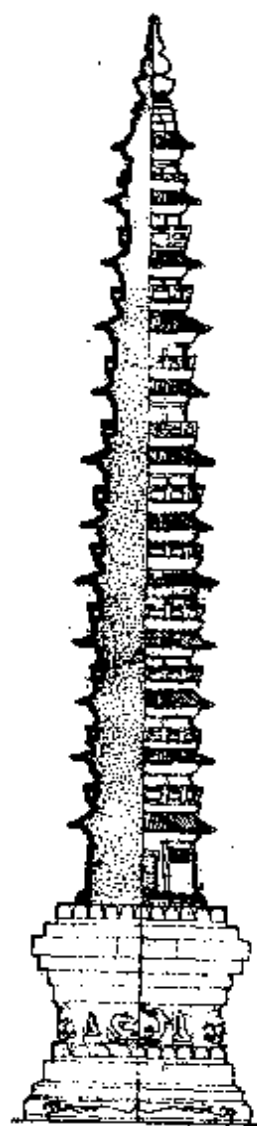
环氧树脂 100 克 K-44

无水乙二胺 8~11 克

丙酮 5~8 克

铁 粉 100 ~ 200 克

具体做法是:先按配方比例将乙二胺倒入环氧树脂内,搅拌,然后按比例将丙酮搅拌,配成环氧树脂胶,这时需及时加铁粉进行搅拌,以减缓反应速度。然后用这种胶把缺损型与塔体缝隙中间的金属填补胶封闭直来,同时也把加固钢条封闭起来,使二者不接触阳光、水和有害气体,这种环氧树脂胶还有粘接和加固作用,也可以用来修整塔身接缝、裂缝和小锈蚀洞。抹平铸铁缺损型与塔体的接合部,使新旧之间的界线更为平整。最后,对新安装的铸铁刷百分之一的食盐水,进行做旧处理,使新旧之间的颜色更为接近。修补工作完成后,用铁锤重击新补塔檐,粘接缝无任何变化,而且塔檐的另一侧会发生共震和共鸣,足以说明粘接的牢固程度。



修复塔檐铁塔
制图立图

光岳楼墩台修复工程技术

魏 聊

光岳楼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山东聊城古城区中心,是一座四重檐歇山十字脊过街式钟鼓楼,创建于明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占地1236平方米,通高34.34米。六百多年来,光岳楼历经十七次较大的维修。1984年—1985年光岳楼四层主楼进行过一次大修,基本上恢复了主楼原貌。至此,光岳楼墩台的修缮又成为保护光岳楼的首要问题。

一、光岳楼墩台的勘查

光岳楼墩台为砖石砌成的正四棱台,墩台又可称之为基台。光岳楼墩台曾于1971年维修,由于当时古建筑修缮的管理不完善,甚至其方针、原则也不十分明确,所以当时将墩台的外墙和平台用3~8厘米的水泥抹了一层,从而严重地破坏了光岳楼的外观风貌。而且也严重地违背了《文物保护法》和《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等修缮工程管理办法》,加之二十余年的风雨剥蚀,外水泥皮也大量裂纹、剥落、渗水。为此,国家文物局于1991年将光岳楼墩台修缮工程立项。

为了制定好施工方案,首先要搞清墩台建筑结构和台体损坏状况。在铲除了墩台西面南半部分的水泥皮以后,暴露出来的是一层 $8 \times 14 \times 7$ 厘米的青砖垒砌的28厘米厚的青砖墙,里面仍然是青砖墙,打探洞至1.5米深处仍找不到墙的内缘(后知此处为大

墙梯脚,厚2米)。里面几皮青砖垒砌的很不规整,砖的规格也十分杂乱,但大多数为 $44\times 22\times 9$ 厘米。最外皮小规格的青砖($28\times 14\times 7$ 厘米)与内大墙之间是用白灰膏浇灌的,而内大墙几皮大规格青砖之间是用黄土浇灌的。

南面西半部分的情况与西面南半部分的情况相同,而东面北半部分和北面东半部的表面砖体的情况十分复杂,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用红砖挖补的外墙。二是用 $28\times 14\times 7$ 厘米的青砖挖补的。三是 $45\times 22\times 9$ 厘米的青砖墙体。从规格、砌法及用黄泥浆垒砌等情况分析,可知 $45\times 22\times 9$ 厘米青砖垒砌的墙体为明代原墙体,其它为后来不同时期的修补物。

光岳楼基础十分简单,只是在墙下垒砌了三层基条石,共厚55厘米,其底部和外部有简单的素黄土夯土层,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浅性基础技术。至于墩台的原始边长,经测量东北角至西北角基条石角至角的距离为34.5米,而且现青砖体是由基条石向内收分1公分开始垒筑的,符合常理。这就证明了光岳楼墩台的底边长并未加宽,而按基条石以上15厘米的原始地面测量,光岳楼的原始底边长和原始高度都应为明代之原尺寸,即明尺九丈九尺,与历史记载相符。基础四角均有两块护角石,形状不规则,约为 80×35 厘米。另外,在西北角的探沟还发现了散水石 $80\times 50\times 30$ 厘米,散水石上对流水口,其表面离现地面60厘米,离最下层基条石的下缘为70厘米,散水石的平面应为原地面标高。沿墙根还发现与散水石同一平面的散水砖,(图1)散水砖的规格为 $24\times 12\times 6$ 厘米,散水宽为30厘米。墩台的地面构造为:上表层是10厘米的水泥层,之下是12厘米的砖渣,然后是48厘米的建筑垃圾,至70厘米处是一层硬面,疑为原平台地面。墩台外墙上端的厚度是1米。

此外在临近大墙外发现1米 $\times$ 1米的墙之梯脚,形状如同城

墙的马面,但梯脚是向内伸出的,(图2)此梯脚与大墙同时垒砌,想必是为了加强大墙的稳固性,推测每面有四个梯脚,而且均匀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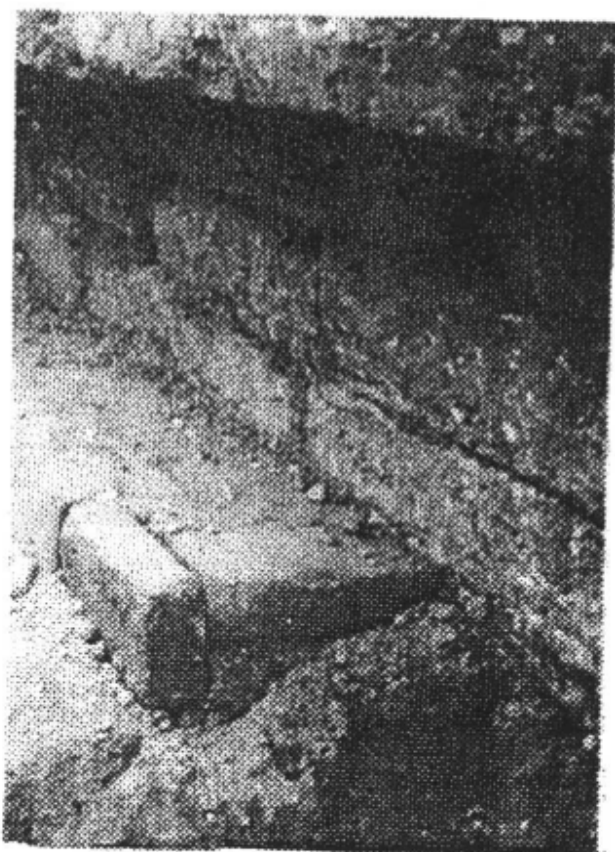


图1 散水砖



图2 大墙梯脚

二、光岳楼墩台大墙的修缮

工程开始首先拆除了水泥皮和最外一皮青砖,厚约28公分,这一皮青砖由于与水泥粘连以及风化酥碱已破烂不堪,(图3)所以不得不拆除之。然后整座墩台外皮包砌一层城砖。

为了防止包砌城砖外鼓脱皮现象。在施工中采用了一系列加固措施:

①首先保证材料质量。专门从西安购来2万余块大城砖(45×23×10厘米)。定点灰膏、沙子的供应,以保证质量。



图3 铲除水泥后的大墙

②大墙外皮的拆除,一般掌握拆除一皮 28 厘米的小青砖;如遇到砖型较好,又极其牢固,也可以不拆除,但如遇到极其松散的情况则又多拆一些,向里多掏几块砖,使基层墙面呈犬牙之态,加大表面阻力以利于新旧墙之结合。

③对于新包砌的外墙,每垒砌 4~8 行,统加一排钢条牵拉件,每顺砖上向墙里打一根,钢条长 40~60 厘米,钢条外端打一钩形,挂住顺砖。每平方米不少于两个 45 厘米长的真钉砖,需要几个就多掏几个孔用真钉砖垒砌,事实证明此次钢条牵拉件与真钉砖并用的方法十分成功。还有一些薄弱部位则根据实际情况在墙体内酌加钢筋加固。

④新旧墙之间用沙灰膏彻底灌满,使之成为一体。

⑤由于北墙受阳光雨水侵蚀较少,所以北门左右各有一小片 $44 \times 22 \times 9$ 厘米青砖垒砌的原墙体保存较好,为保存这二片真正的明代大墙,最大限度地保持文物原样,所以,未对这两片大墙进行拆除更换,只做了简单的挖补和表面修补。

⑥女儿墙完全是顺砖垒的,厚 50 厘米,高 1.09 米,鹰不落顶。为使其更为牢固,在第三行和第六行统加了扒锅。此次女儿墙的垒砌比维修前降低了 0.11 米,主要是为了便于游客观览。

此外,此次施工还更换了四角迎风石,四门迎风石,压口石和踏步石。

重新垒砌的光岳楼墩台外墙,严整雄传,基调为青灰色、白色砖缝,与朱红色的主楼形成衬托,极好地恢复了光岳楼的整体风貌。(图 4)



图 4 光岳楼修复后全貌



图 5 糙埂砖地面

三、光岳楼墩台平台及过街通道的维修

墩台平台地面是对传统建筑工艺的继承和开发,即采用糯米浆合三合土防渗处理技术,其直接参考经验是山东省几座明代墓

葬的密封防潮技术,几百年来效果极好,而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不怕水,越有水就越坚固;同时也参照了山东境内所存的几座古城墙基础遗址上的三合土,其效果也极佳。

具体做法如下:首先清除台面水泥层及杂土至施工标高,即清除到 70 厘米深处的硬地面。按 4:6 的比例混合白灰黄土,然后加二成细沙,用糯米浆调合,形成三合土浆,潮度掌握到手握成团,然后分层夯实,每层 20 厘米,而且每层均用木板拍打提浆并刷一层黑矾水防渗层,上面糙墁方砖,方砖规格为 $50 \times 50 \times 12$ 厘米。(图 5)平台上一楼廊外至女儿墙留 1% 的流水坡。一楼室内则是细墁方砖。

登楼梯道壁及券顶铲除白墙皮,抹 2 厘米厚的麻刀灰,原壁裙水泥皮十分牢固,又在阴暗处,无碍整体风貌,所以未作铲除,以免伤及墙体,而是利用原水泥皮重作假砖,并用白灰勾缝。

过街通道同样是仿前制铲除白灰皮重抹,并剔补了部分酥碱青砖。通道的十字交叉拱下现有四柱承托的藻井,非为原物。此次拆除藻井梁上矮墙勘测,发现十字交叉拱处有拱砖塌落,方知藻井为支撑十字交叉拱而设。

由于过街通道中心比光岳楼广场的四面街道的交汇点高差相差不大,为防止暴雨倒灌,因此将过街通道地面提高 5 公分,糙铺方砖及剩余城砖。

光岳楼墩台通道本为过街性质,原本不应设门,但为保护好,利用好这座文物建筑,文物管理所决定按清式则例重做四门,四门当心间均做两开扇转身大门,门窗花棂上安装玻璃以利采光。新做四门为光岳楼增添不少光彩,聊城人民对此极为赞赏。(图 6)

光岳楼墩台修缮工程总工期近二年,至 1994 年元月修复开放,光岳楼以其独特的浑朴雄姿为聊城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增光添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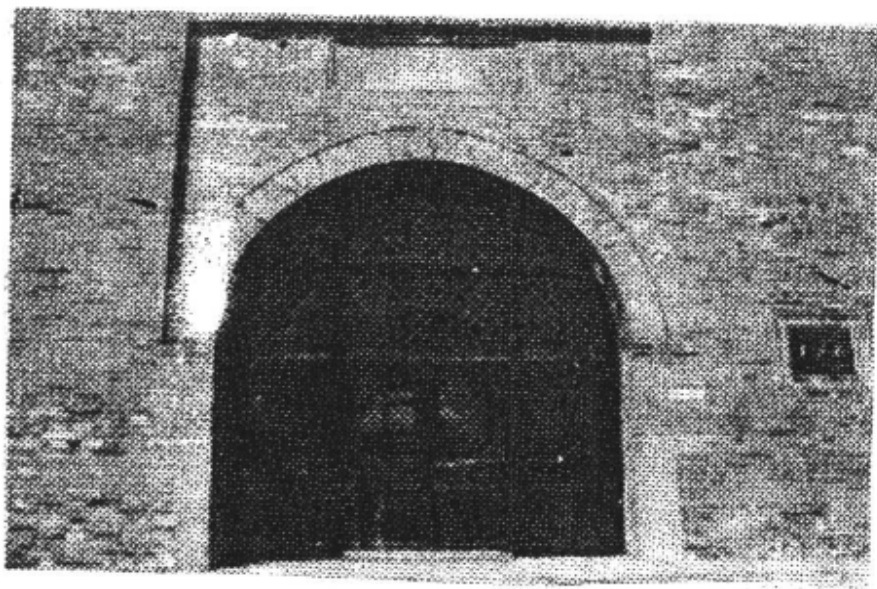


图 6 光岳楼墩台过洞新设大门

光岳楼修复工程技术得失谈

魏 聊

光岳楼始建于明洪武七年,(公元 1374 年),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聊城古城区中心,是一座四重檐歇山十字脊过街式楼阁。光岳楼占地面积达 1236 平方米,通高 33 米,其中砖石砌成的正四棱台垂直高度 9 米,底部设过街通道,至楼之中心形成十字交叉拱;四层主楼为抬梁式木构架,高 24 米。一楼设金柱 32 根,内外双槽等高直达三楼,另设二十根檐柱支撑外檐,柱列分布与宋《营造法式》所谓“副陛周匝内金箱斗底槽”相似。一楼面阔进深皆七间,且明间特大,约有四米之阔。二楼柱列分布与一楼雷同,置童柱于一楼挑尖梁之上,并设平座回廊。三楼为结构暗层,面阔进深皆三间,并始置空井,金柱柱头到此用巨大的梁枋连接,形成一坚固的框架整体,梁枋之上灵活地设置斗拱瓜柱承托四楼,四楼骤然缩小,可视为单独的一部分,面阔进深皆三间,四面开冰纹园窗和四开扇大窗,顶部设十字梁垂莲柱。

光岳楼为明初的建筑物,主要体现宋元的建筑风格,从覆盆式的柱础到楼置暗层、空井,一至到顶部十字脊的设置手法都呈现了宋元遗风,但斗拱攒数骤然增多,与西安钟楼、鼓楼一致,开官式建筑之先河,从而使之成为宋元建筑向明清建筑过渡的代表作。

光岳楼建筑高大,气势雄伟,在鲁西大平原上拔地而起,是历史文化名城东昌府(即聊城)的象征。明弘治九年(1496 年)河南西平考功员外郎李赞曾赞誉它:“余过东昌,访太守金天锡先生。

城中一楼，高壮极目。天锡携余登之，直至绝阁，仰视俯临，毛发欲竖。因叹斯楼，天下所无，虽黄鹤、岳阳亦当望拜。”若从文物建筑价值而论，今日此言也不为过也。1956年，光岳楼被列为山东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文献碑石记载，光岳楼每过50年就要进行一次大修。自1933年民国政府对此修缮后，到八十年代已有50年未做大修了，光岳楼出现了漏雨、倾斜等现象，经深入勘查，发现许多木构件均已腐朽的十分严重。据此情况，文物部门积极申请维修资金，筹备工程技术力量和物质，于1984年5月16日正式动工对光岳楼进行有史以来的第16次维修，至1985年12月16日竣工，历时十九个月，耗资45万人民币。这次工程由曲阜古建公司书院建筑队具体承担施工。光岳楼修复工程领导小组还曾邀请国家文物局、同济大学、山东省考古所、山东省建委的古建筑专家、教授来聊，对光岳楼进行勘查、分析情况，研究施工方案，指导技术实施。由于多方面的支持和努力，光岳楼的修复工程顺利结束，所采取的技术方案也是成功的，工程质量也是可靠的。但是，由于当时还有一些不利因素和不利条件的限制，工程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和失误。工程结束已经五年多了，光岳楼工程的质量经受了考验，时间证明工程是成功的。这五年期间，笔者曾参加了国家文物局泰安培训中心举办的古建筑学习班，对中国古建筑及古建筑的保护有了新的认识，回顾1984至1985年的光岳楼修复工程，感到很有必要也有责任把工程中的一些问题记录下来，谈谈自己的看法，为古建筑的保护积累一些经验，但愿此文能使同行有所借鉴，并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古建筑修缮所采取的技术措施应针对具体问题，最忠实地执行“不改变文物原貌”的原则

光岳楼 1984—1985 年的维修属于“重点修缮、局部复原”工程，工程普遍采用了传统工艺和传统材料，尽量保存文物原件和原状，较好地保持了光岳楼的风貌。但是，由于参加工程的专家与技术人员对“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的理解不同，致使工程方案难以确定而造成一些失误和损失。光岳楼六百多年来历经十几次较大的维修，但主要木构架从未更换过，保持了明代的建筑材料和建筑风格；而外檐部分、平座及四楼在历代维修和改建中已失去了明代的风格。那么，对光岳楼不同部位的维修的设计依据又如何掌握呢？可怕的是光岳楼维修工程对此一直未形成明确的统一的意见。其中一种意见认为工程应按明代初年的风格对所有部位进行复原，另一种意见是按这次维修前的状况复原，还有的人认为应部分地复原明代的建筑风格等。而且，这几种意见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更不幸的是，这些分歧在施工方案设计过程中一直未得到公开和统一，致使不同的意见都参与了工程的具体实施，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光岳楼是十字脊楼阁，维修前，十字脊之上原设有一个清代透花铁葫芦，高 3 米，最大径 1.5 米，铁葫芦之上是 1933 年安装的风向标。十字脊之上的这一部分不是明代原物已无异议。所以，在第一期工程，维修三、四层时，将铁葫芦、风向标全部拆下，并将十字脊，山墙瓦全部拆下，更换了十字梁、天沟梁等腐朽的木构件。然后重砌山墙、垒十字脊，瓦屋面，但是没有重新安装铁葫芦、风向标，也没有为今后安装做任何考虑。当时的意见是：十字脊之上的部分不是明代初年的原物，对明代光岳楼的修复应按明代的风格复原，所以，无需对十字脊之上的部分重新安装，而且，由于现在搞

不清明初时顶部的原状,那么,十字脊之上就暂时空着,等待后人搞清光岳楼顶部的原状,才重新复原。

光岳楼第二期维修工程开始后,由于考虑到工程的社会影响,考虑到聊城人民的习惯感情,又听取了不同的意见,做出了重新安装铁葫芦顶的决定,但不重新安装风向标。为了将透花铁葫芦顶固定,又不得不重新搭脚手架,拆开十字脊,将铁葫芦顶的中心铁柱重新固定在十字梁上,经过这样一个反复,工程延长,浪费了材料和人力,对好的瓦面也有损伤,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而这一切均是决策上的过失,并非技术上的缘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1986 年 7 月 12 日公布的《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等修缮工程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系指始建或历代重修、重建的原状。修缮时,应按照建筑物的法式特征、材料质地,风格手法及文献或碑刻、题铭的记载,鉴别现存建筑物的年代和始建或重建时的历史遗构,拟定按照现存法式特征,构造特点进行修缮或采取保护性措施;或按照现存的历史遗存,复原到一定历史时期的法式特征、风格手法、构造特点和材料质地等进行修缮的原则。笔者认为,虽然光岳楼的主要木构架还保持着明初的风格,但脊顶建筑已非原物,而且,楼之外檐等许多部分均非明初之原状,所以,把明代初年的建筑风格做为维修光岳楼的标准是不现实的,光岳楼的原状应理解为现存的原状。这次修缮也只能“拟定按照现存法式特征、构造特点修缮或采取保护性措施”;而不能“按照现存的历史遗存,复原到一定历史时期的法式特征、风格手法和材料质地进行修缮”。现存光岳楼的状况完全按明代初年的风格修缮是不可能的。况且,假若拟定工程按照明代初年的建筑风格修缮,不清楚光岳楼顶部明初的原状就空缺起来也是不可取的,维修工程应保持古建筑的完整性。

在任何古建修缮工程中,应首先确定是按现存法式特征进行

修缮还是按照现存的历史遗存,复原到一定历史时期的法式特征、风格手法和材料质地。如果按现存法式修缮,就绝不改变修前原状;如是复原,就明确复原的年代,对此一定要明确,至关重要,另外,此问题的确定不只应成为维修工程方案设计的一个重要依据,还应成为维修工程的一个基本原则指导工程的整个过程,控制工程的所有技术措施。

光岳楼修复工程中还有几处地方的技术处理有悖于保持文物原状的原则,值得商榷。

1、翼角木构架的更改。不改变文物原状不仅仅是不改变建筑的外观法式特征,风格手法和材料质地,更重要的是不改变中国古建筑的精髓——木构架。光岳楼四层共有十六个翼角,维修前的翼角木构架如(照片①),在中国,保持这种翼角结构的实物已经十分罕见了,这种翼角结构有许多优点,十分适合楼阁之翼角。以一楼翼角为例,老角梁的一端固定在外槽角金柱上,老角梁部分共有三件木构件组成,首先用一根仔角梁,一端固定在金柱上,一端固定在老梁角上,三者形成一个最不易改变形状的图形——三角形,这根仔角梁对老角梁有极强的稳固作用,防止老角梁不堪垂脊的重压而下垂。另外一根仔角梁,即伸出外端加套兽的那根,为了便于区分,况且称它为挑角梁吧,它的另一端做成一个斜面,固定在老角梁上,这样,它加套兽的那一端就高高地翘了起来。但是在这样一个翼角木构架中起最主要作用的还不是这些,将老角梁,仔角梁和挑角梁固定在一起的是另外一个构件,它是一块三角形的木头,十分小,外面又看不到。古建筑学中有一个名词叫“隐角梁”,但是,关于这样隐角梁的形状,所在位置及其作用还不是十分明确的,笔者认为,翼角木构架中这根三角形的小梁就是“隐角梁”,因为它确实是一根隐藏在一个角上的梁,如果不是落架维修,它是发现不了的。隐角梁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使挑角梁向上翘起,伸出既

高且远,从而使整个翼角的曲线更加柔和、飘逸。但是,光岳楼在维修时却毫无道理地改变了翼角木构架,就是用一根普通的仔角梁代替了原来的仔角梁、隐角梁和挑角梁。(照片②略)这种作法是一般歇山建筑庑殿建筑的作法,而不是楼阁翼角的作法;这种结构在功能和外观效果上都大大不如原结构,它使得翼角伸出的既短又低,外轮廓生硬。更改变原来木构架的结构,违反了“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尤其不幸的是隐角梁这一罕见的木构件再也不复存,维修前翼角遗存的法式特征,风格手法永远地失去了。由此可见,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有多么重要。若不然,我们进行的呕心沥血的古建修缮工程,岂不成了善意的破坏。

2、要注意保持古建筑特有的风格。据史籍记载,光岳楼是利用修筑东昌城的剩余木料建造的更鼓楼,初名“余木楼”。光岳楼还因是为了“严更漏,窥敌望远,报时报警”,这样的军事需要而建。余木建楼、军事功能就成了光岳楼的二大内涵,表现在建筑风格上,就出现了用料不精,规格不严格这一类的特征。例如光岳楼的内槽金柱升到二楼的一段就有8根存在有自然弯曲、粗细悬殊的情况,而这恰恰又成了余木性质的最好写照;同时这又是明初战乱,军事需要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东昌府这一特定地理位置所限定的典型的时代特征。当然,这样的时代特征是与所谓法式特征是不同的,这属于表现光岳楼个性的特征,这种特征应该是光岳楼价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这次维修工程,将不规则的金柱用木板条修补,使细的变粗了,弯的变直了。光岳楼失去了它往日所特有的文化气氛,悲倔的弯曲、时代的痕迹被抹平了,油光了,光岳楼朴实的性格被抹杀了。由此可见,“修旧如旧”是保持古建筑永恒生命力的一个法宝,而“焕然一新”则是对古建筑最美意的破坏。

二、化学保护法的使用有利于不改变文物原状

六百多年来,光岳楼能不坍、不倒,关键在于三十二根金柱保护的好。其中内槽金柱和外槽金柱的功能作用是不一样的,所以保存情况也不一样。内槽金柱的负荷比外槽金柱的负荷重,内槽角柱负荷最重,而外槽金柱自二楼以上全都暴露在外面,受阳光、水份和有害气体侵蚀严重,易于腐朽,特别是外槽角柱受三楼外檐的保护更少一些,所以极易发生腐朽,光岳楼外槽金柱的四角柱有三根腐朽严重,均发生在二楼以上至金柱柱头一段。由于鲁西地区受夏季湿润的东南风影响较大,所以光岳楼东南角金柱腐朽的最为严重,(照片③,略)而对于这种情况是较难处理的,光岳楼的金柱均是由基台直达三楼,高度是 11.58 米,十分沉重,况且每根金柱与其它木构件的连接点就有几十处,更换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工程决定采用化学保护法解决这一问题,专门请来了化学保护方面的技术人员,经研究,决定采用环氧树脂胶对腐朽洞浇灌,并用钢板外包加固的方法。具体做法是:首先用手电钻在金柱上钻孔,彻底搞清金柱的腐朽程度部位及其面积,然后根据腐朽情况,选择适当部位挖槽,掏出朽木,这时,应注意将朽木清理干净,然后配好以环氧树脂胶为主的粘合剂、配方是:

环氧树脂 100g

糖 醛 20g

乙 二 胺 10g

下一步就是向柱洞内浇灌,如果洞较大,还可填入木块,砖块等。最后,用马粪纸,敷放在柱上做出个样子,照此样做出一个钢板箍,卯榫处可做的宽松一些,钢板箍的两端用螺丝上紧。采用这种方法的地方共有四处。

一是三层东南角外槽金柱柱头部分(照片④)。二是三层西南

角外槽金柱柱头部分。三是二层东北角平座一段外槽金柱卯榫结合部(照片⑤⑥略)。四是四层东北角老檐柱卯榫结合部(照片⑦)。使用这种方法可大大减轻工程难度,提高工程的进度,更重要的是,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建筑的原构件和木架结构原状,从而也就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构件上所负载着的远古时代的信息。环氧树脂胶还有其它许多优点,它有较强的渗透力,固化后强度较大,从而使整个柱子的强度都有提高。环氧树脂胶有许多种配方,上述配方一般适应于灌浆,柱外用钢板加固后,再使用不加糖醛的环氧树脂胶(即封闭胶)对柱子的修补的部分进行封闭,然后再用油漆油饰多遍,至此,易于老化的环氧树脂灌浆胶被完全封闭起来,完全失去了与阳光、空气、水份、有害气体接触的机会,所以,其老化的速度将也会最大限度地减慢。

光岳楼十字脊上的大吻在拆开时碎了,我们也是用环氧树脂胶将其粘合,此处对粘合剂无法封闭,也许会老化的快一些。但是这也丝毫不能证明化学保护法的这一缺点不能克服,山东省五三研究所是专门研究生产各种性能的粘合剂的研究机构,而且,五三研究所也愿意与文物部门合作,专门研究生产适合于文物部门各种用途的粘合剂。例如抗老化的粘合剂,文物保护是全社会的事,做为文物主要部门更应广泛的与社会各方面联系,及时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保护最古老的东方古建筑。

三、中国古建筑的所有构件都是艺术性与功能性的统一体,绝不可能随意改建

在光岳楼维修的第二阶段,也就是对一、二层进行落架维修时,发现二层平座回廊普遍下沉(照片⑧略),回廊地板外闪严重,外檐斗拱歪斜,松散,椽子上端固定点与檐枋脱结,从而使整个外檐处倾斜,童柱的落点游位严重。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专家们和

工程技术人员反复论证,讨论,寻找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最后一致认为,造成这一系列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童柱的落点移位,而使地板、斗拱随之外闪、下垂,只要扶正和垫高童柱,地板、斗拱和椽子就能升高,恢复原位。当时按照这样的指导方针对二层平座进行了重新安排,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事后本人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工程在此处的技术处理上还未打到最佳方案,因为人们当时忽略了一个最关键性的问题,如果说,二层平座下垂的根本原因是童柱移位,那么童柱又为什么会移位呢?柱子一定是受到不均匀的压力才会移位的,这一不均匀的压力又来自何方呢?笔者又查阅了一些史料,终于找到了这一不均匀压力的来源,这一不均匀的压力来源于平座的最上端。二层檐上端原来也设有博脊,博脊压住了二层檐的椽子头,1933年维修时,将博脊改建为高窗,这样虽然对室内的采光有利,但却使廊椽的下端就会下滑,从而作用于童柱的柱头,童柱柱头受这种向外下滑力的影响,那么它的根部就会向内移位或者向左右移位,从而使整个平座进一步下垂,倾斜,而且这种恶性的循环会越来越严重。博脊改高窗才是这一恶性循环的起点。其实,不仅如此,如前面所提到的外槽金柱柱头腐朽严重与此也有密切关系,博脊改高窗,使外槽金柱柱头失去了应有的保护,风吹雨淋,必然腐朽严重。由此可见,中国古建筑的任何一部分都有其独特的功能,千万不可随意更改,玻璃高窗代替博脊虽然会增加透光量,而且也许会更美观此,但是,玻璃高窗却永远无法代替博脊的力学功能,从而必然导致一系列险恶问题出现。所以,若要彻底解决平座下沉的问题,必须恢复三楼博脊。也唯有这样,才真正符合不改变文物原貌的原则。事实说明,不改变文物原状不光是一个原则问题,还是一个最重要的技术问题。所以,在古建筑维修设计中,一定辩证分析,综合考虑诸多因素,而且一定要将不改变文物原状做为一个重要的技术因素

考虑在内,联系各相关方面,反复论证,方可能确定最佳设计方案。

四、古建筑保护修复设计方案应该是对保护对象所设计的最佳未来

八五期间,文物部门准备对光岳楼基座进行“局部复原”工程。光岳楼基座是砖石砌垒、熟土夯成的正四棱台体,底边边长 34.43 米,上边边长 31.94 米,高度 9.38 米;四面各有半圆拱门,券至台中心处十字交叉,拱门西阔 5.76 米,拱脚直高 2.90 米,矢高 2.88 米。甬道原为过街通道。1967 年以前,基座外墙及台面全是青砖垒砖,但由于长期失修,残破严重,严重地影响了光岳楼的安全,由于当时聊城市政府对文物建筑的维修原则不了解,1967 年就对光岳楼基座进行了一次极错误的维修;用水泥将基座大青砖全部抹死,水泥厚度达 3cm ~ 8cm 不等,虽然这些年来,水泥外皮地确对光岳楼起到了保护作用,但是却也严重地影响了光岳楼的外观风貌,违反了古建修缮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这二十多年来此种作法不断受到各方面的批评,而且经过这二十余年的风化,光岳楼基座的水泥外皮亦已经损坏的十分严重了,为此,八五期间,光岳楼保护修复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剥掉水泥皮,重砌大青砖,恢复保护基座原貌。这段时期,笔者听到了一些古建筑专家对光岳楼修复总的看法,这些看法虽然有些事后的诸葛亮之嫌,但对古建筑保护事业来讲却不无裨益。这意见是:光岳楼保护修复工作的整体程序有问题。光岳楼基座筑造的主要材料是熟土,青石和青砖只是基础外皮而已,由于 1967 年的水泥工程是不可逆工程,所以,剥掉水泥皮时也必须损坏基座的青砖外皮,那时候,仅靠熟土夯成的基台难以支撑光岳楼四层主楼的重量,万一基台的一小部分坍塌下来,后果就不堪设想。正确的工程程序应该是:先将四层主楼的外檐瓦面全部卸下,以减轻楼之重量,随后停下主楼工程,实施

基座工程,在基台受力较轻的情况下完成基台的修复,之后,再去进行主楼的工程。这种想法的优劣暂且不去评论,但这确是一种有眼光的综合性的思考方法。

光岳楼这一类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类有很高价值的古建筑的保护修复,一定要依据文物建筑保护的规定,请各有关方面的专家反复研究,论证,对各种观念性的方案都要进行可行性研究,从而制定出最佳方案。这种设计方案必须建立在对建筑本身及其环境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面的充分的调查研究上。设计方案本身也必须是综合、全面的、长远的,而且它不仅是一种设计,而且是一种实现,是统帅指导所有保护修复措施实现的一贯思想。它应该是对保护对象所设计的最佳未来。

文化部 1986 年颁发的《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等修缮工程管理办法》是对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的具体解释和具体要求,如果是 1984—1985 年光岳楼修复工程出现了一些错误,未能“事先做好勘查测量调查研究,在充分掌握科学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设计”。是因为《办法》是在 1986,光岳楼工程完工半年之后才颁布的,尚有情可原,但是,八五期间的光岳楼基座工程则必须严格按《办法》的要求开展工作,《办法》是一种古建筑维修的程序要求文件和技术设计管理要求文件,但它更是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修缮工作方面的原则,忠实地执行《办法》要求,是实现在古建维修工程中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的唯一的捷径。

今非昔比子建墓

默 涛 徐燕萍

一、曹植墓维修前的状况

东阿王曹植，葬于东阿县东南黄河西岸，距县城约 20 公里的鱼山西麓。

鱼山，古称吾山，后改鱼山。山虽不高，但面临着波涛汹涌的黄河（古代是大清河），座落在一望无垠的平原上，突兀而起，显得气势宏伟，名扬古今。《水经注》云“东阿鱼山上有柳舒故城”，属春秋齐地。《左传》哀公二十七年，陈成子救郑及留舒（柳，留通用）。其山之阳，古有“吾山书院”。

曹植之墓，座落于鱼山西麓。座东朝西，南临星落陨石，北靠羊茂平台。墓门前有一座古建碑楼，墓门上刻有“曹植隋碑”四个楷书大字。隋代开皇十三年，东阿王曹植神道碑，挺立在碑楼内。碑文书法杂用，篆、隶八分，结构严谨，字体奇异，笔力遒劲，显得格外幽雅古朴。碑楼西壁镶嵌着（1.05 米×0.60 米）石刻横批一方，是大明弘治八年，山东按察司治阳九皋子用章草狂书七律一首：

人才三国数谁良，子建于曹独有光。

七步诗成名盖世，千年冢陷闻骨香。

鱼山西麓斜阳老，胶水东阿衰草荒。

今日我来寻掩处，精灵安妥花彷徨。

东壁镶嵌着 1.80 米×0.80 米的一方竖碑，可惜年久风化，字

迹不清,时代不详,但碑冠“魏陈思王传碑”六个小篆体的大字标题还是十分清晰,这是撰写曹植生平事迹的珍贵铭刻。墓门前还有清末民初的许多碑碣如“清诗碑”、“清重修陈思王碑楼记碑”、“清新建故魏陈思王墓碑亭记”、“民国魏陈思王曹子建墓碑”、“修复曹植墓记碑”、“魏陈思王曹子建碑”。墓上是奇石悬崖、峻壁陡峭,并覆盖着乱石红土。由于年代久远,沧桑屡变,“吾山书院”、“曹植读书处”,早已荒圯无踪。在历代战乱中,这座古墓也几经破坏,损失严重。

解放后,在上级党和政府的重视下,为了抢救文物,曾于1951年由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持,聊城专署及东阿县文化部门协同,将其墓室清理。出土文物130多件,先存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2年平原省撤销,这批文物转故宫博物院。195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这批文物转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是年,曾在故宫午门外西廊陈列室展出。1985年,经协商这批文物移交聊城地区博物馆,后转东阿图书馆,并一直保存在这里。1956年这座古墓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废)。1980年列入《中国名胜辞典》。1992年再次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过去,曾有人对这座古墓怀疑,曹植是否真的在此埋葬?1977年3月,在墓门右上方约3米高的砖壁中,发现一阴刻铭文砖。内容是“太和七年三月一日壬戌朔,十五日丙午,兖州刺史侯昶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侧面“里陈王陵各赐休二百日”。另一面:“别督郎中王纳主者,司徒从掾位张顺。”由此可知,曹植葬在此地无疑。

但是,当时曹植墓所处一周围环境,却十分不尽人意。墓门前五六米远处就是一座粪坑,粪坑西就是住户,墓北是一家住户和牛棚,墓门西北十米远处,又是一个厕所,墓南紧靠墓侧也是民房。

才富八斗的东阿王之墓,就是被包围在这样一种恶劣的环境中,郭沫若次子郭博先生来此凭吊曹植时,曾为此悲伤的痛哭流涕,深为这位历史名人墓葬所处的环境而伤感。不仅如此,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当地村民,为采石卖钱把一个好端端的鱼山几乎开去了一半,鱼山曹植墓危在旦夕。为此,地区文物管理部门曾多次亲临现场制止。1990年前后,中国文化报发表了读者来信,呼吁救救鱼山曹植墓,自此,方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又加上水利部门从黄河防汛方面所做的工作,鱼山开山问题,才得以彻底制止。

二、曹植墓的维修和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好转,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对曹植墓的保护和维修,越来越重视。前后共有四次比较大的保护利用措施。

第一次是1981年11月,省文化局拨款维修了清代的隋碑楼,修建了四十多米的曹植墓围墙。这是建国后所采取的第一次保护曹植墓的措施。

第二次是1986年。省文物局拨款维修曹植墓室。这项工程由曲阜林西古建工程队承担。施工前,地区文物管理部门的陈昆麟同志和东阿县的张方文、刘玉新等同志,曾对该墓的原状作过广泛的调查和仔细的研究,力求使这次维修能够达到或者接近原貌。这次修复的塌落的墓顶、坍塌的墓壁以及甬道、墓门等,都是在找出原来的痕迹后又结合群众的回忆而修的,基本上恢复了墓室的原貌,人们可以直接进入墓室参观了。此次维修自86年5月20日开工,至8月1日竣工,历时70天,共用人工1080个,花费人民币13800元。

第三次大的行动,是由东阿县单庄乡的党委、政府完成的。1993年,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袁炳臣同志,1990年曾和陈昆麟同志

一同调查、制止鱼山开山挖石之事,他对曹植墓的价值和保护曹植墓的意义比较了解,因此,他上任乡党委书记后,就把保护曹植墓、治理曹植墓周围环境当作一项重要任务。在他的努力下,将曹植墓周围上百户人家、上千间房屋全部拆除。使曹植墓前空出了一个南北长 200 多米,东西宽 80 多米的广场。为曹植墓下步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第四次维修工程,如从制定维修规划算起,应始于 1994 年。是年 2 月,山东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的专家黄国康、常兴照等,对鱼山和曹植墓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和论证。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了《山东东阿鱼山曹植墓保护及景区规划》,并制作了沙盘模型。整个规划分 6 期工程,预计投资 760 万元。

1996 年 3 月,上述规划开始逐步实施。第一期工程破土动工。首先修建了 240 米的围墙,墙皮用红土涂刷,墙顶覆青色瓦,极力营造一种王陵气氛。大门是依照汉代画像石中的汉阙建造。石基、红墙、青瓦,给人一种古朴浑厚、庄重大方的感觉,体现了三国时的风格。

重建的隋碑亭为四角双重顶歇山式,座东朝西,位于曹植墓的西北隅。有重要文物价值的隋代开皇十三年为曹子建立的功德碑就置放在里面。为曹植墓陵园内增加了一景。

仿汉庑顶式的子建祠,座落在北围墙内偏西部。里面陈列着曹植墓的出土文物及曹植的生平展览。虽为新建,但也是陵园内不可少的内容。

在曹植墓的南侧,新立了三十多幢名人碑刻,也为曹植墓增加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此次保护工程,自 1996 年 3 月 24 日始,至年底止,共耗资 40 万元。

三、曹植墓的现状

经过上述几次较大的保护措施,特别是第三、第四次,使今日曹植墓及其周围的环境大大改变了原来的样子,墓前开辟了八千多平方米的广场。有红墙青瓦的陵园围墙,高耸在西面围墙中部的汉阙式的陵门庄重肃穆。陵园内,新建的子建祠和隋碑楼,古朴典雅。陵园南侧碑林,有楷、有隶、有草、有篆,皆出自名人名家之手。给陵园增添了几分灵气,几分文雅。陵墓北侧的盘山路蜿蜒曲折,直通山顶。此处已形成一个具有游玩、观展的文物景点。来此凭吊和瞻仰曹植墓的人们每天都络绎不绝。

千年铁塔重现异彩

陈昆麟 徐燕萍

一、铁塔概况

铁塔,位于聊城东关运河西岸,原护国隆兴寺东南角。始建于北宋时期,是本市现存最古老的建筑。

铁塔为八角形楼阁式佛塔,现为12层,通高15.8米,由塔身、塔座两部分组成。

塔基座为石砌正方形上下叠涩不对称式须弥座,高2.90米,底边长为3.17米,占地10.16平方米。牙脚四角成卷云形,罍牙刻宝装覆莲一周,莲瓣中间起脊,脊两侧突起椭圆形泡,瓣尖卷起作如意形;正面阴线刻缠枝花卉纹饰。罍牙上有二层叠涩,下层正面阴线刻缠枝花卉纹饰,上层刻云头,仰莲纹一周。束腰四面均有伎乐人物浮雕。南面中有二龙作上下翻滚状;左右各立一人,左者风化过甚,面目服饰不清;右者赤足身穿长衣,肩披飘带,左手曲臂举一物,右手曲臂置于胸前,脚踏瑞云。东面有二伎乐人,似胡人俑,多髯,长袍窄袖,戴包头,手持飘带,均作舞蹈姿态。北面有二凤,雌雄追逐,作顾盼相戏之状;左右各一伎乐人,服饰与壁同,左者残缺,形态不详;右者左手举一物,似手鼓,右手举一锤,作击鼓舞蹈状。西面有二伎乐人头戴朴头,肩披飘带,身穿长衣。左者前跨腰鼓,欹腰双手作敲击姿态;右者曲臂作站立状,因残,动作不详。束腰东南和西南两隅,各有一金刚力士,手按双腿下蹲作顶托

状,怒目凸腹,形象雄伟,束腰上髹涩三层。下二层均刻减地平,伎乐人物、象、鸾、凤、仙鹤、带翼鱼化龙及缠枝牡丹纹饰。上层刻仰莲一周,形式与髹牙上的宝装覆莲一样。方涩平脚正面阴刻缠枝花卉纹饰,其上有二层叠涩方台,下层刻减地平,忍冬卷草花卉。上层刻云头,仰莲纹一周,形式与束腰下的云头、仰面莲纹一样。

塔身系用铁仿木建造,分层冶铸,逐层迭装,铁壳中空,厚度6~10厘米不等,内填满碎石砖瓦,无登临设施,此塔原为十三级。倒塌八层塔身,只找到七层,尚缺一层,各层塔身均残缺不全。修复后为十二级,从塔身收分情况看,似缺第九(?)层,全塔现存高度15.8米。

第一层塔身,直径1.53米,底部一周宝装覆莲,塔身八面分别有四个假门与假窗,门额有门簪四枚,簪面成削角方形,假门上均有铺首和门钉,东、西两面的门做成半掩门式,假窗为破子棂窗。转角置圆倚柱,都铸成刹头式,有侧角和升起,柱间无阑额上有普枋。每面补间铺作隐刻五铺作重抄偷心造,转角铺作为实跳五铺作重抄偷心造。

二至七层塔身均无门窗雕饰,八至十层雕有格窗花饰。各层倚柱及斗拱与第一层相同。每层塔身均有腰檐平座,腰檐为仿木檐铸造,有檩枋,檐椽,飞椽,瓦垄及斜脊等。腰檐平座的铺作均为四补作单抄计心造。第五至十一层的平座现有栏杆,其余各层平座的栏杆均已残缺。塔身逐层收分,塔顶置仰莲葫芦宝瓶式塔刹,此刹现今重铸已非原样。

二、建国后第一次维修

铁塔原为十三层,由于风灾地震,年久失修,上部八层和塔顶在百年前倒塌,仅存下部五层塔身与塔座。1973年3月,聊城市政府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组织人员,对铁塔进行了清理和重修。

首先,从铁塔四周泥土中挖出了七层塔身和塔顶残片。随后,对残存的五层塔身和塔座进行了清理。在拆卸塔身时,发现塔身内除砖石碎块外,还有六块浮雕刻石。拆卸塔座时,又发现乐舞人物浮雕刻石四块。接着,在塔座底部中间发现一块一米见方的石盖,盖下有一深 80 厘米,南北长 86 厘米,东西宽 62 厘米的地宫(即石室),宫壁用浮雕仰莲、云水图案的刻石砌成。在北宫壁下,陈放着一个长方形石函。地宫内还陈放着铜菩萨、铜佛、青花瓷瓶,等佛教器物。宫底部有一深 5 厘米、长 57.6 厘米、宽 33.2 厘米的槽坑。

在地宫内发现的石函,高 29.4 厘米,长 37.6 厘米,宽 23.8 厘米,分函室、函盖两部分。石函一侧阴刻楷书铭文十行六十一字(字径 2.5 厘米),曰:

古有铁塔,在东关街北,永乐年倒。天顺年间,东昌府僧纲司都、纲性深,隆兴寺住持祖崇、僧德宁,发心募缘、至成化二年三月初六日重立铁塔记。

石匠掌记造

石函内放置一银棺和两包骨灰。银棺呈长方形,长 10 厘米,宽 6.6 厘米,高 7.2 厘米,分棺室、棺盖两部分,底部四角均有垫脚。棺身正面刻“辟支佛舍利”五字,棺底刻“大明成化丙戌(1466)年三月吉日造”。其他地方刻草木花纹。棺内有丝料骨灰袋一个,袋下四角各置素面无字银币一枚,币径 3.4 厘米、厚 0.2 厘米。布袋已成残片,内装骨灰和若干“舍利子”(实为石英、玛瑙、石灰质石珠)。

石函内的两包骨灰分别用黑白布袋装置,布袋已朽成碎片。黑布袋内装黑色骨灰,并有银块、铜块各一,绿松石 3 枚(经 1.4 厘米),绿釉红陶人头一件(高 2.5 厘米,宽 1.9 厘米,厚 1 厘米),舍利子百余粒。白布袋内装黄灰色骨灰和舍利子百余粒。黑白两个

布袋里的舍利子的石质与银棺内的相同。

在地宫中清理出的铜质器物共 6 件,其中佛像、观音菩萨、供养人、净水瓶各一件,觚形器二件,均为明代遗物。

佛像为鎏金释迦牟尼像,高 11.8 厘米,宽 9.4 厘米,螺髻,双目微合,两耳垂肩,袒露右臂,身披袈裟,右手抚腿,左手置于脐前,作降魔状,结跏趺坐于覆莲须弥座上,佛像下有一扁圆形石台供放置用。

观音菩萨像高 25.2 厘米,宽 10.5 厘米,头戴宝冠,身披璎珞,手贯环钏,肩搭飘带,腰束长裙,右手上举,左手持宝珠于脐前作说法状,面目端庄,结跏趺坐于仰覆莲须弥座上。

供养人高 4.2 厘米,头戴高尖冠,身穿宽袖长袍,呈合掌站立状。

净水瓶高 18.6 厘米,底径 6 厘米,分器身、器盖两部分。器盖呈宝装覆莲形,顶部有一柱,柱端呈瓜棱状。器身为盘状口,高颈、球腹,腹一侧有兽头顶瓜形流,流内侧有一插销,腹下为宝装覆莲形圈足。

两件觚形器均高 16.7 厘米,横宽 10.2 厘米,纵宽 7.9 厘米,均分三节,上部是六棱喇叭形口,中部为椭圆形箍腰,四面各有一竖棱,下部有六棱喇叭形圈足。

在地宫中清理出的瓷青花瓶高 16.4 厘米,口径 5.3 厘米,底径 6.1 厘米;圆唇、侈口、高颈、圆肩、深腹、圈足;瓷胎为白色,施白釉,饰青花,颈上有两耳,腹部有花纹,为明代遗物。

清理出的钱(埋在葬处的钱),共 693 枚,分别为唐、南唐、北宋、辽、南宋、金、元、明八个朝代 36 个年号的铜币。其中以北宋时期的为最多。

在塔身和塔座中清理出的 10 块浮雕刻石全呈长方形,均长 56 厘米,宽 43 厘米,厚 40 厘米,采用的都是“剔地起凸”技法,造型有

飞仙、娉伽、鸾凤、孔雀、狮子等。

清理结束后,本着恢复原状的原则,对铁塔进行了重修。主要是重铸了塔刹,将塔基从洼地向西北高地迁移了6米,塔基每边增设了7米宽的水泥基台。塔身中心浇注了钢筋混凝土。1973年12月,倒塌百年的铁塔又重新耸立在古运河西岸。

然而,由于当时技术所限,未对残损的塔身进行修补,以致影响了铁塔的风貌和寿命。

三、建国后第二次维修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1973年的维修尚有许多不完善之处;1、新铸塔刹与原塔风格不一致。2、原塔十三层,维修后为十二层。3、安装不严格,第十一层向东错位5公分。4、原塔身中空,为分层多次铸造,1973年维修时从塔刹到地基全部浇铸钢筋混凝土,致使整个塔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5、未对残损的塔体做修补,严重地影响着铁塔的寿命和风貌。实测报告表明:有八层腰檐有不同程度的缺损,第九层腰檐全部残失;第十二层也只残存两面。原残塔十二层,除第一层不设平座外,其余十一层均设平座及平座回廊,但其中第三、四、五、十一层的平座不完整,有些部位塔栏全部残失。塔身和群腰脊也有不同程度的缺损和裂缝,整座铁塔残坏严重,裂缝和缺损加速了铁塔深处的锈蚀。鉴于这种情况,1989年,山东省文化厅文物局拨专款对此塔进行修缮,这次修缮的重点是对残缺不全的塔身修补。1991年5月4日,修复工程正式开工。

对铁塔缺损部分进行修补,首先需要做出缺损部分的模型,然后才能依此进行修补复原。聊城铁塔的缺损包括平座、斗拱、平座栏杆、塔身、塔檐和群腰脊;这些缺损部位极不规则,缺损处凸凹不平,深浅不一。要恢复铁塔的风格一致,缺口衔接吻合严密。为达到这一效果,我们采用石膏铸塑雕刻取形方法,因为石膏具有纯

净、粒度细、凝固度高的特点,石膏可以按需加水调成糊状,凝固后强度较高,造型性和可塑性都比较强,易于加工雕刻,而且价格便宜,把糊状石膏敷在缺损口上,可以准确的拓印出铁塔缺损暴露面任何不规则的形状,用这种方法做出石膏雕刻型与铁塔缺损部位的形状一致,衔接十分吻合。

铁塔檐底面和平座斗拱构造复杂,缺损严重,这些部位难于用上述方法准确塑出缺损部位模型,于是,我们采用了胶泥、油灰取型、拓制阴模浇铸石膏型工艺。采用可塑性好的胶泥,在檐子保存完好部位的底面用胶泥按压取型,即得到拓印的塔檐底面的胶泥阴模型。然后将这个阴模型用木板托住,抬至塔檐缺损处,按塔檐残存结构痕迹接好口,从上面浇入石膏浆,为了增加石膏型的强度,中间预埋了钢筋,待石膏固化后,撤下木板,扒下胶泥,对石膏塔檐缺损型的大样稍加修整,即可交厂方铸造。

油灰带有较强的油性,不会固化成块,也不会粘连塔体,比胶泥的强度和造型更强一些,我们用油灰拓取平座斗拱阴模型。具体做法是:将油灰按印在平座斗拱中完好的部位,得到拓制的油灰平座斗拱模型,然后用木板将阴模托住,抬至平座斗拱缺损处,按塔体残存结构痕迹接好口,从上面浇入石膏浆。待石膏凝固后,撤下木板,扒下油灰,对平座斗拱石膏型的毛坯大样稍加修理,即可交厂方铸造。

铁塔缺损的平座栏杆是立式的,无有依托,石膏难以直接塑造。原塔体每层的平座栏杆的八个面是一体的,现为铸造和安装,必须分成八块制作。二层至十二层共需要七十二面平座栏杆和四十块分件,每块残损情况都不相同,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用石膏雕刻型沙造型浇铸衍生工艺,修复了所有的残损的平座栏杆。

最后,选用金属填补胶粘接法,铁条加固和环氧树脂胶掺铁粉封闭法,将所有的铸件,牢固地粘结在缺损部位。为了避免不牢

固,新安装的铸铁型大多采取了钢条牵拉加固措施,所用钢扁条的规格是 $25\text{mm} \times 25\text{mm}$ 的钢材,把每相邻的平座栏杆都用钢条连接,钢条两端都打孔套丝,栏杆尽头也都打孔套丝,然后用直径 6mm 的平头罗丝上紧加固,使八面栏杆形成一体,塔檐和平座也巧妙地运用各种形状裂纹及铸件之间的互相牵拉进行钢条加固,加固钢条做的十分隐蔽。再一项加固措施是用环氧树脂胶掺铁粉加固封闭。

具体做法是:先按配方比例将乙二胺倒入环氧树脂内,搅拌。然后按比例将丙酮搅拌,配成环氧树脂胶,这时需及时加铁粉进行搅拌,以减缓反应速度,然后用这种胶把缺损型与塔体缝隙中间的金属填补胶封闭起来,同时也把加固钢条封闭起来,使二者不接触阳光、水和有害气体,这种环氧树脂胶还有粘接和加固作用,也可以用来修整塔身接缝、裂缝和小锈蚀洞,抹平铸铁缺损型与塔体的接合部,使新旧之间的界线更为平整。最后,对新安装的铸铁刷百分之一的食盐水,进行做旧处理,使新旧之间的颜色更为接近。修补工作完成后,用铁锤重击新补塔檐,粘接缝无任何变化,而且塔檐的另一侧会发生共震和共鸣,足以说明粘接的牢固程度。

这次维修,从整个塔身来说,对所有残损的部位都进行了修补,只是73年维修所造成的诸多不足之处,如塔刹改样、塔缺一层等等,都因把原为中空的塔心浇灌了水泥石子,十几层塔身成为一体,无法拆动,故上述不足之处无法弥补。但总的来说,这次维修是比较全面和成功的,使千年铁塔重放异彩,以其挺拔俊秀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

原载《山东重点文物保护纪实》,山东省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泰山出版社出版

独具特色的古城格局

魏 聊

1994年元月,聊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聊城能跻身中国99座名城之列,主要是因为聊城保存有古城区及典型的古城格局,这是聊城历史文化名城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也是最具有聊城特色的文化精华之所在。

聊城的古城区位于聊城市区的西南部,其建造年代与背景,位置和性质的不同,又可分为两大部分,今分述之:

一、东昌老城区

位置:古城区西部

时代:明代遗存

性质:军事性城池

此城始建于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当时筑为土城。明洪武五年(1372年),东昌卫守御指挥佥事陈镛为战争需要(与元朝蒙古残余军队作战),主持了对东昌城的改造,重修为砖城。明正德十六年重修,在李延相《重修东昌城记略》中对此有较详细的补记:“城周七里有奇,高三丈五尺,厚三丈,池阔三丈,深二丈,四门,东曰春熙,西曰清远,南曰正德,北曰宣威。设城楼二十七座。其中又以西北角之绿云楼,东北角之望岳楼最为壮观。附城为廓,廓外各为水门,设吊桥,环以护城堤,延亘二十里,以御水涨,全城绮之,而且全部甃以砖石。”此后又经数次维修,均有碑记。

1947年,城楼、城门被拆除,但城墙基础完整如初,东昌府老城区的格局也因此完好地保留下来。整座老城区布局方整,边长均为一公里,街道布局与九朝古都西安大致一致。老城区以光岳楼为中心,分为东南西北四条大街,向外延伸,依次有“四口”(东口、西口、南口、北口),“四门”(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四关”(东关、西关、南关、北关)。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与环城牆路形成一个“田”字形,其它支干道则如一个“井”字套在“田”字之上,道路都是正方向的,纵横交叉,形成棋盘方格网状骨架。而在地面标高上,则是以城中心最高,向四周越来越低,至环城湖。

巍峨壮观的光岳楼宽、高度均为9丈9尺,是极阳之数,合于易理;分五层而建,暗对河络,它的一切都法于阴阳,寓于玄机,控制整个城市于指下:它雄居古城中心,是聊城市的象征,心脏和灵魂;它位于天元,皇极,又是城市阴阳之平衡点,极阴极阳之精华点;它雄伟、高大、又是城市的制高点;它为军事需要而建,可“严更漏”、计时、报时,掌握城市时间节奏;可以料望敌情,传递信息,又可以下达命令,作指挥中心;光岳楼是过街式楼阁,又是城市的交通中心;光岳楼墩台四通道各有石匾,东曰文明,西曰兴礼,南曰文明,北曰武定。值得注意的是,北方的“武定”,与原北城门上的“宣威”一样充满了对北方敌对的信息,这也是军事战争给文化遗产留下的印记。

聊城现存东昌古城格居极好地表现了其平原地区防御性军事城市的性质。立于光岳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的防御体系。最外一道防线是护城堤,原护城堤共长2023丈,高1丈,堤角横量6丈,面宽2丈,即可以防水护城,又是防御工事。现仅存南堤口至龙湾一段,总长约2公里,高2米,宽3.5米,为红粘土夯筑。是东昌古城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护城堤内是一周护城河,即现在的环城湖,其开挖时间与筑城时间同时,原比较窄。“池深二十尺,

池宽四五十尺,四门修有吊桥可以起落”。今吊桥改为小石桥,护城河也大大拓宽了,总面积竟达4.2平方公里,是东昌古城区的四倍,水深2~3米,常年不竭,是我国罕见的人工湖泊,其风光秀丽,景色优美,物产丰富,环境清幽,而且对调节聊城城市小气候起到极好的作用。环城湖是聊城独有的人文景观,也是东昌在古城区最令人赏心悦目的一部分。

古城墙遗址,现存古城墙基础环绕古城一周,长约4公里,高2~2.5米,为三合土夯筑,质地坚硬,今已被开辟为环城公园。古城墙遗址以内是居民区,多为三合院,四合院建筑,至今仍保持白墙、灰瓦、坡屋顶的传统建筑风格。传统街道象状元街、考院街、十县街风貌依旧。

东昌古城出于军事目地而修建。由于它地处平原,不用考虑地形限制,所以极其方正。又由于城高、池深,外围又有瓮城、扭头门、马面之类建筑,极其坚固,所以历来有“能陷不失凤凰城”之说。历代许多次战争,都因此而攻城不破,今列举之:

明成化元年(1465年)河北清丰农民马凤等起义攻打东昌失败。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堂邑县农民起义军宋景诗率万余人三攻东昌不克。

1946年1月2日起,解放军二纵三万余人将聊城包围,与守敌山东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王金祥部作战,多次攻城一年余,王金祥才弃城逃跑,攻城难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防坚固,四周水面既宽又深,不易接敌。

由此可见东昌古城的城市布局,确实能起到很大的防御效果,所以能陷不失之说不为过也,平原防御性军事城的性质表现的淋漓尽致。

运河文化区

位置: 古城区东部

时代: 清代

性质: 商业贸易区

要想了解中国的历史,聊城的文化,就要了解运河。运河始开公元前 486 年,形成于隋大业帝。当时的大运河长达 2700 公里,第一次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到了 13 世纪,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了中国,定都大都(北京),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由中原地区移向北方,所以就将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改造为以北京为中心的直下杭州的纵向大运河。穿东昌府而过的运河就是元代开凿的会通河段。

运河文化区是由于漕运发展而形成的商贸区,所以这一带的商业气息是很浓的。这一带的街巷多布列在运河两岸,随坡就势,依河而建,大小街衢皆与运河相通。运河区街巷的名称也多与商业密切相连,象南顺街、北顺街、馆驿街、米市街、越河街等。而运河两岸的建筑也多为砖房小舍,板门小院,呈现前店后堂的商埠风貌。

山陕会馆是运河文化在东昌最重要的遗产,这座华美的古建筑是由山西、陕西两省的客商创建的。清乾隆年间,东昌“商贾云集不可胜数”,其中又以山陕两省居多,他们在东昌经营钱庄、旅店、药铺、染房、杂货、书店、笔庄等多种行业。每至岁末人们就聚集在山陕会馆,供奉有信有义关公,并拜祀火神与财神,祈求得到神的庇护,然后就是吟酒作乐看大戏了。商人的豪华阔绰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东昌府的繁荣。此外运河一带还建有“苏州会馆”、“江西会馆”、“赣江会馆”、“武林会馆”,可惜已不复存在了。

大码头位于山陕会馆北 200 米处。是运河畅通时代东昌府最重要的码头。过去大码头立有一通御碑，是乾隆皇帝为减免东昌码头部分税收而立的。运河文化区至今还有运河古槐、小码头、大码头、古井、傅氏家祠等文化遗迹，仍会使我们体味到这一带昔日的繁荣。

东昌古城文化区和运河文化区既是风格各异的两部分，又是密切相连的一个整体，横贯东西的五里东关大街将二者联结在一起，宽阔的环城湖环绕东昌老城区又与运河区相交织。从空中俯瞰，东昌老城区像一副方正的棋盘飘浮于千顷碧波之中，连湖、羽湖等十余个小湖像一面面明镜镶嵌在运河区之内，古老的大运河宛如一条玉带在城区蜿蜒穿过，城中有湖，湖中有城，城湖河交织如画；而古城与新城区之间的界线分明，新古城区相连而不相交，古城区风貌极其明显。

光岳春秋

陈昆麟 徐燕萍

一、光岳楼的基本状况

光岳楼位于聊城古城中央,建于明洪武七年(1374年),为四重檐十字脊楼阁,高33米,目前已是我国现存古代建筑中最古老、最高大的木构楼阁之一,1988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聊城出现光岳楼这样高大雄伟的楼阁,不是偶然的,它的建造与聊城的历史地位及古城池的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

明王朝建立初期,元王朝刚刚灭亡,北方的局势很不稳定。出于防御蒙古贵族统治集团复辟的军事需要,东昌卫守御指挥金事陈德,从明洪武二年(1369年)到洪武五年(1372年)将宋熙宁三年(1070年)所筑土城改筑为砖城。为“严更漏而窥敌望远”,报时报警,于洪武七年(1374年)又用修城余木,建造了这座高达百尺的更鼓楼,故初名“余木楼”,又名“鼓楼”。

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知府杨能重修光岳楼时,又因地而名,称之为“东方楼”。明弘治九年(1496年),吏部考功员外郎李赞(河南西平人)在他《题光岳楼诗序》中说:“余过东昌,访太守金天锡先生。城中一楼,高壮极目。天锡携余登之,直至绝阁,仰视俯临,毛发欲竖。因叹斯楼,天下所无,虽黄鹤、岳阳亦当望拜。乃今百年矣,尚寞落无名称,不亦屈乎?因与天锡评命之曰‘光岳楼’,取其近鲁有光于岱岳也。因和傲翰林诗一律,以归天锡,不知

斯楼以为何如？”此后历代重修碑记中，一直沿用“光岳楼”，但人们仍习惯地称它为“鼓楼”。

楼基为砖石砌成的正四棱台，高 9.38 米。底边边长 34.43 米，上缘边长 31.93 米，下大上小，有明显收分。台体四面各辟半圆拱门，券至台中心处是十字交叉拱。东门乃登楼唯一之通道。梯井口上筑一敞轩，以防雨水侵入。

四层主楼筑于高台之上，全为木结构，方形带廊，高 24 米。

第一层地面比台面略高，呈正方形，四周砌以条石，面阔进深皆七间，明间面阔特大。第一层北向门内，在明间柱檐与金柱间置穿插枋，上搁楞木楼板，楼板上构筑一鲁班神龛，左右设小梯可供升降。第二层面阔进深仍为 7 间。第三层系暗层，实际是楼之结构层。利用横木穿插，梁枋扣合，将自下直贯而上的 12 根金柱和 20 根檐柱从上端构成一个整体，使之更加牢固和稳定，故三层也是楼身的主要框架。该层面阔进深皆五间。第四层为楼之最高层，面阔进深皆三间，平面正方形。通面阔通进深等于其他各层明次间的总和，所以比其下几层骤然缩小，且无平座栏杆。

楼脊为歇山十字脊，脊顶正中装一座高 3 米，直径 1.50 米的透花葫芦。

光岳楼上的建筑构件，大部分是初建时的原物，虽几经重修，但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面貌，是明初的重要遗物，许多地方保留了宋元风格。以形式而论，砖石、重檐、十字脊及内部置空井等，仍袭宋元楼阁遗制。细部以柱础而言，从明洪武初所建南京宫殿已开始用古镜式，而此楼则仍为宋元以来的覆盆式。就结构来讲，柱之侧角升起，楼置暗层，内外等高双槽柱列，斗拱疏朗配置，以及柱头科斗口未宽等，也都上承唐宋以来的传统做法，但与大同钟楼等明初其他建筑相比，又有若干相似。因此说光岳楼是我国古代建筑史上从宋元向明清过渡的珍贵遗物。

光岳楼高大巍峨，十数里外就能看到，古人曾赞美她“台高数仞，楼高数寻，冲汉凌霄，连云梯目，巍巍然，峨峨然，如翠如翼。昔人所谓‘手可摘星辰’不是过也”。

光岳楼是聊城文明古老的象征，当地人民对光岳楼有着特殊的感情。每逢“九九”重阳、新春佳节，城乡人民便扶老携幼，来登临这座“盖在半空里”的楼阁，以饱览鲁西平原特有的景色。极目远眺，中原风光历历在目；俯视环顾，城廓河湖，交织如画。封建科举时代，本地凡中了秀才、举人、进士、状元的人，都要登上光岳楼告祭“文昌帝君”。那些衣锦还乡的卿相更喜登临光岳楼，临风把酒，怀古抒情。

不仅当地人喜爱光岳楼，外地游客也多为其雄伟的身姿所吸引。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南北交通大动脉，沿河过往的帝王相卿、文人学士多都登临光岳楼，凭栏咏月，作诗赋词。仅《东昌府志》、《聊城县城》及现存碑刻中就记载了 120 多篇咏赞光岳楼的诗文。清乾隆帝 11 次东巡、南巡，9 次过聊城，5 次登光岳楼，前后作诗 13 首。他第一次过聊城，就写下了《登光岳楼即事》七言律诗两首。昔日登临光岳楼的文人学士，还为光岳楼题写了许多匾额楹联。“神光钟瑛”匾额系清康熙帝所题。四层楼南向檐下悬挂的是清乾隆帝题写的“光岳楼”匾额。

光岳楼下现有石碑七通，横条壁碑十五方。七通石碑中有乾隆帝御题诗碑一通。十五方壁碑除有三方重修光岳楼记事碑外，其余的均为咏颂光岳楼的诗赋碑。

建国后，光岳楼受到国家的重视。罗哲文、陈从周、郑孝燮、陶逸仲、祁英涛等古建专家多次来聊城考察，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舒同、启功、溥杰等许多名家先后为光岳楼题写了匾额和楹联。1974 年，为纪念光岳楼建造 600 周年，郭沫若副委员长重新题写了“光岳楼”匾额（现悬挂于二楼北向檐下），著名书画家丰子恺在为光岳

楼题写的楹联中说：

光前垂后劳动人民智慧无极

岳峻楼高强大祖国文物永昌

光岳楼的确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广大聊城人民为有这样一座雄伟的楼阁而引以光荣和自豪。

光岳楼主楼系木结构，但能历经 600 年的风雨完好的保存下来，除其在建筑结构方面的原因外，无疑也是数代人悉心保护和维修的结果。600 年来，新中国成立之前，光岳楼共进行过 11 次维修。

第一次维修是在明成化二十二年(1468 年)。第二次维修是在明嘉靖十三年(1534 年)。第三次维修是在明万历年间，由东昌知府莫与齐重修。第四次维修是在清顺治五年(1648 年)，由知府韩思敬倡修。

第五次维修是在清顺治十七年(1660 年)，即在上次维修 12 年后，由知府卢谿重修。第六次维修是在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第七次维修是在清乾隆二十年(1755 年)。第八次维修是在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由海源阁创建人杨以增(时任湖北安襄荆郢道员)倡修。时隔 67 年，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在知府宋梦槐的主持下，对光岳楼进行了第九次重修。1933 年(民国 22 年)由聊城县长孙桐峰主持，对光岳楼进行了第十次维修。第十一次保护维修是在 1937 年(民国 26 年)，由行政督察专员兼聊城县长范筑先督导，对光岳楼进行了维修。

二、建国后对光岳楼的保护措施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对光岳楼的保护非常重视。四十多年来，前后共进行了七次维修。

第一次是 1956 年，主要是在第三层楼顶端加了两根工字钢

梁,并对全楼进行了油饰。第二次维修是在1964年,主要是清理瓦垄,换瓦补檐,矫正敞轩。第三次是1967年,主要是对光岳楼基座进行了整修加固,在青砖基座表面抹上了一层水泥皮。这实际上是一次性的破坏,水泥皮和青砖粘结在一起,大大损坏了原来青砖的寿命,改变了光岳楼的风格。上边是明代木构建筑,下边是现代化建筑材料的水泥墙皮,十分不协调,严重破坏了古建筑的风貌。第四次维修,是在1971年,主要是更换了一层24根廊柱和一、二层部分檐椽,修补了部分边檐瓦口,拆修了二层东北角挑角。第五次维修是在1976年,主要是对四楼进行了加固。

以上五次维修,都是小范围局部维修,都不能解决光岳楼自身存在的重大隐患。进入八十年代后,光岳楼四层严重漏雨,原因是,楼顶承担风向标的铁架的四根柱角插入楼顶之内,楼顶和柱角的结合部处理不当,由于漏雨,致使部分木质构件腐朽糟烂。另外,部分屋面、筒瓦和板瓦残破不齐。楼体木构件的油漆严重剥落,光岳楼不仅失去了当年的风采,而且也隐患四伏,危在旦夕。因此于1984年5月16日正式动工对光岳楼进行了建国以来规模较大的维修工程,也就是第六次维修。至1985年12月16日竣工,历时19个月,耗资45万人民币。这次工程由曲阜古建公司书院建筑队承担施工。光岳楼修复工程领导小组还曾邀请国家文物局、同济大学、山东省考古所、山东省建委的古建专家、教授来聊,对光岳楼进行勘察,分析情况,研究施工方案,指导技术实施。由于多方面的支持和努力,光岳楼的修复工程顺利结束。光岳楼是十字脊楼阁,维修前,十字脊之上原设有一个清代透光铁葫芦,高3米,最大径1.5米,铁葫芦、风向标全部拆下,并将十字脊、山墙瓦全部卸下,更换了十字梁、天沟梁等腐朽的木构件。然后重砌山墙,垒十字脊、瓦层面,后来,由于考虑到工程的社会影响,考虑到聊城人民的习惯感情,又听取了不同的意见,重新安装了铁葫芦,

但没有重新安装风向标。

六百多年来,光岳楼能不坍、不倒,关键在于三十二根金柱保护的好。其中内槽金柱和外槽金柱的功能作用是不一样的,所以保存情况也不一样。内槽金柱的负荷比外槽金柱的负荷重,内槽角柱负荷最重,而外槽金柱自二楼以上全部暴露在外面,受阳光、水份和有害气体侵蚀严重,易于腐朽,特别是外槽角柱受三楼外檐的保护更少一些,所以极易发生腐朽,光岳楼外槽金柱的四根角柱有三根腐朽严重,均发生在二楼以上至金柱柱头一段。所以光岳楼东南角金柱腐朽的最为严重。光岳楼的金柱均是由基台直达三楼,高度是9.6米,十分沉重,况且每根金柱与其他木构件的连接点就有几十处,更换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工程决定采用化学保护法解决这一问题,专门请来了化学保护方面的技术人员,经研究,决定采用环氧树脂胶对腐朽洞浇灌,并用钢板外包加固的方法。选择适当部位挖槽,掏出朽木,将朽木清理干净,然后配好以环氧树脂胶为主的粘合剂向柱洞内浇灌,如果洞较大,还可填入木块、砖块等。最后,用马粪纸敷放在柱上做出个样子,照此样做出一个钢板箍,卯榫处可做的宽松一些,钢板箍两端用螺丝上紧,采用这种方法的地方共有四处。一是三层东南角外槽金柱柱头部分,二是三层西南角外槽金柱柱头部分,三是二层东北角平座一段外槽金柱卯榫结合部位,四是四层东北角老檐柱卯榫结合部。使用这种方法可大大减轻工程的难度,提高工程的进度,更重要的是,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建筑的原构件和木架结构原状。光岳楼十字脊上的大吻在拆开时碎了,我们也是用环氧树脂胶将其粘合。对一、二层进行落架维修时,发现二层平座回廊普遍下沉,回廊地板外闪严重,外檐斗拱歪斜、松散。椽子上端固定檐枋脱节,从而使整个外檐外倾,童柱的落点游位严重。面对这系列的问题,专家们和工程技术人员反复论证,最后一致认为,造成这系列问题

的主要原因是童柱的落点移位而使得地板、斗拱随之外闪、下垂，只要扶正和垫高童柱、地板，斗拱和椽子就能升高，恢复原位。当时按照这样的指导方针对二层平座进行了重新安排，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总之，这次维修，一是揭盖翻修了全部瓦顶，更换了全部边檐瓦口，更换了全部望板和部分檐椽，重新制作安装了透光铁葫芦宝顶。二是更换贴补，矫正了一、二层廊柱和四层八根辅助圆柱，加固了二层东北、东南、西南第檐柱，用化学高分子灌注了上端中空的四层四根金柱，更换了部分梁檩桁枋，修补更换了大部分斗拱，更换了二、三层部分地板，修理了全部门窗，三是对全楼进行了油饰。四是按原样重新制作了五块匾额，重新树立和接补了五通石碑。

第七次维修起于1992年3月，止于1993年10月，主要是对光岳楼基座进行了加固复貌。光岳楼基座曾于1967年进行过加固维修，但当时采取的做法是在砖砌基座外墙平台表面抹一层水泥皮，这层水泥皮到了八十年代，经过20余年的风雨剥蚀，已出现严重的裂缝、脱落、渗水现象。为此，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并拨款，对基座进行了全面维修。这次维修首先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所需 $45 \times 23 \times 10$ 厘米的大青砖十分缺乏，我们山东买不到，最后从西安买回，维修工程开始后，首先铲除了基座外表的水泥皮，然后对墙体损坏部分进行了挖补，最后用大青砖对外墙进行了包砌。用 $50 \times 50 \times 12$ 厘米的方砖对平台进行了铺漫。工毕，光岳楼基座又重新恢复了初建时的原貌。

为了确保工程的质量，施工过程中曾邀请国家文物局罗哲文、建设部郑孝燮、故宫博物院傅连兴三位全国著名的古建专家莅临指导，他们不顾年事已高，爬上高高的脚手架亲自探测墙体结构，并提出众多指导性的意见，对光岳楼底座的维修，起了重要作用。

在各级文物部门的关心下,在全国著名古建专家的具体指导下,维修后的光岳楼,更加雄伟壮观,古朴大方。如李赞返世,不知又要以怎样的语言来赞颂这座明代楼阁呢!

原载《山东重点文物保护纪实》,山东省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泰山出版社出版

谈谈历史文化名城的 保护、利用与建设的关系

魏 聊

1994年元月,聊城被列为国家第三批历史文化名城,这是聊城的莫大殊荣。同时,随着京九、济邯两大交通新干线的开通,位于这黄金交汇点的聊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面临着全面腾飞。因此,及时地解决好历史文化名城和保护、利用和建设的关系,是聊城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聊城历史文化名城的形成与特点

聊城历史悠久,春秋时期就见诸史乘,秦汉为郡县,隋唐宋元为州,明清为府。宋淳化三年(992年)由巢陵城迁至今所,宋熙宁三年(1070年)筑土为城,明洪武五年(1372年)由东昌卫守御指挥僉事陈镛主持将宋土城改建成砖城。明清两代是聊城历史上的繁荣时期,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京杭运河的会通河段被开凿,穿城而过的运河为聊城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经济上也出现了高度繁荣,成为沿河九大商埠之一,被誉为“江北一都会”。

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为聊城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位于古城中央的光岳楼,高大雄伟,巍峨壮观,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现存古建筑中最古老、最高大的木构建筑之一,有“虽黄鹤、岳阳亦当望拜”之誉;创建于清乾隆八年的山陕会馆,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位于东关街古运河西岸的宋代铁塔,古朴典雅,崇峻挺拔,是我国屈指可数的铁铸佛塔;由清代著名藏书家杨以增创建

于清道光二十年的海源阁,藏书二十余万卷,其中宋元珍本逾万,是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聊城市境内还存有权寺遗址、傅氏祠堂等二十八处文物保护单位,其中老城区内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就达十六处之多,文物十分集中。

聊城历史文化名城的特点是集名城、名湖、名人于一体,所以又被誉为“三座城市”。

聊城之所以能跻身于全国九十九座历史文化名城之列,其最主要的原因是聊城保留有老城区及典型的古城格局。聊城的古城位于现聊城市区的西南部,按其建造年代、位置和性质的不同,又可分为二大部分:一是东昌老城区。位于整个古城区的西半部分,为明代遗存,具有军事性城池的性质。整座老城区布局方正,边长均为一公里,总面积为一平方公里。城市格局与九朝古都西安大致一致。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光岳楼,位于古城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是古城的主要干道,四条大道向外延伸,分别有“四口”、“四门”、“四桥”、“四关”。其它道路也方向很正,纵横交叉,形成棋盘方格网状骨架。二是运河文化区。位于整个古城区的东半部分,形成于清代,带有商业贸易区的性质。这一文化区的特点是,布列在京杭运河两岸,随坡就势,依河而建,大小街衢皆与运河相通,形成放射性骨架。运河区街巷名称多与商业密切相关,象南顺街、北顺街、馆驿街、米市街、越河街等。而运河两岸的建筑也多为砖房小舍,板门小院,呈现前店后堂的商埠风貌。

名湖是指在原护城河基础上拓宽的环城湖,其开挖时间与筑土城时间同时,应为宋熙宁三年,原来比较窄,“池深二十尺,池宽四、五十尺,四门修有吊桥可以起落”。今吊桥改为四个小石桥,而护城河则大大拓宽了,总面积竟达4.2平方公里,是东昌古城区的四倍,是济南大明湖的五倍,水深2~3米,常年不竭,是我国北方城市中最大的人造湖泊,中国垂钓基地。它风光秀丽,景色优美,

物产丰富,环境清幽,而且对调节聊城的城市小气候起到极好的作用。从空中俯看,翠绿的东昌古城犹如一副围棋盘,飘浮于环城湖千顷碧波之上。古城与名湖构成了聊城的独特风貌。来聊考察的园林、规划专家对此无不交口称赞,把聊城誉为“中国北方的威尼斯”、“东方的诺亚方舟”。

聊城天华物宝、人杰地灵。明清两代,聊城文运大开,据《聊城县志》记载,这期间考中状元2人,进士99人,举人439人,其中既有被明熹宗誉为“讲官第一”的建极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朱延禧,清代首科状元、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傅以渐等名宦重臣,又有被清康熙帝赞为“字压天下”的状元邓钟岳等书画大家。近年则出现了史学家傅斯年,抗日名将范筑先,特别是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生在聊城、长在聊城、长期工作在聊城,为聊城文化增添了灿烂的一页。

二、古城风貌的保护与城市发展、建设的关系

古城的保护和新城的建设开发是一个极不易解决的问题,中国许多著名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都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北京不但在五十年代拆除了城墙,而且还拆旧城建设新城,新城和古城分不开。城市建设搞中心开花是中国城市建设的通病,古都西安也没解决好这一问题。西安钟楼本来是城市的中心,又是城市的制高点,但是在钟楼四周却建了好几栋在高度和体量上都大大超过钟楼的建筑,使原本十分雄伟的钟楼显得十分矮小,象个小弟弟一样,这样的城市风貌与我们所希望的古城风貌格格不入。成都为了修“万岁展览馆”,竟然将皇城拆除,金水河、御河填平,令人痛心疾首。而聊城在这方面比其它城市都做得好一些。

早在1958年,聊城在制定第一个城市规划时,就做出了离开一平方公里的东昌古城区和东关运河区,而在原北部的空旷地带

放开手脚发展新城的英明决策,这也正是聊城能保留有古城格局而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原因。当时还规定:一平方公里的古城区内改造的新建筑,不能高于光岳楼墩台,也就是不能建设二层以上楼房。在此后的这些年代里,聊城市政府还多次下文件,三令五申,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名义填垫护城河(即环城湖),使古城风貌和古城格局得到较好的保护。当然,在聊城的建设发展中,由于个别领导的失误,也出现过拆除范筑先将军司令部、拆除中国四大私人藏书楼—海源阁、拆除著名史学家傅斯年的祖宅,以及在古城区内建有少量超过光岳楼墩台建筑的事例。对此,我认为:加强民主建设、法制建设,反对长官意识、官僚主义,也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在当前,建设性破坏以“建设”二字为由,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因此,建议成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组,以专家组的形式,对名城的建设、规划进行论证,并集体决策,民主管理,真正达到城市建设法制化。专家组的组成,可由文物、规划、环保、园林、城建、市政和行政长官组成,并隶属于人大系列,使之成为城市立法和决策的权威机构。从而加强民主的力量,消弱个人的意志,将文化名城保护好,建设好。

聊城位于鲁西平原,是欠发达的地区之一。多年来都未能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古城的改造缓慢,也是聊城古城得以保留的一个原因。而现在,随着交通状况的改变,国家政策对聊城的倾斜,重点大项目在聊城的投资,以及自身活力的迸发,都将使聊城有一个突飞猛进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目前已有一个好的开端。建设中心已由原古城北部转移到西北火车站附近,但是,古城区的保护、改造仍容不得半点松懈,特别是城市交通的改造,无疑是目前古城保护的最大威胁。

近十年来,聊城人口由不足 10 万人一跃膨胀到 20 多万。由于古城原本就比较狭窄,所以,交通堵塞在聊城已成为一个问题。

著名历史文化名城专家罗哲文先生撰文论述这一问题：“开辟环路，扩大步行区，严格道路功能分工，是解决历史文化名城交通问题的一大良策”，诚为金玉良言。根据聊城的具体情况，本人还认为：首先要确定古城的价值和最主要的功能，围绕这一功能改造古城及古城的交通，才是根本性的措施。聊城东昌古城区仅一平方公里，面积比较小，所以，确定其为游览、渡假、文化为中心的功能并非脱离实际。聊城古城的改造以拆除工厂、迁出人口密集型机构，从而减少古城区人口和车流量。利用这种方式改善交通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也就是说，改善交通并非一定要拓宽旧路或开辟新路，这样一来，以交通需要而“冠冕堂皇，理直气壮”地对古城格局、文物古迹、古建筑街坊、民居拆除，就失去了依据。

三、优先发展文化旅游事业是聊城最明智的选择

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是因为历史文化名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文物一样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保护它既是为了将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留给后人，又是为了“古为今用”，在现实中实现其价值，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笔者认为，文物的“一保护，二利用”的原则也同样适合于历史文化名城。

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目前的聊城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这是公正的历史赐给聊城的又一机会，聊城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聊城的优势是什么？聊城应该优先发展什么？这是聊城急需确定的大决策。聊城的工业、农业、科技都没有优势可言，唯一真能称上国家级的，唯有历史文化名城。

从以上两个方面分析可知：发挥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优先发展文化旅游事业，是聊城最明智的选择。

文化旅游事业有“无烟工业”的美誉，投资少、见效快、无污染。

旅游事业的发展将成为第三产业发展的龙头,也最终将成为聊城整体发展的龙头。

聊城的文化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其开发利用要与古城的保护紧密联系。东昌古城区内可以光岳楼为中心,以环城湖为主要内容,建设环城湖风景区,其中包括环城湖公园、水上游乐园、钓鱼台宾馆、古城度假村、民俗文化中心、明代一条街、垂钓基地等,以旅游搭台,文化唱戏;运河文化区则可开辟运河文化游览线,展示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突出运河特色。这一线可以另一处国宝山陕会馆为中心,包括运河大小码头、天主教堂、运河古槐、护国隆兴寺铁塔、傅斯年陈列馆等文化遗迹。聊城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可开发的项目很多,而那些亟待开发的项目,也正是文物上急需保护的项目。所以,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统一地保护、开发、利用,不失为明智之举。

综上所述,历史文化名城—聊城的保护,利用与建设是统一的,三者既可以互相促进,又会互相影响。依靠党和政府的力量,充分地宣传历史文化名城,培养广大市民的名城意识,才是协调好三者关系的根本途径。

名塔巍然立 又闻风铃声

陈昆麟 徐燕萍

一、维修前概况

临清舍利宝塔，座落在城北三里许卫运河东岸河套内，建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由工部尚书、郡人柳佐监修，历九年乃成，原塔寺同建，称“永寿寺舍利塔”，后寺院废弃，现仅存古塔。

舍利塔为楼阁式砖塔，八面九级，高61米（塔刹毁于康熙七年（1668年）地震，现塔顶距地面53.44米）。基座边长4.9米，外接圆半径6.4米，塔身上部稍有收分，通体近垂直。塔外竖向各层外檐皆砖木结构，檐下饰以砖雕垂莲柱、隔架斗拱、阑额、普柏枋、橡望、勾滴等，陶质斗拱为五铺作，拱眼间镶砖雕“阿弥陀佛”四字。

顶部外轮廓呈将军盔形，由五十五层砖叠涩砌成，为中国古塔之鲜见。八面交脊施有砖雕垂脊，垂脊前端饰铸铁套兽，下系风铎。盔顶上置砖砌仰莲座，居中扣有吨重金陵铸造铸铁覆钵，并铭有施主、募化、工匠姓名，中央尚残存金丝楠木刹杆折痕。

冠表盔顶的金丝楠木刹杆，往下穿过各层塔心室，直落地宫，贯通全塔，旧志中称“通天塔心柱”，在我国古塔遗存中，尚属仅见。

塔体平面构成，各层皆为正八边形，地宫迤上各层辟出塔心室，一、二、三、四、五、七、八塔心室为正方形，六、九为八角形，层层相错，变化有致。各层辟有门（窗）洞券，四明四暗，一、六、九层塔心室设有内凹佛龕。

各层塔心室除以柔韧的金丝楠木塔心柱上下贯通外,并以隔层错置的砖构叠涩穹顶和金丝楠木梁架、楼板与塔外调筒体相构成整体。塔身、外檐及盔顶砌筑,全部采用“临清城砖”,砖的规格有三十多种,在四百多年的自然风化中同故宫、十三陵所有“临清砖”一样,不碱不蚀。至今用回弹仪测试,仍多在 150 ~ 200 号以上,有的甚至高过石材达 300 号。

各层塔心室砖壁镶嵌有疏文、募化、擅越、题咏、佛像等碑刻六十通。塔内设有螺旋式蹬道,由正门入塔,盘缓而上,直攀塔顶,登高远眺,运河如带,云雾袅袅,渔舟点点,令人心旷神怡。

此塔营造风格独具,巍峨壮观,为“运河四大名塔”之一,省内仅见,《中国名胜辞典》以“临清砖塔”列条载录,1956 年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弃。1992 年 6 月山东省人民政府重新公布(第二批)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塔是我国佛塔建筑史上的杰作,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早在清初就有荷兰人测量绘图,乾隆年间英使马戛尔尼曾率队实地测验。近年中央电视台《话说运河》及各报刊相继载文介绍,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也相继进行考察。舍利塔作为临清一处重要的历史遗存,是临清历史文化之精华,是研究明代历史、经济、文化、建筑、宗教、风俗的珍贵实物,是运河名城临清的重要标志。但因年久失修,塔檐几乎毁坏已尽,塔体多处出现裂缝,塔身内部券顶也多处出现塌落。通天塔心柱也因大火而烧去十之八九,仅存塔刹以下三米多长的一截。总之,此塔损坏严重,急待维修。

二、保护维修工程

永寿寺舍利宝塔建成三百八十多年来,至今未有见到有关维修的文字资料。这次维修,很可能是该塔建成以来的第一次最全面的维修。

此次维修,为了节省脚手架开支,采取自上而下的维修顺序。首先维修塔刹。

塔刹毁于清康熙七年(1668年)地震。首先恢复第八层千斤梁,然后用红松木作塔刹,一直上通至第九层和残存的金丝楠木塔心柱相接。衔接处采用巴掌榫拼接。

塔檐毁坏相当严重。对所有残损部位,全部进行了拆砌。

砖椽、勾滴和砖质斗拱,因质脆易折,大部分已断折、塌落。这部分构件,千姿百态,形状各异,凡可以烧制的,就定作烧制,不能烧制的,全部根据原样切割磨制。加工成形,然后重砌于原位。腐朽脱落的木质华拱、木角梁、木飞椽,皆用红松木照原样重新制作,腐朽者则用 150[#] 钢筋混凝土梁替换,以增加其耐久性。恢复各层塔檐的垂脊、力士、风铎、套兽。其中的脊块、力士等由曲阜烧制。风铎、套兽先由临清当地试制,耗资 8 千多元,所制产品达不到设计要求,又改为济南某铸造厂制作。所制风铎和套兽勉强符合设计要求,但与过去的产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为了增加塔檐的牢固程度,在木华拱到勾头各层砌砖中,垂直塔体配加 $\phi 6$ 钢筋,间距 25mm。钢筋伸入塔体内 300mm 左右。又沿塔身方向在檐口铺设 $\phi 6$ 钢筋 2 条。

塔体的维修难度也较大。对坍塌的券顶,塔心室墙壁、梯道、各层塔心室结顶,根据测量后的设计要求,全部按原样重新砌筑。对塔体内外的裂缝,实施高压灌浆,将裂缝填实封严。又在第二层到第九层的塔体上每层都绕塔一周做 $80 \times 8\text{mm}$ 的扁钢圈梁一道,以扼制裂缝的发展。这些扁圈梁全部埋入塔体之内,以免有碍于外部观瞻。原来塔上的木制门,已部分损坏丢失,这次恢复了第二层到第九层各层的券洞隔扇门,这样不但增加了美感,更重要的是保证了登塔人员的安全。同时,对塔上的全部木构件,用掺入五氯酚杀虫剂的桐油涂刷三遍,既防腐又防虫,大大增加了木构件的耐

久性。

为了增强塔体抵抗大自然的能力,还在塔上安装了避雷设施。在塔基周围补做了砖散水。

三、维修前的组织和准备

永寿寺舍利宝塔的维修问题,早就成为聊城地区文物管理部门及临清市委、市政府和人民群众所关注的问题。要维修塔,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经费问题。临清市政府通过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季羨林(临清市人)老先生做工作,从国家文物局争取到经费 40 万元。此款项到位之前,临清市政府先期拨款 10 万元,聘请天津大学的专家教授,对该塔进行了全面测验,取得了第一手资料。然后由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张之平主任等设计了维修方案。

为确保工程保质保量的顺利进行,由文物局责成聊城文物管理委员会组建舍利塔维修领导小组和技术监督组,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维修工作顺利进行。

为补充维修资金不足,临清市成立了维修临清塔募捐委员会。共募捐人民币 27 万多元。加上省文物局拨款 18 万元,前期共到位资金 85 万多元。

永寿寺舍利宝塔的维修,1992 年由国家文物局立项,天津大学测验,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所设计,山东省文物工程公司施工。1995 年 10 月开工,1997 年 8 月全部工程竣工。历时 1 年零 10 个月,使这座濒临倒塌的明代古建筑终于又恢复了原貌。

1998 年 9 月,由聊城市文化局牵头,组织了对该塔维修质量的验收工作。国家文物局、省文化厅、省文物局、聊城市政府对这次验收工作高度重视。参加验收的有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所古建部主任、高级工程师张之平女士、闫明工程师;省文化

厅副厅长王承典、省文物局局长由少平、聊城市副市长刘玉华、聊城市文化局局长殷立森及临清市有关领导。验收专家组由省文物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研究员蒋英炬、省文物局原局长、研究员刘谷、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所古建部主任、高级工程师张之平、省文物局局长由少平、聊城市文化局局长殷立森、聊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研究员陈昆麟、临清市文化局副局长袁陶光等七位同志组成,专家们对经过一年考验的舍利塔进行了细致的实地考察。然后进行了座谈讨论。工程中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部位做工不精细,原材料不太合格(大砖)等,但专家们一致认为永寿寺舍利塔的这次维修,规格高、质量好,不失为优秀工程。

新修好的宝塔,巍然屹立在古运河岸边,微风过处,风铃叮当,以她古朴雄伟的姿态,吸引着人们。

原载《山东重点文物保护纪实》,山东省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泰山出版社出版

山陕会馆维修记

徐燕萍

一、山陕会馆建筑概况

山陕会馆位于聊城东关古运河西岸。北约里许,便是集散货物的大码头。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之前。运河曾为南北漕运的主要通道。明清两代,聊城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成为商贾云集,车樯如织的水、陆码头。昔日,运河两岸曾是各省会馆云集之处,但随着运河的兴衰,今日就只有山陕会馆保留下来了。

山陕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八年,历经四年,包括山门、正殿等主体工程竣工。其后,逐年动工扩修,至嘉庆十四年,方具现在的规模。这是一处神庙与会馆相结合的建筑群,供山、陕同乡“祀神明而联桑梓”之用。会馆东西长77米,南北宽43米,占地总面积为3311平方米,保留至今的有山门、戏楼、南北夹楼、钟鼓二楼、南北看楼、南北碑亭、飨亭、南、中、北三殿、游廊、春秋阁、望楼等亭台楼阁一百六十余间。山门为三间牌坊式门楼,每间辟门,门旁衔以刻工精细的雕花石柱,门上,如意斗拱承托着金壁辉煌的琉璃瓦顶,六层如意雕昂层层排列,充分显示了清代精工细作、装饰性强的建筑风格。门上正中有“山陕会馆”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正门两侧门柱上刻有木质楹联一幅,上联:“本是豪杰作为,只此心无愧圣贤,询足配东国夫子”。下联:“何必仙佛功德,惟其气充塞天地,早已成西方至人”。一幅对联,充分表现了山陕两省人民对关羽的百

倍推崇。

戏楼为三层三间歇山建筑,东面门上有“岑楼凝霞”四个大字,门两侧又有两米高的大幅线雕石版画,左为松鹤,右为梅鹿。戏楼正面为三间台口,檐坊、藻井以透雕、彩绘装饰,足以与颐和园中德和园之复台结构的大戏台相媲美。其顶部建筑形制,更为国内罕见,一般古建筑,顶部多为四个挑角,而该楼顶部向东北、东南各伸出两个挑角,向西北、西南各伸出三个挑角,成十翼角,有的比作风凰展翅,有的说如俊鸟争飞,总之,犬牙交错,争奇斗胜,表现了古代建筑大师们的高超技艺。

戏楼两侧有南北对称的夹楼,为二层三间单檐建筑,夹楼外侧又有南北对称的钟鼓楼,为单间二层歇山十字脊式建筑。戏楼正对面为飨亭,与南北两侧对称,面阔五间的看楼,围成了一个四合院落,院中两尊高约3.25米的石狮,不仅比例准确,造型雄伟,而且刀法娴熟,刻工精细,生动地再现了狮子的威武凶猛,是难得的艺术珍品,两株古槐,老杆苍劲,丫杈盘绕,更给古建筑增添了古色古香。

山陕会馆的整个建筑面积并不大,因布局紧凑,设计合理,大小间错,疏密得体,所以整个建筑群并不拥挤,而给人以对称协调的感觉。

在这处民族风格的古建筑群里,还保留有历年重修大小碑刻十九幢,石雕方形檐柱三十根,浮雕、透雕的精密额枋四十二方,作为柱础的石雕狮子、大象、麒麟等十二座。照壁折壁人物、花草、山水等石刻画十二幅,主要建筑的一百一十六个柱础,都刻有各种花、鸟、兽等装饰,另有木柱上刻的楹联两幅,石柱上刻的楹联十幅,正楷行书兼备,字迹浑厚大方,遒劲有力,为书法家所称颂。因此,山陕会馆在建筑、雕刻、绘画、书法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艺术鉴赏价值。

山陕会馆为山陕众商所建,许多石碑都载有捐银商号及捐银数目。这些商号、数字,为研究资本主义萌芽及发展提供了很多的文字资料,戏楼与夹楼内壁还记有来此演出的许多剧团及上百个剧目,是研究戏曲发展史的重要史料。

1988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保护措施

山陕会馆自清乾隆八年始建至今已有255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前,先后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四十二年(1777)、嘉庆八年(1803)、道光二十五年(1845)、同治六年(1867)、光绪二十三年(1893)、民国二年(1913年)进行过八次扩建维修,工程量有大有小、耗资也有多有少,不再赘述。

1947年,聊城解放后,山陕会馆划归聊城一中作为学生宿舍使用,其间政府曾拨款对会馆的主要建筑进行修缮,但没留下任何文字资料。

1977年,山陕会馆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山陕会馆划归文化部门管理,并辟为聊城地区博物馆。同年,开始对山陕会馆进行第十次维修,至1985年止,历时8载,耗资40万元,终于将一处破坏严重的古建筑群抢救过来。

这次维修任务是相当繁重的。大部分屋顶都长满了草,戏楼和大殿顶部长的小树直径有5、6厘米粗,有的树根穿透屋顶。大部分瓦件破损,脊兽、仙人、套兽等不知去向。屋顶全部漏雨,因此许多木构件严重腐朽。更困难的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生产古建材料的厂家甚少,多处联系也难以购到琉璃瓦、脊块、仙人、脊兽等。只好在会馆北院空地上,自己聘请技术人员就地立窑、烧制琉璃瓦。克服重重困难,才烧制成功。仙人、脊兽也是聘请民间老艺人蒋泽勋带领徒弟捏塑而成。虽然不太理想,总算备齐了必要的

原材料。

这次维修,所有屋顶全部翻新,更换了泥背、瓦块、脊块,所有腐朽不能用的椽、檩、望板、挑角、博缝板等木构件,也全部更换。部分能拼接加固的,拼接加固后仍然利用。对山门、戏楼、夹楼、献殿、中殿前后檐以及南北看楼、南北大殿、南北碑亭、春秋阁等前檐的彩绘、透雕、额枋,全部修补后进行了油漆彩绘。特别是春秋阁一层前檐下的透雕缠枝瓜蔓,几乎全部被砸掉,只有部分痕迹。老艺人蒋泽勋师傅,利用纸浆,配以传统工艺,将此处透雕、照原样补齐,效果和木雕的一样。陈昆麟先生利用木粉配以他料,修复了戏楼上的木质楹联。在毕宝琪先生主持下,更换了南献殿西北角的墙内立柱,将南献殿前数第二排、南数第二根立柱下沉的地基和柱础衬平。依照献殿前原有的踏步两侧石望柱的样子,更换了十根石望柱及其附属石件。从一中征集并修复悬挂了“大义参天”、“万世瞻仰”、“风时浪恬”、“绚丽多彩”、“功司利济”五块匾额。遗憾的是,当时维修人员对古建筑维修原则知之甚少,错误的将火神殿、财神殿与前献殿相连的天沟拆除,破坏了古建筑的原貌。另外自己烧制的琉璃件,因设施简陋,技术欠缺,质量上存在问题,所使用的彩绘颜色也都是新型的化学产品,又加上彩绘人员既没有经过专门培训,又缺乏古建彩画的经验,也留下不少问题。尽管如此,这次维修还是应当给以充分肯定的,这次维修不仅保住了这座古建筑群的整体布局和框架结构,而且还修复了诸多损坏的透雕彩绘,基本恢复了原貌,成为聊城对外开放的一处重要景点。同时,也为山陕会馆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聊城申报并被批准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次维修,功不可灭。

上次维修不久,因自制瓦件不太过关,屋顶筒瓦全部出现冰裂碎纹,屋内开始漏雨,严重危害着这座国保单位的安全。因此又开

始了会馆建成以来最全面的一次维修。

这次维修工作,首先从绘图开始。1993 年开始对山陕会馆进行全面测绘。这是山陕会馆建馆 250 余年来从未有过的系统全面的测绘。测绘工作由山东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承担。他们的几名专家,坚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历经半年的时间,完成了山陕会馆古建筑群的测量与绘图工作。共绘图纸 218 张,耗资 7 万余元,填补了山陕会馆建馆 250 余年没有图纸的空白。于 1994 年 10 月开始维修,历时 5 年,完成了山门、过楼、戏楼、关帝大殿、前献殿、财神大殿、左献殿、火神大殿、右献殿、钟楼、鼓楼、左夹楼、右夹楼、南北看楼、南北碑亭、春秋阁、南北望楼、南北游廊及配房、院内地面、山门前广场地面的维修工作。

1、山门:屋面筒瓦和脊件全部使用按原件翻模烧制的件。

木构件中朽烂较轻的望板、大连檐和部分飞椽等,采用拼接法进行了修补,并在维修后新换的望板上普刷了两遍防腐防虫沥清油,以延长望板的使用寿命。为防止长草和减轻屋面负荷,将原来的泥背改换为焦渣灰背。

山门翼角有些下沉,正脊亦随其下斜,是因其结构不合理出檐太大造成。针对这一实际情况,采用了内部加固法隐蔽方案。即由侧面挑檐檩转角处至金柱间,设 $\phi 20$ 斜向拉筋附钢丝绳,牵拉翼角,使其不再下沉,现已自原下沉 0.15 米,回升 0.06 米。

砖雕残损,用原青砖粗凿细雕补配了残缺砖雕件,挖补了墙面,使之恢复了原状。

彩绘剥落严重,又加原正立面部分在 1978 年曾由地方艺人彩绘过,与主体建筑风格不符,针对这一情况,在进行油漆彩画工程前,技术人员反复研究查看该建筑背面所存彩画痕迹,临摹出图案,再参照现大殿内彩画的色彩,绘出小样,然后按照传统工艺程序,重新进行彩绘,经过努力,基本达到复原效果。

2、戏楼：戏楼的屋面瓦件，大部分更换，所更换的瓦件其中有一部分是从山门上移过来的旧瓦件。

木构件已照原貌拆换或修补，其中换红松木望板 200 余平方米，换上层檐椽 59 根，甩网椽 7 根，飞椽 59 根，补配象鼻子 4 件，昂头 26 件，滴水木 3 件。换下檐甩网椽 2 根，拼补 6 根，换朽烂椽 14 根。换北次楼仔角梁和老角梁各 1 根。换下层后椽檩条 3 根，随檩枋 3 根，灰背也改用灰渣背。

楼梯，落格窗扇，梯门已依据现有资料均进行复原，并注意到与整个建筑风格保持协调。

彩绘，均依照原有痕迹绘制图案，图案不清的，便参考了大殿中的彩绘图案和色彩格调，以求恢复原貌。

3、过楼：瓦件，大部分已拆换；木构件，更换了北侧跨梁，更换飞椽 24 根，博风板 3.6 平方米，并依照原来图案进行了彩绘。

4、关公大殿和前献殿：顶部更换了筒瓦、宝鼎、部分脊兽、灰背和檐椽、望板、飞檐等。其中筒瓦、宝鼎、脊兽大多是根据原样重新烧制。拆除了现有玻璃门窗及矮墙，复原了所有门窗共 36 扇，再现了大殿当年的面貌。精心彩绘了前后两廊的全部木雕，并对所有木柱进行了油饰。

5、财神大殿和左献殿：瓦件，更换了近 80 平方米的灰瓦和近 20 米的勾头、滴水，并对部分脊兽进行复原。木构件，针对各种椽子腐朽严重，望板、斗拱风化之情况，采取加固、拼补、更换等手段，更换修补望板 100 多平方米，金椽、檐椽、飞椽 200 余根。恢复了原有古建形式的花棂格扇门窗共 24 扇。

6、火神大殿和右献殿：屋面进行了全方位揭瓦翻修，更换了灰渣背和大部分屋面瓦件、脊兽以及朽烂严重的金椽、檐椽、飞椽、望板。对部分木雕件和斗拱原样修补，木构件加固之后，重新油饰彩画。恢复了原有古建形式的花棂格扇门窗 24 扇。对殿内地面损

坏的青砖进行了更换。

7、恢复了财神前后殿、火神前后殿之间的天沟：财神前后殿、火神前后殿之间的天沟，为便于使用曾一度被拆除，严重破坏了古建原有风格。这次维修，针对这一情况，经过多方论证研究，决定对财神前后殿、火神前后殿的天沟进行复原，尽管这项工作任务重、难度高，但是经过技术人员的不懈努力，终于以优良的质量，按时完成了任务。

8、钟楼、鼓楼：针对顶部瓦件碎裂、杂草丛生之现象，重新对屋顶进行了揭瓦补修。更换了灰渣背，杜绝了长草现象。而且对残碎不整的筒瓦、宝鼎、脊兽、滴水等进行了复原性更换。檐椽、望板、斗拱等木构件在拼接、更换、加固的基础上进行了油饰彩绘。墙体进行了挖补处理。

9、左、右夹楼：左右夹楼顶部瓦件破碎和油饰剥落较重。针对这一现象，顶部也将泥背更换成灰渣背。并对筒瓦、滴水、脊兽等进行了复原性更换。腐朽的檐椽、斗拱、望板等木构件，能拼接的拼接，不能拼接的全部更换，然后重新油饰彩绘。

10、春秋阁：顶部瓦件，脊兽破损者，全部更换，将原来的泥背换为灰渣背，腐朽的望板、檐椽、斗拱等木构件，能拼接的拼接，能加固的加固，不能拼接加固的，全部更换。损坏的额枋上的透雕，照原样补齐，并重新进行油漆彩绘。将现代式的玻璃门窗拆除，恢复了原落地木格门扇。

11、南、北望楼：南北游廊顶部木、瓦构件均按古建维修原则或拼接或更换，并对木构件进行了油漆彩绘，个别墙体裂缝处，进行了拆修加固。

12、南、北看楼：是会馆第二进院落中的重要建筑。顶部维修与其他建筑相同，前面的玻璃门窗全部更换为落地木格门，并进行了油漆，恢复了原貌。

13、南、北碑亭:更换了部分瓦件,泥背更换为灰渣背。更换了腐朽的博风板、挑角等木构件,并全部进行了油漆彩绘。

14、院内地面原为鹅卵石铺成,利用自然石的色彩,大小形状之不同,组成丰富多彩的图案。因年久失修,大部分脱落。又从外地购进类似的鹅卵石,参照残留的原图案,将 800 多平方米的二进院落的地面铺好,基本恢复了原貌。

15、山门前广场,原为土地面,刮风满天土,下雨满地泥,遇到这种天气,车开不进,人不能走,不仅影响古建筑的风貌和参观旅游的环境,也大大影响了经济效益。为改变这种状况,投资 10 万元,将山门前广场改修为磨光青石地面,彻底改变了门前的环境。

三、维修的组织安排

为了按古建维修原则保质保量的搞好这次维修,聊城地区文化局首先建立了以局长兼任组长的山陕会馆维修领导小组,负责全面维修工作。又建立了以地区文物研究室主任为首的技术监督组,以文化局财务科长为首的财务监督组。每到关键时刻或关键部位,领导小组就及时召开会议,共同商议工作方案,以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技术质量监督组,经常到施工现场,检查维修质量,凡是不符合要求的地方毫不客气,让施工单位立即翻工。如大门内侧立柱上的一块雕花雀替,反复拆卸修改了三次。山门、戏楼等处的彩绘,翻过六次工,直到符合要求为止。因此,确保了维修质量。财务监督组也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把好财务关,保证专款专用,节约开支,少花钱多办事。

在选择施工单位时,也是十分慎重的,经过多方考察,还是确定由有多年古建维修经验,技术力量较强的省文物保护工程公司承担了维修任务。

这次比较全面的维修工程,自 1994 年始,至 1998 年止,历时

五年,耗资近 200 万元,主要建筑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修缮。但终因资金不足,仍有戏楼及三大殿前的石栏杆、北小院的几间配房没有修复,钟鼓二楼的楼梯没有复原。

这次维修使这座以精工细作为特色的古建筑群,又恢复了本来面目,重新以其古朴俊美的姿态,迎接着八方来客。

希望集团慷慨解囊 武训祠堂恢复原貌

陈昆麟 徐燕萍

一、武训祠的现状

武训祠位于冠县柳林镇东北隅,是为了纪念清末乞讨兴学的武训先生而在其墓前修建的祠堂,用以祭祀武训先生。武训先生生于清朝道光十八年(1838年),卒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历经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帝。他一生为了兴办义学,漂泊流浪,到处乞讨,当牛做马,出卖劳力,甚至用自作自贱的办法,让人打一拳踢一脚,只要给钱就行。他通过各种办法,拼命赚钱,终于办起了三处义学。冠县柳林这处义学,是其中最主要的一处。为了纪念武训这种重视平民教育而兴办义学的精神,从三十年代起,各界名人纷纷解囊,政府也参与其事,终于在三十年代末在其墓前建起了武训祠堂。祠堂东西长14.5米,南北宽8.64米,为面阔五间,进深二间的前廊单檐歇山顶建筑。当时初建时,正值外患内忧频繁之际,又加资金不足,施工仓促,因此,建造法式很混乱,且顶瓦未及铺盖而草草收工。四十年代末,虽然上了瓦面,但也很不规矩。屋面挂瓦所使用的筒瓦有13、14、15厘米,板瓦有18、20、21厘米等规格,尺寸十分零乱,且垂脊和岔脊脱开50厘米,不合法式做法。近五十年来,风剥雨蚀,瓦件大部分损坏,勾头和滴水也大部分残破,屋面长满一尺多高的杂草。木构件中,四根仔角梁

上部腐朽,雀替全部丢落,望板也大部分朽烂,飞椽和檐椽部分腐朽,已成濒临坍塌之势。柱顶石用混凝土做成,高低不一,又由于年代的变迁,武训祠前的甬道路面加高,致使祠堂室内地面相对低矮,从远处看,祠堂如建在凹地内,整个外观显得局促、别扭。在武训祠的前面,有一月台,在月台东、西两侧,各竖立三块石碑;月台正中,放有近年新雕刻的武训青石雕像一尊。月台和平台周围,是用砖和铁栏杆围起的围墙。这些虽然是八十年代为保护武训祠而新做,但其风格和用料,都和时代不相吻合,有必要拆除重建。

时代跨入九十年代之后,当教育成为全党、全民共同重视的事业之后,这位曾为平民教育的振兴而忍辱负重、行乞办学的义丐,也重新成为各界人士所关注的热点。纪念堂虽因种种原因没有维修,但在其纪念堂的西南部位,新建起“高歌台”,东南部位新建起了“武训魂”。甬路两侧新刻立了二十多块当代名家如于右任、冯玉祥、张学良、郭沫若等的石碑。这些都大大增加了这所纪念建筑的观赏内容。

1996年秋,当第二届全国性的武训精神学术研讨讨论会开过之后,武训纪念祠很快被定为待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时,也正式开始酝酿武训纪念祠的维修工作。

1997年初,当四川希望集团刘总经理到冠县洽谈饲料工厂投资项目时,有人向他提及关于维修武训大殿的问题。刘总经理欣然应允,答应投资40万元,用于武训祠的维修。

二、武训祠的维修

冠县工商联具体负责这次武训祠的维修工作。维修方案由山东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勘察设计,施工由山东省文物工程公司承担。这次维修有两项不影响文物原貌的大变动,一是武训祠的地基(包括平台、月台)抬高1.45米;二是武训祠全部落架维修。这

就大大增加了工作量。

(一)月台和平台:在月台和平台的四周设计青石制作的须弥座,须弥座上安装石望柱及罗汉式石栏板,在台阶垂带石上设计望柱、栏板及抱鼓石,与须弥座上的望板、栏板连成一个整体。须弥座以内填土夯实,平面漫铺青方砖。新修成的月台地面比自然地面高 110 厘米,平台地面又比月台地面高出 45 厘米,武训祠的台面比平台地面高 20 厘米,这样,武训祠室内地面比南面柏油路面总高出 145 厘米,比自然地面高出 175 厘米。

(二)加固基础:武训祠的原基础十分简单,地槽深度只有 40 厘米,而且用砖和灰泥砌筑,很容易出现不均匀下沉。在整个月台、平台的地基抬高之后,武训祠基础也必须重新考虑。基础采用毛石,用水泥混合砂浆砌筑,其上再浇捣钢筋混凝土圈梁,使整个基础混然一体,坚固耐久。圈梁之上安装了 24 块加高 10 厘米的青石鼓形柱顶石,替代了原水泥柱顶石,大大加强了柱础的坚固性能。

(三)更换加固木构件:拆下的木柱有四根柱子的柱根处腐朽,则采取墩接办法,把腐朽部分锯掉,然后用好的红松木材,按原柱直径取料,上下都做成刀把式,将两截墩接成一根柱子,用大铁钉固定后,接头处再用宽 40 毫米、厚 2 毫米的扁铁加固。另有三根柱子、四根角梁,表面腐朽较重,则采取剔补的办法,把腐朽部位剔除掉,再用红松木按原样补上,再用铁钉固定。

房顶 142 平方米的望板、136 根木椽、各 57 米的连檐、闸档板、瓦口、10 块不知下落的雀替,都重新制作、更换,以确保维修质量。

(四)更换屋面材料,纠正不合理的作法:原有的瓦件,尺寸不一,规格多样,这次全部改用了统一尺寸的瓦件。原来垂脊和岔脊不合法式的做法,也进行了更改。原来的泥背更换为灰背,以前破损或丢失的正吻、正脊垂兽、支兽、套兽等全部更换补齐。

(五)更换门窗:解放后,祠堂曾改作学校的教室用,把原来的隔扇门和窗都改为现代的玻璃门窗,以适应教室的采光和通风。这次维修按原格式进行了复原。即明间前后檐和次间为四扇隔扇门,稍间为四扇隔扇窗,均用红松木做成方格花棂式门和窗。

(六)油漆:所有木构件都按传统工艺进行油漆,以增加木构件的耐腐蚀性。

这次维修,自1997年7月始,至1997年10月止,为期四个月,耗资43万元,按设计要求,圆满的完成了维修任务。维修后的武训祠,由南往北逐层升高,层次分明,主体突出,并大大增加了武训祠的庄严气势,立体效果很好。

这位行乞办学的平民教育家,如九泉之下有知,也应为之兴奋不已了。

原载《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纪实》,山东省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泰山出版社出版

坚持依法办事， 四千年前古城得以保护

陈昆麟 徐燕萍

一处古城遗址就是一座极为丰富的地下博物馆，是一部无字、但却最详实、最直观、最准确的地下文献宝库。它对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起源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因为它们都是长年埋于地下，地下往往没有能引起人们重视的标示物。有的虽然有些陶片、石器残件等，一般人也不知其历史价值，当作普通瓦片、石块看待。又因文物保护工作专业性强，一般行政领导对文物法规和保护文物的意义以及文物的范围又知之甚少，因此，这给大遗址的保护带来许多困难。但我市文物保护管理工作者们，通过广泛宣传，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文物保护法规，克服重重困难，在保护大遗址这类重要文物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取得了丰富成果，得到省和国家文物部门的多次表扬。

一、大遗址比果园、变电所重要

105国道由北京向南延伸。当国道进入山东省茌平县境内时，与遗址的保护发生了矛盾。这时，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高速发展的茌平县城，正逐步向外扩展。茌平县委、县政府从长远的利益着眼，准备让原来穿城而过的105国道改线到县城西部约两公里处，成为一条新辟的西外环路。如果单从城市发展规划、疏散市内交通等方面来考虑，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就在于，改线的105国道正好从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尚庄遗址通

过。这样,国道的修建与大遗址的保护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聊城市文物管理部门得知信息后,立即冒雪赶赴现场,不顾道路泥泞难行,在尚庄遗址上一根路桩、一根路桩的仔细察看。滑倒了,爬起来,继续察看,直到把路面占压遗址的面积全部搞清为止。然后,他们又对遗址东西两侧的地理环境进行调查,为公路的下步改线摸清情况。

茌平尚庄遗址,是一处上自大汶口文化时期开始,下至汉代的大型固堆遗址。占地面积近十万平方米,文化内涵极为丰富。1976年曾在该遗址西部边沿地区进行过试掘。出土了大量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的遗物。它对于弥补鲁西北地区古文化遗址的空白,研究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冀鲁豫交汇处的部落群体的分布、迁徙及交流,都有着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文物工作者们都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性。该遗址一定要保护好,不能遭到破坏。这时,在他们的心里已初步考虑成熟了有进有退的两个方案:一是坚决保住遗址,让国道让路;二是,国道实在要占用遗址,退一步就是要争取经费,争取时间,对占压部分进行科学发掘,取出完整的科学的资料。

茌平县委、县政府的领导班子,是刚刚换届不久的新班子。他们为了茌平县经济的腾飞、县城的发展正满腔热血、百倍努力的工作着。过去对文物这一专业性很强的领域接触甚少,甚至根本没有接触过,对这一工作的特殊性、重要性,一时还认识不到。这固然增加了工作的难度,但也是专业人员应当理解的。只有这样考虑问题,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在为保护这处遗址召开的座谈会上,县政府分管领导提出的路线不能改动的三条理由也不是没有道理的:(1)105国道的路线定位,是由县委、县政府根据整个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区交通安全的需要而定的,不是一人意见,是一级政府的决定,不能随便改动;

(2)国道如果东移,不但离城区太近,而且恰好冲着变电所。变电所的迁移非同小可,不仅要经过上级电业部门的同意,就是迁的话,从设计到建成要几个月的时间,整个茌平县城的工业要停产、照明要停止,其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因此不能往东迁;(3)如果西迁,要拆尚庄村数十户民房,毁掉一个正在结果的苹果园,经济损失也很大。而现在国道所走的路线,是在空旷地带,经济损失最小。

文物管理工作者们为了使谈判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并能使对方逐步认识该遗址的重要性,进而达到改变线路保护遗址的目的,首先检查了本职工作做的不够,《文物保护法》的宣传工作不够深入、不够广泛,没能使县里领导在基本建设项目决策时,把文物保护也做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进去。接着对茌平县委、县政府在选择路线方面的考虑给予肯定,同时也指出了美中不中——国道冲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尚庄古文化遗址。接着他们把这一遗址的重要性、在全省考古学方面所占的重要地位向县里领导作了充分介绍(略)。特别是在谈道该遗址通过试掘,资料在《文物》上发表后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大大提高了茌平县的知名度时,引起了县里部分领导的共鸣。接着他们又将遗址的价值与变电所和民房、果园的价值作了比较,说明遗址的价值远远高于后两者的价值。但因县里的领导对文物工作比较生疏,又牵扯到拆房、刨树的经费,县里一时难以同意改线。

根据白天谈判的情况,他们觉得应该到个别一些县领导处讲讲保护该遗址的意义,取得他们的支持。于是,他们不顾白天一天的疲劳,为了保护大遗址,晚上又去登门拜访县里的领导。他们第一个找的是县政协副主席李盛奎。因为李是六十年代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原来做过文物管理工作,茌平县的绝大部分古遗址都是他当图书馆长时发现的。他还亲自参加了尚庄遗址的试掘,他在

在平也德高望重,说话有影响力,且对文物有特殊的感情。这一步棋果然见效,李主席答应全力以赴说服县里改变国道线路。接着他们又赶到县委孙副书记处。孙书记也是山大毕业的,知识层次高,政策水平也高。听过关于尚庄遗址的介绍后说:“来到在平听说过这个古遗址,也知道它的价值,但不知道 105 国道定线时是否对遗址有妨碍,现在知道了,我尽力做工作。”从孙书记处出来时,已是夜里十一时多。

他们一方面做工作,一方面及时的向省文物局作了汇报。

省文物局领导接报告后立即派王永波副处长赶往在平。王处长冒着严寒,不顾道路泥泞到现场进行考察,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他诚恳地向县里领导人说明:“《文物法》是国家制定的大法,县政府的决定如果与国家大法抵触,不是让大法来适应某一地方政府的决定,而是地方政府的决定应根据大法来修定。作为一级政府,更应该成为遵守和执行国家大法的模范。关于改线所需的一切经费,根据文物法的规定应该由县里支付。”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根据预先安排,陈昆麟研究员接着发言,他说:“如果县里坚持 105 国道既定线路,文物部门也可做出让步,但必须对公路占压地段进行科学发掘。这样,根据所占遗址面积计算,县里最少要支付一百万元的发掘经费,时间也要二至三年。大家可以从时间、经费两方面算一算,是拆几间民房、刨几棵果树可行还是县里出百万元经费,等二至三年发掘完后再修路可行。”可能是因为李主席、孙书记已做了工作,所以省文物局王处长和陈昆麟研究员语意深长的说服工作,收到了满意的效果。县分管交通的领导表示同意改线。105 国道西移 100 米,尚庄遗址保住了!

二、105 国道在此绕了个弯

105 国道过了在平,进入东阿县境内。在这里也遇到同样的

问题。东阿县委、县政府决定,将原来穿过县中部的 105 国道,改往县城东部,新辟一条城市街道。新辟的线路在城北约两公里处,恰好又冲着一座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已探明城为西南、东北走向的圆角长方形,面积约 4 万多平方米(该资料已在 1995 年 9 月 28 文物报上发表)。其价值远在单纯的遗址之上,该遗址必须要保护住。

但是,在 105 国道定线时,没有我们文物部门的人员参加,直到动工的头一天中午,才知道消息,情况十万火急,如果今天不把改线的问题定下来,成千上万的民工一出动,这座四千多年前的古城就要彻底毁坏。于是市文物管理工作者们立即赶到东阿。

下午三时,他们首先向分管的副县长讲明了该遗址的重要性和保护该遗址的重要意义,希望县里能够从国家利益着想,改变一下国道线路。分管县长也讲出了他们不能改线的理由:(1)线路是县委、县政府两大班子决定的,地区公路设计院设计,省公路局批准的,我个人无权改动;(2)已向各乡镇下了通知,今天下午民工已经到岗,明天一早就要动工,来不及改线了。听到这里,文物工作者恳求县长能缓期两天开工,如果这两天做不通各方面的工作、改不了线,你可照样施工。分管的县长也十分为难地说明此线路是地区公路设计院设计,县里确实无权改动,因此无法缓期施工。市文物管理工作者们经过认真分析,认为要改线,关键在地区公路设计院,明天又是星期天,看来说服地区公路设计院改线的工作,必须在今晚完成。否则,明天改线,将是一句空话,因此,他们谢绝了东阿县同行们的真诚挽留,有的不顾胃部病痛难忍,毅然赶回聊城,饭没顾上吃,先赶到公路设计院杜文亭院长家。杜院长和文物部门交往甚多,保护文物意识很强,当他听说 105 国道穿过一龙山文化古城址需要改线时,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是时间紧,二是明天是星期天,三是报省厅来不及。好处是,他的政策水平

高,法制观念强,他认为遗址应该保,线路应该改,只是困难太大了。杜院长经过再三考虑,说,我们马上找地区公路局郭秀华局长,只要他能拍板,事情就好办了。等我们到了公路局郭局长家时,已是夜里十点多了。多年来,在郭局长协调下,公路工程和文物保护方面,一直协调的很好。当我们向他讲明来意后,郭局长也感到为难了。时间,只有十个小时,那边,民工已经到了工地,下达改线的决定容易,要改线就得重新测量、重新计算、重新划线,这些工作不尽快做完,就会使大批民工窝工,造成极大浪费。要改线,至少需要四个测绘员同时工作,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重新测绘、重新定线的任务。文物工作者们恐怕郭局长摆完了困难,而不同意改线。于是一再重复,公路局多年来对文物保护的支持,希望这次郭局长再克服困难,给予支持。郭局长说明强调困难不是不办,而是考虑如何做才能达到既保护文物,又使工地少窝工的办法。他通过与杜院长商议,决定克服星期天难找人的困难,至少也要集中四名测绘员,明天八点赶到东阿改线。

听了郭局长的果断决定,文物工作者们才如释重负,此时已是深夜十一点,他们才觉得肚子有些饿了。

第二天工作者们一早就赶到东阿县。当他们把地区公路局改线的决定告诉分管副县长时,副县长提出让去找县长,否则,他负不起责任。他们二话没说就赶到金县长办公地点。他们又不厌其烦地将该遗址如何重要、应该如何依法保护文物说了一遍。金县长的政策水平的确高,他说,大遗址就是一本无文字的历史教科书,我们应当保护好,这是你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责任,县里受点损失也要改线。

八点稍过,地区公路设计院杜文亭院长,亲自带着四名测绘员赶到东阿工地。经过测量,新的 105 国道线路在离古城址 50 米的西侧绕弯而过。大遗址终于保护下来了。

三、这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不经勘探,不能挖土

阳谷县景阳冈,因为一部《水浒》名著的广泛流传而闻名遐迩。武松景阳冈打虎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人们并不知道这里还是4500年前我们祖先曾经休养生息的地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景阳冈龙山文化遗址。正因为这里是武松打虎的地方,多少人都想到这里光顾一下英雄打虎的去处。但是,凡是到过景阳冈的人,无不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有的人总结说,不去景阳冈感到遗憾,去了景阳冈感到更遗憾。造成如此结果的原因是,原来的大沙岗,自五八年的平整土地到后来的挖土卖沙,把一个东北西南长约两公里的大沙岗几乎铲成平地,有的地方甚至由景阳冈变成了景阳坑。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给来此参观旅游的人留下个美好的印象,阳谷县的几届政府,都曾设想把景阳冈改造好,因为条件不成熟没能如愿。改革开放十几年来,经济的发展,双休日的实行,特别是京九铁路的修建,给阳谷县旅游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因此,阳谷县委、县人大、县政协等六大班子联席会议决定,重建景阳冈旅游开发区。无疑,这一决定是有远见的。文物部门也应大力配合。但是,县委、县政府却忽略了景阳冈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要占用必须先期进行文物勘探和发掘,并报省文物局批准后方可占用,在进行设计和论证时,都没有让文物部门参加。1994年5月当文物部门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派人到景阳冈旅游中心,提出对景阳冈古遗址进行先期文物勘探的意见,把工作做到前头,以免影响开发工作的施工。同时,也向省文物局做了汇报。但是,征地时,阳谷旅游中心没有告诉市文物部门。当得知消息后,他们马上组织十几个技工,开赴工地,对景阳冈进行全面监控,并广泛宣传,这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受法律保护,不经文物勘探,不准挖土,以防民工突然进入工地施工。同时,向有关部门继续宣

传文物保护法,讲明对该遗址进行文物勘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恰在此时,省文物局、省土管局也作出了没有文物部门的文物勘探报告和同意征地的意见,不能批准征地的决定。

景阳冈的文物勘探工作开始了。经过文物管理部门的认真勘探,在原来的古遗址范围内,发现了一座 35 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这一重大发现,给文物界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波。这是黄河中下游最大的龙山文化古城,有的专家认为是舜的都城,是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乃至城市的起源、国家的起源等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历史价值、科学价值难以估量。无疑是文物战线上的一件大喜事,但对景阳冈旅游开发来说,却是一件头痛的事。开发区原征地 380 亩,龙山文化城占压了近百亩。龙山文化城不仅占压,而且还要在城墙以外划出 40 米的隔离带。这样,原来景阳冈开发区的规划几乎要全部推翻,重新设计,难度大极了。这时,市文物工作者们和 20 多个技工,日夜守护在工地。他们及时向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汇报这一重大发现,请考古专家到现场考察论证,通过省和国家考古专家向县委、政府六大班子领导人宣传景阳冈龙山文化古城在中国考古学上的重大意义,取得他们的理解,然后达成保护龙山城的共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 1994 年 11 月份至 1995 年元月份这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先后请省文物局、省考古所的领导专家到阳谷八次,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专家到阳谷两次。省和国家文物部门专家的意见,起到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国家文物局二处的孟宪珉处长、王军副处长,了解了阳谷景阳冈旅游开发区的实际情况后,提出了“把景阳冈龙山文化古城的保护和开发利用结合起来,配合发掘,建立几个景点,与西边的景阳冈武松打虎旅游开发区相对应,形成两个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景点,这样不但不会影响西边旅游区的开发,而且还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会更进一步提高阳谷县在全国的知名度”。这一对龙山文化

古城保护、利用的指导方针的提出,对解决龙山古城的保护与旅游开发区的矛盾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在省和国家领导及专家的共同努力下,阳谷县六大班子领导很快制定出了新的景阳冈旅游开发区的方案。整个龙山文化古城保护下来了。

现在阳谷县委、县政府又重新制定了关于龙山文化古城保护、开发、利用的规划,要把这里建成一个在冀、鲁、豫交汇处独具特点的龙山古城博物馆。

临清砖与紫禁城

殷黎明 陶 光

大凡到过北京城的人，都要去故宫、天坛、十三陵等地游览。那富丽而又庄严的紫禁宫苑、陵寝，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使人留恋、陶醉、惊叹。可以这样说，这些昔日皇家宫苑，如今既是北京城的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的象征。

可是，你可知道，这些宏伟的皇家宫苑与山东省临清市的联系？

在历史学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北京城是“漂”来的。何以如是说？原来，历史上京城皇族的“衣、食、住、行”大都是通过京杭大运河运至京城的。而“住”的主要部分，即营建北京皇城的重要建筑材料——青砖，则大都来自运河岸边的山东临清。

让我们先来看看史料中的记载：

《天工开物·卷七·砖》：“若皇居所用砖，其大者厂在临清，工部分司主之……运至京师。”

《明会典·卷一百九十》：“临清窑烧造城砖、副砖、券砖、斧刃砖、线砖、平身砖、望板砖、方砖、二尺、尺七、尺二四样，凡八号。”

《明史·食货志·六》：“烧造之事在外临清砖厂……以供营缮。”

《明代临清钩沉》：“自永乐时起，便在临清设立了工部营缮分司，派工部侍郎一员管理烧造，提督收放。”

据以上记载，临清为明、清两代京城建筑用砖的主要烧制基地和供给地。并且当时的中央还在临清设立了专门派出机构——工部

营缮分司来管理烧造事务。

那么,明清时皇宫建筑用砖的烧造,为何要设在远离京师千里之遥的山东临清呢?

明、清时的临清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由于运河漕运的兴盛,临清经济异常繁荣,有“富庶甲齐郡”、“上有苏杭、下有临张”之誉。当时临清“地居神京之臂,势扼九省之喉,连城则百货萃止,两河而万艘安流”。因而,运河航运之便,这是临清烧窑业兴盛的原因之一。

其二是由于临清一带土质好,利于烧制。历史上,黄河屡次决口改道,在临清境内与运河交汇,经多年反复淤积,从而形成了优质土资源,即俗称的“莲花土”。此种莲花土红、白、黄相间,土质细密、均匀,粘中带沙,烧出的砖质量好,强度高,因而为皇宫所选用。

根据志书记载:明永乐间,成祖朱棣为了迁都,用了15年时间在北京大兴土木,营建皇家宫苑城池,临清的官窑业即创设于此时。

据史料记载与实地考察,明清两代临清共有官窑192座,每座为2个窑,共384个窑。这些窑为取水用土方便,均分布于运河沿岸。自临清西南部约30里的东、西吊马桥至东、西白塔窑,再延展至临清东南部的河隈张庄,总计长约70华里。其中有些地段砖窑分布特别稠密,每隔几十步便有一座旧窑址。

根据窑户后代回忆:当时烧窑全用柴草,如豆秸、麦秸、棉柴等。一窑砖要烧半个月,沤半个月,需一个月才能出窑。烧制好的皇砖,每块规定重达20公斤左右,出窑后需逐块检验。凡敲之发金属之声,形状规正者方为合格,其余稍有残缺、哑声及颜色发红者,便被淘汰。那豆青色的上等好砖,须以黄裱纸封好,送至运河码头上,由北上的船只运往京城。依照规定,每只漕运官船搭运40块,民船搭运20块,且途中不能有丝毫损坏。据乾隆50年《临

清直隶州志》记载：当时朝廷由临清“岁征城砖百万”。可以想象，漫长的岁月里，该有多少临清砖，顺着古老的运河，“漂”向了北京城啊！

如今，临清运河沿岸的许多村庄仍以窑为名，如张窑、唐窑、白塔窑等，这些村庄的农民大都为窑户后代，他们通过自己的祖、父辈之口，对自己先祖所从事的烧窑业，仍留有清晰的记忆。这些村庄的民居也特别，许多房基和墙基中，都彻有数量不等的明、清烧制的青砖，当然，这些砖均为检验后不合格的次品。在这些砖上，均打着烧制年代及窑户、匠人的名字。如“嘉靖十五年窑户罗凤，匠人郑存仁”、“康熙十五年临清窑户畅道、作头郭守贵造”等。其中的窑户即官窑的管理者；匠人、作头则为直接从事烧窑的技术工人。据记载，每座官窑除窑户外，作头、匠人及一般工人数量约在50人左右，如此推算，在明、清500余年的漫长岁月中，每年约有万余人在运河岸边劳作。可这样说：建造皇家宫苑的块块青砖中，都凝聚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血汗。

500年悠悠岁月，紫禁皇宫的灯火明明灭灭；运河岸边的临清皇窑红红火火。如今，昔日繁盛的临清皇窑已成陈迹，但是，曾盛极一时的临清皇砖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与精神，与紫禁城一道，永远地铭刻进了历史中。

原载《山东画报》1993年第11期

高唐建置考

陈昆麟

高唐,自春秋时期有记载以来,已有 2500 多年的历史。沧海桑田,河动山移,高唐城也因自然和人为之原因,几经迁徙。关于高唐城的位置和变迁,历来众说纷纭。或因掌握材料不足,人云亦云;或因考证方法不妥,将错就错,故谬误百出,莫衷一是。因篇幅有限,不便一一列举,仅就几种对世人影响最深的错误归纳如下:

一、高唐故城一直在今禹城县西南伦镇说。众多地方志书,包括现在新编地方志乃至民间传说,都认为高唐城在迁移今址之前,一直在今禹城县伦镇。

二、北魏景明三年(502 年)治所即今山东高唐县说。

三、元代至元七年(1347 年),因大雨成灾,由禹城县伦镇迁今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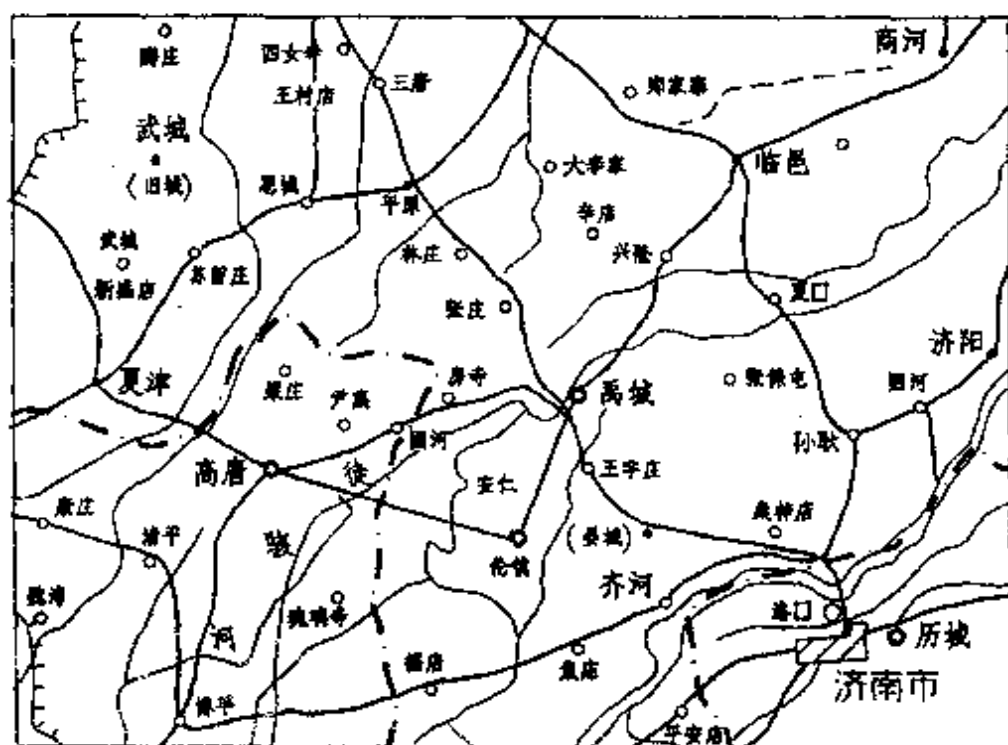
本文不想采取对上述错误逐条辩证的方法。只想以最新的考古资料,借助他人最新研究成果,参照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将新的结论展示与人们,过去的错误说法,也就自然消除了。

一、涸河——春秋至两晋之高唐故城

(一)春秋时期,高唐城在今涸河

“高唐”,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是公元前 554 年。《春秋左传·襄公十九年》载:“以夙沙卫易己,卫奔高唐以叛。”^①还有一条史料与此相对应。《史记·齐太公世家》载:“(齐)灵公二十八年,八月……

晋闻齐乱，伐齐，至高唐。”^②鲁襄公十九年与齐灵公二十八年，都是公元前 554 年。这正是齐国的多事之秋。齐灵公这年五月病逝，齐庄公即位。“一朝天子一朝臣”历来如此，刚即位的庄公当然也不会放过先前的政敌。于是，杀戎姬，执太子牙，杀高厚，齐国内部出现了混乱局面。因此，不仅本国的卫乘机叛逃高唐，而且晋国也趁机伐齐之高唐。故人如何征战，我们姑且不管，但这两条史料足以证明，春秋时期，高唐城不仅存在，而且是齐国西部重镇，兵家必争之地，那么此时的高唐在何处呢？我认为城的位置就在高唐县东之洧河，论据有五。



图一 现在高唐县城位置图

1、《左传》在“夙沙卫易己，卫奔高唐以叛”条下的注释云：“据《清一统志》高唐城在今禹城县西南，即在今高唐县东三十五里。”^③洧河正好是处在今禹城西南，今高唐东三十五里处；在 1:200000 的现在地图上，禹城、伦镇、高唐之间形成一个三角形。如果以伦镇为三角形顶端，向现在的禹城、高唐各引一条线，将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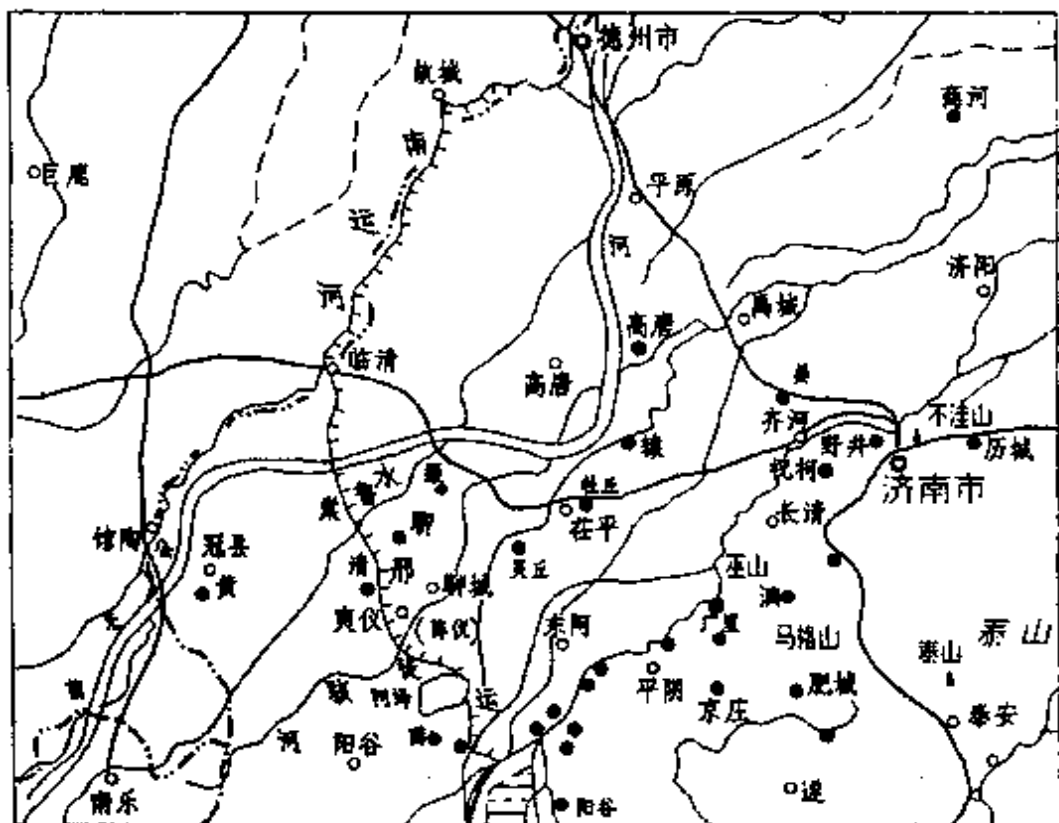
成一个 100° 的夹角。而测得高唐与伦镇之间的距离是 54 华里。高唐与濶河的距离是 34 华里。伦镇在高唐的东南,而濶河却在今高唐的以东偏北,几乎在高唐、禹城一线的中间部位。史书载:“高唐城在今禹城县西南即在今高唐县东三十五里。”不管是方向还是距离,濶河与史书的记载相符,而伦镇差之甚远。

2、《史记·齐太公世家》在“晋闻齐乱伐齐,至高唐”条下,杜预注曰:“高唐本祝阿县西北。”^④杜预为西晋学者。曾撰《春秋左氏传集解》、《春秋释例》、《春秋长历》等书。他对《春秋左传》颇有研究,他的注释也是比较准确可信的。他为什么要以“祝阿”为基点来标明高唐的位置呢?因为春秋时期,地广人稀,城邑甚少。在现在的高唐、禹城、齐河甚至济南西部之大片的土地上,能见于文献记载的,只有祝阿、晏、轵、黎、高唐等几处城邑。而祝阿是周武王封黄帝之后的祝国、位要名显,故以祝阿为基点,标出了高唐的方位。不仅如此,他还以祝阿为基点,标出了轵、野井的位置。《后汉书》载:左传哀公十年取黎及轵。杜预曰,县西有轵城故县,有野井亭(左传昭二十五年齐侯唁公于野井),杜预曰:“在县东。”^⑤杜预注明的位置,与历史地图上标明的位置相符。这说明,杜预是对春秋时期的文献记载进行过充分研究和考证后得出的结论,是比较可信的。

3、对于考证历史地名价值最大的最新成果,当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等单位协作合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许多研究历史地理的专家和著作都推崇这书是“体制庞大,内容丰富,考证精细的历代政区地图集,也是我们今天查考古代地名的最为有用的工具书。”^⑥在这套地图集的春秋时期的地图上所标明的方位,与杜预的注释是完全吻合的。(图二)而此时高唐邑的位置,恰好是在今濶河的位置上。

4、在《中国历史地图册》中春秋时期齐鲁部分的地图上,测得

春秋时期的高唐邑,在西距 116°经线 38.5 公里、北距 37°纬线 13 公里处的坐标点上。从山东省地图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的 1:750000 的《山东省地图》上测得,濰河在西距 116°经线 36.75 公里,北距 37°纬线 12 公里的坐标点上。春秋时期的高唐和现在在濰河的坐标几乎是一个。



图二 春秋时期高唐县城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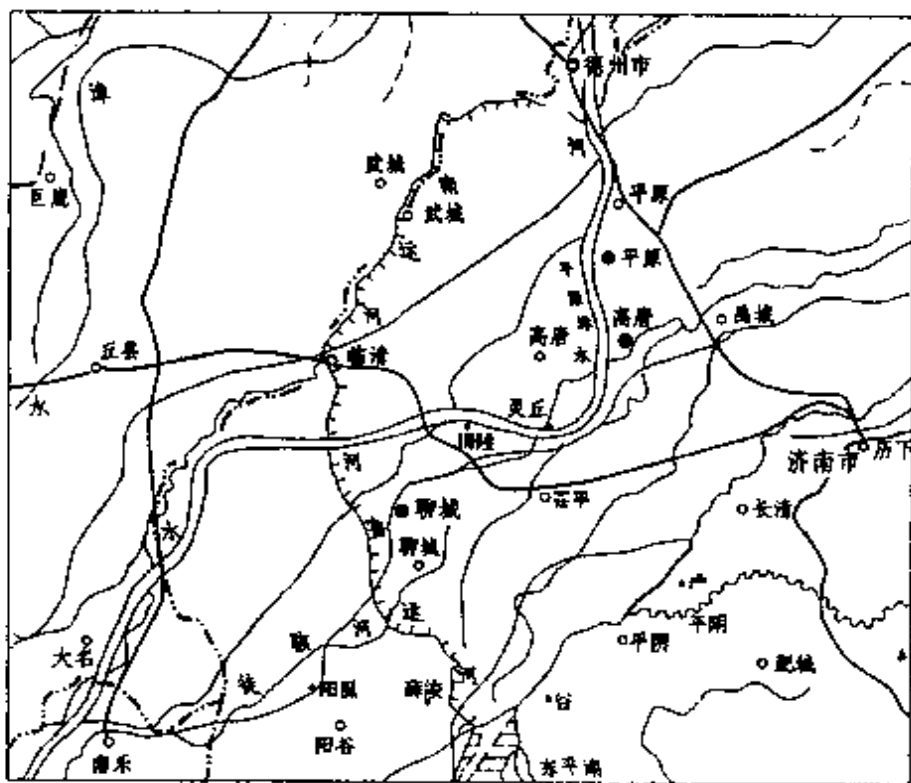
5、从黄河的位置来看,这时的黄河自今濮阳北上,在今冠县以北北馆陶附近折而向东,大约在今高唐县南镇以东又北上。经故高唐西侧,今德州东侧,经沧州市然后向东北方向流入渤海。这时黄河叫河水,也正是齐国和晋国的分界线。河水以西归晋,河水以东属齐,因此,当时的高唐成为齐国西部边陲重镇,也是齐国西部的门户。晋国伐齐,高唐首当其冲是很自然的了。

从以上五点来看,春秋时期高唐城应在今高唐县城东三十五里的濰河,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而且这几条理由同样可以作为战

国、汉、晋时期高唐在涸河的质证。

(二)战国时期,高唐城仍在涸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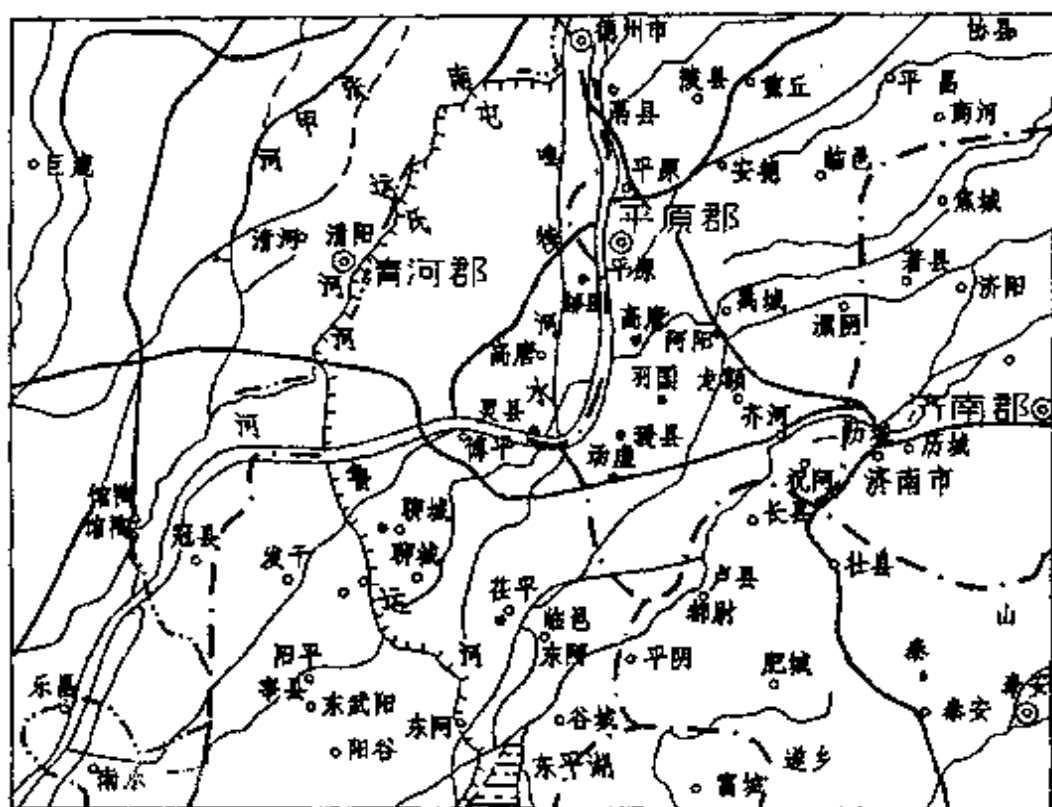
1、《史记》中曾有多处关于高唐的记载。如“赵肃侯”六年(公元前344年),攻齐,拔高唐”、“赵惠文王二十五年(前274年)燕周将,攻昌城、高唐、取之。”^①特别是齐威王的一段话,对于分析当时高唐城的位置,很有价值。齐威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33年),与魏王会田于郊,威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②这段话:一是说,齐、赵以河水为界,二是说明当时的高唐城在河的东岸,离河很近。三是说明高唐当时是齐国防御赵国入侵的重要门户。我们再结合《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时期齐、鲁、宋行政区划图(图三)分析,高唐故城应仍是涸河。



图三 战国时期高唐县城位置图

2、从民间传说看,涸河附近有盼子墓,而且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涸河村南的大土堆为盼子墓。经考证,该墓虽为汉代墓葬,但并

没否认洹河周围有盼子墓,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准确位置而已、而在伦镇附近却没有此种传说。



图四 西汉时期高唐县城位置图

(三)西汉时期,高唐属平原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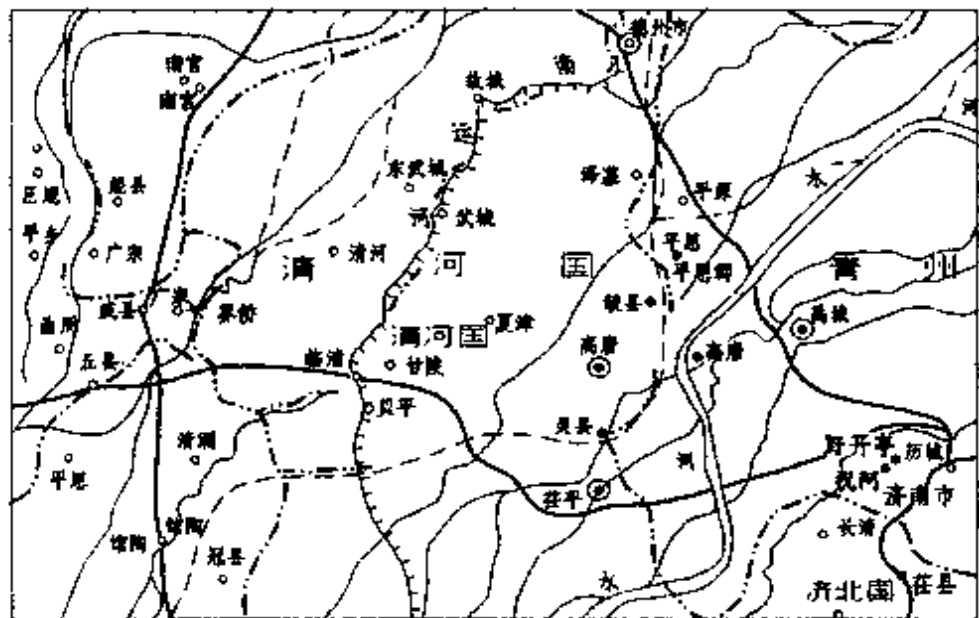
《汉书·地理志》载:“平原郡,高帝置……户十五万四千三百八十七,口六十六万四千五百四十三,县十九,平原、高唐(桑钦言,漯水所出)。”^⑩桑钦,西汉学者,主要著作有《水经》,他所言漯水,自战国时期开始出现,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漯水自出现到桑钦注释时止,高唐境内确实有漯水流过。北魏末期著名地理学家酈道元的《水经注》,更明确地指出:“漯水又径高唐县故城东。昔齐威王使盼子守高唐,赵人不敢渔于河,即鲁仲连子渭田巴曰:今楚军南阳,赵伐高唐者也。《春秋左传》兗公十年,赵鞅率师伐齐,取黎及轅,毁高唐之郭。”^⑪这里关于“漯水又径高唐县故城东”的记载,

十分明确的标出了高唐与漯水的对应位置。濶河的位置是在漯水的西北部,而伦镇的位置,当时却在漯水之东南。也就是说漯水是从伦镇的西北部流过。其位置与《水经注》中的记载不符。又载:“大河又东北,径高唐县故城西。《春秋左传》襄公十九年,齐灵公废太子光而立公子牙,以风沙卫为少傅,齐侯卒,崔杼逆光,光立杀公子牙於句渚之丘,卫奔高唐以叛。”^⑩在这段关于黄河流向的记载里,明确指出在高唐县故城西流过。这与当时濶河的位置也相符。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这两段记载都用“高唐县故城”的字眼。一个“故”字说明这里原来是高唐县城,现在已经不是了。酈道元生活的年代是 472—527 年之间。高唐县城已经东迁至梁邹。这里必然称“故”了。这也进一步说明,502 年复高唐县时的县治——伦镇,离漯水、黄河都稍远,故而没有提及新的高唐县城。这说明,西汉时高唐已是县级建置。且是在西汉初期汉高祖时建立的,依据元始二年(公元 2 年)西汉政区设置绘制的西汉豫、兖、徐州刺史部的历史地图(图 4)来看,图中标出的高唐南部的主要城邑及侯国有羽国、瑗县、龙颜、灵县及东部的阿阳,濶河仍与地图上的高唐相吻合,而伦镇却与此时的羽国位置相近。

(四) 东汉时期,仍属平原郡

《后汉书·地理志》载:“平原郡高帝置……九城,户十五万五千五百八十八,口百万二千六百五十八。平原、高唐、般、鬲……”^⑪这说明东汉时高唐仍为县级建置。结合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 140 年)政区设置绘的豫、兖、徐、青刺史部的历史地图来看,这时黄河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动,河床南移(图五)。原来是由濮阳北上,现在则向东稍偏北方向流去。大约东流 70 余里又折而北上,靠今阳谷县城西侧继续北流,大约在阳谷北 30 里处又折而向东北方向流去,入今茌平境内后大约在今杜郎口附近又折而北上(实际稍偏西北),从高唐城西侧而过,继而向东北方向流去,在今利津县附近

入渤海。而高唐正处在黄河的拐弯处。西面、北面被河水包围。地图上高唐城的位置,与今涸河的位置相符。另一方面,在涸河周围保存有许多东汉时期的大墓葬。过去曾有七十二冢的传说。通过文物普查,已发现了如大冢、小冢、双冢、王子坟等十几座汉墓。特别是1958年在涸河村西北挖水库时发现的大汉墓,出土了釉陶楼、釉陶井、绿釉陶厨俑等珍贵文物。陶楼高1米多,乃是稀世珍品,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曾多次出国展览。同时还出土一批汉画像石。这众多文物遗迹和遗存,说明涸河在东汉时必定是个繁华重镇,东汉时期高唐县城在此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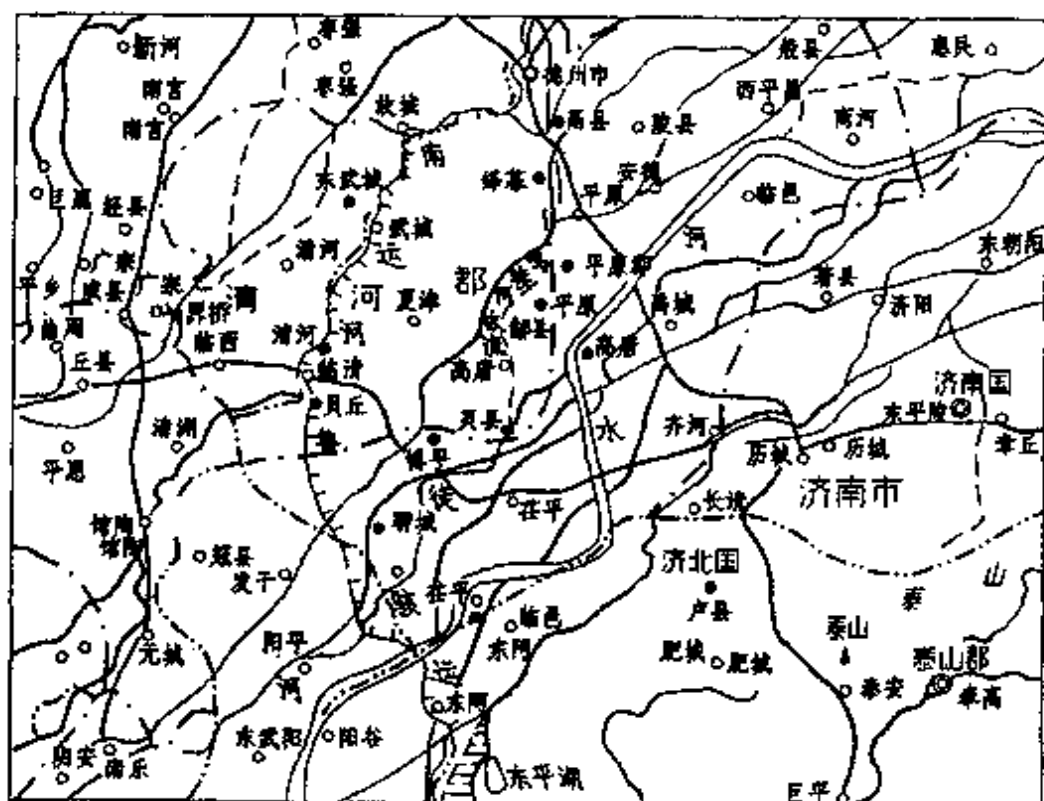


图五 东汉时期高唐县城位置图

(五)三国曹魏时期,高唐县属冀州平原郡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③《三国志·蜀书》又载:“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清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后为高唐尉,迁为令。”^④这都说明,高唐当时是县治所在。根据以曹魏景元三年的政区设置所绘三国魏冀、并二州的历史地图(图六)分析,其位置也是在今涸河附近。

另外,在涸河北约 5 里路的大华庄,有华歆墓。华歆,高唐人。《三国志·华歆传》载华歆字子鱼,平原高唐人也。高唐为齐名都,衣冠无不游行市里。”^④华歆,高唐人,死后葬于高唐附近,顺理成章。现在所指的华歆墓,是否是真,虽需进一步考证,但这传说出现在涸河而出现在伦镇,就可以做为三国魏时期高唐城仍在涸河的佐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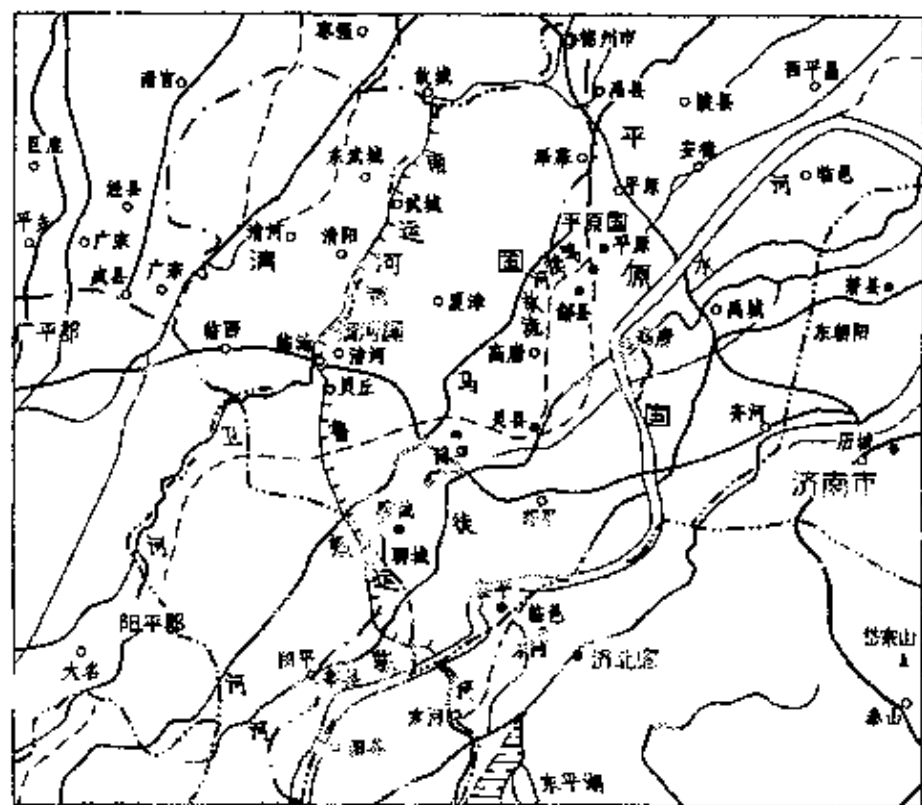
图六 三国曹魏时期高唐县城位置图

(六)西晋时期,属冀州平原国

《晋书·地理志》载：“平原国，汉置。统县九，户三万一千平原、高唐、茌平、博平、聊城……”^⑥《晋书·华表传》又载：“华表字伟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为魏太尉。”^⑦这些史料说明西晋时期的高唐城与三国时期的高唐城地理位置相同。因为三国时期的华歆和西晋时期的华表，原籍都是高唐。依据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的政区设置绘制的西晋冀州、并州历史地图（图七）分

析,高唐城仍在今涸河附近。

通过上述考证分析,不难看出,现在的涸河附近,应是春秋至西晋时期的高唐故城,而不是禹城的伦镇。



图七 西晋时期高唐县城位置图

二、关于高唐县侨置问题

郡县的侨置,也是由众多历史原因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区域划分制度。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政局多变。有些统治者,以某种政治目的出发,实际上已经失去的地盘,再在自己现在占有的地盘上重建起来,亦冠以原来的州、郡、县名称。《宋书》载:“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都鉴又徙流民之至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⑩这里已十

分明确的告诉我们侨置郡县的情况。这些侨置郡县,开始有的只有虚名,而没有实土。“晋乱,琅琊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太兴三年立怀德县丹阳。虽有琅琊相,而无此地。”^①这是侨置郡县只有虚名而无实土的原始记载。显然,长期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没有实土,便没有生存的依据、生活的来源,常此下去,是很危险的,统治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割给侨置郡县实土。“成帝咸康元年(335年)……割丹阳之江乘县立郡,又分江乘地立临沂县……”^②侨置制度开始后,高唐县也被侨置在江南。“中原乱,北州流民多南度,晋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时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文帝元嘉八年始割江淮间为境,治广陵……十九年(442年)省东燕县属南濮阳。……南平原郡领平原、高唐、茌平凡三县……”^③元嘉为南朝宋文帝年号,江北实无他们的立锥之地。立南兖州、南平原郡纯属政治上的需要。此时,也正是高唐县侨置的开端。

过去,许多方志误以为高唐的侨置地点只有章丘黄巾堙一处,实则不然。高唐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年)曾侨置江南,侨置梁邹。“东平原郡,刘裕置,魏因之,治梁邹(今邹平县),领县六,平原……高唐”。^④(图八)这段记载明确告诉我们,刘裕政权侨置东平原郡时,首先是在梁邹。刘裕是南朝宋的第一个皇帝,在位只有三年多的时间,自永初元年(420)年始,至永初三年(422年)止,也就是说,高唐县城是在420-422年之间侨置梁邹的。那么,高唐县在这里侨置了多长时间,《元和郡县图志·章邱县》载:“本汉阳丘县也,属济南郡。高齐文宣天宝七年自高唐故城移高唐县理于此。开皇十八年以博州亦有高唐县,改为章邱县。”^⑤《山东通志》载:“(高唐)……南宋侨置高唐县于邹平;属平原郡。北魏属南清河郡(北齐废郡,移高唐于朝阳属清河郡,在今章丘县境内)隋属清河郡(开皇十六年改高唐曰章丘,复置高唐于禹息城西古高唐县地,即今治)。”^⑥《元和郡·县图治》中明确指出,天宝七年,高唐县自

梁邹迁徙到章丘隋开皇十八年(《隋书》为开皇十六年,应以隋书为准)。因博州亦有高唐县,遂将此处高唐县改为章丘县。自北齐天宝七年(556年)始,至隋开皇十六年(596年)止,前后共40年。

通过以上史料分析,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高唐县侨置外地有三处遗址:一处是南朝宋刘裕政权于公元420-422年间侨置邹平县梁邹之高唐,二是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九年于江淮间之广陵附近侨置的高唐县,属南平原郡。三是北齐天保七年,由梁邹迁徙到章丘黄巾堙之高唐县。

第二,《元和郡县图志·章丘》中记载的北齐天保七年高唐县迁址问题,是指由邹平梁邹迁徙到章丘之黄巾堙,而不是由伦镇迁徙到今址。

第三,《山东通志》中关于高唐县城的记载有误:一是“(高唐)北魏属南清河郡(北齐废郡,移高唐于朝阳,属清河郡,在今章丘县境内)”之记载有误。因为“南清河郡”在济南以西,章丘在济南以东。北齐废南清河郡与北齐迁徙高唐城无有相联带关系,二者不宜相提并论。二是“隋开皇十六年改高唐曰章丘,复给高唐于禹息城西古高唐县地,即今治”。之记载有误。因《元和郡县图志·章丘》条中已经指出,隋开皇十八年(实为十六年),以博州亦有高唐县,改此为章丘县,“博州的高唐县即今之高唐县,于《山东通志》中所说的禹息城西的位置相邻,不可能在相邻之地设两个高唐县,且禹息城西之地并非现在的高唐县,《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北宋前期(约1000年前后),其记载可信程度较大。因此,《山东通志》中的记载明显是错误的。

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明确看出,高唐县首先侨置江淮间,但因区域复动频繁,史书记载不详,难以确定准确时间。在邹平梁邹侨置时间是公元420-556年,在章丘黄巾堙侨置时间是公元556-596年。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唐县城侨置外地期间,曾有几个高唐县并存的时期。西晋永嘉之乱后至南北朝时期结束,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战争频繁,区域变化与郡县设置无常。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侨置郡县,而且还出现了一个郡县几处并存的怪现象。高唐县就是如此。上文我们已经知道,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年),高唐被侨置江淮间;南朝宋时将高唐侨置在邹平之梁邹。魏景明三年(502年)又复立高唐于禹城县之伦镇。北齐天保七年又将江北之高唐由梁邹迁到黄巾堀。这一系列的历史记载告诉我们,公元502年之前至南朝刘裕侨置高唐梁邹止(420年),是江淮间之高唐与山东梁邹之高唐并存。502年至天保七年(556年),是黄巾堀之高唐与伦镇之高唐并存。我们又知道隋开皇十六年,将黄巾堀之高唐改为章丘县。而现在的高唐县治自公元564年之前就存在,也就是说自564年左右至612年,是黄巾堀之高唐县与现在之高唐并存。

三、高唐县城何时建在伦镇

高唐历来就有一种说法,高唐自禹城伦镇迁今址。如清光绪版《高唐州志·高唐故城》载:“高唐故城(旧志载)在城东七十里,伦镇西北,今属禹城。”^②《山东通志·高唐州》载:“汉高唐县,魏高唐县皆在今禹城县境。”明嘉靖版《高唐州志·故城》也载:“(高唐故城)在州城东七十里,伦镇西北,俗称为旧高唐,今属禹城界内。”上述记载说明,自明以降,明确提出高唐自禹城伦镇迁来之说。但“伦镇”这一地名,出现并不早。宋以前的史志中尚未见到“伦镇”这一地名。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不惜多费点笔墨,把唐、宋时期有代表性的地理著作中关于高唐、章丘、禹城三县的记载,摘录下来,纵横进行比较,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很有裨益的。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载:“高唐县,本齐邑,春秋夙沙卫奔高唐以叛。”史

记齐威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赵人不敢东渔于河。汉以为县，属平原郡。后魏属济州，高齐改属平原郡。隋开皇十六年改属博州。皇朝因之。长寿二年改为崇武县，神龙元年，复旧名。……黄河在县东四十五里。华歆墓在县东二十里。”^⑧关于章丘县的记载是：“本汉阳邱县也。属济南郡，高齐文宣天宝七年，自高唐故城移高唐县理于此。开皇十八年（《唐书》地理志为十六年）以博州亦有高唐县，改为章邱县，属齐州……县理城即黄巾城也，在济水之南。汉献帝建安中，黄巾贼张角之所守也。”^⑨关于禹城县的记载是：“禹城县，本汉祝阿县，春秋时齐邑、汉以为县，属平原郡。开皇十六年改属济州，天宝元年改名禹城县，以县西南三十里有禹息故城，固而为名。”^⑩《元和郡县志》是盛唐元和八年（813年）成书的地理总志。作者李吉甫久任宰相，熟悉当时图籍，记载详尽，较为可据。上述第一条史料，明确告诉我们高唐县的沿革历史、现在的位置，特别是当时黄河的位置与距离、华歆墓与县城的方位距离，都明确的标出这不仅与唐代的情况相符，而且与现在的历史遗迹也很一致。但是并没有提到与禹城、有关的字眼。第二条史料关于章邱的记载，明确提到了侨置高唐县的变迁。第三条史料中谈到禹城由祝阿县变迁而来，也没有涉及到高唐的任何问题，这足以说明唐代时，还没有提到高唐县自伦镇迁今址之问题。

宋代时，在《輿地广记》中，关于高唐县的记载是：“高唐县，春秋齐邑，汉属平原郡，后汉及晋皆因之。后魏置南清河郡，北齐郡废。隋开皇初，属贝州，大业初属清河郡。唐武德四年属博州。”^⑪关于章邱县的记载是“本汉阳丘县。属济南郡。后汉省之，后置高唐县。隋开皇十年，改为章邱，属高密郡。唐属齐州……”^⑫关于禹城县的记载是“本祝阿，齐邑也。春秋襄十九年，诸侯盟于祝阿，即此。二汉曰祝阿，属平原郡，晋属济南郡，隋属齐郡，唐属齐州。天宝元年（742年）更名禹城。东有野井亭，齐侯唁鲁昭公之所。”^⑬

《輿地广记》是北宋地理总志,欧阳志编著,政和年间成书。历代史学家对其颇加推崇。认为该书略古详今、纵横解剖,端委详明、系统清晰,便于寻检。在这部地理专著里,前两条史料在涉及到高唐时,都有较明确的记载,但在第三条关于禹城的史料中,只字没有涉及高唐。即没有说这里曾是故高唐之地,更没有说高唐故城始终在伦镇。这时,“伦镇”这一地名是否存在还是个疑向。又据《元丰九域志》中关于高唐的记载“高唐县(博州博平郡,治聊城。州东北一百一十一里),三乡。夹滩、新刘、固河、南刘四镇。有黄河、鸣犊沟。”^②可惜,关于包括“章丘”、“禹城”在内的齐州部分散佚,无法作比较。这部书成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的官修地理总志的记载告诉我们,“固河镇”,最迟在宋代前期已经存在,是个较早的古镇,却没有提及高唐故城始终在伦镇。

据目前我们所接触到的史志资料,最早提到“伦镇”一名的,就是明代嘉靖版之《高唐州志》。正因自明以来,众多地方志都说高唐县故城在禹城伦镇,这就给后来造成一种错觉,误认为高唐县自汉代建县开始(侨置废止阶段除外)至迁今址止,一直是在禹城伦镇。实则不然,西晋以前,高唐故城一直是在涸河。这在第一部分的考证中,已经说明,不再赘述。问题是,高唐县何时曾以伦镇而治,又是何时迁往今址?我想,通过对下面史料的分析,可以使我們明白这一问题。

《魏书》载:“高唐、二汉、晋属平原,后置,景明三年复”^③这段史料告诉我们,汉、晋时期,高唐一直存在。魏时,曾一度废止。到景明三年(502年)又复立高唐县。这时的高唐县属哪个州郡,又复立在何处。《魏书·地形志》中明确记载是属南清河郡:“南清河郡(晋泰宁中分平原郡置,治莒城)。领县三……郿……零(二汉、晋属清河、太和中属平原,后属治零域,有莒城。)高唐……”^④这段记载使我们明确这样几个问题,1、后魏时南清河郡依然存在,辖县

与晋同；2、此时的高唐县城与莒城并非一地，因为记载中明确告诉我们，莒城是在零县境内，不在高唐境内，而且是南清河郡治。这给我们考证其他问题提供了依据。

上述史料提到“景明三年（502年）复，”这次复立的高唐县城在何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中载：（高唐县）“①西汉置，治所在今山东禹城县西南，西晋废。②南朝宋置，治所在今山东章丘县西北，北齐废。③北魏景明三年（502年），治所即在今山东高唐县”^⑧这些结论。依据最新考古资料分析显然是错误的。1972年，我们曾在今高唐县城东北三里的三里庄村南，发掘一座东魏时期济州刺史房悦墓。出土墓志中关于墓葬的方位是这样记载的：“……春秋七十，兴和三年（542年）岁次率酉六月率丑朔十一月率庆薨于济州灵县之本宅……其年十一月己巳朔十七日乙酉葬于鸣犊河之东。”^⑨墓志中只字没有提到仅距墓三里的高唐县城。这说明，公元542年时，高唐县城还不在这里（下文将详述）。那么502年恢复高唐县时，其治所也就不可能在这里。根据房悦墓志铭提供的切实可信的资料分析，房悦墓在现在的高唐城东北约三里，房悦墓属灵县地，今高唐县城在房悦墓以西也当属灵县地无疑。而当时恢复的高唐县城也就必然在灵县辖区之外了。因此，现在的高唐县城也就不可能是502年复置高唐县时的县治所在地了。那么，这时高唐县的治所应该在何处呢？根据明代以来史志中关于高唐县由禹城伦镇迁来今址的记载，结合民间传说以及伦镇所处的地理位置分析，502年复县时的高唐县治应当就在伦镇之西的城子坡。高唐县治在此一直延续到迁往高唐今址。何时迁走，将在下文述及。

四、关于高唐县城今址的建置年代

现在的高唐县城何时建立，历来说法不一，如“北魏景明三年

(502)建”之说,已被 1972 年出土的东魏房悦墓志铭所否定。志文中提到两个地名以标明房悦墓的位置。一是灵县,二是鸣犍河。灵县,汉代所置,治所即今高唐县正南三十里之南镇。鸣犍沟,《汉书·地理志》以及酈道元的《水经注》中都有记载:“河水自灵县别出为“鸣犍河,东北到蓼入屯氏河。”^⑧“河水自灵县别出为鸣犍河者也。东北经灵县东,东入酈县,而北合戈氏渚。”^⑨这两个地名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汉至东魏的地图上都明确标出。以其与现在的高唐县城、南镇所处的对应位置分析,都基本相符。鸣犍河在房悦墓以西,今高唐县城以东。房悦墓在现在的高唐县城东北,相距只有 1.5 公里。按墓志铭的传统写法,在标明墓葬的方位时,一般先写明所属县,再写明周围最有代表性的标志物,如河流、山川、高地、乡镇等。志文中提到了离墓葬三十里之外的灵县,提到了并不十分重要的鸣犍河,而离墓葬只有 1.5 公里的若大个县城却只字没提及,这说明在东魏兴和三年(542 年)时,现在的高唐县城还不存在。

第二种说法是“元代至元七年,高唐县城迁今址。”^⑩此说也不能成立。我们在 1989 年配合 308 公路建设时,在高唐城东约十里的胡庄村,发现了《大唐故王府君墓志铭碑》一块。志文载:“乾符四年二月十三日殡于高唐东约十里口龙乡。”^⑪志文以高唐城为基点标明的墓葬的方向、距离,与今天的实际方向和距离都是一致的。这说明高唐县城早在唐代乾符四年(877 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元代建城之说显然是错误的。

第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在高唐县条目下载:“……汉于其他置县,晋废。古城在今山东禹城县西南,后改置于汉灵县界,汉灵县地,后魏分置高唐县。唐改曰崇武。”^⑫从这段文字来看,高唐县治所在地除侨居之外似乎还有三个地点。一是汉置晋废的县治,故城在今山东禹县西南;二是后来改置汉灵县界的县

治；地点在何处，没有交待清楚；三是汉灵县地，后魏分置高唐县，唐改曰崇武”的县治，地点应是现在的高唐县址。但稍加推敲，便可看出这段文字记载不是错误百出就是含混不清。不足为据。关于“汉晋故城在今山东禹城县西南”问题，前边第一部分已经论证汉晋时期之高唐县治，在今高唐县濰河附近，方向在禹城西南。502年复置高唐县之县治在禹城伦镇，也在禹城西南，不知该书是指的那一个。关于“改置汉灵县界之高唐城”，也未交待清地点在何处。特别是“汉灵县地，后魏分置高唐县，唐改曰崇武”条，更是存在严重错误。往往给人一错觉，误认为后魏分置高唐县时，县治就设在今址。其实不然，我们把“汉灵县地，后魏分置高唐县”与《魏书·地形志》中“南清河郡，晋泰宁中（约325年左右），分平原郡置，治莒城，领县三、郿、零……（有莒城），高唐二汉晋属平原后置，景明三年复”的记载及《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中的“（高唐）北魏县，济州南清河郡。”^②条结合起来分析，这时的高唐县城不在今址，因为莒城在灵县境内，高唐是独立的县，不会在灵县境内设县治，而现在的高唐县治却在灵县境内。显然，二者不是一个地点。因此，后魏分置高唐县之县治和“唐改曰崇武”之县治不是一个地点，二者没有前后延续关系。前者应在伦镇，后者才是今之县治。

那么，现在的高唐县城究竟建立何时呢？《元和郡县图志》载：高唐县“西南至州百一十里，本齐邑，……汉以为县……隋开皇十六年改属博州，皇朝因之。长寿二年改为崇武县，神龙二年，复旧名。黄河在县东四十五里，华歆墓在县东二十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三个确切的数据。“西南至州百一十里”是说的高唐县治离西南方向的博州一百一十里。唐时之博州治所，在今聊城市许营乡之民王屯附近，在高唐之西南，距离也是一百一十里，都与实际情况相符，“黄河在县东四十五里”，唐代黄河正好是从现在的高唐城东四十五里处流过；“华歆墓在县东二十里”，也与现在高唐城距华

歆墓的方向和距离一致。三组数据和方向,都十分明确的说明现在的高唐县城在元和八年(813年)之前就已经存在。《新唐书·地理志》又载:“博州博平郡,武德四年以魏州之聊城、武水、堂邑、高唐置……县六,聊城、博平、武水、清平(武德四年置)、堂邑、高唐(长寿二年曰崇武,神龙元年复故名)。”^⑧根据所列县名分析,这时的高唐城应当在现在的县城。也就是说,武德四年时(621年),现在的高唐城已经存在。

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出土文物铭文。民国版《高唐县志稿》载“民国五年(1916年),八区小华庄浚砦壕,掘出一造象,石洁如玉,古色斑烂。惜弥陀及侍者被插损其身,背面字尚可辨,系‘显庆六年,华公乡清化里佛弟子刘一盛界造石。’”^⑨“显庆六年”,历史上本不存在。“显庆”年号共用了五年,如何出来一个“六年”?根据情况分析,唐时都城在长安,高唐离长安遥遥几千里,交通不便,讯息不灵。朝廷已经改了年号,边远地区尚不知道。自己仍按“显庆”年号顺延。实际上显庆六年应为唐高宗李治龙朔元年,即公元661年。“小华庄”离县城二十里。也就是《元和郡县图志》中所说的华歆墓所在地。这进一步说明,现在的高唐县城,自唐代早期就存在。

《高唐县志稿》又载“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城东亚王庄民,掘地发现石佛十余尊,或石或玉,背有“河清三年,高唐县信女郑氏镌”^⑩等文字。“河清”为北齐武成帝高湛年号,河清三年即公元564年。亚王庄在今高唐县城东北,离城6公里,这段铭文无辩驳的说明,公元564年,高唐县城已在今址。但北齐何年废南清河郡”的记载分析,很可能在废南清河郡的同时,也将高唐县迁到今址。但北齐何年废南清河郡,却没有明确记载,不能妄下断语。另外,上边提到北齐天保七年,郡县曾有过变迁有明确记载的便是北齐天宝七年将梁邹之高唐迁往黄巾埕之高唐。一般说来,区域的

变动不会是单一个城市的变动,很可能会有一批郡县的变动。高唐县也很可能是在这一年由禹城伦镇迁往今高唐县治,南清河也很可能是这一年废止的。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确切的史料记载,只能算作推论,而不是结论。但是,北齐的建立是在公元 550 年,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由伦镇迁今址的时间压缩在 550 - 564 这 14 年之间,也就是说,高唐县城今址是在北齐 550 - 564 年建立的。

注 释

- ①《十三经注疏》下册第 1968 页。
- ②《史记》中华书局版第四册第 1500 页。
- ③杨伯骏《春秋左传注》第三册第 1049 页。
- ④同②。
- ⑤《后汉书》中华书局版第十二册第 3472 页。
- ⑥王明根等《文史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73 页。
- ⑦《史记》中华书局版第六册第 1890 到 821 页。
- ⑧《史记》中华书局版第六册第 1891 页。
- ⑨《汉书》中华书局版第六册第 1579 页。
- ⑩王国维《水经校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85 页。
- ⑪同⑩第 191 页。
- ⑫《后汉书》中华书局版第十二册第 3472 页。
- ⑬《三国志》中华书局版第一册第 10 页。
- ⑭《三国志》中华书局版第四册第 872 页。
- ⑮《三国志》中华书局版第二册第 401 页。
- ⑯《晋书》中华书局版第二册 423 页。
- ⑰《晋书》中华书局版第四册第 1260 页。
- ⑱⑲⑳《二十五史宋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版缩印本第 1752 页。
- ㉑《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版缩印本第 1754 页。

- ②《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版缩印本第 2455 页。
- ③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四册第 299 页。
- ④《山东通志》卷三第 539—175 页。
- ⑤光绪版《高唐州志·高唐故城》。
- ⑥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版第六册第 500 页。
- ⑦同上书第 299 页。
- ⑧同上书第 301 页。
- ⑨欧阳志《舆地广记》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二册第 113 页。
- ⑩⑪同上书第一册第 63 页。
- ⑫《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一册第 70 页。
- ⑬《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版缩印本第 2455 页。
- ⑭同⑬。
- ⑮《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第 735 页。
- ⑯墓志，现藏山东省考古研究所。
- ⑰《二十五史·汉书·地理志》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版缩印本第一册，第 152 页。
- ⑱《水经校注》（王国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74 页。
- ⑲《聊城古今知识大全》第 30 页。
- ⑳墓志藏高唐县图书馆。
- ㉑《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第 775 页。
- ㉒《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卷八下第 161 页。
- ㉓《新唐书》第四册第 1011—1012 页。
- ㉔民国《高唐县志稿》第十二册第 36 页。
- ㉕民国《高唐县志稿》第二册第 12 页。

原载《高唐县志》，齐鲁书社，1994 年版

略论《老子》的政治思想^①

李付兴

《老子》是我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典籍。其作者老子又称老聃，姓李名耳，春秋时楚国苦县人，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载，他曾为“周守藏室之史”，^②即周王室掌管图书典籍的史官，后因见周王室日趋衰落，遂回乡隐居著述，成五千言，是为《老子》。

《老子》以“道”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道”的本义是道路，而在《老子》中“道”是用来表示宇宙万物的本质、变化和本原的，它“先天地生”且“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下母”，(25章)并且“道恒无名”，(32章)“大象无形”，(40章)同时说“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41章)从而使道具有了形而上学的哲学意义，以之为代表的学派也被称为道家学派，

《老子》把“道”作为事物存在和变化的普遍原则，关于这种原则，《老子》提出“道法自然”，(25章)倡导贵柔、守雌，形成了以退为进的人生哲学。但细读《老子》五千之文，我们却不难发现“《老子》五千言多谈‘治道’，老学的目的却在‘外王’之道”，^③特别是《德经》的大部分多是讲治平天下之道的。下文拟就此作详细阐述。

一

《老子》哲学的核心思想是“道”，而道是法自然的，所谓自然是自然而然之意，即“道”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万物，而是由其

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变化,因而“道”是无为且无以为的。这种思想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即形成了《老子》尊道、非礼的独特政治观。

《老子·三十八》曰:“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其旨在以道观察区别德、仁、义、礼四者是递次下降的,其先道德后仁义的态度跃然纸上。我们知道礼在周代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周王朝用礼确立了严格的等级秩序和行为规范,通过礼治维护其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老子曾为周守藏之史,而史官在周代社会地位是很高的,“史与相乃并尊。相馆百务,史司案牒,互助互稽,以辅首领”,^④作为守藏史,可以说老子就是周代礼制文化的掌管者,而他却对礼采取如此态度,是很值得人探究的。

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期,也是大动荡的历史时期。平王东迁后,晋郑是依,周王室渐趋衰微,齐、晋、楚、秦等大国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使礼乐征伐由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而随着各国卿大夫阶层的迅速崛起,如鲁国的季氏、齐国的田氏等,呈现出大夫皆富、政权在家的局面,礼乐征伐进而变为自大夫出;到后来大夫的家臣也起而夺取政权,如鲁国就形成了季氏专鲁,而阳虎又专季氏的局面。周礼所确立的统治秩序日趋瓦解。虽然此时的大小诸侯仍特别重视礼仪,但“这种重视讲究丧失了礼制结构下的应有原则,从而实质上只能是一种非礼……这种情况下的所谓礼仪,因此,体现的并非周文之尊尊、亲亲的精神,而只是各类大小僭越者的贪欲和野心罢了”。^⑤礼坏乐崩已是不争之事实,作为守藏史,老子无疑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感受,其思想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春秋时期动荡的社会局势对老子由礼文化的掌管者变为反对者所起的作用毋庸置疑。但问题是同样面对礼坏乐崩的局面,同时代的老子和孔子为何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态度?孔子讲求复礼,即要求恢复西周初周公所定之礼,以此来维护社会的稳定;而老子却认为“大道废,案有仁义。智慧出,案有大伪。六亲不和,案有孝慈,邦家昏乱,案有贞臣”,(18章)从而将礼斥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但仔细比较两人的观点,可以看出还是有着共同点的,即复古,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孔子要求恢复到周初,而老子则要求恢复到仁、义、礼、智未出之时,连周初之礼也予以否定。复古也许是那个时代众多忧时伤世者的共同倾向,只是老子的观点更为彻底、偏激罢了。这自然与老子作为史官,较之其他人有更为切身的感受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礼”和《老子》的核心思想“道”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冲突。前人王弼说:“夫礼也,所始首于忠信不笃,通简不阳,责备于表,机微争制。夫仁义发于内,为之犹伪,况务外饰而可久乎!所谓外饰即指礼,韩非有“礼者外饰之所以谕内也。”王说甚得《老子》本义,《老子》虽先道德后仁义,文中也数见“圣人不仁”“绝仁弃义”之句,但仁义二者毕竟还是“发于内”的,是属于道德自律范畴的,而礼作为外饰,它规定了严格的等级秩序和行为规范,从根本上违反了“道法自然”的基本原则,故而《老子》将礼置于仁义之下,并斥之为“忠信薄也,而乱之首。”

二

春秋时期最突出的社会政治现象就是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据《史记·周本纪》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⑧所谓“政由方伯”即指大国争霸。大国争霸对周初所确立的社会政治格局造成很大影响。武王克殷以后,为了“以蕃屏周”^⑨的目的开始封建诸侯,至周公成王之世封建大业基

本完成。当时所封侯国,据《荀子·儒效》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焉”,^⑩而据顾栋高《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统计则有 204 国。^⑪据说至春秋初期,大小侯国仍 140 余个,但随着大兼小强并弱,这一数目迅速下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齐、鲁、卫、晋、楚、宋、燕、陈、秦、吴、越等十余国,而这其中又以齐、楚、晋、秦四国最为强大,整部春秋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齐、楚、晋、秦等国的争霸史。但其中哪个国家都不具备统一天下的力量,各国的势力此消彼长,时战时和,使得争霸战争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三百年。

长期的争霸战争虽然对摧毁旧体制、促进新兴势力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对社会生活的负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使得百业凋敝,广大人民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其次,为了满足长期战争和统治者奢侈生活的需要,各国无一例外地加强了对奴隶和平民的剥削,如齐景公时“民三其力,二人于公,而衣食其一”,^⑫这使得阶级矛盾加剧,到春秋末年,各国奴隶、平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再者,统治阶级内部也互相倾轧,斗争十分激烈,据《左传》载,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欲立王子朝为太子,未成而死,引起公、大夫之间的战争。^⑬这场王朝内战一直延续到鲁定公八年方告结束,老子也当是于此间辞官归隐的。正是在目睹了这种种现象之后,老子提出了他“小邦寡民”的政治理想:小邦寡民,使有十百人之器而毋用,使民重死而远徙。有舟车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67 章)

《老子》小邦寡民的政治理想是基于当时分散、自足的农村社会而提出的,因而有保守、复古、倒退的一面,这种理想也颇为今人

所非议。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老子认为“反也者,道之动也”,即指事物之间大小、强弱、祸福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它们都在向着相反的方向所转化,如同“物壮则老”(30章)一样,同时他还说“弱也者,道之用也”,即倡导贵柔守雌,认为只有常处于弱势,方能免于灭亡,因而在老子心目中圣人也是终不为大的,以其不为大也,“故能成其大”,(63章)这是普适的原则,齐、楚、晋、秦那种大邦众民显然不符合这种原则,故而也是为《老子》所不齿的。而且在这种理想社会中,没有剥削和压迫,也没有战争,人民的生活是简朴而自足的,这种反剥削和反战争的要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老子》虽然以“小邦寡民”作为其政治理想,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这只能是一种理想,而不可能成为现实。因而在《老子》中,念念不忘的是“治大国若烹小鲜”(60章)之类,其一整套治世方略也正是为了治大国,平天下而提出的。

三

《老子》政治思想的特点是推天道而明人事,要点在于从自然现象中确立社会、人生的法则,即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5章)具体表现在治世方略上,就是由天道的自然无为推导出王道的无为而治,即是《老子》所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57章)

无为而治的方略看似简单明了,而一旦被推到操作层面上就变得复杂起来,政治几乎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现,为了使社会的稳定及顺利运行,并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就需要将无为的原则贯彻始终,这确属不易,为此《老子》不厌其烦地从各个方面对执政者阐述了无为而治的原则。下面就几个主要方面加以阐述:

1、以正治邦的思想

《老子》在叙述治世方略时说应“以正治邦，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57章)在这里他创造性地使用了一个词“正”，这个词也多次出现如“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39章)“正善治”，(8章)“清静可以为天下正”，(45章)“我好静而民自正”等。所谓“正”者，蒋锡昌《老子校诂》认为“其谊专指清静之道言，此为《老子》特有名词”。^⑩以正治邦即是说治邦当以清静无为为最高准则，这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告诫持政者当以清静无为为本，要无私，无欲、无事、无为，意在消解统治者的权威，给人民以更大的自由和生存空间。二是持政者应当使“民自正”，使百姓少私寡欲，见素抱朴，此亦后文之“愚民”思想，兹不述。

春秋时期，民生艰辛，如于水火，《左传·昭公三年》载“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饿”，^⑪作为下层官吏的“三老”尚且如此，普通民众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对于社会上出现的种种悲惨状况，老子认为是统治者的多欲有为造成，他说：“人之饥也，以其取食税之多也，是以饥。百姓之不治也，以其上有为也，是以不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轻死。”(77章)在《53章》，他更愤怒地说：“朝甚除，田荒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而资财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韩非说：“竽也者，五声之长者也，故竽先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今大奸作则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则小盗必和，故‘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而资货有余’者，是之谓‘盗竽’矣(《解老篇》)。”^⑫由此他认为“取天下也，恒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48章)可见他是反对兴业劳民的，而为了达到无事，必先无欲无为，一是要不欲扩张国土，增多民口，并且倡导“大国者，下流也”。(61章)二是要不贵难得之货，当戒奢以俭。只有这样才能谓之有道，也才能达到“太上，下知有之”(1章)的境界。

2、非战的思想

老子生逢乱世，对于战争所带来的一系列悲惨后果有深刻认

识,故而《老子》中流露出强烈的非战思想。他认为“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46章)意指人主有道,则兵革不兴,故使马以服耕载之役;人主无道,戎马悉被征发,故驹犊生于野外,可见老子是将有无战争作为人主有道、无道的重要依据的,同时他还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也”,如“不得已而用之”,则应以“恬淡为上”。并说“勿美也,若美也,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不可得志于天下”,(31章,上引皆同)对统治者滥用武力的行为提出了警告,同时他还告诫为人臣者应“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这样方能“其事好还”。(30章,上同)

针对当时诸侯国大兼小,强并弱的情况,《老子》认为“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交也,牝恒以静胜牡。为其静也,故宜为下。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故或以下取,或下而取,故大邦者,不过欲兼畜人,小邦者,不过欲入事人,夫皆得所欲,大者宜为下。”(61章)其意即大邦若能对小邦谦恭自下,小邦自可归附,从其所愿即“兼畜人”;而小邦若能对大邦谦恭自下,则可见容于大邦,也可从其愿即“入事人”,如是则大兼小,强并弱的战争自可休矣。但《老子》也认识要达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大邦要谦恭自下,因为大邦国盛兵强,若以强取,则亦可如意,可见战与不战的主动权掌握在大邦手里,故而苦口婆心地说服大邦“大者宜为下”。

3、愚民思想

春秋时期,各国忙于急霸,对民众思想控制无暇顾及,因而春秋时期也是民众思想解放的时期。一方面新兴的地主和商人阶层在争霸战争中迅速崛起,他们强烈要求分享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和奴隶也日益觉醒,要求推翻奴隶制度。与此相呼应,在思想界“重民”思潮汹涌。而此时老子却反其道而行,倡导“愚民”思想。“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也。民之难治也,

以其智也。故以智治邦，邦之贼也；以不智治邦，邦之德也。”（65章）又三章“不上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智知无欲也，使夫智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之行妨，五味使人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12章）此等言语在那个“重民”的时代里不啻石破天惊，难怪后人认为《老子》的政治思想乃人君南面之术，应予以摒弃。

值得注意的是，《老子》在提倡“愚民”的同时还认为“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49章）要求为人主者要与百姓同心，不许搞特殊化的，因此《老子》“为腹不为目”的愚就不仅指要化民以愚，而是包治统治者本身在内的。《老子》是主张人性复朴的，即回复人性本来的自然纯朴的状态，为此，只有“少私寡欲”，《老子》之“愚民”也是指不能喻民于利欲，而是要使民众少私寡欲，以达到人性复朴的目的，进而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由此观之，《老子》之愚也就不成其为愚了。

《老子》的政治思想对后世有相当的影响，特别是对先秦诸子影响尤大，陈鼓应先生在其《道家在先秦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一文中对此有详细论述，此不赘述。而《老子》的政治主张以其局限性难以付之应用。除去汉初外，鲜有能广为采纳者，但在各朝各代政治实践中，特别是每当天下初定时，新王朝所采取的措施中，常能看到老学的影子。

注 释

①《老子》传世版本甚多，其中以河上公本和王弼本影响最大，但多由于传抄讹误、窜改，已非《老子》原貌。也有注者认为唐景隆二年易州隆兴观《道

德经碑》近于原本,中华书局有朱谦之《老子校释》。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应是较早之写本,其中又以甲本为早,更近原貌。本文所引均据高明先生《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所校定之甲本,故内容和章节常与他本不同,特此说明。

②⑧《史记》,中华书局1959版,第149页,第2139页。

③陈鼓应:《道家在先秦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载《中国文化研究》1995夏之卷,第7页。

④柳诒徵:《国史要义》,中华书局1948版,第6页。

⑤韩德民:《礼·从历史到哲学》,载《中国文化研究》1997春之卷,第13页。

⑥《诸子集成·老子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24页。

⑦⑬《诸子集成·韩非子集解》,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96,第113页。

⑩《诸子集成·荀子集解》,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73页。

⑪据自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三联书店1996版,第10页。

⑨⑫⑭⑮《春秋三传》,上海古籍1987版,第188,第418,第464-465,第418页。

⑱转自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版,第10页。

马陵古战场考

陈昆麟

战国前期,魏国攻韩。韩国国力小力单不支。向齐国求救。齐国以田忌为将,孙臏为师,向魏都大梁进军。公元前341年,齐军用孙臏计,以逐日减灶法制造齐军大量逃亡之假象来迷惑魏军、引敌追击。待魏军追至马陵险要地区,齐军伏兵四出,万弩齐发。全歼魏军十万人,魏太子申被俘,魏将庞涓被逼自杀。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马陵之战”,是历代兵家所崇赏的战例之一。

“马陵之战”,顾名思义,战争当是在马陵之地进行的。“马陵”究竟在何处,历来众说纷云,莫衷一是。

关于马陵之战的记载,最有权威的文献要是《史记》了。一是《史记》成书年代较早,二是司马迁治史态度严谨,为世人所信任。关于“马陵之战”,《史记》曾在“秦本纪”、“田敬仲完世家”、“魏世家”、“孙子吴起列传”、“商君列传”、“孟尝君列传”、“六国年表第三”中,凡七次提到这次战争。无论是简、是繁,内容基本是一致的。但是,对马陵所处的地理位置,却没有明确的记载。到了六百多年后的晋代,在徐广、虞喜的注释中开始出现较具体的地理位置。但也是意见不一。同为晋人的两位大学问家徐广和虞喜就有两种见解。徐广说在“元城”。虞喜说:“马陵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六十里。”^①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这次战争时仍尊重《史记》的原著。文字上没有任何增减。^②明代李贽在其《史纲评要》中,也是尊重《史记》原著,没有枉加推测。^③当代诸多史学家

的意见也不一致。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认为马陵在今菏泽地区鄆城。^④王伯祥先生的《史记选·孙子吴起列传》注释中说马陵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南 10 公里处。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认为马陵在“今山东濮县。”^⑤而《辞海》曾四易其说。1976 年版的《辞海》(历史分册)在“马陵之战”中沿用王伯祥先生说。1980 年再印时,改为马陵在“今河南范县西南”。^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关于马陵地理位置的说法有二,一说“在山东濮县北三十里”,同时也保留了虞喜之“鄆城东北六十余里有马陵”之说。^⑦近年来,更有受演义小说影响,把马陵古战场拉到山东省临沂市东南九十里之马陵山者。归纳上述众说,有六种意见:

- ①“鄆城东北六十余里”说。
- ②“河北大名附近”说。
- ③“今山东濮县”、“山东濮县北三十里”说。
- ④“今河南范县西南”说。
- ⑤“元城”、“元城东南”说。
- ⑥“今山东省临沂市东南九十里马陵山”说。

下面根据文献提供的地形、地貌、地理位置,及实地调查三方面的材料,分析考证,究竟那种意见更贴近历史的真实。

从文献提供的地形地貌看:

最有权威的史学巨著《史记》,在“孙子吴起列传”中是这样记载的:“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⑧在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笔下,即没写山石,也没写涧谷,可见当时的马陵古战场,并非是山高崖陡、涧深水急的山地。对于治史态度十分严谨,在政治问题上尚能坚持事实求是、秉笔直书的司马迁来说,如果马陵之战处有山石涧谷,如此重要的地形,他是绝不会漏书的。“涧谷”,是到六百多年后的晋代虞喜的笔下出现的。他在《史记·魏世家》“马陵”条的注释中说,马陵,“有陵、涧谷深峻。

可置伏。”^⑨宋代的大史学家司马光在编著《资治通鉴》时,虽在小字注释中保留了虞喜的“涧谷深,可以置伏”。但更以大字正文沿用了司马迁《史记》中“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的说法。^⑩可见司马光还是更注重司马迁的原著的。至于把马陵古战场描写为山地的,那是明代《东周列国志》的作者冯梦龙、蔡元放的“创举”了。他们在书中是这样写的“那马陵道在两山中间,溪谷深隘,堪以伏兵。”^⑪通过上述引文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笔下的马陵,是一“道狭,而旁多阻隘”的地方,无山无水,最多道两旁有杂草丛生,古树成林的土丘而已。到晋朝虞喜的笔下出现了“涧谷”。到明代文学家冯梦龙、蔡元放笔下又进了一步,有山有水了。因《东周列国志》这部长篇演义小说流传面广,对后世影响颇大。所以,其后涉及马陵之战的文学作品,不管是故事、戏剧、还是连环画册,总爱把这一古战场描写为山高岭峻,谷狭溪深的山地。这就进一步混淆了人们的视听,无怪乎现在有人要把这一古战场拉到今临沂市东南九十里的马陵山中。诚然,文学作品是允许想象和虚构的。但也正因如此,文学作品中的描写是不足为据的。凡是治史态度比较严谨的史学家,无论是宋代的司马光,还是明代的李贽,他们都是尊重《史记》的记载,文字上没有任何增减的。显然,那写“涧谷深峻”、“马陵道在两山中间,溪谷深隘”的描述,都是不符合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写的地形地貌的。而现在的山东省莘县大张乡的马陵至樱桃园乡的道口之间的地形地貌,却与《史记》中的记载基本相符。

从文献资料提供的地理位置来看:

《春秋左传》中载,成公七年,“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郑。八月戊辰,同盟于马陵”。晋人杜预注:“马陵,卫地,阳平元城县东南有马陵。”^⑫春秋时,卫国的都城在今濮阳市南约十公里处的旧城。马陵就在其东北方向约 80 公里处。

到战国时期,马陵就属齐了。根据杜预所注,我们查看《中国历史地图集》。^⑧战国时期,阳平、元城均有。阳平在古黄河西,元城在古黄河东,两城东西相距约 80 公里。元城东南约 50 公里处有马陵。战国时期,甚至晋代,都是地广人少城稀。以当时的县城为基点来确定小地名的方位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一马陵正与现在莘县大张乡之马陵的方位相符。我们再看《战国策》所提供的资料。“韩自以专有齐国。五战五不胜。东朔于齐。齐国起兵击魏,大破之马陵”。注释曰:“鲍本补曰:虞喜云,马陵在濮州鄆城东北六十里,有涧深峻,可以置伏,庞涓败即此。徐广云,在魏州元城县东南。司马彪引杜预说,亦然。”^⑨注释当中四人有三人是持“元城东南”说的。反对“元城东南”说,持“鄆城东北六十余里”说者主要理由是“齐师走大梁,败魏马陵,合更渡河北,至魏州元城哉”?持此说者,是因为他们不熟悉当时黄河的流向和元城所处的地理位置。战国时期,黄河流至现在的新乡市之后,一直向东北方向流去,而战国时期的元城在黄河的东南岸,从大梁撤军是不用渡河的。再说撤军不是一直撤到元城,而是撤到元城东南约五十里的马陵,所以“元城东南”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关于“濮县”说或“濮县北三十里说”,濮县即今河南省濮城。距今河南范县约 25 公里,北距马陵约 15 公里。与现在莘县大张乡之马陵,正好是同一地点。从现在山东省大张乡的马陵地理位置看,“今河南省范县西南”说也比较准确。因为河南省范县县城至今座落在山东省莘县樱桃园乡之内,(县委、县府办事机构所占地盘归河南省范县。四周地面皆归山东莘县)其西南约 8 公里处即为马陵。

“鄆城东北六十里”说,现在此处已无“马陵”这一地名可寻。当然,许多历史上的地名都被淹没了。这也是事实。但作为著名战例的古战场来说,特别是对于从古至今都十分重视,推崇的马陵

之战的古战场来说,是不会被淹没的无任何迹向可寻的。而这一可寻的迹向,正是在今山东莘县西南大张乡的马陵。全国最权威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编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正是将马陵标在此处的。此处东南约六十里,即是今古鄆城。因此,“城东北六十里”是否是“鄆城西北六十里”之误呢?如果将“东北”二字改为“西北”,此地理位置就与现在的马陵的位置基本相符了。

关于“大名”之说,因其处在古黄河西岸,且又为赵国之地,齐军无论是进军大梁,还是由大梁撤军,如到大名,不仅必须渡黄河,还要绕远,齐军是不会如此愚笨的。故此说难以成立。

关于“在今临沂市东南九十里之马陵山”说,此处的地理位置已在鲁国国都以东,已深入鲁国腹地,远离魏国千里之遥,齐魏两国交战总不会带着军队到鲁国腹地打仗,此说更不能成立。

从实地调查情况看:

1980年应邀为《中国名胜词典》编写条目。在写关于《马陵古战场遗址》词条时,为了使词条写得更切合历史事实一些,我曾赴马陵古战场遗址调查。山东省莘县大张乡至今仍有马陵地名存在。在马陵东北方向约六公里处,还有一古地名称“道口”,现属莘县樱桃园乡。人们常把马陵和道口合称为马陵道。马陵村南约150米处是金堤河。村东北有一条通往道口的大路沟,传说孙臆就是在此沟中设伏击败庞涓的。道口村南紧邻金堤河。马陵和道口的房屋、街道很少是正南正北方向的,几乎全是斜的,外地人进村后很容易迷失方向。传说孙臆正是利用这样的地形而置庞涓死地的。我们推测,因为金堤河是西南、东北流向,可能是村民因河堤而筑房形成现在的房屋布局。恰与历史上的马陵之战巧合,人们才有了这一传说,孰是孰非,难以定论。也曾走访过当地老者,他们说,原来的道沟还要深,沟两旁有土丘。生长着树木荆棘,地形险要。少年时捉迷藏或拔草、拾柴,一个人就不敢到这沟里来。

后因邻近村民长年取土用土和平整土地,土丘荡然无存了。因此,在《中国名胜词典》中的“马陵古战场遗址”条目中,我作了如下描述:“马陵古战场遗址,在山东莘县西南大张乡村附近,南濒金堤河。东、西、北均为开阔地带。传此处原有两座土丘,其间一条狭窄崎岖的通道,淹没在古木丛林中,地势十分险要,此即文献所载“马陵道”。为战国时期自魏至齐必经之路,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就发生在此。”^⑥现在马陵的地形地貌,虽然保留了战国时期的点滴痕迹,但前后已经大不相同了,这也是事实。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既有大自然的功劳,也有人为的因素。所谓大自然的功劳,主要是指黄河泛滥后所造成的淤积,它可以使沟渠变浅,可以使土丘相对变低。所谓人为的因素,因人口的增长,荒地逐渐被开垦,土丘逐渐被削平。因此,经过两千多年大自然的雕凿和人为的因素,这里的地形地貌发生很大的变化是不足为奇的。

结论:

通过对文献记载的地形、地貌、地理位置,实地调查的材料分析来看。“马陵之战”古战场的“大名说”和“今临沂市东南九十里之马陵山”说皆非。“鄆城东北六十里说”亦非。如“东北”为“西北”之误,是“城西北六十里”,此说就正与莘县之马陵相合了。“元城东南说”“濮县说”、“濮县北三十里说”、“今河南省范县西南说”,实际指的同为一地,都是指现在的山东莘县西南大张乡之马陵。因此,此处就是马陵古战场遗址。

注 释

①司马迁:《史记·魏世家》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六册,第 1846 页。

②司马光:《资治通鉴》1956 年版第 1 册,第 59 页。

③李贽:《史纲评要》1974 年版,第 1 册第 115 页。

④郭沫若:《中国史稿》第 1 册第 48 页。

- ⑤翦伯赞:《中国史纲要》1979年版第1册第79页。
- ⑥《辞海》1980年版缩印合订本第1136页。
- ⑦《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1931年版、1982年重印第764页。
- ⑧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64页。
- ⑨同①。
- ⑩同②。
- ⑪冯梦龙、蔡元放《东周列国志》1955年版,下册第847页。
- ⑫《十三经注疏》1980年版中华书局影印本下册第1903页。
- ⑬《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33-34页、37-38页、43-44页。
- ⑭《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17页。
- ⑮《中国名胜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第二版第640页。

从孙臆论将看工厂 企业厂长、经理的选任

陈昆麟

孙臆生活的时代,正是各诸侯国之间频繁、互相兼并、互相争雄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正是时势造就了这样一位伟大的军事家。他的著作《孙臆兵法》,既是他高度军事智慧的结晶,也是他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这部书就其主旨来讲,是研究战争决策的。他在继承其先祖孙武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创新和发展。可以说在先秦诸家兵书中内容比较丰富,比较有价值的兵法著述了,他从战争实际出发,对于选将、用兵、客观的作战方案的制定、具体的战术的实施等,都有比较详尽的论述,字里行间充满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现在看来,随着现代武器的不断更新、现代化战争手段的不断丰富,《孙臆兵法》中所论述的一些方法和原则,虽然已经过时了,但是就其军事指导思想来说,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有的已经超越了军事领域和时代的局限,而在现代化的工厂、企业、商业经营中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如孙臆把“义、仁、德、信、智”^①作为选拔将帅的条件,我们就可以从中受到启发和教义,可以参照用来选任我们工厂企业的厂长和经理。“兵之胜在于篡卒”^②的思想,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用来招收工人和职员,严于法制和纪律的思想,可以用于工厂企业管理等。本文受篇幅所限,只将孙臆兵法中所论述的关于将帅的选任对于今天现代化工厂企业中厂长经理的选拔的指导意义,谈点粗浅意见。

一、从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看厂长、经理在企业中的重要性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旗鼓相当,战略战术正确者胜的战例。如战国时期的齐魏“马陵之战”,公元前341年,齐国击魏救韩,采纳了孙臆逐日减灶法以迷惑敌人。魏将庞涓向来狂妄自大,看不起齐国。这次以为是齐国将士胆怯而临阵逃脱。故只带部分骑兵,昼夜兼程追赶齐军。当庞涓带魏军追至马陵之地时,恰中了齐军埋伏。当时齐军金鼓齐鸣,万箭齐发,魏军个个心寒胆战,四处逃命。齐军在孙臆的指挥下乘势掩杀,打败了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庞涓被逼自杀。齐军大获全胜。再如东汉末年的袁、曹“官渡之战”,当时袁绍据有冀、青、幽、并四州,自持兵强粮足,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率兵十余万南下。曹操兵少粮缺,以劣势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相距。次年春,曹乘袁军轻敌,内部不和,两次偷袭袁军,焚烧其粮车和粮屯,袁绍所部军心动摇,纷纷溃散投降,曹操乘机全线出击,歼灭了袁军主力,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还有春秋时期的齐鲁“长勺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等等,不再一一赘述。这些战例充分说明将帅在军队和战争中的重大作用。因此,历代的军事家都十分重视将帅的重要作用。如战国时期大军事家孙武,对将帅的作用曾作过如下的描述:“故知兵之将,民之司令,国家安危之主也”。^③因此,他对将帅提出了五个条件“智、信、仁、勇、严”。^④百年后的孙臆,更进一步发展了其先祖的思想,他说,将肩负着“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⑤的重任。也就是说,将帅任用的是否得当,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君王、人民命运的大事。因此,他在自己的兵法著作中,用《将义》、《将德》、《将损》、《将失》四个专篇论述了将帅的问题。并在孙武提出的将帅的五个条件上,有了新的改进,他保留了孙武提出的

“智、信、仁”，而将孙武的“严”改为“义”，“勇”改为“德”。“德”，就是高尚的品德，这可能是积累了他与庞涓多年交往的经验总结。这一字的改动，十分重要。把将帅所应具备的条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如此重视将帅，后来的兵家也是如此。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不正是为求一将而不惜劳累奔波的典型吗！从反面来看，街亭的失守，不也正是因为诸葛亮错用了马谡吗！

在军事上将帅的选拔是如此重要，当代工厂、企业中厂长、经理的选拔也是如此。

我们的时代，正处在改革的时代。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要实现 2000 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第二步宏伟战略目标的关键，就是要充分发挥各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效益。工厂、企业的经济效益能否搞上去，厂长或经理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改革的大潮中，许多实际例子证明，一个企业、一个工厂的兴衰，往往在其厂长或经理任用的是否得当。一个好的厂长可以将濒临倒闭的厂子起死回生，给工厂企业带来了繁荣昌盛和活力，用人不当也可能将一个好的企业推到破产的边缘。人们大概还都记得河北省石家庄市造纸厂厂长马胜利的事迹吧。他在承包河北省石家庄市造纸厂时，该厂已经三年没有给国家交一分钱了，反而吃国家补贴 15 万 7 千多元，并常为发不出工资而发愁。实际上这个厂的资金上有千万元，国家要是拿去存银行，坐收利息，一年也可收 40 多万。但开工生产反而赔钱。马胜利承包的就是这样一个厂，他上任后，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仅仅一年的时间，就使一个吃国家补贴的工厂当年盈利 140 万元。^⑥当你穿起长城牌风雨衣的时候，也许你还记得北京长城风雨衣公司经理张洁世同志的名子。他在当选为北京市第三服装厂厂长时，所面临的也不是一条铺满鲜花的坦途，而是一个濒于“挨饿”的困

境。该厂生产了十六年的产品——棉服,严重滞销,订货锐减。在“危难”中,张洁世带领厂领导班子作出决策,转产风雨衣,硬是在改革中“杀”出一条生路。他们生产的“长城牌”风雨衣,畅销于国内56个大中城市,远销美国、日本、法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24.3%,创利税平均每年递增20.7%。使濒于“挨饿”的市服装三厂在改革的道路上腾飞起来了^⑦。这两个企业从濒临倒闭到为国家创造出上百万元的经济效益的变化过程,不是可以充分看出工厂、企业中厂长、经理选任的重要性吗!没有马胜利、张洁世这样的厂长、经理,国家就没有这笔经济效益,这两个厂的工人就仍然领不到工资,就要“挨饿”。这不正是孙膑“安万乘国……全万乘之民命”思想的具体体现吗!因此,拥有工厂、企业厂长、经理选任决策权的领导机关,对此是绝不可掉以轻心的。

二、从《孙膑兵法》看厂长经理应具备的条件

将帅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败,进而关系到国家、君王和人民的命运,因此,将帅的选拔必须十分慎重。先秦的诸多兵家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总结出了将帅必备的诸多条件,作为选拔将帅的标准。孙武提出“智、信、仁、勇、严”五个条件。孙膑发展为“义、仁、德、信、智”。这些条件对于我们今天工厂企业中厂长经理的选拔也是有其重要指导意义的。特别是《企业法》制定之后,不仅加重了厂长、经理的担子,也扩大了厂长经理的权力,这就进一步增加了选任厂长、经理的严肃性。

所谓“义”就是要认真负责地准确地去做每一件事。《礼记·中庸》曰:“义者,宜也。”^⑧宜,就是适宜、合适,准确的意思。《企业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企业建厂以厂长为首的生产经营管理系统。厂长在企业中处于中心地位,对企业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

负有全面责任”。即企业的命运、职工的命运维系于厂长一身。由此可见厂长、经理在企业中责任之重大。如果一个厂长或经理不认真负责的、准确无误的去工作,而是玩忽职守,庇漏百出,这个企业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给工人群众带来的将是什么后果,是不难想象的。

所谓“仁”,就是要爱护工人群众。“仁”者,爱人也,具体到将帅来说就是要爱护士卒。孙臬指出,将帅对待士卒“视之若赤子,爱之若狡童,敬之若严师”。^⑨只有这样,到战时“用之若土芥”时,士卒才无怨恨之心,肯于卖命杀敌,就可以克敌至胜,战功赫赫。厂长肩负着搞好企业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这些任务靠谁来完成呢?只有依靠全厂广大职工群众。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人就是浑身是铁也拈不了几根钉。工人群众是工厂的最基本的力量。作为一厂之长,必须要爱护工厂群众,关心他们的生活疾苦,想工人所想,急工人所急。这样就可以成为工人群众的贴心人。马胜利、张洁世二位同志也正是这样做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为企业的繁荣昌盛去拼搏、去奋斗。否则,就会倒向反面。因此,孙臬警告说:“将者不可以不佬,不仁则军不克,军不克则军无功”。^⑩这是每个厂长、经理都应牢记的。

所谓“德”,指将帅应具备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从《孙臬兵法》之《将德》篇可以看出“德”包括以下内容:(1)爱护士卒,即“视之若赤子,爱之若狡童”;(2)不轻敌,不惧敌,始终如一的对待敌人,即“不轻寡,不劫于敌,慎始若终”;(3)有同敌人血战到底,势不两立的英雄气概,即“将不两生,军不两存”;(4)大公无私,赏罚严明而及时,不分亲疏贵贱,不屈从于外来压力,即“赏不逾日,罚不还面,不唯其人,不何(阿)外辰(震)”。^⑪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品德,才可为将帅。这样的品德,更是厂长、经理所不可缺

少的。要完成任务,首先就是要爱护工人群众,不是专横拔扈欺压工人群众;其次是有敢于担当重任,不骄不馁,顽强拼搏,坚决完成任务的英雄气概;第三,企业法规定,厂长有“任免或聘任、解聘企业中层行政领导干部”的权力,有“依法奖惩职工,提请政府主管部门奖惩副厂长级行政领导干部”的权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厂长,必须大公无私,赏罚严明,不管亲疏,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并且要敢于顶住外来的“说情”和“权力”的干预,有过则罚,绝不能看人下菜碟,也就是孙臆所说“不唯其人”、“不何(阿)外辰(震)”。要真正达到这一标准也是不容易的。

所谓“信”,即要讲信誉,要说到做到,不失信。只有这样,才能统一调动指挥士卒,取得战争的胜利。正如孙臆所说:“将者不可以不信,不信则令不行,令不行则军不精,军不精则无名。”^④

所谓“智”,是指将帅高度的智慧,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指挥才能。战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方案,战时能临机决断地指挥战争。对于企业的厂长经理来说,这个条件也十分重要。《企业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一)经营方针,长远规则和年度计划,基本建设方案和重大技术改造方案,职工培训计划,工资调整方案,留用资金分配和使用方案,承包和租凭责任制方案。(二)工资列入企业成本开支的企业人员编制和行政机构的设置和调整。(三)制定、修改和废除重要规章制度的方案。上述重大问题的讨论方案,均由厂长提出。从上述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一个厂长没有高度的智慧、渊博的知识,高瞻远瞩的胸怀是难以提出上述方案的。“北京长城风雨衣公司由一个只生产棉服、濒临倒闭的小厂而发展为一个联合大企业,不正是因为其经理张洁世高瞻远瞩制定了转产风雨衣的方案吗?陕西“太阳牌”锅巴,所以风靡一时,不正是因为他们的厂长看准了广阔的儿童市场吗?当别的厂长也相继而起生产锅巴时,“太阳牌”锅巴生产厂家的厂长,又想出新的高招,生

产别的产品了。所以他们能够使企业蒸蒸日上,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些厂长的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出,他们不仅有高度的智慧、渊博的知识,可以制定长远的、年度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的等各种规划方案,而且还有高超的领导组织才能,能够机智果断地、正确地指挥工人群众胜利地去实现这些规划。因此我们所要求的厂长,必须要有大智大勇,能够在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上开拓前进。实际上,将上述条件归纳起来,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企业领导干部应具备的高尚的政治素质,渊博的业务知识、高度的现代管理能力。一个工厂的厂长或企业的经理,只有具备上述条件时,才能使厂长企业繁荣昌盛,立于不败之地。如果一个厂长或经理,在当前改革的大潮中,依然是闭关锁国、默守陈规,鼠目寸光,抱着原来的铁饭碗讨饭吃,或者坐吃山空,那么他就不称职!

三、从《孙膑兵法》看选拔厂长、经理的原则

厂长、经理在企业中的重要性以及他们所担负的责任,启示我们:工厂、企业中厂长经理的选任,必须按原则办事。关于厂长、经理应具备的条件,我们已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那么政府部门的决策机关应根据什么原则来选任现代化工厂企业的厂长经理呢?

《孙膑兵法》中,连续用《将义》、《将德》、《将败》、《将失》四个篇幅,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为将的条件,这就从正反两方面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可用,什么样的人不可用。字里行间贯串着“选贤任能”的唯物主义思想。也就是他在《行篡》篇中所说:“用兵移民之道,权衡也。权衡,所以篡贤取良也。”“正衡再累……既忠,是谓不穷。”^①“正衡”,就是要放平衡器,“再累”,就是要翻复减法码,一直到指针指到中间为止。这样就能选拔出合格的将帅。他在《将德》中又指出:“将能而君不御者,胜”。^②这与“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驾御将帅的要求要给以将帅以相当

自由指挥的权力,不能牵扯分散他们的精力,这就要求君主给予将帅极大的信任,不能听到任何的闲言碎语,就对将帅产生疑心,而过多的干预他们的行动。

根据孙臆以上选拔将帅的方法和条件,可以将我们今天选拔工厂企业中厂长、经理的原则概括为四条:

一、“唯贤是用”。所谓“贤”,就是要具备高尚的政治品德,良好的政治素质。对党忠贞不二,对国家人民富有极强的责任心,正直坦荡,不搞阴谋鬼计,公政廉明,不偏私和腐败等。只要具备上述条件,不管亲疏远近,决策者就要大胆任用。坚决摒弃“任人唯亲”的不良作风。

二、“唯才是用”。所谓才,就是良好的业务素质。也就是孙臆所说的“智”。更具体一点说就是必须具备的某个工厂企业的专业知识。任纺织系统的工厂企业的厂长经理,必须是懂纺织的。机械系统的厂长经理,要懂机械生产过程中的业务知识。在厂长、经理这个职务上,要坚决改变“外行领导内行”的作法,(书记任用当作别论)。另一层意思就是用才要得当。学航空的,你不能让他去搞农业,学造汽车的,你不能让他去生产面包。在我们现实社会中,往往有用才不当的现象产生,这样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所学的专长,实际上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封建社会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对这一问题已有所认识。如清代诗人顾嗣协曾写过这样一首诗:“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我想,这首诗对我们今天的用人问题也是有一定指导意义的。

三、“唯能是用”。“能”是指其领导才能。也就是高超的现代管理能力。今天的工厂企业和改革开放前有了很大变化。管理上大部分实行了承包制,经营上,开始商企挂钩,分配上,由原来的“铁饭碗”,变成了“泥饭碗”。特别是厂与厂之间的自由竞争,进一

步促进了工厂企业的新陈代谢。为保证自己的工厂立于不败之地,要进行技术改造,要更新设备,要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上述诸多因素,都要求我们的厂长和经理,必须具备现代化的管理能力。他要有远见卓识,善于用人,并能协调好各种关系,能够娴熟地组织和指挥工厂企业的生产。否则,工厂企业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四、“用而不疑,疑而不用”。这条原则不仅不是可有可无,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厂长要指挥一个大、中型工厂的生产,所面临的不单单是生产问题。诸如工人的生活福利,原材料的来源,产品的销售等。在目前管理机制不很健全的情况下,为了保证生产前线原材料的供应,为了打开产品的销路,厂长很可能要采取一些必须但是合理不合法的措施。对这些问题如何看待?在处理工人的工资、生产福利和待遇中,是一人难称百人心的。特别是那些在“大锅饭”、“铁饭碗”的时候养成偷懒磨滑的坏习气的人,对待“奖勤罚懒”、“多劳多得”的分配方案是不适应、不满意的。要改革中层领导班子,实行优化组合。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所谓“中层领导”,也是不愿意让位的。这种种势力必然会行成企业中改革开放的反对派。他们会抓住厂长、经理工作中的不可避免的失误,特别是那些看来似乎是“合理不合法”的所谓罪证,去传播,以败坏厂长经理的威信;去告状,以达到更换厂长经理,恢复其所向往的“大锅饭”、“铁饭碗”之目的。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决策机关应当怎么办?我认为,既然是通过充分权衡,根据条件严格选拔任用或聘任的厂长,就要给予充分的信任。决不能有点风吹草动,就怀疑他们,甚至撤换他们,还要给他们充分的自由指挥企业生产的权力,充分发挥他们的指挥才能。除大政方针,或者违法乱纪的腐败分子之外,一般不要过多的干预工厂企业的事务。这也就是孙膑所说的“将能而君不御”。

笔者对于企业管理,是个十足的门外汉,对于干部的选任更是一窍不通。上述意见,不一定正确,内行人看来,很可能是荒唐的,但这是我读《孙膑兵法》的感受和联想,如实记之。错误之处,望行家批评指正。

注 释

①《孙膑兵法注译》沈阳军区后勤部《孙膑兵法》注译组 1975 年内部版第 164—165 页。

②同①第 48 页。

③《诸子集成·孙子十家注》上海书店,1986 年影印版第六册第 33 页。

④同③第 7 页。

⑤同①第 60 页。

⑥《先锋颂》中《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局编,新华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8—35 页。

⑦《先锋颂》中《他为事业燃烧》第 17—25 页。

⑧《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431 页。

⑨同①第 168 页。

⑩同①第 164 页。

⑪同①第 167—168 页。

⑫同①第 165 页。

⑬同①第 34 页。

⑭同①第 169 页。

原载陆嘉玉、姚梁彦主编《谋略与竞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2 年版

“桂陵”擒与“马陵”自刭考

魏 聊

《史记·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孙子吴起列传》载梁惠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战,但未提及庞涓,而在其后十三年(公元前341年)的马陵之战,称庞涓战败,“自刭死”之后,马陵之战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例而倍受历代军事家的推崇。但是,关于庞涓,《战国策·齐策一》则记载:“田忌为齐将,系梁太子申,擒庞涓。”此说因资料甚少,所以多年来影响也微。1972年4月,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了一号、二号汉墓,发现了《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等大批竹简残片,这两种兵法的同时出土不仅解决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大悬案,而且,《孙臆兵法》中有《擒庞涓》一篇,文中明确记载有“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擒庞涓”^①这样一来,庞涓是桂陵之战被擒还是马陵之战自刭的问题就明朗化了。但是《史记》记载的马陵之战影响甚大,“庞涓死此树下”那戏剧性的情节众人皆知。今日之戏剧、电影仍对此大肆渲染,所以,进一步澄清这一历史事件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孙臆兵法》是最可靠、最具权威性的史料

竹简兵书《孙臆兵法》长期埋于地下,保证了史料的可靠性、权威性。许多长期流传于世的史书散失、补作、篡改是常有的事,《史记》就有这一类情况。从银雀山一号墓发掘情况的简报可知,此墓没有被盗或年代扰乱现象,也就是说,这批竹简在西汉早期以前曾

流传于世,但之后这批竹简埋进墓葬,到1972年这二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封闭在地下,从而也极好的保证了这批史料的纯洁性。在1972年以前,也就是这批竹简出土以前,《孙子兵法》与《孙臆兵法》的关系,孙子与孙臆的关系,庞涓是被擒还是自刭均是历史悬案,无有铁证。银雀山西汉一号墓竹简的出土,使世人不得不承认孙臆与《孙臆兵法》的存在。而且,《孙臆兵法》中有《擒庞涓》一篇,且是《孙臆兵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承认了《孙臆兵法》,那么就必须承认《擒庞涓》、《孙臆兵法》理所当然地成为证明孙臆、庞涓等人生平最可信、最有权威的史料,据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桂陵之战擒庞涓应是历史事实。

二、竹简《孙臆兵法》的年代早于《史记》的成书年代

银雀山西汉一号墓虽然没有明确纪年的出土物,但是在《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等竹简的简报》^②中,一号墓的年代,早就做了很有说服力的结论。文章是这样论述的:“从这些器物(指出土物)的形制、纹饰、风格等特点和墓坑形制来看,可以断定这是两座西汉前期的墓葬。特别是鼎、盒、壶、罐等陶器组合的出现,更证明了这一点,这两座墓葬的年代,在一号和二号墓出土的‘半两钱’和一号墓出土的‘三铢钱’,更是有力的见证。《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始铸‘三铢钱’,到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停罢’,流通的时间很短,由此可以进一步断定,一号墓的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建元元年。这座墓葬里还出土了‘半两钱’,而没发现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始铸的‘五铢钱’。在此墓葬中没有见到‘五铢钱’,似非偶然,由此可以推断墓葬年代的下限,不会晚于元狩五年。”那么,书简的书写年代就会更早了。许获先生认为:“至迟在汉文帝即位(公元前179年)以

前,还有可能在秦楚之际(公元前 209 年—203 年)”。^③而司马迁是在 42 岁时,也就是汉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才开始他的著述工作。^④天汉二年(公元前 99 年)受宫刑,前后共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史记》。而且,到班固写《汉书》的时候,《史记》已缺十篇,由后人补作。由此可知,银雀山西汉一号墓年代的下限早于司马迁著述《史记》年代的上限,而竹简《孙臆兵法》的书写年代更远远早于《史记》的写作年代。甄别历史资料有一个最一般的常识,那就是与历史事件发生时间较近的史料更为可信,《孙臆兵法》的记载比《史记》的记载更为可信这一命题恐怕没有什么疑问了吧?

三、《孙臆兵法》的失传年代是西汉中期

司马迁以治史态度严谨闻名于世,为什么会在《史记》中称庞涓战败“自刭死”呢?这就涉及到《孙臆兵法》的失传问题,大致可做出如下推断:《孙臆兵法》祖述《孙子》十三篇的兵法思想,但还有一部分论阵势,论将略,对《孙子》有所发展,这样的兵家立国之书,当然会被前代人视为珍宝异书,受到格外的珍藏,因而收藏者一般不会外传。当时又无印刷之术,诸子之书全靠人抄手写,所以收藏此类书的人数极少,例如这批竹简兵书的收藏者银雀山西汉一号墓的主人只会是“关于兵法或与军事有关的人物”^⑤。七十年代,有些学者曾认为《孙臆兵法》的失传年代当在汉末或三国时期,其理由是,汉末曹操注《孙子》十三篇未论及孙臆兵法,而现在根据司马迁《史记》误说分析,也许在西汉中期,《孙臆兵法》就在世上失传了,所以,才会有庞涓马陵道战败“自刭死”的千古错案。

注 释

①《孙臆兵法》,文物出版社,1975 年,第 70 页。

②《文物》，文物出版社，1974年第2期，第19页。

③《略谈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古代兵书残简》，《文物》1974年第2期，第30页。

④《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60页。

⑤《临沂汉简概述》，《文物》1974年第2期，第33页。

曹植出生在莘县朝城考

刘玉新

关于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曹植的出生地问题,史无记载,笔者曾留心查阅了部分有关史料和年谱,也未见个子丑寅卯,只知他卒于魏明帝(曹睿)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十一月庚寅,时年41岁。后人以此上溯41年至汉献帝(刘协)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定为曹植的生年,这无可非议。但曹植出生在何处?至今还是一个迷。

考察曹植的出生地,首先要了解其父母当时的行迹。也就是说,当时其父曹操及家眷居住在哪里?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汉初平二年“袁绍因表太祖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三年春,太祖军顿丘,毒等攻东武阳。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闻之,弃武阳还”。“夏四月,司徒王允与吕布共杀卓”,鲍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四年春,军鄄城”。

由以上这段记载看,其中有两个地方值得注意,一是东武阳,一是鄄城。东武阳为东郡治所,而鄄城则为兖州治所。臧励和主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有详载。其《东郡》条:“秦取魏地置东郡。前直隶大名府、山东东昌府及长清以西皆是……治濮阳,在今直隶濮阳县南。晋废。后汉初平中尝治武阳。臧洪为太守,又治东武阳。”又《东武阳》条:“汉置县。应劭曰:‘武水之阳。’后汉初平二年,袁绍表曹操为东郡太守,治武阳。又臧洪为东郡太守,治

东武阳。”《水经注》：“漯水迳武阳新城东，曹操所治。又东北迳武阳故城南，臧洪治此。后魏曰武阳县，唐曰朝城。故城在今山东朝城县西四十里。”又《兖州》条：“后汉兖州治昌邑，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四十里，后徙治鄆，在今山东濮县东二十里。三国魏因之。”

综上所述，曹操于初平二年（公元191年）为东郡太守，治所在东武阳。后为兖州牧，至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春，才移军居鄆城。那么从初平二年至四年春期间，曹操居住在东武阳无疑了（其中虽曾一度军顿丘，但那只是暂时的）。若不“三年春，太祖军顿丘”时，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于毒等不会乘机去攻打东武阳。由此可见东武阳为曹操当时的居住地。曹操既然居住在东武阳，那么其家眷必然亦居住在此。这因为曹操在汉献帝六年（公元189年）“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三国志·武帝纪》）后，就再也没回过老家谯地（今安徽省亳州市），家眷亦随军转战四方（曹植亦曾说自己“生乎乱，长乎军”可证）。至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曹植既然出生于初平三年，那么这时正值曹操及其家眷居住在东武阳之际。因此，曹植的出生地就在东武阳，即今山东省莘县朝城。

也谈曹植出生地

孙淮生 陈清义

《聊城日报》1994年1月27日第三版上刊登了一篇署名刘玉新先生写的关于曹植出生地的文章。文中列举了《三国志》中记载曹操曾任东郡太守的时间,由此推算出曹植出生于汉献帝初平三年的“东武阳城,即今之朝城”。为研究曹氏父子提出了新的观点,同时也为建安文学及建安史学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新的依据。但对曹植的出生地问题,除同意玉新先生的观点外,还有一点必不可少的补充。

莘县朝城据《朝城县志》和《南乐县志》载:春秋时,齐桓公曾率诸侯在朝城筑台朝会周天子,所筑之台曰朝会台,今朝城西土丘尚在,据说便是朝会台故址。汉代,朝城初置县,曰东武阳,贞观十七年,东武阳城废。1938年,笔者在进行全区文物普查时,有幸在朝城西约1公里的地方,当地群众俗称“孟洼”,发现地面上有许多砖瓦、罐片,从这些遗物分析考证,多为东汉时期,进而观察这片洼地呈正方形,边长约0.75公里,很象一个废弃的古城址。经过调查,我们还发现,在洼地西南约1公里的地方有一土冢,高达5米,径约50米,土冢内砖室墓门已暴露,也为东汉时期型制,该墓以西,还有数座现无封土的汉墓。

通过以上科学的观察与考证,群众说的“孟洼”,就是曹操曾驻守过的东武阳城。如果曹植是出生于东武阳的话,也不是今天的朝城,而应是莘县朝城西约1公里的“孟洼”。

曹植在东阿事迹考索

刘玉新

关于曹植任东阿王期间的事迹情况,史料乏载。为弥补阙如,1991年我曾撰写了一篇《从民间传说谈曹植在东阿》的文章,提交在河北邯郸市召开的全国第三次建安文学学术讨论会。会后,为进一步弄清曹植在东阿这段时间的具体情况,又做了大量的考索工作。塞翁失马,从中倒也获得部分信息材料。现整理如下,以供参考。

一、曹植任东阿王的起止时间

关于曹植任东阿王的时间,陈寿《三国志·陈思王植传》载,太和“三年,徙封东阿”。没有详细月份。查《资治通鉴》卷七十一太和三年十二月“雍邱王植徙封东阿”。可获知曹植是在魏明帝(曹睿)太和三年(229)十二月由雍邱(今河南省杞县)迁徙来到东阿的。其迁徙的原因,曹植在其《转封东阿王谢表》中写的明白:“奉诏:‘太皇太后念雍邱下湿少桑,欲转东阿,当合王意。可遣人按行,知可居不?’……臣在雍邱,劬劳五年,左右罢息,居业向定。果园万株,枝条始茂,私情区区,实所重弃,然桑田无业,左右贫穷,食裁糊口,形有裸露。臣闻古之仁君,必有弃国以为百姓。况乃转居沃土,人从蒙福。江海所流,无地不润;云雨所加,无物不茂……”在其《社颂序》中曰:“余前封鄄城侯,转雍邱,皆遇荒土。宅宇初造,以府库尚丰,志在缮宫室务园圃而已,农桑一无所营。经历十

载,块然守空,饥寒备尝。圣朝愍之,故封此县。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故封此桑,以为田社。”由此可以看出,曹植由“下湿少桑”的雍邱来到“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的东阿,这是曹魏统治者对他的照顾了。那么他是什么时间离开东阿的呢?《三国志·陈思王植传》载,太和五年“其年冬,诏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陈前四县封植为陈王,邑三千五百户”。由此可见,曹植是太和五年(231)冬,奉诏离开东阿入京朝正月。太和六年(232)二月迁徙陈地为王(今河南省淮阳县)。曹植在东阿的具体时间为太和三年十二月至太和六年二月,只有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那么真正在东阿,只有两年整。那就是太和五年冬入朝后没有再回到东阿。因为朝六年正月后,二月既徙封陈前四县为陈王。

二、曹植任东阿王时的地望

关于曹植任东阿王时的地望,不是今天的东阿县城—铜城镇;也不是建国前的旧东阿县城—平阴县东阿镇,而是地处阳谷县城东北五十余华里的阿城镇。臧励和主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东阿县》条记载:“春秋齐柯邑……秦时谓之东阿。汉置东阿县。故城在山东阳谷县东北五十里。即今阿城镇。宋徙废。”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文物普查时,发现阿城镇西北三里余有一大土丘,当地称之为城岭子,上存高达丈余的旧城垣。初步鉴定为一处原始社会晚期的氏族村落遗址。此地即宋以前的东阿故城址,也就是曹植曾做过东阿王的地方。

三、曹植任东阿王期间的待遇情况

关于曹植任东阿王期间的待遇情况,据《三国志·陈思王植传》记载,食户为三千。与雍邱王时同。然“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

僚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这在曹植《求免取士息表》中记载的比较详细：“……臣初受封，策书曰：‘植受兹青社，封于东土，以屏翰皇家，为魏藩辅。’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顺，或不踰距，虎贲官骑及亲事凡二百余人。正复不老，皆使年壮，备有不虞，检校乘城，顾不足以自救，况皆复耄耋罢曳乎？而名为魏东藩，使屏翰王室，臣窃自羞矣。就之诸国，国有士子，合不过五百人，伏以为三军益损，不负赖此。方外不定，必当须辨者，臣愿将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负襁，子弟怀粮，蹈锋履刃，以徇国难，何但习业小儿哉？愚诚以挥涕增河，鼯鼠饮海，于朝万无损益，于臣家计甚有废损。又臣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儿，七八岁已上，十六七已还，三十余人。今部曲则年耆，卧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视，气息裁属者，凡三十七人；疲癯风靡，疣盲聋聩者，二十三人。惟正须此小儿，大者可备宿卫，虽不足以御寇，粗可以警小盗；小者未堪大使，为可使耘耜秽草，驱护鸟雀。休侯人则一事废，一日猎则众业散，不亲自经营则功不摄，常自躬亲，不委下吏而已……”由此可以看出曹植当时潦倒窘迫之状。正如《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记载的那样：“魏武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圜圉；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注引《袁子》曰：“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既违宗国藩屏之义，又亏亲戚骨肉之恩。”

四、曹植在鱼山“闻梵”与“步虚声”

谈到曹植在东阿，必然让人想到他在鱼山闻梵的故事。过去

总以为是荒诞离奇的无稽之谈,但却从其对佛、道两家所起的影响,理应刮目相看矣。

曹植在鱼山闻梵,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四中记载:“又至魏时,陈思王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幼合珪璋,十岁属文,下笔便成,初不改定。世间术艺,无不毕善。邯鄲淳见而骇服,称为天人。植每读佛经,辄流连嗟玩,以为至道之宗极也。遂制转赞七声,升降曲折之响,世之讽诵,咸宪章焉。尝游鱼山,忽听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独听良久,而侍御皆闻。植深感神理,弥悟法应,及摹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梵声显世,始于此焉。其所传呗,凡有六契。”

释慧皎《高僧传·经师论》载:“自大教东流,乃释文者众,而传声益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促,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以金言有译,梵响无授。始有魏陈思王深爱声律,属意经音,既通般遮之瑞响,又感鱼山之神制,于是删治《瑞应本起》,以为学者之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其后帛桥支俞,亦云祖述陈思,而爱好通灵,别感神制,裁变古声,所存一千而已……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弦管,五众既与俗违,故宜以声曲为妙。原夫梵呗之起,亦肇自陈思。”

刘敬叔《异苑》卷五载:“陈思王曹植,字子建。尝登鱼山,临东阿,忽闻崖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远谷流响,肃然有灵气,不觉敛衿祇敬,便有终焉之志,即效而则之。今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一云陈思王游鱼山,忽闻空里诵经声,清远遒亮,解音者则而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也。”

从以上记载看,由于曹植在东阿鱼山闻听梵响,佛教徒则以为“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梵呗”者,“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弦管。”(《高僧传》卷十三)。任

继愈进一步解释道：“而《梵呗》则是据佛经所作的偈颂，也供歌咏之用，大概都注上音韵，歌咏时可伴之以管弦。用这种形式传教，普及佛教教义，是容易吸引民众的。”（《中国佛教史》第1卷）故尔“传声则三千有余”。而道家者对曹植鱼山闻梵，则以为“解音者则而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也”。“步虚声”，《辞海》解释为：“道士诵经礼赞时的一种腔调。据称这种腔调宛如众仙缥缈步行虚空歌颂之声。”因此，唐朝诗人张藉在《送吴炼师归王屋》诗中写道：“却到瑶坛上头宿，应闻空里步虚声”。王建在《赠王处士》诗中亦有“道士写将行气法，家童授于步虚词”句。由此可见，曹植在鱼山闻梵的故事，对佛、道两家都起到了一定影响。所以已故著名学者逯钦立在其《四声考》一文中这样写道：“陈思鱼山之事，是否属实，姑可不论。惟刘敬叔晋、宋间人，其著《异苑》，已谓‘解音者则而写之，为神仙之声；道士效之为步虚声’云云，此步虚诸谱东晋已行之左证。又《异苑》于乐谱之制，神仙步虚相提并论，则尤堪注意。考佛曲鱼山十二调子，其中之一为神仙调，大藏经鱼山私抄载之，可以参看。敬叔云神仙声者指此；盖刘氏本言‘今之梵响，皆植依拟所制’也。据此，释道乐谱本出于同源，故皆托始于陈王；神仙步虚其双方之代表也。”（《汉魏六朝文学论集》）

以上为有关曹植在东阿期间的部分佐证材料，笔者稍加系统整理而已。但囿于资料贫乏，难于旁征博引，只能做点浅尝辄止的工作。祁方家匡正。

曹植死因勾沉

刘玉新

关于曹植的病因死因,诸多史书,无及详披。凡谈及此一事者,乃含乎其词,道不出个子丑寅卯所以然来。就是陈寿的《三国志·陈思王植传》,也以其“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之笼统词语塞而搪之。患何“疾”而薨,不得而知。因此,后人不加思索,一再引用或引申。诸如“十一年里频频徙都,汲汲无欢,遂发疾而薨”,^①“卒使植愤闷发疾以死”^②云云,遂成定式,无人发指。闲来翻书,偶尔在《太平御览》卷三七六摘引《魏略》一书中,发现这样一条记载:

“陈思王精意著作,食饮损减,得反胃病”。为之一怔,顿开茅塞。心下窃喜,真乃孤陋寡闻,这不是一条颇具说服力的佐证吗?

中医学理论谓:反胃之疾,乃饮食入胃,经过良久,复由胃反出之病。临床特点为:饮食之后,宿谷不化,脘腹胀闷,自感难忍而复吐,或朝食暮吐,或暮食朝吐,吐出之物,完谷不化。寻其病因,大致有四,仅择其二。一、饮食不节,恣食生冷,饥饱不均,或劳役过度,皆损伤脾胃。胃伤则不能纳,脾伤则不能化,二者俱伤,纳化皆难,宿食痰饮动扰脾胃,因致斯疾。二、嗜酒大甚,酷饮无度,伤于酒湿。凡饮酒过多,酒毒溃于肠胃。酒性有毒而大热,其毒热之气,渗溢经络,浸溃脏腑,损伤胃气而为反胃。^③

纵观曹植一生非同常人的生活遭遇,不难让人对他的病死因再产生别的臆想,他一生恣肆纵酒,无有节度,几乎送了性命。请看《三国志·陈思王植传》中的记载:

“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

“(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

“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

再者由于政治的倾轧，“豆萁”的相煎，使得他空怀“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④的壮烈激情，而成为曹魏统治集团的阶下囚。

曹植就是在这种诚惶诚恐、惴惴不安的心情下，过着为布衣而不能得的“囹圄”生活，怎能不使他郁闷愤懑、汲汲无欢而损伤脾胃？因此，在太和五年(231)冬“诏诸王朝”之时，魏明帝见到曹植如此潦倒之状，甚为惊讶：“王颜色瘦弱，何意也？腹中调和不？今者食几许米，又啖肉多少？见王瘦，吾惊甚，宜当节水加食。”^⑤于是乎，惻隐之心偶发，赐给阿叔曹植一些食品，以做补偿。为此，曹植还写了一道《谢明帝赐食表》：

“近得赐御食，拜表谢恩。寻奉手诒，悯臣瘦弱。奉诏之日，涕泣横流……”^⑥以示感戴。

曹植生性纵酒无度，加之豆萁相煎造成的心灵创伤，及其颠沛流离的囚徒生活，不能不使他在精神上增添沉重的负担，以至于整日里郁闷不乐，借酒浇愁，亦严重的破坏了他的生理平衡。他曾写过一篇《释愁文》，以求仙问道的笔法，暗示出自己当时的生活及疾病情形：“予以愁惨，行吟路边，形容枯悴，忧心如醉，有玄灵先生见而问曰：‘予将何疾以至于斯？’答曰：‘吾所病者，愁也。’先生曰：‘愁是何物，而能病子乎？’答曰：‘愁之为物，唯惚唯恍，不召自来，推之弗往，寻之不知其际，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长夜，或群或党，去来无方，乱我精爽。其来也难退，其去也易追，临餐困于哽咽，烦冤

毒于酸嘶。加之以粉不泽,饮之以兼肴不肥,温之以金石不消,摩之以神膏不希,授之以巧笑不悦,乐之以丝竹增悲,医和绝思而无措,先生岂能为我著龟乎?’”^⑦

综上所述,参照有关中医学理论,不难看出曹植患反胃病而无疑耶。至于记载中“陈思王精意著作,食饮损减,得反胃病”之说,笔者不敢完全苟同。曹植患反胃之疾,不单单是“精意著作”,更重要的是汲汲无欢,郁闷愤懑,饮酒不节而致。当然,曹植在长期的政治倾轧之中,“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⑧呕心沥血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而加重了他疾病的发作。但事实上不应是疾病的主要根源。因此,“精意著作,食饮损减,得反胃病”之说失之偏颇。

近年来,由于科学的进步与发展,我国的中医学理论也得到发扬光大。根据最新研究成果表明,“……由于不适应的食物或饮料(如烈性酒)长期反复刺激而引起的慢性胃炎,可促使胃粘膜上皮细胞和胃腺管上皮细胞经增生、过增长、异型增生等演变过程,由量变到质变,终于癌化。这一病理组织的演变过程,已为多数研究者所证实。”^⑨笔者窃意,曹植生前大量饮酒。加之心情长期的抑郁寡欢,导致患上了反胃病。那么,假若病情进一步发展,是否引起病理组织的演变而导致癌症病变?若果然,那么曹植应死于胃癌了。因此,存此疑案,求教于专家,以解迷悟。

注 释

(1)拙著:《鱼山曹植墓·隋建〈曹植墓神道碑〉》1990年10月山东友谊书社。

(2)李梦阳:《曹子建集·序》引自《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7页。

(3)参见王其飞:《内科证治·脾胃系统疾病》1990年1月河北人民出版社。

(4)曹植:《与杨德祖书》。见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152页。

(5)转引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引《太平御览》卷第378页、第9474页。

(6)(7)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6月,第474页,第467页。

(8)曹植《与杨德祖书》。见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第153页。

(9)《外科病理学·胃疾病》(上册),1987年10月,湖北人民出版社。

鱼山“渔姑庙”溯源

刘玉新

刘禹锡在《陋室铭》中有这样一句名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座落在九曲黄河岸边的泰岱之余脉一鱼山，因埋葬着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曹植而闻名遐迩。每当人们前去凭吊曹植的陵墓时，当地的百姓就会不厌其烦的给您讲述起一段渔姑庙的建筑轶事。这是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美丽传说，是关于当年做东阿王的曹植和神女渔姑的一段恋情。我曾将此整理编写了一则民间故事：《曹植和渔姑的故事》，收录在《鲁西民间故事》一书中，后又被山东民间文学系列丛书《对诗故事选》一书选录。故事的大体情节是：

相传当年曹植来到东阿后，由于频频迁徙，形如囚徒，心情郁闷，自甘消沉。此时他有幸在鱼山结识了一位名叫渔姑的姑娘，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并在渔姑的感召下，精神振奋，宏业大展。谁知好景不长，渔姑离他而去。原来这渔姑是玉皇大帝的义女，掌管天下的鱼族，因贪恋下界锦绣山河及曹植的才华，私自下凡定居鱼山。因此，每年的桃花汛期，海洋里的鱼儿溯河水而上至鱼山，朝拜渔姑。从此鱼山便由此而得名。后来玉皇老儿得知此事，将渔姑召回天庭。曹植为怀念渔姑，便在鱼山顶上修建了一座渔姑庙，并为渔姑塑了金身，年年香火不断，岁岁游人不绝。

可能有人要问，现今光秃秃的鱼山顶上，只有一堆破砖烂瓦，渔姑庙何处寻？

针对这个问题,我曾三次赴鱼山走访调查。当地百姓告诉我,过去鱼山顶上确曾有过一座渔姑庙,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建筑物,座落在鱼山顶南坡上。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曾一度占据鱼山,并在山顶上修了炮楼。修炮楼所用的砖瓦,据说就是拆的渔姑庙和另外一座镇武庙。

由此看来,鱼山上有座渔姑庙而无疑了。那么渔姑庙相传为曹植怀念渔姑而建,而今已有一千七百余年,可谓一处名胜古迹,人文景观,弄不巧还是一片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哩。我想,既然如此,历史上也应有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我怀着一种探胜访幽的心情,翻阅了大量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均无所获。但却从《全唐诗》中发现了王维《鱼山神女祠歌》二首。现抄录如下:

迎 神

坎坎击鼓,鱼山之下。吹洞箫,望极浦。女巫进,纷屡舞。陈瑶席,湛清醑。风凄凄兮夜雨。不知神之来兮不来,使我心兮苦复苦。

送 神

纷进舞兮堂前,目眷眷兮琼筵。来不言兮意不传,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兮思繁弦,神之驾兮俨欲旋。倏云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潺湲。

《鱼山神女祠歌》题解中还记述这样一段文字:

“张茂先《神女赋序》曰:‘魏济北从事弦超,嘉平中,夜梦神女来,自称天上玉女,姓成公,字智琼,东郡人。早失父母,天地哀其孤苦,令得下嫁。后三四日一来,即乘辎軿,衣罗绮。智琼能隐其

形,不能藏其声,且芬香达于室宇,颇为人知。一旦神女别去,留赠裙衫柄裆’。《述征记》曰:‘魏嘉平中,有神女成公智琼,降弦超,同室疑其有奸,智琼乃绝。后五年,超使将之洛,西至济北鱼山下陷,上,遥望曲道头,有车马,似智琼,果。至洛,克复旧好。’唐王勃《杂曲》曰:‘智琼神女,来访文君。’按《十道志》:鱼山一名吾山。汉武帝过鱼山,作《瓠子歌》云‘吾山平兮巨野溢,是也。’

由以上可见,过去鱼山上曾有座神女祠,所奉祀者为天上玉女成公智琼。并以此引伸出神女智琼与济北从事弦超的一段恋情故事。按其记载论之,故事当发生在魏嘉平中齐王曹芳之时。西晋文士张华(字茂先,公元232-300年)为此还写了一篇《神女赋》以记述其事。至于神女祠始建于何时,已无可考,至少在唐代还存在,故王维登鱼山写下了《鱼山神女祠歌》二首,流传至今。

弦超与神女智琼的恋情故事,虽然是既无文彩又无思想,但不由使人联想到曹植和渔姑的恋情故事。同是人神相恋,同是与鱼山有关,并且发生在同一个时期。一个史不乏载,一个民间流传。这难道不发人深思吗?由此可以看出,曹植和渔姑的故事是由弦超和智琼的故事演变而来的。那么,渔姑庙便是当年的神女祠了。

可为什么在民间只知鱼山上有座渔姑庙,而不知有座神女祠?这与曹植在当地百姓心目中的形象有关。曹植在东阿做了不到三年的藩王,正如我在《从民间传说谈曹植在东阿》(此文提交1991年在河北邯郸召开的全国第三次建安文学学术讨论会论文)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曹植在东阿人民心目中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并奉为神明而加以颂扬、祭祀。时至今日,(曹植)墓前香火不断。这一方面反映了当地百姓仍存有封建迷信思想,祈福于东阿王曹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在默默的纪念这位建安时期的伟大诗魂。”他“在任三年,可称颂的虽无什么辉煌建树,倒也做了一些抑恶扬善的工作。中国人向来有着淳朴善良不记旧恶的优良传统,但对

于所赐予的点滴恩惠,他们是不会忘记的,并做为口语世代相传”。因此,神女智琼变成了渔姑,才华横溢的曹植取代了平平庸庸的弦超,从而流传下一段天方夜谭般的美丽传说。神女祠便理所当然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渔姑庙。约定俗成,世代相沿,流传至今。

汉代的“闹洞房”图

刘玉新

闹洞房,是我国婚姻习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葛洪的《抱朴子》云:“世俗有戏妇之法,于稠众之中,亲属之前,问以丑言,责以慢对,其为鄙黷,不可忍言。”《酉阳杂俎·礼异》云:“近世娶妇之家,弄新妇。”弄新妇,就是闹洞房。三国时期大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在少年时候就参与过一次闹洞房的恶作剧。据《太平广记》卷一九〇引《小说》云:“魏武少时,曾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至!’庐中人皆出观,帝乃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动。帝复大叫:‘偷儿今在此!’绍惶迫自掷出,俱免。”由此看来,闹洞房的习俗,早在汉代就已十分流行。

但闹洞房的内容不仅仅是“弄新妇”、“劫新妇”之类的恶作剧(民俗学中称为“武闹”),尚有不少文明之举(即“文闹”),比如让新郎新娘同时啃一个用红线拴着的水果,让新郎张嘴伸舌去吃含在新娘嘴唇上的瓜粒,借以让新郎新娘当众接吻等。这在汉画像石中就出现过这类内容。如在



山东莒县沈刘庄汉画像石墓中,有一幅被原报告称之为“男女亲吻图”的画像石,就是一幅反映汉代“闹洞房”的实物资料(《山东莒县沈刘庄汉画像石墓》,《考古》1988年9期)。原报告在叙述该画像时说:“下格刻三人,一男一女居中对立,二人引臂相互拥抱,作亲吻状。女子身后一侍女,举手推亲吻女子的头部。此画像男子头上似裹巾幘,身着长衣。女主人及侍女皆梳多髻,或戴花钗。人物的上端似为帷帐,用以表示室内之事。”原报告分析认为:“亲吻图在山东各地出土的汉画像石中还属首见。类似画像,曾见于四川省荣经县东汉石棺左部画像……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可能与当时的神话故事传说有关。”因为原报告者将与该两幅画像相连的另两幅画像人物释为“西王母”,故有相同之说。笔者以为另外两幅画像中的人物是否是“西王母”,则另当别论,就两幅“亲吻图”看,也是有区别的。四川荣经东汉石棺画像的“亲吻图”,为“男女二人相对席地而坐,互相扶拥,为少有的反映家庭室内生活的古代石刻造像”。(《四川荣经东汉石棺画像》,《文物》1987年1期)男女二人应为夫妇,相拥相亲,这是家庭生活中的“私生活”,没有第三者参与,是无所顾忌的。而莒县沈刘庄汉画像石的“亲吻图”则是夫妇之外参入了第三者。参入了第三者,则不能视为“私生活”,而应视为是一种与风俗习惯有关的“游戏活动”,或称为“闹剧”。这种“闹剧”解释为“闹洞房”则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在传统婚俗中,人们普遍认为结婚是人生中比较火爆热闹的一个场面,必须要闹一闹,图个吉利。有句俗语“三日无大小”,说的就是新婚后三天内,不分男女老幼、辈份高低,均可到新房去“闹”一番。否则,“人不闹鬼闹”、“人不听鬼听”(指“听房”)。那就视为不吉利了。莒县沈刘庄汉画像石中的“亲吻图”,则就是这项“活动”的形象反映。

1996年11月在山东临沂召开的中国汉画学会第五届年会期间,笔者有幸实地(莒县博物馆)考察了沈刘庄的汉画像石,仔细观

摩了该幅“亲吻图”，从该图中男女主人的服饰穿戴上，足可窥其为一对新婚夫妇，另外一个人在尽情地取闹，逼迫着新婚夫妇“亲嘴”。这与四川茱萸东汉石棺画像所反映的内容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说，莒县沈刘庄的这幅汉画“亲吻图”，应是一幅“闹洞房图”。是一幅弥足珍贵的反映汉代婚姻习俗的实物资料。

古诗与汉画三题

刘玉新

(一)诗配画

迢迢牵牛星， 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 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 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 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

这是古诗十九首中第十首《迢迢牵牛星》。这首诗以牛郎织女为题材，描写了男女相爱而不能相聚的一个悲哀故事。也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故事之一《牛郎织女》（另三个分别是《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最早的故事雏形。

牛郎和织女原本属于天象中的主要星宿。牛郎星即牛宿，又叫“牵牛星”，是二十八宿之一，为北方玄武宿的第二宿。共有六颗星，其中三颗星相连，组成“一·一·”形状，宛如一个人挑着一副担子在赶路。它是夏秋夜空中著名的亮星，与“织女星”隔银河相对。织女星又叫“天孙”——天帝的孙女。共有三颗星，成等边三角形，在银河西，与银河东的牵牛星相对。早在春秋时期，《诗经·小雅·大东》中就有了牛、女二星的记载：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
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

睨彼牵牛，不以服箱

但尚无故事情节。至汉时出现的古诗《迢迢牵牛星》，才得以将“牛郎织女”人格化、故事化。这为以后《牛郎织女》故事情节的逐渐完善和丰满，奠定了基础。



牛郎织女图

《牛郎织女》，在我国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这不单单口头上流传，书本上记载，还出现在汉代画像石上。比如在河南南阳发现的《牛郎织女图》画像石，其内容为一牧童牵一老牛，牛上方有三颗星连成横直线，为牵牛星；在牵牛星的左下方，有四颗星组成不规则的  形，中间有一高髻女子跽坐，为织女星。这幅画像即正确的反映了牛、织两个星宿的位置，^①又同时形象的反映了牛郎和织女两个故事人物。拿它与《迢迢牵牛星》相对照，足可看成是“诗配画”的最早范例，成功地反映出牛郎织女由天象星宿向传说故事过渡时期的形象写照。这是汉画像石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也是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珍贵资料。

(二)“江南可采莲”

在四川郫县发现的一座东汉砖室墓的画像石棺上，有一幅《采莲图》，图的内容为：荷塘里有一只小船在游动，船周围遍是荷叶和莲花。船上两人分别在船头和船尾，一人似在摇橹，一人似在采

莲,小船的右方,有6只野鸭分两拨向左欢快地凫动。^②整幅画面充满了无限生机和生活情趣。这不由使人想起汉代的乐府民歌《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

该诗生动的描绘了江南荷乡的采莲风光,表现了采莲人的快乐情趣。“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首先把人引入到一个碧叶鲜丽,小舟穿行的江南水乡。它令我们浮想联翩:在一个良辰美景的日子,轻风徐徐,阳光旖旎,采莲人哼着小曲,摇动一叶轻舟,荡漾在碧荷白莲之间,悠闲自得的在采莲。又加之“鱼戏莲叶间”,更给人一种欢快、活泼、心旷神怡的感觉。让人似乎走进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



采莲图

千百年来,《江南》一诗描绘的荷乡风光,一直为人们所憧憬、所向往。这是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四川郫县汉墓石棺上的

《采莲图》，就是人们在追求这种生活的一个形象反映。画像中虽然没出现“鱼戏莲叶间”的动人情景，但取而代之的则是6只自由畅游、活泼可爱的野鸭子。这使整幅画像显得更加生动，充满了十分和谐的生活气息。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不能不说我们的古人在美化自己幸福生活时的匠心独具。

（三）诗情画意

在丰富多彩的汉画中，反映妇女采桑内容的画像比较常见。比如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现的东汉壁画墓石室南壁上的《采桑图》、^③四川成都发现的东汉画像砖中的《采桑图》^④和《桑园图》^⑤等，这一方面说明我国是一个农桑比较发达的国家，有着悠久的蚕桑生产历史，另一方面还反映出汉代的蚕桑业是广大妇女的一项主要生产活动。因此，则出现了象“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东南隅”这首汉代著名的乐府民歌《陌上桑》。

《陌上桑》描述了一位美丽动人的采桑女罗敷拒绝一“使君”纠缠调戏的故事，这首由采桑女而引发的斥责轻薄官吏的诗篇，千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吟咏不衰。拿它与汉画中的《采桑图》相对照，足可让人产生一种具有诗情画意般的感觉。

说到“诗情画意”，不由让人联想到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壁上的一幅画像。画像内容为：一个头戴进贤冠的官吏，上身略前倾，双手抬起，面向右方，正在调戏一个采桑女子。女子左手采桑，右手抬起拒绝调情。桑树下还放着一个盛桑叶的小筐。题榜曰：“鲁秋胡、秋胡妻”。^⑥这是一幅《秋胡戏妻图》。

秋胡戏妻的故事，是人们比较熟悉的。故事最早见于西汉刘向的《列女传》。故事大略：鲁国秋胡娶妻才五天，就到陈国去做官，一去五年才回来。未到家之前，见路旁有一美丽女子在采桑，他就停下车子，挑逗说：“力田不如逢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我这

里有金子,愿给您。”女子说:“我采桑力作,衣食自给,奉养二老,不需您的金子。”秋胡讨了个没趣。回到家中,拜见了母亲。母亲叫人把媳妇唤来。一见,正是刚才那个采桑的女子,秋胡很尴尬,妻子也非常气愤,觉得他丈夫品行太污秽了,于是投河而死。“后人哀而赋之,为《秋胡行》。^⑦”



秋胡戏妻图

《秋胡行》是晋代诗人付玄根据《列女传》中《秋胡戏妻》的故事改编的一首相和歌辞。辞曰:

秋胡纳令室,三日宦他乡。皎皎洁妇姿,泠泠守空房。燕婉不终夕,别如参与商。忧来犹四海,易感难可防。人言生日短,愁者苦夜长。百草杨春华,攘腕采柔桑。素手寻繁枝,落叶不盈筐。罗衣翳玉体,回目流采章。君子倦仕归,车马如龙骧。精诚驰万里,

既至两相忘。行人悦令颜，借息此树旁。诱以逢卿喻，遂下黄金装。烈烈贞女忿，言辞历秋霜。长驱及居室，奉金升北堂。母立呼妇来，欢乐情未央。秋胡见此妇，惕然怀探汤。负心岂不惭，永誓非所望。清浊自异源，鳧凤不并翔。引身赴长流，果哉洁妇肠！彼夫既不淑，此妇亦太刚。

读一读付玄的这首《秋胡行》，再看一看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上的《秋胡戏妻图》，不是充溢浓郁的诗情画意吗？

注 释

- ①周到《南阳汉画像石中的几幅天象图》。《考古》1975年1期。
- ②《四川郫县汉砖墓的石棺画像》、《考古》1979年6期。
- ③《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文物》1974年1期。
- ④《成都市出土东汉画像砖》、《考古与文物》1982年1期。
- ⑤刘志远《四川汉代画像砖反映的社会生活》、《文物》1975年4期。
- ⑥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
- ⑦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36，中华书局1979年版。

汉画撷英拾趣

刘玉新

一、农耕图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从史前时期的刀耕火种,北辛文化时期的锄耕、春秋战国时期的铁制农具、两汉时期的牛耕,到今天的农业机械化,这一个个的由低级到高级的跳跃式发展,无不伴随着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辛苦和勤劳。这无疑也是人类历史向前进步的一个个伟大标志。反映在汉画中的一幅幅牛耕图,足以说明中国农业文明在发展进程中的辉煌一页。

江苏省泗洪重岗汉画像石中的《农耕图》:共有农夫五人,上面是牛耕。二犍牛抬杠,共拉一犁,前有一人用绳牵牛,后有一人扶犁;下面为播种,前一人左手挎笆斗,右手撒种,两人在后,用长柄耙子平整土地。五位农夫相互配合,使耕作、整地和播种等农活有机的结合起来,形象地展现了汉代农业生产的图景(《江苏泗洪重岗汉画像石墓》、《考古》1986年7期)。

山东邹城出土的汉画像石《农耕图》:自左至右,前面二农夫皆着短衣。一人荷担,担一壶一簞,一人肩负着一耒,向左而行。其后为两牛拉一犁,一人扶犁柄耕地,再后一农夫扛打场农具,一农夫扛耒。最后一牛车,车双辕,前坐一驭者,后坐二乘车人……(《邹城出土东汉画像石》、《文物》1994年6期)

除此之外,尚有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的《农耕图》(《文

物》1974年1期)、陕西绥德、米脂出土的汉画像石《农耕图》(《陕北东汉画像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等等,不一而足。



农耕图

二、收获图

上小学的时候,在语文课本上曾熟读白乐天的《观刈麦》一诗,至今记忆犹新。其中有几句是这样写道: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箬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岗。

诗中描绘的一幅麦收大忙景象图,让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这不由的使人想起汉画中的一幅刈稻图。这是四川成都汉墓出土的画像砖,内容为:中间三人弯腰正在收割谷穗,右二人持刈钩,刈

谷草。左一人一手提篮肩上挑着一担捆扎好了的谷穗。(见刘志远:《四川汉代画像砖反映的社会生活》,《文物》1975年4期)好一幅农忙丰收图。这与白居易的《观刈麦》有着异曲同工的艺术效果。表明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汉代,劳动人民就已普遍掌握了稻作物的栽培技术,也同时反映出汉代的农业生产,呈现出五彩纷呈的繁荣景象。



收获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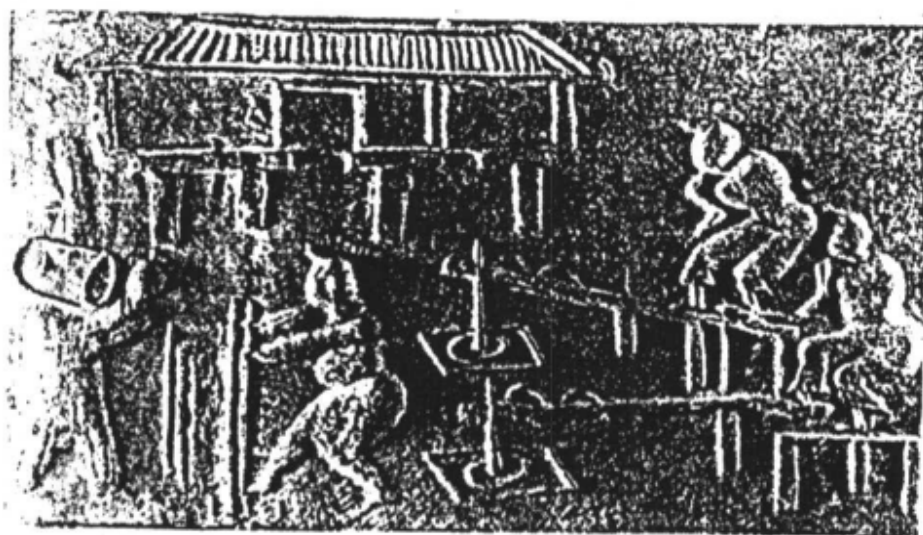
三、舂米图

我国最早粮食加工,进行脱粒的工具,应是 7000 多年前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它们的用途是配合使用,将收割后的谷物或植物的种子进行研磨脱粒,达到食用的目的。发展到汉代,粮食加工则是砬谷、舂米等一系列工序。这在江苏泗洪重岗汉画像石墓的《庖厨图》中,可找到舂米的全过程。

粮食加工有砬谷在上,舂米在下,砬分两扇,顶部有承粮谷之漏斗,下有接已加工好的粮谷的承盘。砬右一人弓步张开,正使劲推动连接砬体的“T”字形磨架,此人高髻,似为妇人;舂米者一人,身着短衣,高髻,亦似妇人,双手合握一杵,弓步张开,向左面亚腰

形大臼中杵、舂……碄、磨、杵、臼等,过去在汉墓中为常见模型明器,而雕刻于画像石上,却为少见。这提供了粮食加工的宝贵而形象的资料。(见《江苏泗洪重岗汉画像石墓》,《考古》1986年7期)

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稻去壳用碄,去膜用舂、用碾。”“凡碄有二种,一用木为之,截木尺许(质多用松),斫合成大磨形,两扇皆凿纵斜凿,下合植笋,穿贯上合,空中受谷。木碄攻米二千余石,其身乃尽。”“一土碄,析竹匡围成圈,实洁净黄土于内,上下两面各嵌竹齿。上合筭空受谷,其量倍于木碄。谷稍滋湿者,入其中即断。土碄攻米二百石,其身乃朽。凡木碄必用健夫,土碄即孱妇弱子可胜其任。”“凡既碄,则风扇以去糠秕,倾入筛中团转。”“即筛之后,入臼而舂”,“既舂以后,等膜成粉,名曰细糠,以供犬猪之豢”。类似方法,在乡间直流传到电力加工谷物之前,溯源至少到汉代已经使用了。



舂米图

四、仓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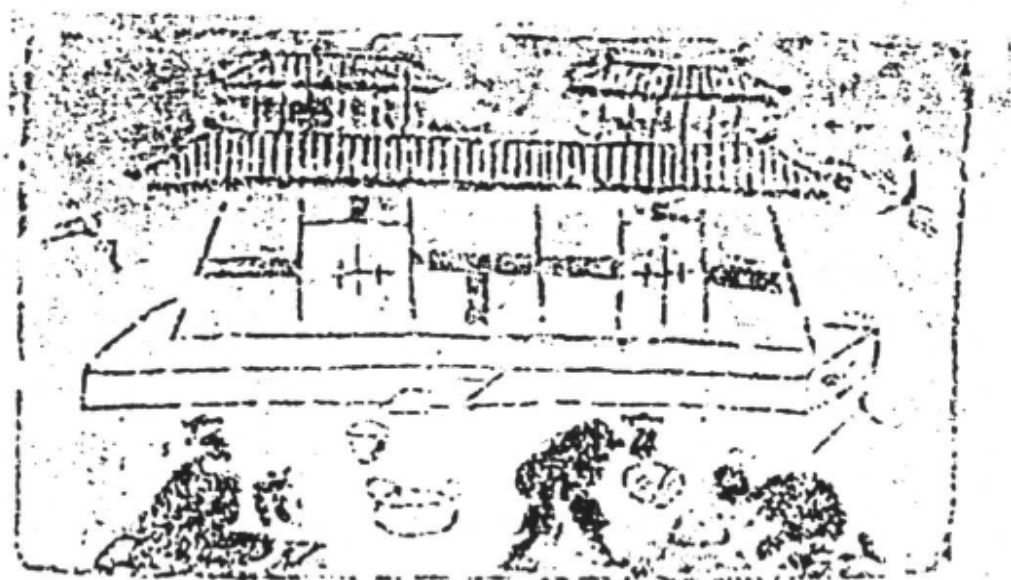
仓储粮食,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粮食种植面积进一步

扩大和粮食生产量的不断提高,并且都已大大超出人们的消费水平时,将剩余的粮食进行仓储,以备不测。早在 6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时期,由于农业生产比较发达,丰收的粮食有了剩余,因此也就出现了仓储。这在胶县三里河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一座贮藏粮食的库房。该库房内北部有一个椭圆形的窖穴,“东西径长 1.85、南北径宽 1.7 米,深 1.4 米,底部平,近圆形,直径 1.5 米,窖穴占据了这座房屋的面积将近二分之一……此窖内还遗留有 1.2 立方米的已炭化了的粮食颗粒,经中国科学植物研究所的鉴定是粟”。(《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古代劳动人民仓储粮食的事例,在田野考古中不断被发现,被报道。就是在汉代画像石中也屡屡有所反映。《考古》1985 年 11 期登载的李发林先生撰述的《记山东大学旧藏的一些汉画像石拓片》之第十二幅:中层……最左边是一建筑物,似为仓房,四周有矮墙,屋顶为坡形圆顶,顶起短脊,脊两端起翘。顶上有两只鸟。房体两边各有一人,当为守仓者。这种上为伞顶,下呈圆柱状,四周有矮墙的仓房在汉画像中还是首次见到。下层的右方也是一座仓房,结构与上述大体相同,惟上不起脊,正中为一螺旋式顶。顶斜坡上有一尾鱼、一只鸟,空中二鸟。仓后面有大树两株,叶子粗大,树干被仓体遮住。仓房两边各有一人守卫。仓四周也有矮墙,右边矮墙上蹲有一只猫,其下方有一只鹅。仓房左旁,并列两个小规模粮囤,囤身上粗下细,其顶部均为伞式圆顶,其一顶部起短脊,脊也是两头起翘,另一顶部为圆柄式。两个囤顶坡上各立二鸟。上囤边蹲一犬,下囤边站立一人,此人足下有一只鸡,面向粮囤。

在仓房附近出现猫的形象,这是汉代利用猫来捕捉粮仓中的老鼠的最早图象记录。

汉画中出现的《仓储图》,一方面说明农业的发达、粮食的丰收,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另一方面还说明人们在长期的生活

实践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将剩余的生活资料,没有抛弃、浪费掉,而是进行加工储藏,并且不断提高储藏水平,以备长期食用,或者说是“备战、备荒”。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



仓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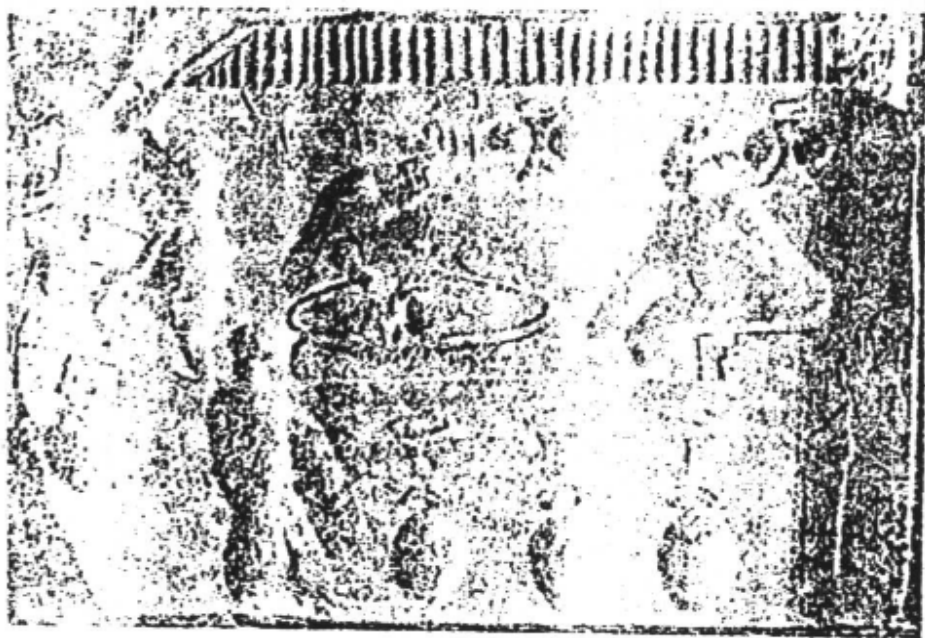
五、酿酒图

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粮食有了剩余,有了积累,人们的生活消费水平和需求水平也日渐得以提高,因此,作为生活消费中一个主要内容的酿酒业应运而生。据有关专家研究表明,我国利用谷物酿造水酒,起源于 8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参见李仰松:《我国谷物酿酒起源新论》,《考古》1993 年 6 期)那么到了汉代,水酒的酿造情况是个什么样子? 丰富多彩的汉画,给我们提供了形象的视觉资料。

在四川彭县出土的一块汉代《酿酒图》画像砖上,正中一人在灶上和曲、酿酒,左边一人似在打下手。其左一人,手扶独轮车(残缺部分),运酒出店。下方为一横梁上悬挂三个尖底酒壶,左边亦

悬一个。(参见刘志远《四川汉代画像砖反映的社会生活》，《文物》1975年4期)。

另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后室南壁)亦出现《酿酒图》。据有关资料介绍,该图左下方有黄色之物两堆,旁边又有三块方席,上面也布满黄色之物。还有一人似在搅拌席上之物。黄色之物似为蒸熟的黍、粟,如果这一推测不错,则此画表现的应是有关酿造的活动。《齐民要术》在谈造酒时,就说先要把馏熟的饭摊开冷却,或者是置于净席上面,此法一直沿用于今天。这和画上的情况比较相象。成书于东汉时期的《四民月令》中提到制曲、作酒的事,说明东汉时的大庄园里,曲和酒都是自制的。(参见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文物》1974年1期)



酿酒图

酿酒图在其它画像中也多有发现,比如山东嘉祥的洪山村画像石、刘村洪福院画像石中均有《酿酒图》。(见朱锡禄《嘉祥汉画

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 1992 年版)这足以说明,在汉代的酿酒业是十分发达,比较普遍的。

六、酒肆图

酿酒业的不断发展,也大大促进了酒的经营销售活动。这在四川彭县发现的汉代酒肆画像砖上,表现的十分突出。其中有一羊尊酒肆画像砖最具代表性。

“酒肆”建筑斜置于砖面左边,为单檐四阿顶式,倘可见到山墙一面的斜坡屋顶面。山墙上有穿斗式的梁架和蜀柱,酒肆的四角木柱清晰。屋前设一高案做为柜台,用木柱支撑。案下有两个带提梁的大酒壶,柜台内侧有一大酒瓮,屋内还有两个大酒缸,柜台外面有个带提梁的壶。屋内一人在售酒,右手执量酒的容器,左手将盛好酒的器皿递出。柜台外有两宽衣博袖的沽酒者,前者正伸手向前接过酒器;后面一人,右手端起酒杯,正欲饮酒。砖的右上部有一大案,案上有一方形容器和两个模拟羊形的容器。中部有一短衣袴的游贩,肩挑酒壶向酒肆走来;右下有一人推独轮车离酒肆而去,车上也载有一个羊形的容器。羊形容器应为盛酒器“羊尊”。(参见《四川彭县等地新收集到一批画像砖》,《考古》1987 年 6 期)

从这块酒肆画像砖上,一方面看到汉代酒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看到汉代商业经济的繁荣。这是研究汉代经济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弥足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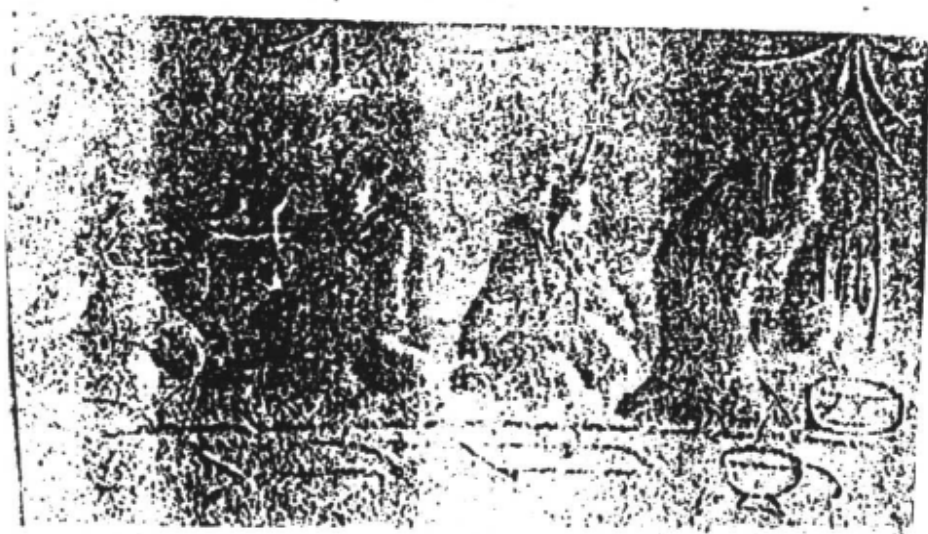
酒肆图

七、醉酒图

在丰富多彩的汉画中，表现宴饮的场面，是十分常见的，但大都是与乐舞、百戏、六博等活动场面组合在一起的。可见汉代饮酒习俗之一斑。但表现醉酒场面的画像尚不多见。据笔者所知，在四川彭县出土的一块画像砖中有一幅《醉酒图》。（有关资料为《宴饮图》）图中上挂帷幄，下置盘案、杯、樽。左边两人在尽情的猜拳行令；右边两人，其中一人似饮酒过量正在呕吐，另一人在关照。（参见刘志远《四川汉代画像砖反映的社会生活》，《文物》1975年4期）

另在洛阳偃师县新莽壁画墓中，亦有两幅《醉酒图》。一幅为中室西壁《六博宴饮图》：上部绘两条缎带束扎起来的饰有紫色卷

云纹的帷幔,帷幔下右边二人相对而坐,皆戴黑冠,着宽袖长袍,分别伸出左、右手,似在猜拳行令,身边置一酒樽、一耳杯,左边二人一前一后,前为老者,身材高大,着长袍,弯腰张口作醉酒欲吐状,显然为酒量不胜或豪饮所致。后为侍者,两手挽老者。画面下部绘两跪坐老者六博的场面……另一幅为中室东壁《宴饮图》,图中间绘一羊形尊,画面上部四人分为两组对饮,身边各置陶尊、案类器物。右下角绘两个直口折腹大酒瓮,酒瓮上方绘二人,左为一姬,着宽袖长裙,席地而坐,姬前跪一女侍,双手捧耳杯递上。画面左下方绘三个女子,正中一人穿紫色宽袖翻领上衣,红色细腰长裙,裙裾曳地,作醉态状,左右各有一侍女相搀扶。(参见《洛阳汉墓壁画·偃师辛村新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



醉酒图

从以上几幅《醉酒图》中,形象地反映了汉代社会嗜酒成风,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

汉画中的汉代社会风情略述

刘玉新 李清洪

汉画是汉画像石、画像砖的概说。它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它以绘画雕刻的艺术形式,生动形象的描绘记录下汉代的社會生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宛如汉代社会的一个缩影。这为研究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艺术等方面提供了众多的资料,弥补了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汉画内容丰富多彩,种类繁多,本文拟就其中与汉代社会风情有关的内容作一略述,不足之处,方家教正。

一、六博

六博,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古代游戏。据《说文》称,夏桀的臣子乌曹作博。就是说早在夏代就有“六博”这种游戏了。“六博”,又叫“博”、也作“六博”、“陆博”。

据有关资料记载,六博是一种用掷采的方式得到的齿采而行棋的游戏。其掷具最初是用竹片或者木片做成,其形状是两头尖细,中间略粗的细长箭的样子,叫做“箸”,又叫箭或博、蔽。据《西京杂记》卷四记载,有一个叫许昌的人长于“六博”,窦婴很喜欢,和他交往过从,他的六箸是用竹子做的,长六寸。根据《说文》记载:“博局戏六箸十二棋也,古者乌曹作博。”就是说玩“六博”游戏必须要有六个箸(博),十二枚棋子,黑白各六枚。此外,还应有行棋的棋盘,即局,又叫曲道。棋盘一般用木板制作,上面绘有行棋的路

线,所以叫“曲道”。博局的掷具不管用什么材料制做,都是两头尖细,中间宽平的长形两面体,两面用颜色或符号来区别。这样当博掷在棋盘上时,只能露出一面。露出一面叫齿。齿和齿的组合构成不同的点数和图案,叫齿采。齿采的名目很多,如“塞”、“白”、“黑”、“五”等等。“六博”就是根据各人掷出的齿采来走棋子。

“六博”的局分为十二道,局中为“水”,用两枚鱼形的棋子放在“水”中。二人对局时,按照各人掷出的齿采来走棋,自行到目的地的棋叫“梟棋”,其余棋子叫“散棋”。谁先树起梟棋,谁就可以把放在“水”中的双鱼吃掉,每食一鱼,得二筹(分数),得筹多者为胜。正如《晋书·张华传》所载:“六博得梟者胜。”

六博这种古老的游戏,盛行于秦汉时期,当时倍受统治阶级上层人物所青睐,视为一种高雅文明的游戏活动。故在各地出土的大量汉画像石、砖中,多有以博局为内容的画面出现。如1994年《文物》第6期报道的山东邹城高李村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就有一幅“六博图”。内容为左右二人对博,中间刻一博盘,博盘刻画清晰,居左者头戴介帻,着宽袖长袍,正面端坐,双臂伸开,表情严肃深沉。居右者头戴进贤冠,着宽袖长袍,侧身坐。傍有二侍从和两位观博者。画象内容形象的反映了当时贵族阶级盛行的博戏之风。

六博游戏由于结构复杂,齿采名目繁多,行棋方式变化无穷,计算胜负也不简单,加之又多在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中流行,一般人是不会很容易掌握而娴熟运用的。再者由于历史上频繁的战乱,很多古籍史料多被丧失殆尽,六博游戏在宋代就已不多见了。因此,目前各地出土的汉画像石、砖中的“六博图”,为我们了解研究当时社会流行的“六博”游戏,提供了生动形象的资料,弥足珍贵。

二、捕蝉

捕蝉是我国民间的一种游戏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渊远流

长。早在春秋时期,古人们就以竿黏蝉的方法而盛行,可见这时捕蝉已是一种闲逸的游戏了。据《庄子·达生》曰: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镒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枸,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佝偻丈人之谓乎!”

在汉画中,以捕蝉为题材的内容,仅见于汉画像石。同时也是古人们捕蝉活动最早的形象资料记载。1982年,在江苏邳县的东汉彭城相繆字墓中,就有一幅儿童捕蝉图。该画像画面刻一颗叶茂旺盛的大树,树下共有六人,其中一人张弓欲射;一人双手举竿伸进树枝间,竿的顶端触着一蝉;另一人跳跃欢呼;其余三人席地而坐,翘首仰视。(见《文物》1984年第8期)

画像中突出表现了一群正在捕蝉嬉戏的儿童,并把他们的表情刻划的维妙维肖。在大树下的持竿者全神贯注,围观的儿童活泼可爱,有的仰首期盼;有的跳跃欢呼;有的指点谈笑;有的张弓欲射,姿态各异,形象生动,耐人寻味。此画像具有社会的时代性,又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是汉代民俗中的形象反映。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云:“建武三年,充生为小儿,与侪伦邀戏,不好狎侮。侪伦好掩雀、捕蝉、对钱、林熙,充独不肯。”该画像正是这一风习的真实写照。

曹植曾作《蝉赋》,其中对于儿童以竿黏蝉作了细致的叙述,恰与繆字墓中的画像相映成趣:

有翩翩之狡童兮,步容舆于园圃。体离朱之聪视兮,姿才捷于猕猴。条罔叶而不挽兮,树无干而不缘。翳轻躯而奋进兮,跪侧足以自闲。恐余身之惊骇兮,精曾睨而目连。持柔竿之冉冉兮,运微

黏而我缠。欲翻飞而逾滞兮，知性命之长捐。委厥体于庖夫，炽炎炭而就燔。（见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93页）

由以上看出，由于蝉反应敏捷，不易捕捉，而黏蝉充分利用了黏胶易于黏翼的特点，要求凝神屏气，用心专一，等待时机，稳中求快，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从中才能体现到捕蝉的意义和乐趣。因此，这一有趣的游戏，对儿童来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一是锻炼儿童捕蝉的技术水平，二是锻炼儿童的大脑思维能力。从繆宇墓画像中可以看出，捕蝉是社会生活中的现实反映。这一风俗流传至今，与画像中的故事情节比较而言，仍惊人相似，一脉相承，历经数千年而不衰，令人观止。

三、百戏

所谓百戏，概指乐舞、杂技等表演性的艺术活动，这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到了汉代，由于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和域外文化交流，乐舞杂技艺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又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政治上、生活上的需要，上自宫廷，下至百官，都争相蓄养倡伎优伶，蔚然成为一种时尚。“歌舞俳優，连笑伎戏”、（《盐铁论·散不足》）“倡优俳笑观倚庭”，（史游：《急就篇》）就是当时的写照。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的皇室贵族不但举办“堂会”，还兴致所使，举办大型的百戏表演。《汉书·武帝纪》中就记载汉武帝曾于元封六年（前105年）在长安上林园平乐馆举行百戏汇演，以示国富民强，天下太平。关于这场乐舞百戏，张衡在其著名的《西京赋》中曾做过生动的描述：

“大驾幸乎平乐之馆，张甲乙而袭翠被。攒珍宝之玩好，纷瑰丽以杳靡。临迴望之广场，程角觝之妙戏。乌获扛鼎，都卢寻回。冲狭燕濯，胸突铍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吞刀吐

火,云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压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尔乃建戏车,树修旗。佞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挂,譬陨绝而复联。百马同轡,骋足并驰。橦末之伎,态不可弥……”(见《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上册第58页)

这形象逼真的描述,在目前出土的大量汉画像石、砖中,得以充分体现。

比如“程角觥之妙戏”,角觥,即盛行于汉代的角觥戏。《史记·李斯列传》应劭注曰:“角者,角材也;觥者,相觥触也。”角觥戏的内容,大致有人与兽斗,象人与兽斗、象人与象人斗等。所谓象人,即戴假面具的演员。在山东、河南、四川等地出土的画像石、砖中,多有精彩的象人表演的画面。其中比较流行的,首推东海黄公制蛇御虎的故事。据《西京杂记》卷三载:“有东海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绶绾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压之。术即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觥之戏焉。”即《西京赋》:“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压白虎,卒不能救。”这在山东临沂出土的汉画像石中,就有一幅象人表演黄公御虎的故事内容。

“都卢寻橦”,亦称“寻橦”。其表演方式是立木橦长二丈,橦顶安横木,两伎各坐木一头,或鸟飞,或倒挂,又作猕猴之形。即《西京赋》中“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挂,譬陨绝而复联”。实际上就是后世的戴竿表演艺术的早期形式。这在河南新野出土的浅浮雕画像砖中,就有一幅惊险壮观的走索、戴竿的表演场面。画面内容为前后两乘戏车,各一马一橦。前后橦杆均呈“T”形。前车竿首横木上一伎儿倒挂悬空,双臂平伸,左右手掌中各托一球一人,左掌伎儿叉腰半蹲于球上,右掌伎儿单足着球,左腿抬起,双臂向上弯

曲。后车竿首伎儿蹲在横木上,双足外撇如一字,左手拉绳索和前车伎儿相合,两车之间的绳索作斜向直线状,一伎踏索表演。整个表演过程是在运动中进行的,表演者的体力、毅力和平衡本领,即使在今天的杂技同行中也要叹为观止(见《中原文物》1981年3期)。

“跳丸剑”,即跳丸飞剑,或作飞剑跳丸,是汉代一项常见的杂技表演艺术。其表演方法,即手中同时向空中抛掷剑、丸,但不能使其落地,循环抛掷,让观者眼花缭乱。跳丸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先秦时称“弄丸”,汉代逐步发展为丸剑并用。刻有跳丸飞剑图案的画像石、砖,在山东、河南、四川等地多有发现,表演者少则三、五丸、剑,多则八、九丸、剑,生动地再现了当时艺人娴熟的技巧和观众的热烈场面。山东安丘董家庄汉画像中,有一幅场面宏大的乐舞百戏图,其中一位艺人表演跳丸飞剑。他手足并用,同时跳11丸、飞掷3剑。丸剑同掷,本不易掌握,何况掷物达14件之多,起落纷繁,节奏急促,难度极大,可谓世界之最了(见《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济南出版社,1992年10月)。

除以上之外,如乌获扛鼎、冲狭燕濯、胸突铍锋、吞刀吐火、百马同辔等技艺表演内容,在各地出土的汉画像石、砖中亦多有发现,全面生动形象的再现了汉代丰富多彩的社会娱乐活动和太平盛世的歌舞升平景象。

总之,包容万象、风靡一时的汉画,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辉煌壮丽的汉代历史画卷,这为我们研究考察两汉时期的风俗民情,提供了大量详实、形象直观的第一手资料。

运河发展简史

陈昆麟

第一次接触“运河”一词,是少年时期在高级小学上历史课。老师讲隋炀帝如何残酷暴虐,如何为了自己的腐化享乐而驱赶大批民工开凿运河时,感情十分激动。自此始,“隋炀帝为享乐腐化而开凿了大运河”便在我脑子里扎下了根。此后,直到我上大学,在这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运河的认识只限上述范围。隋代之前或以后是否还开凿过运河,运河还有无其他用途,却未曾深究过。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还曾把穿过我们聊城地区境内元、明时候开凿的南北京杭大运河,就以为是隋炀帝开挖的大运河。无独有偶,我还听到过不少人也有这种错误认识,甚至于传给他人。正因如此,写这篇短文,以供大家参考。因时间短促,编写过程中有的是直接摘录了他人的文字,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另方面因查资料不足、编写能力有限,错误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教正。

运河,是指的人工开凿的沟渠或水道。《辞海》中运河一词是这样解释的:运河是“人工开挖的水道,用以沟通不同河流、水系和海洋,连接重要城镇和工矿区,发展水上运输”。这里所指的运河,包括世界各地近现代所开挖的运河。单就我国的古代大运河而言,大都远离海洋,但就其为人工所挖,目的在于发展水上运输等属性来看,都是一致的。其实,运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工开凿。就这一点而论,中国运河的发展史,可以上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大禹

时代。《史记》载：“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但是鲧用筑堤坝堵截的办法，“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因此，尧帝因用人不当而引咎自责，先令祝融杀鲧于羽郊，而后辞去帝位让贤于舜，舜继帝位后，于是“举鲧之子禹，而使其续鲧之业”，继续治水。大禹开始治水时，仍然采用其父鲧的办法，筑堤修坝，堵截洪水，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他总结父辈的教训，开始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据《史记·河渠志》载：“……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行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渤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这段记载中说：“乃厮二渠，以引其河。”乃、厮是所挖的新的的人工河道。乃，是指鸿沟，厮是指逆河。又说：“播为九河，同为逆河。”是说新开挖的九条人工河道，通称为逆河。而这九条河是指的徒骇河、太史河、马颊河、胡苏河、简河、鬲河、钩盘河、鬲津河。这里提到的九条河流中，有徒骇、马颊两河流经我们聊城地区，至今还发挥着灌溉和排涝的巨大作用。

关于夏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传说，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是，夏代的真实情况，至今尚未有丰富的考古资料来证实，因此，九条河究竟是人工河还是自然河、或者是人工、自然各半，都无从考证。今天，当我们提到徒骇河、马颊河时，恐怕没有多少人认为这是大禹带领我们的祖先开挖的人工河，而是把它当做自然形成的河道来看待。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把禹看作我们开挖“运河”的先驱。值得提醒的是，大禹治水既然用疏导的办法，就自然要开挖水道、沟渠。不管这些人工沟渠和水道现在是存在于地上还是早已又被洪水中的泥沙淤平或埋入地下，都不影响我们把大禹看作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开挖运河的先驱。

先秦时期的运河

为什么要开凿运河,先是为了治水,而后为了军事、政治、经济、灌溉等目的而开挖运河。因此,为了不同的目的,先秦时代的人们曾经开挖了许多运河。因其年代久远,又无确切的文字记载,那条运河为中国第一运河,说法不一,虽经历代历史学家、水利专家多年的潜心考证和研究,也没有得到比较一致的意见。谁对谁错,笔者因学识浅,不敢妄断。我只是按运河开挖的年代先后顺序,摆在这里,以供参考。

1、云梦池:这是春秋时期楚庄王在江汉平原上开挖的一条运河。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613 - 519 年之间,楚庄王令孙叔敖“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地”。这是沟通楚国都城一郢、汉水以西及南部水利网的运河;

2、扬水:这是楚灵王于公元前 540 - 520 年间开凿的运河。它自郢都西南部开始,往东北经现在潜江县西南的章华台,到潜江县西北注入汉水。这是连接首都和产粮地区,为“漕运”而开挖的,也可以说是专门为运粮食而开的运粮河。

这两条运河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呈东西方向开凿的,没有贯穿几条河流,在政治上或经济上起的作用不大,历代历史学家或水利学家,都没有把它们看作是中国运河的首创。因此,在研究运河时,往往把它们排除在外。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它们既然是人工开凿的水道,那么就应当是运河,因此,云梦池理所当然的应该是中国的第一条运河。

3、邗沟:春秋后期,齐国的霸主地位早已为人所取代,国势渐衰。当时雄居南方的吴国,却日益强大,吴王夫差,为了进军齐国,争霸中原,为了军事的需要,他便开凿了一条以江都(今扬州)到末口(今淮安)的邗沟,把淮河、长江两大水系沟通起来,以供吴王向

北进军时运兵运粮所用。该河开挖于春秋后期,《左传》载,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哀公九年即公元前 486 年,该运河开凿,距今已有两千四百八十多年的历史了,这是中国第一条南北纵向开凿并连接两大水系的运河。

4、鸿沟:这是战国时期魏国的魏惠王为了发展经济,向外扩张而在中原地区开凿的一条运河。大约于魏惠王十年开成,即公元前 360 年。其自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东流经今中牟北,又东经开封北,折而南通许东、太康西,至淮阳东南入颍水。联接济、濮、汴、睢、颍、渦、泗、汝、荷等河道,成为黄淮平原上的水路交通网。这条运河的开凿,不仅对魏惠王的河道运输和控制周围小国带来便利条件,而且还可灌溉大面积的土地,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因此司马迁称赞它“此渠皆可舟,有余则溉浸,百姓飡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总之,它对促进当时全国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都起了巨大作用。楚汉相争时,曾以鸿沟为界,东面楚,西面是汉。现在此界限分明,常用的“判若鸿沟”一词典故即出于此。汉以后改称“狼汤渠”。

5、郑国渠:战国末期,因秦国在商鞅变法后,日益强大,势压六国,与其临近的国家惶惶不可终日,时刻提心吊胆地怕被秦国吞并掉。特别是韩国,他与秦国毗邻,为了让秦国把主要人力、物力都用在国内的水利建设而顾不上向东进兵,以达到保护自己利益的目的,于是便派当时韩国最著名的水利专家郑国到秦国作说客,劝说刚刚即位的秦王嬴政开凿一条横贯中原的运河。当时的秦王政,正为关中地区雨水稀少,土地脊薄而苦恼,便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调动数十万青壮年劳力,动用了大量物资财富,命郑国亲自带领开凿这条运河。这条运河全长三百多华里,自中山西瓠口(今陕西泾阳)引泾水东流,至今三原北会合浊水,利用浊水及石川河

水道,再引流东经今富平、蒲城之南,注入洛水。该渠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 237 年)修成。此渠可以“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约合现在土地二百八十多万亩。使关中的不毛之地,成为沃野,更进一步壮大了秦国的实力。

6、灵渠:又称湘桂运河或兴安运河。该渠是秦始皇为进一步统一岭南,令史禄兴修的。它沟通湘、漓二水,联系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全长 66 华里,于公元前 214 年修成。这条运河的最大特点是能使船只爬山越岭。渠长虽只有 60 多华里,但建有陡门 36 座,人造河弯 72 处,为船只爬山跨岭创造了条件。因此,各国水利专家在该渠乘舟上下之后,无不惊叹两千多前的中国水利专家修建的这条举世无匹的水利工程,不得不佩服中国人民的聪明和智慧。

7、都江堰:这是当时的秦国为解决成都平原南涝北旱而兴建的水利工程,共有分支河流 520 多条,分堰 2200 多道,渠道总长达 2200 多华里,能灌溉 300 多万亩土地。修建该渠的李冰父子,构思也颇具匠心。为了掌握水的盛和枯,在都江堰的江水中设置一石人站立于水中,而都江堰的河渠和灌溉系统都设有斗门。这个石人“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也就是说,枯水时水位不能低过脚面,水盛时水位不能超过肩膀。如果水位到了石人的脚部时,便开放斗门放水,如果水位到了石人肩部,则关闭斗门以控水,以此来调水位,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管理水流和水位的科学方法。使都江堰流域的水位“涝旱从人”,这在当时的世界水利史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另外,公元前三世纪时,秦国还开凿过自宁夏中部至黄河东岸的灌溉渠,名曰秦渠。秦始皇东巡时还在丹徒开挖了一条通往长江的运河,叫丹徒运河,在嘉兴开凿了长河,都在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中发挥过很大作用。

汉魏南北朝时期的运河

(一)两汉运河

1、西汉漕渠

西汉建立之后,其政治中心在西,但粮食产地却集中在两淮地区。当时,要两淮地区的粮食调运长安,开始从淮河取道鸿沟,再溯黄河西上,经渭河运往长安,这条运输线远远不能解决京畿长安对物资的需求,因此,开挖新的运输线成为迫在眉睫之事。于是,西汉元光六年,(公元前 129 年)在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和主持下,发卒数万人,由水工徐伯督率开凿。渠傍南(秦岭)下,长三百余里,三年而成,大大方便了漕运,漕渠流经的区域之地也可得到灌溉之利。该渠初以灊水为源,又引沪、渭之水,经临清、渭南、华夏、华阴等地而接通黄河。渠长三百华里,大大缩短了运输时间。

2、荥阳漕渠:西汉哀帝刘欣建平年间,开黄河堤,经荥阳引黄河水,下游一分为二:一由鸿沟而南,经狼汤渠,东南至陈入颖,至寿春再入淮河;一由陈留而东南,经鲁渠水,东至阳夏入涡水,再入淮河。

3、东汉阳渠: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之后,定都洛阳。为了促进水上交通,发展工商业,繁荣东汉经济,于是于建武二十四年(公元 48 年)开凿阳渠。《后汉书》载:“建武二十四年,上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阳渠自京都洛阳南部西引洛河之水,建起围绕都城的水运网,然后东下偃师入伊水,可使东来的船只直接开到京城下。

4、汴渠:这是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令王景修的一条运河。主要是为了治理黄河水患。经过反复辩论,终于使明帝下定了决心,于是“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壅积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磧,直截沟洫,防遏冲要,疏

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四注,无复溃漏之患”。经王景的治理,黄河入海口大体稳定在千乘、无棣之间,出现了一个长期相对安定时期,这不仅解决了黄河延续六十多年的水患,而且也使汴渠长期漕运畅通,对于巩固东汉王朝的统治,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汉明帝对王景、王吴等治河有功人员,倍加赏赐并提拔重用。

(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运河

这时期,是中国的战乱时期。特别是魏、蜀、吴三国争战之时,为了运粮、运兵、屯田发展经济而开挖了一系列运河,沟通了黄河与海河两大水系。其次是东吴孙权在江南开凿的破岗渚运河,沟通长江、钱塘江两大水系。这样使海、黄、淮、长、钱五大江河由纵向运河全部贯通起来,打开了南北航运的新局面。同时,魏国为了准备进军南方统一全国,还由邓艾开凿了广漕渠、淮阳渠、百尺渠、曹丕开凿的讨虏渠、贾逵开凿的贾侯渠。这些运河大多处在淮河上游偏西河段和黄河以南的开封、许昌、郾城一带,由人工河把汝、颍、洧等天然河流串联起来,形成一个重要的运河航运网,对于运兵、运粮、灌溉等,都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两晋时期,博学多才的镇南大将军杜预曾修建新渠、富寿渠、游陂渠等,南北朝时南齐兴修的丹徒水道,则是东吴破岗渚的向东延伸,也是隋朝江南南运河的前身。这些人工河的开凿,对发展漕运,促进经济发展,都曾起到过应有的作用。

隋朝开凿的大运河

隋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和加强对南北双方的控制,隋文帝首先考虑到要开运河发展漕运的问题。他经过深思熟虑并命水工实地考察后,才下决心动工。公元584年,隋文帝令宇文恺率水工开凿广通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长三百余里,

漕运通利,但砥柱仍阻碍关东漕运。595年,文帝下诏凿砥柱,611年,砥柱被凿崩,压河水倒流数十里,工程完全失败。后来,为了进军江南,隋文帝又于587年开山阳渎。该渎北起山阳(今淮安),南到江都(今扬州),大体上就是重疏浚了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开凿的第一条古运河,这条运河的开凿,不但为征伐南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而且也为了以后南下江淮开展漕运奠定基础。实际上,隋文帝所做的这些工作,都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序曲。

隋炀帝继位后,为了便利漕运和军事运输,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开凿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并能沟通南北的大运河。

大运河的开凿,分四期工程进行。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发河南、淮北一百多万人开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入黄河,自黄河入汴水,循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运河故道,引汴水入泗水以达淮水。同年,又征发淮南民工十余万沿吴王所开运河的故道而开邗沟,自山阳(今江南淮安)至扬子(今江苏仪征县)入长江。通济渠广四十步,两岸筑御道,种柳树护堤。大业四年(608年),征发河北诸郡男女民工百余万人开凿永济渠(又称御河),引沁水南至黄河,又连接渭河北至涿郡(北京市)。大业六年(610年)开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至余杭(浙江杭州市),长八百余里,广十余丈。至此,贯通南北五个水系的大运河全部完成了。大运河开通之后,隋炀帝于611年便乘龙舟自江都直达涿郡。他带领百官和步行的候选人士数千人,走了五十多天才到达涿郡。

大运河开通之后,全长约500多华里,这是世界最伟大的工程之一。它的修成,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不仅显著改善了南北交通的条件,而且加强了南北的经济交往,促进了全国的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是,它对于祖国的统一,起了巨大的作用。

唐宋时期的大运河

唐朝的运河体系,基本上延用了隋朝的河道。只有部分河段有所变化,或对部分河道进行疏浚和修补而已。唐时的运河线走向是由漕渠从长安华阴入渭河,由渭河入黄河;再由黄河南岸的河阴(今河南荥阳)入汴河(唐时称通济渠为汴河);由汴河经汴州(今河南开封)、商丘入淮河;又由江苏的淮阴(今清江市)经山阳渚至长江北岸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再由江南运河至杭州。

唐王朝建都长安,与洛阳相比,又西迁一千多里。又加上京都对江南、两淮物资需求量大、依赖程度高,所以,从长安到洛阳段的漕运数量大大增加。因此,就需要对这段运河进行整修。而洛阳以东的其他河段,只要加强管理能够畅通就行了,不必开展很大的工程。至于北方的永济渠,只要起到水上运输的骨干河道的作用即可,也不必开展很大工程。因此,唐王朝在运河方面的主要精力是放在长安至洛阳段运河的整修和其他河段的管理上。

唐朝整修由长安至黄河的漕渠,先后有两次。第一次是唐明皇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由当时的长安令兼水陆运使韦坚所开;第二次是唐文宗大和年间(公元827—835年),又清淤重开,改名为兴成渠,进而又整修了许多支渠。唐还把广通渠的终点由长安的三河口延伸到宝鸡,并将这段新开的渠命名为瀚泉渠。因而大大提高了关中地区西南部的水运效益。唐时,还对汴河、山阳渚、江南运河、永济渠等进行了整修,以保证漕运畅通。又重开灵渠,活跃了西南地区的水上运输。

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宋太祖赵匡胤接受了唐王朝定都长安,漕运线太长的教训,他看到,开封与东南沿海漕运的距离比长安要近2000多公里,比洛阳也缩短了近500里,他又看到开封座落在较富庶的豫鲁平原,从这里即可以出汴河往东南,经山阳渚到两淮、江

南,又可顺黄河东趋齐鲁,还可通过永济渠北达幽燕,溯黄河西进可达关东、关中地区,是个建都的好地方。因此,他建议,建都开封。无疑,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卓识的举措。

北宋定都之后,就决心以开封为中心,建立一四通八达的运河网。赵匡胤登基之后疏浚的第一条河是惠民河(又名蔡河),这条河出开封后南流至古鸿沟,南至东南的陈州(今淮阳县)在安徽境内入淮河。此河的开凿,很得民心,在北宋存在的一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漕运作用。五丈河则是宋太祖修建的第二条运河,这是由京师向东进行漕运作用。五丈河则是宋太祖修建的第二条运河,这是由京师向东进行漕运的主河道,也是沟通山东漕运的主河道。金水河是宋太祖开凿的第三条运河。为了补广济河水源之不足,于建隆2年(961年),在郑州以西把京、索二河的水引到开封城西,由于入城前要经过汴河,为了不使此水和汴河相混,便在汴河之上建了一条横架汴河之上的大渡槽。因水从空中渡槽通过,表示水贵如金,因此名曰金水河,又名天源河。这条河成为京都开封西部水运网的主河道。

宋朝为了能够进一步把江南、江北水运连接在一起,在治理连接汴河、江南运河和长江的山阳渚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首开沙河以避淮水之险。重开扬州古河,以解水堰阻航之困,凿洪泽渠六十里以避洪泽湖的风浪、开龟山运河、重开通连河、重修通明河等,保证了大运河南北的畅通无阻,对于发展宋朝经济,巩固宋朝统治,起了很大作用。

元、明、清时期的运河

元帝国建立之后,首都定在大都(今北京)。为了南货北运,重新疏浚开通运河,成为元朝统治的一项大事。

隋炀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经过五代、宋末元初连年的战争,

早已淤塞不通。这时,从江南运往大都的货物由浙江西部集中在江南运河的两岸,过长江,再由瓜州古渡,经淮南山阳渎河道运至淮安,进入淮河,再转涡水向西北入黄河。再从黄河逆水西行运至中滦(封丘)旱站,然后陆运一百八十里至河南省淇县的淇门。由淇门入御河(指卫河)北运;经过山东的临清,由卫河(隋开永济渠)经过天津到通州,然后再用车辆运往大都。这条线路水旱更替,反复装卸,费时费工效率低。于是改由任城(今山东济宁)开河,名曰济州河。为开这段运河,先令著名科学家水利专家都水监郭守敬到冀鲁等地寻访。郭守敬在汶上听取了在水利方面很有造诣的人士马之贞的建议,决定开挖济州河。济州河开通后,曾有两条线路北运。一条是南来船只进入济州后,入大清河东去利津进渤海抵直沽(今天津)。这条线路虽然可行,但因积沙阻塞,清淤困难,只运行了三年而停止。第二条是由济州河过大清河从山东东阿县重新登岸开始陆运,经寿张(今梁山)、茌平、聊城至临清,由临清装船入御河(卫河)北上至天津。这条线路虽短,但水旱交替,费工费时,特别是在茌平境内,地势低洼,夏秋时节,淫雨水多,道路泥泞难行。运输车辆苦不堪言难以达到提高南粮北调效率之目的。因此,开通新的运河迫在眉睫。

新的运河沿何线路开凿,这首先要归功于寿张县令韩仲晖。他熟悉这一带地形,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要求开辟会通河,打通大清河北岸从东阿到临清,接通卫河的新航道。另一位有功之臣是太史院令史边源。他也建议“引汶河水达舟于御河,以便公私漕贩。”忽必烈采纳众议,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正月,下诏征旁即定夫三万开凿新的河道。该河道起于须城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临清入于御河,全长二百五十余里。建闸三十一座,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新河开成之后,主持开河的张孔孙、李赴巽、马之贞共同上书奏禀元世祖忽必烈:“开魏博之渠,

通江淮之运,有所未有。”忽必烈大喜,钦赐曰会通河。后又接受水利专家郭守敬的建议,引大都西北诸泉水,在金朝所开旧运粮河的基础上重加修整,车至通州,入于白河,全长一百六十四里,建坎闸共十一处,计二十座,命名为“通惠河。”这样,江南的货物就可以经杭州沿运河水运直抵大都了。

这次开凿通的南北大运河,才是现在我们聊城地区境内保留下来的大运河。它的修通,虽然主要是为了满足朝廷对物质财富的需要,但它对沟通南北经济、繁荣元朝运河城镇的商业,都有着极大的作用。

明朝建立后,基本上是继续利用元朝开通的大运河展开繁忙紧张的货物运输。当然,因运输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明王朝也对元代运河的某些段落进行了改建和扩修。特别是明成祖于永乐四年迁都北京之后,京杭大运河又成为把北方政治中心和江南丰富的物资产地联接起来的纽带。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地位,必须要保证京杭大运河的畅通。于是,明成祖下决心重开了会通河。永乐九年(1411年)明工部尚书宋礼奉修治运河,目的不是水利灌溉,而是在于打通南北水运航道,水利漕粮北运。所以在浚通河道处,又设法增加运河的水量。当时运河流经鲁西丘陵地带,要越过一道地脊南旺地方。北至临清,地降九十尺,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南旺水量不足,运船不能通过。宋礼采纳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筑戴村等坎五里,截住汶河水,使其不能南流而北归海,并汇合泉水,尽出汶河上游,至南旺分南北二流,南流接徐沛者十之四,北流达临清者十之六,南北置闸三十八,以调剂水量,闭北闸则水南流,闭南闸则水北流。经过这样整修,可以使漕船有足够的水量通过南旺地脊。因而大运河畅通无阻,不仅官船漕运繁忙,南北商船来往不绝,为明朝经济的发展,政权的巩固,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清朝早中期,也是大运河漕运全盛时期。虽然没有开凿新的河道,但为了维护漕运,也采取了许多办法,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保障大运河的畅通。这条运河每年漕粮北运总数达400多万石。管理河道的官员级别也相当高,官阶从一品,驻江苏淮安,统辖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个省。足见清王朝对运河的重视。因其运河线路与明朝开凿的运河相同,不再赘述。清代运河繁荣昌盛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咸丰五年(1885年)黄河改道为止。

在明清两代,因运河畅通,带来了沿岸城镇的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如我区的临清、聊城、阿城、张秋都是在这期间发展起来的,曾有“南有苏(州)杭(州),北有临(清)张(秋)”之誉。史载,当时临清一处钞关的税收就占全国税收的十分之一,足见临清在当时的重要经济地位。因有专门阐述经济的论文,此处不再赘述。

清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腰斩了山东境内的大运河,会通河的百里河道被淤塞,淮河、海河也水浸运河航道,当时内外交困、衰落的清廷无力重修。后来又加上与运河平行的津浦铁路的修建,大运河终于御下了负担上千年的漕运重任。

这篇文章,只是把中国运河的发展历史,大体画出了一个轮廓,而且也主要是讲的它各阶段的开挖过程和所走路线,至于他的巨大作用,因篇幅所限,只是简单一提,没有展开叙述,敬请读者见谅。

参考书目

- 1、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 2、班 固:《汉书·沟洫志》1959 年版。
- 3、范 曄:《后汉书·郡国志》1959 年版。
- 4、魏 徵:《隋书·地理志》1959 年版。

- 5、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1959年版。
- 6、脱 脱:《宋史·河渠志》1959年版。
- 7、宋 濂:《元史·河渠志》1959年版。
- 8、张廷玉:《明史·河渠志》1959年版。
- 9、袁 珂:《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 10、酈道元注、王国维校:《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11、范文澜、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 1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
- 13、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 14、岳国芳:《中国大运河》。
- 15、高志超:《运河名城临清》山东友谊书社 1990 年版。

运河与聊城地区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陈昆麟

文化一词,说起来似乎大都熟悉,但要下个简练而又确切的定义,恐怕也不是大都能做到的易事。什么是文化?翻阅《中国文化史词典》、《山东省文化工作手册》等许多介绍文化的书籍,却都没有关于文化一词的定义或解释。唯《辞海》一书关于“文化”一词有这样的解释:(1)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2)泛指一般指示,包括语文知识在内。(3)指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无疑,上述几种解释都是正确的,特别是第一种解释,更为确切。平时,我们在学习历史知识时,关于旧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时期,就常常用“文化”一词,如旧石器文化、细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等,在新石器文化时期分期和分类中,又常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等,这里所指的文化就是广义的。我们今天召开的“运河文化研讨会”中的“文化”一词,也是广义的,是研究运河开通之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各方面的发展和变化的。但是,我今天所谈的《运河与聊城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中的“文化”一词,与上述三种解释都不同,既不是广义的,也够不上狭义的,它比狭义的概念所包括的范围还要小,仅仅指我们文化部门所管辖的范围之内的“文化”内容,如美术、舞蹈、戏剧、曲艺、文学创作、历史名人

等等,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般知识的一小部分。总之,是指平时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易于接受的文化作品,引以为荣的地方名人等。只有限制在这一范围之内,这篇文章才能下笔,但却很难写深、写透、写好。因为每一个艺术门类,那丰富的内容足可以写一本专著,了了数语怎能解决问题,更何况我这个门外汉。这里只不过是把翻阅过的材料,稍加整理,罗列在这里,提供给诸位行家里手、专家学者们,透过这些材料,看一看运河的畅通对聊城地区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仅此而已。人们常用抛砖引玉一词,来比喻自己文章作用之小。在此,我连砖也不敢提,因为“砖”已经是经过加工的成品,多了就可以建起高楼大厦,而我这里只能说堆了一批烧砖的土,它究竟对运河文化的研究能起到什么作用,我是无论如何不敢贸然说出的。下边就让我把散乱的土堆在一起吧!

一、美术的繁荣和发展

聊城地区民间美术与工艺美术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如聊城、阳谷张秋镇的木版年画,茌平剪纸和董庄的中堂画,冠县郎庄面塑,聊城马官屯、临清郭庄的玩具泥塑,临清市内的纸扎,聊城的蚰子葫芦,高唐、临清、莘县等地的土布印花等。其中有的是土生土长的,有的则是因为运河的开通,交通便利而从外部传入,或当地的技艺与外地传入的技艺相结合,使这一美术表现形式得到更完美的发展,明清两代,在北部大半个中国享有盛誉的东昌府木版年画,茌平董庄中堂画,土布印花技术,以及临清纸扎等,都是因为运河的畅通,而兴盛发达起来的。

(一)东昌府木版年画

东昌府木版年画,发源地是今阳谷县张秋镇,它影响并促成了山东西部地区十几个县的乡镇年画产地的建立与发展。而张秋镇

的木版年画,则是元代由山西晋南传来。据说,元代运河开通之后,张秋镇成为运河上的一重要码头,各地商人纷纷来此经商,山、陕两省尤甚。年画制作工艺,也随之传入张秋镇。并在这块适宜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明清两代,这里的木版年画,得到长足发展,不仅画店多,而且规模大。

在清代,张秋镇的年画店就有三家,即“源茂永”、“鲁兴聚”、“刘振生”画店,均为山西人开设。1918年间,张秋“源茂永”画店就有25盘印画案子,一年印画用纸达1440令;“鲁兴聚”画店的规模与其相当。门头五间,技工、查、发货人员达80余人。一年印画用纸1400余令,年印画数十万张。后来,刘振生看到聊城地处运河岸边,交通发达,人口集中,比张秋镇更有发展前途,于是将年画店迁到聊城。又促进了聊城年画的兴旺、发展。其年画店迁至聊城后更为发达。他们的画店历来只坐庄卖画,从不零售。春天印扇面画,供给做扇子的手工业者,阴历八月底开始印制年画,十一月就挂牌出售。据查,清末民初,东昌府清孝街、铁塔寺一带的年画,各种店有二十余家,如“五福祥”、“义和祥”、“福略”、“月泰”、“同顺和”、“裕兴和”、“福源成”、“魁元隐”等。每年十一月起,东昌府的年画除销售本省的西部、南部各县和泰安、德州、济南等地外,还远销东北三省和河北、山西、河南等省,各地商贩来这里贩运年画的络绎不绝。

东昌府年画兴旺发达之时,运销全国北部大半个中国,有着丰富的利润。正因为有利可图,因此,带动了聊城周围的许多县木版年画的制作和销售,当时的寿张、堂邑、莘县、阳谷等都有木版年画画店。至清末,这一地区已有聊城“五福祥”、莘县的“递顺”、堂邑印花杜等二十多家。

东昌府的年画如此畅销,是因为种类繁多、各式各样、互不雷同,印制质量又特别高的缘故。就当时的“灶王像”来说,就有“摇

钱树”、“里烧锅”、“外烧锅”、“金灶”、“大飞灶”等数种；还有什么“天地褂子”、“财神褂子”等等。都是一种不满五寸，印有简单象征图像的小画，这类小画，是用以所供某种神的代表物；另外，还有“炜子”。这是过年时贴在神桌前面的一种缀品，上面有好几种颜色，印有花卉，人物等图案，质朴工致，色彩谐调，大都在春节前大量赶印批售。

东昌府的年画就其内容而言，可分为三大类别：一类是故事人物年画，包括民间故事，戏曲故事，小说故事等。如“白蛇传”、“天河配”、“打金枝”等，《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赵云救阿斗”、“长坂坡”、“马超马岱”，《水浒》中的“武松打虎”以及秦琼、尉迟敬德、赵匡胤等；另一类是喜庆吉祥的内容，如“福寿三多”、“双喜临门”、“招财进宝”、“连年有余”、“五谷丰登”等，也不乏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灶王”、“门神”、“财神”、“天地神”等。这类作品体现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三类是和生活较为相近的儿童题材年画，如“五子登科”、“麒麟送子”、“莲花哪咤”、“娃娃抱鱼”、“娃娃扑蝶”、“娃娃逗猫”等。这是东昌府年画的传统题材，一个天真活泼的儿童，有的抱鱼、逗猫、采莲，有的捧花、扑蝶，形象生动，饱满甜润，既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又可以体现人们对幸福美满生活的向往。又如“麒麟送子”、“五子登科”、“吉祥如意”等画面，其设计、印色都富丽堂皇，红火吉利，体现了鲁西一带人们迎春，纳福的美好心理。

东昌府年画，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不仅形式和内容丰富多彩而且与其他民间年画产地的产品有着明显的区别，可谓独具一格。其特点一是历来只用“草版”即全部用木版分色套印，从不开脸敷彩；二是造型生动，线条简洁、刚劲、细致，富有版画意味；三是色彩一般为丹红、粉红、大红、黄、绿、青、黑、兰八色，印6~8遍成品，色彩对比强烈；四是在印制方法上左手执把，这是当时全中国

独一无二的印制方法。

东昌府年画,门神作坊,历来是刻印分家。刻的地方,大都在堂邑西部的几个村庄,如西三奶奶庙、骆驼山、徐一发、许堤口等村庄。那些村子中,不仅男子干此类刻工活的很多,不少妇女也会操刀雕刻,约期交货,论件以质付款,成为当地农村的一项副业收入。

(二)茌平董庄中堂画

茌平县杜郎口乡董庄,是民间中堂画的产地中心。该村现有65户人家,每年冬季从事绘画者约100多人,有数万套中堂画销往本省各地及河北、河南、山西、安徽等省。这里的中堂画,为何如此红火,这也是与运河的开通有着密切关系。

明朝隆庆5年(公元1571年)河北省清河县人董月迁到茌平董庄落户,其第六代孙董继白(字松云,公元1725-1796)的花鸟画就有了一定的水平。他所绘制的“条屏牡丹”从章法布局、勾线赋彩、到题字印章,都非常讲究,为后人世代珍藏。到了第七代的董玉池(公元1761-1836)时;绘画水平到了较为成熟的阶段。主攻鞍马、山水、人物。现有的《八骏图》是他的手笔,展卷望去,典雅之风扑面而来。该画章法谨慎,笔墨活泼,马匹有立有卧,神态各异,造型准确生动,设色沉着谐调。他的山水画也有一定的功夫,气韵、笔墨、构图俱佳,为世人所称道。第八代传人董立元的出现,将绘画水平推向了新的高峰。董立元(公元1791-1841)字逢春,号云槎,系继白之孙,玉池之侄,他在世虽50余年,却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和画像。曾到曲阜得衍圣公孔庆熔赏识,得奎文阁典籍之职。由于它的绘画成就,故被清朝道光皇帝授予“文林郎”的称号。他从前辈那里学到了花鸟,山水的传统技法,又攻研人物,所画人物无不毕肖,每到一处总有人高价求他画像。

董立元人物画创作,是他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选材大多为神话故事、名媛淑女。现存《三仙炼丹》、《麻姑献寿》是他的代表

作品,均为工笔写意人物画。所画线条生动,尤以画部处理最为精致,两幅中的仙女着墨用色不多,使文静善良的性格跃然纸上。另一幅《中八仙》系大幅中堂,也堪称佳作,有人把他与当时的著名书法家崔班,画虎高手杨频并列,故有“崔安杨虎董人物之称”。第九代传人董芝兰(公元1800-1860)善画人物花鸟,现存《花鸟条屏》为其代表作品,他也曾在孔府任画师多年。第十代传人董学善(公元1870-1904)山水画较好,现存《渔樵问答》出自他手。画面的中上部树木群山,系以墨色绘制而成,颇有韵味。董学诚(公元1871-1951)善画写意人物。董学敏(公元1874-1955)善画花鸟虫鱼,第十一代传人董兴金(公元1848-1923)曾在孔府任奎文阁典籍三十余年,主要绘制人像及历代帝王像。现存《仕女蝴蝶》。董兴业(公元1877-1951)善画人物,第十二代传人董友谅(字总卿,公元1892-1972)在世80年,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他年青时,从上辈人那里学到了工笔,写意的传统技法,无论人物、山水、花鸟都有较深的功底。《八仙》、《和合二仙》、《刘海戏金蟾》是他常用的人物画题材。花鸟题材则以牡丹为主,现存的《中堂牡丹》是他早期的作品。从其严谨的画风中,犹可见到与其前辈的一脉相传。《松鹤图》则是他晚年的代表作品,系用深浅两种墨色在白纸上完成。鹤顶、尾部及月亮的设色,基本上用纯色涂抹,较少变化。

建国后,董庄中堂画在艺术表现方面,变双勾为没骨,变淡彩为重彩,题材以花鸟为主,构图罗列饱满,色彩更加单纯鲜艳,勾线变得可有可无,代表人物较多,而且各具特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董庄中堂画这朵民间艺术之花迎来了春天,绘画活动又活跃起来。《文汇报》、《大众日报》、山东广播电台、山东电视台,都曾报导介绍了董庄绘画活动,引起了各界关注,也激发了董庄人的创作热情。该村作品多次参加省、地、县

举办的美术作品展。

茌平董庄中堂画,自明朝以来四海闻名。在这二十多代传人中,有多人被封文林郎、孔府奎文阁典籍、孔府画师,为国画的发展,繁荣做出了贡献。现在董庄的中堂,仍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起着重要作用。1987年4月,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深圳大学《世界建筑导报》社举办的“中国民间艺术品展览”,选入董庄农民画两幅,一幅《喂鹅》,作者张加旺、胡福秀。一幅是《交棉去》,作者董庆忠、胡传申,作品赴香港展出,并获得好评。

(三)印花土布

明朝时期,因运河开通,交通发达,棉花种植业首先传入聊城地区。广大农村,家家纺车转,户户机杼声,村村有土染。所织的土布除自己穿用外,还大量上市或销往外地,白色土布无论是穿是用,都不能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因而土布印花便应运而生。清朝道光17年(公元1837年)《高唐州志》载:“查各集贩卖花布居多……如花布一项每集贸易者,多至数十万斤。”清代还有了专门印制花鞋面、花被褥、花包袱、桌围裙条的印花店铺。当时是靠脚踏手织的手工操作来织布,印染是靠原始的技艺,工具有染锅、染缸,染料有靛兰、煮黑、红花、槐米等,花布是镂空板,刷蘸石灰调豆腐做咬白剂,亦有用线缝成蝶形皱纹,染后折线,称为扎染,染色晾干后用元宝石轧光。

当时的土布印花业十分发达,遍及阳谷、高唐、茌平、聊城等地。他们从每年旧历二月初二开始生产,直干到腊月才歇业。所印图案有“鲤鱼戏莲图”、“狮子滚绣球”、“猫蝶富贵”、“石榴和鹿”、“凤凰牡丹”等传统版样20多种,还有一种机染花纹技术更为独特。现在虽然进入了机织,机染的全新时代,但用这种土法印制的兰印花布窗帘、围裙、坐垫、台布、书包等仍有很大的销路,特别得到国外人士的青睐。因此,成为出口赚外汇的产品。

二、曲艺园地添新葩

曲艺,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喜闻乐见的各种说唱艺术表演形式的总称。聊城地区现存的曲艺品种有当地的山东大鼓、山东琴书、山东快书、山东落子、聊城八角鼓、评词、木板大鼓、三弦大鼓、临清时调、临清琴曲、高唐四平调、阳谷谷山调、茌平南城调、也有外地传入的河南坠子、西河大鼓等。在这众多的曲艺表演艺术形式中,山东快书、临清时调、聊城八角鼓与运河的通航,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没有运河的开通,没有临清、张秋这些重要商业城市的形成,这些演唱形式能否在我区产生并发展是值得考虑的,也可以说,是运河给我们带来了这三种曲艺表演形式。

(一)山东快书

山东快书起源于聊城地区,是一种民间说唱艺术。清道光6年(公元1826年),茌平县李长清和其他人进京赶考落榜后,由运河乘船返至临清,在临清编成《武松传》。李长清将书带回茌平县南岗子王庄老家,传给会打竹板演唱的艺人傅汉章,傅汉章潜心钻研,充实发展,于道光19年(公元1839年),在曲阜庙会正式演出,他传艺于师弟赵震、徒弟魏玉河。魏玉河受徒卢同文、卢同武兄弟。其后,卢同文传授杜承春、卢同武传艺杨逢山、杨逢山传艺杨立德,后形成“杨派”山东快书。赵震授徒吴洪钧、吴洪钧传艺马玉恒。同时,赵震、卢同武、杜永春因朋情传艺给唱梨花大鼓的戚永立。戚兼诸家之长,颇有成就,授徒范园德、郭元和、李元才、高元钧等。高元钧艺术造诣最为突出,影响最大,自成一家。

山东快书产生不久,便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欢迎,很快传遍全省全国。早在清朝末年,戚永立等名家就曾到上海、南京、苏杭等地演唱。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山东快书这一曲种蓬勃发展,从专业文工团体到工矿农村业余演出,山东快书节目处处可

见,特别是著名山东快书演员高元钧、杨立德,多次举办山东快书学习班,培养了大批新生力量。

山东快书演员刘同武(公元 1899 - 1961),口头文学家,山东齐河县人,其自幼学唱山东梨花大鼓,擅长中长篇书,后与山东快书著名艺人于传宾(于小辫儿)相识,交往甚厚,他把于传宾所创四页板伴奏的《武松传》演唱技艺及部分节目遂改唱“武老二”,不论演唱或伴奏均有不少发展创造。解放前,他到处流动长期撂地说书,经常在临清、高唐、夏津等鲁西北一带活动。他的山东快书表演十分精湛,口齿清楚,说表层次清晰,动作洗练,合情人理,刻画人物性格鲜明,并经常将自身武术化入表演。他于 1949 年参加高唐县曲艺队,后于六十年代调山东省曲艺团任教。由于他天资聪惠,又有长期撂地说书的丰富经验,敢于用“趟口”演唱《武松传》。在演出实践中,参照《水浒》原著的有关部分,对山东快书《武松传》进行了较大的整理改编工作。一般的快书演员演唱《武松传》至《快活林》结束,唯刘同武续有《诓军记》、《飞云浦》、《鸳鸯楼》、《二返十字坡》、《蜈蚣岭》、《白虎庄》成为完整的全本《武松传》。刘同武口述的山东快书《武松传》有两个本,一本是五十年代高唐县文化馆的抄录本,一本是 1961 年他在山东曲艺团任教时,曲艺团重新记录本。

山东快书演员杨明杨,原名杨秋圃,聊城王屯村人。自幼喜爱曲艺艺术,尤爱山东快书,后因工作需要投师著名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高元钧,学习表演技艺。他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又经数年的舞台实践,演出风格日渐成熟。近年来,他创作的山东快书小段短小、泼辣、明快、风趣,他的代表作品有《擦皮鞋》、《卖手扶》、《李白饮酒》等作品,《紧急会议》、《老沙查案》、《错走一步棋》等,曾获新乡市创作一等奖。自 1983 年以来,他创作的山东快书小段,已在全国 65 家报刊杂志上发表 254 件。他的事迹曾在《新乡晚报》、

《春草》、《曲艺专辑》等报刊上作过报导。

山东快书的主要传统节目《武松传》，全书由《东岳庙》、《景阳冈》、《狮子楼》、《石家庄》、《十字坡》、《飞云浦》、《鸳鸯楼》、《闹公堂》、《闹南监》、《蜈蚣岭》、《白虎庄》等中篇书组成的传统段儿书，流传的有《大闹马家店》、《鲁达除霸》、《李逵夺鱼》等，山东快书的现代段儿书很多，而且思想艺术性均有较高成就。抗日战争时期有《血战岱崮》、《二曹大战蒙阴城》等，全国解放后比较突出的段儿书有：《一车高粱米》、《三只鸡》、《长空激战》、《李三宝比武》等。

（二）临清时调

临清时调是由过去的“窑调”演变而来的。明清以来，临清漕运兴盛，商业繁荣，沿岸商业城市兴起。在这些商业城镇里，因社会的原因不可避免地聚集了一些被逼为娼的妇女。她们为了混碗饭吃，不得不学习一些演唱和弹奏技艺。所谓“窑调”，首先就是在这些人们之间传唱的。明朝时期竹杆巷“富喜院”的歌妓李翠萍（后流落于安州，即今惠民，改名“陈三两”）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歌妓当初用当地小曲、小调填词歌唱，故此称为“窑调”。她们当时的代表歌曲有“拔大葱”、“割韭菜”、“摘葡萄”等。“窑调”开始只在妓院演唱，后来歌妓又走出妓院搭漕船，花船、随官宦、商贾沿途陪唱，北至京津，南到苏杭，运河两岸遍地流传起“窑平调”。故清乾隆年间的《百本张钞印本》及李家瑞等《北常俗曲略》两本书中均明确写道：“北京小曲源于山东临清。”朱自清等《中国歌》一书中也对临清时调（窑调）作了这样的记载：“小曲的历史，从明初到现在，已有五、六百年之久。它的全盛时代，大约也和昆曲一样，是在清乾隆的时候。当时尤其欢迎它的是满洲人。”清道光四年（1824年）华广生编写的小调刻本《白雪遗音》一书中也收进了“临清小曲”、“下河调”。

“窑调”在运河南北流传中，大量吸收其他说唱艺术的优点，致

使“窑调”愈加丰富多彩。同时,它对“北京时调”、“天津时调”、“扬州清曲”等的形成和完善,也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随着历史的变迁,“窑调”由只唱的模式向夹叙夹议的说唱形式发展,产生了“十杯酒”、“四季荒唐”、“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苏小妹三难秦郎”等大块故事。至此,“窑调”便发展成为固定曲牌,与鲁南五十调,淄博蒲松龄俚曲,并称山东三大演唱曲调。

后来人们感到“窑调”二字有伤风雅,为文明起见,民国年间(于1920年)由卖元霄的小贩陈玉山、李函林、徐宝福、巩凤香等人借“窑调”的伴奏乐器三弦、胡琴、二胡等之丝弦,将“窑调”改为“丝调”,解放后定名为“临清时调”。演唱内容也随着时代的改进,人类的文明而不断进步,曲词婉转缠绵,乡土韵味浓厚,广泛流传,深受群众喜爱。1956年4月阎玉贞、汤桂英进京参加全国总工会举办的“全国曲艺观摩汇演”时演出的临清时调“撒大泼”获一等奖,声振全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人民日报》封面上刊登剧照。之后,又经郭兰英指导,到中南海怀仁堂向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汇报演出,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并与其合影留念。

(三)聊城八角鼓

聊城八角鼓,是独具地方特色的一朵艺术奇葩。清朝前期,原盛传于京都,在八旗军队中较为流行。到清乾年间传入聊城后,经过当地艺人的去粗取精,去伪存实,兼收亦蓄的再加工,又与当地方言和地方民歌相融汇,逐渐形成了具有聊城地方特色的说唱艺术,并受到民间爱戴,由于古运河的缘故,逐渐传到荷泽、济宁及至整个齐鲁之地。

聊城八角鼓,是以其主要伴奏乐器“八角鼓”而命名的。另外,还配以三弦、截板、小钹等。八角鼓是用檀木、乌木等硬质木料制做而成的一周呈八个角的小鼓,鼓面是用蟒皮蒙住,七个面中间安

装小铜钹,一个面中间安铜柱,柱端环上系着鼓穗。演员演唱时,左手执鼓,右手配合,随着三弦弹奏的主旋律,莖、弹、轻、槎、栢、摇、碰、簸,唱腔委婉动听,引人入胜。八角鼓演唱形式比较灵活,可有专门乐队,也可演员自兼,边奏边唱可以一人一角,单独演唱,也可多角同演。可演全本成套,也可演折子清唱。现保留曲牌 70 多个,传统节目 100 多个。

解放后,聊城八角鼓的独特表演风格,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建国初,就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整理。1953 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特邀著名八角鼓艺人逯本荣、石兆义、元怀明等赴京献艺,录制音响资料。其后,聊城八角鼓创作了一大批现代题材的曲目,在中央、省、地大赛中多次获奖,曾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化部、省曲协、省文化厅的表彰。

三、民间舞蹈增新秀

聊城地区的舞蹈艺术多起源于民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种类繁多,风格独特,分布广泛,为广大群众所喜爱。据统计,全区现有柳林花鼓、伞棒舞、火狮子、五个秃、姜老背姜婆、五鬼闹判、竹马、哆嗦旗、龙灯、顶灯、善鼓舞、抬辈等五十三种舞蹈。从表演形式、动作姿态、风格韵律看,都各具特色,不仅继承传统的古朴遗风,而且也吸收了许多外地舞蹈的特点,从而在我区广泛流传。其中,伞棒舞、五鬼闹判舞,则是因运河的开通而产生发展。同时,其他民间舞蹈,也随着外来优秀舞蹈的不断传入,而吸收新的营养,获得新的生机。

(一)五鬼闹判

五鬼闹判是流传在临清市区的一种面具舞蹈,俗称“判子会”,在箍桶巷街、前关街、吉士口街等四起判子会中,以福德街判子会技艺出名。

五鬼闹判相传是元末明初运河开通之后从江苏南通一带传播而来,已有六百年的历史。临清由于运河的开凿,明、清以来舟船南北往来,商贾云聚,自然带来了文化繁荣。明代万历年间刻本《梼杌闲评》记载:“……临清市上,是个繁华大码头处,时逢年节,当于鲍老盘旋,满市傀儡跳跃……牡丹亭唐王醉杨妃,采莲船吴王拥西子。步詹官三元及第,占鳌头五子登科。吕纯阳飞剑斩黄龙,赵文坛单降黑虎,数声锣响,纷纷小鬼闹钟馗,七陈旗开,满街头童叟齐喧。斗柄回寅,万户笙歌行乐事……”五鬼闹判已于明代进入了鲁西北的重镇—临清。

五鬼闹判是五个手执琴、棋、书、画、伞的小鬼闹判官,在纷闹中判官明察秋毫,指挥若定,驱恶扬善,刚直不阿。判官,即镇鬼之神钟馗。清朝宣统年间,临清的“五鬼闹判”与南通之“闹叛”分庭抗礼竞相发展,独自形成为北派风格,即以武功见长,风格粗犷豪放,代表舞有《穆莲僧救母》。

“五鬼闹判”舞蹈借鬼喻理、伸张正义,鞭挞邪恶的意蕴,还有丰富多彩的舞蹈语汇,灵活多变的舞蹈队形,变化交错的锣鼓伴奏。那“蝎子爬”、“拿大鼎”、“飞旋子”、“滚绣球”的小鬼与那在众鬼闹中神情自若,时而抚琴品曲,时而举盘奕棋,时而抚髯、时而凝目观画的判官,配合默契,形神入微,维妙维肖,情趣盎然,使观众百看不厌。

解放后,几经整理改编,删去了具有恐吓色彩的“火稽角”及迷信色彩的“阴阳官”、“牛头”、“马面”等角色,汇合南北派艺之精华,使其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清新向上的风貌。

(二)伞棒舞

伞棒舞流传在聊城市梁水镇梁闸村一带,是以“伞”和“棒”表演主体的秧歌舞蹈。

梁水镇是古运河道的水闸码头,明朝末年,百余艘运粮皇船行

至码头南,因水落而搁浅数十日。押粮官员闲暇无趣,于是令地方官召集当地艺人登船献艺。吹拉弹唱过后,当地武林献艺。几套空手拳脚激起粮官的兴致,又令其持器械而舞。在舞中又借押粮官头罩绛罗伞与仆役手中黑红棍而舞之。此后,每逢年节,即自做红伞和黑红相间的棒,五人、九人、十一人持之相舞,以伞为引,伞棍配合默契,故称“伞棒舞”。

后经发展与演变,又增加了“火流星”、乐队和“花大姐”、“憨老婆”、“小媳妇”、“三花脸”、“憨小”、“木皮虎”等角色。

伞棒舞一般在春节表演、婚丧嫁娶也参加庆典。表演时,以伞棒开场。引请角色入场,有伞棒对舞、伞独舞和棒的集体表演。另有以伞做指挥的各角色演唱,伞指向谁,谁即出场演唱。演唱曲子有“秃子闹房”、“闺女出嫁十二难”、“小磨坊”等。

伞棒舞的动作多与武术相揉合,粗犷豪放,铿锵有力,有骏马腾跃之感,充分体现了鲁西人民的性格。

四、刻版印刷业兴盛发达

明清两代,聊城的刻版印刷业达到鼎盛发达时期,无论是木版年画,还是刻版印书,都在全国享有盛誉。因此有“江南桃花坞,直隶杨柳青,东潍西聊在山东”的说法。关于木版年画,已在“美术”的繁荣和发展中论及,这里主要谈的是聊城的刻版印书业。

聊城的刻版印书业始于明代洪武初年。运河开通后,山陕商人云集聊城,其中不乏刻版印刷的能工巧匠。他们将这门高超的技艺带到聊城,并开始刻印启蒙读物和通俗读物,因此,明代早期,聊城新出现了一些小型木版书和印刷作坊。据传“友好堂”是出现最早的一家刻版印书作坊,当是聊城刻版印书业的开创者。

明中期之后,运河漕运更加兴盛,做为运河北段的重要城镇——聊城经济也迅速发展,文化事业相继繁荣,刻版印书业随之蓬勃兴

起,出现了“书业德”、“善成堂”、“宝兴堂”、“有益堂”四大书庄和一大批中小型书坊及不计其数的书摊书贩。印书、制笔两行一跃成为聊城的主要行业。

明清两代,刻版印刷装订,都是手工操作,但因为当时书坊林立竞争性强,没有好的质量便难以存在下去。因此各书社、书坊选用刻版、印刷、装订的工匠都要求很严、在生产过程中也严把质量关。他们对刻版、印刷、校勘、装订乃至纸张的选用都十分讲究。当时,凡是聊城出版的书籍,全都雕版精良、字画清晰,校勘认真,装订讲究,颇受市场欢迎。当时出版书的种类很多,经史类的有《资治通鉴》、《五经备注》、《通鉴辑览》等有数百种之多,医药类的有《本草纲目》、《伤寒论》、《针灸大成》等也近 200 种。当时有些书庄、书坊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据记载,当时居四大书庄之首的“书业德”共有书版千余种,分库保管,设有“经史版库”、“启蒙书版库”、“小说版库”、“医杂版库”等。与“书业德”不相上下的“善成堂”,其盛期也有书版近千种,包括“四书”、“五经”、“小说”、“医书”、“卜书”、“善书”、“画谱”、“棋谱”等 200 余种。另有供科举考试用的“闱书”版百余种。善成堂的书版,均聘请堂邑雕刻能手刻制,有自制原版、也有翻版、复制版。刻版工程浩繁,如一部《三国演义》多达 1100 余页,工人分头雕刻,需三年功夫,一部《五经备注》只刻工工资一项,就要耗银 1500 两,再加上纸张、印刷、装订、包装运输等项,可见没有相当雄厚的资本,是难以成为书庄或书坊主的。

清代早中期,聊城的刻版印刷业达到空前繁荣阶段。出版的各类书刊行销北部大半个中国。每年冬季,各地的书商蜂涌而至,张家口骆驼队,河北的大车帮、山西的毛驴群。云集聊城,大量采购书籍、毛笔、木版年画等,形成“乱市”。当时,各种书画刊印作坊、书店、画店、笔店遍布聊城大街小巷。仅当时的清孝街、铁塔寺

一带就有各类书、画、笔店铺上百家。一里多长的东关大街，街面上设有各类营销书、笔、画的商店 200 多家，称为东昌书画。因此，当时有“东昌作坊，书笔两行”之说，形象地概括了聊城书、笔两业的发展盛况。

当时的刻版印刷业，不仅局限在聊城城内，还波及周围 20 多个城镇和许多乡村。如堂邑、莘县、阳谷、寿张、张秋等地，也都有许多从事刻版印刷的。产品有的当地销售，有的则运到聊城销售，对聊城当时刻版印刷业的繁荣和发展也起到很大作用。

津浦铁路建成后，交通要道东移，自此，运河漕运日渐衰萎，聊城的刻版印刷业也相继萎缩。又加上战乱时期，兵匪滋扰，大量图书版损失严重。特别是聊城解放前夕，被困在城内一年之久的国民党匪兵，弹尽粮绝，把书版拿来取暖做饭当柴烧，将许多珍贵的书版烧毁。兴旺发达的聊城刻版印刷业从此一蹶不振。

五、聊城毛笔闻名遐迩

钢笔传入中国之前，毛笔曾是我国人民的主要书写工具，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那用毛笔作为主要书写工具的时代里，制笔业的发达，也从一定程度上象征着文化事业的繁荣。

明清两代，运河成为南北运输要道，带来了运河沿线的经济和文化繁荣，毛笔用量大增，聊城的制笔业也就应运而生。明朝中期，这里的毛笔生产已十分发达，全市有制笔工人千余。清朝早中期，这里的制笔业达到鼎盛时期。清朝顺治三年（公元 1646 年）开科取士，聊城傅以渐用本地所产毛笔写出了光彩照人的文章，深得顺治皇帝的赞赏，御笔钦点头名状元。康熙皇帝巡幸聊城，曾用聊城毛笔撰文赋诗，并为光岳楼题写了“神光钟暎”的匾额。康熙 60 年（公元 1722 年）聊城邓钟岳用聊城所产毛笔进京应试，康熙皇帝朱批“字压天下”钦点头名状元。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聊城时，

也曾用聊城生产的毛笔书写了“层栏杰构入云区，耸峙城中镇四隅”等御诗四首。海源阁创始人杨以增用聊城毛笔撰写了《重修光岳楼记》碑文。因此，聊城毛笔闻名遐迩。

清朝末年，聊城制笔业还相当发达。大小作坊 30 多家，其中较大的作坊有“余子尚”、“玉山堂”、“德华斋”、“老文友”、“鲍乾元”、“魁纪堂”、“文聚堂”、“德润斋”、“老魁盛”等作坊。工匠多者 100 余人，少者 30 余人。此外还有小作坊 22 家，当时全市约有制笔工匠八、九百人，年产毛笔总量达 300 多万支。毛笔制作分为水盆、干棹两大工序。水盆是制作笔头，干棹是制造笔杆。艺徒学徒时就要分学。水盆五年出徒，干棹四年出徒。当时制作的毛笔品种也相当多，有 200 多种。最大的“抓笔”毫长六寸，选用上等猪鬃、羊胡精制而成，可以写三尺大字。最小的蝇头小楷，毫长只有斗寸。按制作原料分，又可分为“羊毫”、“狼毫”、“兼毫”、“七紫三羊”等。

聊城毛笔，除少数纯羊毫楷笔外，基本上都沿用三国时期“韦诞法”制作，经过大小七十二道工序，才为成品，其特点是外形美观、刚柔相济、富有弹性，吸墨性强，经久耐用。书写时纵横挥斫，挺拔有力，圆润流畅。具有精品毛笔所特有的“尖、齐、圆、健”四德。因此，产品大量销往山西、河北、河南及本省各地。

随着运河漕运业的衰败，毛笔制作业也逐日凋零。进入民国后，大作坊相继倒闭，小店号勉强支撑维持。此时，全县毛笔制作工匠不足 200 人，年产毛笔仅 50 万支。随着钢笔、圆珠笔、铅笔的广泛应用，毛笔使用范围逐渐缩小，毛笔生产也基本停滞。近年来，书法绘画兴旺起来，毛笔的购买量增加，因此，聊城于 1987 年又重新成立毛笔厂，恢复了这一传统产品的生产。

六、戏剧舞台绚丽多彩

戏剧是戏曲、话剧、歌舞剧的统称,是我国传统的艺术表演形式之一。我区早在东汉建武年间(公元25年至公元57年)就有百戏演出活动。唐代建有简易戏场和庙台,是早期戏剧演出活动场所,迄今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我区现存最早的戏剧舞台建筑,应为阳谷县张秋镇清代康熙三十二年所建的“山陕会馆”内的戏台。设计建筑精良的戏台应推聊城乾隆八年所建的山陕会馆的大戏楼。我区有明确记载的戏曲演出活动是清朝道光二十六年农历六月二十一日(公元1795年)于聊城山陕会馆戏楼上“德义班”的演出,明清两代,当地产生的地方独特剧种有高唐、聊城“四根弦”、临清“乱弹”与“吹腔”、冠县“哈蟆嗡”、东阿“王皮戏”、茌平“花鼓戏”等。传入剧种有京剧、横笛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戏、大弦子戏、南北调、两夹弦等八种,从以上情况看,不管是演出场所,还是剧种,都与运河开道,交流便利,商业发达,文化交通频繁有着重要关系。

(一)演出场所星罗棋布

从演出场所来看,明清两代,沿运河两岸的重要城镇,各式各样的戏台十分兴盛。目前保存最完好,最有代表性的戏台,应属聊城山陕会馆的大戏楼。戏楼坐东朝西,为三层三间歇山建筑,正面为三间台口,台基高2.3米,中间有一通道是由大门通往院内的中间通道。前台宽9.6米,进深5米,后台宽8.6米,进深3米。前台檐下5块额坊均为透雕,中间一方主雕福、禄、寿三星故事,两边为飞龙花卉等,做工精细,形象生动,四根檐柱均为石雕,并刻有楹联两幅,内柱楷书阳刻对联是“宫商翕奏,赏心是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扮演成文,快意在坦道骏马,高帆顺风”,柱础上右刻吉庆,左刻如意,均为变形篆。外柱楷书阴刻楹联是:“结五万春花,奏雅

宣和,无戾风骚称杰构”、“谱大千秋色,镂金错彩,有裨世教即奇观”。

柱础上刻有花卉图案。戏楼中部迎屏幕柱上有木刻抱柱楹联一副:响遏行云,一曲笙簧欣乐利;歌翻白雪,八方舞蹈庆升平。戏台左右折屏上各有石刻山水画一幅,左为“海市蜃楼”,右为“天台胜景”。戏台后台墙壁上原有供奉志郎君的神龛。南北化妆室及后台墙壁上还留有自道光25年(1845年)至民国8年(1919年)各地戏班用毛笔题写的十多首打油诗和上百个剧目,以及戏剧班社的名款,为研究戏剧发展史留下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戏楼顶部的建筑形制更为特殊,国内罕见。一般顶部为四个挑角,而该楼顶部向东北,东南各伸出两个挑角,向西北,西南各伸出三个挑角,成十翼角,如凤凰展翅,似俊鸟争飞,犬牙交错,争奇斗胜。其设计独特,精工细做的结构,不仅可以与北京颐和园中的德和园“大戏台”相媲美,而且还可以和故宫内庭“淑芳斋”戏台争高低。清至民初,每年的春季和秋季,这里有两度庙会。届时,人山人海,摩肩擦背,十分热闹。在此演出的剧种有山西梆子(晋剧)、京剧、黄梅戏、豫剧、河北梆子等数十种。其他剧目也十分丰富繁多。根据后台题壁可知有五福堂、富贵图、黄金台、春秋笔、日月图、美人图、宇宙峰、满堂福、六月雪、辕门斩子、探母、秦琼卖马、大保国、韩信拜师、鸾凤图等上百个剧目。

沿运河现存最早的戏台,当数阳谷县张秋镇山陕会馆内康熙五十一年(1716年)的戏台,比山陕会馆内的戏台要早四十多年。建筑规模虽然不大,但其歇山式的顶部结构,也体现了建筑工人的高超技艺。

阳谷县阿城镇,清代曾有戏台多处。在这里山西盐商建有“运司会馆”(又称山西会馆,因其坐落在镇的南部,当地俗称其为南会馆),也有山东周村人建的会馆,叫“於陵会馆”(周村地属长山,而

於陵系长山旧名而得),因地处镇东,故俗称东会馆,两个会馆内都有戏台建筑,同时在山西人建的海会寺内,也有戏台建筑。这里的运司会馆和海会寺地基相连,会馆在寺的西侧,会馆前院实际上是一个旧式戏院,正对大厅修在大门上的南庭即是戏楼,前为舞台,后为化妆室。海会寺山门外百余步也有一个戏台,所以会馆戏楼称里戏台,寺门台称外戏楼。每年春秋两季有两次古庙会。据县志记载“每会百货云集,买卖兴隆,演戏八天,十余日贸易不绝”。这里演出的剧种多为河北榔子和河南榔子。

魏湾,是运河沿岸拐弯处的一个小镇。该镇西街真武庙的戏楼相当出名。其匾额“梨园风景”四字,由清康熙六十年辛丑科状元、礼部侍郎、书法家邓钟岳亲书,这更提高了这一戏台的知名度。明柱之上的抱柱楹联也别有情趣,上联七字为“传传传传传传传”,下联七字为“调调调调调调调”,这一妙趣横生,耐人寻味的楹联,也使这一戏台名扬四海。

明清时期的临清,因为商人云集,经济发达,戏台林立,仅市内就达十七家之多。如位于运河头闸口的漳王庙戏台、运河二闸口桥东的大王庙戏台、市内太平街中部的大关帝庙戏台、卫河西岸米市街的万家园戏台、运河北岸柴市街北的药王庙戏台、市内太平街东首的娘娘庙戏台、砖城东门里南营街的城隍庙戏楼、市内大寺街路北大宁寺戏楼等等。特别是大宁寺戏楼,因附佛殿建筑,没有后台,在西侧设有砖砌梯道供演员上下,该戏楼坐北朝南,为元代伸出式全木构戏楼,单檐四坡顶,戏台由八根柱础承托望柱间寻杖与地之间的镶嵌通花栏板。栏板刻有“凤戏牡丹”、“麟趾呈祥”、“喜鹊登枝”、“幽石兰草”等图案,其建筑精工细雕的程度可见一斑。

运河自阳谷县张秋入境,至临清出境,所有沿运河的重要城镇,几乎都有戏台或戏楼,这从一侧面反映出明清两代戏剧繁荣的盛况。

(二) 剧种剧目百花齐放

演出场所的表达,必然促进剧种的成熟、戏目的繁荣。如前所述明清两代,聊城地区流行的剧种达十余种,而颇具影响的是京剧和各类梆子戏。

京剧是国粹,在它的发展历程中,也不难看出运河开通对它的巨大影响。清乾隆五十年(1790年),四大徽班陆续进北京演出,于嘉庆、道光年间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有合作,相互影响,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又吸收了一些民间曲调,逐渐形成相当完整的艺术风格和表演体系。其实,徽班的许多戏剧班社,都曾沿运河北上,在运河沿岸的城镇演出。山西的许多戏剧班社,也随商人来聊献艺,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内壁上的题记可以作证。“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江南‘三庆班’、‘四喜班’,头天《明月缘》、《红桃山》。二天《云罗山》一本”。“同治三年正月初一日安徽同庆班”,“山西泽州府凤台县全盛班”等,这些戏剧班社的北上,无疑会对京剧的形成产生较大的影响。

“大笛子”戏流传和兴盛也是清代乾隆年间,其主要流行区域在菏泽、濮阳、郛城、鄄城、聊城、临清、曲周一带,也是在运河沿岸。“乱弹”剧种,也是在乾隆年间才走上舞台成为独立剧种。其东部流行区域也是在临清、莘县、阳谷、夏津一带,再如“四根弦”,“吹腔”等,都是在乾隆时期发展并兴盛起来的,而此时,正是运河畅通漕运发达之时。从剧目来看,各剧种都有自己的传统剧目,据不完全统计有160余个,因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七、运河畅通 名人辈出

聊城地区,这块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宝地,在春秋至元代的漫长历史长河中,曾经出现过孙臆、鲁仲连、华歆、马周、吕才、王彦章、王旦、成无几、王懋德等著名历史人物,为鲁西大地增添了不少

光辉。元代运河开通之后,因交通便利、经济繁荣而带来的文化昌盛更使这里人才云集,名人辈出。特别是明清两代,进士、状元代有人出。据不完全统计,有文武状元、进士二十多名,仅聊城一县,明清两代就有王、朱、耿、付、任、邓、杨七大家,其中,傅以渐和邓钟岳又都是状元公。

王是指明代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王汝训(1551-1610年),他字师古,号谿阳,聊城王楼村人,自幼聪慧好学,七岁读完《四书》、《五经》、《史记》、《左传》,他二十岁便少年得志,考中进士。初放元城县令,有政绩。万历初年升任刑部主事,后改任兵部主事。他为政清廉刚正,家无积蓄,他在浙江巡抚任期内,扬善抑恶,惩处贪官污吏,因而触动了万历皇帝,下令将汝训削职为民。他居家15年,后又被起用为南京刑部左侍郎,后改任工部左侍郎。死后,赠工部尚书。生前纂有《东昌府志》二十卷,《疏草》二卷,文集六卷。

朱是指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朱延禧,其字允修,聊城人。初授官翰林检讨,后迁至礼部右侍郎,任日讲官时,讲《尚书》“可爱非君”一章时旁征博引,授古喻今,颇得熹宗喜爱,称赞他为“讲官第一”。拜为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后又升任太子太师、建极殿大学兼吏部尚书。后遭权奸魏忠贤党羽陷害,罢官回乡。死后,谥文恭。著有《畸齐诗文集》十五卷传世。

耿是指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耿如杞。其字楚材,聊城人。考中进士后,初授户部主事。天启元年改任职方郎中,他为官刚正不阿,不向恶势力屈膝。他在任遵化兵备副使时,巡抚刘诏让他呈文建魏忠贤生祠,他坚决不从。后来,抚镇率文武将吏向魏忠贤像五拜三稽首,他拒不从命。中军刘凤翔力劝其参拜,否则将遭杀身之祸。他厉声说:“吾头可断,膝必不可屈。且吾祖先以劾逆瑾得罪,此膝一屈,吾何面目复入先人坟墓乎!”使者将此事报于魏

忠贤，奸贼魏忠贤立即指派党羽将其逮捕入狱，诬陷他得赃款6300两，定为死刑，秋后问斩。多亏当年毅宗(崇祯)即位，魏忠贤被诛，他才获释。

他著有《与争录》、《楮墨廷杖议》、《抚晋疏稿》行于世。

傅是指清顺治三年(1646年)殿试夺魁的傅以渐(1606-1665)。他字于磐，号星岩，聊城人。自幼聪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三岁能诵史，五岁熟记经史不遗一字，十岁工属文，博览群书。因此，清朝开国第一次开科取士，他便首夺大魁，成为清朝的第一名状元，初授翰林院修撰。他仕途顺达，累迁至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他为官清正谦恭，从不傲下。据史料记载，“公居相位，食不重味，衣皆再浣，无异寒素”。别的官员都骑马坐轿，他却以驴代步。一日被世祖(顺治)看见，遂赐傅以渐骑驴画像一幅，也足见其君臣关系之融洽。他官居相位，对乡里百姓却能周贫济苦，和颜相待，深得百姓拥戴。

相传，傅以渐为相期间，家里人和邻居因一墙之宽的宅基，发生了纠纷，并经官动府地打官司。家里人为打赢这场官司，飞速告之傅以渐，想得到他的支持，傅以渐得知后，挥笔写了封信交给前往报信的人，并让他火速赶回。家里人接书后，拆开一看，是四句诗：“千里送信皆为墙，让他几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尚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里人们看后，认为他讲得有理，便主动将宅基让出三尺。邻居见后，十分感动，也主动将宅基线让出三尺，中间空出一条六尺宽的胡同。民众纷纷称赞，并将这条胡同誉为“仁义胡同”。

傅以渐治学也十分严谨，他博览群书，勤于思考，他对天文、地理、礼乐、法律、兵农、漕运等无不涉猎，他著有《狐白解太史名篇》、《中规篇》、《易经通注》、《诗经礼记春秋题说》、《易经制义》、《贞固斋四书制义》、《贞固斋诗集》等，康熙二年居家养病期间，还主持编纂了《聊城县志》。

任是指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任克溥(1618-1703年)。他字海眉,聊城人。初授南阳推官,因政绩卓著,即任吏科给事中,后升任刑部左侍郎。康熙十八年(1679年),因有人告发白莲教将在东昌一带作乱,他未及时上疏,被落职回乡。他居家期间,急难乐施,好行善事,也十分关心百姓疾苦,聊城广为流传的“无税碑”的故事,就是对任克溥关心百姓疾苦的赞誉。

相传,他回乡后本想安度天年,谁知东昌府连年遭灾,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地方官吏不但不减税挽民,反而苛刻地搜刮民财。克溥为救乡民,曾三次上疏皇上,均未得到答复,正在焦急之时,得知康熙皇帝又要南巡路过东昌,他便心生一计,安排家人照计行事。

不久,康熙皇帝果然南巡来到东昌,任克溥同地方官员沿岸列队跪迎,不料,龙舟在东闸口附近触物搁浅。地方官员忙令河工下去清理障碍,河工从水下捞出石碑一块,上面刻有文字,随行官员立即察报康熙皇帝。皇帝问上面书写何字,任克溥急忙跪奏道:“启奏万岁,此碑沉于河中,胆敢阻挡拦舟,恐有缘由,还请万岁明察为好。”康熙点头称是,遂任克溥及地方官吏亲裹石碑。康熙见石碑上写有四个大字,便顺口念道:“今日无税。”语言未落任克溥忙双膝跪下高呼:“谢主龙恩。”康熙不解其意,忙问:“爱卿,何意?”任克溥便把东昌府连年遭灾,民难度日的困境讲了一遍,又说:“古碑出于河中,都是天意,万岁体恤灾民,亲免赋税,我应当代表乡亲父老谢恩。”此时,康熙皇帝也顺水推舟地说:“东昌连年遭灾,本应早免赋税,今日古碑显现,此乃天意,就照此办理吧。”其实,并非天意,乃是任克溥为拯生民于水火而冒死设下的计策。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帝再次南巡过聊城时,为任恢复原职,后又加封为刑部尚书。生前著有《任克溥奏议》、《占鳌蓑庵诗集》。终年86岁。

邓是指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士并以一甲第一名中头名状元的邓钟岳。先入翰林院供职。为官一生,多从学政。他操行方正,刚直端厚,即不阿权附势,也不附合苟同。因此,人们对他的品倍加赞许,他一生酷爱书法。最大的成就也在书法方面。相传当年殿试结束后,主考大人将前十名的答卷呈送皇上钦定状元、榜眼、探花,康熙皇帝看过邓的考卷后,感觉他的文章一般,但字却超群,因此随笔批了八个大字“文章平平,字压天下”。并因字而点了他的头名状元。至今,聊城人民仍然怀念这位书法家。他的不少墨宝珍藏在民间。卒年74岁,著有《知非录》一卷、《寒香阁诗集》四卷、《文集》四卷。

杨是指清道光二年(1882年)进士杨以增。初授荔波县知县,后官累至陕西巡抚、江南河道总督。咸丰五年(1855年)病逝于任所,享年69岁。他一生为官清正刚直,政绩卓然,但因他藏书家的名声远远超过了他的政声。因此,人们知道杨以增这个名字的,大都是因为“海源阁主”的原因。

他自幼酷爱藏书,步入仕途之后,更是广交文士,大量搜求珍本秘籍,并建“海源阁”藏书楼珍藏之。由于杨以增的努力,杨氏藏书迅速增加,特别是杨氏海源阁藏书楼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私家藏书南富北贫的传统格局。咸丰年间,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冲击下,江浙藏书家多不能自守,“各地藏书,一时俱出”。时任江南河道总督的杨以增乘机大量收购,很快“辗转于吴越间几百年之文献,几为杨氏一网打尽矣”。很快,他便成为中国藏书史上与江南可对峙的“北杨”。在那社会动荡,战争频繁的年代里他能将流散于社会的珍贵版本收藏于海源阁,无疑,为保护中国历代文化遗产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另外,临清的明代布衣诗豪谢榛、明末名将左良玉、清代镇台总兵吕恒安、阳谷的清康熙年间曾为太子师的诗人刘琰;东阿明永

乐年间兵部尚书张本、隆庆二年进士著名文学家于慎行；聊城明万历进士傅光宅；冠县明宣德年间户部尚书郭敦；茌平顺治十二年进士王曰高；高唐明万历年间兵部尚书杜潜、清顺治、康熙两朝兵部尚书并因反对权奸鳌拜圈占民田而慷慨就义的朱昌祚，都出在运河畅通的明清两代。因篇幅所限，他们的事迹不再一一介绍。这一重要现象，绝非历史的巧合，应该是造就了明、清两朝的名人。

运河造就了一批名人，同时，这些名人中，也有不少为运河的畅通而贡献过力量。如郭敦，他在宣德二年任户部尚书之后，曾建议疏浚运河，发展漕运。明史载：“建漕运议，民运至瓜洲、仪真，资卫运至京，民甚便之。”在郭敦的建议下，运河畅通，方便了运输。另一位与运河有关的是永乐年间的刑部右侍郎张本。明史载：“命督北河运，躬自相视，立程度舟行得无滞。”意思是说，在张本督管漕运之时，舟行无阻。第三位是著名的藏书家、海源阁主杨以增。他六十岁任江南河道总督，无疑，江南运河也归他管。据有关资料记载，他在河道总督任内，勤于政事，关心黎民百姓的疾苦。既保证了河道畅通，又保障了堤防牢固而留誉于民间。

八、东昌府和名著

明清两代，因运河畅通，促进了南北双方的文化交流。全国众多文人学士，纷纷来东昌府。他们来的目的各有不同，但他们一方面把本地的优秀民俗文化带到了东昌，另一方面，加深了对聊城风土人情的了解，都是一致的。因此，在明清两代产生的许多文学名著如《水浒》、《金瓶梅》、《老残游记》、《聊斋》等，都涉及到东昌府。

《水浒》中的第二十三回，描写的武松景阳冈打虎、第二十六回，狮子楼武松斗杀西门庆、第五十二回李逵打死殷天锡、柴进失陷高唐州、第五十三回中“话说戴宗、李逵各藏了暗器……离开了高唐州，取路投蓟州来”，第五十四回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

探穴救柴进,第六十九回东平府误陷九纹龙、宋公明义释双枪将,第七十回没羽箭飞石打英雄、宋公明弃粮擒壮士、第七十四回燕青智扑擎天柱,李逵寿张乔坐衙等,不仅所占篇幅多,而且大都是《水浒》中的精彩章节。在上述描写中,曾多次提到阳谷县、高唐州、东昌府、冠州、寿张县等地名。特别是武松打虎、武松斗杀西门庆、李逵大闹高唐州等,都是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片断。

文学名著《金瓶梅》与东昌、临清、阳谷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临清,因运河畅通、漕运发达,商贾云集,这里已经成为沟通南北商业贸易的重要城市。这里的商品经济发达,预示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正是《金瓶梅》产生的最好土壤,关于这一点,我曾在《论明代临清经济的发展与〈金瓶梅〉成书之关系》(见临清金瓶梅学会编《临清与金瓶梅》一书)一文中作过专门论述,不再赘述。这里应当指出的是,《金瓶梅》一书从第五十回开始到一百回的四十二回中,有二十五处直接写到临清,如临清州、临清码头、临清钞关、临清闸、临清晏公庙、临清市上、临清第一座酒楼、临清谢家店等,另外,书中描写的许多风俗特产、方言土语也都和临清相仿。这些都足以说明临清这一运河上的商业城市与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金瓶梅》的密切联系。同时,书中还多次提到东昌、阳谷等地名,这也都是运河沿岸的重要商业城镇。恩格斯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这说明,一部文学名著的出现,是脱离不开经济基础的。《金瓶梅》这部文学名著的形成,就是依赖于运河这条运输大动脉造就的繁荣发达的经济而产生的。

另外,《老残游记》中多处提到聊城、临清。《聊斋志异》一书中,在“胭脂”一篇中,故事情节的发生地点就在聊城,自然对聊城的描写就更多了。这都说明,运河给聊城带来了知名度,而使聊城能够多次出现在众多文人学士的文学名著之中。

运河的畅通,带来了聊城地区明清两代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现在,京九铁路已经通车,济馆高速公路已经开通一半,邯济铁路也已放线定位,即将开工,聊城已经成为交通发达的黄金十字路口。文化列车也已经沿京九线南下,给沿途的文化事业注入了新的生机,这一切都预示着随着聊城经济的腾飞,文化事业也必然会有一个飞速的发展。

本篇在写作过程中,曾经翻阅了许多文献资料,参考了许多同志的调查或研究成果(见参考书目)。因篇幅所限,不能一一提名,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参考书目

- (1)《明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卷一百七十五、卷二百七十三。
- (2)《高唐州志》光绪丁未镌。
- (3)《茌平文史资料》第二集,政协茌平县文史委员会编。
- (4)《临清文史》第四集、第六集,政协临清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5)《聊城地方史志》1983 年第二期、第四期,1984 年第一期。
- (6)《山东省文化艺术志资料汇编》第十二辑,山东省文化厅史志办公室、聊城地区文化局史志办公室编印。
- (7)《鲁西风情》亢德玉编著,山东友谊书社 1989 年第 1 版。
- (8)《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聊城》中共聊城市委宣传部、聊城市政府办公室编,山东友谊书社 1995 年版。
- (9)《文博论集》陈麒麟、竞放编,山东省出版总社聊城分社 1990 年版。
- (10)《东昌古今备览》齐保柱编著,山东省友谊书社 1990 年版。
- (11)《阳谷县志》山东省阳谷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

书局 1991 年版。

(12)《高唐县志》山东省高唐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齐鲁书社 1996 年版。

(13)《运河名城临清》高志超主编,山东友谊书社 1990 年版。

(14)《水浒传》施耐庵、罗贯中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15)《金瓶梅》兰陵笑笑生著,齐鲁书社 1992 年第二版。

(16)《老残游记》刘鹗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第二版。

(17)《临清与金瓶梅》临清金瓶梅学会编,山东聊城地区新闻出版局 1992 年版。

(18)《鲁西名人传略》张锡九主编,山东友谊书社 1991 版。

(19)《聊城地区文化志》山东省聊城地区文化局史志办公室编油印征求意见稿。

(20)《张本墓》档案资料,聊城地区文物研究室编并存。

(21)《傅光宅墓如石刻》档案资料,聊城地区文物研究室编并存。

(22)《郭敦墓》档案资料,聊城地区文物研究室编并存。

原载《山东运河文化论文集》

运河与临清城的变迁

殷黎明

临清地处鲁西北边陲,东临高唐、茌平,南接聊城、冠县,北毗夏津,西隔卫河与河北省相望,大运河从其腹地穿过,更有马颊、卫水左右呼应,其地下为海相沉积,地面为黄河冲积平原,这里土地平坦肥沃,气候四季分明,是人类繁衍生息的理想之地。

临清从聚落兴起到城市的形成,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地理环境是历史发展的外在因素,它可以延缓或促进城市历史的发展。在不同的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城市的形成和历史发展就有着不同的色彩。临清一域从聚落发展为城市,几经迁徙,其命运维系于水,维系于运河,是典型的运河城市。

临清历史上地处黄河下游平缓低洼地带,凡有水患定会首当其冲,暴虐的黄河历史上几经光顾。有记载以来,黄河从下游决口约 1500 余次,并曾一度夺清河(即卫河),正如《禹贡·锥指》载:“以今舆地合之……堂邑、聊城、清平……诸州县中,皆古漯水之所经,自宋世祖河决商丘,朝城流绝,而旧迹之存鲜矣。”

汉代,在临清域内还有一个隶属巨鹿郡,后改属魏郡的县级政权—清渊县,它应该说是临清的前身。《中国古今地名辞典》载,“临清县,汉清渊县。后魏析置临清县”。西晋咸宁中(275—279 年)清渊县改称清泉县属司州部阳平郡。十六国后赵建平元年(330 年)改清泉县为临清县,临清之名始此。其治设于今河北省临西县仓集镇,直至魏太和二十一年(497 年)复设清渊县,治迁清

河郡。北齐、清渊、临清合，复称清泉县，治清水，即今冠县北、卫河东清水镇。此间曹魏利用黄河故道开凿了一条人工运渠—白沟，起自河南卫县经淇县、滑县、内黄顿丘复向东北流过河北省馆陶县南，威县东清阳县故城，东流注入渤海，《三国志·武帝纪》有“建安九年春正月，济河，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的记载。曹操在一首诗中曾写到：“立马白沟上，遥看粮草堆。”须知，此白沟大概循今之卫河，至今流向无大变，此运渠促进了华北中原一带的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河港水运交通的重要地位，对北方河道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此时的临清—清渊城正处在白沟河之滨，并已形成重要港口。自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至隋大业四年开凿永济渠，北运河与南运河沟通，临清县治所在仓集共存在630余年，现遗址尚存。

隋朝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起自余杭，止于涿郡，其北段称永济渠，又名御河，本古清河，时为军事所需开凿的，永济渠成了一条具有深远影响的南北水路交通运脉，是世界上最早、最长的人工运河。在以后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长期发挥着作用，在使用了近六百年后，终因地理环境的变迁，其末段被淤塞废弃。临清治所—今仓集镇，紧靠永济渠，是古代建仓储粮的地方，现有称“堂台子”的地方，传说是古县城署衙所在，现地面仍有很多残毁建筑构件、瓦砾。隋开皇十六年（596年）临清西境置沙邱县，大业二年（606年）复入临清，唐武德四年（621年）再析临清置沙邱县，贞观元年（627年）又复入临清，其治在仓集镇东。

临清域内在唐大历七年（772年）曾析置永济县，《元和郡县图志》永济县条下载：“本汉贝邱县地，临清县之南偏，大历七年，田承奏于临清张桥行市置，西临永济渠，故以为名。”其治在今北馆陶镇，北宋仁宗嘉祐五年王安石奉旨出使辽，循永济渠返京经临清时曾有诗云：“灯火匆匆出馆陶，回看永济日出高。”

五代兵起,地方残破,契丹数寇,火灾频仍,黄河北夺御河,河北诸州千里泽国。北宋元丰四年,河决大名,复贯御河、馆陶、永济、临清溺没,此时废永济县并入馆陶,省临清县为镇,归广宗,寻复置并以永济县回并,金天会五年(1127年)临清县治自仓集东移卫河东岸曹仁镇(即今临清市临东镇旧县村,曹魏大将曹仁封亭侯于此)。至明代洪武二年,临清县治所在此已存在了二百四十余年。金代卫河运量在90余万石以上,由河南、河北、山东一带通过卫河北运京师,卫河是通向中原与北京的水运要道,临清城在这一运道上发挥着它的作用,此已被近年的考古调查所证实,然金代以其奴隶制色彩浓厚的少数民族入据中原,且只半壁江山,阶级斗争与种族斗争无法调和,华北平原历经战乱破坏,经济残破不堪,据《大金国志二十三崇宁元年记事》说,“田土荒者,动至百里,草莽弥壁,狐兔出没”,地区经济如此。临清城在此200余年内并没得到太大发展。

元王朝在金代内河航运的基础上又开通了京杭大运河航线,年运量在350余万石,临清开会通河,运、卫交汇,县中心北移,政府在临清设漕运机构—临清万户府,临清城在漕运中的地位开始显现。此后,元明清三代相继建都北京,京师给养均靠江南漕运,运河成为经济命脉,加之政府以政权的力量强化运河航运,在漕运的推动下,社会经济获得了稳步发展,为运河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临清城经二千余年的沧桑由区区小镇开始起步发展。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游历中国,曾沿会通河路经临清,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卷二》中这样描述当时的临清:“沿途见有环墙之城村甚众,皆隶属大汗,其中商业茂盛,为大汗徵征赋税,其额甚巨。此强格里城中央有一宽而深的河流经过,河上运输有丝、香料及其他,巨贾货物不少。”时至今日,旧县村及周围随处可见精美瓷器残片,同时,还出土有大型石柱础及石香炉,可

见马可·波罗所记不虚。

明代洪武初,县治自曹仁镇北移至中洲临清闸,今吉土口街纸马巷,至今阁楼门楣上镶嵌着“县治遗址”刻石。明政府虽在此建立了行政中心,但未筑城,其原因是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河决原武,漫安山湖而东,会通尽淤”。直到二十年后即永乐九年(1411年)仍用济宁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尚书宋礼……浚会通河。与此同时,明政府对南北大运河各段皆有治理,永乐十五年(1417年)临清由于元代会通河常有水险,便在今鳌头矶南侧开凿了会通河南支至头闸口汇入卫河,至此,南北运河通畅,“而海陆运俱废”。元代奠基、明代开凿的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明永乐二十一年,明成祖“择天下形胜,建都北平”,“百官六军之食,咸仰给东南,漕运者,盖国之大计也”(《漕运新渠》)。为此,特设12部,下属143卫,漕军12万(宣德增至16万)漕船11000多只,经大运河北运漕粮达400多万担,另外,漕船携带各地的手工业品、土特产进行贩卖,漕船回空时可载运旅客及北方物产,这种南北物资交流,大大促进了大运河沿岸城市的发展繁荣,在这种外部条件的促进下,临清的经济地位得到迅速提高。首先明政府在临清建“水次仓”,设临清卫领兵戍守,设钞关,官、商船舶均在此盘诘纳税,而后放行,临清流动人口大增,运河沿岸商贾云集,人声鼎沸,屋瓦鳞次,店铺林立,中洲一带形成了繁华的商业区,主要经济活动都在此进行,明成化间大学士李东阳有过《鳌头矶》诗赞曰:“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商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明正统十四年兵部尚书于谦建议在临清筑城,至景泰元年“东抚洪瑛始卜今地筑城,高三丈二尺,厚二丈四尺,围九里一百步”,俗称砖城(《临清县志》),由于运河经济迅速发展,临清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重要商埠,弘治二年升临清县为州,领馆陶、邱县二县。至嘉靖二十一年,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的需要,修筑

临清土城,于是自砖城之乾方至巽方沿正德间跨汶、卫掘堑筑土的边墙,拓而广之,筑起周长二十余里的新城,俗名“玉带城”,此时的临清城已发展到鼎盛时期,这在很多明、清文学作品中均有描述,尤《金瓶梅》一书最为详尽生动,有记载说当时临清城“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明清史料》甲编 923 页),这显然是夸大之词,但也不完全没有谱。

清继明制,依然实行漕运,沿运河设立 43 卫 16 所 121 帮,运丁达 14 万余人,漕船 1 万余只,清政府还允许北上南下的漕船携带各地土产沿途进行贩卖,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临清城市“其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乾隆四十一年,临清升为直隶州,属以武城、夏津、邱县。清末(光绪 25 年)漕粮运输由铁路运输取而代之,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颁诏漕粮折银,就地交纳,至此,中国历史上实行很久的漕运制度宣告结束。

临清由聚落发展成为城市,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汉魏隋唐时期临清地区出现的清渊、清河国、清河郡、贝丘、沙邱、永济等建治,均因周围地区贫瘠,没有向城市发展的条件。金元明清建都北京后,临清才初露端倪,尤其是元代奠基、明代开通的京杭大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五大水系,卫河连结了河南、河北、山西等广大的中原地区,漕运制度的实行,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才使临清城市规模迅速扩大,铸造了她历史的辉煌。然而可惜的是,临清的繁盛并不是她自身的繁盛,而是运河河道的繁盛促成的,一旦失去这个外部条件,临清立即衰落下来了,这就是说,临清的繁盛并非基于自身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并没有自己稳定的经济基础,是中国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形成南北经济发展相互依赖的结果,临清那些以封建的特殊需求为生产内容的手工业如临清砖,生产规模固然很大,但京城一停修便停产了;没有自己的工业资本,依赖外商而生产的哈达丝织

业,也是如此,从原料到产品靠外商经销,外商一撤,便萧条了,其他各业均有如此状况。

原载《人文与自然》1997年第2期,
《山东运河文化文集》,1998年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傅斯年与考古学

陈昆麟 徐燕萍

傅斯年先生在文学、史学、哲学乃至教育方面的重大贡献,是国内外学人所共知的,但是他在考古学方面的贡献却少有人注意。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他在文学、史学、哲学方面的声誉太高,而淹没了他在考古学方面的贡献。二是与上述几门科学相比,考古学是一门新的科学,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人员相对来说较少,因此注意傅斯年先生在这方面贡献的人也就少了。或者是把考古学只看做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把其放在历史科学中没有特别注意的去研究。

其实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又是一门独立的新兴科学,其材料的来源及研究方法,与历史科学有很大不同。傅斯年先生在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方面,都有着杰出的贡献,我们应当对这一问题认真进行研究,恢复其本来的历史面目。

什么是考古学?概括地说就是“根据用科学的手段获得的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一门学科”。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尽管可以把考古学的萌芽期上溯到宋代“金石学”的产生,但那毕竟不是“近代考古学”。所谓“近代考古学”,无论是从原始材料的获得上,还是从研究方法上,都是以崭新的面貌出现的。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把傅斯年先生视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不为过份的。

一、用考古学的方法研究上古史的倡导者

我们从事历史科学研究的人,大都是依靠文献资料。特别是在考古学尚未形成一门完整的科学之前,要研究上古史,基本资料是《尚书》和《左传》。对此,傅斯年先生提出了疑异,他说“就是中国古史时期,多相信尚书左传等书,但后来对于尚书左传,亦发生怀疑,不可信处很多很多,于是不能不靠古物去推证”。^①正是他具有比较新颖的思想,所以在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期间,他要求从事历史科学研究的人们,不要完全依赖旧资料,不要完全相信旧结论。“他不赞成‘国故’,研究‘国学’或‘中国学’等字样,用老法子囫圇吞枣的读古书”。^②他主张的是“要实地搜罗材料……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③进而从“搜集的原料里面……研究新的问题”。^④因此,他在制定当时历史学发展的标准时,明确规定“第一,必须能发现新问题。对于历史材料的处理,要能够直接对材料的本身,重新批判去找新的问题,不能以昔人处理的旧公式为满足,而陈陈相因的下去。然后历史的研究才能有新的发展。第二,必须扩张使用历史材料范围。这些材料的范围,就性质来说,应当扩张到史籍材料以外的材料……例如地下材料的彝器、甲骨、简牍、明器,偶然发现的敦煌卷子,平时不被人注意的档案,以及从人类学调查得来的资料。第三,必须扩张研究工具。凡是任何科学的发展,都需要研究的人具有和这个科学相关的知识,作为工具。现代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学等,无一不是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⑤傅斯年先生在这里提出的这三条,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无疑有很大进步意义。三条之间的逻辑性也是很强的。只有如第一条所说,敢于对先前的材料和结论提出问题,才有可能另辟途径去寻找新的材料。有了新的材料,如果还是用过去的老方法去研究,那

仍然会象推磨一样,走不出新的路子。还必须要用新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傅先生所说的“新的工具”。再具体一点来说,傅先生第二条中所说的“史籍材料以外的材料”并不是指的在考古学萌芽期从事金石学研究那样任意征集来的材料。因为傅先生深知,这些材料虽然对于研究历史也有一定价值,但其科学性、可靠性仍然是不大的。他所指的材料,是经过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发掘而得来的材料。因此,他非常积极地组织和推动殷墟遗址的发掘。与他同时期的劳于曾明确地说:“他尽量的采用考古方法,希望以考古的成绩作为治史的基础”。^⑥他所指的新扩张的研究工具,实指是考古学。因为自近代考古学发展以来,就将地质、地理等学科常用的“地层学”的研究方法吸收过来,又将“生物学”的分类法吸收过来创造了“类型学”。这些新的方法的应用,进一步促进了考古学的健全和完善。

一门新的科学由诞生到发展,必须要有人提倡和实践,广造舆论,扩大影响,得到世人承认,才能有生命力,才能不断发展和完善。而傅斯年先生对于考古学的贡献之一也正在这里。

二、在考古学工作方法和研究方法上的贡献

上边曾经谈到,中国考古学的萌芽期可以上溯到北宋时期就已经产生的《金石学》,但那为什么不能称为《考古学》呢?二者无论是在材料的获得上还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都是有很大差别的。先从材料获得上来看,《金石学》所依据的原始材料如钟、鼎、壶、盆、罐、甲骨、简牍等,几乎都是从别人手中征集而来的,这些东西早已脱离了原来的地层,改变了原来的位置,研究者根本看不到这些东西在地下的组合情况,更不能从地层学的角度去分析、认识问题。这些材料本身早已失去了很大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有铭文的器物价值还较大,无铭文的器物就很难用来准确地说明问题了。

而考古学所要求的材料,则是用科学的手段发掘得来的。傅斯年先生在这方面的指导思想是非常明确的。他坚决反对“粗心发掘,随便毁坏”和“随便购买”的作法。他说:“关于购买一层,最不可靠,因为不知道他的来源,不如亲自掘出来的较为确实可信”,^①这里所说的亲自掘,也不是说象刨地瓜一样,哪里有就到哪里刨,刨出地瓜就算。而考古学要求的发掘,是有其科学程序的。挖土要一层一层的挖,绝不能一口气挖到底。见到器物,也不能随便乱动,要先拍照、绘图、记录地层关系后才能取出。他对于那种非科学的盗掘是大加鞭笞的,对其危害也是深恶痛绝的。他指出:“贩卖者皆有集众挖掘之举,所得龟骨尽已杳无下落。夫殷人卜辞藏地下者,宁有几许?经一度之非科学的搜罗,即灭损一部之储积,且因搜求字骨,毁弃他器,紊乱地下情形,学术之损失尤大。而吾国官方及学人竟孰视若无睹,听此珍贵史迹日就渐灭,亦可哀矣。”因此,他强调,“吾等每掘一坑,必先看其地层上下之全,并为每一物记其层次,及相互距离。此为考古学之根本工作,不如是,则器物时代皆已紊乱,殷唐不分,考古何云”?

再从研究方法上来看,《金石学》大都是注意带有铭文的金石器物。通过对文字的反复考证,来纠正历史上的错误或补历史之不足。这方面的例子是不少的,不再赘述。但那些没有铭文的器物,特别是陶器,在金石学家面前就视为无用之物了。而在考古学方面,则可通过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得出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傅斯年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很大的。他说:“陶器有时代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陶器,我们可以因陶器的区分而为时代的区分,这是最容易最妥当的办法”,“陶器是因时因地而变的,并且因日常所用,变化很快”。在这里,傅斯年先生虽然没明确提“类型学”这一概念。但实际上是在运用“类型学”的方法来研究出土的器物。无疑,这对于“类型学”在中国考古学领域的广泛

应用和逐步完善是有极大推动作用的。运用地层学来分期断代,也是在近代考古学形成期才逐步认识和采用的。在这之前,就连外国的一些考古专家,也没有很好地将地层学的方法熟练地运用于考古学中。如1921年首先发现河南仰韶文化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他的仰韶文化六期说,并不是按照地层学的要求科学划分的,而是主观的认为单色陶(灰黑)早于彩陶。由于他有“外国专家”、“学术权威”双重贵冠,这种错误的分期方法和结论流毒甚广,一直到解放后才在事实面前被彻底弄清。但是傅斯年先生却早就注意了这一点。他在1929年写成的《考古学的新方法》一文中,在谈到关于殷墟问题时,明确地分出了地层,并以此来断代。他说:“殷墟的地层,最深的殷,在第四层。第三层是隋,第二层是唐,第一层是明。中间有断了不少朝代”。^⑩他用“地层学”的方法来断代,在中国无疑是较早的。在我们国家,首次科学的按土质、土色划分地层得出的区别仰韶、龙山和殷文化的性质的科学结论,是1931年梁思永在安阳后岗进行考古发掘时得出的。但比傅斯年先生运用地层学的方法来分期还晚二年。他对于梁思永的这次成功是不无影响的。

地层学和类型学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和发展,是考古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我们说近代考古学的基础是田野考古,而构成田野考古理论和方法的核心则是地层学和类型学。无疑,傅斯年先生在这一核心的形成和发展中,是有着不可低估的重大贡献的!

在考古学的资料的整理分析和综合性理论性的研究方面,傅斯年先生也是有建树的。

所谓资料的整理分析,就是把田野调查发掘的资料,进行系统的梳理,最后写成报告,予以公布。其包括检阅对调查发掘记录和绘图、照片,清洗出土遗物,修补复原,挑选典型器物标本和典型地层,遗迹单位,进行分类排队,以及分析文化性质,断代定年等一系

列工作。无论是在殷墟的清理发掘,还是在山东城子崖的清理发掘,都要求按上述科学程序进行资料的整理分析。坚决反对那种单纯为陈列、为猎奇而进行的考古发掘。他说:“盖科学之发掘绝不能于一经出土之后,不经研究,不待完工,遂作陈列。果如此陈列,势成五都之市,使人目眩,科学的问题不出,整个之意义淹减。近代的考古学与古器物学全不同,而发掘之方法与采矿大相迳庭。此学及此法在中国实为初步之尝试”。^⑩为资料整理之需要,他们将在殷墟发掘的部分资料运回北京进行科学系统的整理引起了河南省某些人士的误会,双方发生了纠纷。傅斯年先生在赴河南解决纠纷之时,又一次强调说:“故如但求掘出古物,以资陈列,不以取得新知识为目的,则敝所敢告不敏。如求每件器物所含之真知识,借其联络以知当时文化情形,则在所内整理实为此项研究之绝对必要”。^⑪由此可见,傅斯年先生对资料整理的高度重视。

三、考古发掘工作的组织者和实践者

石璋如先生在回忆安阳殷墟的考古工作时说:“把考古组的人员,大都调到安阳,人力可以说集中……安阳在考古工作能够有这样的成绩,固然是财力、人力、时间三者配合起来的结晶;实际上仍是由于能克难、能果断,有魄力的孟真所长的英明领导。他对于发掘考古工作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他鼓励三组同仁到田野去发掘;另一方面是他自己亲到田野,去排解困难,去指导发掘”。^⑫这一段叙述,基本上概括了傅斯年先生在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期间在组织和领导考古发掘中的工作成就。傅斯年先生于1926年由柏林学成归国,任教于中山大学。1927年在该校创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这时他就积极主张“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1928年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他被聘为该所所长。同年他就组织人力开始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发掘。自此开始,到1937

年的10年间,凡发掘15次,先后由董作宾,李济主持其事,发现大量殷代铜器及甲骨文。将中国之信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在这十年间,他曾四次亲赴发掘二工地视察发掘工作。每次他都认真地观察发掘现场。如1932年秋,他到达安阳发掘地时,知道浚县辛村发现大墓后,他很感兴趣。这个墓的墓室约7米见方,深10余米,墓道长18米,有一个规模宏大的车墓,其中有10辆车,60匹马,八只狗,都是活着埋入,姿态各异。十余米深的大墓,没有发掘修养的人,是不敢轻易站在墓边的。傅斯年先生为了看清这新奇的现象,就亲临墓地边去观察。特别是1929年冬,发掘队和河南省民族博物馆之间发生纠纷之后,他亲赴河南开封,为解决这次由误会而产生的纠纷,多方接洽,四处奔走,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圆满地解决了这次纠纷,使殷墟的发掘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山东省龙山镇城子崖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国家的学术机关有预计的发掘,未经前人之手遗址之第一次。在这次之前,虽然有过仰韶彩陶文化的发掘,但那是外国考古学家主持的。也有殷墟的发掘,而且成果十分显著,但殷墟是自然出现,并且为前人所注意过的。而城子崖的发掘,则是由中国的考古学家所主持,且此地先前并没有其他人注意过。这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为什么要组织城子崖发掘?这与傅斯年先生的指导思想是有直接关系的。他说:“我们认为中国考古学如大成就,决不能仅凭一个路线的工作,也决不能但以外来物品为建设此土考古年代之基础,因为中国的史前原文化本不是一面的,而是多面相互混合反映以成立在这个文化的富土上的。凭籍现有的文籍及器物知识,我们不能自禁的假定海边及其邻近地域有一种固有文化,这文化正是组成周秦时代中国文化之一大分子。于是想,沿渤海黄海省分当在考古学上有重要的地位,于是有平陵临淄的调查(近年又有

沿山东海岸的调查),于是有城子崖的发掘”。^④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先生所以要组织这次发掘是有明确的目的,是带着要解决的问题组织的。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弄清沿海诸省分的地下文化面貌与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在纵的和横方面有什么联系,又有什么不同,对中国古文化的分布做一全面的了解。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这个发掘之动机,第一是想在采陶区域以外作一试验,第二是想看看中国古代文化之海滨性,第三是探比殷墟——有绝对年代知识的遗迹——更早的东方遗址。”如果负责这项工作的人没有渊博的学识,没有全盘思想,他就不可能组织城子崖的这次发掘。这次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一个展新的文化类型——龙山文化,就是在这次发掘中发现的。可以说这次发掘为中国考古学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为中国考古学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石。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离不开傅斯年先生的组织和领导的。

综上所述,傅斯年先生,在提倡考古学,组织领导考古发掘,完善考古学的方法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从事历史科学、考古学研究的人们,是不应忘记这位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的奠基人的!

注 释

①《傅斯年全集》第四卷第 1339 页。

②《傅孟真先生年谱》第 25 页。

③同②第 24 页。

④同②第 25—26 页。

⑤同②第 27—28 页。

⑥同②第 29 页。

⑦同①第 1342 页。

⑧同①第 1317 页。

⑨同①第 1318—1319 页。

⑩同①第 1345 页。

⑪同①第 1324 页。

⑫同①1328 页。

⑬同②第 30 页。

⑭《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 943 页。

⑮同⑭。

称谓习俗与远古的婚姻形态

魏 聊

《文史知识》1987年11期“文化史知识”版刊登了王文锦先生的文章《我国远古的一种婚姻形态》。文章对《仪礼·丧服》和《尔雅·释亲》这两篇古文献所记载的丧服制度和亲属称谓进行考证,推定我国华夏民族也盛行过族外群婚制。论证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族外群婚制应该是在族内婚制和对偶婚制之间存在,而不是像文章的第二小段所说“在贵族们的一夫多妻制之前”存在;此处与文章第一小段中婚姻形态发展的顺序也不相符,误也。

文章考证了周秦时代“侄”这种称谓的内涵十分狭窄,只有“谓吾姑者吾之侄也”这一种涵义,并解析道:这是因为远古时期一群父亲无法也无须对一群儿女们区分哪是自己的“儿”,哪是自己的“侄”,(父辈男性对子辈)自然也就没有“侄儿”、“侄女”之类的称谓。由此推论华夏民族在远古时期也曾盛行过族外群婚制。

山东省西部地区农村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鲁西的孩子不称“爹”,不称“叔叔”就称“大”。这句话的具体涵义是鲁西的孩子对父亲没有专门的称谓,“叔叔”、“大”、“大大”、“大爷”都可能是父亲,也可能不是。详细的情况一般是这样的:父辈中行数是老大的男子的孩子称自己的父亲为“大爷”、“大”或“大大”,如果父辈中只有父亲一人,那么也有可能称父亲为“叔叔”;父辈中行数不是老大的男子的孩子称父亲为“大”、“大大”或“叔叔”。“大大”还做为一种对父亲特别亲昵的称谓而普遍使用。后辈对父亲的哥哥称

“大爷”或“大大”，对父亲的弟弟称“叔叔”，有时冠以行数和“大大爷”“二大大”“三叔叔”用于父辈群的区别。鲁西的孩子在平时虽然对父亲称“叔叔”、“大”、“大大”、“大爷”，但是一旦父亲去世，那么哭的时候都称“爹”。

无独有偶，河南南阳地区附近农村也有类似的称谓习俗，其特征为：叔伯兄弟对父辈诸兄弟的称谓无差异性，即子辈中的任何成员对父辈中行数为首的都称“伯”，对行数第二的都称“爹”，对行数第三的都称“叔”，对行数第四的都称“达”。

这样的称谓习俗使伯、爹、叔、达的孩子在称谓上都不能明确表现自己的父亲。伯、爹、叔、达都不是父亲的专门称谓，但却都又可以是父亲的称谓。南阳地区的这种称谓习俗与鲁西的称谓习俗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子辈对父辈称谓的第一依据是父辈诸兄弟的行数，而不是反映子女与父亲的直接的血缘关系，而且与之类似的称谓习俗还不仅仅限于鲁西和豫南，在山东南部、河北西部、安徽南部、山西等地都有与之相近似的称谓习俗，虽然具体叫法不尽相同，但其本质特征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对父亲没有固定的专门称谓。具有共同本质特征的一类事物必然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原因，这种普遍的称谓习俗也应该有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根源。

那么，这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有人解释：叫爹难叫，又直又笨。虽然，这样的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在封建的中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界限严格，特别是父子关系，这种最至关重要的关系怎么能用“难听”二字为由而加以改变呢？

探讨民俗的形成和起源，只有从历史中去找蛛丝马迹。

王文锦先生从父辈对子辈没有“侄”这种专门称谓，来说明父辈无法区别哪是自己的“儿”或“侄”，从而推论古代族外群婚制的存在，我们也完全可以用族外群婚的理论来解释子女对父亲的称

谓不确定这一民俗现象。

因为亲属称谓制度反映亲属制度,而亲属制度反映婚姻制度;所以,称谓制度也反映婚姻制度。鲁西等地的这种称谓制度是现代人对族外群婚制的遥远的模糊的追忆,同时,它又是人类婚姻发展历史一般规律的有力佐证。

人类婚姻的发展一般可分为五个阶段,即杂婚,族内群婚,族外群婚,对偶婚和一夫一妻制婚。族外群婚制是同属一个部落的两族世通婚姻,甲族一群兄弟与乙族一群姐妹集体婚配,同样,乙族一群兄弟与甲族一群姐妹婚配,当然,到了这一婚姻形态的后期也有例外,夏威夷及整个波利尼西亚在十九世纪的普那路亚婚就不要求通婚的男子一方是兄弟,也不要求女子一方都是姐妹关系^①。总之,族外群婚制形成的家族使他们的孩子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无法也没有必要确认他们的生身父亲,所以,也就没有特定意义的父亲称谓,而只能不确定的称呼反映他们的“父亲们”,表现在称谓上也主要反映父辈人的行数,而不是主要反映直接的血缘关系。鲁西地区不特别的把父亲从“叔叔”、“大”、“大大”、“大爷”这样的称谓中区分出来,就表现了对父亲称谓的不明确的痕迹。同样,王文锦先生的文章所论述的周秦时代的父亲们无法也没有必要确认哪些孩子是自己的亲生孩子,也不知哪些孩子是自己的“侄儿”、“侄女”,所以父辈对子辈就没有“侄儿”“侄女”的专门称谓。

族外群婚制在华北的消失是非常遥远的过去了,但鲁西地区为什么还存在有把自己的父亲称为“叔叔”、“大”、“大大”、“大爷”的这样难以区分而不易确定父亲身份的称谓习俗呢?

这是因为亲属制度(反映为称呼)带有人类传统习惯的因素而慢于婚姻和家庭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当家庭继续存在的时候,家庭却已超过它了。”^②而且这种亲属制称为“叔叔”、“大”、“大大”、“大爷”的习俗虽然体现了族外群婚的亲属称谓制度

残余,但是,有了“叔叔”与“大爷”的区别,也表明了称谓制度的进化,因为“叔叔”与“大爷”的区别是由父亲在父辈中的行数决定的;父亲的行数是老大的孩子大多称父亲为“大爷”反之则称“叔叔”的居多;而父辈中的其他男性,一般是比父亲大的称“大爷”,比父亲小的称“叔叔”,有了这样的与父亲相比较出来的区别,也就表明了父亲的确认性。毫无疑问,这种区别由于对偶婚和一夫一妻制产生和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鲁西等地的称谓习俗既保留了族处群婚亲属称谓习惯,又适应了一夫一妻制的亲属称谓需要。而且,直到如今,称谓制度还在进化,随着现代文明对华北农村的进一步冲击和我国人口政策的落实,称父亲为“叔叔”、“大”、“大大”、“大爷”之类的民俗现象将日益减少,取而代之的将是明确反映父亲身份的称谓。

注 释

①《中国原始社会史》第103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中国古代钱币之最

陈昆麟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等价物,也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人类最初的商品交换是采用以物易物的非等价交换形式,随着交换频率的增加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利用一种媒体作为商品交换的等价物便成为商品交换活动中的迫切需要,货币,也就是本文所称钱币便应运而生了。

中国钱币的发展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大约经历了贝(骨)、金属和纸币三个阶段。就钱币形制来看,有贝、刀、布、环钱、圆孔、方孔、有无郭等形态。就货币性质来看,有流通币、纪念币、赏钱(奖钱)、压胜钱等。在各大类的货币中,又有许多小类,单就金属铸币来说就有铜、铁、铅、金、银、镍等种,因受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还不时出现一些特殊的钱币,使中国钱币更加丰富多彩。已知的中国钱币之最常因考古学的迅速发展,经常有新的钱币出土而被改写。本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拟出 85 项钱币学之最,供大家参考。

最早的货币 最初等价物今天已不得而知,可以确认最早的货币是海贝,商代甲骨文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在相当于夏代的一些遗址中也曾发现过海贝,但它们是否作为钱币使用,还有待于今后的证明。此类海贝多生长在南海中,采集比较困难,得之不易;其外表华美,可作装饰品和象征吉祥的护符;便于计算、携带和转让;生产数量少,坚固耐用,具备了充当货币的基本条件。其货币

单位为贝，十贝为一朋。随着需求量的增大，又出现了骨贝、石贝和无文铜贝。

最早的铸币 商代晚期因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原来的贝币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便仿照齿贝的形状制造了一种铜贝。山西保德商墓和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商代晚期墓葬中，就曾出土过铜贝。这不仅是中国货币史上最早的金属铸币，在世界货币史上也是遥遥领先的，比西方推许的小亚细亚吕底亚人开始铸币的年代早 800 多年。

最早的布币 布币是由铲形农具演变而来，称为原始布，也叫大铲布，尚未脱离农具的原形。其特点是体大叠短，厚重粗糙，大约出现于公元前 11 世纪。

最早的刀币 是由游牧区的铜刀削演变而来的。齐刀又称大刀，按钱面文字可分为三字刀、四字刀、五字刀、六字刀，其中的五字刀如“即墨之法化”等铸造时间较早，作工比较精致，流行时间约在春秋早期。有一种观点认为，六字刀如“齐建邦长法化”应是齐国始封时，即西周成康时期所铸。

最早的环钱 环钱是由原始的纺织工具纺轮演变而来的。山西省闻喜县东镇战国墓出土的带“共”字的钱，圆形，中间有圆孔，面背皆无郭，面文多记地名。圆钱比刀、布更便于携带和清点，遂成为金属铸币的主要形式。

最早的有郭方孔圆钱 是大约出现在战国晚期齐国的𧇔化钱，基本形式是圆形、方孔、面有郭，沿用刀的货币单位“化”。郭可保护币文，方孔可避免加工和携带时旋转，是中国钱币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流通时间最久的铸币形制 方孔圆钱是自战国末齐𧇔化钱开始的。公元前 211 年秦始皇统一币制，制造圆形方孔“半两钱”，使其走上货币形制统治地位，直到清末“宣统通宝”废止，前后流通

了 2300 多年。

最早的铁钱 过去认为中国最早的铁钱是西汉末年公孙述在四川成都称帝时铸造的铁三铢,近年来在长沙、衡阳发掘的西汉墓中,出土了较多的铁钱,其中有四铢半两铁钱的形制、轻重与汉文帝时期流行的四铢半两钱十分相近,证明至迟在西汉初期(公元前 200 年左右)就开始铸造铁钱了。

最早的铅钱 是五代十国时期闽王王审知于 916 年所铸“开元通宝”小铅钱。

最早的金铸钱 为楚国的“爰金”,大约始建于战国早期,距今约 2500 多年,是一种扁平铃印的块状金铸块,又叫印子金。

最早的银铸币 过去把汉武帝时期铸行的“白金三品”定为我国最早的银币,1974 年 8 月河南省扶沟县古城村出土 18 枚银布币,其中空首布约在春秋前期,短平首布约在春秋晚期,中、长型平首布在战国初期。

最早的法定银币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因对匈奴用兵,财政困难而铸白金三品,意欲解燃眉之急。所谓白金三品是指圆形货币(圆形而有龙纹,重八两,值三千)、方形马币(方形而有马纹,重六两,值五百)、椭圆形龟币(币形象龟,币纹似龟甲,重四两,值三百),是我国迄今正式见于官方文献的最早法定银币。

寿命最短的金属铸币 咸丰十一年(1861 年)七月,清文宗奕訢在承德避暑山庄病重时命肃顺等辅佐幼子登基,并拟定次年改元“祺祥”,第四天肃顺等八位大臣提出铸“祺祥”钱并付诸实施。慈禧于九月三十日,逮捕了八位辅政大臣,废除“祺祥”年号,“祺祥钱”还未正式颁行使用即被废止。

最早的银元 银元俗称“洋钱”、“大洋”等,15 世纪末始铸于欧洲,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清道光年间,在台湾仿照西班牙银元熔铸白银成饼状,叫银饼,有“寿星银饼”,重库平七钱二分,稍轻

者叫“如意银饼”、“笔宝银饼”，重并六钱八分。

最早的铜元 铜元是清末以来所铸各种新式铜币的通称，因中间无孔，故俗称“铜板”，最早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广东铸造的。正面以汉文铸“光绪元宝”四字，又加满文“广宝”二字，周围印“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字样，背面有蟠龙纹。每枚重库平二钱，当制钱十文，每百枚换一枚银元，还有一文、二文、五文和二十文等面额。

最早的机器铸币 是清光绪八年（1882年）吉林用机器试铸的银币，称为“厂平银币”。

最早可兑换的黄金货币 是西汉居摄二年（7年），王莽铸行的“金错刀”，两枚可兑换黄金一斤。

流通时间最久的铸币种类 为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118年）“罢半两，行五铢钱”，至隋代 700 多年间一直流通使用。

最早的铜雕母钱 铸钱时要经过制样、制模、翻砂等工序，样模为“雕母”，所用材料有铜、锡、铅等。1984 年在南京博物院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嘉靖通宝铜雕母，也是第一次发现明代的铜雕母。

最大最重的钱币 太平天国特大花钱直径 33.5 厘米，厚 0.8 厘米，现存的半枚残片重 2170 克，整币约重 9 市斤。其质为黄铜，遍体鎏金，正面有“太平”二字，边沿是二龙抱珠图案，背面尚存一“圣”字，旁有双凤图案，边沿是八宝纹饰。为稀世珍品，现存湖南省博物馆。

最小的铸币 是东汉、六朝期间所铸特小“五铢”钱，俗称“鸡目钱”或“鹅眼钱”，比榆荚钱还要劣小。

最早的压胜钱 又称厌胜钱，最早见于汉代，官私炉均行铸造，品类甚多。“压胜”意即“厌而胜之”，系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达压制所厌恶的人、物或魔怪的目的，其中有吉语、八卦、供养、撒帐及春钱等，传世甚丰。

最早撒帐钱 属厌胜钱的一种,在旧时女子出嫁的仪典上,由女宾将特铸的金钱彩果抛撒其新房帐下,始于唐公主出嫁,后为民间沿袭。钱文多系“金玉满堂”、“忠孝传家”、“五男二女”等,大小各异,背面有各种吉祥图饰。

制作最精美的方孔圆钱 为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所铸大观通宝,面文为宋徽宗御书,有小平、折二、折三、当十等数十种版别,以当十大钱最为精美。

最早带有帝王像的铸币 光绪二十四年,成都造币厂铸龙泽和四川卢比银币,币的正面为光绪半身像。

铸币史上最大的笑柄 五代十国时,刘仁恭、刘守光父子都曾用泥做钱,如《旧五代史、刘守光传》说:“……又以黄泥做钱,令内部行使”,成为中国铸币史上的一大笑柄。

第一套流通性纪念币 1984年10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建国三十周年纪念币,共三枚,面值都是一元,直径3厘米,用镍、铜合金制成,银灰色,正面图案由国徽、天安门、广场和礼花组成。背面图案:第一枚是开国大典时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图案;第二枚是象征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图案;第三枚是华表、长城、松鹤组成的象征“祖国万岁”的图案。

在国际上首次获奖的纪念币 1984年美国劳斯出版公司和《世界硬币新闻》周刊主办了一次世界最佳硬币评奖,在这次评奖中,我国壬戌年纪念币获1982年最佳标准银币奖。

最早的纸币 宋朝初期(995年左右)四川商人私自发行的纸币“交子”,其性质同存款收据相近,可兑现也可流通。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比西方国家使用纸币早好几个世纪。

最早由政府发行的纸币 宋初商人发行的“交子”常因发行人破产不能兑现,政府遂禁止商人发行,并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置益州交子务,天圣二年二月起发行第一届官交子(分界交

子),限区域使用,一交一缗。每次发行一定限额,以铁钱为现金准备,又叫钞本,三年兑换一次。

最早由银行发行的纸币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大官僚盛宣怀提议开办了第一家私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总部设在上海,对外称“中华帝国银行”。第二年发行了“银圆券”,背面印有“中华帝国银行”字样。

现存最早的纸币 过去一直认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纸币是元世祖的“至元通行宝钞”,1982年在维修呼和浩特市东郊白塔时发现了一张“中统宝钞”,面值“壹拾元”。此钞纸长16.4厘米,宽9.4厘米,正面上下方及背面上方盖有红色官印,左右上方均盖有黑色长条形铜印。纸币柔软,颜色青黑、正面墨印文字是“中统元宝交钞”及面文“壹拾文”,下面的文字是“行中书省奏准印造中统元宝交钞,宣课差发内交并收受,不限年月诸路通行”等。这张交钞上没有八思巴文,应是1269年以前印制的,比“至元通行宝钞”要早20年左右。

最大的纸币 明朝洪武八年(1375年)发行大明宝钞,面额分别为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共六种。其中一贯钞纸面最大,长33.8、宽22.86厘米,为桑皮纸印刷,四周有龙纹花样,上面横题“大明通行宝钞”六字。花纹栏内,上方两边各有一行篆字,右为“大明宝钞”,左为“天下通行”,中间有钱贯的图样,上写“壹贯”,下面印有“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伪造者斩,告者赏银贰佰五拾两”等,是世界上最大的纸币。

最小的纸币 民国年间由“浙江地方银行”发行的一分纸币,票幅长5、宽2.5厘米,是世界上最小的通行纸币。

流通时间最长的纸币 明朝发行的“大明通行宝钞”,原有六种,洪武二十二年又加发从十文到五十文的小钞五种,流通时间长达100余年。

最早带颜色的纸币 宋崇宁四年(1105年)为了代替贬值的“交子”,印发了兑换钱币的凭证“钱引”,上面印有界分、年限及面额,并有用红、蓝、黑三种颜色印制的图案。

最早的银本位纸币 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川陕宣抚使吴玠在河池(今甘肃徽县)发行的“银会子”(亦称“银票”),是可以代替银两的纸币,以钱为单位,面额为二钱、半钱两种。

最早的银元券 清末爱国将领刘永富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发行了“台南官银票”,票面上盖有五颗印章,第一颗朱印用满汉文刻制,汉字篆体书为“镇守福建台湾总兵官之关防”;第二颗朱印为“台南府印”四字,第三颗是虎形章,上面刻有16个字,模糊难辨;第四颗上面刻有“此票准照现银行通用。不论官银私款,钱粮官税,典铺盐馆,行商贸易以及兵粮军饷,洋关洋行一概当银支取,奉宪示谕颁给遵行”;第五颗文字为“不发棍徒,行用假票,军法究治”。

最早的公债券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气大伤,翰林院侍读学士、南京人黄思永参照外国筹募国内公债制,奏请发行公债向商民募债应急。因慈禧想维护皇室体面不愿称“债”,而定名为“昭信票”,以示昭信于民。昭信票印发后,交各省派销。后来几位大臣为了迎合慈禧心理,奏称“人民爱戴朝廷,愿以昭信票银悉数报效国家”,而失信于民。

最早的汇兑形式 唐宪宗元和初年(806年)因当时商业发达,钱币携带不便,加上钱币缺乏,各地方政府又禁止出境,各地在京师的商人将售货所得的款项交付各道驻京的进奏院及各军、各使等机关,或交各地设有联号的富商,由机关、商品发给半联票券,另半联寄往各道有关机关、商号,商人回到本道后,核对票券取款,通常称为“飞钱”或“便换”。

最早的灭佛铸钱事件 南朝梁武帝时,曾出现侯景之乱,据说

侯景的谋士王佛，因用度不足，曾取襄阳寺院中铜佛铸钱，但未知币名。

最彻底的一次灭佛铸钱事件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受到统治者的青睐，故寺院常仗势毁钱铸佛，致使社会上货币短缺，有些朝代或农民起义军，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曾先后六次灭佛铸钱，最为彻底的一次是后周世宗柴荣在显德年间(955年)下令凡不是朝廷特许寺院一律废除。废除的寺院达30346所，铜佛一律销毁，限五十日内送到官府用以铸币。

最早的马钱 有人把马钱列入厌胜钱之列，似有不妥。最早的马钱产生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白金三品的第二品就是重六两的方形马币，值钱五百，不久废止。东汉至魏晋期间，新疆和田铸行的“汉佉二体钱”亦为流通货币。该钱圆形，无孔，有大小两种，正面用篆书汉文标明币量，大钱为“重廿四铢铜钱”，小钱为“六铢钱”，背面中心是马形图案。宋代的打马格钱，是一种游戏。明代的跑马崇祯则是流通货币。

最不受欢迎的钱 宋徽宗时奸相蔡京奉命撰写钱文以供铸钱，他写的钱文很特别，崇字的“山宗”竖笔相连，“宁”字无心，笔划故意简省，当时有人说他是“有意破宋，无心宁国”。由于他做尽了祸国殃民的坏事，老百姓切齿痛恨他，为此见到此类钱币就毁掉，时至今日，已一无所见。

最早带有币文的货币 带有币文的齐刀铸行年代素有争议，那么最早带有币文的货币就是“空首布”，大约铸行于春秋时期。其体形薄小，釜长，布的头上、中空可以纳柄，有尖肩尖足，平肩弧足，斜肩等形状，背有三道纹，大部分币面上有各种文字记载，如干支、数字、地名等。

最早带有币值的货币 是战国时期中山国铸行的一种圆肩圆足三孔布，正面铸地名，背面记重量，有一两、十二铢大小两种。

最早的纪地钱（参见“最早带有币文的货币”）

最早的年号钱 为铸于 338—343 年间的汉兴钱，其钱文排列分上下、左右两种，上下排列的叫直汉兴，左右排列的叫横汉兴，横书比直书少见，均为广穿内薄的小钱。钱径 1.6 厘米、穿宽 0.7 厘米见方，重一克左右，属于榆莢钱一类。

最早的纪年钱 是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 年）铸行的“淳熙元宝”钱背上加铸数字，以表示铸造年份。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纪年钱，比欧洲纪年货币早 300 多年。

最早的纪地方孔圆钱 三国时，蜀汉刘备在四川犍为铸“犍为五铢”，背面有一“为”字。

最早的对子钱 对子钱又称对书钱、对品钱，日本钱币学家称为符合钱，是指同一种钱有两种书体，产地形制完全相同。南唐“开元通宝”初行篆、楷两种书体。为李璟（943—961 年）时期所铸。

最早有法定计数的银铸币 是金章宗完颜景承安二至五年（1197—1200 年）所铸异形银币“承安宝货”，宝货分一两、两半、二两半、五两，十两五种，法定一两对铜钱两贯。其形状呈亚腰状，两端椭圆，底有蜂窝状孔洞。据出土的“一两半”宝货测量，通长 4.8、两端宽约 3、腰宽 2.1、厚 0.6 厘米，重 59 克左右，钱面铸有“承安宝壹两半”字样以及监制官署签押。

面值最大的金属铸币 王莽篡权之后，为把黄金收为国有，铸行“国宝金匱直万”钱，钱币界都把它推为古泉苑中的奇葩，存世甚少。清代只发现一枚残品，现已不知去向。1901 年，西安农民挖土时又得二品，皆完好无缺，上为方孔圆钱，钱径 3、方穿边长 1 厘米，面有“国宝金匱”四字，直读。圆钱下有一短颈与方形钱身连接，钱身竖高 2.5、宽 2.7 厘米，面背各有两条直纹，面篆书“直万”二字，其中一枚原曾流落香港，五十年代初我国政府毅然以重金将国宝赎回，同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最早的通宝钱 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621年)下令废五铢钱,改铸“开元通宝”。法定钱径八分,重二铢四,十钱为一两,革新了秦汉以来币面值纪重的旧制,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大改革,钱文由给事中欧阳询书写,为八分隶含篆体构架,章法精美。初铸钱面有内外廓,且精整峻深,背多平坦光洁。实测初期开元通宝径2.4~2.5厘米,重3.8~4.2克。

最早的泉宝铸币 唐高宗李治乾封九年(666年)所铸虚值钱“乾封泉宝”以一当十与开元钱并行,钱略大或同等于开元钱,一般径2.5厘米,重3.3~3.5克。其制作工整,边廓完好。币文四字旋读。乾写作“𪔐”。因其与开元钱比价过高,百姓拒用,行七月遂止。因铸行短暂,故传世不多,今常见赝品。

最早的重宝铸币 唐肃宗李亨乾元元年(758年)。所铸“乾元重宝”以一当十与开元钱并行,币文隶书直读,“乾”写作“𪔐”。初铸钱径2.6~3厘米,重6~10克。次年又铸“重轮重宝”,径3.5厘米,重12克左右,一当五十与开元钱并行。民间呼之为虚钱。因虚值利大,盗铸盛行,小钱纷出,物价飞涨,代宗继位后,迫于混乱,诏令大小钱等值流通,虚值重宝遂罢。“乾元重宝”二种多光背,也有少数背有月纹、云纹、星纹及瑞雀等,品种繁多。

最早的元宝铸币 叛将史思明销洛阳铜佛铸“得壹元宝”以一当百与开元钱并用,币文隶书旋读,铜色暗红,制作工整,径约3.5厘米,重12.5克左右,背多见月纹。后史思明感到“得壹非长久之兆”,改元顺天。素有“得以难求”之说,为皇家所珍视。

最早使用悬针篆的铸币 王莽天凤元年(14年)所铸货泉币文为悬针篆,其直径一般为2.2~2.4厘米,重约2.3~3.6克,多有内外廓,“泉”字中竖笔断开。其铸量丰富,版别纷繁,存世较丰。

最早能与机制币比美的铸币 金章宗泰和元年铸行的“泰和重宝”,币文篆书、直读。钱径4.5厘米,方廓边长1.5厘米,厚0.3

厘米。其制作技艺高超,非常精美,廓细内深,篆如玉箸,堪与后来的机制币相比美。

最早有政治寓意的币文 小刀会于1854年7月铸“太平通宝”,币径2.4、方穿边长0.8厘米,廓较宽,币文直读,背有日月纹或明字。意为反清复明。

最早的御书钱 宋太宗淳化元年,太宗亲书真、行、草三体“淳化元宝”钱文,旋读、光背。币径2.4、方穿边长0.6厘米,重3.8克左右。真书钱文犹富隶意,草书币文也是首创,制作都很工整。值得说明的是,该币中还有四川造当十大铁钱与“缩水”(三点水紧缩)淳化”,为该币种之稀品。

币名最多的朝代 南宋钱币名称特别多,有元宝、通宝、重宝、永宝、之宝、全宝、兴宝、安宝、新宝、洪宝、万宝、正宝、真宝、崇宝、封宝、至宝、隆宝等22种。

年号钱最多的朝代 宋代共有16个皇帝,改了55次年号,铸有53种年号钱。

最大规格的纪念币 1984年5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发行一种大规格的大熊猫纪念金币,面值一千元,直径7厘米,纯金12盎司。纪念币正面图案为北京天坛祈年殿,背面图案为熊猫与青竹。

最早印有马克思、列宁像的纸币 1928年2月19日,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发行了“劳动券”,面额壹元。券长12、宽7.5厘米。正面印有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券”,四角有“壹圆”字样,周边有简单的花纹框,框内右方印有马克思像,左方印有列宁像,中间为“壹元”面值,下有县苏维埃主席和副主席的签名及“中华苏维埃元年印”字样。背面有“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圆形印章。

最早分别用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铸行的年号钱 西夏仁宗年

间(1170—1194年)铸行的“乾右元宝”,分别使用汉文和西夏文,但形制完全相同,双双成对,开创了对子钱的新形式。该钱径2.7、方穿边长0.8厘米,币文旋读。

最早的货币立法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实行了一系列统一政策,下令废刀、布,统用圆钱,并采用外圆内文方的形制,标重半两,称秦半两。

最早集中货币铸造权、发行权的政府 汉武帝元鼎四年(113年)将铸币权、发行权集中于中央,“令天下非官钱不得行”,废除以前的各种货币,不准郡国铸钱,责令上林三官铸造标准五铢钱,重约4克,制作精整,郭纹细致。

最早采用纯纸币流通制度的朝代 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年间相继发行中统钞,这种钞有强大的后备金,是世界最早采取纯纸币流通制度的朝代。在世界货币史上占有特殊地位。

最早较完备的币制条例 元朝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正式发行“至元通行宝钞”时,由尚书省颁布了叶李拟定《至元宝钞通行条划》(即《叶李十四条划》)十四款,其内容颇为周详。终元之世一直有效,对后世的纸币流通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世界上最早的较完备的币制条例。

最早的知名纸币设计人 叶李(1241年),字太白,杭州人,原为南宋太学士,后入元为官。他在南宋时曾设计纸币初样进献,朝廷没有采纳。入元后将原样改进,进呈元世祖忽必烈,币名“至元通行宝钞”,受到嘉许。

最早的信用机构 明末清初,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兴起了钱庄和票号。钱庄以上海为中心,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成立“钱业公所”。票号以山西为中心,亦称“山西票庄”。

最早的官方信用机关 清雍正九年(1731年),北京设立了官

钱局,1737年开设10所,用银两向当铺收进制钱,再向市面抛出,以平钱价,后改为“官银号”。

最早主张办银行的人 太平天国洪仁玕在其所著的《资政新篇》一书中,提出“兴银行,发纸币”的主张,因当时社会环境不允许,未能实施。

最早的私人银行 (见最早由银行发行的纸币条)

最早由国家办的银行 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户部筹设大清户部银行,额定资本银400万两,官商各半,股东限于中国人。次年,由户部拨库银20万两,总行设在北京西郊民巷,分行设于天津、上海、汉口等地,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并有发行纸币、代理部库等特权。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改称“大清银行”。

最早的银行条例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大清银行则例》和《银行通行则例》,规定银行的九项业务:①票据贴现、②短期放款、③存款、④放款、⑤买卖生金银、⑥兑换、⑦代收票据、⑧发行票据、⑨发行银铸票。

最早的货币理论 春秋时期(公元前524年左右),周景王的卿士单旗,提出了“量资币、权轻重”,“子母相权”的货币理论。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货币理论。

最早的钱币学著作 为南北朝时期的《刘氏泉志》的内容,因南朝萧梁时期顾恒所著《顾恒钱谱》曾引用《刘氏泉志》的内容,故知其时代当更早些。

现存最早的钱币学专著 为南宋洪遵撰写的《泉志》,绍兴十九年(1149年)成书,全书15卷,收录了五代以前中外历代各类钱币348品,分为正用品、伪品、不知年代品、天品、刀布品、外国品、奇品、神品、厌胜品九类,并对各朝代的铸造时间、样式作了介绍,绘有历代钱币的图样,是研究中国钱币的重要史料。

最大的一部钱币学工具书 为《古钱大辞典》,由近代古钱学

家丁福保编著的,分总编、上编、下编三部分。上编为古钱图,为原大拓本。下编是古钱辞典,录了前人对各种古钱的考订资料。书中除著录了编者自藏古钱外,还收入了翁树培《古泉汇考》、刘喜海《泉苑精华》、鲍康《观古阁泉说》三书(均无刻本)以及日本人平尾聚泉所辑各种钱谱中的古钱拓本。近人方若、张乃骥所藏钱币的精拓也收入该书,全书录图越万,100多万字。

最早由国家出版的钱币书 为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印刷的《钱录》,由梁诗正等人奉敕纂辑,凡16卷,收录先秦到明代古钱币567枚,以年代先后为序,包括吉语、厌胜、异钱以及外国诸品都有。钱图、花纹、币文、钱径的大小,色泽都与原钱相近,并且进行了考证辨伪,论据充分。

最早研究钱币学的杂志 1927年程文龙等编《古钱杂志》珂罗版影印,仅出版一期就停刊了。

在搜集整理本文材料时曾参阅了彭信威先生著《中国货币史》、肖清著《中国古代货币史》、千家驹等著《中国货币史纲要》、苏皖著《古钱探趣》、朱活著《古钱新探》、许长志等编《中华之最知识手册》、许道静编《中国之最》、高汉铭编《简明古钱辞典》以及《钱币漫话》、《古钱大辞典》、《古泉学》、《泉币》等书,还参阅了有关的考古资料,纠正了一些不确切说法,有些条目直接从上述书中摘录,在此向上述各书作者致谢。另外,因涉钱学不久,很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或疏漏,切望钱币界专家学者予以纠正。

原载《齐鲁名物博览》,王永波、
陈昆麟等主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论赙化圆钱产生的划时代的意义

陈昆麟

自山东省钱币学会成立以来,关于齐国货币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果。在山东省钱币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我将近年关于赙化圆钱研究的点滴收获,作为大会献礼,并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面值佰元纸币产生的启示

面值伍拾圆、壹佰圆的大面值的人民币,是 1990 年后发行的。此时,为什么需要发行如此大面额的人民币? 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十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和活跃。要满足市场经济对货币的需求量,单靠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不用说国营经济部门,就以较大的个体企业、个体商业而论,每天发生的以现金结算的经营额,数以几千、几万,乃至十几万计,如此大的数额,如果单靠原来的面值拾元的人民币结算,不但浪费人力,更重要的是浪费掉许多宝贵的时间。社会经济的发展,急需大面值人民币的产生。因此,1990 年发行面值伍拾元,壹佰元的人民币是应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这启示我想到战国时期赙化圆钱的产生也是与当时的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分不开的。它产生的划时代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二、贗化圓錢產生的原因

贗化圓錢為戰國晚期齊國鑄行的貨幣，這一點已基本成為定論。但是，贗化圓錢為什麼產生在戰國晚期的齊國而不是其他國家，絕非偶然。這是與齊國重視工商業並促使工商業高速發展而國家又能嚴格控制統一的鑄幣權的結果。

（一）贗化圓錢的產生，是齊國長期重視工商業而且使其得到高速發展的必然結果。

齊國是十分重視工商業的國家。早在太公時期，就注重“通商工之業，便漁鹽之利”。到齊桓公時，工商之業得到進一步發展。他所任用的相管仲，就出身於商賈之家。他提出的治國大計，其中一項主要內容就是優待工商。他把全國分為土鄉和工商鄉。土鄉是指從事農業生產的，工商鄉就是從事工業生產的。而且还明确提出優待工商不服民役，讓他們專心致志的從事工商活動。

齊國商業高速發展的另—原因，是因為其幅員遼闊且近海。春秋時期，仍然是萬邦並立的時代。有的一城一地，亦可稱國。而當時齊國却是“地南至於岱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地方三百六十里”。^①到戰國時期，則是“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達到了“齊帶山海，膏壤千里”的境地。幅員遼闊，必然物產豐富，近海，則有魚鹽之利。這為齊國商業的發展準備了雄厚的物質條件。齊相管仲以及後來的齊國統治階層正是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一直把發展工商業作為強國富民的治國方針。

鹽是人民生活的必須品，又是沿海國家的專利品，管子早就注意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②“惡食無鹽則腫”^③的道理。而內地的邦國不產鹽，或少產鹽，只有向沿海國家購鹽。因此，管子一方面在國內大力發展鹽業生產“伐菹薪煮沸水為鹽”，另一方面把鹽作為和別國通商的重貨“……修河濟之流，南

输梁赵宋卫濮阳。”^④同时,管子也注意到铜、铁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性。他不仅看到铜、铁在国防和生产中的作用,“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钁、夷、锯、楸,试诸木土”^⑤而且还看到铜铁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巨大作用。“今铁官之数日”“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铤,……行服连辔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⑥铜铁与国计民生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必然会成为发展商业的重要物质基础。

盐,铁既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又是发展工商业为国家聚财的重货,如果任凭私采,必然对国家不利。因此,管子主张“官山海”,^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矿山资源和海产资源都是国家的,私人不准随便开采、利用。为此他提出:“海王之国,谨正盐英。”^⑧就是说,要谨慎地管好盐业。而对矿产资源的管理就更严格了。“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⑨利用如此严酷的刑罚来管理矿山资源,足见管子对铜铁之重视。

管子在注意国内商品资源管理的同时,还制定了许多发展对外贸易的优惠政策,鼓励各诸侯国与齐国通商。他主张“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任养。”因此,“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⑩

正是因为齐国采取了以上措施,齐国的经济迅速发展。齐桓公时已是民富国强,故而为五霸之首。此种富强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这时齐国国都已发展到拥有七万户人家,几十万人口的大都会。正如《战国策》中所描写“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声击,人肩摩,连袂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⑪简直是一片热闹繁华、歌乐升平景象。

商业经济的发展,带来民富国强,同时,必然是对货币需求量

的加大。到目前为止,从出土的齐国战国中晚期的货币统计数字来看,“齐法化”多达万枚,是四大币系中目前出土最多的一种。人所共知,齐法化虽然在齐国经济发展中起重大作用,但是由于其造型特异,体大且重,在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中再充当流通手段,就必然暴露出了自身的弱点。社会需要一种更新的既便于携带,又便于结算的新型货币的产生。因此,一种质和量相脱离的新型货币——𧇵化圆钱便应运而生了。

质和量相脱离的新型货币的发行,如果没有国家强制手段的干涉,也是难以成为事实的。而齐国恰好是国家统一掌握货币发行权的,刀币所以被称为法化,正是国家法定货币的最好说明。同时,文献中也有明确记载。如管子在《国蓄》之中载:“人群铸钱之币,民庶之通施也。”当时的人君,就是国家的象征。人君铸钱立币就是说国家要掌握立币权。齐国也的确是这样做的。发齐法化、齐𧇵化、齐四化、齐六化的自身重量,都相差甚少且币形整齐化一,就足以说明是国家统一掌握铸币权的。也正因如此,钱币在齐国上下颇有影响力。这种货币符号与实重严重脱离的𧇵化圆钱,只要国家统一下令实施,便可畅行于市。如果没有如此强硬的手段,𧇵化圆钱这种形制的产生会推迟许多年的。

三、𧇵化圆钱与刀币之关系

𧇵化的产生,势在必然。它产在齐国,与齐刀,具体说和齐法化是何种关系?历来说法有二,一是以王献唐先生为首的“母子相权”说,“齐有𧇵化之品,署𧇵化者,最小为子。署𧇵四化者,加重加大,以一当四,署𧇵六化者,又重又大,以一当六。皆𧇵化之母。三者具为辅币,其正币为刀。以若干𧇵化为,抵一刀。𧇵化之中,复为三种。皆以铜重比价。合之则刀为母,三𧇵化皆子,齐币有四制焉”。^⑩我们的秘书长房郁琴先生也尚此说。他说“所在刀币的轻

重大小形制都相差不大,说明了齐刀作为‘法化’铸币的统一性。而法化铸币在执行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的时候,是以贗化的流通作为补充的。”^⑬又说“因为有了贗化圆钱,可以以刀权贗,以大权小,以母权子,刀币本身即不再分正币辅币。”^⑭对同一个学术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这是十分正常的。就货币发展规律以及贗化钱所表明的价值量分析,我比较赞同朱活先生的观点。他指出:“齐刀与贗化圆钱的关系,并不是主币辅币的关系。一枚贗化圆钱的法定币值是一枚齐法化。”^⑮我在1988年写成的《齐国货币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曾经接触过这一问题,在此做进一步阐述。

我认为,贗化圆钱不是齐刀的辅币,而是在高速发展的工商经济下,应运而生的一种即将代替齐刀的新型货币。这可从齐刀贗化产生的年代,它们各自代表的币值,以及贗化圆钱的先进性得到证实。

首先从产生的时代看,齐刀自春秋时期就已产生,它是渔猎工具刀削演变而来,一直流通到战国晚期。而贗化圆钱则产生在战国晚期。他是在齐国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下,应商品流通的需要应运而生的。两者不是同时代产生,不是同时流通,因此不会是“母子相权”的主辅币关系。如果说与刀币并行有辅币的话,也只有大量出土的骨贝币或无文铜贝。另一方面,贗化圆钱也不是在齐国故有货币上发展而来的,它吸收了西部三晋圆形货币的造型及体积较小,便于携带等优点,吸收了齐国刀币有边廓、有面值的优点,又加以创新(方孔)而产生的,它能集几种货币优点于一身,这不仅进一步说明当时商品经济之发达,而且也证明贗化圆钱绝不是刀币的辅币。

其次,从面值来看,根据朱活先生令人信服的考证,一刀就等于一贗。^⑯也就是说,一枚法定的齐刀重45~50克。而贗化圆钱有三种面值:贗化、贗四化、贗六化。一枚法定的贗化,虽然只有1.3

~1.4克,但它的法定面值却与一枚齐刀相等,贗四化等于四枚齐刀,贗六化等于六枚齐刀。如果说二者母子相权的话,那也是贗化为母,刀化为子。如此轻薄的圆钱,面值却如此的大,这正是在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为满足商贾携带方便又便于结算的需要,国家而发行的一种大面额的货币。这时的商贾们看待贗化就象我们今天的人们看待伍拾元、壹佰元的纸币一样,只重视他的符号和购买力,并不重视钱币自身的实际价值了。

第三,贗化圆钱应社会需要而产生,它吸收了当时其他国家钱币之优点,又根据实际需要加以改造创新而成。如形圆是学习三晋,体小则引发于楚之蚁鼻、郢爰,有廓及面值为化则来自齐刀,方孔则是贗化的一种创新。面值大能满足大宗商品交换的需要,体小则便于携带,有廓则可保护币文、币肉之磨损,方孔可以避免旋转,减少磨损,分大、中、小三种便于找零。这种种优点,不但刀币不具备,就是战国晚期其他国家通行的货币也不具备。试问,如此先进的货币形制,怎么会是将被社会淘汰的刀币的辅币呢?

因此,贗化圆钱与刀币的关系,是一种先进与落后,新生与消亡、新旧接替关系。也就是说,贗化是在刀币逐渐消亡而应社会经济发展之需要产生的一种当时最完善的新型货币。

四、贗化圆钱的划时代意义

货币产生的初期,为了最好地履行货币职能,是以质和量的统一来更好地充当价值尺度的。朱活先生在《三谈齐币》“齐国刀化的购买力”一文中,通过细心考证,一贗是43~50克,而齐法化重量多在45~47克之间,这说明一枚齐刀就是一贗青铜。这时,齐刀的质和量是基本一致的,但是新产生的贗化圆钱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贗化”钱实重一般为1.3~1.4克,但它由政府所规定表明重量却是一贗,即45~50克。出现了质与量的严重分离。这

一分离,表明货币的发展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开始是让自己的实体形态来充当交换的价值尺度。但是,高速发展的商品经济,不仅需要大量货币,而且使流通速度大大加快。任何开始足值的货币,经过多次流通的磨损也不会再足值。但在整个商品交换过程中,这种货币的形态已经得到大家的共同认可,只要有这种形态的货币即可,却很少有人关心它的实际重量。这种现象,当得到全社会认可之后,减重钱币的出现也就势在必然了。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地步,钱币肉体象征商品的价值量,只需要一个大家公认的或国家硬性规定的尺度就行了,只要它便于携带,坚固耐用,有利于流通便可为社会所公认,而不具备这些优越条件的货币,必然被淘汰。我们知道,齐刀体大且重,发展对外贸易,大宗商品的结算携带是十分困难的,且不易分割,不便找零。刀币走进被淘汰的死胡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取代刀币的臙化圆钱在此时产生,不仅表明了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社会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货币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趋于完善的历史阶段。

我们说,臙化圆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在于面值和自身实际价值的脱离。前面在分析臙化和齐刀之关系时,已经明确,一枚齐法化重一臙,即一般约为 45 ~ 47 克左右。一枚臙化钱一般重 1.3 ~ 1.4 克,而法定面值即与一枚刀币相等。一枚臙四化实重一般为 5.79 克,法定面值等于 4 枚齐刀。如果每枚齐法化的平均重量按 47 克计,那么 4 枚齐刀共重则是:

$$47 \text{ 克} \times 4 = 188 \text{ 克}$$

四枚齐法化的实重与一枚臙四化的实重比则是:

$$188 \text{ 克} \div 5.79 = 32.47(\text{倍})$$

也就是说,一枚臙四化圆钱的实际重量是它所代表的齐刀币实际重量的 1/32。面值符号与实重如此脱离,仅仅用钱币减重来

解释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如果仅仅是减重问题,没有更重要的社会背景作后盾,这种钱是很难得到社会承认的,但是黠化圆钱不仅在战国晚期能够产生,且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并大量流通。近年我们山东齐币出土的统计数字就足以证明这一问题。近年来,在济南的历城,五里牌场、青岛、日照、博兴等地,曾五次出土齐国货币,其中共出土黠化圆钱 909 枚,各种齐刀币共 364 枚,出土数量有如此大的差距。这种货币符号与自身的实际价值严重脱离的货币的产生,并得到承认,是社会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反映,是社会进步的反映,更是货币发展走向成熟的反映,它的产生代表了货币发展史上前一个阶段的结束,新的阶段的开始。

再者,黠化圆钱的划时代意义,还在于它完善了中国钱币发展史上一个历史阶段的货币形制。

人所共知,货币自产生之日起至秦统一币制止,货币形制是多种多样的。各国之间的货币大小不一,厚薄不同,形制各异。燕齐行刀币;三晋地区多行布币,兼有圆孔圆钱和刀币、楚国则为蚁鼻钱和郢爰。同为刀币,有齐刀、燕刀、赵刀之别,同为布币,又有空首布、尖足布、圆足布、三孔布等之分。总之是五花八门,各行其事。当社会随着经济实力的发展由万邦万国而兼并到战国七雄的时候,一个大国是很难长期容许多种货币并行的。以齐国为例,其东征,“一战而率服三十一国”(《国语·齐语》),西伐,兼有了聊、摄之地。由一个地方三百六十里的中型国家发展为膏壤千里大国。过去在山东境内比较有点名气的小国,如莒莱等国,都为齐国所管。他们原来铸行的钱币如莒之安阳刀,莱之即墨刀也先后被淘汰,包括齐国自己所铸的齐之法化,到战国晚期,都为齐法化所统一。这说明货币由形制各异走向统一,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制约下的必然结果。

黠化圆钱的形制是圆形、方孔、有廓、质地青铜,且体积较小。体

积较小和做成圆形,便于携带和储藏;方孔,可防止成串的钱穿在一起随便滚动,减少钱币磨损;有廓,可以保护币文币肉。质地为青铜则坚固而耐用,这种具备众多优点,比较完备的形制产生之后,其他形制的钱币便被否定。臚化圆钱做为一种钱币形态,虽然因齐国的灭亡而失传,但是它的完备的钱币形制,却为后人所接受,一直流传了几千年。

再次,由于臚化圆钱所具备的种种优点以及比较成熟的货币形制,一开我国方孔圆钱流行 2000 多年之先河。

人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币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就秦始皇所铸半两钱而论。虽是方孔,尚且无廓,还没有臚化圆钱的形制完备。汉武帝元狩五年所铸五铢钱,才又加上边廓。其后直至清末,这种带廓方孔圆钱虽然币文屡有改动,但外形却一直沿用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贝、刀、布流通时代与带廓方孔圆钱流通时代的分界线,就是臚化圆钱。

综上所述,臚化圆钱的产生,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速度,反映了社会的巨大进步,更反映了货币发展进入了一个更加完善的阶段,把它视作齐刀之辅币是错误的,把它做为钱币发展的一般阶段也是不对的,我们必须注意他的划时代意义,才会进一步推动我们加强对齐国货币发展史的研究。

注 释

①《诸子集成》第五册《管子小匡》第 126 页。

②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193 页。

③同②第 416 页。

④同②第 415 页。

⑤同①第 125 页。

⑥同②第 202 页。

⑦同②第 189 页。

⑧同②第 192 页。

⑨同②第 411 页。

⑩同②第 621 页。

⑪《战国策·齐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上册第 337 页。

⑫王献唐：《中国货币通考》上册第 272 页。

⑬⑭：《山东金融研究》1988 年钱币专刊第二集第 82 页。

⑮朱活：《古钱新探》第 132 页。

⑯同⑮第 130 页。

阳谷景阳冈出土骨贝币管见

孙淮生

1979年春,笔者在阳谷县景阳冈清理了一座被群众取沙破坏的古墓。墓中一次出土了1700余枚骨贝币。现就这批骨贝币的时代、特征、用途作一粗浅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骨贝币的时代

贝币是对历史上使用的海贝、铜贝、骨贝等的总称。这里出土的骨贝,是贝币发展到晚期的一种货币形制。在其演化过程中,虽留有时代特征,但要具体确定其时代就显得依据不足了,只能确定相对年代。自有文字的货币出现,便为我们确定其时代打上了“烙印”。景阳冈墓中出土的骨贝币虽然没有文字纪年,但与它同出的器物为我们确定它的时代提供了依据。

景阳冈墓中与贝币同出的陶器16件,铜器19件,还有几十件骨器,这批器物中时代特征比较明显的有陶鬲、豆、鼎,铜器中有镞、戈、豆。分叙如下:陶鬲,方唇、折沿、鼓腹、裆近平,颈以下饰绳纹,高24、口径20、腹径27.4厘米;鼎,浅腹、圜底、蹄足;盖豆,子母口,深盘;铜、镞,椭圆口,口两侧对称环耳,盖、身四角各一蹄形足,盖顶隆起有一环钮,通体饰乳钉纹;戈,短援略上翘,三角形锋,锋刃锈钝,胡残,栏侧残存穿三,内一穿;豆,盖残缺,子母口,深腹圜底,柄较高,横断面呈九角形,喇叭状圈足,盖、器身均饰小蟠螭纹。

陶鬲是从袋足、分裆逐步发展为矮足、低裆而进一步为无足(或象征形足)近平裆。春秋中期,齐国的陶鬲足极矮。鬲到春秋中期便进入了尾声,春秋晚期已很少看到,当社会进入战国时期,陶鬲已经绝迹。商周时期的鼎足是柱状的,春秋时期的鼎足进化到马蹄形。镬通身饰乳钉,盖身四角各一蹄形足,形状和纹饰都反映了春秋中期的特征。

由以上几件典型器物分析,时代特征突出反映了处于春秋中期偏晚阶段。故骨贝币的时代亦应同以上器物时代相同,该墓腰坑还发现有殉狗的遗迹,这也是春秋中期齐国流行的一种埋葬方式。另方面从骨贝的质地基本相同,形状相近,大小虽有差异,但其风格一致分析,其流通时间不会太长。由此推测,骨贝的时代应是春秋中期。

二、骨贝币的特征

骨贝币是因为天然海贝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是仿照天然海贝的形状、纹饰,用特别选定的骨料磨刻而成。

景阳冈出土的骨贝币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1、选料严格

景阳冈墓出土的骨贝币选材非常严格。能看出的质地均为牛的四肢骨,用其他骨的甚少。所以,骨贝的结构紧密,成色好,虽经二千四百余年的地下侵蚀,但无腐坏现象。有的骨贝由于放置的与铜器较近,多年的相互浸蚀,使青铜色浸置在骨贝币上,贝币出现青铜色。由于质料好,似铜贝又无锈色,又如青色玉质。这都是骨贝选料好的结果。

2、制作精美

骨贝状似海贝,正面刻一道竖纹,两旁刻有锯齿状纹、背面平、

双穿。因为首先流行的是海贝,要用骨质的替代海贝,就要制作成海贝的形状。其大小也基本与海贝相同,这就要把选好的大块骨料切割成小块,所以,有的骨贝的平背面上留下了锯齿的切痕。然后把正面磨成弧面龟形,于中间切割成凹槽,沿槽两边刻划成锯齿状。于凹槽中心上下钻两孔,孔系由背部钻起,双孔的出现,可以系绳,便于携带。这批骨贝磨制光滑,均成弧面,有齿有槽有孔,制作极为精细,是它的突出特征。

3、类型特征

陈昆麟先生在他撰写的《齐国货币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对景阳冈古墓中出土的 1700 余枚骨贝币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将骨贝分为三种类型,摘抄如下:(1)大贝:平均长 2.2 厘米,宽 1.5 厘米,厚 0.6 厘米,重 2.5 克。(2)中型贝:平均长约 1.8 厘米,宽 1.5 厘米,厚 0.4 厘米,重 1.5 克。(3)小型贝:平均长 1.7 厘米,宽 1.3 厘米,厚 0.35 厘米,重 1 克。以上三种类型的划分,使我们清楚地看出大小贝之间重量悬殊,竟差 1.5 克。悬殊的出现,主要不是在长宽度上,而是差在厚薄度上。大贝厚 0.6 厘米小贝厚 0.35 厘米。

三、关于骨贝的用途

1、骨贝起到货币作用

《说文》对贝的解释为:“贝,海介虫也,居陆名瓢,在水中名蜃。象形。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以上明确告诉我们贝币是到了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废弃的。做为货贝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许慎在他的《说文》中只说“古者货贝而宝龟”。一些文献记载虽不能确指于夏商、但对周朝使用贝币比较一致。既然周代使用贝币,我们在这里讨论春秋中期的骨贝流通情况就不成问题。关键在于春秋时期,齐国的铜质刀币已广泛应用在买卖

交易中,而被广大群众所认可。骨贝币既然秦以前还是货币而广泛流通着,那么,它在货币的交流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要搞清楚骨贝在交流过程中扮演的货币角色就应弄清它的计量单位,郑玄笺:“古者货贝,五贝为朋”;崔憬注:“双贝曰朋”。至于商周时期朋贝的具体形制,文献未见系统记载,故难得整体认识。(1)《汉书·食货志》载王莽时制定的龟贝货币形制,其贝币为“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云:“王莽时复作贝货五品,然实未尝施行。”这里我们不研究王莽作的贝币是否施行。只就他的大小“为贝货五品”来说,去秦不远,王莽作贝币形制,重量不可能凭空臆造,疑其时尚有文献可徵,故仿之。由王莽制“贝货五品”,使我们联想到陈昆麟先生将景阳冈贝币分为大中小三种形式的重要性。他在文中明确指出:“贝币的大、中、小三种类型,很可能影响和启发了贗化圆钱的铸造。所以贗化圆钱亦有大、中、小三种类型”。此种理解是非常正确的。其实,社会交流中的物品价值是不等的。这就要求购物贝币的等量价值也应有大小之分,以便适应物的价值需要。所以,景阳冈贝币的大小不一,轻重不一,是货币的本身面额值不同。

知道了景阳冈骨贝币的差价,而有意制造的大小不一和重量不一的骨贝。它在购物中起到调节面值大而购物价值小的作用。骨贝的大小除自己面值大小不一以外,它们对齐刀币而言,都是起附属作用。当齐刀币购物而不能兑换时,就可以用骨贝附加在物上,使之与齐刀币价值相等,陈昆麟先生说:“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齐刀币,面值都很大,分量较重,使用起来很不方便,特别是民众间的小型交易如一斤菜、一斤豆、一尺帛以及针头线脑之类。如果

没有贝币之辅助,单靠刀币去支付,就很难结算,所以,贝币与刀币同流,这是商品交换的需要,是社会实践的需要”。

2、骨贝起到装饰作用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自古而然,早在距今六、七千年的大汶口文化早期,人们就将吃过肉剩余的骨头进行加工,制成各种饰品,有的小件串起来作为项饰。贝币中间有双孔,是为系绳而钻孔的。它除了系绳便于携带之外,还应有装饰的用途。

当人们生活得到满足之后,美的追求便开始产生。早期人以骨件作为项饰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平尚庄大汶口墓中出的长方形项坠极为精美。周和春秋阶段有人就用贝来作为项饰,这在齐国故城的东古城春秋时期墓葬群中有具体的反映。有的墓中出贝均发现在头颈间,或在口内,口内的贝应该是一种项饰。贝币项饰既起到装饰作用,又具有货币流通的使用价值,就如今天人们戴的项链,项链的本身就具备了价值,而又起到了装饰作用,所不同是贝币既是货币,又是饰品,金项链价值虽贵,但它却不能作为货币来使用。

就齐故城的东古城春秋时期墓中出土的贝币是项饰来说,景阳冈骨贝币也具备项饰的功能,甚至有可能作过项饰件。

综合全文的举例分析,使我们对景阳冈骨贝币有以下认识:景阳冈骨贝币时代特征明确,作为春秋中期的制品制作精美。骨贝状似海贝,分大、中、小三种,作为齐刀币的辅助货币流行。大、中、小三种贝代表的面值不一,起着货币交换,购物的小面额兑换作用,同时它还有装饰的作用。

浅谈几种唐代货币及其相关问题

吴明新

今年5月1日,笔者参加了山东大学与地区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文博专业证书班》有关中国货币的学习,并有幸陪同货币专家、山东省大学教授徐基先生观看了博物馆藏的唐代货币,聆听了徐老先生的指导和教诲,受益非浅。我对唐代货币产生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思考了一些新的问题。粗成此文,献给首界全区钱币学术研讨会,并就教于各位领导、专家和泉友们。由于学识短浅,对钱币学知识知之甚少,错误难免,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地区博物馆藏唐代货币计32228枚,^①是1984年2月下旬,高唐县旧城镇小屯村民刘修岭在其宅内修房屋时,距地表1.2米处,发现于两个大小相等的瓷罐中,计135公斤。由于枚数众多,捡选不细,只分出“开元通宝”,私筹“开元通宝”及“乾元重宝”,不见“乾封泉宝”钱及其它。

一、“开元通宝”,数量最多,计有3万多枚。分背面素面、带记号两种。其中带记号的有背面穿上有一星月纹,穿下有月纹,穿左有月纹等几种。其年代可分为早期、中期。因没有发现会昌开元,因此时代不应晚于德宗年代。

“开元通宝”始铸于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朝(公元618—907年)承隋以后,政治安定,社会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较长时间的稳步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均呈现出繁荣昌

盛的景象。商品贸易活动十分活跃。货币作为物与物之间交换的等价物,具有流通手段、价值尺度及贮藏手段等特征。而作为计量重制的五铢钱,已不适应货币流通中的便利交往,被历史淘汰已是大势所趋。《郑樵通志》载:“开元钱文字含八分及篆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俗谓之‘开元通宝’”。含有“开国建元,流通宝货”之意。钱文由大书法家给事中欧阳询书写,章法精美。初铸面有内外廓。法定钱径八分,重二铢四,十钱为一两,相当标准。从此,十进制形成了,便利了人们日常的经济生活。“开元通宝”的铸行,彻底结束了秦汉以来币文记重的旧制,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其重量、形制对后世及日本、越南的铸钱影响极大。

二、私筹“开元通宝”5枚。径略小,肉稍薄,字口稍微模糊。铸造年代不详,估计与“开元通宝”同时代之物,曾经一齐使用流通。这种私铸钱为什么能夹杂在法定的开元钱中等值流通呢?我认为,这和历史上记载的唐朝因缺铜而铸钱太少,钱重物轻有关。

据《杜佑通典》记载:“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每炉计铸钱三千三百贯,约一岁铸钱三十二万七千余贯。”这是唐代铸钱最多的时候。而唐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在玄宗时达到了顶峰,人口数量也在天宝十三年达到极盛,计有户口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②人口的繁荣必然带来经济交往的繁荣,国家铸钱的速度远远满足不了商业发达的需求,引起了钱重物轻。私铸钱也就应运而生。当然,私铸在唐朝开国之初已很盛行。尽管法律规定“盗铸者死,没其家属”,但是“私铸犯法日蕃”,“盗铸渐起”。^③钱币私筹并非唐代特有,唐以前历代都曾发生过。可是,唐朝私铸的起因与前代根本不同。以前发生私铸现象多半是因为封建统治者遭受到财政危机的困扰,实行货币贬值政策,带头铸造不足值的轻小恶钱所致。国家铸造的“法钱”名义高于实际价值,造成通货膨胀。而唐朝自高祖武德四年铸

造“开元通宝”钱后，一直到唐玄宗先天之际，只有高宗乾封元年铸造“乾封泉宝”钱，以一当十，提高名价，变相贬值（行七月而废，故存世较少）。此外，“惟开元钱唐三百年冶铸相继”，^④一直作为“法钱”流通。而“开元通宝”钱与“铜之价颇等”，^⑤其名义价值并没有高于实际价值。“私钱”和“法钱”相比，不具备无限法偿的权力。在“法钱”轻小的情况下，轻小的“私钱”自然也会被人们接受。但是在“法钱”并不轻小的情况下，大量的比“法钱”轻小的“私钱”能够在流通中被人们所接受，而且没有引起“物价踊贵”的后果，也说明了钱币紧缺，物轻钱重的这一唐代社会经济问题。

三、“乾元重宝”，8枚，分大小两种。大者3枚，其中带记号的有背面穿右下角一星一枚；小者5枚，其中带记号的有背面穿左上角一斜杠，穿下一星一枚，背面穿下一月纹一枚。

“乾元重宝”始铸于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安史之乱”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为了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解决经费不足之现状，“第五琦请铸十当钱。二年又请更铸重轮一当五十”。^⑥与开元钱并行。当十钱币文隶书直读，“乾”写作“𪛗”初铸钱径2.6~3厘米，重6~10克；当五十钱径3.5厘米，重12克。^⑦民间呼之为虚钱。因其虚值利大，盗铸盛行，小钱纷出，物价飞涨。代宗继位后，迫于混乱，诏令大小钱等值流通，虚值重宝遂罢。这批货币中“乾元重宝”数量不多，也说明其币值低下，民间不愿贮藏备用。

四、这批唐代货币制作精巧，字迹清晰，只有少量稍有磨损，其余皆边缘齐整。说明这批货币在世流通时间不长或还不曾流通，即被埋入地下。从出土的情况看，这批货币显然是有意识埋藏的，有的同志认为，肃宗时正值安史之乱，可能是避难而埋藏的。但是，根据史料记载及对当时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状况的分析，可能还会有另外一方面的因素。

唐代中叶以后,唐朝前期实行的均田制开始瓦解,土地买卖变得兴盛起来,一些官僚豪强除了利用特权兼并土地之外,还通过买卖形式兼并土地;而一些富商们则遵照“以末求富,以本保富”的古训,把经商得来的钱财以购买土地的方式保存起来。官僚富商们为了购买土地就需要积累贮藏大量的钱币。同时,由于钱币紧缺,造成“钱重物轻”,“货当益贱”,币值不断升高,物价不断下跌。“故藏钱者得承人之急,居货者必损己之资^①”。贮藏钱币者无形之中在增值,而居货者则无形之中在贬值,因此,居货者争相抛出货物搜索钱为藏钱者。从当时唐皇朝颁布的有关禁止蓄钱的法令来看,藏钱之风是普遍的。在王公贵族、方镇将帅、富商豪强们手里,窖藏钱币的规模相当大,一人名下屯积五十万贯并不算多。至于屯积几千贯、万贯、十数万贯更是人数众多。这批货币,即可能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贮藏起来的。

综上所述,唐代这几种货币的诞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因素,它所反映的社会问题、经济矛盾也是比较尖锐的。特别是“开元通宝”钱的铸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需要,是钱币史上的一次革命,它开创了中国币史上的新纪元。

注 释

①郭争鸣、孙怀生《山东高唐出土唐代货币》陈昆麟《文博论集》第一辑408页。

②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卷292页。

③《唐大诏令集》582页。

④《泉货》120页。

⑤⑧《新唐书·食货志》。

⑥《旧唐书·食货志》。

⑦《齐鲁名物博览》115页。

论聊城地区发展文物旅游业之优势

陈昆麟

明清之际,依赖运河的畅通,聊城地区曾一度辉煌。不仅聊城商贾云集,经济繁荣,而且北去百里的临清,南去百里的张秋,也都是商业发达,人口稠密的重镇。因此,曾有“南有苏杭,北有临张”之说。津浦铁路代替运河成为南北运输要道之后,聊城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逐渐衰落下来。但是,历史既不会直线上升,也不会直线下降。京九、济邯铁路、济邯高速公路的建成,将为聊城经济的腾飞,再度辉煌带来新的契机。

“铁路通,百业兴”,这句民谣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我们相邻地区的德州、衡水,不早就有了铁路吗?为什么以前经济一直没有“飞”起来呢?这说明,路通了,给你创造了一个腾飞的有利条件,至于是否能够腾飞,是否能够辉煌,要看当地的领导和群众是否能够抓住这一契机,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抓准本地区发展经济的优势,制定出符合本地区情况的决策。就聊城地区而言,发展经济的优势在于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将另文论述)和文物旅游业的兴盛。本文仅就我区发展文物旅游事业的优势谈点粗浅意见。

一、优越的文物旅游地理位置

京九、济邯铁路通车之后,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聊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北边河北省的衡水,文物古迹和自然旅游资源都不如聊城丰富,且不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往北,直

到北京。也就是说,从北京到聊城近千里之遥,除北京之外,沿线还没有一个城市像聊城一样既有丰富的文物旅游资源,又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人们看完了北京那气势宏伟的宫殿建筑之后,来到这里还可以换换口味,领略一下聊城的湖光水色、文物古迹。火车继续南行,大约要行驶 300 公里,才能到达另一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商丘。但是,到目前为止,商丘既没有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没有聊城如此整齐方正的旧城布局,如此宽阔清澈的水面。甚至沿京九线南行直到九江,在长江以北,就很难找到象聊城一样有如此优越的文物旅游条件的城市。

再看一看济邯线。济南距聊城 120 公里,是京沪线上重要的旅游胜地。这里不仅有天下第一泉—趵突泉,还有大明湖、千佛山、四门塔、灵岩寺等名胜古迹。人们可以从这里乘火车西行,来聊城观光旅游。邯郸也是京广线上的一颗明珠,这里曾是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达五处之多。人们也可以在这里沿济邯铁路东达聊城,领略一下聊城的风土人情。

从以上情况看,京九线长江以北段,在这长达上千公里的沿线众多城镇中,除北京、九江之外,可以说,其他城市的文物旅游资源都不如聊城优越,同时,济邯线的起点和终点两个城市,又都是文物古迹众多的城市,离聊城又不算太远。可以将京广线、京沪线上观光旅游的人们吸引到聊城来。聊城处于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如果很好地发挥自己的旅游优势,会进一步促进聊城地区经济的发展。

二、丰富的文物旅游资源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海内外人们常说的一句口头语。苏州杭州知名度为什么这么大?人们为什么把到苏州、杭州一游当作人生一大快事?我看,这首先并不是因为那里的工业发达,或

农业闻名而至。而是因为那里自然环境优雅、文物古迹众多的原因。具体说来,如果杭州没有西湖和以西湖为依托建成的风景名胜区、苏州没有寒山寺、拙政园、虎丘、沧浪亭等文物古迹,是不会如此出名的。就我们省内来讲,曲阜、蓬莱、泰山,每年能吸引那么多的国内外游客,不也是因为他们丰富的文物古迹和优越的自然景观吗?

聊城,也有我们自己的优势!

聊城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临清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有全国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 余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近 200 处。应该说是一个历史悠久、文物荟萃的地区。这里还有华夏文明的摇篮—黄河,沿南部边境流过,闻名中外的南北大运河,穿境而过,曾给聊城带来过昔日的辉煌。堪称长江以北城市中最大水面的胭脂湖,更给聊城增添了几分灵秀之气。又加上名著《水浒》中所描写的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或发生在聊城地区,或与聊城地区有关,这进一步丰富了聊城的文物旅游事业的内容。概括的说,这一“文”—“水”,正是聊城应当大作文章的课题。实际上,也正是这一“文”—“水”,早已经为我们造就了三条旅游线,那就是黄河旅游线、运河旅游线、水浒旅游线。

1、运河旅游线:

运河,在聊城地区境内蜿蜒曲折流经二百余里,在临清并入漳、卫河直达北京。六百多年来,一直与聊城地区各重要城镇的兴衰息息相关。它给沿途城镇带来了空前的繁荣,给沿途人民留下了众多的名胜古迹,也给我们今天的人们留下了无限的感慨,留恋和回忆。

运河,南从阳谷县的张秋镇进入聊城地区境内。在运河兴盛的年代,张秋也曾是商贾云集、名人荟萃的地方。当时曾有“南有苏杭、北有临张”之说,这临张就是临清和张秋之简称,足见当时之

繁盛。张秋名胜古迹甚多,挂剑台就在张秋镇运河东岸。传说,吴国公子季札出使北方,路遇徐君,徐君很喜欢季札的佩剑。季札心里也明白,因急于出使,没有把剑给徐君。当季札出使返回,要把剑送给徐君时,徐君已经死了。季札为了实现自己“心许”的意愿,毅然把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后人为了宏扬这种守信义的高贵品质,就在徐君墓旁建筑一亭。此处现有众多名人碑刻,供后人凭吊。由挂剑台北行五百米,便是乾隆晾衣台了。传说乾隆皇帝水陆南巡时,船至张秋,忽然风起浪涌。浪花打湿了船头赏景的皇帝的衣裳,故停船晾衣,后人筑台修亭,以示纪念。如今登台远眺,仍可发思古之情。戊巳山位于张秋镇石桥东崖,实际是一祭奠河神,消除水灾的高地,上置铁牛,铁老鼠各一。过张秋,沿运河北上便是运河重镇—阳谷城东北约 25 公里的阿城镇,这里仍残留着长约百余米,高十多米、宽二十多米的秦汉时期的墙。上面古树参天,荆棘丛生,爬上这段城墙,如到野岭老林一般。谁会想到这里竟是昔日人烟密集的城市?古城的中央,有一眼古井,称为“古阿井”。文献记载:井口如轮、深数丈。水色绿而重,清冽甘美,含有多多种矿物质元素,取井水煮黑驴皮熬制的阿胶,系珍贵滋补药品。明天顺七年在井旁筑石亭一座,清光绪五年重修六角石亭,亭中立石碑一幢,碑上篆书“古阿井”三个大字。西南额题“济世救人”四字,两旁石柱上镌刻有“圣代即今多雨露,仙乡留此好泉液”的楹联。随着“阿胶”的名扬四海,“古阿井”也身价百倍。凡是来聊城观光旅游的人,谁不想亲眼见一见这熬制高级滋补佳品的圣水,亲口尝一尝这仙乡雨露啊!

聊城为运河鼎盛时期的九大商埠之一,有着丰富的文物古迹。传说曾有凤凰落入城中,故又有“凤凰城”之美名。

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辛勤创造,形成了湖、河、城一体的独具特色的城市格局。从空中俯瞰,清澈的湖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宛

若一条玉带曲折回环,围抱旧城。光岳楼耸立于旧城中央,城内48条街道经纬分明,犹如一盘围棋飘浮在碧波之上。东水桥至大码头的东关大街,两侧建筑古朴典雅,依然呈现出运河畅通时的繁荣景象。现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光岳楼这座建于明朝初期的雄伟高大的建筑物,向游人展示着聊城的昔日风采。它位于聊城中央。为四层檐十字脊过街楼阁式建筑。通高33米,建筑高大,气势雄伟,巍然起于城廓间阊阖闾之中。连云接日,冲汉凌霄。登临顶阁,俯吹行云,倒睨飞鸟。极目远眺,中原风光历历在目,俯视城区,城廓河湖交织如画,明代弘治进士李赞登楼时感叹地说:“天下所无,虽黄鹤、岳阳亦当望拜。”所以,数百年来,众多文人骚客、达官显贵,无不以登楼吟诗赋词为快事。清康熙皇帝南巡过此,亲书“神光钟瑛”匾额,至今仍悬于二楼南檐下。乾隆皇帝南巡,九次过聊城,五次登楼,前后作诗十三首,他亲自题写的诗句,刻碑立石,至今保存于一楼东回廊下。现在楼基上,仍保留有历代文人骚客诗赋碑碣壁刻数十方,这不仅是重要的文字资料,而且也是众多游客推敲欣赏、留恋忘返的重要人文景观。

山陕会馆,位于东关运河西岸,是会馆与神庙相结合の木结构古建筑群,其精湛的工艺技术和独特的建筑风格,堪称我国古建筑的瑰宝,那气势宏伟,做工精细的山门,让人回味无穷,六排雕昂承托着琉璃瓦顶,下有砖砌重花门罩,精细程度,不亚于南方的园林小景。门楣上的“山陕会馆”石刻横匾,笔力遒劲,落落大方。正门上那一幅含意颇深的楹联曰:“本是豪杰作为,只此心无愧圣贤,洵足配东国夫子;何必仙佛功德,惟其气充塞天地,早已成西方至人。”道出了当时山陕商人建筑会馆的宗旨。

进入山门便是风格独特的大戏台,呈十翼角形的歇山顶,为山东仅见,有人称其为凤凰展翅,有人喻为俊鸟争飞。总之,其建筑

工艺已大大超过了北京颐和园内德和园大戏楼。钟、鼓二楼列于戏楼两侧，为重檐歇山十字脊式建筑。立石为柱，青瓦覆顶。楼下各设一小院，院内翠竹玉立，古槐浓荫如盖，别有情趣，后部主殿三座并列，南北碑亭分别两侧，犬牙相错，勾心斗角，主殿前后的檐柱、柱础全部透雕山水、人物、花草、禽兽。殿内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殿后为春秋阁和左右游廊。整群建筑前后簇拥，亭台相依，楼阁相望，错落有致，布局紧凑，气势浑厚，富丽堂皇。每天都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吸引着无数的观光旅游者。

山陕会馆北约 200 米，便是当年“崇武连樯”的大小码头。据文献记载，当年载重 800 石的运粮船可在这里停靠。那痕迹斑斑的石条以及被缆绳磨得光溜溜的拴船用石孔，依然能使人们回想起昔日那熙熙攘攘的繁忙景象。游人到这里都爱抚摩一下那石上的伤痕和光溜溜的圆孔，以寄托对历史的追忆。

被誉为聊城三宝之一的宋代铁塔，位于城东北隅古运河的南岸，为十三级八角形楼阁式建筑，通高 15.8 米。塔座为石砌正方形上下叠涩不对称式须弥座。牙脚四角呈卷云状，束腰四面浮雕龙凤和伎乐人物。塔身用生铁分层铸成，逐层收分迭装。每层都有腰檐平座和檐枋、檐椽、瓦垄、斜脊、栏杆、象征性门窗等雕饰，顶置仰莲葫芦宝瓶式塔刹，已是我国不可多得的铁石建筑。其造形典雅，峻崇挺拔。南边紧邻与环城湖相通的水塘。湖、河、塔相映成趣，昔人曾把它列入聊城八景之一——“铁塔烟霏”。今日它仍是人们喜游之地。

大运河畅通的年代，聊城不仅是驰名的商埠，还是一座文化名城。名扬海内外的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就座落在光岳楼下的西南侧。这处藏书达二十多万卷且多极为珍贵的宋元刻本和抄本的藏书楼，由于战争的劫难和人为的原因，已是书去楼毁，面目皆非。但是酷爱古老文化的聊城人民，已在海源阁旧址重建

了海源阁。新建的海源阁为一四合院式建筑群。主楼为二层歇山式,雕梁画栋,飞檐挑角,高峻雄伟,气势宏大,为聊城又增添了一处文化园地。

环城湖是聊城的又一特色。其面积略小于杭州西湖,是济南大明湖的5倍,是我国北方少有的人工湖泊。湖水清如许,明如镜。广阔的水域调节了城市的气候,改善了城市面貌。修砌后的湖岸蜿蜒曲折,柳绿花红,步移景换。湖心岛上建有古典式园林,山石成趣,曲径通幽,花繁树茂,亭台映辉。望岳亭、荷香亭与光岳楼隔水相望。千顷碧波之上,鱼戏游船,荷香扑面。如诗如画,令人流连忘返。

运河穿过聊城,北流百里便到了“富庶甲齐郡”的历史文化名城——临清。临清位于运河、漳河、卫河交汇处。水陆交通便利,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故有“小天津”之美誉。这座历史悠久、文物繁多,名胜古迹美不胜收的古城,给我们保留下了许多古香四溢、蔚然浮秀的人文景观。

舍利宝塔可谓临清的象征。塔建于明代万历四十一年(1613),座落在城北卫河东岸。属楼阁式砖木结构,九级八面,逐层收分,通高近60米。底层门楣横石匾上镌“舍利宝塔”四字。顶呈将军盔形,威武壮观。每层密甃宽度为1.5米,檐下有陶质斗拱、转角立柱,下有莲花承托。各角有雕花木椽挑出,上系铜钟。风动钟响,声震旷野,故有“塔岸闻钟”之说。塔内有转角形梯道,可迂回登临塔顶。举目远眺,孤帆远影,运河如带,翠堤蜿蜒,城区井然,令人心旷神怡。

位于大运河畔的临清北大寺,是全国著名的清真寺之一。寺由大殿、望月楼、讲堂、沐浴室等部分组成。殿堂隆起,飞檐四出。大殿左右有角亭对应,望月楼精致秀丽,为木牌坊式重檐楼阁建筑,布局精巧,结构严谨。院内古柏参天,静穆庄严。每当夕阳西

下,夜幕降临,登上望月楼,遥望星空,皓月当空,耳旁流水潺潺,渔歌悠悠,使人沉醉于风光迷离之中。

鳌头矶座落在临清市区古运河之北岸。明代这里曾筑一防水石坝,形如鳌头,周围诸闸如鳌足,故名鳌头矶。矶旁有一古建筑群,原为弘芸庵。东楼名观音阁,南楼名登瀛楼,西殿称吕祖堂,北殿叫甘棠祠,整个院落结构严谨,布局得体,玲珑纤巧,幽静肃穆,故有“鳌肌凝秀”之称,引得无数文人学士赋诗称赞。明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曾赋七绝一首:“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

临清东郊还有一奇特的古树,高三丈,围两丈有余。树干齐腰处有斑状突起,状如叠云。树冠形如巨盖,其枝似虬龙盘旋。更奇怪的是叶有五种形状,即米粒、竹箴、针、刺、喇叭形。故名“五样松”。此树国内罕见,凡到临清者,无不慕名前往观看,一睹为快。

2、黄河旅游线:

黄河,这条母亲河,她在聊城的南部边沿流过。在她的怀抱里,曾经孕育出了多少人间史话,且不说已经被埋入地下几千年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光辉成就,也不说当今的英雄儿女在滚滚黄河上建起的东阿黄河大桥,鱼山浮桥、位山大闸等现代奇迹,一座曹植墓,就足以使我们崇拜、向往了!

曹植墓,位于东阿县黄河西岸边的鱼山西麓,鱼山虽不高,地势却好。东、西两面有黄河和小清河萦绕,合为襟带;对岸群山起伏,攒峰耸翠,北面沃野千顷,一抹平川。这里山青水秀,风光宜人,怪不得曹植生前有遗愿,死后要葬于鱼山。曹植,字子建,曹操三子,曹丕的胞弟,是建安时期杰出的诗人、文学家,他才比山藪,思并江湖,辞新华名,骨气奇高。他那首“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七步诗”,更是脍炙人口,“七步成章”的美名,不翼而飞,百世留传。这样一位中国文学史上的巨

子埋在了鱼山，能不招来众多的骚人墨客前来顶礼膜拜，填词赋诗以发崇拜敬慕之情吗？正是人因山秀而葬，山因人奇而名，更何况这鱼山上还有浮云洞、羊茂台、浴仙池、摩崖刻石、天然石画等景观。

曹植墓以西，约 10 公里的邓庙，现存元、明、清三代石刻一组，现存十一尊，大的 1.95 米。天皇、地皇、人皇三尊石像，雕刻技法娴熟，形象生动逼真，流露出浓厚的元代风格。吾党的雕刻技法更为古朴，有宋代遗风。这组石刻造象在山东省是少见的。

3、水浒旅游线：

《水浒》这部中外闻名的文学名著中，所描写的许多故事都与聊城地区有关，如妇孺皆知的武松打虎、三打祝家庄、三打高唐州等，都发生在今聊城地区。

有诗曰：“胆大艺高武二郎，挺身走上景阳冈。醉来打死山中虎，从此威名四海扬。”景阳冈在聊城地区阳谷县境内。当年这里岗阜起伏，古树参天，林木郁茂，杂草丛生，四野人烟稀少，猛兽出没无常。武松只身打虎，为民除害。后人为纪念武松这位为民除害的英雄，在打虎地点立碑修亭，又在岗上修建武松庙一座，为三开间硬山顶仿古建筑。如今的景阳冈虽然已不象当年树高林密、草深路险，但岗山依然苍松蔽日，翠柏遮天。著名书法家舒同题字的“景阳冈”碑刻更给这处名胜增添了不少成色。

过了景阳冈西行三十里，就到了阳谷县城。闻名遐迩的狮子楼，就座落在县城内十字街首，坐西朝东，是一座五开间两层重檐歇山建筑。始建于北宋。《水浒》中关于武松仗义勇为、杀死地痞恶棍西门庆的地方就在这里，原楼已荡然无存。为纪念武松这位英雄，1958、1984 年阳谷县政府先后拨巨款重建狮子楼。新建的狮子楼，斗拱飞檐，灰瓦覆顶，雕梁画栋，辉煌壮观，二楼檐下悬挂有沈雁冰题“狮子楼”匾额一方。楼内有“三碗不过岗”、“潘金莲王婆

谋害武大郎”泥塑四组，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水浒》中关于三打祝家庄的描写，颇为引人入胜，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在阳谷城南至今还能寻到三庄的史迹。无论文人墨客还是普通百姓，只要到了阳谷，都想去祝家庄探一探那盘陀道之谜。

一提起“打高唐州”，人们就不难想到黑旋风李逵和小旋风柴进。正是因了这两股旋风，梁山英雄好汉们，在高唐州谱写了一篇见义勇为、杀富济贫，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雄壮乐章。如今的高唐县，虽已面目全非，但当年囚禁柴进的深井及柴皇叔的御花园依旧花香水清，亭台映辉，成为今人访古探幽的去处。

出高唐北行二十五华里，就到了宋代砖塔所在地。塔旁原有一枝干苍虬的古槐，因此，当地素有“唐槐宋塔”之说。塔为青砖砌筑，八角十三级，仿木结构楼阁式建筑。塔体自下而上逐层收分，使古塔显得更加挺拔俏丽。

高唐古城三面环水，如玉带萦绕，岸柳婆娑，水波荡漾，是一个人杰地灵，英才辈出的好地方。当代国画大师李苦禅、爱国画家孙瑛，都出生在这里，新建的孙瑛纪念馆，座落在湖水北岸的绿荫中。工作之余，湖中泛舟，岸上观画，这该是何等的舒心惬意啊！

聊城，有众多的名胜古迹，优越的自然环境，为文物旅游事业的发展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三、发展文物旅游业的后续效应

一个国家，看其经济是否发达，首先是看它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多少。所占比重越高，经济就越发达。而文物旅游事业的发展，正好可以带动第三产业中的许多行业迅速发展。

有关资料载，曲阜文物局，1993年的门票收入是2000多万元。内外宾客平均每人每天的全部门票支出按40元计，这样，每年曲

阜要接待百万人次。这一百万人要住宿,要吃饭,要乘车,照相,要买纪念品,除买纪念品的款数难以估计预算外,其他四项,每人每天最少也不会低于 70 元钱,这样就是 7000 万元。难怪在曲阜三孔周围的各种类型,各种行业的摊点上千个。这将解决多少人的就业和温饱问题呢?

据说,蓬莱阁每年门票收入比曲阜还要高,几乎每年到 3000 万元,泰安市文物部门每年的门票收入,也在 2500 万元左右,这些收入可以说都是无本经营,除去工作人员的费用之外,其他几乎都是利润。如果加上旅游人员的吃、住、行、玩、纪念品等消费,每年就旅游这一项就可以给当地带来上亿元的收入。

另方面,旅游业的发展还可以带动服务行业、副食品加工业、纪念品加工业、照相器材生产等行业的发展。

一、服务行业:包括吃、住、行、摄影等。

a、吃,每年这百万流动人口吃饭就是个大问题,“民以食为天”,这必然促使餐饮业迅速发展,这里既需要一些普通的便民小店,也需要一些接待外宾或富商的高档饭店。

b、住,许多人要在这里住宿,这必然促使各个层次的旅馆、宾馆等行业的发展。因此,凡是旅游发达的地方,不仅小型的旅馆遍布街区,高档的大酒店,大厦等也高耸挺立。

c、行,各旅游胜地,各种出租车的数量都相当可观,低档次的有自行车、三轮车、中档次的有小面包、面的,高档次的有豪华大轿车,传统形式的有马拉车、毛驴车、花轿等形式。

d、摄影,各旅游胜地,国营、集体、个体摄影者成群结队,但都生意兴隆,收入可观。

以上服务行业都是直接为旅游服务的,那种繁荣兴旺景象,我们在旅游地点就可一目了然。还有许多生产加工业,也在旅游业的带动下发达兴旺,如副食品加工业、纪念品加工业等也分别简析

如下：

二、副食品加工工业：包括酒类、饮料、糖、茶、糕点等，特别是包装坚固、携带方便、卫生的饮料、糖果、面包、饼干等，都十分受欢迎。

三、纪念品加工业：这里既有高档的金银首饰、珠宝玉器、玛瑙琥珀、珐琅宜泥，也有中低档的仿金饰品、保健用品，还有民间的木刻水印、布贴草编，面塑泥塑等工艺品，每年都能换回大量外币。

四、照相器材生产：人们到一个地方旅游，无不在美景名物前摄影留念，据统计，蓬莱阁这一处旅游胜地每年消耗的胶卷，相纸、药液粉等，是全市其他销售店总和的好几倍，销量的扩大，必然刺激生产的发展。

五、商业：流动人口的增加，也必然带来商业的活跃。因为许多游客在领略完了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之后，也要逛一逛商店，购买一些生活日用品。

六、为社会闲散人员提供就业机会：这一点应该引起领导的足够重视。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可以解决多少人的就业问题，可以解决多少人的吃饭问题，我想凡是到过曲阜、泰安、蓬莱的人，都能看到那一个接一个的商业摊点群，都能看到那鳞次栉比的宾馆酒店，车水马龙的车队。这将安排多少就业人员啊！

从以上这六方面的分析，文物旅游业这无烟大工业的发展，将给我们带来多少实际利益啊！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四、发展文物旅游事业的措施

我区文物旅游事业的发展，前途光明，但必须跟上有力的措施。

首先，应该成立“聊城地区文物旅游局”，来规划管理全区的文物旅游事业。

文物和旅游联系非常密切。文物是旅游业的重要载体,没有文物古迹,就缺乏吸引游人的魅力。而文物古迹有许多也只有在旅游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二者相辅相成,珠连璧合、相得益彰。如果把二者分割开来管理,无论在管理使用,还是保护修缮上,都会出现矛盾,出现许多不应有的扯皮现象。许多大城市的区、县一级,如北京市的下属几个区,设立文物旅游局,统一管理,可能也正是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之后而建的。只有建立了相应的机构,才能保证事业的顺利发展!

其次,要加强现有文物单位和风景名胜景点的保护。这些地方遭到破坏,旅游业就无法发展。

第三,应当敢于在旅游设施方面投资,实际上这是投资少,见效快的行业。如河北正定县,在充分利用当地大佛寺、凌霄塔等文物古迹外,又投资 400 万元修建了红楼梦中的宁、荣二府和大观园。投资上千万元修建了西游记第一宫、第二宫、中国神话宫、电影探迷宫,丝绸之路宫等大型游乐场所。根据人们去时的情况估计,每天到此旅游的人不下 4000 人。每人每天包括住宿吃饭在内,最少要在这里用去 60 元钱。这样,每天,正定县的这一项收入就是 240000 元。再如淄博“蒲松龄纪念馆”驻地蒲家庄,80 年代末,投资 60 万元,建立了狐仙园,不到三年就全部收回了投资。这种事例还很多,不用赘述。总之,谁有远见卓识,谁就敢于在旅游业上投资。

当然,资金的来源不可能只依靠地方财政,可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可以国家搞,可以集体搞,也可以个人搞,或者几家联合搞,更可以大量吸引外资,宣传我们的投资环境,丰富旅游资源也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重点。

综上所述,我区占有发展文物旅游事业的绝对优势,只要引起领导的足够重视,抓准项目,随着京九铁路、济邯铁路、济聊高速公

路的建成通车,必然会促进我们聊城地区经济的腾飞和再度辉煌。

本文所用数据,大都是文物界同仁在一起开会时口头交流的材料,因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进一步核实。又因本文写作时间短促,错误之处难免,肯请赐教。

临清市征集瓷器选介

殷黎明

山东省临清市博物馆在文物普查中陆续征集到一批瓷器,现选介如下。



图一 白瓷壶

白瓷壶 圆唇,高颈,深腹,平底。颈肩处有对称两系,带把,流短小,芒口。釉质细腻,白中闪黄,有细开片,底部无釉,胎质灰白。壶通高 20、口径 6.5、最大腹径 10、底径 6 厘米。(图一)该壶是 1986 年征集的,当为唐代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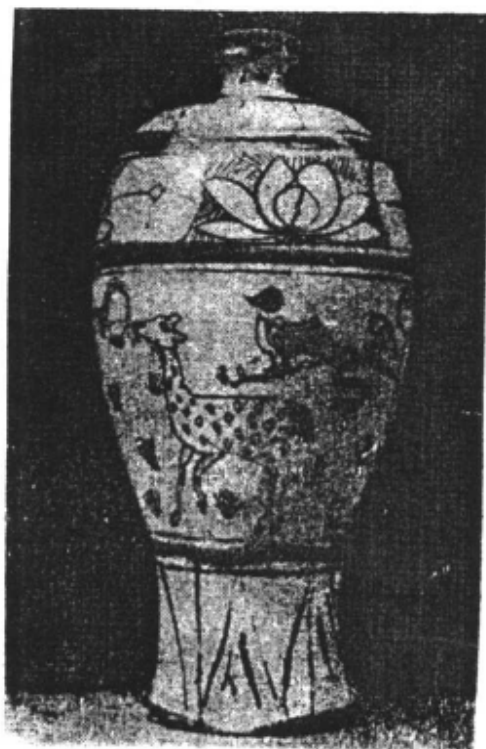
白釉釉下酱褐彩罐 直口,圆唇,扁圆形腹,腹下部急收成桶

柱形,底部折曲外凸,圆足内微凹。粗胎,胎质坚硬。腹内施灰褐色釉,器表敷白中闪黄化妆土,外施玻璃釉,腹下部未施釉。腹中部饰一圈赭红色带状纹,上部为酱褐、柿黄两色弦纹、涡纹和叶状纹,下部饰酱褐色羽状纹,底部饰水波纹。罐通高 24、口径 14、腹径 25、足径 11 厘米。(图二)

该罐征集时间为 1987 年,据造型及纹饰分析,当为元代产品。



图二 元白釉釉下酱褐彩罐



图三 梅瓶

梅瓶 小口,短颈,丰肩瘦体,底微内凹。通体施乳白色釉。釉上用黑褐色颜料自颈至底部绘 5 道带纹,其间分别绘荷花、草、鹿、鸟,流畅明快、古朴稚拙。瓶通高 34、腹径 15 厘米。(图三)该瓶于 1979 年征集,时代当与前述酱褐彩罐相近。

原载《文物》1992 年第 11 期

《乾隆英使覲见记》与马戛尔尼

殷黎明

天津历史博物馆研究员顾道馨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民俗学专家,虽年逾古稀,仍于1990年春开始,和几个青年学者一道,沿大运河考察、采风。临清作为历史上的运河名城,顾老倍感兴趣,交谈中他提及贵馆藏有中华书局1917年版、刘半农译注的由英国1798年乔治尼古拉出版社出版《乾隆英使覲见记》全册。图册中有一幅是绘制的临清运河景色,标题文字为“大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临清”。

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便专程去天津历史博物馆,承蒙顾老的热情帮助,翻阅了这一历史图册,并对部分画面进行了拍摄。

本图册为铜版画,均为实地写生或实测图,柯罗版印刷,装帧非常精致,刘半农译,中华书局1917年版。原系法文,为法国传教士传进,清廷当时将此深藏内府,直至1932年故宫博物院发现后,才复印出版。前有翁文灏和朱希祖二位序言,详介图册出版前后的情况。

此图册形成的历史经过是这样的:1792年9月,英国以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寿辰的名义(实际乾隆皇帝头一年就满过八十岁了),第一次派使团出访中国,其赴华特使就是马戛尔尼。马戛尔尼生于1737年,卒于1806年,曾任英国驻俄公使,1792年时为马德拉斯总督。1792年英国国务大臣敦达斯任命他为赴华特使,9月,他率领使团从英国朴茨茅斯出发,这个使团包括军事、测量、绘

图、航海等各方面人员一百多人,分乘“狮子”、“豺狼”、“印度斯坦”号三艘船,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向中国驶来。18世纪末,英国工业迅速发展,急需在东方寻求一个广大的市场。但是,清朝自1757年起就把闭关自守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沿海只准在广州一地与外国贸易,严格限制外国商人在广州域外的地方居留和活动,马戛尔尼就是肩负着使英国的政治势力和商品打入中国这个特殊使命来华的。

1793年6月,马戛尔尼率领的使团到达中国,8月5日到达大沽,换乘木船沿白河前往北京,然后乘自带的豪华马车到承德觐见乾隆皇帝。为了达到目的,完成使命,马戛尔尼呈递了英国国王给乾隆皇帝的一封充满誉词的信,诡诈宣称来华目的只是研究各地出产、交流技术、传播知识云云,绝非谋利益和特权,并精心挑选了一批礼品,包括天体运行仪、望远镜、天球仪、地球仪、铜炮、榴弹、毛瑟枪、连珠炮、玻璃制品和英国军舰模型以示炫耀,“图穷匕首见”。当马戛尔尼自认为彼此双方关系融洽后,便提出八项包括主权特权、领土等等狂妄的、不合理的要求,被乾隆皇帝严辞拒绝。马戛尔尼并未善罢甘休,他率领使团到天津、北京、承德,沿运河到杭州、广州、澳门等地周游,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中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一些情况,搜集到国民经济、自然资源、海陆交通、军事国防等重要情报,为40多年后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提供了资料。正如他的使团随员斯当东说的那样,这次出行是“……为国家完成了一项新奇而微妙的使命。”《乾隆英使觐见记》图册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794年9月5日,马戛尔尼回到英国朴茨茅斯,历时两年的中国之行宣告结束。

从临清一幅图中可见,当时临清舍利塔一带是一处风景非常优美,而且非常繁华的码头所在,玲珑秀丽的宝塔,建筑幽雅的寺

庙和运河上过往的船只相映成趣,岸上的各种人等悠闲自在的或交谈、或小憩,远处临清城的城墙和城门楼高大雄伟,河中帆樯林立,此图与清末《临清县志》临清城区图相吻合。

是地的繁荣随着运河漕运的终止而迅速衰落下来,其寺庙建筑也毁于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现在只留下这座孤独的宝塔,诉说着这苍凉的历史。

原载《人文与自然》1998 年第 3 期

临清穆斯林

黎明 建文 陶光

山东临清为一个多民族的城市,今全市 10 余个民族中,除汉族外,人口最多的当属回族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回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和睦相处,辛勤劳动,休养生息,共同创造着美好的生活。

临清回族人口约 13000 人,在鲁西北地区县、市中是最多的。他们大部集中在市区,临清城区西北部为回族主要聚居地,除此而外,尚有少部分散居于乡村。

临清回族的历史渊源久远。

盛唐时,阿拉伯、波斯一带商人沿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波斯湾、印度、绕马来半岛到达中国广州、泉州、扬州、南京等地经商并逐渐定居。元代以后,漕运兴盛,临清因地居运河要冲而地位渐重。至明清之际,尤以其发达的商业及手工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这期间,已定居南方的西域商人(时称“胡商”)沿大运河北上,至临清从事商贸活动,后部分人因慕临清之繁华,遂定居于此,繁衍生息,成为临清回族的主要组成部分。

至十三世纪初叶,成吉思汗西征中亚细亚,劫掠了大批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编为“探马赤军”,这部分人后来参加了忽必烈统一全国的战争。据《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 18 年(1281 年),世祖下令:河洛、山东居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此后,大批回族士兵取得农民身份进行屯垦,于是各地出现了一些回

族村镇。时至今日,这些回族村镇仍保留着当初编民屯垦的称谓。原临清市洪官营村(现已划归河北省临西县),即为当年回族屯垦的例证。

以上为临清回族的主要来源。

清真寺为临清穆斯林举行公共活动的主要场所。临清清真寺(当地人称“礼拜寺”)为中国长江以北著名清真寺之一,原有三座:老礼拜寺、北礼拜寺和东礼拜寺。三座寺在一条轴线上自西而东排列,其建筑最早者为老礼拜寺。可惜的是,此寺 1968 年疏浚运河时拆除无存。北礼拜寺建于明初,现今保存较为完整,东礼拜寺始建年代已无考。自明代以来,在全国中等城市中,有三座清真寺的唯独临清。每逢回族重要节日,穆斯林们均聚于清真寺内举行礼拜活动。清真寺内负责伊斯兰教务的人称阿訇,一般由精通《古兰经》并在回族中有威望的人担任。

临清回族除遵循伊斯兰教义,沿袭世界范围内回族一般习俗外,尚具有独特的地方习俗。婴儿出生 3 天,须全身洗浴,当地回民称为“洗娃娃”。待婴儿长满 1 周岁时,宰一鸡以为贺;长至 5 周岁时,宰一只羊;长满 10 周岁,宰一头牛。婴儿出生后,除按父母姓氏起名字外,还要请阿訇起一个经名名字。孩子长至 8 岁至 15 岁间,都要去清真寺由阿訇导读“乜贴”,也就是阿拉伯文初级小学课本,并学习伊斯兰教一般教义及本民族的基本礼仪。做礼拜则是穆斯林们必修的功课,按伊斯兰教义规定:每日必须礼拜五次,分别称为“晨礼”、“晌礼”、“晡礼”、“昏礼”和“霄礼”,此外,每星期五还要进行“主麻拜”,也就是“聚礼”。“聚礼”一般在北礼拜寺举行。礼拜前,穆斯林们必洗净全身,礼拜时,必须严肃、庄重、诚心诚意,不得喧哗、左顾右盼、发笑等,否则,便为礼错拜或坏拜,就需要“补拜”,绝不能马虎。

在婚、丧、嫁、娶或某些节日时,回族群众习惯上做一礼仪性食

品——油香。油香为一种饼类食品,有大小之分。大油香以面粉加盐、碱、花椒水调和后制做;小油香则裹以糖馅,作为一种既可自食,又可互相赠送表示敬意的礼仪性食品,为回族群众所喜爱。临清回民中还流行一种颇为独特的“羊肉粥”。其主料为一只整羊及麦仁、江米;佐料有葱、姜等。羊须除去内脏。加上佐料在大铁锅中煮至稀烂如粥,方可食用。

由于长期同汉民族杂居,许多回民食品亦为汉族群众所喜食,如松花羊肉、烧饼夹羊肉、热羊肚等。临清回民名吃“小割”,获得1994年全国清真食品大奖赛特别奖。

临清回族的姓氏有黑、白、洪、陈等,其各姓之间一般均有姻亲关系。回族群众之间非常讲团结,一家有难大家帮成为非常重要的信条。

共居一方土,共饮一方水,长期以来,临清回、汉杂居,互相影响,和睦相处,关系融洽。

原载《山东画报》1995年第6期

浅谈《戒赌碑》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

刘玉新

文物普查中,我们在山东省东阿县北双庙村发现一方清光绪年间的《戒赌碑》(时该不久,又在该县姜楼乡陶赵村、顾官屯乡大柳张村发现两方同时期的《戒赌碑》,其内容大同小异),该碑镶砌在庙墙上,长 1.70 米、宽 0.70 米,碑四边线雕缠枝牡丹花纹,碑文楷书阴刻,保护完好。这是一份惩赌、戒赌的乡规民约,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民俗研究资料。现将碑文抄录如下:

且甚哉,天下事,倾家败产、丧名坏节者,莫甚于赌博。或为骰、或为宝、或为牌,种种赌局,皆是剥富劫贫也。见夫世人,贪赌博,荒业农,屡赌屡输,悬欠难归,典垄亩,卖房宅,祖父遗业,一扫而空。欲再赌,无资,不赌,难禁。由是诤东拐西,偷亲窃友,甚至饿父母而不顾,冻妻子而弗恤,寡廉鲜耻,难免正人之憎恶。余庄双庙戒赌已久,父老子弟群安耕凿之性,智愚贤否共游和睦之天,岂不幸甚。恐有无知之徒,引诱童蒙倡赌,以坏风俗,於是囿庄老幼,甘心戒赌。命余作文垂戒。余诚学疏才浅,曷敢妄作,谨以俚言聊且勒石以志云尔。

犯赌条规者开列于后:

窝赌者罚钱十千

诱赌者罚钱五千

见赌不献者罚钱三千

见赌私放者罚钱五千

遇賭即拙者賞錢三千

糾首 陳光明、陳希思等三十二人

邑儒陳光猷撰文并書

大清光緒二十三年葭月上浣穀旦

該碑一方面指出賭博之徒對社會，對家庭的嚴重危害，並為之深惡痛絕；一方面規定了嚴厲的懲戒條規，賞罰並舉，以正鄉風，這充分說明在當時查賭、禁賭、懲賭已成為群眾性的自發行動，並具有其特有的廣泛性和普遍性。這對於維護社會秩序，純正鄉風民俗，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歷史作用。在社會主義時代的今天，仍有着可供借鑑的現實意義。

眾所周知，賭博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一種惡風陋習，誘惑力大，成癮性強，並能傷風敗俗，危害社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賭博活動曾一度銷聲匿跡，但並未有根絕。近幾年來，又有所滋生蔓延，大有泛濫成災之趨勢。嚴重地影響了社會安定，敗壞了社會風氣。據一份資料報道：“當前，賭博案件正以驚人的速度上升。據公安部統計，全國查處的賭博案件，1986年為13.9萬多起，1987年為17.3萬多起，而1988年達21.8萬多起，比1987年上升24.4%。最高人民法院去年上半年受理的賭博案件比前年同期上升53%，這還只是已經查獲的數字，實際發生的賭博案件數量遠大於此。”（鐘聲：《關於當前賭博活動的情況與對策》載《人民公安》1989年第3期）並且涉及面廣，賭資巨大，花樣繁多，已經成為當今社會一大公害。

北雙廟《戒賭碑》的發現，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就是查賭、禁賭，光靠行政命令和行政手段很難徹底根治，近年來屢禁不止的例子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只有廣泛發動群眾，大打一場人民戰爭，使賭博者像過街的老鼠，熱鍋上的螞蟥，惶惶不可終日，禁賭活動才得以大奏成效。

据笔者与北双庙村民座谈,了解到该村村风淳正,多年来未发现有聚赌、诱赌、窝赌现象。他们以赌为耻,无赌为荣,已形成良好的风俗习惯,这在当前赌风日渐不衰的情况下,有这么一方“净土”,足可说明群众性的查赌,禁赌活动是有着一定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的,应引以为鉴。

依法强化管理 确保文物安全

陈昆麟

什么是法,法和国家一样,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由国家行使立法权的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它是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又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法是有阶级性的,用以巩固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剥削阶级国家的法都是保护少数剥削阶级利益,统治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被彻底废除。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是镇压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凡法律、法令、条例、规则、命令以及惯例等,都属于法的范畴。

在我国法制建设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法》)是制定的较早的大法之一,早在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就通过并颁布施行了。《文物法》的颁布为依法保护管理文物,制止破坏文物行为,打击文物犯罪,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后来,根据八年来实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1991年6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30条、第31条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整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的补充规定》两个法律文件。1992年4月

30日,国务院又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并于5月5日发布实施。同时,国家又根据《文物法》的基本要求,相继制定了一些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文物出境鉴定管理办法》、《博物馆工作条例》、《文物店工作条例》、《古建筑消防管理条例》、《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等。各省乃至地市也相继制定了符合各自具体情况的地方法规。1980年10月30日,山东省第七届全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山东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1987年,聊城地区行署下发了《聊城地区行政公署批转地区公安局、工商局、文化局〈关于严厉打击破坏文物行为的报告〉的通知》。《文物法》和其他相继制定并实施的文物保护法规,构成了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完整的法律体系,使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有法可依,基本上走上了法制轨道。

《文物法》共分八章三十三条。在这部大法中对什么是文物?保护文物的责任、文物所有权、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流散文物与管理、文物的出土、收藏与经营、文物保护经费的来源、奖励与惩罚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一、保护文物,人人有责

(一)什么是文物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是世界上文物最多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在《文物法》中,已对文物的范围作了具体规定。《文物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下列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受国家保护:

1、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

2、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

3、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4、重要的革命文献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

5、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6、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的保护。

通过上述各条规定的文物的范围,我们可以看出文物都与人类的社会活动有密切关系,必须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三种价值。可以说他是历史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遗存。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文物是人类社会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它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历史进程,是一种无法取代的不能再生产的宝贵财富。

(二)保护文物的重要意义

为什么要保护文物?因为文物本身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正是这三种价值使文物具有了史料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

1、文物的史料作用

文物是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有形的物质遗存,是研究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的实物资料,这是文献资料所无法代替的。因文献史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人为的,自然的原因,有些记载失实,有的残缺不全,有的散失无存,有的经删改正误难辨。而文物,作为那个时代的实物遗存,确能从某个侧面比较如实的反映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起

到证史、正史、补史、形象史料的作用。

a、证史作用：

我国有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但是，由于当时社会各种条件的限制，记载的是否准确，很难断定。文物，确能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商代帝王的世系。过去有人提出疑问。三十年代，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了大批甲骨文，也记载了商代的世系关系。经考证与《史记》记载基本相符。这就证实了《史记》的记载是对的。再如，《史记》中有孙武仕吴、孙臆仕齐并各有兵书传世的记载。《隋书》中没有了关于孙臆的记载。及至唐宋以后，许多人认为历史上可能就没有孙臆其人，更无所谓《孙臆兵法》，世传的《孙臆兵法》乃是他人伪作。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了两座汉武帝时期的墓葬，出土了4千多片汉简。经整理，这就是《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证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是正确的。再如，过去史书记载，在少数民族统治中原地区时，中原地区的男子多穿胡人服饰，而女子则穿汉人服饰，并且有左衽习俗。1979年，在我们聊城地区高唐县，发掘了一座金墓，所出土壁画，与史书记载相符，证明史书记载是正确的。

b、正史作用

我国文献浩繁，有些在传抄过程中出现错误，有些在流传中缺佚；更有甚者，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在编修史籍时，进行大量删改。如清皇朝在修《四库全书》时就是如此。文物，做为实物资料可以校正古籍记载之谬误，订正错讹。如关于漆器的记载，过去因为只见于《韩非子》和《周礼》中，因此人们一直认为这种美观轻巧的用具出现于战国中期。但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漆器的出土。这样把中国漆器的产生提前了一千多年。再如河北磁县，原有许多古墓封土。过去一直传说为曹操的七十二疑冢。

后经过部分墓葬的清理发掘,证明这是北朝墓群,绝非曹操疑冢。我们地区的实例也不少,如高唐城东北三里庄村南有一高大封土,过去传说是皇姑墓。73 年对墓进行清理,墓主人是北朝东魏的济州刺史房悦。墓中埋的是男的。纠正了过去的讹传。

c、补史作用

文物补史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无文字可考的历史提供实物资料,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补充记载的缺陷。1974 年,在发掘湖北云梦县睡虎地 11 号墓时,发现一批秦简。经整理,分为《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为吏之道》等 9 种。特别是 5 种关于秦法律的文书,其内容远远超出了李悝《法经》的范畴,已经具备了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又以刑法最为成熟。在我国,有关法律的记载,保存最完整的最早的古代律文是唐律。隋以前的律文比较少,且多为断章零篇。这批竹简中的秦法律文书的出土,填补了我国法制史上的许多空白,是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意义十分重大。

2、文物的借鉴作用

文物本身就是当时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其本身蕴藏着当时的学术成果和信息。人们都知道当代人的书法绘画,都是在借鉴前人的书法绘画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例子很多,不去多讲。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看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如河北省赵县的安济桥,是 1300 年前隋代工匠李春修建的。它的优美的造型和科学结构,对我国后代的桥梁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后代的石拱桥普遍借鉴继承,而且为现代的混凝土桥梁所广泛应用。再如河北省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在 1976 年唐山大地震中,许多近现代建筑被震倒,而这座辽代建筑,却在地震中仍然不动。经查文献,在多次七级以上地震中,均未震垮。这说明他的结构非常科学,有

很大的科技价值,为现代建筑的抗震设计提供了重要信息。

文物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中的借鉴作用是非常广泛的,不再一一列举。

3、文物的教育作用

历史文物是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文物具有直观、形象、生动的特点,其教育作用和感染力是其他教育手段所难以代替的。万里长城、北京古都、曲阜、泰山的名胜古迹以及历史名人的各种遗物、遗迹等历史文物,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力,以此来教育子孙后代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韧不拔、艰苦奋斗的光辉历史,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自尊心。大量的历史文物,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蕴藏着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近现代文物、革命文物反映了中国人民为寻求救国之路进行的巨大历史变革,可以从正反两面教育人们认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真理,激发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爱国热忱,自觉地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就我们聊城来讲,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光岳楼,不仅是聊城的象征,而且也是聊城人民的自豪,这必然增强我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感情。因此,文物作为一种特殊的教材的巨大作用,是教科书难以达到的。

(三)保护文物的责任

文物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珍贵的古代文物是中华文明的标志。因此,保护国家文物不单纯是一个部门或某些人们的事了。《文物法》第三条在规定“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文物工作”的同时又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文物较多的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可以设立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工作”。

这就明确指出,各级政府都有保护文物的责任。就是专门的文物管理机构,也是由政府设立的,政府应当在财力、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不能当做可有可无的部门来对待。《文物法》第三条还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国家文物的义务”。这就明确指出“保护文物,人人有责”。因此,每个人应当主动的、自觉的保护好文物。要认识到破坏、摧残文物的行为是愚昧、落后的表现,必然受到子孙后代和全人类谴责。保护好文物是国家主权独立、民族团结、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标志之一。一个道德素质高的民族国家,要具有文物意识,一个道德素质高的人,要主动自觉地保护文物。要在我们国家、我们地区形成一个人人爱护祖国文物,“保护文物光荣,破坏文物有罪”的社会风尚。

二、文物的所有权

我国文物的所有权有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公民私人所有权三种形式,其中国家所有权及集体所有权占主导地位。

1、国家所有的文物

《文物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等,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机关、部队、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组织收藏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这就从法律上确定了国家对我国绝大多数文物的所有权,任何人不得非法侵犯。

社会上往往有一种不正确的认识,认为在农田基本建设或修房盖屋时自己发现或挖掘到的文物是无主物,应该归自己所有。于是,有许多人发现文物或挖掘到文物,便自己占有或私自出卖;许多土地承包者在承包的土地上发现和挖掘到文物也认为应该归自己所有。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做法是违法的。我国境内地下、内

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人在我国境内任何地方发现、挖掘到的任何物,都必须上交国家,否则就是非法占有国家财产,侵犯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关于这一点,不仅广大群众要提高法制观念,就是少数执法部门的同志也应提高认识。如有一个县,发生了群众盗掘古墓葬、古遗址的事件,文物保护人员在请求执法部门对首犯绳之以法时,他们却为难地说,如果说他偷了一个小收音机,我当场就可以拘留他,他只是挖了些盆盆罐罐,怎能逮人家呢。这就是对文物的所有权、重要性认识不足。

我国境内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石刻等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等,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也均属于国家所有。

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还包括国家机关、部队、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组织收藏的文物。这些部门和单位所拥有的一切财产都是国有财产,所藏的文物当然要属国家所有。

2、集体和私人所有的文物

《文物法》第5条规定:“属于集体和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和传世文物,其所有权受国家法律的保护。文物的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保护管理文物的规定。”根据以上条款和宪法有关规定,属于集体和私人的文物同其他财产一样受国家法律的保护,但是与处理其他财务不一样的是,文物的拥有者还必须遵守国家有关保护管理文件的规定。这就对其所有权又增加了一些必要的限制。所以这样规定,主要是因为文物不是一般的商品或其他物品,文物是属于全社会、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集体或者个人虽然拥有文物的所有权,但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随便处置、破坏或者损伤文物,也不能把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外国人或境外居民。

三、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

不可移动的文物是指那些不宜进行整体移动的文物,如革命遗址及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对这一类文物可以根据其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划分等级。实行分级管理和重点保护。一般可分为县(市)、市(地)、省、国家四级保护单位。为了使同志们对上述文物有些较具体的了解,现对我们地区内所有的类型加以简单介绍:

1、革命遗址及建筑物。在近代中国史上,多少革命先辈为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前仆后继、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与这些斗争中的重要历史或历史事件有关的遗址、旧址、纪念地、纪念建筑物、故居、墓葬等,作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见证,具有突出的和鲜明的历史教育意义,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如:范筑先,金方昌等人的遗址,赵以政、金谷兰等人的墓葬。因此在保护和管理上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古文化遗址,是指古代人类进行生产和生活活动遗留下来的聚落址、城址、窑址、矿冶址、古战场及其他附属物等,是了解古代人们生产、生活情况的重要资料。这类遗存一般面积较大,范围较广,多埋藏于地下,在管理上故多称之为地下文物。如:聊城县的权寺遗址,聊古庙遗址、茌平的台子高遗址,尚庄遗址等。

3、古墓葬。古代各历史时期的墓葬,包括各类独体墓和墓葬群。墓葬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各种埋葬制度和埋葬习俗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当时的社会制度、阶级关系、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情况。墓葬也属于地下文物。但是有些墓葬如帝王陵墓和封建官僚墓地在陵区或墓地上都保存有封土、石刻、享堂及其

他木结构建筑,有的还保存有庞大的建筑群,它们是古墓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保护管理上亦可作为地上文物对待。在我们地区比较有保护价值的墓葬有鱼山曹植墓、高唐洄河汉墓群、莘县孟洼汉墓、聊城垢墙汉墓。

4、古建筑,是指现存于地上的各种古代建筑。从质料上可分为木结构建筑、砖石结构建筑;从形式上可分为殿宇、民居、塔幢、桥梁、城苑等。每一类建筑又可分为若干小类。这些建筑有不少为建筑群组,楼台殿阁互相映衬,木石砖瓦互相补充,形成中国古代建筑多彩多姿的艺术风格。在管理上多称之为地上文物。如:光岳楼、山陕会馆等。

5、石刻。主要是指现存于地上的各种古代石刻、画像石、碑碣、墓志、造像、题咏等。属于地上文物类。我们地区比较有价值的石刻有曹子建墓隋碑、莘县梁不营唐代石刻群、阳谷唐代石塔、赵孟頫撰写的《元札刺王墓碑》等。

对这类文物进行保护的措施主要有:

1、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我们地区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6 处,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86 处。还有 1 千多处尚未被公布的文物史迹。但这不等于说这些文物不重要,不等于没有保护的必要,更不能任意加以破坏。任何一处文物古迹都是国家的宝贵财产,都受法律保护。

2、划定保护范围:

《文物法》规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相应的各级人民政府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

保护范围的划定,是根据该文物保护单位的年代、性质及其地上、地下的保护情况,加以分析研究,确定应保护的四周边界。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如有特殊需

要,必须经原公布的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家文物局同意。

3、划定建设控制地带

《文物法》第12条做了规定。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大小的原则,是保护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根据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在这个地带内建新建筑物,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其设计方案必需征得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报城乡规划部门批准。对安排在建设控制地带的新建筑,其建筑体量、高低、形式、色调、用途等,都要与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相协调。

4、把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城乡建设的总体规划,《文物法》第十条重点谈了这一问题。

各级人民政府在制定城乡建设规划时,首先要由城乡规划部门会同文物管理部门商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纳入规划。如建设工程特别需要而必须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迁移或者拆除的,应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该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物管理部门批准。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缮、保养、迁移时,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关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要注意保护这些名城固有的合理布局。注意整个城市的空间协调,并把一些典型的街区、地段成片地保存下来。确定为重点保护区。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和禁建地带。通过规划,把它有机地组织到城市的整体环境中去,以显示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连续性,要杜绝在历史文化名城新建有严重污染或破坏城市风貌的工业项目。

四、文物的出土、收藏、经营

1、考古发掘与基本建设

《文物法》第十六条规定：“一切考古发掘工作，都必须履行报批手续。地下埋藏的文物，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私自发掘。出土的文物除根据需要交给科学研究部门的以外，由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保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这就是说，在进行基本建设工程或农业生产中，任何个人或单位发现文物，要立即报告当地文物部门。不得隐藏不报，不得居为已有。如有重要发现，必须及时报请上一级文物部门前来处理。如举世闻名的西安秦兵马俑，最初就是由一位当地农民挖井时发现的。他及时报告了当地文物部门。后经勘探，发现是一处十分重要的遗址。经科学的发掘，成为世界第八大奇观。

2、馆藏文物与流散文物的管理

馆藏文物是指由国家设立的博物馆、文物管理所等文物单位收藏的文物。这些文物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员进行管理和研究，一般不会有多大问题，不再赘述。在此想着重谈一谈流散文物，换句话说，也就是散存在社会上非文物收藏单位和私人手中的部分文物如何依法进行管理。流散文物是流散在社会的，包括掌握在集体组织和个人手中、以及以其他方式存在的非馆藏文物。所谓流散，主要是指收藏者的成份比较复杂、文物散布面广，而且随着收藏者经济条件、生活方式的变化，文物可能随时变换和更改着所有权、使用权、具有不稳定的特点。从目前来看，较常见的种类有各种历史和革命的文献资料、书画拓片、图书、邮票、各种质地的雕刻艺术品、货币、服装、生产资料、生活用具、武器、文化娱乐用品和宗教用品，以及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个人收藏的一些过去时代的出土文物等。从现存形式看，流散物包括私人收藏的文物、文

物商品进入流通流域里的文物,银行兑换和再生资源等部门拣选的文物,以及非文物部门收藏的文物。

其中私人收藏的文物属于私人财产的一部分,在法律上受国家保护。同时,文物所有者必须遵守国家有关保护管理文物的规定,不能象处置其他财产那样随意破坏、私自买卖或未经批准而出售、赠送给外国人或境外居民,其对文物的所有权要受国家法律、法规的一定制约。这首先是因为文物不同于其他商品,它是历史的产物,是国家保护的财产,是属于全人类所共有的文化财富。其次因为文物破坏了不能再生,一旦破坏了将会给祖国、民族文化财富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为了确保文物安全,私人收藏者可以请求文物保护部门给予业务指导和帮助,对其所藏进行鉴定,分级分类,采取科学方法和措施,予以妥善保管。私人收藏的文物只能出售给国家指定的文物经营部门或全民所有的文物收藏单位。不能卖给私人或其他文物收藏单位。但是捐赠不在其列。文物收藏单位欢迎私人收藏者将其所藏文物捐献给国家,收藏单位将根据所捐文物的价值,给予适当的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

银行在收兑金银器工作中对拣选的金银质地的文物,应价拨文物部门,对一些历史货币,除经批准,银行可作为研究所需的标本而留用的少部分外,其余均应移交文物部门。冶炼厂、造纸厂、供销社等再生资源单位,在废旧物资中拣选出来的文物,也应移交文物部门,不能随意销毁、损坏和出售给其他单位和个人。无论是银行兑换的,还是拣选出来的文物,在移交文物部门时,均须合理作价,由文物部门支付一定的经费。

3、文物经营

社会流散文物由文物部门统一管理、统一收购、统一经营。经营文物购销业务的单位,必须经过国家和省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能经营文物购销业务。这在《文物

法》第 24 条中有明确规定,但是,目前社会上一些不法之徒,见利忘义,为了发财致富,干起倒卖或走私文物的勾当,竟然以身试法。做为公安、工商、文物管理部门,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牵就姑息。一定要依法严惩,狠狠打击。

《文物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私人收藏的文物,严禁倒卖牟利,严禁私自卖给外国人。”在这里,明确告诉私人文物收藏者,你们所有的文物,如果不愿意珍藏,想出售的话,一定要到国家指定的文物收购单位去卖。不能卖给文物走私犯子,以图暴利,更不能私自卖给外国人。否则,便是违法行为。执法部门可以依法对其进行严厉制裁!

五、文物经费的来源

文物经费的来源主要分以下几种类型:

1、日常文物保护管理经费

《文物法》第六条规定:文物保护管理经费分别列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预算。一般执行的是哪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由哪一级政府拨款进行保护,就过来的情况看,中央、省一级,每年都能拨出相当可观的款项用于文物保护。并且逐年有所增加。如中央以前用于文物保护的经费是每年 7000 万。92 年增长到 1 亿 2 千万。1993 年再增长到 1 亿 3 千万。我们山东省前几年一般在 150 万元左右,92 年增加到 250 万元,93 年增加到 500 万元。增长速度是十分可观的。但是地、县一级就不行了。有许多地、县至今没有为文物保护拨一分钱。客观上讲是财政困难。主观上讲是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希望这种局面能够逐步改变。

2、配合基建工程的文物保护经费

《文物法》第二十条规定:“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文物勘探,考古发掘的,所需经费和劳动力由建设单位列入投资计

划和劳动计划,或者报上级计划部门解决。”这就是说,配合工程的文物勘探发掘经费,是由建设单位支出。关于这一点,有些建设单位因为不熟悉文物法的规定,不愿意出这部分款,使文物勘探工作迟迟不能进行,因而误了工期,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最后还得根据文物法的规定出款进行文物勘探和发掘。这种例子不少。这就是吃了不熟悉《文物法》的亏。

六、奖励与惩罚

国家为了保护祖国文物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依法给予表彰和奖励,对盗窃、盗掘、非法经营文物和走私文物的,坚决予以打击。《文物法》第 29 条规定:有下列事迹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国家给予适当的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

- (一)认真执行文物政策法令,保护文物成绩显著的;
- (二)为保护文物与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
- (三)将个人收藏的重要文物捐献给国家的;
- (四)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
- (五)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上有重要发明创造或者其他重要贡献的;
- (六)在文物面临破坏危险的时候,抢救文物有功的;
- (七)长期从事文物工作有显著成绩的。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决定》,《文物法》第 30 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行政处罚:

- (一)刻划、涂污或者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尚不严重的,或者损毁依照本法第九条规定设立的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的,由公安部门或者文物所在单位处以(200 元以下)罚款或者责令赔偿损失;
- (二)在地下、内水、领海及其他场所中发现文物隐匿不报,不

上缴国家的,由公安部门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并追缴其非法所得的文物;

(三)违反本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工程的,或者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设控制地带修建筑物、构筑物的,由城乡规划部门或者由城乡规划部门根据文化行政部门的意见责令停工,责令拆除违法修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处以罚款(罚款数额为建筑物造价的百分之一,但是最高不超过两万元)。

(四)在文物保护单位附近进行爆破、挖掘等活动,危及文物安全的,由公安部门或者由公安部门根据文化行政部门的意见予以制止,可以处以200元以下罚款。

(五)未经文化行政部门批准,从事文物购销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文化行政部门的意见,没收其非法所得和非法经营的文物,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罚款;

(六)文物经营单位经营未经文化行政部门许可经营的文物的,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文化行政部门检查认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罚款或者没收其非法经营的文物;

(七)有私人收藏的文物私自卖给外国人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2万元以下罚款,并可没收其文物和非法所得;

(八)全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将文物藏品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其他全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的,由文化行政部门责令追回出售、赠送的文物,没收其非法所得或者处以罚款,罚款数额为非法所得的2~5倍,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对于依照前款规定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

请复议或者提出诉讼。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决定》，《文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贪污或者盗窃国家文物的；

(二)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或者进行文物投机倒把活动情节严重的；

(三)故意破坏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名胜古迹的；

(四)盗窃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

(五)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失的。

全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将文物藏品出售或私自赠送给非全民所有制单位或者个人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非法占用国家保护的文物的，以贪污论处；造成珍贵文物损毁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收藏的国家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私自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外国人的，以走私论处。文物工作人员对所管理的文物监守自盗的，依法从重处罚。

贯彻《文物法》，一定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不管什么人，只要是违犯了《文物法》，就要依法追究。保护文物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文物工作的领导，健全和充实管理机构，认真贯彻落实《文物法》的各项具体规定，使文物管理工作法制化、使广大人民群众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坚定信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后 记

十年前,我们曾编辑出版了《文博论集》一书。那是将文革后至 1990 年前聊城地区文物工作者所取得的工作成就、外地区专家、学者有关研究聊城历史文化的成果汇集成册的。当时曾颇得省文博界领导、专家和同仁们的赞许。光阴荏苒,转瞬间又是十年。抚摸手头积累的聊城市文物工作者们分散发表在全国各地报刊、杂志、书籍上的文稿,已不下四十余万言,为了便于查阅这些资料,进而扩大聊城的知名度,于是我们又编集了此书,名曰《鲁西文博论丛》。从某种意义上说,亦可看作是《文博论集》的续集。这两本书,基本上概括了聊城市文物工作者们二十余年来的辛勤著作。如果它能为研究聊城市的历史文化、续写聊城市的历史提供有益的借鉴,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编者

2000 年 2 月 26 日

